

列宁专题文集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

总 目 录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

责任编辑：郇中建

装帧统筹：曹 春

编辑助理：崔继新

技术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赵立新 徐林香 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7889-2

I.列… II.中… III.列宁著作—无产阶级政党 IV.A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692 号

书 名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

LIENING ZHUANTI WENJI

LUN WUCHANJIEJI ZHENGDANG

编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35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7889-2

ISBN 978-7-01-007889-2



9 787010 078892 >

目 录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

[党纲草案](#)

[党纲说明](#)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怎么办？](#)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三）俄国的批评](#)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节选）](#)

[（九）党章第1条](#)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节选）](#)

[序言](#)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致俄共中央](#)

[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俄共（布）纲领草案（节选）](#)

[1 俄共纲领草案初稿](#)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节选）](#)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 相互关系](#)

[十 几点结论](#)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

[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2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节选）](#)

[8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9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

[10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

[关于“出版自由”给A. 米雅斯尼科夫的信](#)

[俄共（布）中央秘密信件的草稿](#)

[关于清党](#)

[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三封信](#)

[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

[重要论述摘编](#)

[返回总目录](#)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¹⁾

(1895年和1896年)

党纲草案

（1895年12月9日〔21日〕以后）

一、1. 大工厂正在俄国日益迅速地发展起来，使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相继破产，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工人，把越来越多的人赶进城市、工厂和工业村镇。

2. 资本主义的这种增长意味着一小撮厂主、商人和土地占有者的财富和奢侈程度大大增加，工人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程度更加迅速地增加。大工厂在生产上的革新和采用机器既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增加了失业人口，从而使工人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

3. 但是，大工厂在极度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时，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有可能同资本进行斗争，因为它的生活条件本身破坏了它同私有经济的一切联系，并且通过共同劳动把工人联合起来，把他们从一个工厂投进另一个工厂，从而把工人群众团结在一起。工人开始同资本家作斗争，于是在他们中间就出现了联合起来的强烈愿望。工人的零星发动发展成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

4. 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反对一切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和反对一切剥削的斗争。只有当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全部土地、工具、工厂、机器、矿山转交给全社会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时，这个斗争才能结束。在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下，工人生产的一切和一切生产革新都应该有利于劳动者本身。

5. 俄国工人阶级运动，就其性质和目的来说，是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6. 俄国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的主要阻碍是不受限制的专制政府及其无需承担责任的官吏。这个政府依靠土地占有者与资本家的特权和对他们利益的殷勤效劳，使下层等级处于完全无权地位，从而束缚了工人运动，阻碍了全国人民的进步。因此，俄国工人

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必然引起反对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的斗争。

二、1. 俄国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的任务是帮助俄国工人阶级进行这一斗争，方法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指出斗争的任务和目的。

2. 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

3.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脱离工人运动，要支持一切反对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阶级、反对一切阻碍竞争自由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残余的社会运动。

4. 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要展开斗争，反对一切想靠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保护来为劳动阶级谋福利的企图，反对一切阻止资本主义发展、因而也阻止工人阶级发展的企图。

5. 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6. 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而是从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三、根据这些观点，俄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求：

1. 召开由全体公民的代表组成的国民代表会议来制定宪法。

2. 凡年满21岁的俄国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都有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

3. 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

4. 出版自由。

5. 消灭等级，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6. 宗教信仰自由，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事宜交由不受警察干涉的独立民政官管理。

7. 每个公民有权向法院控告任何官吏，不必事先向上级申诉。

8. 废除身份证，流动和迁徙完全自由。

9. 有从事任何行业和职业的自由，废除行会。

四、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工人要求：

1. 在一切工业部门中设立工业法庭，从资本家和工人中选出人数相等的审判员。

2. 以法律限定一昼夜工作时间为8小时。

3. 以法律禁止夜工和夜班，禁止雇用15岁以下的童工。

4. 以法律规定节日休假制度。

5. 把工厂法和工厂视察制推行到全俄一切工业部门和官办工厂，同样也推行到家庭手工业者。

6. 工厂视察员应有独立地位，不受财政部管辖。工业法庭的成员在监督工厂法执行情况方面，享有与工厂视察员同样的权利。

7. 无论何处，绝对不得以商品支付工资。

8. 工人选出的代表监督工资的合理规定、产品的检验、罚款的用途和工厂工人宿舍的状况。

以法律规定，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一切款项，不论扣除的原因如何（罚款、废品等），其总数不得超过每卢布10戈比。

9. 以法律规定，厂主应对工人伤残事故负责，如过失在工人方面，厂主则应对此提出证明。

10. 以法律规定，厂主有供给学校经费、给工人以医疗帮助的义务。

五、俄国社会民主党为农民要求：

1. 废除赎金，对已缴赎金的农民给以补偿。把多缴入国库的款额归还农民。

2. 把1861年从农民手中割去的土地归还农民。

3. 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担负的赋税完全平等。

4. 废除连环保以及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令。

[1](#) 这是列宁为创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起草的第一个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在这两篇文献中，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俄国的实际，论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和目标，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要求，并对这些要求作了科学的论证。

党纲说明

（1896年6—7月）

党纲分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党纲其他部分所依据的一切观点。这一部分指出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它同厂主进行的斗争有什么意义和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在俄国的政治地位如何。

第二部分阐述了党的任务，指出党对俄国其他政治派别所采取的态度。这里谈到党和所有认识到自己阶级利益的工人应该进行什么活动，以及对俄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第三部分是党的实际要求。这一部分又分成三节。第一节是关于全国性改革的要求。第二节是工人阶级的要求和纲领。第三节是为农民提出的要求。下面在没有谈到党纲实际部分以前，将对这三节先作一些说明。

一、1. 党纲首先谈到大工厂的迅速发展，因为这是现代俄国的主要现象，它彻底改变了一切旧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在旧的条件下，几乎全部财富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业主生产的。人们当时定居在乡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就是为了附近村落的小市场，这些小市场与附近其他市场很少联系。为地主做工的也是这些小业主，地主强迫他们生产产品主要是为了自己消费。家庭产品则交给手艺人去加工，手艺人也是住在乡村，或者到附近地区去揽活干。

农民解放以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起了根本变化：小手工业作坊开始被飞快发展起来的大工厂所代替；这些大工厂排挤了小业主，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强迫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一起做工，生产大量商品在全俄各地出售。

农民的解放打破了人们的定居生活，农民已经不能再依靠自己剩下的小块土地来维持生活了。许多人出外谋生，有的进工厂，有的修铁路，这些铁路把俄国各个角落联接起来并把大工厂的货物运往全国

各地。许多人进城谋生，为工厂和商店建造房屋，为工厂运送燃料和准备材料。最后，还有许多人在家里，商人和未能扩大自己工厂的厂主交给他们活计。农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地主开始为出售而生产粮食，农民和商人中间出现了大耕作者，几亿普特的粮食开始向国外销售。进行这种生产需要雇佣工人。于是几十万、几百万农民抛弃了自己的小块份地，去给为出售而生产粮食的新主人当雇农和日工。党纲上也描述了旧的生活条件的这些变化，谈到大工厂使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日趋破产并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小生产到处被大生产所代替。在这种大生产中，大批工人已经成了为挣工资而给资本家做工的普通雇工；资本家则拥有大量资本，他们建立起巨大的工厂，收购大批原料，并把联合起来的工人所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生产的全部利润装进自己腰包。生产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它残酷无情地压榨所有的小业主，破坏了他们的乡村定居生活，迫使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普通的小工，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越来越多的人完全脱离了乡村，脱离了农业，聚集到城市，聚集到工厂和工业村镇，形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特殊阶级，即专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雇佣工人一无产者阶级。

这就是大工厂在国家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小生产被大生产所代替，小业主变成了雇佣工人。对全体劳动人民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它会引起什么后果呢？党纲接着谈的也就是这一点。

一、2. 随着小生产被大生产所代替而来的，是各个业主手中的少量货币资金被巨额资本所代替，蝇头微利被百万利润所代替。因此资本主义的增长到处都引起奢侈程度和财富的增加。在俄国，大的金融寡头、厂主、铁路主、商人和银行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阶级。依靠把货币资本贷给工业家以获得利息收入来过活的人们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发财了，他们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土地赎金，他们利用农民需要土地这个机会提高了土地租价，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开办了巨大的甜菜制糖厂和酿酒厂。所有这些富人阶级的奢侈

浮华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布满了他们的豪华府邸和华丽大厦。但是工人的状况却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而日益恶化。在农民解放以后，即使有的地方的工资有所提高，那也是为数很少、时间很短的，因为大批从乡村流落出来的饥民使工资降低了，然而食品和生活用品却越来越贵，因此工资即使有了提高，但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却日益减少，谋生越来越困难了。与富人的华丽大厦并排（或在城郊）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的破旧小房。工人们不得不住在地下室，住在拥挤的、潮湿寒冷的房子里，再不就住在新建厂房附近的土屋里。资本越来越雄厚，越来越残酷地压榨工人，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人，强迫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时间交给工厂，并驱使工人的妻子儿女也去做工。可见，资本主义增长所引起的第一个变化是：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而人民群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

第二个变化是：小生产被大生产代替以后，生产有了许多改进。首先，分散在每个小作坊、每个小业主那里的个体劳动被联合起来的工人在一个工厂、一个土地占有者、一个承包人那里进行的共同劳动所代替。共同劳动比个体劳动要有成效得多（生产效率高得多），生产商品也容易得多，快得多。但是所有这些改进都被资本家独自享用了，一点也不分给工人，他们白白攫取了工人联合劳动的一切好处。资本家更强大了，工人却更软弱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某一种工作，他要改行做另一种工作是比较困难的。

另一个更重要得多的生产改进就是资本家采用了机器。机器的使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但是资本家把所有这些好处用来对付工人：他们利用机器需要的体力劳动较少这种情况，安排妇女和儿童来看管机器，付给他们更少的工资。他们利用机器需要工人极少这种情况，把大批工人赶出工厂，并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进一步奴役工人，延长工作日，剥夺工人夜里休息的时间，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机器所造成的和不断扩大的失业现象现在使工人处于完全无以自卫的境地。工人的技术失去了价值，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很快就习惯

了机器、甘愿为更少工资做工的普通小工所代替。一切想要捍卫自己免受资本更大压力的企图都使工人遭到解雇。单个工人在资本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因为机器会置他于死地。

一、3. 我们在对前一条的说明中已经指出，单个工人在采用了机器的资本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无以自卫的。工人为了自卫无论如何总要寻找一个反击资本家的手段。他们找到联合就是这样的手段。单个无能为力的工人一旦和自己的伙伴联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力量，就能够同资本家斗争并进行反击。

联合逐渐成了工人必需的东西，因为反对他们的已经是大资本。可是把一大群虽然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但是互不相干的人联合起来，是不是可能呢？党纲指出了促使工人联合和培养他们联合的能力和本领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1）大工厂的机器生产要求全年不间断地工作，从而完全割断了工人同土地、同私有经济的一切联系，把工人变成了彻底的无产者。而小块土地上的私有经济却使工人分散，使每个工人都有某些不同于自己伙伴的利益的特殊利益，因而妨碍了他们的联合。割断工人同土地的联系也就消除了这种障碍。（2）其次，成百成千工人的共同劳动使工人们习惯于共同讨论自己的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因为这种劳动鲜明地表明，全体工人群众的地位和利益是相同的。（3）最后，工人经常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这使工人们习惯于对照和比较各个工厂的条件和制度，确信所有工厂的剥削是相同的，吸取其他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经验，从而加强工人的互助和团结。就是这样一些条件的总和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工厂的出现引起了工人的联合。这种联合在俄国工人中间的最经常、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罢工（至于为什么我国工人不能通过工会或基金会的形式联合起来，我们下面再谈）。大工厂发展得越快，工人的罢工就越频繁，越猛烈，越顽强；因此资本主义的压迫越厉害，工人也就越需要共同进行反抗。党纲指出，工人的罢工和零星发动，是目前俄国工厂中最普遍的现象。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罢工的日益频

繁，罢工和发动就显得不够了。厂主们为了对付罢工和发动采取了共同措施：他们订立同盟，从其他地方招雇工人，呼吁国家政权协助他们镇压工人的反抗。反对工人的已经不是单个工厂的单个厂主，而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帮助这个阶级的政府。整个资本家阶级投入了反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它寻求对付罢工的共同措施，要求政府发布对付工人的法令，把工厂搬到比较偏僻的地方，把活计分到家里去做，并采用了其他各种各样的诡计来对付工人。为了反抗整个资本家阶级，单靠单个工厂工人的联合、甚至单个工业部门工人的联合是不够的，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这样，工人的零星发动就发展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跟厂主的斗争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所有的厂主被一种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付给他们尽可能低的工资。厂主认识到，要维护自己的事业，只有整个厂主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只有取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工人同样也被一种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不让资本置自己于死地，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过人的生活的权利。工人同样也认识到，他们也需要整个阶级（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为此就必须争取到对国家政权的影响。

一、4. 我们已经说明，工厂工人同厂主的斗争怎样和为什么成为阶级斗争、成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同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试问，这个斗争对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有什么意义呢？在现代的条件下（这些条件，我们在第一条的说明中已经谈过），利用雇佣工人进行的生产对小经济的排挤越来越厉害。依靠雇佣劳动过活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不仅固定的工厂工人的人数在增加，而且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寻找这种雇佣劳动的农民的人数增加得更多。目前，雇佣劳动，即为资本家做工，已经成了最普遍的劳动形式。资本不仅统治了从事工业的大批人的劳动，而且统治了从事农业的大批人的劳动。大工厂正是把这种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展到了顶点。各工业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所采用的、俄国全体工人群众深受其害

的种种剥削方式，在这里，在工厂，被汇集一起，变本加厉，成为常规，扩展到工人劳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章，一套完整的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现在我们举例来说明：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每个受雇的人，到了节日，只要附近地方庆祝那个节日，他就可以放下工作去休息。工厂的情况完全不同：工厂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雇来的工人，根本不管他们的习惯、日常生活方式、家庭状况和精神上的需要。工厂认为需要时就赶工人上工，迫使工人的全部生活适应工厂的要求，迫使他们把休息时间分割成零星的片断，如果是轮班劳动，则无论在夜间或节日都要强迫他们干活。在工作时间上，凡是能够想得出来的不正当做法，工厂都用上了，同时它还实行了每个工人都必须遵守的“条例”和“制度”。看来，工厂的制度是特意为了适应这样一个目的制定的：从被雇的工人身上榨取他能付出的全部劳动，并且尽快地榨取，然后把他一脚踢开！再举一个例子。任何受雇的人，当然都必须服从自己的雇主，必须完成雇主吩咐他做的工作。然而，受雇者虽然必须完成临时工作，但是他决没有放弃自己的意志；如果他认为雇主的要求不正当或者过分，他可以走掉不干。而工厂却要求工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它规定一种纪律，强迫工人按照铃声上班下班；它享有一种自行处罚工人的权利，如果工人违反了它所制定的规则，它可以罚款或扣款。工人逐渐成了庞大机器的一部分：他不得不像机器本身一样，任人摆布，任人奴役，没有自己的意志。

还有第三个例子。任何受雇的人，往往都不满意自己的雇主，常常向法院或主管当局控告。而当局或法院，在解决纠纷时，总是袒护雇主，总是给雇主撑腰。但是它们这样庇护雇主利益，并不是根据一般的条例或法律，而是根据每个官吏效劳的程度，有时庇护得多些，有时就少些。它们处理案件不公道，袒护雇主，或者是由于同雇主有交情，或者是由于不熟悉工作情况，不了解工人。诸如此类处理不公道的案件决定于工人和雇主的每个具体冲突，决定于每个个别官吏。

工厂则集中了这样大量的工人，压榨工人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无法弄清每个具体案件。于是订立了一般条例，制定了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的关于工人对厂主的关系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中，对雇主利益的庇护已被国家政权固定了下来。个别官吏的不公道已被法令本身的不公道代替。譬如，有这样的条例：工人不上班不但领不到工资，而且还要缴付罚款，但是雇主使工人不上班时，却什么也不付给工人；雇主因为工人粗暴可以解雇工人，但是工人却不能以同样的理由离开雇主不干；雇主有权擅自向工人勒取罚款、扣款，或者要求工人加班等等。

所有这些例子都向我们表明：工厂是怎样加剧对工人的剥削，怎样使这种剥削普遍化，怎样把这种剥削变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不管工人愿意不愿意，他现在要对付的已经不是单个雇主的意志和迫害，而是整个雇主阶级的专横和迫害。工人认识到：压迫他的不是某一个资本家，而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因为所有工厂的剥削制度都是一样的。单个资本家甚至不能违反这种制度。譬如说，如果他想缩短工作时间，那么他的商品就比附近其他厂主的商品要贵，因为其他厂主付出同样的工资，却强迫工人做更长时间的工作。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工人现在不得不对付以资本剥削劳动为方针的整个社会结构。与工人对立的已经不是个别官吏的个别不公道，而是国家政权本身的不公道，这个政权把整个资本家阶级置于自己庇护之下，并发布对这个阶级有利而大家都必须遵守的法令。这样，工厂工人同厂主的斗争，就必然变成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反对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斗争。因此工人的斗争就具有社会意义，成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反对一切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工人的斗争开辟了俄国历史上的新时代，成了工人解放的曙光。资本家阶级究竟依靠什么对全体工人群众进行统治呢？它依靠的是，所有工厂、矿山、机器、劳动工具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归他们私人所有；它依靠的是，大量土地掌握在它们手里（俄国欧洲部分1/3以上的土地属于人数不到

50万的土地占有者所有）。工人自己没有任何劳动工具和原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而把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可见，资本家付给报酬的只是工人工作时间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据为己有。大批工人的联合劳动或生产上的革新而增加的一切财富，都落到资本家阶级的手里，而世代辛勤劳动的工人却仍然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因此，要终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有采取一种手段，就是消灭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所有工厂和矿山以及所有大地产等等都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那时，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因此党纲上指出，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才能结束。为此，就必须使政权即管理国家的权力，从处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影响下的政府手里，或者说从直接由资本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手里，转到工人阶级手里。

这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工人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应该向着这个最终目的奋勇前进。但是在我们俄国，他们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妨碍他们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一、5. 目前，同资本家阶级的统治进行斗争的已经是欧洲各国的工人，并且还有美洲和澳洲的工人。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已经不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都大声宣布，全世界工人的利益和目的是完全共同一致的。它们在一起开代表大会，向各国资本家阶级提出共同要求，给整个联合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无产阶级规定国际性的节日（5月1日），把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成一支工人大军。各国工人的这种联合是必然的，因为统治工人的资本家阶级并不限于在一个国家内进行自己的统治。各个国家的贸易

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资本不断从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银行，这些把各地的资本收集起来并贷给资本家的资本大仓库，逐渐从国家银行变成了国际银行，它们把各国资本收集起来，分配给欧洲和美洲的资本家。大股份公司的建立已经不是为了在一个国家内开办资本主义企业，而是为了同时在几个国家内开办资本主义企业。资本家的国际协会出现了。资本的统治是国际性的。因此，工人只有进行反对国际资本的共同斗争，各国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才会取得成就。因此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无论是德国工人、波兰工人或法国工人，都是俄国工人的同志，同样，无论是俄国资本家、波兰资本家或法国资本家，也都是他们的敌人。譬如，最近一个时期，外国资本家特别愿意把自己的资本投到俄国来，在俄国建立自己的分厂，设立公司，以便在俄国开办新的企业。他们贪婪地向年轻的国家扑来，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更加对资本有好感、更加殷勤，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可以找到不如西方工人那样团结、那样善于反抗的工人，因为这个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低得多，因而他们的工资也低得多，所以外国资本家可以获得在自己本国闻所未闻的巨额利润。国际资本已经把手伸进俄国。俄国工人也把手伸向国际工人运动。

一、6. 我们已经谈过，大工厂怎样把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发展到了顶点，怎样建立起一整套剥削方式；工人起来反对资本时又怎样必然地把全体工人联合起来，怎样必然地引起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工人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这个斗争中，同庇护资本家及其利益的一般国家法令发生了冲突。

但是，既然工人联合起来能够强迫资本家实行让步，能够反击他们，那么工人联合起来同样也能够影响国家法令，争取修改这些法令。其他各国的工人正是这样做的，但是俄国工人却不能直接影响国家。在俄国，工人的处境是，他们被剥夺了最普通的公民权利。他们既不能集会，也不能共同讨论自己的事情，既不能结社，也不能刊印

自己的声明。换句话说，国家法令不仅是为了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它们还直接剥夺了工人影响这些法令和争取修改这些法令的一切可能。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俄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也只有俄国）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也就是保存着这样一种国家机构，沙皇一个人能够任意发布全国人民必须遵守的法令，而且只有沙皇任命的官吏才能执行这些法令。公民被剥夺了参与发布法令、讨论法令、提议制定新法令和要求废除旧法令的一切可能。他们被剥夺了要求官吏报告工作、检查官吏的活动和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权利。公民甚至被剥夺了讨论国家事务的权利：没有这些官吏的许可，他们不能集会结社。可见，官吏是完全为所欲为的。他们好像是一个骑在公民头上的特殊等级。官吏的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和人民本身的毫无发言权，使这些官吏穷凶极恶地滥用职权和侵犯平民百姓的权利达到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几乎都不可能有的地步。

因此，在法律上，俄国政府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它好像是完全独立于人民的，凌驾于一切等级和阶级之上的。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法令也好，政府也好，为什么在工人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当中，总是站到资本家方面去呢？为什么资本家随着自己人数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多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而工人却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和限制呢？

实际上，政府并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而是维护一个阶级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维护有产阶级来反对穷人阶级，维护资本家来反对工人。不受限制的政府如果不给有产阶级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不可能管理这样一个大国。

虽然在法律上政府是一个不受限制的、独立的政权机关，但实际上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却有千百种手段影响政府和国家事务。他们有法律所承认的自己的等级机关、贵族和商人协会、工商业委员会等组织。他们选出的代表，或者直接充当官吏，参加国家管理（譬如贵族代表），或者被邀担任一切政府机关的委员，譬如厂主按照法律可以

选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工厂事务会议（这是工厂视察机关的上级机关）的会议。但是他们并不限于这种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他们还在自己的协会里讨论国家法令，拟定草案，而政府每件事情也往往征求他们的意见，送给他们某种草案，请他们提出意见。

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举行全俄代表大会，讨论自己的事情，寻求对本阶级有利的各种措施，代表所有贵族地主、代表“全俄商界”请求发布新法令，修改旧法令。他们可以在报上讨论自己的事情，因为不管政府怎样通过自己的书报检查钳制言论，但是剥夺有产阶级讨论自己事情的权利，那它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门路和途径通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最高代表，可以比较容易地谴责下级官吏的专横行为，可以容易地废除限制特别苛刻的法令和条例。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法令和条例，有这样空前未有的政府的警察式的监护来干预一切琐事、使一切活生生的事情失掉固有的特点，那么，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仅仅根据高级领导的恩准就这样轻易地违反这些资产阶级的条例和这样轻易地回避这些警察式的法令。而且从来也不拒绝给以这种恩准⁽¹⁾。

二、1. 这是党纲中最重要、最主要的一条，因为它指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党应该进行哪些活动；一切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哪些活动。它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消除长期人剥削人现象的愿望，应该怎样同大工厂造成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人民运动结合起来。

党的活动应该是帮助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党的任务不是凭空捏造一些帮助工人的时髦手段，而是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阐明这个运动，并在工人自己已经开始进行的这个斗争中帮助他们。党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那么在工人的斗争中对工人的帮助究竟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党纲谈到，这种帮助应该是：第一，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至于工人同厂主的斗争怎样逐渐变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讲过了。

从以上所述产生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工人的阶级自觉。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只有同大工厂所造成的资本家、厂主阶级进行斗争，才是改善自己状况和争得自身解放的唯一手段。其次，工人的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本国所有工人的利益是相同的，一致的，他们全体组成了一个不同于社会上所有其他任何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最后，工人的阶级自觉就是工人认识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必须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就像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已经争取到并且在继续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影响一样。

工人究竟通过什么途径认识到这一切呢？工人经常是通过他们已经开始的反对厂主的斗争、通过这个随着大工厂的发展而日益扩展、日益尖锐、日益吸引更多工人的斗争来认识到这一切的。有过一个时期，工人敌视资本还只表现为憎恨自己的剥削者的模糊情感，表现为对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模糊认识和向资本家复仇的愿望。当时的斗争表现为工人的零星发动，如破坏厂房，捣毁机器，殴打厂长等等。这是工人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因为对资本家的憎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促使工人产生自卫要求的第一个推动力。但是俄国工人运动已经从这种最初形式向前发展了。工人已经不是模糊地憎恨资本家，而是已经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他们已经不是模糊地感到自己在受压迫，而是开始分析，资本究竟通过什么和究竟怎样压榨他们，同时他们起来反对这种或那种压迫形式，限制资本的压榨，保卫自己，反击资本家的贪心。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向资本家复仇，而是过渡到进行争取让步的斗争。他们开始向资本家阶级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要求，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每次罢工都把工人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人阶级所处的这种条件或者那种条件上。每次罢工都引起工人对这些条件的讨论，帮助工人认清这些条件，弄清资本在这些条件下怎样进行压榨，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同这种压榨进行斗争。每次罢工都丰富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经验。罢工胜利

了，它会向工人阶级证明工人联合的力量，同时会促使其他工人去利用自己同志的胜利。罢工失败了，它会引起工人讨论失败的原因，并寻找更好的斗争方式。俄国工人取得的巨大进步，就在于各地工人现在都开始转向为解决自己的迫切需要、争取让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而进行不倦的斗争，因此，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觉悟的工人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斗争和促进这个斗争上面。对工人的帮助应该是：指出斗争应该去满足的那些最迫切的需要；分析那些使这些或那些工人的状况特别恶化的原因；解释工厂法和工厂条例，因为工人常常由于违反这些法令和条例（以及受到资本家的蒙骗）而遭到加倍的掠夺。帮助应该是：更明确地表达工人的要求并公开提出这些要求；选择最好的时机进行反抗；选择斗争方式，讨论斗争双方的情况和力量，讨论是否可以找到更好的斗争方式（如果不能直接采取罢工等形式，那就可以根据情况，也许采取致函厂主、向视察员或医生呼吁等办法）。

我们已经说过，俄国工人转向这种斗争是他们的一大进步。这个斗争把工人运动带上了（引上了）康庄大道，它是工人运动进一步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工人群众通过这个斗争，第一，可以学习辨别和分析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学习把这些方式同法令、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加以对比。工人在分析个别的剥削方式和情况的时候，学会认识整个剥削的意义和实质，学会认识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二，通过这个斗争，工人可以检阅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联合，学习认识联合的必要性和意义。这个斗争的扩大和冲突的频繁必然导致斗争的扩大和工人（起初是某一地区的工人，后来是全国工人，整个工人阶级）的统一精神即团结一致精神的增强。第三，这个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处于这样的状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空闲时间和可能去考虑任何国家大事。但是工人为解决自身的日常需要同厂主开展的斗争本身，必然使工人接触国家大事，政治问题，即俄国这个国家是怎

样管理的，法令和条例是怎样发布的，它们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等等。工厂发生的每次冲突，都必然使工人同法令、同国家政权机关的代表人物发生冲突。工人们在这时第一次听到了“政治演说”。首先听到的就是工厂视察员的演说，他们向工人解释说，厂主借以压榨工人的诡计，是以有关当局批准的、允许厂主任任意压榨工人的条例的确切含意为依据的，或者说，厂主的压迫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厂主只是运用自己的权利，他们是以国家政权机关批准和维护的某项法令为依据的。除了视察员先生们的政治解释以外，有时还可以听到一位大臣先生的更为有益的“政治解释”，这位大臣先生向工人们提到“基督博爱”的精神，说他们应当感谢厂主的这种博爱精神，因为厂主靠剥夺工人的劳动成了百万富翁。除了国家政权机关代表人物的这些解释和工人们直接认识到这个政权的活动究竟对谁有利以外，后来还出现了社会主义者的传单或其他解释，因此工人通过这样的罢工完全可以受到政治教育。他们不仅学习认识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而且学习认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总之，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的阶级斗争所能给予的帮助应该是：在工人争取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斗争中给予帮助，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

第二种帮助，正像党纲所说的，应该是协助工人组织起来。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种斗争要求工人必须组织起来。现在，为了更顺利地进行罢工，为了给罢工者募捐，为了建立工人储金会，为了向工人进行宣传，为了在工人中间散发传单、通知、号召书等等，都需要组织。为了保卫自己免受宪警迫害，为了隐蔽工人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不让宪警发现，为了递送给工人以书籍、小册子和报纸等等，就更需要组织。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帮助，——这就是党的第二项任务。

第三种帮助是指出斗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说，要向工人解释，什么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剥削是依靠什么进行的，土地和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怎样使工人群众陷于赤贫境地，怎样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把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以外的全部剩余劳动产品白白

送给资本家，其次要向他们解释，这种剥削怎样必然地引起工人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的条件及其最终目的又是怎样的，——一句话，解释这个党纲所简略指出的东西。

二、2. 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俄国资本家早就懂得了这种影响的必要性，我们也已指出，俄国资本家是怎样不顾警察法的百般禁止而找到了千百种手段来影响国家政权的，这个政权又是怎样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自己的斗争，甚至不可能争得自己处境的不断改善。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必然导致工人同政府发生冲突，而政府本身也竭尽全力向工人证明，工人只有进行斗争，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才能影响国家政权。1885—1886年俄国发生的大罢工，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政府立即着手制定工人条例，立即颁布关于工厂制度的新法令，向工人的顽强要求作了让步（譬如施行了限制罚款和合理支付工资的条例）。⁽²⁾现在（1896年）的罢工也同样立即引起了政府的干预，而且政府已经懂得：只是逮捕和流放是不行了，再用颂扬厂主品德高尚的愚蠢训令（见财政大臣维特给工厂视察员的通令。1896年春季。⁽³⁾）来款待工人就太可笑了。政府已经看出，“联合起来的工人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是它就重新审查工厂法，在圣彼得堡召开工厂视察长代表大会，讨论缩短工作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向工人让步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这个斗争现在的确已在影响国家政权，获得政治意义。但是工人运动越向前发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的情况，工人根本不可能公开地、直接地影响国家政权的情况，就越清楚、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感觉出来。因此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

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得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争得政治自由成了“工人的迫切事情”，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从而必然仍旧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受屈辱的、不能发表意见的阶级。如果现在，当工人的斗争和团结还刚刚开始，政府就急于向工人让步，以制止运动的继续发展，那么毫无疑问，当工人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迫使政府投降，一定会为自己、为全体俄国人民争得政治自由！

党纲的前几部分已经指出，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工人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什么，代表工人利益的党的任务是什么。在俄国政府无限权力的统治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公开的政党，但是代表其他阶级的利益、可以影响舆论和政府的政治派别还是有的。因此，为了说明社会民主党的地位，现在必须指出它对俄国社会其他政治派别的态度，以便工人们能够确定，谁可以成为他们的同盟者，在什么限度内是他们的同盟者，以及谁是他们的敌人。党纲的下面两条指出了这一点。

二、3. 党纲宣称，首先，所有反对专制政府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的同盟者。因为这种无限权力是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主要障碍，所以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工人的直接利益要求大家去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专制就是不受限制；专制制度就是政府有无限权力）的社会运动。资本主义越发展，官僚管理机构和有产阶级本身利益即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就越深刻。所以社会民主党宣称，它将支持资产阶级中间所有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阶层和等级。

资产阶级直接影响国家事务，比它现在通过一群卖身求荣、横行霸道的官吏来影响国家事务，对工人说来，是无比有利的。资产阶级公开地影响政治，比它现在通过似乎是万能的、“独立的”政府来隐

蔽地影响政治，对工人说来，也要有利得多，因为这个政府自命为“承受上帝恩典”，并把“自己的恩典”赐给受苦受难、爱好劳动的土地占有者和贫困不堪、受尽压迫的厂主。工人必须同资本家阶级进行公开斗争，以便让俄国全体无产阶级能够看到工人是为了哪些利益而斗争的，能够学会应该怎样进行斗争；以便让资产阶级的阴谋和企图不能隐藏在大公的外室里、参议员和大臣的客厅里、政府各部门绝对秘密的办公室里；以便让这些阴谋和企图暴露出来，使每个人都看清楚，究竟是谁在影响政府的政策，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追求的是什么。因此，必须清除一切掩盖资本家阶级现在的影响的东西。因此，必须支持一切反对官吏，反对官僚管理机构，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宣布自己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运动的同时，承认自己并不脱离工人运动，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与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需要消灭政府的无限权力，只是为了公开地、广泛地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

其次，社会民主党声明，它将支持所有起来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阶级的人们。在俄国，贵族地主被视为国家的第一等级。他们对农民的农奴制统治的残余，直到现在还压迫着广大人民。农民还在为从地主势力下解放出来而缴纳赎金。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为的是使地主老爷们不致感到缺乏廉价而驯服的雇农。农民直到现在还像一群毫无权利、尚未成年的人一样，受官吏们的任意摆布，这些官吏维护自己的腰包，干预农民的生活，以便使农民能够“按时”向农奴主——地主缴纳赎金和代役租，以便使农民不敢“逃避”给地主做工，不敢（举例来说）迁徙，因为迁徙会使地主不得不到别处去雇没有这样便宜、没有受到这样贫困逼迫的工人。地主老爷们奴役千百万农民，强迫他们给自己做工，使他们继续处于毫无权利的地位，由于这

些英勇业绩，地主老爷们享受最高的国家特权。国家的最高职务主要由贵族地主担任（而且按照法律，贵族等级也享有担任国家职务的最大权利）；显贵地主最接近宫廷，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直接、容易地使政府的政策服从自己的利益。他们利用自己接近政府的地位，掠夺国库，从公款中得到几百万卢布的赠品和恩赐，这些赠品和恩赐有的是作为俸禄的大地产，有的是“让步”。^[4]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69—93页

^[1] 原件中由此往下的几个字，抄写人显然没有辨认出来。胶印本中这里印着“[*脱漏I*]”，接下去有这样半句话：“不负责任的官员的统治，比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各种干涉，社会越是乐意把机会给[**脱漏II**]”。——俄文版编者注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9—33页。——编者注

^[3] 同上书，第95页。——编者注

^[4] 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胶印本中，正文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1897年底）

90年代后半期的特点，是在提出和解决俄国革命问题方面呈现异常活跃的气象。新的革命党民权党的出现，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和成绩的增长，民意党内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在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工人小组中以及秘密宣传中，引起了对纲领问题的热烈讨论。在秘密宣传中值得指出的有：“民权党”的《迫切的问题》和《宣言》（1894年），《“民意社”快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在国外出版的《工作者》，在俄国国内出版主要供工人阅读的革命小册子的紧张活动，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1896年著名的彼得堡罢工时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等等。

在我们看来，现在（1897年底）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问题。我们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是因为它的理论方面，看来已经度过了最紧张的时期；当时，它根本不为对手们所了解，又有种种势力力图在新派别一出现时就把它压下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则热烈捍卫自己的基本原则。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观点，在其主要的与基本的方面，已经充分阐明了。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方面，关于它的政治纲领，关于它的活动方法，它的策略，却还不能这样说。我们觉得，正是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多误会和隔阂，妨碍着某些革命者与社会民主党充分接近，这些革命者在理论上已经完全离开民意主义，而在实践上，或是由于客观力量所迫，到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甚至把自己在工人中间的活动放到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或者力图把民主主义任务当做全部纲领和全部革命活动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后一评语是适用于目前在俄国与社会民主党人同时活动的两个革命团体，即民意党和民权党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把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任务解释清楚，把我们下述看法的根据加以说明是特别适时的：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是现有三个纲领中最合理的纲领，反对意见多半是由于了解不够。

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我们刚才说大家知道。的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自从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这一活动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联系在他们所采用的名称上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然而直到现在，你们还往往看见，有些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抱着一种极端谬误的观念，责难社会民主党人忽略政治斗争等等。我们现在就来稍微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践活动的这两个方面。

我们从社会主义活动谈起。自从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彼得堡工人中间活动时起，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活动的性质，看来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工作，就是在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使工人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了解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的斗争，了解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了解工人阶级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应采取的态度，了解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同宣传工作紧密相联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下，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

民主党人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日、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的要求表述得更明确、更切实，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它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建立经常的秘密联系，印发工人书刊，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我们的工作首先和主要是针对城市工厂工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力量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因为工业无产阶级最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智力上和政治上最发展，并且按其数量以及在国内巨大政治中心的集中程度来说，又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坚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党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然而，我们虽然认为必须集中自己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反对分散力量，但我们丝毫无意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根本不是这样。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本身，使他们往往要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同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同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现在把自己的力量派到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间去工作，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决不想忽视这些阶层，而要努力教育先进工人了解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的日常生

活情形，使这些工人在同无产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阶层接近时，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俄国民主派，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也带给这些阶层。当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派遣鼓动员到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中去是不实际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既然有很多机会不知不觉地接触这些人，那就应该善于利用这种机会并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般任务。因此，那些责难俄国社会民主党狭隘，说他们因为只注重工厂工人而有意忽视广大劳动群众的人，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中间进行鼓动，是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唤醒起来（随着运动的扩大）的最可靠手段。在城市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必然会使这些思想经过比较细小分散的渠道传播开来：为此必须使这些思想在较有锻炼的人们中间扎下较深的根，使俄国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完全领会。俄国社会民主党运用自己全部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同时决定支持俄国那些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工作放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地上来的革命者，但他们毫不隐讳，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深信，现在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他们将用全力来传播这个学说，使它不受曲解，反对任何想把还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同那些不确定的学说联系起来的行为。理论的判断证明，而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则表明：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工作。我们再说一遍：这个工作与社会主义工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的时候，不能避开政治问题，并且认为，想避开政治问题或者把它们搁置一边的任何做法，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背离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在工人群众中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

思想，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活动表现，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当前的经济要求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的时候，把这种鼓动与根据工人阶级当前的政治需要、政治困苦和政治要求进行的鼓动密切联系起来，例如进行鼓动反对那种在每次罢工、每次劳资冲突中都出现的警察压迫，反对对工人，作为俄国公民，特别是作为最受压迫最无权的阶级的工人所实施的权利限制，反对每一个与工人直接接触并使工人阶级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政治奴隶地位的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和走狗。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做政治鼓动的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密切联系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因而也就使工人有可能在解决迫切问题和迫切需要方面试验自己的力量，使工人们有可能从敌人方面争得局部的让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资本家不能不考虑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使政府不能不扩大工人的权利和接受工人的要求，使政府在怀有敌对情绪并由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所领导的工人群众面前经常胆战心惊。

我们已经指明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是完全并行的。然而这两种活动和斗争也有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

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还有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迫害的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这里自然就发生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对于这些分子应该抱什么态度？其次，工人阶级是否应当与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既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政治革命在俄国应当先于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岂不是应当与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联合起来进行反专制制度的斗争，而暂时把社会主义搁置起来，这不是为加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所必需的吗？

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工人阶级这个反专制制度的战士对其他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早已由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原则十分确切地规定出来了。⁽²⁾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进步的社会阶级去反对反动的社会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这种支持并不打算也不要求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特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党人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并不打算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那里为自己取得什么，也不会让与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

在宣传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的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证明专制制度敌视工人事业时，将指明专制制度也敌视其他某些社会集团，将指明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任务上，工人阶级和这些集团是一致的，等等。在鼓动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将利用专制制度警察压迫的每一表现向工人们指明，这种压迫如何落在一切俄国公民头上，尤其是落在特别受压迫的等级、民

族、宗教和教派等等的头上，这种压迫如何特别影响到工人阶级。最后，在实践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心同其他派别的革命者结成同盟，以便达到某些局部目的，而这种决心已用事实多次证明过了。

这里我们也就谈到第二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一致时，始终要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要解释这种一致的暂时性与相对性，始终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今天同盟者的敌人。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指出这点，就会减弱现在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我们回答说：指出这点，只会加强所有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的力量。只有那些立足于已被认识的一定阶级的实际利益的战士，才是强而有力的；凡是把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起着主要作用的阶级利益蒙蔽起来，都只会削弱战士的力量。这是第一。第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应当使自己划分出来，因为只有它才是专制制度的彻底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会屈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为了巩固自己小私有者的地位而会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反对无产阶级。有教养的人，整个“知识界”，不能不站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摧残思想和知识的野蛮的警察压迫，但是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至于被压迫民族和受迫害宗教中间的民主分

子，那么谁都知道，谁都看得见，这几类居民内部的阶级矛盾，要比每一类中的各个阶级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制度的一致性深刻得多，强烈得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这个阶级的地位不可能有丝毫改变，它既没有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他各个阶级和集团的民主主义融合起来，就会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削弱政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容易妥协。反过来，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划分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将带动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同当前社会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俄国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现在还要补充说：俄国一切真正的和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拿官僚这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的机关来说，从专制的、半亚洲式的俄国起，到有文化的、自由的、文明的英国止，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官僚机关。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吏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在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监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种监督也远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着不少特权，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即使在英国，我们也看到，有势力的社会集团总是支持官僚特权地位，不让这个机关完全民主化。这

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这个机关的完全民主化仅仅有利于一个无产阶级；于是连资产阶级最先进的阶层，也维护官吏的某些特权，反对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反对完全废除资格限制，反对官吏对人民直接负责等等，因为他们感觉到，这种彻底的民主化将被无产阶级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俄国人民中许多各不相同的阶层，都反对专权独断、不对任何人负责、贪赃受贿、野蛮昏聩、过着寄生生活的俄国官吏，可是，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一个阶层会容许官吏机构完全民主化，因为其他一切阶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整个“知识界”）都与官吏有联系，都与俄国官吏有亲属关系。谁不知道，在神圣的俄罗斯，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很容易变为帝国政府的官吏，他们以在官场范围内有所“裨益”而聊以自慰，他们以这种“裨益”来替自己的政治冷淡态度辩护，来替自己向刑棍和皮鞭的政府献媚辩护。只有无产阶级，才绝对敌视专制制度和俄国官吏；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任何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

我们证明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是俄国民主运动的先进战士的时候，竟遇见一种十分流行而又十分奇怪的意见，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拖延政治任务和政治斗争。我们知道，这种意见与真实情况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曾多次阐述过，而且早在最初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中，即“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小册子和书籍中就已经阐述过，为什么有人竟如此惊人地不了解呢？我们觉得，这一奇怪事实是由于下面三个原因产生的：

第一，是因为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各个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现实阶级的估计。正因为人们没有用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来讨论那些支持俄国民主运动的利益，才能发生这种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忽略俄国革命者的民主主义任务的意见。

第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换成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政治压迫的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俄国激进派分子往往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不直接号召先进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而提出了发展工人运动和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就是从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往后退，就是拖延政治斗争。可是，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语所说的那种后退：“为要远跳，必须后退！”

第三，误会所以发生，是因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概念本身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比旧的革命理论代表人物的理解广泛得多。1895年12月9日《“民意社”快报》第4期，就具体证明了这个似乎不近情理的说法。我们衷心欢迎这个刊物，因为它表明在现代民意党人中间进行着一种很有成效的深刻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纲领问题》一文（第19—22页）显然表明老民意党人对于政治斗争有另一种理解⁽³⁾。彼·拉·拉甫罗夫谈到民意党人的纲领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关系时写道：“……这里有一点而且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在专制制度下面，离开组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是否有可能组织强大的工人党呢？”（第21页第2栏）；在稍前一点（第1栏）也同样说：“……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组织俄国工人党，而不同时组织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革命党。”我们完全不懂彼·拉·拉甫罗夫认为十分重要的这些差别。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除了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党之外的工人党”？？难道工人党本身不是革命党么？难道工人党不反对专制制度么？对于这个奇怪议论，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建立俄国工人

党的组织，是要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同时组织政治密谋⁽⁴⁾来反对专制制度及其搞这种密谋⁽⁴⁾的一切条件而能做到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的政治纲领当然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因为工人的解放将能用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然而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第21页第1栏）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民意党人原来认为政治斗争与政治密谋是一回事！必须承认，彼·拉·拉甫罗夫的这些话，真是十分明显地指出了民意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斗争策略方面的基本区别。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以致他们只能把政治斗争设想为政治密谋这种形式。社会民主党人却没有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谁都明白，彼·拉·拉甫罗夫所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西方的活动看成最好的榜样”（第21页第1栏），不过是辩论中的胡言乱语罢了。其实，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与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但他们始终认为，这种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他们认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把警察政府的勇士们统统钉上耻辱柱，迫使这个政府实行让步。难道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不正是这样么？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而没有组织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么？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

的巨大政治势力么？1897年6月2日颁布的法令，无论按其匆忙施行或就其本身内容来说，都显然表明这是被迫对无产阶级实行的让步，这是从俄国人民的敌人手中夺得的阵地。虽然这个让步很小，虽然这个阵地不大，可是要知道，争得这个让步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并不大，并不坚固，成立不久，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经费：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1895—1896年间才成立的，它对工人们的号召，只是通过胶印的和石印的传单。如果这样的组织至少包括了俄国工人运动一些最大的中心（圣彼得堡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区，南俄以及各重要城市，如敖德萨，基辅，萨拉托夫等等），拥有革命机关报，在俄国工人中间享有像“斗争协会”在圣彼得堡工人中间所享有的那种威信，那么这个组织就会成为目前俄国最大的政治因素，成为政府在其全部内外政策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这难道可以否认么？一个组织，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的组织和纪律，帮助工人为了自己的经济需要而斗争，又接二连三地从资本手里夺得阵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不断地和勇往直前地攻击专制制度，消灭每一个使无产阶级感觉到警察政府魔爪的沙皇强盗，这样的组织就会是既适合我国条件的工人党组织，又会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强大的革命党。预先来谈论这个组织为了给专制制度以决定性打击将采用什么手段，例如，它将采取起义，还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或者其他进攻手段，——预先来谈论这个问题，并且要在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是空洞的学理主义了。这就好像将领们尚未调集军队，动员军队去进攻敌军以前，就预先召集军事会议一样。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自身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素质，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

和对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

因此，彼·拉·拉甫罗夫的下面一段议论，也是十分不正确的：

“如果他们（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一定要不仅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而且还要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那么不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怎样称呼自己，他们事实上是要采纳他们对手即民意党人的纲领。在村社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以及经济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对实际事业不太重要的、促进或妨碍在准备主要之点时规定局部任务和局部手段的一些细节而已。”（第21页第1栏）

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驳，怎么能说在俄国生活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理解历史的各种基本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牵涉到一些“细节”呢！早已有人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现在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理的必要。阶级斗争的理论，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了解俄国历史，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估计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形，承认必须把革命斗争归结为一定阶级的一定利益，并分析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把这些问题叫做“细节”，是绝顶荒谬的。从革命理论的老手方面听到这种言论，真是出人意料，我们简直要说这是失言。至于上面所引那段话的前半节，它的荒谬无理就更令人惊奇了。报刊上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是部署工人力量去反对资本（就是说，只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同时团结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去反对专制制度，——说这种话，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也许彼·拉·拉甫罗夫不承认那些在社会民主党人队伍里进行实际工作的人是“革命分子”和“革命团体”吧？！或者（这也许更正确些）他把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只了解为反专制制度的密谋吧？（参看第21页第2栏：“……问题是要……组织革命密谋”；黑体是我们用的）。也许彼·拉·拉甫罗

夫认为谁不组织政治密谋，谁就是不进行政治斗争吧？我们再说一遍：这种观点完全合乎古老民意主义的古老传统，但它完全不合乎现代的政治斗争概念，也不合乎现代的实际情况。

关于民权党人，我们还要说几句话。在我们看来，彼·拉·拉甫罗夫说得完全对：社会民主党人“把民权党人当做比较直爽的人，并且决心支持他们，但是不与他们融合起来”（第19页第2栏）；不过要补充一句：是当做比较直爽的民主主义者和只要民权党人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可惜，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真实的现在，不如说是所希望的将来。民权党人曾经表示愿意使民主主义任务摆脱民粹主义，并且根本摆脱与“俄国社会主义”的陈腐形式的联系，但他们自己还远未摆脱旧的偏见，远不彻底，因为他们竟把自己仅仅主张政治改革的党称为“社会〈？？！〉革命”党（见他们1894年2月19日发表的《宣言》）。《宣言》里说：“民权这一概念包括组织人民生活”（我们只能凭记忆引证），这就证明他们又在偷偷地运用那种民粹主义偏见。所以彼·拉·拉甫罗夫称他们为“戴假面具的政治家”

（第20页第2栏），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是，也许把民权主义看成一种过渡的学说会更正确些，它有不可否认的功劳，就是它以民粹派学说的独特性为耻而与民粹派中最可恶的反动分子公开进行争论，这些分子面对警察式的阶级专制制度竟然说什么人们期望的是经济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见“民权”党出版的《迫切的问题》）。如果民权党内除了那些从策略考虑而藏起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戴上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假面具的（如彼·拉·拉甫罗夫所假设的那样，第20页第2栏）旧时社会主义者而外，确实没有别的人，那么这个党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然而，如果在这个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努力唤醒我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等这一阶级的政治自觉，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这个小资产阶级在西欧各处的民主运动中都起过相当的

作用，它在我们俄国改革后的时代，已在文化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特别迅速的成就，它不能不感觉到警察政府进行压迫和恬不知耻地援助大工厂主、金融和工业垄断大王的事实。为此，民权党人必须力求和各个居民阶层接近，不要仍然局限于那个“知识界”，因为“知识界”由于脱离群众实际利益而软弱无力，这是连《迫切的问题》也承认了的。为此，民权党人就要抛弃那种想把各种社会分子融合起来并借口政治任务来排斥社会主义的企图，就要抛弃那种妨碍他们自己与人民中间资产阶级阶层接近的虚伪羞耻，就是说，不要仅仅谈论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的纲领，而且还要按照这个纲领去行动，唤醒并发展那些完全不需要社会主义，但日益感到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阶级自觉。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个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践活动。其他派别的革命者，已经不得不放下对社会民主理论和纲领的批评，而来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活动。必须承认，后面这种批评与理论批评大不相同，有可能造出这样可笑的谣言，说圣彼得堡“斗争协会”不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那种指斥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政治斗争的流行责难是不正确的。出现这样的谣言本身，也就证明未被社会民主党人理论所说服的许多革命家已经开始被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说服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有许许多多刚刚开始的工作要做。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它对知识、团结、社会主义、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自发追求，表现得日益明显、日益广阔。俄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内达到的巨大进展，保证工人运动将会毫不停顿地扩大和深入。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

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从而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尖锐地提出早已摆在每个有觉悟有思想的工人面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民主主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设法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破产到来的时候更有觉悟，更加团结一致，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能够回击现在赚得巨额利润而随时都想把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的资本家阶级，能够领导俄国民主势力去进行决战，反对那束缚俄国工人和全体俄国人民手脚的警察专制制度。

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满足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要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鼓动的书刊，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工党！

(1) 这是列宁论述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的小册子。列宁根据对俄国社会状况的分析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开展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两种斗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特别强调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论点。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286页。——编者注

[\(3\)](#) 在第4期上发表的彼·拉·拉甫罗夫的论文，不过是彼·拉·拉甫罗夫预定在《资料》上发表的那封长信中的“摘录”而已。我们听说，今年（1897年）夏天，在国外发表了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全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可是我们无法看到这封信，也无法看到这个回答。《“民意社”快报》编辑部曾答应在第5期上发表编辑部对于彼·拉·拉甫罗夫这封信的评论（见第4期第22页第1栏附注），但我们也不知道该期是否已经出版。

[\(4\)](#) 黑体是我们用的。

“斗争协会”告彼得堡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彼得堡革命者正处在困难的时期。政府确实是动员了它的全部力量来镇压产生不久就显示了很大威力的工人运动。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乱抓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男是女；逮捕工人，成批地把他们放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消息，说警察政府疯狂地迫害它的敌人，愈来愈多的人遭到牺牲。政府决心不让俄国革命运动的新潮流发展壮大起来。检察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夸耀，说他们把“斗争协会”摧毁了。

这种夸耀完全是谎话。尽管迫害重重，“斗争协会”还是屹然不动。我们非常满意地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已经发生了自己的作用，它已成为向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进行鼓动的有力工具，一批革命者倒下去，另一批新的人又带着新的力量站到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俄国人民而战的战士队伍里。斗争不可能没有牺牲。对于沙皇强盗的野蛮迫害，我们镇静地回答说：革命者牺牲了，——但革命必将胜利！

直到目前为止，加紧迫害只不过使“斗争协会”的某些活动暂时削弱，使代办员和鼓动员的人数暂时有所不足。现在正是感到这种暂时的不足，所以我们向一切觉悟的工人和一切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斗争协会”需要代办员。一切愿意从事任何一种革命活动，哪怕是极小范围内的活动的小组和个人，请把自己的愿望告诉同“斗争协会”有联系的人。（如果有的小组找不到这样的人，可以通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代为转达。这种情形可能很少。）需要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的分工愈严格，他们对秘密活动的方法和隐蔽的方式考虑得愈周密，他们愈是忘我地埋头于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和局部性的工作，总的事业就愈可靠，宪兵和奸细就愈难发现革命者。政府预先就撒下了密探网，而且不仅对准真正的反政府分子的基地，连那些有可能的和有嫌疑的地方也不放过。政府豢养一批专事迫害革命者的奴

仆，不断扩大和加强他们的活动，并且想出一些新办法，设置一批新的挑拨者，竭力用恫吓、伪造口供、假造签名和假文件等等手段来迫害被捕者。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而秘密活动首先就要求各个小组和个人实行专业分工，把统一联系工作交给“斗争协会”的为数很少的核心分子。革命工作的分工是十分繁杂的。需要有公开的鼓动员，他们善于向工人宣传，但是又不致因此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要善于只说出甲的意思，使别的人说出乙和丙的意思。需要有散发书刊和传单的人。需要有工人小组的组织者。需要有散在各个工厂而能提供厂内各种情况的通讯员。需要有监视奸细和挑拨者的人。需要有设置秘密住所的人。需要有传递书刊、指示和进行各种联络的人。需要有筹集款项的人。需要在知识界和官吏中间有一批同工人、工厂生活和当局（警察、工厂视察机关等等）有接触的代办员。需要有同俄国和国外各城市进行联络的人。需要有能用各种方法翻印各种书刊的人。需要有保管书刊和其他物品的人，等等，等等。各个小组或个人担负的工作愈细小，就愈有可能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工作，保证工作不致失败，研究各种秘密工作的细节，采取各种办法麻痹宪兵的警惕性，使他们迷茫混乱，这样，工作的成功就愈有希望，警察和宪兵就愈难追踪革命者以及他们同组织的联系，革命政党就比较容易用他人来代替牺牲的代办员和党员，而不致使整个事业遭到损害。我们知道，实行这种分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所以困难，是因为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眼的、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但是只有这样，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才有可能用多年的时间从事革命事业的全面准备工作，实现极其宏伟的事业。我们深信，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决不逊于前辈的革命者。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方式，许多献身革命工作的人都将经历一段非常艰苦的准备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斗争协会”要收集有

关这些愿意效劳的个人或小组的必要材料，考验他们适于执行什么使命。不经过这种预先的考验，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

为了把这种活动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才把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的一点体会介绍出来。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方式就能使革命工作的胜利获得最大的保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

《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1900年8月下旬）

编辑部的话

在政治报纸《火星报》出版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们的意图和我们对自己的任务的理解。

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近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知识界传播之快，是异常惊人的，而与这一社会思潮相呼应的却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独立产生的运动。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地方性的鼓动小报广为流传，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报供不应求，政府变本加厉的迫害已阻挡不住这个运动了。监狱中拥挤不堪，流放地也有人满之患，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听到俄国各地有人被“抓获”、交通联络站被侦破、书报被没收、印刷所被封闭的消息，但是运动在继续发展，并且席卷了更加广大的地区，它日益深入工人阶级，愈来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俄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进程、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将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最终冲破重重障碍而向前发展。

可是，另一方面，最近时期我们的运动特别明显的主要特点，就是运动的分散状态，即运动的所谓手工业性质：地方小组的产生和活动，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甚至（这一点尤其严重）与一直在同一中心活动的小组也没有联系；没有树立传统，没有继承性，地方书报也完全反映出分散状态，反映出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树立的东西缺乏联系。

这种分散状态是不符合波澜壮阔的运动的要求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使当前成了运动发展的紧要关头。运动本身迫切要求巩固，要求具有一定的形态和组织，然而这种向运动的高级形式过渡的必要性，

远非各地做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所能认识的。相反，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存在着思想动摇的情况，倾心于时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伯恩施坦主义”，散布所谓“经济派”的观点，这样就必然力图阻碍运动，使它停留在低级阶段，把建立领导全体人民进行斗争的革命政党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可以看到这一类思想动摇；狭隘的实际主义不从理论上来阐明整个运动，有把运动引上歧途的危险，这都是事实。凡是直接了解我们大部分组织的实际情况的人，对这一点是不会怀疑的。而且有些著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指出《信条》、《〈工人思想报〉增刊》（1899年9月）或彼得堡“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的宣言就够了。《信条》已经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抗议，《〈工人思想报〉增刊》非常露骨地表现了贯穿整个《工人思想报》的倾向，彼得堡“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的宣言也是本着这种“经济主义”的精神拟就的。《工人事业》断言，《信条》只不过代表极个别的人的意见，《工人思想报》的倾向不过是反映了该报编辑部的思想混乱和不通情理，并不是俄国工人运动进程本身的特殊思潮，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与此同时，有一些著作家一直被读者不无根据地认为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向资产阶级辩护论的观点转变的迹象愈来愈明显了。这一切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因此，伯恩施坦这个原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个原社会党人才能历数自己的成就，才能在书刊上扬言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多是他的信徒而不受驳斥。

我们不想夸大情况的危险性，但是闭眼不看这种危险性，其害处更大；因此我们衷心拥护“劳动解放社”的决定——恢复出版书报的活动，并着手进行有系统的斗争来反对歪曲社会民主主义和把它庸俗化的企图。

由此得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

主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这个任务早就由1898年的代表大会确定了，那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

我们既然是这个党的党员，就完全赞同《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认为《宣言》的重要意义在于公开宣布了我们党的目的。因此，对我们党员来说，关于当前迫切任务的问题是：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

通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必须重新选举中央机构并委托它恢复党的机关报。但是，在我们处于涣散状态的时期，这种简单的办法未必合适。

建立和巩固党，也就是建立和巩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而由于上述原因，这种统一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办到的，不是只根据某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一番努力。首先，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恕我们直言，这种情况目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中还普遍存在；必须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地及时地传递有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组织，建立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邮递工作，党才能稳固地存在，党才能成为真正的事实，从而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决心要为实现这个任务的前一半，即创办坚持原则的、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的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这是当前运动的迫切要求，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还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达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思想上的统一，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公开地全面讨论当前“经济派”、伯恩施坦派和“批评派”提出的原则上和策略上的基本问题。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它会把现存的涣散状

态掩盖起来，妨碍彻底清除这种涣散状态。因此很清楚，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大概也没有必要再补充说，我们主张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坚决反对爱德·伯恩斯坦、彼·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人首先提出而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虽然在讨论一切问题时我们持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之间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为了弄清目前各种意见分歧的深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为了同革命运动中不同观点的代表、甚至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不可避免的走极端现象作斗争，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

我们不想一一列举已经列入我们机关报的工作规划的那些问题和题目，因为这个规划本身就是从目前形势下即将出版的政治报纸应该怎样一种报纸这个总概念产生的。

我们将尽量使全体俄国同志把我们的出版物看做自己的机关刊物，在这里，每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都来介绍自己的经验，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评价，总之，每个小组都来谈谈它对运动的贡献和在运动中的收获。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真正是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只有这种机关报才能把运动引上政治斗争的康庄大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说：“要扩大我们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范围，充实它们的内容。”这句话应当成为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近的将来活动的口号，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口号列入我们机关报的工作规划。

我们不仅向社会党人和有觉悟的工人发出号召。我们的号召也是向一切备受现行政治制度压迫和蹂躏的人们发出的，我们为他们提供版面去揭露俄国专制制度的一切丑恶现象。

谁把社会民主党理解为一个只搞无产阶级自发斗争的组织，谁就会满足于只搞地方性的鼓动工作和“纯工人的”书报。我们不是这样理解社会民主党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反对专制制度、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只有组织成这样一个政党的无产阶级，即现代俄国最革命的阶级，才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把全国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彻底战胜万恶的制度，完成历代先人的未竟之业。

每号报纸的篇幅约为1—2印张。

鉴于报纸在俄国处于秘密状态，出版日期不能预定。

我们有各方的支持，——外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人士答应为我们撰稿，“劳动解放社”（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直接参加我们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若干组织以及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团体都答应支持我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1—318页

（1）这是列宁为全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报纸《火星报》撰写的声明。在这篇声明中，列宁针对俄国社会革命运动中存在的涣散状态、无政府状态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旗帜下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为此，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创办坚持原则的革命刊物，必须坚决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的一致。

怎 么 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节选）

（1901年秋—1902年2月）

（1）这是列宁论述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著作。在节选的部分，列宁批判了俄国经济派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贬低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的机会主义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指导意义，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Что дѣлать?

Наболѣвші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ія

Н. ЛЕНИНА.

... „Партиная борьба придаетъ партии силу и жизненность, величайшимъ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ъ слабости партии является ея расплывчатость и притупленіе рѣзко обозначенныхъ границъ, партия укрѣпляется тѣмъ, что очищаетъ себя“ ... (Изъ письма Лассалля къ Марксу отъ 24 іюня 1852 г.).

Цѣна 1 руб.

Preis 2 Mark = 2.50 Francs.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02

1902年列宁《怎么办?》一书封面
(按原版缩小)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像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¹⁾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斯坦讲出来了，由米勒兰做出样子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伯恩斯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大量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论文里，都一直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有教养阶级的一代青年，都经常

在受这种批评的熏陶，那么，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法国在这一次也没有辜负它历来的名声，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序言）⁽²⁾。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制发展程度较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这么热心地、迫不及待地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做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 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

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现在这种“批评自由万岁！”的叫嚷太像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了。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1\)](#) 顺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之间，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

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页。——编者注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最近（第10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做理论原则，而是当做政治要求提出来的，即在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这一问题时提出来的：“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第36页）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明确的结论：1. 《工人事业》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2. 《工人事业》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结论。

《工人事业》“特别”不高兴的，是“《火星报》和《曙光》喜欢预言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必将决裂”[\(1\)](#)。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类比，它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思想家可能认为的那样，代表着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黑体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用的）派别，包括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第32—33页）

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断定说“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坚决为最

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辩护，却拿不出任何的论据和理由。作者显然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那么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竟以该派代表人物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紧接着的关于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第34—35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充分的批评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法国人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偏激行为的害处”。

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直是“按伊洛瓦伊斯基方式”来研究历史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要解释德国社会党为什么统一和法国社会党为什么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点，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加以比较，不必回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²⁾、讲坛社会主义者），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法国人所以争吵是因为他们偏激，德国人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乖孩子。

你看，用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把维护伯恩施坦派的言论完全推翻的事实。伯恩施坦派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一个国家的伯恩施坦派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参看《工人事业》第2—3期合刊第83—84页），试图独自站稳脚跟。拿法国人“不肯调和”当借口，除了有其“故事性的”（诺兹德列夫式的）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话来掩盖很不愉快的事实罢了。

而且，就连德国人我们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许许多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所以还能见容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服从那个坚决摒弃伯恩施坦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以及那个尽管措辞婉转、但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吕贝克决议。至于从德国党的利益来看，这种婉转的措辞究竟适当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场合下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还是可以争论的，简而言之，在评价用哪种方法拒绝伯恩施坦主义才妥当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拒绝伯恩施坦主义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是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一说法，就是完全不了解有目共睹的现实情况。⁽³⁾

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人事业》还向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显然它是认为我们这里有人冤枉了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究竟是冤枉了什么人呢？是谁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工人事业》始终避而不谈，没有一次提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这里我们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事业》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两篇文章都只讲《曙光》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如果是这样，那么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施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工人事业》，不替“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讲点好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或者被人冤枉的是某个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还在继续玩那种从它一创立就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游戏。其次，请注意这第一次实际运用被大肆吹捧的“批评自由”的情况吧。实际上，“批评自由”不仅立刻表现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表现为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正是这

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做暗疾（照斯塔罗韦尔的中肯的说法）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现在却主张，为了治这种病，只要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就行了！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模仿……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惩罚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样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那我们就自己来试试，把《工人事业》不愿说出来的（或许是它无法理解的）东西哪怕是简单地说明一下。

[\(1\)](#) 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做18世纪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见《火星报》第2号（1901年2月）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无题派”或孟什维克，至今都很爱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现在人们却宁愿默不作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2\)](#) 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杜林的观点的，人们甚至公开在党代表大会上纷纷责备恩格斯，说他偏激，不肯容忍，用非同志式的态度论战等等。莫斯特等同志提议（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上）在《前进报》上不再登载恩格斯的论文，认为这些论文“绝大多数读者都不感兴趣”；而瓦尔泰希（Vahlteich）则说登载这些论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说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出了力的：“我们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教授们要争论，那么《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争论的场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们看，这也是维护“批评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

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评派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

[\(3\)](#) 必须指出，《工人事业》在谈到德国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问题时，始终只限于单纯转述事实，完全“不肯”说出自己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例如，在第2—3期合刊第66页上讲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竟把一切意见分歧都归结为“策略”，并且只是指出绝大多数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4—5期合刊第25页及以下各页上，也只不过是把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述一遍，并把倍倍尔的决议摘引一下；这里又是（也像在第2—3期合刊上一样）把对于伯恩施坦观点的叙述和批评留待“专文”去谈。可笑的是，在第4—5期合刊第33页上说道：“……倍倍尔所阐述的观点赢得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赞同”，而稍后一点却又说：“……大卫发言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他首先就竭力说明……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毕竟是〈原文如此！〉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是1899年12月间写的；到1901年9月的时候，《工人事业》大概已经不再相信倍倍尔正确，而把大卫的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来重复了！

（三）俄国的批评

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产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受检查的书刊上打开了一条道路，虽然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习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做危险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然也就出现了不止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书刊上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结成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往后的“批评”发展明显地证实了）早在“联盟”还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¹⁾

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出现那种“混乱”，是否应当由那些同未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最大的责任呢？

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那里，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肯定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议可以比做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做政治协定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作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破裂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破裂不过是使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书刊上消失。在这种书刊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

（现在《工人事业》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这有事实为证，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伯恩施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荐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可是，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书刊上。在人们转向“批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主义”。

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我们只要指出无疑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臭名远扬的《信条》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

《信条》并不是编造出来的，但它的公布没有照顾它的作者们的意愿，也许，甚至是违反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把新“纲领”公布于世⁽²⁾的本书作者已经听到一些怨言和责难，说不应该把发言者概述自己观点的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节，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的“经济主义”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害怕公开。这正是整个“经济主义”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真诚地拥护“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有《工人事业》（它因“经济主义的”文件在《指南》中发表

出来而表示愤慨），有基辅委员会（它在两年以前也不愿意让人把它的《宣言书》连同那篇反驳《宣言书》的论文一起登载出来⁽³⁾），还有许许多多单个的“经济派”分子。

拥护批评自由的人有这种害怕批评的表现，不能单单用不老实来解释（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也非不老实不可，因为把还没有巩固的新派别的萌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是不合算的！）。不，大多数“经济派”确实打心眼里憎恶（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说，他们也应当这样）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让侨居国外的人去干这些事情吧！”——一个相当彻底的“经济派”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过，而他这句话是代表一种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纯粹工联主义的）观点的：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正像《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第10期异口同声地所说的那样，都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

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都没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下面我们将从各方面来详细地说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批评自由”的要求同我们俄国的批评以及俄国的“经济主义”的特点处于怎样一种极端矛盾的状态。

况。其实，看一看“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肯定《工人事业》观点的那个决议就行了：

“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党的书刊上有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评不同这个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10页）

理由就是：决议的“第一部分同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未觉察到他们这样抄袭多么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贫乏（*testimonium paupertatis*）！……“但是……决议的第二部分却比吕贝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

这样，“联合会”的决议就是针对俄国伯恩施坦派的了？否则，提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岂不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决议逐条拒绝了，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吕贝克决议中，则对伯恩施坦本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对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经济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表现都只字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那么空空洞洞地说什么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就会给曲解留下更大的余地，特别是“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做机会主义（《两个代表大会》第8页第1条）。但这还只是顺便说说而已。而主要的是，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在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批评派”则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的修正主义意图又很怯懦，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派只是把“革新主张”干脆否决了事。而在我们俄国，却是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看做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所滥用过的“批评自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

党的联系⁽⁴⁾，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够“限制”、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来“限制”批评自由的为大家公认的党的机关）；“经济派”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工人事业》第10期第25页），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一封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4页）。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即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声明）⁽⁵⁾。总之，德国人坚持现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反对同它调和。

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的“自由地”抄袭德国人决议的专家们就没有觉察到！

⁽¹⁾ 这是指前面刊印的克·士林的一篇反对司徒卢威的文章，该文是根据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学术讲演写成的。见序言。（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²⁾ 指反对《信条》的17人抗议书。本书作者参加过起草这个抗议书的工作（1899年底）。1900年春，抗议书曾同《信条》一起在国外刊印出来。现在从库斯柯娃女士的文章中（仿佛是登在《往事》上）已经知道：《信条》的作者就是她，而当时在国外的“经济派”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³⁾ 据我们所知，基辅委员会的成员从那时起发生了变化。

⁽⁴⁾ 单是缺少公开的党的联系和党的传统这一事实，就构成了俄国和德国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必定会提醒每一个明智的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从下面这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批评自由”在俄国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俄国的批评派布尔加柯夫先生竟谴责奥地利的批评派赫茨说：“赫茨作的结论虽然很有独立精神，但是他在这个问题（合作社问题）上，看来毕竟是太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了，他虽然在细节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始终不敢离开总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第287页）一个政治上备受奴役的国家，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由于政治上处于奴隶状态和完全不懂党的荣誉和党的联系而墮落到了极点，

这样的国家里的臣民，竟傲然地责备一个宪制国家里的公民过于“受党的意见的束缚”！那么，我们的不合法组织就只好去拟订关于批评自由的决议了……

[\(5\)](#)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6页。——编者注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的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提出一个问题：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面前有两个书刊出版声明：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的纲领》（《工人事业》第1期单张），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两个声明都标明是在1899年发表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在第一个声明中，你们丝毫没有指出这个现象，也没有确切说明新的机关刊物对这个问题打算采取的立场。关于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问题，无论在这个纲领中，或在1901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这个纲领的补充条文中（《两个代表大会》第15—18页），都只字未提。在这整个时期内，《工人事业》编辑部始终都把理论问题搁在一边，虽然这些问题是全世界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与此相反，另一个声明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减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方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评”我们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倾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倾向”。已经出版的几期《曙光》，表明了这个纲领的执行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现象）：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

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¹⁾，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

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1874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²⁾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把各个行业组织得很好，但是前进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按巴枯宁不伦不类的模式传播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以罕见的理解力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件究竟能让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赋予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愈来愈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愈来愈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刻牢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这样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3\)](#)

恩格斯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意外的严重考验。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编者注

[\(2\)](#) 1875年莱比锡合作出版社第3版。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302页。——编者注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我们说，必须用70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但是，最近有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至今对这个问题的一切流行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局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总的意见分歧”归结到更深的根源上去，即归结为“对自发因素和自觉的‘有计划’因素相比哪个意义大，有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提出的指责是：“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¹⁾。对此我们回答说：即使同《火星报》和《曙光》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想到这个“总的意见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普遍的关注，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¹⁾ 1901年9月《工人事业》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90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普遍的。大约同一时期，在有名的1896年彼得堡工业战争之后，工人罢工也带有同样的普遍性。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

“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

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¹⁾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里特别要指出那个常常被人忘记的（也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手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做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那些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底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准备好要付印的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阿·亚·瓦涅耶夫⁽²⁾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⁶⁶（也许过个30年，会有一家像《俄国旧事》那样的杂志把它从警察司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³⁾，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尔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讯）。可见，90年代俄国社会

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所谓“初次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力求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当时的运动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也是如此；《工人报》以及1898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更是如此。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这种缺乏修养的情况归罪于当时的活动家。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吸取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⁴⁾，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变得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还有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从理论上论证自己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了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¹⁾ 工联主义决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

[\(2\)](#) 阿·亚·瓦涅耶夫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时得了肺病，于1899年在东西伯利亚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耶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

[\(3\)](#)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

[\(4\)](#) “《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90年代末，即使在90年代中期，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欣赏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我们在讲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书刊上的种种表现之前，先要指出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个事实多少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后来的两派之间的纠纷在彼得堡活动的同志们中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7年初，阿·亚·瓦涅耶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流放之前，参加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的主要是组织问题，也谈了《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定稿发表在《〈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上（第46页）。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开玩笑地把他们叫做“十二月党人”）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青年派”拥护的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决不是这个，而是加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的那些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显然，争论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道扬镳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极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个事实表明，即使在俄国，“经济主义”的产生和泛滥也并不是没有经过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的（现在的“经济派”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进行活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变动极其频繁，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出现把“经济主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的。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当时俄国许许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具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成败的偶然因素是很

多的，才能懂得为什么这个“新”派别的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好，都长时间不能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断定，这究竟真是一种特殊的派别呢，或者只是个别人缺乏修养的表现。比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引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弗·伊一申的文章（《〈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7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了这篇社论，而弗·伊一申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心地——狂热地——夸奖这个同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纸大不相同的新报纸。⁽¹⁾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制服的人阻止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写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的⁽²⁾，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后退，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水平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³⁾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这类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移植到本国土地上来，向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⁴⁾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当前的意见分歧⁽⁵⁾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像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不要说亲身参加过当前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正是这样。然而，我们所以要特别坚持让读者彻底弄清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所以要为了明确起见而引用有关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以及1897年初“老年派”同“青年派”争论的材料，是因为有些以自己的“民主主义”相标榜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

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这一纲领。这个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⁶⁾，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⁷⁾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⁸⁾：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黑体是卡·考·用的）。于是这些批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可以想见：被人用上述方式驳倒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愈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愈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

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像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ßen Hineingetragen）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新草案接受了旧纲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一来，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⁹⁾，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發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

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通盘思考一番，正如每个从事写作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仔细思考自己的见解一样，那他们就只能“把一双没用的手交叉在空虚的胸前”，而……而把阵地让给司徒卢威之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把阵地让给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请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走上（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盛情参与下）的那条进步党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不是谈论什么轻视自发因素，什么策略—过程，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做法。为此需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许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比如说，柏林的工人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直到现在也远远没有结束（也许那些根据普罗柯波维奇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根据司徒卢威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最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懈的斗争，才能保持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¹⁰⁾。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采取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年人，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章程中，就谈到要同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论点，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比在其他国家更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不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尽管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国家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那么《工人事业》的说法就是对的。这种要求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以及天主教工人和“祖巴托夫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可见，《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

它，不如说是崇拜它的自发性，崇拜它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但完全不肯独立地研究一下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治。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也是这样。

[\(1\)](#) 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一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1898年11月，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一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业》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

[\(2\)](#) 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施吕瑟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细J. J. 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

[\(3\)](#) 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的理论修养究竟怎样。当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书刊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理解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干反动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真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却在重复这种把“经济唯物主义”粗暴地庸俗化的论调！

[\(4\)](#) 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斗争的人。

[\(5\)](#) 我们强调当前的，是要请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说：现在斥责《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们回答当前这些伪君子说：这里指的就是你，只是改了一下名字。关于这些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证明。

[\(6\)](#) 《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

[\(7\)](#) 《工业事业》第10期。

[\(8\)](#) 《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3期第79页。卡·考茨基谈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

[\(9\)](#)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份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学习愈来愈多地领会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

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的，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中的情况，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10\)](#)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三）“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

我们这样详细地分析《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那篇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现在差不多已被遗忘的社论，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现了一个总的潮流，这个潮流后来又涌现出无数细流。弗·伊一称赞《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及其社论，说它写得“很尖锐，很有斗志”（《〈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9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认为自己提出了某种新主张的人，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只有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攻击该报论敌的“论战的斗志”。

我们现在且不谈《〈工人思想报〉增刊》（下面谈到各种问题时，我们还得引用这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经济派”思想的作品），而只简单地谈谈《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发表于1899年3月，转载于1899年7月伦敦《前夕》第7期）。这篇宣言的作者们说得很公道，“工人的俄国还刚开始觉醒，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并本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但是他们也和《工人思想报》一样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些作者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们跟着瓦·沃·先生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服从于它”。

至于说到《工人事业》，那么它的活动一开始就是为“经济派”“辩护”的。《工人事业》竟在它的第1期（第141—142页）上公然撒谎，说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¹⁾里警告“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但是在同阿克雪里

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工人事业》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用迷惑不解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青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以反驳这种不公正的责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责备“经济派”眼界狭小）。其实，这个责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清楚地知道这个责备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编辑弗·伊一申的头上。我想顺便指出，在上述争论中，在解释我的那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²⁾时，阿克雪里罗得完全正确，《工人事业》却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最初的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到1898年上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小册子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危险，我这本小册子上所阐述的观点已于1897—1898年间在圣彼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排挤掉了。⁽³⁾

但是，《工人事业》不仅为“经济派”“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错误上去。所以会滑下去，是因为《工人事业》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基本上将决定联合会的书刊工作的任务〈黑体是我们用的〉和性质。”说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群众性运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是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经济派”就是这样理解的）；或者是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地讲过任何新任务，而始终都认为，似乎这个“群众性运

动”使我们不必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运动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认为不可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25页）。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在第7期上的《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⁴⁾，我们暂且不谈这篇文章，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第10期。我们当然不准备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曙光》和《火星报》提出的各条反驳意见。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想去分析，比如说《工人事业》发现下面两种提法是“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一种提法是：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等等。（《火星报》创刊号）⁽⁵⁾另一种提法是：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4号）⁽⁶⁾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疗法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自己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法”。因此它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10期第18页），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第11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后面这一句话很有希

望成为一句名言，成为《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指导性的机关刊物所作的回答是：运动是运动的起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间的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并不只是一个笑话（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别来讲了），而且是整个派别的纲领，尔·姆·在《〈工人思想报〉增刊》上把这个纲领表述如下：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极端机会主义派别。

“策略一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是把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正如民粹派在同我们论战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贬低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广阔的前景，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千百万人的强大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充满着时而由这个政治领袖时而由那个政治领袖提出的种种计划，证实了某个领袖所持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个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建立帝国、成立帝国国会、赐予普选权这种极大的历史转变时，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整个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干脆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伯恩施坦（部分参与）则提出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现在应当以模范行为来求得宽恕；当时那些筹备并出版了秘密机关报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在选择道路问题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的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了最后的定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回顾往事，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这当然是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⁷⁾，

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覆辙的“策略一计划”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恰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当他们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范围”[\(8\)](#)，当他们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策略一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

《工人事业》往下又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由于《火星报》对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第18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制订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制订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反而是轻视自觉因素，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单是谈论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相比〔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哪个意义大的估计”，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假如说某些“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一般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么对这种自发因素的不正确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因素”。假如说这种因素是人的意识所不能觉察到的，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因素，也无法加以谈论了。波·克里

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星报》的“主观计划”是错误的（而他正是宣布这些计划是错误的），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观事实，就应当因这种忽略而责备《火星报》缺乏自觉性，用他的说法，就是“轻视自觉因素”。假使他不满意主观计划，除了援引“轻视自发因素”（！！）之外又没有其他论据，那么他以此只是证明：（1）在理论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和备受别尔托夫讥笑的卡列耶夫之流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一样；（2）在实践上，他完全满足于那些把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诱到“经济主义”上去的“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并且他对那些无论如何也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自发”发展道路的人“十分恼火”。

再往下纯粹是些滑稽可笑的话了。“正如人们不管自然科学取得什么成就而还是要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现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是自发地爆发的结果。”（第19页）有一句老话说得妙：要生儿养女，谁没有智慧？——同样，“现代社会党人”（像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之类）也有一句话说得妙：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生成，谁都有智慧。我们也认为谁都有这种智慧。为了参与，只要在“经济主义”流行时听从“经济主义”，在恐怖主义出现时听从恐怖主义就行了。例如，今年春天，正应当告诫大家不要醉心于恐怖手段的时候，

《工人事业》对这个在它看来是“新的”问题感到困惑莫解。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当问题已经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一方面向我们声明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也不应当是阻止恐怖主义情绪的发展”（《工人事业》第10期第23页），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有计划的进攻性的恐怖手段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多么圆通！我们不去阻止它，但宣布它不合时宜，而且这样宣布的意思是说，“决议”并没有把无计划的和防御性的恐怖手段包括在内。

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决议很保险，完全可以保证不犯错误，正如一个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的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一样！为了拟定这样一个决议，只要善于做运动的尾巴就行了。当《火星报》讥笑《工人事业》把恐怖手段问题说成一个新问题时⁽⁹⁾，《工人事业》怒气冲冲地指责《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15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组织，说服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因素啊！⁽¹⁰⁾如果只是旧调重弹，不拿什么“强加于”人，对于每一次向“经济主义”或向恐怖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把自己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做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神灵”（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所谓的《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策略—过程”，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认，下定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运动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不会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5—51页“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的。

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这样迅速（并且继续在迅速地发展），以致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的任务显得缺乏修养。这种缺乏修养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连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整个知识界以至农民都掀起了风潮）。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工人事业》贬低我们的理论任务并“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因为重复这一口号的人，对了解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立场和革命派的立场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点缺乏“自觉性”。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方面和组织工作中，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是怎样表现的。

[\(1\)](#) 《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1897年写给《工人报》的两封信。

[\(2\)](#) 见本书第25—45页。——编者注

[\(3\)](#) 《工人事业》在写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之后，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任务》一书的书评以来，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产生或是较为明确地形成了经济主义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任务》一书描绘的我国运动的状况相比，就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1900年出版的《回答》是这样说的。但《工人事业》第1期（即登载有书评的那一期）是在1899年4月出版的。难道“经济主义”1899年才产生出来吗？不，189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初次对“经济主义”提出了抗议（即对《信条》的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编者注）。“经济主义”是在1897年产生的，《工人事业》分明知道这一点，因为弗·伊一早在1898年11月（在《〈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上）就称赞过《工人思想报》了。

[\(4\)](#) 例如，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论是这样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1900年8月写的！）应当适合于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才应当去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11页）。在第4页上，作者反驳了

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责，他慷慨激昂地喊道：“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黑体是我们用的）这“所以”二字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波·克里切夫斯基所重复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的议论（即政治服从于经济等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斯坦派的议论（例如沃尔特曼正是用这种议论来证明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力量”，然后才能考虑政治革命）。

[\[5\]](#)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7页。——编者注

[\[6\]](#)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

[\[7\]](#) 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Ein Jahr der Verwirrung（混乱的一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策略—计划”时起先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

[\[8\]](#) 摘自《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6页。——编者注）

[\[9\]](#)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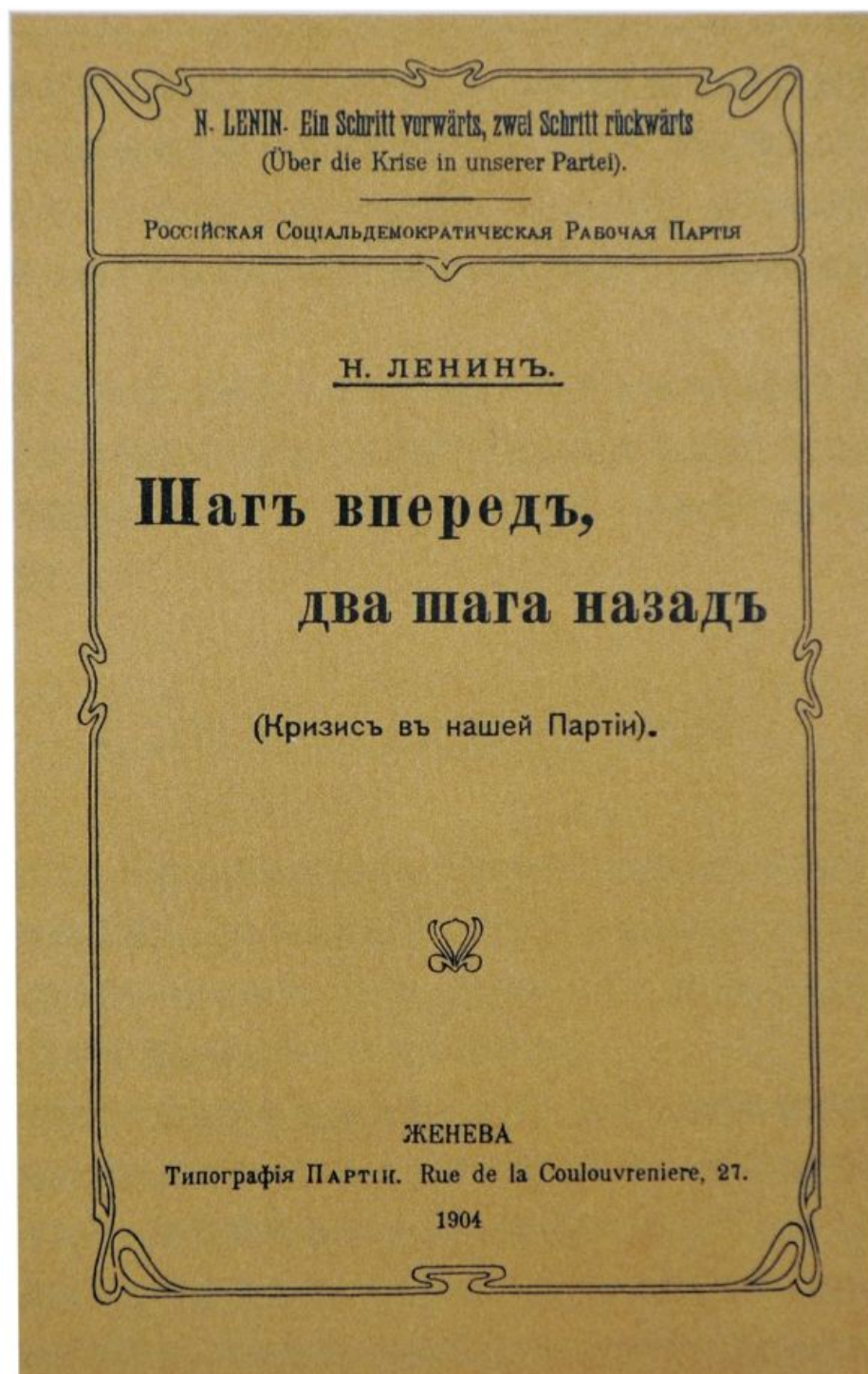
[\[10\]](#) 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手段问题时，还总结了以前的革命运动的经验。

进一步，退两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 （节选）

（1904年2—5月）

（1）这是列宁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的重要著作。在节选的部分，列宁批判了俄国党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强调应当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通过组织的统一来保证党的坚强团结和步调一致，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九）党章第1条



1904年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封面
(按原版缩小)

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热烈的有意义的争论的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1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250页）⁽¹⁾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1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

用绞索，就像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像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像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及其他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庞巴杜尔式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了。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戈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还难以认清这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

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²⁾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和“民意党”）作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作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

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作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做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

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纳

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91页）[\(3\)](#)。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将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

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争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的第1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第240页）⁽⁴⁾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像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⁵⁾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

支持。不是像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86页）[\(6\)](#)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

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96页）⁽⁷⁾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17—18页）⁽⁸⁾。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

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 [\(9\)](#)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正大”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1条的情况。布鲁凯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布鲁凯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整个精神”(第239页),而他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的拥护者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

础。布鲁凯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布鲁凯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252页）。他继续说：“我和布鲁凯尔，想挑选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像马尔丁诺夫同志⁽¹⁰⁾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245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们、阿基莫夫们以及马尔丁诺夫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

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第255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241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242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作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像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像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

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做组织中的成员。”（第241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了《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内。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的体系……”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布鲁凯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布鲁凯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事件）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

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 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公式吧：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5）“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第241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¹¹⁾。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

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

“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当时在代表大会上倒是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觉，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及其被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外层小组表示赞同我的要求。”（不仅外层小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¹²⁾，但是我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1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有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¹³⁾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做

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看来不是多余的，这在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14)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

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表决党章第1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像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1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才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布鲁凯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戈罗夫和察廖夫）归附到火星派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23票（24-5+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划分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

我（“中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火星派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1\)](#)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

[\(2\)](#) “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

[\(3\)](#)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页。——编者注

[\(4\)](#)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

[\(5\)](#)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1页。——编者注

[\(6\)](#) 同上书，第108页。——编者注

[\(7\)](#)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0页。——编者注

[\(8\)](#)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2—13页。——编者注

[\(9\)](#) 同上书，第13—14页。——编者注

[\(10\)](#) 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本书第25—45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

[\(11\)](#)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東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

[\(1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

[\(13\)](#) 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

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

[\(14\)](#) 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¹⁾当做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57号）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对抗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而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多少触及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他没有作任何尝试来认真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

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我们了解前面说过的一切之后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由于自己的这种特性，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而求救于惬意的幻想。他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供一个领袖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显露出是一个自由派分子时，那些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面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只不过是郑重地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能引证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么他的事情想必已经是十分不妙了！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我们不会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来翻阅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

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争论。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所有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这种写法有可能被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阶级推到后面去，并使前者同后者隔离开，而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了（是用事实，而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社会民主党内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的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由于他所犯的错误）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第169页）。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戈尔德布拉特）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170页），——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关于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的联系的看法，所不同的只是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把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出来，而戈尔德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

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像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第62号上的社论）。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一批40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

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反复咀嚼起码的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陷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就得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白痴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工人事业》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

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

《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明显的原因为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能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表明肯于让步而想掩盖⁽²⁾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从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主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啊！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是，对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骄傲和自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像一个机会主义者（党章第1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而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了——他说：葡萄是酸的！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并不是万应灵丹；什么是句法呢？它并不像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来的一种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

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56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能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自夸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天啊！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覆去地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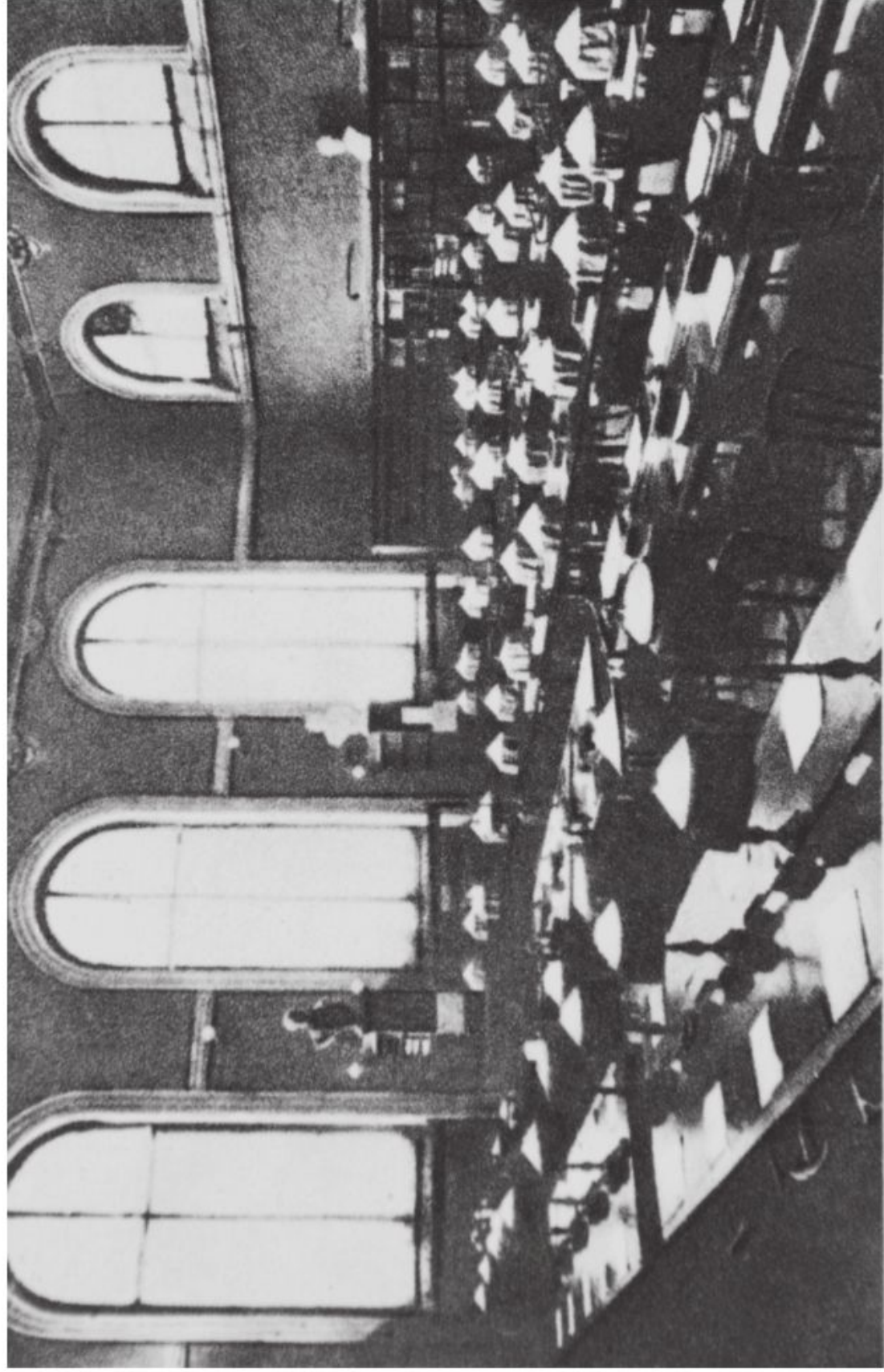
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应当不单单通过思想斗争，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说：

“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56号的附刊第4版第1栏下面确实就是这样说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顾形式却忽略了内容的人而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58号的社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基莫夫主义常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拿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

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辩护。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现在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头号阿基莫夫们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们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像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日内瓦大学图书馆。列宁曾在此写作《进一步，退两步》一书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他说：“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的活动〈用黑体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的思想，即使被人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注意，听着！〉，只能随着〈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构成其内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57号）这岂不又一次使我们想起民间故事里的那个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的人物吗？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的伊万努什卡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们喊：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³⁾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请看，如果有人想加深谬论并从哲学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根据，那么在组织问题（党章第1条）上所犯的小错误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在策略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在组织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57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有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做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做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

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58号上就是这样教训我的，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4\)](#)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

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小组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做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达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做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是怎样议论那些可能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作家小组的。时时处处都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集团，我们就同它“达成协议”（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对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与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针锋相对的态度呀！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限的办法作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像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关于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号叫，关于“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关于有人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的滑稽喊叫，关于“庞巴杜尔作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的意思（如果有的话⁽⁵⁾）。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

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维护的也正是自治制。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⁶⁾，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53号）上拿“**形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像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也多少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

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根本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凡是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只是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第20号萨克森选区竞选的失败（所谓格雷事件^{[\[7\]](#)}）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名气的书《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就立刻来为他“鸣不平”。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冈·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党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冈·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戈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冈·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文章的标题《对格雷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月第4期），就已经很了不起。内容也同样非比寻常。沃·海涅同志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一次偶然事件，而在于一种总的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对这种倾向，据说过去人们就有所觉察，但是现在变得特别危险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的生活的体现者”

（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写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这本小册子中抄来的）。不要“习惯于让一切重要政治决定都出自一个中央机关”，党要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那篇发言中借用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么我们会看到，这种激烈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大概是暗示“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吧），主要是党内的官方人士对‘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那本论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一个英国习惯用语：Outsidertum）不信任，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

议案》，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写道：“有人指责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让人们在应当普遍实行绝对自由的思想生产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地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模仿阿克雪里罗得”。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因为在德国党内这个争论没有掺杂什么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因为德国的阿基莫夫们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1904年第28期的《选区和党》——《Wahlkreis und Partei》一文）。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主义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在意大利，机会主义者都在竭力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在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

组织的作用后指出，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⁸⁾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弱些，所以德国的“自治制倾向，暂时还只表现为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⁹⁾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弱，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更少，“动听的高调”和无谓争吵的成分更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像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了“吓人的字眼”：官僚主义对（Versus）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党的执行委员会一种权利，让它对各地方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施加影响，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要求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当经过党所信任的人（Vertrauensmänner）对指定候选人施加影响。“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他不妨提出由全体党员（Sämtliche Parteigenossen）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就不必抱怨说，这项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由党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就是缺乏民主精神。”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各

个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都引起争议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作更加“精确的章程性的规定（statutarische Festlegung）⁽¹⁰⁾，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ößere Str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仅仅私下里许诺有朝一日会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在德国也有一些聪明敏锐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的解放派先生们，——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对这个新的争论作出反应，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竭力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德国交易所资本家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上版），它表明肆无忌惮地抄袭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报刊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打算用来“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的做法，攻击“盲目服从”、遵守“死板纪律”的要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

和小轮子厉害得多！）的要求。交易所的骑士们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民主的制度，不禁愤愤不平地说：“请看，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要加以取缔，因为它们有产生法国那样的情况，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³⁴的危险，辛德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但是，虽然有上述种种条件的差别，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¹¹⁾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斯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无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是直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58号第2版第3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1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原

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¹²⁾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们，驱策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让他们“委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1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像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

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量转变成了质。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13\)](#)。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份参加到这种坏事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啊！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63号的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化子了。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尔说出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多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列为机会主义者。正是这个沃罗涅日委员会在它的一月份的传单（1904年1月第12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罗涅日委员会充分理解全党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它充分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

所发生的转变。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罗涅日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根本不存在沃罗涅日委员会退党的问题。沃罗涅日委员会十分了解，像沃罗涅日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先例，会多么有损于党的声誉，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不应当制造新的分裂，而应当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何况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个例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任何一个组织，甚至连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8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61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1\)](#) 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1906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2\)](#) 见《火星报》第53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

[\(3\)](#) 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6号

（第46—51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12号（第52—63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

[\(4\)](#)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8页。——编者注

[\(5\)](#) 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

[\(6\)](#) 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

[\(7\)](#) 格雷1903年6月16日曾在第15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20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

[\(8\)](#) 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作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

[\(9\)](#) 德语Bannstrahl（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义语。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

[\(10\)](#) 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很有教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

[\(11\)](#) 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问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64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

[\(12\)](#) 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1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1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

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

[\(13\)](#) 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彼此显然不同的一些主要阶段列举如下：（1）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提出机会主义条文，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耶夫参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温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9票对7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3）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为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而斗争。（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火星派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5）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增补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少数派”中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继续充斥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全党极为关心的问题。

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的原则意义何在？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¹⁾，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像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

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狂风使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一——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新《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赞扬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²⁾。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进一步，退两步…… 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

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像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47—272、379—415页

[\(1\)](#) 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1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

[\(2\)](#) 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节选)

(1905年6—7月)

(1) 这是列宁论述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策略、阐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掌握领导权的重要著作。在节选的部分，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一方面需要对政治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提出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需要教育和引导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策略口号。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实践经验来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策略。

序 言



1929—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的部分中译本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上事变的发展，而这些事变为评价各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萨

事变⁽¹⁾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²⁾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起义一过程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革命无疑是非常迅速、非常深刻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义，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个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社会革命党”纲领草案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在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问题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问题上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的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使各个阶级受到真正的政治洗礼。通过革命，这些阶级将显示出它们的明确的政治面貌，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它们自己。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

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在这种时期，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我们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熟悉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盖着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问，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府方面？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当然，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中的自觉分子非常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解放》杂志就赞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内现在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主义”。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72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则趋向。因此，他就拼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憎的革命狭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第104号已在事实上转到它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论敌方面，但它同时又轻视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错误等等）道路的那些口号和策略决议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仅是跟在事变后面做尾巴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的代表会议⁽³⁾的决议，就最确切、最周到、

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作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杂志所表现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完全不同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要开始研究他们眼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其中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地方，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想切实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奠定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1905年7月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4页

[\[1\]](#) 指“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26—135页。——编者注

[\[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在这本小册子里常常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1905年11月13日〔26日〕）

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灭绝。还远远没有灭绝。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企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个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讽社会民主党的

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做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做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

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完成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完成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

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做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²⁾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

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伟大的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使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92—97页

(1) 列宁在本文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报刊出版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的基本原则，指出党组织和与党有联系的团体的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作事业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不能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但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的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应当加强对写作事业的引导，把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2) 《新生活报》上显然误印为“в рамках”，按意思应为“в романах”。——俄文版编者注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1909年5月13日〔26日〕）

苏尔科夫代表在国家杜马讨论正教院预算案时的发言，以及下面刊登的我们杜马党团讨论这篇发言稿的材料，提出了一个恰巧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和特别迫切的问题。凡是同宗教有关的一切，目前无疑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使接近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甚至某些工人群众感到兴趣。社会民主党当然应该表明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我们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通篇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杜林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必须指出，恩格斯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²⁾，——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17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

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

(3) 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无情地斥责哲学家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的让步，即使是些微的让步，但也同样严厉地斥责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恩格斯说，这样向宗教宣战，就是“比俾斯麦本人还要俾斯麦”，即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斗争这一蠢举的覆辙（臭名远扬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就是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反对德国天主教的党，即反对“中央”党的斗争）。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巩固了天主教徒的好战的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他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工人阶级和民主派的某些阶层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最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恩格斯痛斥了妄想做超革命家的杜林，说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复俾斯麦的蠢举，同时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4) 这个观点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给耶稣会士以自由，主张允许他们进入德国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的任何警察手段。“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1891年）的一个著名论点，它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

这个策略现在竟然成为陈规，竟然产生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歪曲，使它走向反面，成了机会主义。有人把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论点说成这样，似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于我们党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行直接的论战，但是他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不是用论战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就是说，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

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⁵⁾

从外表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表示意见的经过就是如此。那些轻率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动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经过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最最革命的战争，另一方面怯懦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们吓跑等等，这是多么“没有原则”的动摇。在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著作中，这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可以找到不少的。

可是，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看待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腐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要把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毫不留情地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

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以及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进步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传播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由此是否可以说，反宗教的启蒙书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是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应当说，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一个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思考过的人，也许不能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理解）这条原则。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进行思想宣传，宣扬某种思想，同维持了数千

年之久的这一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即宗教）作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即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争呢？

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流行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这证明反驳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使这种反驳者感到不安的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做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定某个地方和某个工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是相当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然是无神论者，另一部分则是相当落后的，他们同农村和农民还保持着联系，他们信仰上帝，常到教堂里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个建立基督教工会的司祭的影响。再假定这个地方的经济斗争引起了罢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考虑使罢工运动得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应当坚决反对这样的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神论就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这倒并不是出于不要把落后群众吓跑，不要在选举时落选等庸俗考虑，而是从实际推进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 and 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中，宣传无神论，就只能有利于神父，因为他们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上帝这一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上帝开战，实际上是帮助了神父和资产阶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终在帮助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

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资产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像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对上帝的信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是打小算盘：不得罪人，不排斥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此等等。

凡是同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的具体问题，都应该根据上述观点来解决。例如，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司祭能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人们通常根据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作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但是这种经验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工人运动的结果，而且也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关于这种条件，我们到下面再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在我国是不正确的。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说司祭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司祭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纲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这个司祭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许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的矛盾，只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一个政治组织要用考试的方法来检验自己成员所持的观点是否同党纲矛盾，那是办不到的。当然，这种情况即使在欧洲也是极其少有的，在俄国则更是难以想象了。如果这位司祭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竟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点，以此作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那么党当然应该把他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我们不仅应当容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们当然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

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我们容许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以自由结合原则所容许的一定范围为限，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内多数人摒弃的观点的人携手并进。

再举一个例子：假定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声明“社会主义是我的宗教”，并且宣传与此相应的观点，对这种党员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概加以申斥呢？不能这样做。这种声明确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背离的意义和所谓的比重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鼓动员或一个在对工人群众讲话的人，为了说得明白一点，为了给自己的解释开一个头，为了用不开展的群众最熟悉的字眼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著作家开始宣扬“造神说”或造神社会主义（就像我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及其同伙那样），那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提出申斥就是吹毛求疵，甚至是过分地限制鼓动员的自由，限制他运用“教育手段”来施加影响的自由，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党的申斥却是必需而且应该的。“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

现在来谈谈哪些条件使“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论点在西欧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歪曲。当然，这里是有产生机会主义的一般原因的影响，如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根本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机会主义者把情况歪曲成似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但是除了常见的机会主义歪曲（对于这种歪曲，我们的杜马党团在讨论有关宗教问题的发言时完全没有加以说明）而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宗教问题采取了目前这种可以说是过分冷漠的态度。这些条件分两种：第一，反宗教的斗争是革命

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说在他们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着手完成）这个任务。无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个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百科全书派、费尔巴哈）。在俄国，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几乎完全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上。同欧洲比较起来，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派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并不是（像《路标》中的那些新出现的黑帮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黑帮所想的那样）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在欧洲已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一斗争所作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歪曲，而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罗曼语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德国的莫斯特（附带说一句，他曾经是杜林的门生）之流，奥地利8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宗教斗争中使革命的空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现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要矫枉过正，把无政府主义者弄弯了的棍子弄直。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忘记西欧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是不行的。

第二，在西欧，自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以后，自从实现了比较完全的信教自由以后，反宗教的民主斗争问题在历史上已被资产阶级民主派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政府往往故意对教权主义举行假自由主义的“讨伐”，转移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德国的文化斗争以及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教权主义斗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运动，是转移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的手段，——这就是目前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反宗教斗争普遍采取“冷漠”态度的根源。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

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应该使反宗教斗争服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对抗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分子的反教权主义运动。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等等。因此，如果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政党要求国家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的主张偷换成宣布宗教对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本身来说也是私人的事情时，恩格斯纠正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还比较温和，那么俄国机会主义者仿效德国人的这种歪曲，就应该受到恩格斯严厉一百倍的斥责。

我们的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就开创了一个先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次对宗教问题发表意见时都应当以此为基点。是不是还应该更进一步，把无神论的结论发挥得更详细呢？我们认为不必。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政党有夸大反宗教斗争意义的危险；这样做会抹杀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同社会党人反宗教斗争之间的界限。社会民主党党团在黑帮杜马中应该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已经光荣地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明教会和僧侣支持黑帮政府、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作用，这一任务也光荣地完成了。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说得很多，今后社会民主党人谈这个问题还会对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作补充，但是这篇发言毕竟是很出色的，我们党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各级党组织广泛宣传这篇发言。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详尽地说明经常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原理的正确含义。遗憾的是苏尔科夫同志没有这样做。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党团过去的活动中，别洛乌索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已被《无产者报》及时指出）。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表明，党团争论无神论问题，却没有正确说明宣布

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一著名的要求。我们不会把整个党团所犯的这个错误都推在苏尔科夫同志一个人身上。不仅如此。我们公开承认这是全党的过错，因为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解释不够，没有让社会民主党人充分认识到恩格斯批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意思。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证明，这正是由于对问题了解得不清楚，而决不是不愿意考虑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我们深信，党团在以后发言时一定会纠正这一错误。

我们再说一遍，总的说来，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是很出色的，各级党组织应当广泛加以宣传。党团对这篇发言的讨论，证明党团在兢兢业业地履行它的社会民主党的职责。不过我们希望报道党团内部讨论情况的通讯能更经常地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使党团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党能了解党团所进行的艰巨的工作，使党和党团的活动在思想上趋于一致。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88—401页

(1) 列宁在本文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阐明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全面论述了工人阶级政党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对待宗教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595页。——编者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56页。——编者注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页。——编者注

致俄共中央

（1918年5月4日）

我请求把审判贪污案件（1918年5月2日）的党员开除出党的问题列入议程，因为他们对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受贿者只判了半年监禁。

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应该是与克伦斯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为伍，而不能跻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之列。

列 宁

1918年5月4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3页

（1）这是列宁针对莫斯科革命法庭对四名被控受贿和敲诈勒索的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轻判的错误写给党中央的信。这封短信体现了列宁从严治党的思想和严惩腐败的决心。

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1918年5月23日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

鉴于您不执行我的坚决要求，不向我说明为什么从1918年3月1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鉴于您直接破坏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3日的法令，在取得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夫同意后擅自提高我的薪金这一公然违法行为，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处分。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155—156页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院内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邦契-布鲁耶维奇
交谈(1918年10月16日)

(1) 这封短信表现了列宁奉公守法、严格自律的崇高风范。

俄共（布）纲领草案（节选）

（1919年2月）

1 俄共纲领草案初稿

纲要：党纲由下列部分组成：

1. 引言。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已经开始并在各地迅速发展。要了解这个革命，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不可避免性。2. 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分重申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即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的主要部分，以便附带阐明我们的世界观的“历史渊源”。3. 帝国主义。根据1917年5月的党纲草案。4.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和新国际。根据1917年5月的草案改写。5.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根据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的草案⁽²⁾。6. 这些任务在政治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7. 在民族、宗教、教育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8. 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9. 在土地问题方面的具体化（新加的内容）。10. 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具体化（施米特正在写）。11. 和12. 对其他方面的补充（还没有写）。

这个初稿有许多地方还写得不完善，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因此有些地方暂时用了解释性的表述而没有用纲领的表述方式。

（1）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的开始和发展进程，都清楚地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2）要正确地了解这个革命的原因、意义和目的，就首先需要弄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即基本性质，弄清它们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其次需要弄清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加速资本主义崩溃并把无产阶级革命提到日程上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

（3）对于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还占统治地位的、其发展必然引起并且已经引起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那个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说明：

（4）“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6）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7）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8）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

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困难加剧。

（9）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10）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11）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12）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集中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

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13）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14）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15）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16）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17）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几乎一切先进国家都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够拿出一小部分这样得来的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保证

这些上层分子能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

（18）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相当广泛而具有国际性，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和腐朽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国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它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1）本纲领草案是列宁为制定俄共（布）第二个纲领而起草的一些文稿。这里节选了第一篇。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保留了1903年第一个党纲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论述，并增加了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的分析；实践部分规定了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项基本任务。在经济方面，列宁强调党必须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478页和第34卷第65—71页。——编者注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现时的基本任务是彻底完成已经开始的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夺，把一切工厂、铁路、银行、船队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

利用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的联盟，逐步而坚定地过渡到共耕制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这个联盟已使土地私有制废除，已使关于由小农经济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已站在无产者方面的现代农民思想家把这种形式称为土地社会化）的法令得以颁布；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这种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高得多和进步得多的民主形式，而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1905年和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唯一适合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国家类型；

全面地和充分地利用已在俄国燃起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以便制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企图干涉俄国内政或联合起来公开反对和进攻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使革命蔓延到比较先进的国家以至所有的国家中去；

用一系列逐步而坚定的措施彻底消灭私人贸易，组织起统一的经济整体（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这样一个整体）中各生产公社和消费公社之间的正确的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政治方面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为了从政治上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特别是议会制曾经是（必需的）必要的，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的情况下，任何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步骤都是为剥削者即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绝对反动的行为。那些似

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

苏维埃共和国——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如下：

（1）建立和发展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群众性的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对他们的组织设置无数的实际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像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2）苏维埃国家组织使那一部分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社会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最多的劳动群众，即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实际的优越地位。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这种优越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为了把工人分裂成互相竞争的集团而在他们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影响，组织和教育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

（3）资产阶级民主制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而实际上却伪善地掩盖剥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够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群众。苏维埃国家组织戳穿了这种欺骗和伪善，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一切劳动者的真正平等，把剥削者排除出享有

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之外。全部世界史的经验、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苏维埃国家组织适合于镇压这种反抗，否则就谈不上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4）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5）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国家机构同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的先进无产者群众的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系，除了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外，也为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

（6）苏维埃组织使我们建立了一支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农武装力量。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即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

（7）苏维埃组织无比深入地 and 广泛地发展了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制比中世纪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即居民参加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因为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而实际上又加以限制。同时苏维埃组织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这一制度巴黎公社已开始废除，其狭隘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苏维埃把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而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这道围墙，因为资产阶级议会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投机家的金融勾当和交易所勾当，保障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国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摧毁了官僚主义这座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中最觉悟的阶层忙于几乎超过人力所及的极度紧张的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9）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这一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不断变换这些工作，以便能接触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全部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10）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更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束缚。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民族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俄共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使各民族的无

产者和劳动群众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在先前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中正在迅速消失，正在随着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而消失，但这种不信任并不是在所有民族和所有劳动阶层中都已完全消失。因此，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认真地实行各民族的真正的平等和分离的自由，以便消除这种不信任的基础，而使各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一个自愿的最紧密的联盟。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协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启发他们去反对中世纪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协助那些在此以前受压迫的或不平等的民族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

在宗教政策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俄共）的任务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许诺过、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把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和助长群众愚昧的宗教宣传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彻底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

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

(1) 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2) 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

(3) 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4) 加强对教师的鼓动和宣传工作。

(5) 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师骨干。

(6) 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 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学自修（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8) 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苏维埃政权的一般任务，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经济方面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如下：

(1) 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 特别注意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并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这是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战胜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统治所造成的习惯的最主要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现在，当群众看到地主、资本家和商人确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教育不仅是可能的，实际上也在用千百种办法通过工人和农民切身的实际经验而进行着。在这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发展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这样迅速的发展，但它应当做到把所有劳动者无例外地都联合到严整的、集中的、有纪律的产业工会中来。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决不能墨守成规。一方面

应当用实际试验的结果来检查每一步骤，有系统地把工会变为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关；工会应该密切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其他国家管理部门的联系，并且巩固这种联系。另一方面，工会应当更加成为对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机关，以便在工人先锋队的监督下把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普及到比较落后的工人中去。

（3）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进行长期的工作来教育群众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还要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在通常情况下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的科学技术专家。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的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像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

同时，要不断努力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而且不要一看到个别不可避免的失利就无所措手足，要耐心地启发有科学素养的人，使他们意识到把科学用于个人发财和人剥削人是极其卑鄙的，意识到使科学为全体劳动群众所了解则是更为崇高的任务。

（4）要实现共产主义，绝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最高度地最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要首先克服工人在职业上和地区上的散漫性和分散性，因为这种散漫性和分散性是使资本有力量而劳动没有力量的根源之一。反对行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反对行会的利己主义的斗争是与消灭城乡对立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进行这一斗争有很大的困难，如果不预先大力提高国民劳动的生产率，要广泛地开展这一斗争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开始时不妨在地方上小范围试办，以便把各行业各地区要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措施的效果加以比较。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远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负一定的社会工作。

（5）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合作社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过渡手段。利用合作社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同类的任务，因为领导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合作社机构的是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头脑和经营作风的人。俄共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生产消费公社的过渡。

（6）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因此，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得到社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

夺劳动者。单靠银行国有化这一项措施来同资产阶级掠夺的这种残余作斗争是不够的。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准备和实行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所取得的实际经验将表明哪些措施是最适当的。

（7）在财政方面，俄共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实行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但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及大多数工厂和其他企业的私有制以后，这种情况不会很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时代，国家的财政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一定部分的收入直接用于国家需要。只有正确进行商品交换，收支平衡才能实现，为此就要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和恢复运输业，后者是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土地问题方面

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剥夺了地主和实施了承认大规模地共同经营土地的优越性的土地社会化法令以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在这方面寻找和试行各种最合理最实际的过渡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的基本路线和指导原则仍旧是力求依靠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首先应该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是这方面的步骤之一，建立农村党支部，改选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以清除富农分子，建立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应当严格地予以执行。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即社会主义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决不能把镇压手段扩大到他们身上；中农就其阶级地位来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盟者，或者至少是中立

者。因此，尽管有不可避免的局部的失利，尽管中农动摇，但必须坚定不移地力求同他们妥协，关心他们的一切愿望，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在这方面，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工会帮助下或采取其他办法建立起更严格的监督，反对那些打着共产党员招牌、实际上执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政策而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政策的苏维埃政权代表的违法乱纪行为，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驱除出去。

至于向共产主义的农业过渡的办法，俄共将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三个主要措施，即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以及协作社），注意更广泛更正确地运用它们，特别是注意发动农民自愿参加这些新式共耕组织的方式，组织劳动农民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同志纪律。

在粮食政策方面，俄共坚持要巩固和发展国家垄断，同时也不拒绝在苏维埃政权进行监督的条件下，为了把工作组织得很好而利用合作社和私商或商业职员，并实行奖励制度。有时不得不采取的部分让步纯粹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且国家决不会因为这种让步而放弃实行垄断的坚定意向。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实行国家垄断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和一系列过渡措施的试验，目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普遍地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并正确地发挥它们的作用，把一切余粮交给国家。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76—93页

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

（鼓掌）同志们，根据我和布哈林同志谈好的分工，我的责任是说明委员会对于一系列具体的、争论最多的或当前全党最注意的条文是怎么看的。

我首先简单地谈谈布哈林同志在他报告结尾时说到的、我们在委员会内部争论过的那几点。第一点就是纲领总纲部分应该怎样写。关于委员会大多数为什么不同意删掉党纲谈及旧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这一点，在我看来，布哈林同志叙述得不完全正确。布哈林同志是这样说的，照他说来，人们有时以为委员会的大多数怕别人非难，怕别人责备他们不够尊重旧东西。毫无疑问，照他那样说来，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立场是太可笑了。但这与事实相去很远。委员会大多数不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这种做法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没有资本主义这一主要基础的纯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把金融资本主义描写成似乎没有任何旧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是把涉及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切论述作了不正确的概括。

这是不正确的。这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时代是特别不正确的。恩格斯在一次谈到未来战争的时候就曾说过，未来战争引起的破坏要比三十年战争厉害得多，人类将大大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造机构将遭到破产⁽²⁾。战争开始时，社会主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曾吹嘘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嘲笑我们是“狂热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看，这种预言并没有实现。事变证明，这仅仅对于很少几个国家、对于很短时期才是正确的！”现在，不仅在俄国，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各战胜国这种现代资本主义也开始遭到大破坏，其结果往往是取消这类人造机构，恢复旧资本主义。

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说，可以试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作一完整的描写，那时我们反驳过他，在这里我还要予以反驳：您去试一试，您就知道是不会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员会里曾作过一次这样的尝试，结果他自己也只好把它放弃了。我完全相信，假如有人能做到这点，那么最合适的是布哈林同志，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作过很多的很详细的研究。我敢断言，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因为课题出的就不对。我们俄国现时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之后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时期。同时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隔绝的俄国许多地区内，资本主义往往正在复活，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要想跳出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假若照布哈林同志所想的那样来写党纲，这个党纲便会不符合实际。它至多是把关于金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描写重述一遍，但决不是现实的再现，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中恰恰没有这种完整性。由不同的部分凑成的党纲是不完美（这当然并不重要），可是另一种党纲会完全不符合实际。不管这种庞杂性、这种由不同材料组成的结构如何不顺眼，如何不够严谨，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还跳不出这种状况。当我们跳出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制定出另一个党纲。可是那时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了。硬要那时也像现在一样，那是可笑的。

我们现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许多最基本的现象已经复活。就拿运输瘫痪来说吧，这是我们很好地，或者确切些说，很痛苦地感觉到的事情。这是其他国家甚至战胜国也有的现象。而在帝国主义制度下，运输瘫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退回到最原始的商品生产形式。我们很清楚什么是私贩粮食者。这个词外国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而现在呢？你们同出席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同志们谈谈吧。原来在德国和瑞士也开始有这类的词了。可是你们不能把这个范畴归到任何无产阶级专政中去，而一定要归到资本主义社会 and 商品生产的低级阶段上去。

用制定漂亮完整的党纲的办法来跳出这个可悲的现实，就等于跳到九霄云外，制定出不符合实际的党纲。决不是像布哈林同志所委婉地暗示的那样，由于尊重旧东西，我们才把旧党纲中的一些条文写进来。在他看来，1903年在列宁的参加下写成的党纲，无疑是不好的党纲，不过因为老年人最爱回忆过去，为了尊重旧东西，就在新时代制定的新党纲中重复了旧东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怪人倒是可以拿来讥笑一番。我敢断言，事情并不是这样。1903年所描写的那个资本主义，正好由于帝国主义的瓦解和破产，还继续存在于1919年的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离莫斯科不很远的萨马拉省和维亚特卡省就可找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当国内战争把国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状况，不能很快摆脱这种私贩粮食的现象。因此把党纲写成另一个样子是不正确的。应当说出实际情况，党纲应当包括绝对不可反驳的和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

布哈林同志在理论上完全了解这一点，他说，党纲应该具体。但了解是一回事，实际来做又是一回事。布哈林同志所谓的具体，就是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书本式的叙述。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在每个农业省份内，我们都看到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工业同时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不与许多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同时并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写出这样的制度，就是写出脱离实际生活的不真实的制度。既然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是普遍的小生产的上层建筑⁽³⁾，那么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认为存在着不包含旧资本主义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就是把愿望当做现实。

这是很容易犯的一种很自然的错误。假如在我们面前真的有把资本主义彻头彻尾改造过的完整的帝国主义，那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千百万倍了。那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制度：一切都服从于一个金融资本。那时只要把顶部拆掉，把其余一切交给无产阶级就行了。这倒是非常

痛快的事情，可惜这是现实中所没有的。现实的发展情况要求完全不同的做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当帝国主义遭到破坏的时候，就会看到顶部破坏，根基则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的党纲要想成为正确的党纲，就应该说出实际情况。存在着旧资本主义，它在许多部门中成长到了帝国主义。它的趋势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各种根本问题只能从帝国主义存在的观点来考察。没有一个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可以不顾这种趋势而得到解决。现在党纲说的不是这一点。在现实中，还存在着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帝国主义这个上层建筑是有的，它引起了战争，而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要想跳出这个阶段是办不到的。这个事实说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何种速度发展，并且这个事实在许多年内仍将是事实。

西欧革命也许会顺利一些，可是为了改造全世界，为了改造大多数国家，毕竟还需要很多很多年。这就是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过渡时期中，我们无法跳出这种纷繁复杂的现实。这个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现实决不能抛弃，不管它如何不漂亮，也丝毫不能抛弃。用另一种方式制定的党纲将不符合实际。

我们说我们取得了专政，可是应当知道我们是怎样取得的。旧事物千头万绪地拖住我们，缠住我们，不让我们前进一步，或者迫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前进，正像我们现在这样。所以我们说，为了懂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就必须说出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引我们来的是帝国主义，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诸如对中农的态度这类问题。的确，在纯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怎么能有中农呢？要知道甚至在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没有中农的。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几乎是中世纪现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那我们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并且还会碰很多钉子。如果我们要改变对

中农的态度，那就请在理论部分说清楚，中农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中农。中农是小商品生产者。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常识，是必须指出的，因为我们终究还没有越出这个初步常识。如果把这一点置之不理，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金融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来研究这种初步常识！”——那是极不严肃的。

对于民族问题我也要这样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把愿望当做现实。他说，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混在一起。我们无产者竟要承认某个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真是岂有此理！不对，请原谅，这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您把这一条删掉，那您就是沉溺于幻想。您提到民族内部发生的分化过程，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过程。但是，我们还要看看这种分化究竟怎么样。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145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干吗要民族自决权！”他在1917年夏季提议取消最低纲领而只留下最高纲领时，我曾驳斥过他，现在我应当把驳斥他的话再说一遍。我当时回答说：“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只要我们夺得政权，再稍微等等，我们就要这样做的。⁽⁴⁾果然我们夺得了政权，也稍微等了一些时候，现在我同意这样做了。我们已经完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打退了威胁我们的第一次进攻，

现在这样做就适当了。关于民族自决权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说：

“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这就是说，你所愿意承认的是除了俄国以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

看看芬兰吧。芬兰是个民主国家，是比我们发达、比我们文明的国家。那里正在发生无产阶级分离出来、分化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特殊，比在我国痛苦得多。芬兰人受过德国专政的压迫，现在又受着协约国专政的压迫。可是，由于我们承认了民族自决权，那里的分化过程就容易些了。我在斯莫尔尼宫把正式文件交给起过刽子手作用的芬兰资产阶级代表斯温胡武德（译成俄文，就是“猪头”的意思）时的情景，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很殷勤地握了我的手，我们彼此客套了几句。这是多么不好啊！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芬兰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欺骗劳动群众，说莫斯卡里、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要消灭芬兰人。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昨天我们对于巴什基尔共和国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当布哈林同志说“对于某些民族可以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甚至记下来了，他所开的名单中有霍屯督人、布西门人、印度人。听他这样列举时，我就想：布哈林同志怎么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记了巴什基尔人呢？布西门人在俄国是没有的，关于霍屯督人，我也没有听说他们想要成立自治共和国，但是在我国有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是不能拒绝承认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居住在前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民族都不能拒绝这一点。就假定巴什基尔人推翻了剥削者，而且是我们帮助他们这样做的。但这只是在变革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且要做得很谨慎，以免我们的干预会阻碍我们所应当促进的无产阶级分化出来的过程。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能做些什么呢？在我们俄国，居民有过和神父打交道的长期经验，所以他们帮助我们把这些神父打倒了。但你们知道，关于非宗教婚姻的法令至今还执行得很差。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

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受自己的毛拉的控制。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这种发展必然会来到。

布哈林同志不愿意等待。他忍耐不住：“干吗要等待！既然我们自己推翻了资产阶级，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干吗我们还要这样做！”这是带鼓舞性的号召，其中指出了我们的道路，但如果我们在党纲中只宣布这样一点，结果那就不是党纲而是传单了。我们可以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完全鄙视那些该受万分鄙视的资产阶级，可是在党纲中应当绝对确切地写出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我们的党纲才是无可争辩的党纲。

我们采取严格的阶级观点。我们写在党纲上的东西，是肯定自我们规定一般民族自决那时以来所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共和国。当这种共和国出现之后，而且只有按它们出现的程度，我们才能写出像我们现在写在纲领中的条文：“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⁵⁾。苏维埃类型还不等于俄国存在的那种苏维埃，但是苏维埃类型正在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类型。我们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再往前去，哪怕是再进一步，再进一分，就会不正确了，所以就不宜写在党纲里。

我们说：必须考虑到该民族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哪个阶段。⁽⁶⁾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大可不必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门人专门提来说。这个论断对于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对于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适用，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这是必由之路。再多说一点也不行，因为再多说就会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勾去民族自决而写上劳动者自决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没有考虑到各民族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困难，如何曲折。在德国，分化的情形和我国不同。在某些方面快些，而在某些

方面则慢些，并且要经过流血的道路。在我国，把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的这种怪思想是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接受过的。要知道我们还得和这些民族毗邻居住。现在谢德曼分子已经在说我们想征服德国。这当然是很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报刊，这些发行千百万份的报刊，向全世界叫喊这一点，而威尔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予以支持。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拥有庞大的军队，想用征服的手段在德国培植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优秀人物——斯巴达克派——告诉我们，有人挑拨德国工人反对共产党员说：你们看，布尔什维克那里的情形多么糟！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很好。于是我们的敌人在德国就用这样的理由去影响群众，说什么在德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造成和俄国一样的混乱状态。我们的混乱状态是我们长期的病症。我们是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中在我们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只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德国工人，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建立自己的制度”这种恐吓的影响，“劳动者自决”的公式就不会使情况好转。我们应当做到，使德国社会主义叛徒们无法说布尔什维克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万能制度，似乎这种制度可以靠红军的刺刀推行到柏林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自决原则，人家就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党纲不应当说劳动者自决，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党纲应当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曲折，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这会促进劳动者的自决。在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离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突出和深刻的。那里的一切绝不会和我国相同。如果我们说不承认什么芬兰民族，而只承认劳动群众，那就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不承认实际情况是不行的，因为它会强迫你承认它。在不同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循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这方面我们应

当极端谨慎。尤其是对于各个民族要特别谨慎，因为没有比对一个民族不信任更坏的事情了。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在自决。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333人，共产党员297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日历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1917年的8月或9月。但是，第一，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第二，现在的情形是，比我国工人先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波兰工人，大多数都持有社会护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必须等待。这里决不能说劳动群众自决。我们应当宣传这种分化。这点我们已经在做，但毫无疑义，现在不能不承认波兰民族自决。这是很明显的。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和我国一样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可是前进的方式却不相同。在那里，人们恐吓工人说：向来压迫波兰人的莫斯卡里、大俄罗斯人，想在共产主义招牌的掩盖下，把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移植到波兰来。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我向一个优秀的波兰共产党员同志说，“你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他回答我说，“不，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不过要比你们做得好些”。对于这种说法，我根本无法反驳。应当让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个谦虚的愿望：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不能不估计到那里所走的道路的一些特殊性，决不能说：“打倒民族自决权！我们只让劳动群众有权自决。”这种自决过程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现在除了俄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自决，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提议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我们拟订的计划，现在我来谈谈我应当说明的以下几点。我把小私有者和中农问题放在第一位。关于这一点，党纲第47条说：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

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我觉得，我们这里所写的，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中农问题多次说过的。这一条文的缺点只是不够具体。在党纲中，我们未必能写得更具体些。但是在代表大会上应当提出的不仅仅是纲领性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农问题要给予加倍的注意。我们掌握的材料表明，某些地方发生的暴动显然是有一个总计划的，而且这个计划显然是和白卫分子决定在3月举行总进攻并组织一连串的暴动的军事计划有联系的。大会主席团拟订了一个就要向你们提出的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的草案。这些暴动再明显不过地向我们表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曾在布良斯克组织暴动）是白卫分子的直接代理人。白卫分子总进攻，农村暴动，铁路交通断绝，——难道这样还不能把布尔什维克推翻吗？这里，中农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特别重大。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不仅应当特别强调我们对中农让步的态度，而且要想出许多尽量具体的、能使中农直接得到一些好处的办法。为了自卫，为了反对我们的一切敌人，这些办法是迫切需要的，这些敌人知道中农动摇于我们和他们之间，因而竭力诱使中农离开我们。就我们的现状看来，我们拥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我们知道，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这些革命会给我们以无产阶级后备力量，会减轻我们的困难而大大巩固我国目前还很薄弱的无产阶级基地。这可能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但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发生。你们知道，现在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因此，中农问题现在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

其次，我想谈谈合作社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纲第48条。这一条已经有些陈旧。我们在委员会写这一条时，我国只有合作社而没有消费公社，但几天之后便通过了把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合并为统一的消费公社的法令。我不知道这个法令是否已经公布，到会的大多数人是否已经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法令明后天会要公布的。这一条在这一方面

已经陈旧，但我仍然觉得它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从法令颁布到执行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从1918年4月起我们就忙着解决合作社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这还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成绩。在吸收居民参加合作社方面，我们有时达到了这样的规模：许多县份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村居民参加了。但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已存在的合作社，完全习惯于资产阶级社会那一套，而领导它们的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还无法使这些合作社服从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法令，在建立消费公社的意义上说，是前进了一步，法令中指出，全国的各种合作社必须实行合并。但是这个法令，即使我们全部执行，也会在将来的消费公社中保留工人合作社这个自主的部分，因为实际熟悉情况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们证明说，工人合作社这种较为发展的组织应当保留，因为它的活动是需要的。我们党内合作社问题上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合作社里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过摩擦。我觉得，在原则上，这个问题无疑地应当这样来解决：这个由资本主义在群众中准备好的唯一机构，在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农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唯一机构，无论如何要保留，要发展，而决不能加以抛弃。在这里，任务是困难的，因为充当合作社领导者的大半是资产阶级专家，而且往往是真正的白卫分子。由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仇恨，正当的仇恨，由此就产生了反对他们的斗争。当然，这个斗争应该进行得很巧妙：要制止合作社工作者中的反革命阴谋，但这不应当成为反对合作社机构的斗争。我们一面要排除这些反革命分子，同时应当使机构本身服从我们。这里的任务同对待资产阶级专家是一样的。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是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

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引起不少的摩擦和分歧。几天前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作报告时，递给我的条子中有几个是关于工资的。有人问我：难道在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工资可以高到3 000卢布吗？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写进了党纲，因为这方面的不满已经很厉害了。在

军队中，在工业中，在合作社中，到处都存在着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使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想用另一种方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不行的。而要这样来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把工作人员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必须吸收所有这些专家参加工作。我们在党纲中有意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很详细，以便得到彻底解决。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决不是因为法律造成了障碍，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有助于这样做。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本届代表大会应当对资产阶级专家问题作出极明确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会使那些无疑是倾听这次代表大会意见的同志们有可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信进行工作，并知道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样的决定会帮助那些处处碰到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至少来参加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斯巴达克派的代表同志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上告诉我们说，在工业最发达、斯巴达克派在工人中的影响最大的德国西部，虽然斯巴达克派还没有获得胜利，可是许多最大的企业的工程师和经理已经来向斯巴达克派说：“我们跟你们走。”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情形。显然是那里的工人的文化水平较高，技术人员较无产阶级化，也许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造成了这种与我国有些不同的关系。

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主要障碍之一。现在我们应当不等待其他国家的援助立刻提高生产力。要做到这点，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是不行的。这应当斩钉截铁地说清楚。当然，这些专家大多数是浸透

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阶层就不去工作。想用棍棒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这一点我们已深有体会。可以迫使他们不积极地参加反革命，可以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伸手去拿白卫分子的宣言。在这一方面，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很坚决的。这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也做得很够了。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这一点。但是，要用这种办法来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可能的。这些人习惯于文化工作，他们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推进了文化工作，就是说，他们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无产阶级的所得微不足道。但他们毕竟推进了文化，这是他们的职业。当他们看到工人阶级中的有组织的先进阶层不仅重视文化，而且帮助在群众中普及文化时，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当医生看到无产阶级发动劳动者主动进行防疫工作时，他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我们。我国这个由资产阶级的医生、工程师、农艺师、合作社工作者所组成的阶层是很广大的，当他们实际看到无产阶级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这种事业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那时我们的任务就会容易些了。那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吸收到我们机构中来，成为它的一部分。为了这点，必须作些牺牲。为了这点，哪怕付出20亿卢布也算不了什么。害怕这种牺牲就是幼稚，因为这就是不懂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运输业的解体，工业和农业的解体，直接威胁到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我们在这里应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

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个亿，却可能造成用几十个亿也不能补偿的损失。

当我们同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同志谈论工资问题时，他举出了以下的事实。他说，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做过而且用几十年时间也不能做到的。例如战前的工资：粗工每天1卢布，每月25卢布，而专家每月是500卢布（不算那些拿几十万卢布的人）。专家领的工资是工人工资的20倍。我们现在的工资幅度是从600卢布到3 000卢布，相差只有5倍。为了把工资拉平些，我们已做了很多工作。当然，我们现在给专家的工资是过高的，但为了向他们请教，多给一点不仅值得，而且是应当的，从理论上讲也是必要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党纲上规定得十分详细。必须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仅要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要使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回到各地后，在向自己组织作报告时，在进行自己的全部活动时，都能贯彻这一点。

我们已经在动摇的知识分子中促成了巨大的转变。如果说我们昨天谈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化，今天就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么，在这种变动中，我们执行的完全是既定方针。这种变动贯彻着一条最坚决的路线：反革命要清除，资产阶级文化机构必须利用。孟什维克是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披着无产阶级的外皮，而实际上是非无产阶级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只有极少数的上层分子是无产阶级出身，而这个阶层本身是由小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阶层在靠近我们。我们要把整个阶层争取过来。每当他们靠近我们时，我们总是说“请来吧”。每动摇一次，这个阶层都有一部分人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是这样，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所有这些动摇分子都会是这样，他们还会长久地左右摇摆，怨天尤人，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对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通过这一切动摇，我们会得到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参加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队伍，而排除那些继续拥护白卫军的分子。

按照分工我应当说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官僚主义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的问题。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种埋怨无疑是有根据的。我们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那种彻头彻尾都是官僚的和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机构（甚至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仍然是这样的机构）已被我们彻底摧毁。单就法院来说吧。的确，这里的任务比较容易，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因为根据劳动阶级的革命法律意识来裁判是谁都会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把任务贯彻到底，可是在许多方面已把法院照应有的那样建立起来了。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机关，从而不仅使男子而且连妇女即最落后最不活跃的分子也人人都能参加工作。

其他管理部门中的职员是更加守旧的官僚。在这里，任务比较困难。没有这样一批人是不行的，一切管理部门都需要这样一批人。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在德国，大概这种痛苦要轻一些，因为德国的官僚机构受过充分的训练，它把官僚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在迫使他们做事情，而不像我国办公室里的一些人那样，坐在安乐椅上安闲度日。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再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

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应当取得后援，就各种征象来看，国内的这种后备力量正在增长。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是非常巨大。一切征象表明，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后备力量，用以代替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那些劳累过度的人，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因此官僚们还占据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每个人民委员部实行的这类办法，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谈了。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剥夺选举权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西欧纯粹民主派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在实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摆脱由于群众文化程度不够而碰到的困难。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假设：无产阶级专政将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宪法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只是说，谁认为不必镇压资产阶级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我们不愿意给资产阶级以自由，我们不承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但我们在党纲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像工人和农民不平等之类的办法，根本不是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是在这些办法实施之后才把它们记载下来的。苏维埃宪法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就拟订的，其实是反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按照实际生活所造成的情况拟订了这个宪法。组织无产阶级比组织农民快得多，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人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往后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工农平等。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谁也没有把资产阶级赶出苏维埃。资产阶级自己离开了苏维埃。

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根本不是为我们的行动表示歉意，而是如实地摆出事实。我们的宪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们的组织工作差。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在革命后过了17个月的现在，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在讨论党纲时必须谈到以供大家今后讨论的主要几点。（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37—157页

(1) 本文是《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三。列宁在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自己的纲领，必须从确凿无疑的事实出发，科学地判断时代特征，准确地把握党所处的历史环境，依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党的各项政策和任务，只有这样的党纲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纲。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页。——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407页。——编者注

[\[4\]](#)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

[\[5\]](#)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9页。——编者注

[\[6\]](#)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9页。——编者注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是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时刻举行的。由于邓尼金的胜利，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拼命加紧阴谋活动，资产阶级竭力扰乱人心，千方百计想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决心。犹豫动摇的不自觉的庸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例都更加动摇起来，而且最先被资本家吓倒了。

但是，我认为，莫斯科在困难时刻举行征收党员周对我们更有利，因为这对事情更有益处。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还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目前正当加紧动员人们上前线的时候，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好处是，不致对那些想混进党里来的人有什么诱惑力。我们只是号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入党，而不是号召投机农民入党。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样更好。入党的将都是一些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受过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

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作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者敞开党的大门。

苏维埃政权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劳动者的政权。首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是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它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夺得了国家政权。

工人阶级把大多数农民团结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倾向于资本、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只是经商的农民，投机农民，而不是劳动农民。

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才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以便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人才。

非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同志们，加入党吧！我们不向你们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我们号召你们来进行困难的工作，进行建设国家的工作。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共产主义，你们就应该大胆地担负起这种工作，不要怕工作生疏和困难，不要被那种陈腐偏见弄得惶惑不安，以为只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工作。这是不对的。能够而且应当有愈来愈多的普通工人和劳动农民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

1919年10月11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15—217页

(1) 列宁在本文中阐述了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原则。他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

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要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的人。列宁强调党取得政权后，要多吸收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正直的劳动者入党，要特别重视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人才，大胆使用新人才，发挥他们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

（1919年10月21日）

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有13 600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完全没有料到的成绩。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那些为自己丧失“老爷的”特权地位而伤心的专家、官吏、职员在内，——所有这伙人恰巧在最近，恰巧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期间，拼命扰乱人心，预言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邓尼金即将胜利。

这伙“知识分子”是多么善于巧妙地运用扰乱人心这个武器啊！要知道这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总是要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动的一帮”并且“死命地”抓住这个武器的。

莫斯科本来是商人势力特别大的地方，是剥削者、地主、资本家、食利者最集中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合到了一起的地方，是驻着中央政权机关因而官员特别密集的地方，——正是这个莫斯科是资产阶级造谣、诽谤、扰乱人心最方便的场所。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进攻得手的“时机”非常有利于资产阶级这种手段取得“成功”。

无产阶级群众看到了邓尼金的“成功”，并且知道在现在做一个共产党员会遭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和危险，但是他们中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挺身而出，起来支援共产党，承担异常艰巨的国家管理工作的重担。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我们党的成就简直是了不起的！

这个成就向首都居民，并且也向整个共和国和全世界证明并清楚地指出，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正是在劳动群众的真正代表中间蕴藏着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最可靠的源泉。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人们志愿申请入党，从这个成就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实际地显示

了为劳动解放事业的敌人深恶痛绝而为劳动解放事业的真正朋友最为珍视的那一方面，即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从道义上（从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讲）影响群众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施加这种影响的方法。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以身作则，在整整两年期间（在我国政治发展极快的情形下，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给劳动群众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他们对劳动者的利益十分忠诚，他们同劳动者的敌人（剥削者，特别是“私有者”和投机者）斗争时十分坚决，他们在艰苦的时刻十分坚定，他们在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时奋不顾身，这都说明只有工人和农民对自己先锋队的同情所产生的力量才能够创造奇迹。

这是奇迹，因为被饥饿、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顾没有素养并缺乏经验，承担了驾驶国家航船的重担！而且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奇迹。不论个别的考验多么严重，这样的奇迹将会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完全胜利。

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怎样正确地使用新党员。这个任务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任务，靠老一套办法是解决不了的。

资本主义扼杀、压制、摧残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在贫穷困苦、人格遭到侮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善于发现这些人才，让他们担任工作。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大多数没有经验，不熟悉国家管理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是被资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没有抬头机会的那些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最真诚、最有才能的人，这也是毫

无疑的。他们比别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耿直，更坚强，更真诚。

因此，一切党组织都应当对怎样使用这些新党员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应该更迅速地在实践中考验他们。

当然，所谓大胆，并不是马上就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新手担任，因为担任重要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新手还没有掌握。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的党纲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什么官僚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以及怎样防止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要大胆，首先是说要大胆地让那些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及其疾苦和要求的新党员对职员、官吏和专家实行监督。要大胆，是说要立即给这些新手在广阔的工作领域中施展才能和一显身手的机会。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打破常规（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可惜还不少呢！——非常怕冒犯已经规定的苏维埃的陈规陋矩，虽然这些东西有时不是由自觉的共产党员而是由旧官吏和旧职员“规定”的）；要大胆，是说要决心以革命的速度为新党员改变工作方式，以便更快地考验他们，更快地给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

在很多场合可以为新党员安排这样的工作，即让这些党员一方面监督旧官吏是否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很快能学会业务，并能独立地担当工作。在其他场合可以安排他们来更新、加强工农群众同国家机构的直接联系。在我们工业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怠工者、潜藏的地主和资本家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政权。中央和地方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的本领应该在加紧利用党的新生力量来同这种祸害作坚决的斗争方面表现出来。

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它应该尽量发挥一切力量，尽量节省这些力量，尽量减少拖拉现象和繁文缛节，尽量精简机

构，尽量使这个机构不仅知道群众的疾苦，而且能为群众所了解，能使群众独立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

目前正在加紧动员老党员参加军事工作。这一工作无论如何不应削弱，而是应该不断加强。但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应该改善、精简、更新我们的非军事管理机构。

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足，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超过白卫分子，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英法帝国主义这个泥足巨人。我们超过他们，是因为我们能够从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不论在哪里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那些阶级中，也就是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吸收力量，而且今后还要长期地愈来愈深入地从他们当中吸收力量。我们能够从这个大储备库中吸收力量，因为它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向我们提供最忠诚、受苦难生活锻炼最多、最接近工农的工农领袖。

我们的敌人，不论是俄国资产阶级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都根本没有稍许与这个储备库近似的东西，他们的根基愈来愈动摇，工人农民中拥护过他们的人愈来愈离开他们了。

这就是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最终肯定胜利和必然胜利的原因。

1919年10月21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28—232页

(1) 列宁在本文中总结了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成绩和经验，阐述了无产阶级执政党面临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就是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党内新生力量的作用。他指出，各级党组织的职责就是要善于在基层发现人才、正确使用人才，应该打破常规，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同时在实践中考验他们，给他们在广阔的工作领域中施展才能和一显身手的机会。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1919年11月22日）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东部各民族目前的情况。你们是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和共产党的代表。我要指出，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旧帝国主义中打开一个缺口，担负起异常艰难但又异常崇高的开辟革命新道路的任务，那么，你们这些东部劳动群众的代表今后要担负的就将是更伟大更新的任务。十分明显，全世界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限于每一国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如果各国革命进行得很顺利，很迅速，这也许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让我们这样做的，世界各国都已武装起来对付本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心在想怎样战胜自己家里的布尔什维主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酝酿着国内战争，而老社会党人妥协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参加这个战争的。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今年3月通过的纲领里面，我们在说明世界社会革命日益接近的时候说，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这一点正由革命进程所证实，并且今后会得到更多的证实。东方的情形也会是如此。

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我们非常了解，所谓分配殖民地的统治权，就是分配掠夺和抢劫权，就是分配地球上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权。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去完全处于历史的进步之外，因为当

时他们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但是在20世纪初，他们已不再扮演这种消极的角色了。我们知道，1905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展开了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由殖民地人民组成的整团整团的军队被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英国和法国武装了殖民地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装备和革新的机械。他们将利用学到的本事去反对帝国主义老爷们。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东方各民族正在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今后在世界革命发展史中（从这个革命开始时的情况看来，它还要继续很多年，需要人们做很多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在革命运动中，你们将要发挥重大的作用，将要把你们的斗争和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你们参加国际革命，就要担负起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解决了这个任务就会为总的胜利打下基础，因为在这里，人口中的多数是第一次进行独立的运动，他们将成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积极因素。

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我们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把俄国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了，我们的斗争所以进行得很顺利，正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面，同东部各族人民的联系特别重要，因为东部人民大多数是典型的劳动群众，他们不是受过资本主义工厂锻炼的工人，而是典型的被剥削劳动农民群众，即遭受中世纪制度压迫的劳动农民群众。俄国革命已经表明，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把千百万涣散的劳动农民群众团结起来以后，就胜利地进行了反对中世纪制度压迫的斗争。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觉醒的

东部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共同去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因为一些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正被卷到斗争中来，另一方面，由于东部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你们就能够同第三国际保持最紧密的联系。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我们在小范围内即在我们国家内实现了的任务，你们将在大范围内即在一些大的国家内予以实现。这第二个任务，我希望你们能够胜利完成。由于东部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你们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你们就与先进的革命无产阶级有了联系。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关心怎样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懂得的语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不言而喻，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只有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俄国人开创的事业，将由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阶级来巩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我们应当懂得，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激发劳动群众从事独立活动和把自己组织起来的革命积极性（不管他们的水平如何）；把指导较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学说译成各民族的文字；实现那些必须立刻实现的实际任务，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

任务就是这些，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却能够找到。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对你们会有帮助

的，一方面是同其他国家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结成紧密的联盟，另一方面是善于正确对待你们在这里所代表的东部各民族。你们不得不立足于正在这些民族中间产生出来并且必然要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同时你们应当去联系每一个国家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用他们懂得的语言告诉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是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

这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极其巨大的任务。由于革命时代的来临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东部各共产党组织只要能共同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地解决这个任务，并彻底战胜国际帝国主义。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21—325页

（1）列宁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从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确定自己的斗争任务；同时，必须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列宁认为，我们无论在哪一本共产主义著作里都不可能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而只能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节选）

（1919年12月2日）

现在我非常简短地谈一下党的任务。我们党在革命进程中已经面临一项极重大的任务。一方面，坏分子在攀附我们的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执政的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已经疲惫不堪，它的力量自然因国家遭受破坏而被削弱。但是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为了实现这项全国范围的建设任务，我们实行了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建设的一种方法。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让最先应征上前线的人加入我们的党；不能作战的人要入党，则应在原岗位上证明他懂得什么是工人政党，应表明他是在实践共产主义的原则。所谓共产主义，严格说来就是无报酬地为社会工作，不考虑个人的差别，丝毫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守旧心理，没有旧的习气，消除各个工作部门的差别，劳动报酬上的差别等等。这是我们能够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仅投入军事斗争而且投入和平建设的最大保证之一。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成为一所学校。我们应当在贯彻每一个措施的过程中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我们通过重新登记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并不害怕把不十分可靠的人开除出去。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还因为我们信任在困难时刻加入到我们党里来的党员。正如中央委员会今天的报告所指出的，成千上万的党员是在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邓尼金已到了奥廖尔北面、整个资产阶级已经欣喜若狂的时候加入到我们党里来的，他们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我们珍视党的这种扩大。

在党这样扩大以后，我们应当关一下门，应当特别小心。我们应当说：在目前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新党员。我们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会有许多有害的分子混到党里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工人的政党，一个不让混入的分子有立足之

地的政党，但是，我们必须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办法就是举行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不久以前，《真理报》登载了一篇关于非党代表会议的文章。拉斯托普钦同志的这篇文章值得特别注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解决这一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党不能敞开大门，因为在资本主义瓦解时期，党把坏分子吸收进来是绝对难免的。对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分子，党的大门只容其中能够经受极严格考验的人进来。

但是，在一个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里，我们只有几十万党员。这样的政党怎么能管理国家呢？首先，包括几百万人的工会是它的助手，而且应当是它的助手；其次，非党代表会议也是它的助手。在这些非党代表会议上，我们必须善于正确地对待非无产阶级群众，必须克服偏见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估计我们党组织的成绩时，不仅要看这项或那项工作中有多少党员在干，不仅要看重新登记的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而且还要看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开得是否按期，是否经常，就是说，要看我们是否善于正确地对待目前还不能入党但应当吸收来参加工作的群众。

我们所以能够战胜协约国，也许是因为我们取得了工人阶级的同情，取得了非党群众的同情。我们终于战胜了高尔察克，也许正是因为高尔察克失去了从劳动群众这一力量源泉中进一步汲取力量的可能。而我们有这样的后备力量。除工人阶级的政府外，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源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府才能满怀胜利的信心大胆地从最受压迫和最落后的劳动人民中汲取力量。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非党工农队伍中汲取力量，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为了解决粮食、燃料的供应问题，为了战胜斑疹伤寒，我们只能从这些受资本家地主压迫最深的群众中汲取力量。这些群众一定会支持我们。我们将日益深入地从这些群众中汲取力量；我们可以说：我们最后一定会战胜一切敌人。在战胜邓尼金以后，我

们就要真正展开和平建设工作，我们在这方面一定会比两年来在军事方面创造的奇迹多得多。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49—351页

(1) 本文是《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之二。列宁在报告中论述了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加强组织建设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国家。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会有一些有害分子混进来捞取好处，因此必须严把党的大门，应当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1920年4月5日）



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上(1920年4月)

同志们，我们在给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简短的总结时，我认为首先应当谈谈我们党的任务。代表大会就组织工作问题通过了一个详细的决议，正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在这个决议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的，是关于对我们党员的培养、训练和组织上使用的问题。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这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党员超过60万。我们都很清楚：在过去这些战斗的日子里，党遭到了多大的艰难困苦，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防止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斗争的方法之一就是举行征收党员周。只有在党和运动处境特别困难的时候，在邓尼金占领了奥廖尔以北地区、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50俄里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党的才可能都是真正忠于劳动者解放事业的人。

这种情况在目前、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必须指出，我们党员现在达到的巨大数字（同前几次代表大会相比），使人有些担心，而且这里存在着很现实的危险：我们党在迅速发展，而我们教育这些党员去完成党的当前任务这项工作却不能随时跟上。我们必须经常注意到，这支拥有60万人的大军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要在两年内完成自己的任务恐怕是不可能的。党员的忠诚是我们实行和保持我们最严格的纪律的基本条件，因为过去实行纪律所凭借和依靠的一切东西都被破坏了，我们只能以十分周密的思考和高度的自觉性作为我们活动的基础。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实行一种比其他国家的纪律更高的、立足于另一种基础之上的纪律，它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纪律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还能维持的话，那也只是勉强维持着。因此，我们应当记住，在我们取得了辉煌战绩之后的下一年中，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不如说是加强内部工作，即提高我们全党。所以说，我们关于组织工作问题的决议对这一点给予极大的重视不是没有道理的。

无论如何应当使这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使这一支拥有60万党员的大军能胜任它所担当的任务，而它所担当的国际国内任务是极其重

要的！说到国际任务，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尽管从国外传来的关于各国工人生活情况的消息很少，但是每当你收到一两封信或几份欧美社会主义工人报纸时，就感到无上的欣慰，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国家里，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其中好多地方我们都不知道，那里完全没有受过宣传影响的群众或者在可怜的机会主义即纯粹的议会制社会主义影响下混日子的群众，都日益关心苏维埃政权，关心新的问题，革命运动到处都在日益深入，风潮迭起，革命问题被提了出来。

我昨天看了一份英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报纸。英国工人拥有知识分子的领袖，这些领袖几十年来一直以轻视理论著称，但是现在英国工人十分明确地表明，并且他们的报纸也证明：现在英国工人关心革命问题，开始关心并日益关心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议会制社会主义的斗争，对这些为我们所熟知的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斗争。这个斗争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了！美国的P. 同志出版了一厚本书，发表了托洛茨基和我的许多文章，从而介绍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位同志指出，法国革命从世界历史范围来说是一次胜利的革命，它之所以被直接镇压了下去，那是因为它四周的欧洲大陆各国当时都比较落后，在这些国家里不能立即掀起效法、同情和支援法国革命的运动。由于沙皇政府的压迫和许多其他条件（1905年曾进行过革命，等等）而先于其他国家爆发的俄国革命却不同，它四周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走向革命虽然较慢，但是较扎实、较稳固、较坚定！我们看到，每年甚至每月，苏维埃共和国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拥护者和朋友的数目都在十倍、百倍、千倍地增加，而且应当指出，我们的朋友和同盟者比我们所知道的多！

全世界帝国主义想用武力压垮我们的尝试已经完全失败了！现在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比我们革命初期更持久更稳定的喘息时机。但是应当记住，这终究不过是个喘息时机。应当记住，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它正在选择有利的战略条件，研究进攻的

方法，等待着时机。千万不能忘记，现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还在它们那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现在正在迅速成长壮大，正在把敌人手中的武器一件一件地夺过来，但敌人时刻都在苏维埃共和国旁边窥伺着机会！现在国际资本正拿定主意，周密策划，想在撤销封锁的时候把国际的粮食投机活动、国际自由贸易同我们国内的粮食投机活动联合起来，融合起来，结合起来，并准备从这种粮食投机活动方面对我们发动新的战争，设置下许多新的圈套和陷阱。

这里我们来谈谈作为这次代表大会主要问题、主要注意中心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建设任务。在这方面代表大会做了很多工作，一致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和运输这一主要问题的决议。我们现在靠着党的教育，一定能使参加工会的300万工人同心协力地来执行这项决议。我们一定要利用这项决议来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纪律性和干劲都用于恢复我国的经济，首先是恢复运输，其次是改善粮食供应状况。

我们现在有许多问题要宣传。在这方面，从国外传来的每一条消息和新吸收的每十个党员都能给我们提供新的宣传材料。宣传应该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要浪费和分散力量。我们在军事上之所以取得了胜利，创造了奇迹，就是由于我们总是集中力量来解决主要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使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会使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原来，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公民所特别关心的事情——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战争与和平——都是背着社会决定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战争、和平、外交等，都是由一小撮资本家来决定的，他们不仅欺骗群众，甚至常常欺骗议会。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议会曾经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发表过一点有分量的意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他们是饿肚子还是能维持好的生活，都由资本家这位老爷、这个上帝来决定！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里，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在这种时候总是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编造种种谎言，采取种种手段来欺骗和蒙蔽群众！与此相反，在我们这里，整个国家政

权机关和每个觉悟工人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当前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上，集中在主要的任务上！在军事上我们这一点做得很出色，我们现在应当把这一经验运用到经济方面来。

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最重要的问题——粮食问题、劳动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企业主的私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每一个稍有头脑的农民都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和理解到，如果国家在所有的报刊上，在每一篇文章里，在每一号报纸上都提出运输问题，那么，这便是大家的事情！这一建设对农民来说是摆脱曾使他们遭受奴役的那种愚昧无知，进而享有真正的自由，那时劳动者就会了解他们面前的种种困难，因此要把社会团体的全部力量、国家机关的全部力量、宣传鼓动的全部力量都用于最平凡最重大的事情上，不要像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报纸鼓动家那样花言巧语，舞文弄墨，玩弄各种决议和美妙的诺言！应当把全部力量和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最平常的经济任务上，这些任务是每个农民都理解的，任何一个较正直的中农、甚至富裕农民都不会反对这些任务，我们在任何会议上提出这些任务都是绝对正确的。最不觉悟的工农群众都会肯定，主要的是立即恢复经济，不让它再受剥削者操纵，不让那些握有余粮的人有机可乘，趁国家闹饥荒而利用手中余粮来发财致富，逼得穷人饿肚子。即使最愚昧、最没有觉悟的人，也不会不认为用余粮投机倒把是不正当的，也不会不意识到——虽然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所举出的理由是完全符合劳动者的利益的。

在大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平常的任务被置于末位，被认为是企业主的私事，而我们却要把60万党员大军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容许其中任何一个党员不执行自己的任务，为此就要使全体工人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忠诚完全投向我们这一边！这是很难组织的，但是这样做我们就会有很高的威望和巨大的说服力，因为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正确的！可以相信，由于代表大会所作的努力，我们现在一定能像完成军事任务那样把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虽然我们会像完成军事任务那样遭受许多失败，犯许多错

误。我们有这样的把握说，现在欧美各国的工人都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完成我们所担负的这个更困难的任务，因为完成这个任务要比夺取军事胜利更困难！这个任务单凭热忱、自我牺牲精神和英勇精神是不能完成的！在这种我们俄国人做起来比谁都差的组织工作中，在这种培养自我纪律的工作中，在这种需要善于抓住主要东西而抛弃次要东西的工作中，图快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在收集粮食、整顿运输、恢复经济方面，只能一步步地前进；这方面正在打基础，做出的成就虽少，然而扎实的。在这一工作上，各国工人都看着我们，期望我们取得新的胜利！我相信，依靠我们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60万党员同心协力，同经济机关和工会机关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我们一定能像完成军事任务那样胜利地完成这个任务，并迅速而坚定地向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迈进！（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11—316页

（1）本文是《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之六。列宁在这篇闭幕词中论述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保持纯洁性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行和保持严格的纪律，防止各种有害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列宁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的规模，不如说是提高党员质量，使无产阶级先锋队能胜任它所担当的任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选）

（1920年4—5月）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呢？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清同治元年... 著... 第二...
清同治元年... 懂... 必须... 消灭

的中共運動主義

左派幼稚病

著者 列寧

現在我們工作中的無紀律性
或政府狀況

毛澤東

版出社放解

一九四八年八月
廿一日

毛泽东读过的列宁著作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1）这是列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策略问题的重要著作。在节选的部分，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所谓“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任务，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行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精辟地阐明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论述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来确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原则。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做“左派”，而是叫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做《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人，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标记全录自原文。）

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参加议会活动）“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切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应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

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大力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各行业各阶层的最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就必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和最广大的范围内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汇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响应‘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联合在这里。在这里，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之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于是，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参加议会活动，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一斗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参加过或仔细观察过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不过，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吧。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

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人们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思想便发生了混乱。在德国，也像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通过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内战的展开，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开始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¹⁾英

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¹³⁸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²⁾埃勒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

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组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就要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

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一经治愈，机体甚至会更加强壮。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把领袖们“藏起来”，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使他们去服苦役，并使其中许多人过早去世。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采用适当的隐蔽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使他们丧生，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3\)](#)

在许多国家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后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对付这种危险，办法之一就是
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724页；第22卷第320—325页；第28卷第146页；第33卷第521、526、637页；第35卷第18、35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0—286、338、467—468页。——编者注

[\(2\)](#) 《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2月7日汉堡出版的该报第32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毁政党，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罗曼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糊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埃勒和克·霍纳通过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其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极不恰当的议论。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特别经常地成为“时髦的东西”。

[\(3\)](#) 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

十 几 点 结 论



1927—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部分中译本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一个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1905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且从1905年1月到10月，罢工还在不断和急剧地发展。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表明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合，而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表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怎样创造出了苏维埃这种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工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看来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这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第二种斗争则存在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绝对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如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活动采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毫无疑义，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然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用了15年时间才使它这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还显得坚强有力，还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护照、报刊）和思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既是由于它推行机会主义，又是由于它不善于或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

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转向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在这方面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主要的）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却更接近于实际完成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采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么，现在不肃清

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因而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这时候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绩来。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已不能像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要以百万、千万来计算了。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邱吉尔之流和劳合一乔治之流（这种政治类型的人各国都有，只是依国家不同而稍有差别）的分歧以及韩德逊之流和劳合一乔治之流的另一种分歧，从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也就是从还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但是从群众这种实际行动的观点来看，这些分歧却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

的、信仰坚定的、思想先进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务就是要估计到这些分歧，确定这些“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完全成熟的时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以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称为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们在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破产，从而启发群众接受我们的观点，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加速韩德逊之流、劳合一乔治之流、邱吉尔之流相互之间（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君主派之间，谢德曼之流、资产阶级、卡普派之间，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争吵、冲突和彻底分裂；并且正确地选择这些“神圣私有制的支柱”分崩离析的时机，来发起无产阶级坚决的进攻，把它们全部打垮，把政权夺过来。

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体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

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平静”时期，非革命时期）用合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不合法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至于1914—1918年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当时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闻所未闻的蛮横无耻的手段欺骗工人、禁止人们说这场战争具有掠夺性这一真理，有些政党和领袖却不善于或不愿意（不要说“我不能”，还是说“我不想”吧）采用不合法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那是对的。但是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爆发、已经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在这种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而在这以后，在胜利以后，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糟透了的革命家却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历尽千辛万苦。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拿英国来说吧。我们无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什么时候那里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

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把四只脚都钉上马掌（正如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所爱说的那样）。能“冲开缺口”、“打破坚冰”的也许是议会危机，也许是由极端错综复杂、日益恶化和日益尖锐的殖民地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许是什么别的，等等。我们谈的不是哪一种斗争将决定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解决了，并且彻底解决了），我们谈的是什么缘由将唤起目前还在沉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起来，并且把他们一直引向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无论从国际或国内环境来说，革命形势都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有反动军阀千万次无耻行径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只要有这样一个“意外的”、“小小的”缘由，就足以把人民径直引向国内战争！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不断、始终不渝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的爱尔兰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球性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遇到的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他一切领域、一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式，用共产主义的方式，照第三国际那样而不是照第二国际那样来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啊，那是在你们俄国，我们这里，议会活动却是另一个样子。”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上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在各国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系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议会工作。过去在我国的选举中，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专讲实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

的议会活动，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传送和散发传单，走访工人住所，走访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大陆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走进最下层的平民酒馆，进入真正的平民会社、团体，参加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带议会腔）跟人民说话，丝毫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是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构，利用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期间，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构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任务不花气力都是无法完成的，而气力必须花在完成日益多样化的、日益涉及社会生活各部门的、从资产阶级手中逐一夺取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在军队中，在“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办法，而是用革命办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今天，当各国人民受尽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认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应由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社会生活的所有这些领域都布满了易燃物，可以触发冲突和危机、激发阶级斗争的机会也特别多。目前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中都有无数火星从各方面迸发出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点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能够彻底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园地，甚至包括最陈腐的、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指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就将肩负不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种类的

武器，既不能准备好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准备好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出乎资产阶级和庸人们意料的若干胜利之后，全世界现在已经变了样，各处的资产阶级也都变了样。资产阶级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对它恨得咬牙切齿，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加速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他许多方面的阵地。一切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估计到这两种情况。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克伦斯基在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疯狂攻击（特别是从1917年4月起，而到6月和7月就更加猖狂）的时候，做得“太过火了”。发行数百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就帮助了群众来认识布尔什维主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热心”，不但是报纸，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充满了就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的争论。现在各国百万富豪在国际范围内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衷心感谢。他们正同过去克伦斯基之流一样，全力恶毒攻击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同克伦斯基一样，在这方面也做得“太过火了”，同样也帮助了我们。法国资产阶级把布尔什维主义当做竞选鼓动的中心问题，责骂比较温和的或动摇不定的社会党人，说他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则完全丧失了理智，以涉嫌布尔什维主义为理由把成千成万的人抓起来，并到处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消息，造成人心惶惶的气氛；世界上“最老练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它很有头脑，很有经验，却也干着难以置信的蠢事，建立各种经费充足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协会”，出版专门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书报，增雇很多学者、鼓动家、神父来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为此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在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现在也不可

能有别的做法，因为要用“缄默”来扼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已经办不到了。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看到的几乎只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内，资产阶级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对我们来说也决没有什么可怕的。共产主义确实正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出来”，它的幼芽确实到处可见，“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经深深侵入机体并且感染了整个机体。即使煞费苦心，“堵住”一处，“传染病”也会从另一处，有时甚至是最意外的一处冒出来。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疯狂挣扎，暴跳如雷，肆意横行，干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对布尔什维克杀一儆百，错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几千以至几十万个明天的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终究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也遭到过镇压；谢德曼和诺斯克伙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狡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15 000多个德国共产党人；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损害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要更有信心、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现在只缺一点，这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要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先进国家中蓬勃发展着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缺少的就是这种认识，就是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通晓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

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过并向别人传授过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许多东西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说，他们在实践中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

应该设法使共产党人不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确切一点说，要较早地纠正，较快地、使机体较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只不过是出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医治。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即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现在我们工作的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是这样扎实，这样有力，这样宏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驾驭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

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完全的、最终的、确定无疑和不可逆转的胜利的手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6、19—26、69—83页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惨绝人寰、卑鄙齷齪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它所造成的绝境，极其有力地推动和加速了世界革命，这场革命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如此迅猛，更替的形式如此丰富，在实践上对一切学理主义的驳斥如此富有教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能够迅速而彻底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医治好。

1920年4月27日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不晚于1920年7月18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没有制定各个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确切条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时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多数国家不仅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流派和派别，而且有了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

现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和小组愈来愈多，它们不久以前还属于第二国际，现在都希望加入第三国际了，不过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小组。第二国际已被彻底粉碎。中间政党和“中派”集团看到第二国际已经毫无希望，就想倒向日益壮大的共产国际，但是，它们还希望保留一种“自主权”，以便推行它们原来的机会主义的或“中派主义的”政策。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时髦的东西。

现在“中派”的某些领导集团希望加入第三国际，这就间接证明，共产国际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觉悟工人的拥护，并且成为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力量。

在一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的集团溶蚀的危险。

此外，在多数人抱有共产主义观点的某些大党（意大利、瑞典）里，至今还存在势力相当大的改良主义的和社会和平主义的派别，它们一直在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积极展开暗中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来帮助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

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不应该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人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因此，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制定十分确切的接纳新党的条件，并向那些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指出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如下：

1.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只当做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进行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不断报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合作社中，总之，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斥责资产阶级的帮手即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2.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担负的比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不必顾虑最初有时不得不用普通工人来接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 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非常法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合法地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4. 必须坚持不懈地有步骤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不合法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称的。

5. 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苦农民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使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保持中立，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

6. 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赤裸裸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实质，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议论、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断然地要求在最短期间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和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相类似了。

8. 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赶出这些殖民地，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通过长期的顽强的工

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0.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坚持不懈地宣传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决裂的必要性。它应该竭力支持正在形成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组织。

11. 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成员，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 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实行不完全符合党的要求的政策。

13.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14. 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15.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各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把军事装备运送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应该在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进行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宣传工作，等等。

16. 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

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例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作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

18. 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召集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98—203页

（1）本文是《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之五，写于1920年7月18日之前。列宁在这一文件中阐述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提出了防止和肃清机会主义和“左”倾思潮影响的有力措施。列宁特别指出，共产党的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那些背叛工人阶级的旧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的显著标志。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

（1920年9月24日）

本材料不是用来代替中央委员会的信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的，而是作为补充意见：

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处境极为困难，破坏极其严重，军事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以必然要确定若干“重点的”（因而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这是必然的，因为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就不能拯救遭到破坏的国家；不加强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无疑就会扼杀我们，根本不让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着手进行经济建设。

但是，由于过去遗留下来的难以克服的资本主义的和私有制的习惯和情绪，上述情况就使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全党注意争取实现……[\(2\)](#)

……必须作出切实认真的保证，使党在上述原则问题上一致通过的决定不致变成一纸空文。因此，代表会议提请中央委员会对下列措施立即作出决定，付诸实施，并建议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予以确认：

（1）为发挥党员的主动精神，除其他措施外，还绝对必须更经常、更广泛地召开党员大会；

（2）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

（3）制定完全切实有效的规章制度，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群众之间（在生活条件、工资数额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是违反民主制的，并且是瓦解党和降低党员威信根源；

（4）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由受党的培养最多、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最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有权接受一切申诉和审理

（经与中央委员会协商）一切申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列 宁

1920年9月24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87—288页

（1）本文是《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之三。在这篇文献中，列宁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改进党的各级机关工作的具体措施，包括经常召开党员大会，办好党的刊物，制定规章制度，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等。

[\(2\)](#) 此处有一页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

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82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10月2日）



1933—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青年团的任务》的部分中译本

（大会向列宁热烈欢呼）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青年组织应当是怎样的组织。

这个问题应当讲一讲，尤其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所能完成的任务，至多是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奠定巩固的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就只有靠在新条件下，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参加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负。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就应当说，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

当然，这仅仅是“一句话”，还没有答复主要的和最本质的问题——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而这里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在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同时，将来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一代人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了。青年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只有把青年的训练、组织和培养这一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做到：青年一代努力的结果将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教给青年什么；真正想无愧于共产主义青年称号的青年应当怎样学习；以及应当如何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够彻底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

我应当指出，看来首先的和理所当然的回答是：青年团和所有想走向共产主义的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

但是“学习共产主义”这个回答未免太笼统了。为了学会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呢？为了学到共产主义知识，我们应该从一般知识的总和中吸取哪些东西呢？这里我们可能遇到许多危险，如果把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得不正确，或者对这一任务理解得太片面，往往就会出现危险。

初看起来，总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是领会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著作里所讲的一切知识。但是，给学习共产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就未免太草率、太不全面了。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因为那些书本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谎言，虚伪地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领会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讲话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讲话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样的书本知识仍然会保持旧时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最令人厌恶的特征。

如果我们只求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就更危险了。我们若不及时认清这种危险，不用全力来消除这种危险，那么50万至100万男女青年这样学了共产主义之后，将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就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到莫大的损害。

这样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了学习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一切结合起来？从旧学校和旧的科学中，我们应当吸取一些什

么？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穿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在否定旧学校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这种学校中只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

这里我要谈谈经常听到的人们对旧学校的斥责与非难，从这些话中，往往会得出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有人说，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的学校，死记硬背的学校。这说得对，但是，要善于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仅仅是19世纪一位社会主义者——虽说是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著述，而成为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他们已经运用这个学说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实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例如，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维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不应当吸取旧学校的这样一种做法，即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建立不了共产主义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对基本事实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

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该掌握知识，而且应该用批判的态度来掌握这些知识，不是用一堆无用的垃圾来充塞自己的头脑，而是用对一切事实的了解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没有这种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有学识的人。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下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巨大的功夫，不弄清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实，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悲的。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但是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任何扎实的知识，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我们应当废除这样的学校，摧毁这样的学校，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从这种学校里吸取人类所积累起来而为人们所必需的一切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去区别哪些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哪些是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呢？

我们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代之以工农的自觉纪律，工人和农民不但仇恨旧社会，而且有毅力、有本领、有决心团结和组织力量去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把散居在辽阔国土上的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因为没有这样的统一意志，我们就必然会遭到失败。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工农的自觉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毫无希望。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战胜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我们就会连基础也不能巩固，更谈不到在这个基础上建成共产主义新社会了。同样，我们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要摧毁旧学校的决心，但是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的死读书、死记硬背和强迫纪律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并要使你们学到的共

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

我们在谈论学好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时就应该这样来提出基本任务。

为了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同时也谈谈怎样学习的问题，让我举一个实际例子。你们都知道，紧接着军事任务即保卫共和国的任务之后，我们即将面临经济任务。我们知道，如果不恢复工业和农业（而且必须不按旧方式来恢复），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的。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只有全国电气化，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你们面临的任务是振兴全国的经济，要在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立足于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使农业和工业都得到改造和恢复。你们完全了解，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你们自己必须学会这一点，而且还要教会全体劳动青年。这就是一切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也就是每一个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青年，每一个明确地认识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就负起了帮助党建设共产主义、帮助整个青年一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责任的青年的任务。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起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提高团结自己力量的本领。新一代人面临的任务就比较复杂了。你们不只是应当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支持工农政权抗击资本家的侵犯。这一点你们应当做到。这一点你们完全了解，每个共产主义者都非常清楚。但是这还不够。你们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前一半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

了。旧东西应该摧毁，而且已经摧毁了，它应该变成废墟，而且已经变成了废墟。地基已经清理好，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在这块地基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你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能把你们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你们在教育、培养和发动整个青年一代的事业中应当执行的任务。你们应该是千百万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带头人，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建设者。不吸收全体工农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你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我自然要讲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教授共产主义，我们的方法应该有什么特点。

我在这里首先要谈谈共产主义道德问题。

你们应当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实际活动：使团员青年在学习、组织、团结和斗争的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和那些以他们为带头人的人都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

但是，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有没有共产主义品德呢？当然是有的。人们往往硬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资产阶级常常给我们加上一个罪名，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否定任何道德。这是一种偷换概念、蒙骗工农的手段。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否定道德，否定品德呢？

是在资产阶级所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申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十分清楚，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或者他们不是从道德的要求，不

是从上帝的意旨，而是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申出这种道德来的。

我们否定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出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

旧社会建筑在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全体工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摧毁这个社会，应该打倒这些压迫者，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而上帝是不会创造这种团结的。

只有工厂，只有受过训练的、从过去的沉睡中觉醒过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种团结。只有当这个阶级已经形成的时候，群众运动才开展起来，才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极弱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这个国家三年来抗击了全世界资产阶级对它的进攻。同时我们还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引导分散的农民，并且经受住了剥削者的一切进攻。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帮助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捍卫和巩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那是一种欺骗。在我们看来，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

这种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资本家，消灭资本家阶级。

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

赶走沙皇并不困难，这总共用了几天的工夫。赶走地主也不很困难，这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赶走资本家同样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消灭阶级就无比困难了；工人和农民的区分仍然存在。如果一个农民单独占用一块土地，拥有余粮，即他本人及其家畜都不需要的粮食，而别人却没有粮食吃，那么这个农民也就变成剥削者了。他剩余的粮食愈多，获利就愈大，至于别人，就让他们挨饿去吧，“他们愈饿，我的粮食就卖得愈贵”。应该使所有的人都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和共同的规章，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公共的工厂中工作。这容易做到吗？你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决不像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那样容易。这里需要无产阶级去重新教育和改造一部分农民，把劳动农民争取过来，以便消灭那些富裕的和专靠别人贫困来发财致富的农民的反抗。可见，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是要来完成这项任务。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道德，它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反对一切小私有制，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交给了个人。而在我国，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

如果我从这个公共财产中拿一块土地来，种出超过我的需要一倍的粮食，然后用余粮来投机倒把，那又怎样呢？如果我这样盘算：饿肚子的人愈多，我出卖粮食的价钱就愈高，那又怎样呢？难道我这是共产主义者的行为吗？绝对不是，这是剥削者的行为，私有者的行为。应该同这种行为作斗争。如果听之任之，那一切都会开倒车，回

复到资本家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就像过去一些革命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因此，为了不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恢复，就要禁止投机买卖，就要使某些人不能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发财致富，就要使劳动者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基本任务的主要特征。

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吏、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

既然我种我的地，别人的事就与我无关；别人要是挨饿，那更好，我可以抬高价格出卖我的粮食。如果我有了一个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么别人的事也与我无关。也许，只要我讨好、巴结有权势的人，就不仅能保住我的小职位，还可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共产主义者就不能有这种心理和情绪。当工人和农民已经证明我们能用本身的力量捍卫自己并且创造新社会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剥削者的教育，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利己主义者和小私有者，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

这就是对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当人们向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在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这些。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培养、教育和训练的基础。这也就是对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信赖的。只要工农还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只要学校还操纵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青年一代就仍然是愚昧无知的。可是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使他们自己能够培养共产主义的观点，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有学识的人。我们的学校应当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铲除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称号。你们很清楚：目前俄国还是唯一的工人共和国，世界其他各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旧制度，我们还比它们弱；我们随时都有遭到新的进攻的危险；只有学会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而我们得到巩固之后，就会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把全体青年都组织和团结起来，要在这个斗争中作出有教养和守纪律的榜样。那时你们才能着手建设并彻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厦。

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呢？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一词是“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如果每个人都单独经营一块土地，那劳动能是共同的吗？共同劳动不是一下子就能实行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共同劳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和创造，要在斗争进程中才能实行。这里不能靠旧的书本，书本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这里要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当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邓尼金从南方进攻时，农民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当时农民不欢迎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但是农民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尝到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的滋味之后，就认清了农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者投奔资本家，那么资本家就要你去给地主当奴隶；或者跟着工人走，虽然工人没有许愿让你过天堂般的生活，而且还要你在艰苦的斗争中遵守铁的纪律并具有坚强的意志，可是他们却能使你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奴役。甚至是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只要根据亲身的经验懂得和认识了这一点，也就成了自觉的、经过艰苦磨炼的共产主义拥护者。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应当把这种经验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基础。

我已经回答了 we 应当学什么，应该从旧学校和旧科学中吸取什么问题。现在我还想来回答一下应当怎样学习这些东西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骤，把培养、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我要从某些青年组织的工作经验中举出几个例子，向你们具体说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共产主义教育。大家都在谈论扫除文盲。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靠党提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项工作，那是不够的。还需要青年一代自己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体现在参加青年团的男女青年自己站出来

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我们要努力使青年们能主动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你们知道，要把俄国从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很快变成人人识字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青年团能担负起这个工作，如果全体青年都能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那么这个团结着40万青年男女的组织，就有权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青年团的任务还在于：除了掌握各种知识，还要帮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不了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做一个青年团员，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公共事业。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只有在这样的工作中，青年男女才能培养成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有当他们在这种工作中取得实际的成绩时，他们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就拿城郊菜园工作来作例子吧。难道这不是该做的事吗？这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之一。人民在挨饿，工人在挨饿。为了不再挨饿，应该发展菜园，但是耕作还在按旧的方式进行。因此必须让觉悟较高的人来担任这个工作，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菜园数目会增加，面积会扩大，效果会更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每个青年团组织，每个青年团支部，都必须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一支能够支援各种工作、处处都表现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突击队。青年团应当成为这样的一个团体，使每个工人都感觉到，这个团体中人们所讲的学说也许是他不了解的，也许是他还不能一下子就相信的，但是从这些人的实际工作和活动可以看出，他们真正是能给他指明正确道路的人。

如果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各方面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工作，那就说明它走上了资产阶级的老路。我们的教育应当同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结合起来，以便帮助劳动者完成共产主义学说提出的任务。

青年团员应当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或在某个工厂里组织青年学习等等。我们要把俄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

成一个富裕的国家。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把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使大家都看到，入团的青年个个都是有文化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当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废除了旧学校里的旧的强迫纪律，代之以自觉的纪律，看到每个青年都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他们利用每个近郊菜园来帮助居民，那时人民就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要在农村或自己的街道上帮助做些事情，我举一个小例子，像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的工作。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这些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那时每个人只为自己工作，谁也不注意这里有没有老人或病人；或者全部家务都压在妇女肩上，因而妇女处在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谁应当来反对这种现象呢？青年团。青年团应当出来说：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组织青年队经常到各家各户去，协助搞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正确地调配力量，有组织地为全社会的利益工作，让大家看到，劳动应该是有组织的劳动。

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在旧社会中，是各家各户单独劳动，除了压迫老百姓的地主和资本家外，谁也没有组织过劳动。任何一种劳动，不管它怎样脏，怎样吃力，我们都应当把它组织起来，使每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己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大家从小⁽²⁾就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受教育。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完成现在所提出的任务。我们应该估计到，要全国实现电气化，使我国贫瘠化了的土地能采用最新的技术来经营，至少要花10年工夫。因此，现在是15岁、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

社会里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安排自己的全部学习任务：在每个乡村和城市里，青年每天都能实际完成共同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能否保证共产主义建设成功，就要看这个工作在每个乡村里进行得怎样，就要看共产主义竞赛开展得怎样，就要看青年组织自己的劳动本领怎样。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建设的成绩来检查自己的每一步骤，只有经常问问自己：为了成为团结一致的自觉的劳动者，我们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只有这样，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把自己的50万团员联合成一支劳动大军并且赢得普遍的尊敬。

（掌声如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93—312页

（1）列宁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指出，青年一代担负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他们应当为完成这一崇高使命而认真学习。青年首先要努力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但这种学习不能仅凭书本，不能脱离沸腾的实际生活。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的，青年一代只有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青年还要刻苦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掌握建设祖国的本领。列宁在讲话中还强调在青年中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性，要求青年团必须坚持与工农的劳动相结合，通过教育、训练和培养，使现代青年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

[\(2\)](#) 1920年10月7日的《真理报》第223号上刊印的不是“从小”，而是“从12岁起”。
——编者注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节选）

（1921年3月）

8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3月13日或14日）

1. 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党员注意：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2. 但是，还在全党开展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苗头，即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这种派别活动的苗头已经出现，例如在莫斯科（1920年11月）党代表会议和哈尔科夫党代表会议上，在所谓“工人反对派”的活动中，局部地也在所谓“民主集中派”的活动中已经表现出来。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的敌人极力利用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这种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乱189这一实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以至一切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都利用了这场似乎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才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叛乱所提出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成最左的共产主义者。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同样表明，孟什维克利用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与某些派别

活动的苗头事实上在怂恿和支持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口头上却标榜自己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不过要苏维埃政权作一些仿佛不大的修正。

3. 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一方面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害处和危险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公开打着白卫旗帜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指望了，所以现在他们竭力抓住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到表面上最像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手中，用这种方法来推进反革命。

在宣传中还应当阐明历次革命的经验，当时反革命势力也总是支持那种既反对极端革命的政党又同这一政党最相似的派别，以求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从而为资本家和地主的反革命势力以后取得完全胜利开辟道路。

4. 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

5. 代表大会根本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已有专门的决议⁽²⁾加以分析），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

活动，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全党应当知道，我们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知道，党在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

6. 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7. 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的负主要责任的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78—83页

(1) 列宁在这三篇文献中指出，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党内决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对于各种错误的主张和破坏党的统一的活动，必须坚决进行斗争，以维护党的坚强团结。同时，列宁也指出，党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各种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的不良分子。

[\[2\]](#)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6—69页。——编者注

9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

（3月13日或14日）

1. 最近几个月来，在党内明显地暴露出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必须清洗和健全党的队伍。

2. 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维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主要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共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目前，在歉收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为恶化、成百万军队的复员使几十万农民和工人无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特别猖獗，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3. 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和其他著作，是这种倾向的理论上最完整和形式上最完备的表现（或者说：是这种倾向的……最完整……的表现之一）。例如，他们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
[\(1\)](#)

这种主张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主张所依据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也是同一切半无产阶级革命和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的总结背道而驰的。

第一，“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完全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违背了要明确地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

第二，上述论点中所表现出来的指靠非党群众或者说迎合非党群众的思想，也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这一教导不仅已经由整个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决议中正

式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就是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贯穿在“工人反对派”的全部观点之中。

4.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上述这个派别以及其他想援引俄共党纲经济部分有关工会作用的第5条来为他们的错误观点辩解的一切尝试也是根本错误的。这一条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吸引”这些群众“直接参加经济管理”。

俄共党纲的同一条指出，“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把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把全体”劳动者都包括进来，这个过程是工会做到“应当做到”的这一步的先决条件。

最后，俄共党纲的同一条还着重指出，“根据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2\)](#)。

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考虑这种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不严格地根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纠正的错误的教训去进一步发展这一经验，却直接提出由“各级生产者代表大会或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选举”经济管理机关的口号。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以至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

用，就被撇开了和取消了。因此，这不是继续进行和改进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创建新经济形式的实际工作，而是用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来破坏这一工作，而这样做只能促使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获得胜利。

5. 俄共代表大会认为，上述派别及其他类似的派别和个人的观点不仅是理论错误，不仅是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采取根本错误的态度，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着的直接的政治危险。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战祸频仍、经济破坏、疫病流行、连年歉收必然使人民极端贫困痛苦，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就表现出特别严重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而18、19和20世纪的历次革命的全部经验都十分清楚地和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 and 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的结果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以及私有制的复辟（恢复）。

因此，“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在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

6. 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

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

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84—87页

[\(1\)](#) 见《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工会的任务》（1921年1月25日《真理报》第15号）和亚·米·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仅供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成员参考）（192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5页）。——编者注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10 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

（3月16日）

同志们，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谈很多，因为整个代表大会在讨论各项问题时，就已经涉及了现在应当以党代表大会的名义，也就是以全党的名义正式加以阐明的的问题。《关于统一的决议》⁽¹⁾，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明政治形势的。决议已经印发给大家，你们当然都看到了。其中第7条不准备公布，这是一项特殊措施，它规定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全体会议上，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同意，可以把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项措施在各派代表都发表了意见的非正式会议上，曾一再讨论过。同志们，我们希望不要运用这一条。但是新的情况下，在我们面临相当急剧的变革，希望彻底消灭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这一条是必要的。

现在我谈一谈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这个问题在大会讨论第四项议题时已经涉及了。整个决议的精神是要确定我们对某些派别或思想倾向的态度。我们说“倾向”，是要强调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发现任何已经彻底形成、已经绝对肯定和完全确定的东西，而只是一种政治趋向的开始，党对这种趋向是不能不有所估计的。大概你们都已经看到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在决议的第3条中，有一个地方显然是印错了（从发言中看到，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应当改成这样：“例如，他们的”即“工人反对派”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²⁾。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在大会的非正式的会议和公开的全体会议上已经屡次谈到这个论点。我认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用恩格斯关于生产者的联合的论断来为这个论点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而且把原著切实查对一下也可以肯定，恩格斯讲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当然就没有

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以为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会消失的思想、言论和假设，并且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消灭阶级⁽³⁾。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最先在实践上提出了这个消灭阶级的问题，而在我们这个农民国家里，目前还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此外还存在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残余。

我们的党纲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实行最初的步骤，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但是我们从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实践和整个革命的历史中始终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像反对派现在提出的这种理论定义，是多么不正确。我们十分清楚：我国还存在着阶级，并且会存在很久；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阶级必然要存在很久，存在许多年。要组织好大工业，建立起领导农业所需的储备，至少需要十年。这是最短的期限，而且需要具备非常有利的技术条件。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条件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已经有了把俄国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计划，这就是科学家们所制定的电气化计划。实行这个计划的最短期限需要十年，并且是以比较正常的条件为前提的。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这种条件现在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十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太短了——这是用不着说的。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目前可能的情况是，一些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目前在实践上还不能实现恩格斯的话。先要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以后的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多少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笼统的劳动者或笼统的工作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全部

生活习惯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雇佣工人，即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雇佣工人。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以前已经经过了三年的斗争，已经有了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在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困难，而目前阶级还存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和苏维埃机关内部还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残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里竟有人提出包含我读过的那几个论点的纲领，这显然是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样说并不过分，这样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倾向还不是一个定型的流派。倾向是一种可以纠正的东西。一些人已经有些走入歧途或者开始走入歧途，但还是可以纠正的。我认为，俄文“倾向”一词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这里强调的是，它还不是什么完全形成了的东西，事情还不难纠正；这里是希望引起警惕，是想直截了当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如果谁能找出一个俄文词可以更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那就请提出来。我希望我们不要在用词上展开争论，而应当分析这个基本论点的实质，不要跟着“工人反对派”的诸如此类的许多主张跑。这可以让我们的著作家以及这一派的领导者去分析。在决议的末尾我们特地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们能就上述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我们现在不能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我们是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党。我们必须对自己说，为了保持巩固的统一，对于明显的倾向必须加以谴责。倾向既然已经形成，那就应当加以揭露和讨论。如果需要认真地辩论，我们也欢迎，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来详细引证各种文献，如果认为需要并且恰当的话，我们还可以像你们刚听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国际”这个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我们现在所谈的倾向，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94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一样的。在上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同这个

党是有斗争的。当时批评这种倾向的用词，往往比“倾向”这个词还要尖锐。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因此，想用不再辩论、到此为止的办法来了结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但是，理论上的辩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将要出版一些文集和专门的刊物，但是我们首先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因而必须团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组织“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之类的建议来干扰政治辩论和政治斗争，那我们就不能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前进；这不是我们在近几年内所要执行的政策。这是破坏党齐心协力的工作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它的错误还在于对阶级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判断。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作过决议。目前的情况是，非党的自发势力正在表现出小资产阶级动摇性，这种动摇性在俄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险还要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为了建立这种团结，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

其次，我认为这个决议的第4节非常重要，它对我们的党纲作了确切的解释，也就是说，作了出自作者的解释。代表大会是党纲的作者，因此代表大会应当作出解释，以便结束这种动摇现象，结束这种有时甚至是玩弄党纲的现象：有人对党纲中关于工会的部分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你们都听到了梁赞诺夫同志在这个讲台上对党纲的批评，我们真要谢谢这位批评家的理论探讨！你们都听到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提出的批评。对这种批评是不能保持沉默的。我认为，在这里，在这项决议中，我们有了我们当前所需要的东西。党纲是由代表大会批准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因此，应当以代表大会的名义说：请看我们是怎样理解党纲的。我再说一遍，理论上的争论并不是到此为止。可以对党纲提出修改意见，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禁止。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党纲已经尽善尽美，无可更改，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接到正式的提议，我们还没有花时间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党纲，就会看到下面的话：“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这句话应当加以强调。而从前面的一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法律，工会是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生产管理机关的参加者。”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在世界所有先进国家的协助下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而我们处在极端贫困的时期，工人在我国占少数，无产阶级先锋队 and 农民群众已经疲惫不堪、流血过多。难道我们会幼稚到这种地步，竟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时期这样的国家里可以迅速地完成这一过程吗？！我们甚至还没有打下基础，我们只是刚开始根据经验计划在工会的参加下管理生产。我们知道，主要的障碍是贫困。说我们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工作是不对的；相反，工人群众中任何多少有点才干的人，都得到我们最真诚的支持。现在唯一需要的是形势能够稍微缓和一点。在饥荒之后，我们至少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从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极短的期限，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这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只要有一两年燃料供应正常，保证工厂开工，我们就可以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百倍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他们队伍中提拔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人才。这是任何人不会而且也不能怀疑的。目前我们没有得到这种支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得到支持。为此我们正在做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谁也不能说，政府、工会或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放过了任何一次机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困苦到了极点，到处都是饥饿和贫穷，由此往往产生了消极的心理。我们不要怕如实地说出这种不幸和灾祸。正是这些东西妨碍群众迸发出热情。我们根据统计材料知道，在管理机关中工人占60%。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按照施略普尼柯夫那样来解释党纲说的“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是绝对不行的。

确切地解释党纲，可以使我们把必要的策略上的一致和统一同必要的辩论自由结合起来，这一点在决议的末尾已经着重指出了。决议是怎样说的呢？让我们读一下第6点：

“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份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 [\(4\)](#)

你们都是各方面的鼓动家和宣传家，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战斗的政党内部进行思想宣传和在专门的刊物、文集上交换意见是有区别的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愿意深入研究这个决议的人，都会看到这种区别。我们把这一倾向的代表吸收到中央委员会里来，我们希望这些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能够像一切有觉悟的、守纪律的党员那样来对待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将能够在中央委员会里分清这一界限，而不致造成特殊状况；我们会弄清在党内发生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在战斗的政党内部宣传某种主张，还是在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交换意见。谁有兴趣想仔细研究恩格斯的那些话，那就去研究好了！有些理论家经常向党提出有益的意见。这是很必要的。我们将要出版两三大本文集，这是有益的和绝对必要的。但是，难道这跟宣传某种主张，跟各派纲领的斗争相同吗？难道可以把两者混淆起来吗？凡是愿意深入研究我国政治形势的人，是不会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的。

不要妨碍我们的政治工作，特别在严重的关头，但是也不要放弃学术探讨。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举例来说）想在最近几个月内利用空余时间，为不久前出版的、叙述他在不合法状态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的集子编写第2卷来分析“生产者”这一概念，那就请写吧！而目

前的这一决议，却应当成为我们的路标。我们开展了最广泛、最自由的辩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曾经登载在发行25万份的党中央机关报上。我们从各方面尽可能地考虑了这个纲领，我们根据这个纲领选举了代表，最后，我们召开了代表大会，而大会对政治辩论作了总结，并且指出：倾向已经很明显，我们不要再捉迷藏了；应当公开指出，倾向就是倾向，必须加以纠正；我们一定会纠正这种倾向，至于辩论，那将是理论上的辩论。

因此，我再次提议通过并且赞成通过这两项决议，巩固党的统一，并且正确规定党的会议应该做些什么，个别愿意帮助党的、从事某些理论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在空余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做些什么。（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88—95页

[\(1\)](#) 见本书第294—297页。——编者注

[\(2\)](#) 见本书第298—299页。——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8卷第508—51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46—147页，第4卷第170页。——编者注

[\(4\)](#) 见本书第301页。——编者注

关于“出版自由” 给A. 米雅斯尼科夫的信

1921年8月5日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

今天才看完您的两篇文章。您在彼尔姆（似乎是彼尔姆？）组织中说了些什么，在哪一点上同它发生冲突，我不知道。关于这一点，我无从谈起。这件事将由组织局来处理，我听说组织局已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

我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即把您的信当做资料性和政治性的文献来加以评价。

多么有趣的文献啊！

在我看来，《伤脑筋的问题》一文特别明显地表明了您的主要错误。我认为我有责任来尽力说服您。

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是的，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

但正因为您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所以我奇怪您怎么在作结论时竟忘记了您自己正确运用过的辩证法。

“……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 妙得很！但是，对不起，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考虑过四年来我国革命的经验工人都一定会说：我们倒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哪一个阶级的？

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联邦那样做了和正在做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这是事实。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

而在我国呢？谁能否认资产阶级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呢？谁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呢？这是无法否认的。

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²⁾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

这是事实。“他们”比我们富有，能收买到比我们现有力量大十倍的“力量”。

不，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去帮助世界资产阶级。

您怎么会从阶级估量出发，即从估量一切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堕落到采取温情主义庸人的观点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在“国内和平还是国内战争”的问题上，在我们过去怎样争取和今后如何继续“争取”农民（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问题上，在

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根本的、世界性的（＝涉及世界政治的实质的）问题上（您的两篇文章是专门谈这两个问题的），您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小市民的、温情主义的观点。您在那两个问题上能够切实地、冷静地估计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

但突然间您却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

“……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

据我对您那两篇文章的分析，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误入了迷途。您让一些可悲的、痛心的事实压垮了，失去了冷静估计力量的能力。

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它已经雇用了米留可夫，而米留可夫又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在“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部分是由于愚蠢和对我们的宗派仇恨，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客观逻辑）。

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

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当然，杀人的并不是您，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切尔诺夫＋马尔托夫）。

您忘记了一件小事，一件极小的小事：世界资产阶级和它的收买报纸、收买政治组织中心的“自由”。

不，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千个有觉悟的工人有九百个不会走这条路。

我们的毛病多得很。像1920年秋天和冬天在分配燃料和粮食方面所犯的（很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共同的错误，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大大加重了我们的病情。

贫困和灾难很严重。

1921年的饥荒使这种情况急剧恶化了。

摆脱困境要费很大气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摆脱，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摆脱了。

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的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估计到了国际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不粉饰太平。我们知道困难重重，我们看到了一切毛病。我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在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医治这些毛病。

您已经慌张得不能自己，而且继续往下滑，已经到了似乎您不另组新党就得去自杀的地步。

决不可以慌张。

有没有党支部同党脱节的现象呢？有。有坏事，有祸患，有毛病。

有这些现象。而且毛病很严重。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

您谈到振兴经济，使用“自动犁”和其他机具，争取“影响”农民等等。这些意见包含着许多正确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单独提出来谈呢？我们是能够取得一致并在一个党内同心协力地工作的。这会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不是一下子带来，要慢慢来。

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工作，由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很多很多。

您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切实地加以发挥，在给代表大会写的小册子中加以发挥呢？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工作呢？

为什么害怕做吃力的工作（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呢？有些人对吃力的、艰苦的、见效慢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慌张起来，另寻“捷”径：想到了“出版自由”（给资产阶级的）。

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您为什么不去做不那么“出风头的”（出资产阶级风头的）、吃力的工作，不去切实地反对和祛除营私舞弊行为、切实地帮助党外群众呢？

您在什么地方向党中央举出过某种具体的营私舞弊行为，某种具体的纠正和根除这种行为的办法呢？

没有。

一次也没有。

您看到这许多祸患和毛病，就陷入绝望，投入外人的怀抱，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而我还是奉劝：不要绝望，不要慌张。

我们以及同情我们的人——工人和农民——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充沛的活力。

我们的毛病治得不好。

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提拔党外群众、让他们来检查党员的工作的口号。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我希望您经过冷静思考以后，不会因为爱面子而继续坚持明显的政治错误（“出版自由”），而会在定下神来、克服慌张心理之后，去从事切实的工作：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

这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而不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4—90页

(1) 列宁在信中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提出的“出版自由”口号的虚伪性，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出版事业中必须坚持的党性原则。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执政党不应当也不可能靠倡导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来克服自身的弱点、错误、偏差、毛病，而必须依靠工人和农民、依靠广大党外群众来检查和监督党员的工作，从而切实地反对和祛除营私舞弊行为，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

[\(2\)](#) 在俄语中，“出版”和“报刊”是同一个词。——编者注

俄共（布）中央秘密信件的草稿

（1921年9月9日）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向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提供津贴费自然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极其必要的，但有时却会因此出现一些胡作非为和极其恶劣的舞弊行为。

俄共中央在同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斗争的同时，向所有在国外工作、住在国外或者相当清楚地（通过某种方式）了解这一工作情况的党员发出这封秘密信件。

中央声明，下述行为是极大的犯罪，为此将坚决把有关人员开除出党（此外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和尽可能在报刊上公之于众）

——不仅是任何挥霍从共产国际收到的钱款的行为（用于支持以“左倾”或“革命性”相标榜的派别；用于保障自己或别人具有优于党的工作人员平均水平的生活条件等等）；

——还有任何对中央隐瞒有关这些款项支出详细情况的行为，这是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即直接或间接地逃避向中央十分及时地和绝对正确地报告从共产国际收到的并在国外花费的每一戈比的情况。

凡犯有这类隐瞒真情的错误的人，不论是蓄意隐瞒还是出于疏忽，中央都将把他们视做窃贼和叛徒，因为在国外乱花钱（更不用说挥霍无度了）所带来的害处要比叛徒和窃贼所造成的危害大得多。

凡向共产国际领取款项的人都应知道，他必须绝对准确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指示，特别是要准确地执行向俄共中央绝对详尽、迅速和正确地报告每一戈比开支情况的一切必要规定和条件。

中央责成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工作的俄共党员⁽²⁾立即起草一份关于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取的款项的开支办法以及这一开支的报告的极为详细的指示。

这个指示的要点应该是：

(1) 认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地方共产党⁽³⁾未经中央的批准和同意开支款项的行为是盗窃行为；

(2) 凡领取款项的人，哪怕只是为了运送，都必须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具收据（或将收据寄来），证明钱已收到并遵守开支规定；

(3) 凡收到款项的人，都必须把每一戈比的开支情况告知居住在开支地点的2名以上的同志，其中至少有1人的身份应该是完全公开的，即不参加任何秘密活动；

(4) 凡收到钱款的人，都必须至少3个月1次亲自（或者是上面第3条中提到的2名以上同志中的1位）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最详细地用书面形式报告每一戈比的开支情况；

“检查员”应该是：外交

(α)使团成员

(β)病人

(γ)各种各样的人

(5) 凡收到款项的人也都随时有责任向由俄共中央发给特别委托书（或拥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书）的有权听取报告的人极为详细地报告每一戈比的开支情况；

(6) 凡收到款项而未在规定期限之内提交报告的人，要被交付党审判，即使他甚至已被逮捕；而且没有党的判决，不能排除其盗窃的嫌疑；

(7) 俄共中央会同（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极其严格地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例如：索尔茨+库奇缅科+克里沃夫）。

选自《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第557—559页

(1) 列宁在信中对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提供津贴费用时存在的舞弊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为了防止腐败，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要求有关部门报告每一戈比的使用情况。

[\(2\)](#) 说责成季诺维也夫岂不更好些？更好些！（列宁加脚注）。——俄文整理者注

[\(3\)](#) 手稿上是党共产，列宁在上面标上1、2的数字，把这两个词的位置颠倒过来。——俄文整理者注

关于清党

（1921年9月20日）

清党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关系重大和极其重要的工作了。

有些地方的清党工作主要是依靠非党工人的经验和意见，以他们的意见为线索，尊重非党无产阶级群众代表的意见。这是最可贵、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能这样自上而下、“不顾情面地”实行清党，那么革命的成就确实是会很大的。

因为现在革命的成就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由于从军事战线转到经济战线，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由于现在的情况要求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革命的成就也必然改变自己的性质。在这样的时候，革命的主要成就表现为不辉煌、不显眼、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内部改善，即劳动情况、劳动组织和劳动结果的改善；所谓改善，就是要抵制既腐蚀无产阶级又腐蚀党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要达到这样的改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自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群众眼中玷污了党的分子了）。当然，不是群众所有的意见我们都得照办，因为群众有时——特别是在过重的负担和难熬的痛苦把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年代——也受到那种一点也不先进的思想的支配。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

进行清党时，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能使我们收到很大的效果，能使党成为比以前坚强得多的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紧密的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

我还要指出，把过去的孟什维克清除出党是清党的一部分任务。我看，1918年初以后入党的孟什维克，应当留在党内的大约不超过百分之一，并且对每个留在党内的都要反复进行审查。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这个派别在1918—1921年期间证明，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能巧妙地适应环境，“混到”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里来；第二，能更巧妙地忠心耿耿为白卫分子效劳，口头上和它决裂，实际上为它效劳。这两个特点都是从孟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回顾一下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在口头上和实际上对立宪民主党（以及对君主制）的态度等等就知道了。孟什维克“混到”俄国共产党里来，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由于他们奉行马基雅弗利主义（虽然从1903年以来，孟什维克已表明他们是要资产阶级外交手腕的头等能手），而是由于他们要“适应环境”。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有善于适应环境的特点（但并非任何一种适应环境都是机会主义），而孟什维克这帮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的，他们改换保护色，像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要把1918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可望胜利以及后来必胜无疑的时候参加俄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的大约百分之九十九都清除出党。

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1921年9月20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45—147页

（1）俄共（布）的清党工作是根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的。这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对党进行整顿的一件大事。列宁在本文中指出，清党时应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这会使清党工作收到更好的效果；为了使党成为比以前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并带领群众走向胜利的先锋队，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以及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 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 共产党党团会 议上的讲话（节选）

（1922年3月6日）

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诚然我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但是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这是从政治和行政的角度来说的。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挖苦了那些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确实处于大家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的状态之中，应当说，这是很愚蠢的。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他总是躺在床上，制定各种计划。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俄国完成了三次革命，但奥勃洛摩夫们仍然存在，因为奥勃洛摩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正视自己的处境，不要有任何幻想。我们没有像社会革命党人那样模仿那些把“革命”这个词写成大写的人。但我们可以重申马克思的话：在革命时做出的蠢事不会少，有时还会更多。我们必须冷静地大胆地正视这些蠢事，我们革命者必须学会这一点。

在这次革命中，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这是不可剥夺的成就，这些事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惶惑不安或神经过敏。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依据已进行的侦察来检验我们所做过的事情，这种检验具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通过这种检验继续前进。现在我们要经受一场同资本家的斗争，就必须坚决走我

们新的道路。我们要这样来建立我们的整个组织，做到不让那些没有商业经验的人来领导商业企业。我们往往派某个共产党员去领导一个机关，他无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受过考验，坐过监牢，但不会做生意，偏偏这样的人被派去领导国营托拉斯。他具备共产党员的一切无可争辩的优点，但商人还是揍了他，并且揍得好，因为这种地方本来是不该派最可敬、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去（除去疯子，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忠诚），而应当派机灵的办事又诚实的店员去，店员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比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强得多。我们的奥勃洛摩夫习气也就表现在这里。

我们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去从事实际执行工作，他们虽然具有一切优秀品质但完全不适宜做这种工作。我们国家机关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呢？我们拥有大量的材料，洋洋大观的著作，这会使最严谨的德国学者都喜出望外，我们的公文堆积如山，如果要党史委员会把这一切研究清楚，就得花上50个50年的工夫，而在国营托拉斯里你们却看不到什么实际结果，甚至不知道谁对什么工作负责。我们的法令太多了，而且像马雅可夫斯基所描写的那样，都是匆匆忙忙赶出来的，但对于法令的实际执行情况却没有加以检查。我们共产党负责工作人员的决定是否执行了呢？他们会不会办这件事呢？不，不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内政策的关键就和以前不同了。我们的会议和委员会是怎么回事呢？它们往往是一种儿戏。我们开始清党并暗下决心“清除混入党内的自私自利分子和盗贼”以后，我们的情况有了好转。我们大约清除了10万人，这好极了，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党代表大会上我们要好好讨论这个问题。我想，那些现在只会设立委员会而不进行也不会进行任何实际工作的几万人，到时候也会有同样的命运。我们这样清洗以后，我们的党就会从事实际工作，就会像了解军事工作那样了解这个工作。当然，这不只是几个月的事情，也不是一年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我们不怕说我们工作的性质改变了。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

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他唱得有点刺耳，好在他滴酒不进。他没有学会同拖拉现象作斗争，他不善于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反而为之掩护。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所有非党的工农群众都会跟着共产党的先进队伍去反对这种敌人，反对这种紊乱现象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动摇。

我的讲话快完了，现在作一个简短总结。热那亚的把戏，围绕它的变化多端的把戏，丝毫不能使我们动摇。现在我们不会中圈套了。我们要到商人那里去做交易，要继续执行让步政策，但是让步的限度已经定了。我们至今在我们的合同中所给予商人的东西，意味着我们在立法上后退了一步，但我们不再往后退了。

因此，我们在国内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任务改变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法令、新的机构和新的斗争方式。我们需要的是考查用人是否得当，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下次清党就要轮到那些以行政官员自居的共产党员了。凡是只知道设立各种委员会，只知道开会、谈话而连简单的事也不做的人，最好都到宣传鼓动部门或其他有益的工作部门去。有人正在编造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辩解说，既然是新经济政策，就应该想出一些新花样。而委托给他们的事情却没有做。他们不关心节省他们得到的每一个戈比，更不设法把一个戈比变成两个戈比，而是去制定开支数十亿乃至数万亿苏维埃卢布的计划。对这种坏现象，我们必须进行斗争。考查人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全在于此，仅在于此。这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也不是一年的事情，而是好几年的事情。我们必须用党的名义正式指出，现在工作的关键是什么，并相应地改组队伍。那时在这个新的领域中，我们就会成为胜利者，正像受到农民群众拥护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政权过去在一切工作领域中都一直是胜利者一样。（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2—15页

(1) 列宁的这篇讲话分析了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从政治的高度，要求党员充分理解和认识党的政策转变的必要性。在节选的部分，列宁阐述了在俄共（布）和苏维埃机关内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尖锐地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来清除这种敌人。所有非党的工农群众都会跟着共产党的先进队伍反对这种敌人。

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三封信

（1922年3月9日、24日和26日）

1

致莫洛托夫同志

我不反对。

由于提到的文件没有引用，许多地方看不清楚。依我看，介绍工人入党的要有三年党龄，介绍农民和红军战士的要有四年，介绍其他人的是五年。

预备期（“入党者”？）的概念要规定得准确一些。

细节委托中央委员会制定。

列宁

3月9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6页

2

致莫洛托夫同志

（3月24日）

电话口授

请把我的以下建议提交中央全会：

我认为，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是极端重要的。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规定工人入党的预备期为半年，其他人为一年。我建议，只有在大工业企业实际做工不下十年的工人，预备期方得为半年。其他工人规定为一年半，农民和红军士兵规定为两年，其他各种人为三年。特殊的例外，须经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批准。

我认为，不改变季诺维也夫所提出的短预备期是极端危险的。毫无疑问，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即大工业锻炼的人都算做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

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一切聪明的白卫分子都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在我们普遍存在工作马虎、杂乱无章的情况下，规定这样短的预备期，事实上就等于对预备党员不作任何认真的考查，无从知道他们是否真是经过一些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们党现在有30—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因为所有材料都表明现在的一些党员的修养水平很差。所以我极力主张必须延长预备期，同时责成组织局拟定一些条例并严格执行，这些条例应能真正使预备期成为极其严肃认真的考验，而不致流于形式。

我认为，代表大会应当特别仔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列 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7—18页

3

致莫洛托夫同志

请在代表大会讨论接收新党员的条件问题之前交全体中央委员一阅。

看了3月25日中央全会关于新党员的预备期问题的决定，我想在代表大会上对这项决定提出异议。但是，我怕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因此，请看一下我的下列意见。

毫无疑问，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我想，谁也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查一下统计材料就能证实这一情况。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俄国工厂工人属于无产阶级成分的，比从前少多了，因为在战争期间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进了工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我们党要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迅速觉醒、投入独立的阶级政治的情况下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其次，必须注意到，参加执政党的引诱力在目前是很大的。只要回顾一下路标转

换派的所有著作就会相信，连一点无产阶级气息都没有的人现在都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成就心向往之了。如果热那亚会议使我们取得新的政治成就，那么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十分敌视整个无产阶级的分子涌进党里来的势头就会更猛烈。工人的半年预备期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这种势头，因为用伪装的办法混过这样短的预备期是再容易不过了，况且在我们这种条件下，很多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队伍，简直没有任何困难。综上所述，我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必须大大延长预备期（白卫分子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成分，我觉得这一点更可以证实这个结论），如果工人的预备期仍为半年，那么为了不自欺欺人，绝对必须确定“工人”这个概念，使这个概念只适用于那些确实由于自己的生活状况而必然具有无产阶级心理的人。如果不是在工厂一心一意呆上许多年，就不可能养成这种心理，它是由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陶冶出来的。

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

因此必须：（1）延长各种预备期；（2）特别详细地规定，应当怎样使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应当有哪些具体的切实的考查条件来保证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而不致流于形式；（3）在处理接收新党员问题的机关中必须规定一个法定的多数；（4）接收新党员不仅必须受省委决定的制约，而且必须受监察委员会决定的制约；（5）还应制定一些办法，使党易于除去那些根本够不上十分自觉地贯彻无产阶级政策的共产主义者的党员。我并不是建议再进行一次大清党，因为我认为这在目前是不切实际的，但必须找出一些在事实上进行清党的办法，即减少党员数量的办法，只要对此动动脑筋，我相信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的。

如有可能，请看过这封信的中央委员给我一个答复，即使打电话简略地告诉人民委员会的一位女秘书也好。

列 宁

1922年3月26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8—20页

(1) 列宁在这三封信中针对俄共（布）党员的现状指出，要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党员，就必须接受极其严格的考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为此，他建议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并拟定具体的考察条例，以保证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而不致流于形式；同时，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党组织能将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党员及时清除出去。

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3月18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

莫斯科委员会(包括捷连斯基同志)事实上包庇应该绞死的犯罪的共产党员,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这样做说起来是由于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的危险性极大。

我建议:

1. 采纳季维尔科夫斯基同志的建议。
2. 宣布给包庇共产党员(包庇的方式是成立特别委员会)的莫斯科委员会以严重警告处分。
3. 向各省委重申,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
4. 通告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

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销职务。

5. 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报上对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狠狠训斥一下。

列 宁

3月18日

附言:执政党竟庇护“自己的”坏蛋!!真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53—54页

(1) 这封信体现了列宁从严治党的观点。他要求法庭对于犯罪的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要求将那些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犯罪的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一律开除出党;要求对那些对包庇行为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处分。

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 央全会的信

1922年3月23日

莫洛托夫同志：

请您转告中央全会：

1. 我向全会请病假（我不能出席全会会议，也不能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2. 如果需要我出席全会说明下列报告提纲，那我一定出席，并在接到通知后两小时内到会。

3. 我设想的中央在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如下：

基本上重复1922年3月6日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²⁾内容，有几点要加以发挥。稍微谈谈热那亚。较详细地谈谈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

暂停退却（经济上的）和重新部署力量的任务。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警告，他们通过路标转换派乌斯特里亚洛夫之口说，新经济政策不是“策略”，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

我们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是文化，是管理的本领。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

谈谈我国革命已经取得的不可剥夺的成就和尚未完成任务。

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财政危机的危险。利用“喘息时机”，把工作重心集中在挑选人才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上。

着手执行的任务之巨大同物质、文化之贫乏这两者极不协调。

报告中还要谈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200两位副主席的作用、1922年1月底以来我同亚·德·瞿鲁巴谈这个问题的通信、我们三

人（加上李可夫）现正在拟订的能深入检查执行情况的新的工作安排的条例^[3]。

使人民委员会摆脱琐碎事务；更明确地划分它同劳动国防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的职责。吸收领导同志即人民委员参加人民委员会，而不是仅仅有他们的副手参加，以提高它的威信。

因此并根据加里宁同志的屡次口头声明以及随信附上的叶努基泽同志的书面报告，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请代表大会批准上述提纲，同意召开会期较长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来研究立法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并经常地监督各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最后，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

草拟相应的决议案，提交党代表大会批准。

4. 请中央全会指定一名中央的补充报告人：因为我的报告太一般，而且我能否作报告，自己还没有绝对的把握，更主要的是我脱离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已有好几个月了。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 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2—64页

（1）这封信体现了列宁关于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思想。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缺少文化知识和管理的本领。为此，他号召全党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增强管理才干。同时，他要求明确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进行过分频繁的、琐碎的干预。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5页。——编者注

^[3]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47—155页。——编者注

重要论述摘编

我们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革命阶级的运动，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我们应当记住，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要不断创造新形式，抛弃旧形式，改变形式或者把新旧形式重新配合。我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参加制定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的过程。

《革命冒险主义》（1902年8月1日和9月1日〔8月14日和9月1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73页

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这些目的可能被每天的日常工作暂时遮盖起来，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失掉作为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的意义。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3月23日和30日〔4月5日和1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页

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始终先进阶级的政党，这个阶级决不会向群众提出任何一个暧昧不明的口号，它决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件肮脏勾当，它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斗争的结局如何，都能捍卫革命的利益。

《上面的动摇和下面的坚定》（1906年6月8日〔2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10页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4页

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1月中旬），《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88页

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像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55页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

《我们的纲领》（不早于1899年10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0页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

《我们的纲领》（不早于1899年10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1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清楚地划分开。最高纲领就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不可能不消灭商品生产。最低纲领就是在商品生产范围内可以实行的改造。把这两种改造混淆起来，必然会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造成种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必然会使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的社会革命的任务模糊起来。

《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1906年9月19日〔10月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2页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5页

我们必须从大家公认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即纲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纲领应该向群众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意义、实质和力量在哪里，它应当解决什么问题。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62页

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往往不仅靠原则性的论战来解决，而且也会随着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得到解决，甚至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与其说是靠前者解决，不如说是靠后者解决。特别是有关党的策略即党的政治行动的意见分歧，结果往往是持错误意见的人在生活教训的影响下和在事变进程本身的压力下实际转上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因为事变进程本身常常迫使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并把错误意见完全抛在一旁，使它们失去基础，变成毫无内容、枯燥无味、谁也不感兴趣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说，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不具有重大意义，不需要进行唯一能使党保持高度理论信念的原则性的解释。不是的，这只是说，必须尽可能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以前通过的策略决议。这种检验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必要的——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通过事实、通过经验来证实已经通过的决议是否正确和正确的程度如何，决议通过以后发生的政治事变要求我们对决议作哪些修改；从实践上来说，是为了真正学会贯彻这些决议，学会把它们看做应立即直接运用到实际中去的指示。

《革命教导着人们》（1905年7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26页

决议的起草人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党内的批评自由同党的行动一致的相互关系。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妨回忆一下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1906年5月20日〔6月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29页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任何活动，只有它们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后退，是从思想上团结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没有思想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会把工人变成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可怜仆从。因此，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因此，觉悟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对原则的严重违反必定会使一切组织关系遭到破坏。

《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121—122页

我国革命的教训就是：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1909年1月7日〔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5页

一个能够通过联系群众而得到巩固以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的党，一个能够组织本阶级先锋队的先进阶级的党，一个努力以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影响无产阶级每一个现实表现的先进阶级的党，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走上大路》（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39页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年6—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82页

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7—8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25页

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72页

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必须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设。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3页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09页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俄国工人阶级已经表明它能够推举出这样的人物，最近五六年来俄国工人所广泛开展的斗争，表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初），《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6页

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德国工人党甚至纠正过像倍倍尔这样伟大的领袖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12年7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35页

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1921年8月1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00页

我们要再一次重申我们认为实行合并所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组织原则：（1）少数服从多数（不要同带引号的少数和多数混淆起来！这里说的是党的一般组织原则，而不是“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合并，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抽象地说，可以设想合并将采取“少数派”和“多数派”处于均势的形式，但是如果不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义务，那么这种合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2）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即一切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表作出的决定应当是最后的决定（这是民主代表制度的原则，它同协商会议的原则和把会议决定交付各组织表决即举行“全民投票”的原则是相反的）。（3）党的中央机关（或党的各个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不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选举、二级选举等等都是不许可的。（4）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5）对党员资格的概念必须作出极其明确的规定。（6）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

我们认为，这就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组织原则，不承认这些原则，合并就不可能实现。

《〈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1905年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54—155页

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

《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1906年4月25—26日〔5月8—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62页

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要进行顽强的努力来建立一个包括全体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1906年5月上半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59页

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它也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

《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1906年5月20日〔6月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29页

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

《让工人来决定》（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91—192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

《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907年1月13—14日〔26—2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49页

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但是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管理制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任何把实行集体管理的机关变为清谈馆的现象，都是极大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

实行集体管理，无论在委员会人数方面或处理的工作范围方面，都不应超过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禁止“长篇大论”，要最迅速地交换意见，通过交换意见互通情况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只要有一点可能，集体管理就应限于在最小范围的委员会内仅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最简短的讨论，至于对机关、企业、工作和任务的实际安排，则应委托一位以坚决果断、大胆泼辣、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著称，又深孚众望的同志负责。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都必须极严格地一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威胁着一切没有很多集体管理工作经验的人，而在军事上往往导致无法避免的灾难、混乱、惊慌失措、权力分散和失败。

《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4日和7日之间），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41—42页

党本身必须对它的负责人员执行党章的情况进行监督，而“监督”也不单单是在口头上加以责备，而是要在行动上加以纠正。谁不善于要求和争取使自己的受托者完成他们对委托人所负的责任，谁就不配享有政治上自由的公民的称号。谁不善于要求和争取使自己的受托者完成他们对委托人所负的党的责任，谁就不配享有党员的称号。

《无休的托词》（1905年2月24日〔3月9日〕以后），《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92页

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2月2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300页

泛泛之谈。空话连篇。大家听厌了的愿望。这就是当今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

最好去掉这些东西，拿出实际经验的材料，即使是一个县一个乡的也好，不是学院式地、而是实际地加以研究，让可爱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者来学习学习，哪些不应该做（具体地，有例子，有地名，有确切事实），哪些应该做（也要同样具体）。

《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3月1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45页

宁可十个办实事的人不自称为党员（真正办实事的人是不追求头衔的！），也不让一个说空话的人有权利和机会当党员。这样一条原则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它迫使我同马尔托夫作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03年7—8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所以我反对马尔托夫的条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03年7—8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页

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抱着庸俗心理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则全体怠工，以此讨好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早已开始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继续这一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我们——胆小鬼和坏蛋逃到党外去了。

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创举继续清党：非经半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考验”或“见习期”，不得接收入党。1917年10月25日以后入党的一切党员，如果没有特殊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忠诚可靠，能够做一个共产党人，都需要经过这样的审查。

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早日彻底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

《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4页

全党必须系统地、逐步地和坚定不移地为中央机关培养称职的人，对每个准备担任这种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1903年11月25日〔12月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88页

我们知道，应该深入下层，大胆起用新人。他们还没有经过训练，难免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我们知道，这会给我们造就出年青的工作干部，使我们得到百倍的报偿，使我们得到大批年青的新生力量。我们补充力量没有别的来源。我们只能前进，大胆起用年青工人，把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放到重要岗位上去，而且不断提拔他们。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1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17页

我们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还是工会，如果不能做到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

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同共产主义完全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74页

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再庸俗不过的是沾沾自喜的乐观主义。

《谈谈政治同教育的混淆》（1905年6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34页

每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都有缺点，但是在批评缺点或向党的各个中央机构分析这些缺点时，应当慎重、注意分寸，否则就成为搬弄是非。

《致潘·尼·勒柏辛斯基》（1905年8月2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78页

工人政党应当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全体无产阶级群众树立起富有思想性的、坚毅的、大胆的批判的范例。

《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是怎样对待杜马选举的？》（1906年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31页

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

《政论家札记》（1917年9月22—24日〔10月5—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57页

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68页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

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7页

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5页

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2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7页

我们的共产党员直到现在还不很善于领会自己在管理方面的真正任务：不是要“亲手”包办“一切”，这样就会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一事无成，而是要去检查几十个几百个助手的工作，对他们的工作组织自下而上的检查，即真正群众的检查；要一面指导工作，一面向那些有知识的人（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人（资本家）学习。

《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30页

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
(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
370页

列宁专题文集

责任编辑：郇中建
装帧统筹：曹 春
编辑助理：崔继新
技术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赵立新 徐林香 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7891-5

I. 列… II. 中… III. 列宁著作—马克思主义 IV. A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688 号

书 名	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 LIENING ZHUANTI WENJI LUN MAKESIZHUYI
编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2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7891-5

ISBN 978-7-01-007891-5



目 录

[卡尔·马克思](#)

[序言](#)

[马克思的学说](#)

[哲学唯物主义](#)

[辩证法](#)

[唯物主义历史观](#)

[阶级斗争](#)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价值](#)

[剩余价值](#)

[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书目](#)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1日〔14日〕）](#)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底）](#)

[一 概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 11月7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

[我们的纲领（为《工人报》写的文章）](#)

[游击战争（节选）（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 5日〔18日〕）](#)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反对抵制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

致伊·费·阿尔曼德（节选）（1916年11月30日）

论策略书（节选）（1917年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

第一封信 对形势的估计

国家与革命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

1. 革命的前夜

2. 革命的总结

3. 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1. 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3. 取消议会制

4. 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5. 消灭寄生物——国家](#)

[第四章 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1. 《住宅问题》](#)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3. 给倍倍尔的信](#)

[4. 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5. 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6. 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2.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

[1. 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3. 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第一版跋](#)

[《共产主义》](#)

[重要论述摘编](#)

[返回总目录](#)

卡尔·马克思

（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 [\[1\]](#)

（1914年11月）

[\[1\]](#)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一文是列宁为当时在俄国颇为驰名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条。列宁于1914年春在加里西亚的波罗宁着手撰写这一词条（1918年单行本的序言中误为写于1913年，见本书第1页），后因忙于党的工作和《真理报》的工作而不得不中途搁笔。直到1914年9月他移居伯尔尼以后，才又重新动笔。整个词条于11月初完稿，11月4日（17日）寄给了编辑部。

1915年出版的《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第7版）第28卷刊载了这一词条，署名为：弗·伊林。在书报检查的条件下，编辑部未刊出原稿中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两节，并对原文作了某些修改。词条附有《马克思主义书目》。1918年，波涛出版社根据《格拉纳特百科词典》的词条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单行本，但没有附《马克思主义书目》。《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全文于1925年第一次按手稿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出版的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文集中。——1。

序言

现在用单行本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我在1913年（根据我的记忆）为格拉纳特词典写的。原来文末附有相当详细的、多半是外文的、论述马克思的书目。这个书目没有编进本版。其次，词典编辑部考虑到书报检查，又把本文结尾阐述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部分删去了。可惜在这里我无法把结尾部分再加进去，因为原稿留在克拉科夫或瑞士我的某些文稿中。我只记得，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还引用了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句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²⁾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尼·列宁

1918年5月14日于莫斯科

[illegible]

马克思，卡尔 1818年公历5月5日生于特里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年加入新教。这个家庭是富裕的，有教养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波恩和柏林的大学攻读法学，但他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交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左派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圈子，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教授职务，1836年又拒绝让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年又剥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资格，这样就迫使马克思放弃了当学者的前程。当时左派黑格尔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是从1836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1841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他的另一著作《未来哲学原理》于1843年问世。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这些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我们（即左派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3]这时，一些同左派黑格尔派接近的莱茵激进派资产者，在科隆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2]（1842年1月1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隆。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检查，后来，在1843年1月1日决定干脆将其查封。马克思被迫在查封之前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除后面列举的（见书目^[4]）以外，恩格斯还曾提到论摩泽尔河谷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状况一文

[3]。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他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同她订了婚。燕妮出身于一个反动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她的哥哥曾在1850—1858年这个最反动的时期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赴巴黎，此行的目的是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左派黑格尔派，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流亡国外；1866—1870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一起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德法年鉴》杂志[4]只出了第1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5]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到巴黎小住数日，他从这时起便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一起极其热情地投入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的学说当时特别有影响，马克思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尖锐斗争中创立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马克思作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而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5]，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1848年二月革命^[6]爆发时，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并于三月革命^[7]后，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科隆。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8]；马克思任该报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态的发展极好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理论。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驱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到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9]后又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移居伦敦，直到去世。

流亡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1913年出版）^[10]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及其一家饱受贫困的折磨。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无法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此外，当时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和所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迫使马克思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各种穷凶极恶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11]）。马克思竭力避开流亡者的圈子，写了一些历史著作（见书目）来详细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并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1卷）这两部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见后面马克思的学说）。

50年代末和60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12]。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13]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公告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纳入共同行动的轨道，并同所有这些派别和学派的理论进行斗争，从而为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制定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

略。在1871年巴黎公社——马克思对它曾经作过极其深刻、准确、出色而有影响的、革命的分析（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失败之后，在巴枯宁分子^[14]使第一国际分裂之后，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15]以后，马克思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为紧张的理论研究活动，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他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为此大量收集新的资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语），可是疾病使他无法能够写完《资本论》。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妻子去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静静地长眠于他的安乐椅中。他被安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安息在妻子的身边。马克思的子女，有几个由于当时家境十分贫困，在童年时便死于伦敦。三个女儿爱琳娜、劳拉、燕妮，分别嫁给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艾威林、拉法格、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党员。

（1）本文是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词条。文中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伟大一生和他的学说。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列宁扼要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并阐明了这些基本原理、策略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编者注

^[4]见本书第39—50页。——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6页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编者注

^[2] 《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是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怀有反对情绪的莱茵省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日报，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从1842年4月起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任该报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后，该报日益明显地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

质。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政府决定于1843年4月1日封闭《莱茵报》，而在此以前则对它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鉴于该报股东企图使报纸改取温和态度，以取得政府的宽容，马克思于1843年3月17日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

[3] 指马克思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10—243页）。

[4] 《德法年鉴》杂志（《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这一期《德法年鉴》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5]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

[6] 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

[7] 指184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月革命。

[8]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

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

[9] 指1849年6月13日法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的游行示威。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为了取得天主教会对他的支持，公然出兵协助罗马教皇镇压意大利革命。山岳党遂在立法议会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宪，因为1848年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弹劾案被立法议会内的秩序党多数所否决。这次游行示威就是为此而举行的。秩序党内阁下令军队驱散了这次游行示威，并在这以后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

[10] 指191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德文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通信集（1844—1883年）》，共4卷。通信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写的书信1 386封（这方面的书信总共约有1 500封），是他们的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信集还提供了这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大量珍贵的生平资料和反映他们的组织活动和理论创作的丰富材料。列宁深入地研究了这部通信集，摘记了其中300封信的要点，摘抄了15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信，并为一部分摘要编了名目索引。根据列宁笔记编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已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列为第58卷。

[11] 《福格特先生》这部抨击性著作是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尔·福格特写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4卷第397—754页）。

[12]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

[13] 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5—14页）。

[14] 巴枯宁分子是指拥护以米·亚·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人，这种思潮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其特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代表，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他们认为国家是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小生产者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把这些公社联合成自由的联邦（按巴枯宁主义者的说法就是实现“社会清算”）。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工人阶级的一切不直接导致“社会清算”的斗争形式，否认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而主张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秘密革命团体去领导群众骚乱。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巴枯宁主

义在当时经济上落后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中得到传播。在巴枯宁主义影响下，也形成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一个派别。1868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同盟申请加入第一国际遭到拒绝以后，巴枯宁主义者采取对国际总委员会的决定阳奉阴违的办法，表面上宣布解散这个组织，而实际却继续保留，并于1869年3月以国际日内瓦支部的名义把它弄进了国际。巴枯宁主义者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在国际内部进行了大量分裂和破坏活动，力图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把巴枯宁和另一位巴枯宁派首领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19世纪最后25年间，巴枯宁主义者蜕化成了脱离群众的小宗派。

[\[15\]](#) 指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必须把他的整个世界观作一简略的叙述。

哲学唯物主义

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还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就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醺醺的思辨”）……的斗争”（《遗著》中的《神圣家族》）⁽¹⁾。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缔造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²⁾）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述了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Abbilder，意即映象，恩格斯有时还称为“印象”），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³⁾弗·恩格斯在叙

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⁴⁾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即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充其量是“把当众拒绝的唯物主义又羞羞答答地暗中接受过来”⁽⁵⁾。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发表的比通常“更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谈到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但同时又斥责赫胥黎为不可知论、为休谟主义留下了“后路”。⁽⁶⁾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⁷⁾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如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更不要说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了），其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在还应加上物质的电学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

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3）他们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8\)](#)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59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98—99、74—75、64页。
——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和第220页。——编者注

[\(5\)](#)同上书，第222页。——编者注

[\(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213页。——编者注

[\(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页。——编者注

[\(8\)](#)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编者注

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他们认为，任何其他关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可以说唯有马克思和我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¹⁾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²⁾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³⁾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在

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在，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不过，这个观念，按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作的表述，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参看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4\)](#)）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和第62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240、213、239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10页。——编者注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¹⁾。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3\)](#)（参看马克思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 [\(4\)](#)）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6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410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236页。——编者注

阶级斗争

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¹⁾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而当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胜利、设立了代议机构、实行了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有了供群众阅读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已经建立起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同盟等等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

用很片面的、“和平的”、“立宪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²⁾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³⁾。我们上面引证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

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51页。——编者注

⁽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262页。——编者注

⁽³⁾同上书，第260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也就从分析商品入手。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编者注

价值

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亿万次的交换，总是使各种极不相同的互相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趋于彼此相等。这些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总是可以彼此相等的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通过交换产品，使各种极不相同的劳动彼此相等。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不同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一种类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表现在全部商品价值总额中的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亿万次交换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一单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¹⁾一位旧经济学家^[16]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²⁾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个别的偶然的交换行为（“简单的、个别的

或偶然的价值形式”^[3]：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开始，直到一般价值形式，这时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相交换，最后到货币价值形式，这时金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把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遮蔽起来，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在这里（也如同在《资本论》开头的两章中一样）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抽象的、有时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资本论》第1卷）^[4]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90—91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3页。——编者注

^[3]同上书，第62页。——编者注

^[4]同上书，第193页。——编者注

^[16] 指18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斐迪南多·加利阿尼。

剩余价值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O （商品）—— B （货币）—— O （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 B —— O —— B ，这就是说，买是为了卖（带来利润）。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这种增加叫做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相互间的盈亏会抵消，而这里说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¹⁾，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迫使他整天劳动，比如说劳动12个小时。其实工人在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内就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内则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来看，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所增加，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表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应当把它只同可变资本相

比。这种比例，马克思称做剩余价值率，例如，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它是 $6/6$ ，即100%。

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情况下某些人手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第二，存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从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地出卖劳动力来说是自由的，从他们没有土地和任何生产资料来说也是自由的，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第一种方法时，展示了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以及国家政权为延长工作日（14—17世纪）和为缩短工作日（19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壮观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又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的事实。

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基本的典型的特征揭示得多么深刻，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足以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其丰富的材料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而马克思在1867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中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也都显示了出来。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是用它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嗜欲，而是把它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整个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认为剩余价值在转化为资本时全部都用做可变资本。而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

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快，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的“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这种过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使资本有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锁钥，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则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不固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来。原始积累是强迫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侵占公有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

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²⁾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将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I）生产资料的生产和（II）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详细地考察了在以原有规模再生产的情况下和在积累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资本论》第3卷所解决的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科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社会经济的全部总和来分析问题，而不是像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根据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来分析问题。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了剩余价值之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³⁾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会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都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商品的价格总量相符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一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被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全部商品的价值总

量是同价格总量相符的。然而价值（社会的）变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途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途径，因为很自然，在完全靠市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而不同方向的个别的偏离则相互抵消。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而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之比，而不只是与资本的可变部分之比）当然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阻挡或者说抵消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不再转述《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一——地租理论。由于土地面积有限，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又全被各个业主所占有，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就产生等差地租或者说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肥力的差别，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这就完全揭露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从优等地依次向劣等地转移而产生的。实则相反，也有逆向的转移，也有某一类土地转变为别类土地的情况（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那个出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陷、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然界。其次，利润在工业的各个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的完全自由，是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流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土地所有者作为垄断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

上，而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变会打破私有者的垄断，会导致在农业中更彻底更充分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派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接近于“触动”当代另一种特别重要和特别“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马克思在1862年8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3卷第77—81页。并参看1862年8月9日的信，同上，第86—87页。）⁽⁴⁾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化过程所作的分析，即由工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化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剩余产品交给地主），然后转化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即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转化为货币，在旧日罗斯称“代役租”），最后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主所代替。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许多深刻的（对像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不仅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较富裕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就有富裕的农奴自己又拥有农奴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些旧式的、独立经营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产生了培植资本主义租佃者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

第3卷下册第332页) [\(5\)](#)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 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 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 [\(6\)](#) 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 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 “一部分农村人口因此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人口或制造业人口〈即非农业人口〉的队伍。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 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 (《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 [\(7\)](#)。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 是小生产的基础, 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 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 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 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 (《法兰西阶级斗争》) [\(8\)](#)。 “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 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 (《雾月十八日》) [\(9\)](#) 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 即交给资本家阶级, 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 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 [\(10\)](#)。 “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 (《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 [\(11\)](#) 何在呢? 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 这种较低的价格〈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 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 [\(12\)](#)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小块土地所有制, 即小生产的标准形态, 不断衰退、毁灭、消亡。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

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¹³⁾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工业方面一样，完全是以“生产者的殉难历史”⁽¹⁴⁾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¹⁵⁾

⁽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190页。——编者注

⁽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267页。——编者注

⁽³⁾看来是笔误，应是“利润率”。——编者注

⁽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266—270、276—277页。——编者注

⁽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00页。——编者注

⁽⁶⁾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编者注

⁽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704—705页。——编者注

⁽⁸⁾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编者注

⁽⁹⁾同上书，第696页。——编者注

⁽¹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3页。——编者注

⁽¹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09页。——编者注

⁽¹²⁾同上。——编者注

⁽¹³⁾同上书，第910页。——编者注

[\(1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52—553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地向前发展，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个转变的思想上精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上的执行者，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培养的无产阶级。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彻底破坏了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准备新的因素来建立这种联系，使工业同农业在自觉运用科学和合理组织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在重新分布人口（既消除农村的荒僻、与世隔绝和不开化状态，也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里，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资本主义对父权制家庭的瓦解，必然采取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憎的形式。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工人由各种年龄的男女搭配组合而成，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

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¹⁾。工厂制度使我们看到“未来教育的幼芽……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上）⁽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³⁾，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⁴⁾。这些论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观点）⁽⁵⁾。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

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6]“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7]

最后，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将继续存在的小农的态度问题，必须举出恩格斯表达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阿列克谢耶娃出版的版本第17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杂志^[17]。）^[8]



1929—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卡尔·马克思》的部分中译本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36—537页。——编者注

[\[2\]](#) 同上书，第530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编者注

[\[4\]](#) 同上。——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编者注

[\[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编者注

[\[8\]](#) 《西方土地问题》即《法德农民问题》，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编者注

[\[17\]](#)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早在1844—1845年，马克思就判明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未能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正确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后来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还远远没有收齐，没有汇集在一起，没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个最一般最简短的评介，着重说明，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这就是说，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做是静态的，而应当看做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做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做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而对运动，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像“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¹⁾。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

困》中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共同的反抗思想（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²⁾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在这方面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他们用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说明，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36页）⁽³⁾、使无产阶级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起了败坏无产阶级的作用”（第2卷第218页）⁽⁴⁾；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第2卷第290页）⁽⁵⁾；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精力”（第3卷第124页）⁽⁶⁾；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第3卷第127页）⁽⁷⁾；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老宪章派^[18]的热情”（1866年；第3卷第305页）⁽⁸⁾；英国工人领袖怎样在变成“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类型的人（关于侯里欧克，第4卷第209页）⁽⁹⁾；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只要这种垄断地位未被破坏，“不列颠工人也只能是这样”（第4卷第433页）⁽¹⁰⁾。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相联系的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

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¹¹⁾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¹⁹⁾的政党”⁽¹²⁾。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的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¹³⁾。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方面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害怕世界大风暴……毫无毅力，到处剽窃；……没有首创精神……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遗著》第3卷第212页）⁽¹⁴⁾大约过了2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第3卷第224页）⁽¹⁵⁾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以革命为儿戏的做法了（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要求人们善于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准备着新革命的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要求人们以怎样的精神进行这项工作，这可以从他对德国在1856年这一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¹⁶⁾在德国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一直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面。马克思当时所以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第3卷第210页）⁽¹⁷⁾，其原因之一就是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他们将在报刊上共同发表的意见

同马克思交换看法时写道：“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第3卷第217页）^[18]1864—1870年间，当德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斗争的时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对俾斯麦和亲奥派同样地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20]，而不顾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状况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第134、136、147、179、204、210、215、418、437、440—441页）^[19]。在国际1870年9月9日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中，马克思曾事先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20]；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呼“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21]。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行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危害，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小，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士气沮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21]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一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为对付非常法而转向不合法斗争的决心（《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397、404、418、422、424页^[22]，并参看给左尔格的信）。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编者注

-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201页。——编者注
- [\[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225页。——编者注
- [\[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8页。——编者注
- [\[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334页。——编者注
- [\[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编者注
- [\[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199页。——编者注
-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376页。——编者注
-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19页。——编者注
-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页。——编者注
- [\[12\]](#) 同上书，第285页。——编者注
- [\[1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2页。——编者注
- [\[14\]](#) 同上书，第323页。——编者注
-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69页。——编者注
-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页。——编者注
-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48页。——编者注
- [\[18\]](#) 同上书，第58页。——编者注
-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351、353、370、419页和第31卷第40、48、55、376、408、418页。——编者注
- [\[2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285—294页。——编者注
- [\[2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第207页。——编者注
- [\[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54—55、64—65、89—90、101—102、105页。——编者注

[\[18\]](#) 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

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19] 克拉科夫起义是指1846年2月在波兰克拉科夫爆发的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的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波兰民主协会为首的各民族解放组织所策划的全波起义的一部分。起义者于1846年2月20日占领了克拉科夫市，2月22日成立了波兰共和国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俄、普、奥三个占领国，宣布废除封建义务，并许诺土地归农民所有而不用交纳赎金。这次起义在沙皇俄国和奥地利的联合打击下很快遭到失败，克拉科夫于3月3日失陷。马克思在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537页）

[20] 容克是德文Junker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1/3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

[21]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 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 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

书目

马克思的著作和书信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收齐出版。马克思著作已经译成俄文的，比译成其他任何文字的都多。下面把这些著作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1841年，马克思写了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去世后编入《遗著》。关于《遗著》，下面还要谈到）。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科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评论，以及维护政教分离的文章^[22]等等（部分编入《遗著》）。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4年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马克思的特别出色的文章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除编入《遗著》外，还出版了单行本）和《论犹太人问题》（除编入《遗著》外，还有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编为《廉价丛书》第210辑）。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出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除编入《遗著》外，俄文出了两种单行本：1906年圣彼得堡新声出版社版和1907年圣彼得堡知识公报出版社版）。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作为弗·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附录发表；有俄译本）。1845—1847年马克思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以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23]（1845—1848年在比勒菲尔德出版）、《社会明镜》杂志（1846年在爱北斐特出版）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大部分还没有收集起来，没有重新出版，也没有译成俄文）。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基本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俄译本有新世界出版社的3个版本，以及格·李沃维奇、阿列克谢耶娃、启蒙出版社的

版本，均出版于1905—1906年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有俄译本），后来在伦敦又和弗·恩格斯合作出版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它被译成欧洲几乎一切国家的文字及世界上其他一部分国家的文字（俄译本共有大约8种版本，在1905—1906年出版，其中包括铁锤出版社、钟声出版社和阿列克谢耶娃等的版本。大部分被没收。曾用过《共产主义宣言》、《论共产主义》、《社会各阶级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历史哲学》等各种名称；该书及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完整的和最确切的译本，大部分见“劳动解放社”^[24]在国外出版的版本）。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马克思是该报事实上的主编。马克思在这个到现在还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没有收集起来，也没有全部重新出版。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已编入《遗著》。马克思在该报发表的一组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的文章曾多次出版单行本（俄译本有1905—1906年出版的科兹曼、铁锤出版社、米雅科夫和李沃维奇的4种版本）。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些以《执政的自由派》为题出版了单行本（1906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编为《廉价丛书》第272辑）。1849年马克思在科隆出版了《两个政治审判案》（这是马克思的两篇辩护词，他被控在报刊发表的文章中违法和号召武装反抗政府，后来陪审法庭宣告马克思无罪；俄译本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铁锤出版社、米雅科夫、知识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的共5种版本）。1850年马克思在汉堡出版了6期《新莱茵报》杂志，在其中发表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已编入《遗著》。马克思的几篇特别出色的文章后来由恩格斯在1895年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出版，其标题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俄译本有玛·马蕾赫出版的《丛书》第59—60辑合订本；也编入1906年圣彼得堡斯基尔蒙特出版的、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文集《历史著作集》，以及191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关于20世纪生活的思想和观点》）。1852年在纽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俄译文收入上述的文集）。同年在伦敦出版了《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真相》（俄译本有1906年10月28日圣彼得堡出版的《大众科学丛书》第43辑《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1851年8月至1862年^[1]马克思是纽约《论坛报》（^[25]《The New York Tribune》）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许多都没有署名，而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其中特别出色的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26]，这些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译成德文重新出版（俄译文收入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翻译的两个文集，后来又有1905—1906年阿列克谢耶娃的以及公益、新世界、普及丛书和铁锤等出版社出版的共5种单行本）。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有些文章后来曾在伦敦出版过单行本，如1856年出版的论帕麦斯顿的小册子、《18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自由党^[27]大臣们为一己的私利而经常依附俄国）等等。马克思去世后，他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出版了他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东方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标题为《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1897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一部分已译成俄文，收入《战争与革命》一书，其第1编为《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文章（1852年、1853年、1854年）》1919年哈尔科夫版（《我们的思想》丛书）。1854年年底和1855年期间，马克思是《新奥得报》的撰稿人，1861—1862年又为维也纳《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也像他的许多书信一样，还没有收集起来，只有一部分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马克思在《人民报》（1859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有关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一些文章，情况也是这样。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俄译本有1896年莫斯科出版的、由曼努伊洛夫校订的和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鲁勉采夫翻译的两种）。1860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Herr Vogt》）。

1864年在伦敦出版了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有俄译本）。马克思为国际总委员会起草了许多宣言、公告和决议。所

有这些材料还远未加以分析研究，甚至还没有收集起来。首先做这项工作的是古·耶克，他写了《国际》一书（有1906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俄译本），书中也刊载了马克思的几封信和由他起草的几项决定草案。马克思为国际写的文件有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于1871年在伦敦出版单行本，题为《法兰西内战》（俄译本有经列宁校订的、铁锤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和其他出版社的版本）。1862—1874年期间马克思和国际会员库格曼有书信往来（通信集俄译本有两种版本，一种由亚·哥伊赫巴尔格翻译，另一种经列宁校订）。1867年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在汉堡问世。第2卷和第3卷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俄译本第1卷共有5种版本（有1872年和1898年出版的、丹尼尔逊翻译的两个版本，有由C. 古尔维奇和I. 扎克翻译、经司徒卢威校订的1899年第1版和1905年第2版两个版本，还有一种由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校订的版本）。第2卷和第3卷有丹尼尔逊的译本（较差）及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校订的译本（较好）。1876年马克思参加恩格斯《反杜林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一书的写作，看过全书的手稿并写了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整个一章。

马克思去世后，出版了他的下列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俄译本于190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德文原文刊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8期）。《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6月26日作的报告，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1897—1898年）；俄译本有1906年铁锤出版社和1905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的版本）。《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斐·拉萨尔的遗著》，共3卷，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俄译本有经阿克雪里罗得等人校订的两卷，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还有C. 古尔维奇校订的第1卷，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拉萨尔致马克思的信曾单独出版，后编入《遗著》）。《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等致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有两种版本：一种由阿克雪里罗得校订，另一种由列宁作序，由达乌盖出版社出版）。《剩余价值理论》，共3

卷4册，1905—1910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即考茨基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手稿（俄译本只有第1卷，有3种版本：1906年圣彼得堡版，普列汉诺夫校订；1906年基辅版，热列兹诺夫校订；1907年基辅版，图恰普斯基校订）。191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四大卷《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收有1844年9月至1883年1月10日期间的1 386封信，这些信为研究卡·马克思的传记和观点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材料。1917年出版了两卷《马克思恩格斯1852—1862年论文集》（德文本）。最后，对于这份马克思著作目录，还必须附带说明一点：这里没有编入大部分是在《新时代》杂志、《前进报》^[28]及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德文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比较短小的文章和书信；这里所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俄译本目录，特别是1905—1906年出版的一些小册子的目录，肯定也是不完全的。

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这里我们只能择其要者作一介绍。我们把作者分成三大类：在根本上持马克思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质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作家；似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民粹派对马克思的态度，应看做修正主义的一种特殊的俄国变种。威·桑巴特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书目》（《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文库》第20年卷（1905年）第2册第413—430页）中开列了300本书，那还是很不全的。作为它的补充，可参看1883—1907年及往后几年的《新时代》杂志上的索引。此外，可以参看约瑟夫·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耶拿版第1—3卷。要得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详细书目，还可以参看《社会科学书目》柏林版第1年卷（1905年）及以后各年卷。也可以参看尼·亚·鲁巴金的《书林概述》（第2版第2卷）。我们在这里举出的只是最重要的。有关马克思的传记，首先应当指出弗·恩格斯在《人民历书》（1878年由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和《政治学词典》（第6卷第600—603页）上写的条目。此外还有：威·李卜克内西的《纪念卡尔

·马克思》1896年纽伦堡版。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德文版）。威·李卜克内西的《卡尔·马克思》（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第2版）。保·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1905年敖德萨俄文版，原文见《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卡·马克思纪念集》（1908年圣彼得堡版，共410页，文集所收的文章的作者为：尤·涅夫佐罗夫、尼·罗日柯夫、弗·巴扎罗夫、尤·斯切克洛夫、亚·芬一叶诺塔耶夫斯基、彼·鲁勉采夫、卡·伦纳、罕·罗兰—霍尔斯特、弗·伊林、罗·卢森堡、格·季诺维也夫、尤·加米涅夫、普·奥尔洛夫斯基和米·塔甘斯基）。弗·梅林的《卡尔·马克思》。美国社会党人斯帕戈用英文编写的大本马克思传记（斯帕戈《卡·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1911年伦敦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关于马克思事业的概述，见卡·考茨基的《卡·马克思的历史功绩。纪念大师逝世二十五周年》（1908年柏林版）。俄译本：《卡·马克思和他的历史作用》（1908年圣彼得堡版）。还可参看克拉拉·蔡特金的通俗小册子《卡·马·及其毕生事业》（1913年）。回忆马克思的文章有：安年科夫在1880年《欧洲通报》杂志^[29]第4期发表的文章（及其《回忆录》第3卷，188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光辉的十年》），卡尔·舒尔茨在1906年《俄国财富》杂志^[30]第12期、马·柯瓦列夫斯基在1909年《欧洲通报》杂志第6期及以后几期上发表的文章。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下列著作作了最好的论述：《二十年来》（1909年圣彼得堡第3版）、《由防御到进攻》（1910年圣彼得堡版）、《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1906年圣彼得堡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908年圣彼得堡版）等等。还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1898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1906年圣彼得堡版）。弗·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1906年圣彼得堡版，有启蒙出版社和铁锤出版社出版的两种版本）和他的《莱辛传奇》

（1908年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版）。还可参看沙·安德列尔（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宣言。历史、序言和注释》（1906年圣彼得堡版）。也可以参看《历史唯物主义》（1908年圣彼得堡版，收入恩格斯、考茨基、拉法格等许多人的文章的论文集）。柳·阿克雪里罗得的《哲学概论。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批评家》（1906年圣彼得堡版）。专门为狄慈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尝试辩护的有恩·温特尔曼的《狭隘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1910年慕尼黑版，共753页，是一部篇幅很大但不严肃的著作）。胡戈·里克斯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源》，载于《一般政治学杂志》第62年卷（1906年）第3册第407—432页，这是一个反对马克思观点的人的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他表明了这些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的哲学严整性。本诺·埃尔德曼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前提》，载于《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31]（施穆勒年鉴）1907年第3册第1—56页，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很有用的表述，并综述了从流行的康德主义以及整个不可知论观点出发的各种反对意见。鲁·施塔姆勒（康德主义者）的《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看经济和法》（1906年莱比锡第2版）。伏尔特曼（也是康德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俄译本，1901年出版）。福伦德（也是康德主义者）的《康德和马克思》（1909年圣彼得堡版）。还可参看亚·波格丹诺夫、弗·巴扎罗夫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1908年圣彼得堡版。亚·波格丹诺夫的《伟大拜物教的没落》1909年莫斯科版以及其他著作）同弗·伊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莫斯科版）之间的论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伦理学问题的著作有：卡·考茨基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圣彼得堡版）和考茨基的其他许多著作。再参看布丁的《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190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路·布丁《以现代批评眼光看卡·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译自英文，维·查苏利奇校订，1908年圣彼得堡版）。赫尔曼·哥尔特的《历史唯物主义》（1909年版）。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的著述有：杜冈—巴拉诺夫

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907年圣彼得堡版）。谢·普罗柯波维奇的《马克思批判》（1901年圣彼得堡版）。哈马赫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体系》（1910年莱比锡版，共730页，是引文的汇编）。威·桑巴特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圣彼得堡版）。麦克斯·阿德勒（康德主义者）的《因果性和目的论》（收入1909年维也纳出版的《马克思研究》）和《思想家马克思》。

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者卓·詹梯利的《马克思的哲学》（1899年比萨版）是值得注意的一本书。作者指出了通常被康德主义者和实证论者^[32]等等所忽视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几个主要方面。莱维的《费尔巴哈》也值得注意，此书论述了马克思的最主要的哲学先辈之一。切尔内绍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备忘手册》（1908年圣彼得堡事业出版社版），是把马克思许多著作中的话摘编在一起的一部有益的书。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问题，见卡·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许多俄译本）和他的《土地问题》、《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和许多小册子。还可参看伯恩施坦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论〉第3卷》（俄译本，1905年出版）。加布里埃尔·杰维尔的《资本论》（《资本论》第1卷的阐述，俄译本，190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者中在土地问题上的所谓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爱·大卫，他写了《社会主义和农业》（俄译本，1902年圣彼得堡出版）。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见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以及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08年圣彼得堡第2版）、《经济评论集》^[33]（1899年圣彼得堡版）、《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1917年第1编）。孔佩尔—莫雷尔的《法兰西的土地问题和社会主义》（1912年巴黎版，共455页），是运用马克思的观点（某些地方有所背离）来分析法国土地关系的最新材料。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将它运用于经济生活中的最新现象的书，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1年圣彼得堡版；纠正该作者在价值理论上根本错误观点的文章，见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黄金、纸币和

商品》（《Gold, Papier und Ware》）第30年卷（1912年）第1册第837、886页）、弗·伊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彼·马斯洛夫的《土地问题》（两卷本）及《国民经济发展理论》（1910年圣彼得堡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其中某些错误的批判，见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第29年卷（1911年）第1册上的文章《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资产阶级教授中间广泛流行的“边际效用”论的观点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有：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柏林版，载于《政治学著作》，敬献给卡·克尼斯）（俄译本：《马克思的理论及对它的批判》1897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资本和利润》（1900—1902年因斯布鲁克第2版，两卷本）（《资本和利润》1909年圣彼得堡版）。并见里克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1899年）；冯·博尔特克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核算和价格核算》（1906—1907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文库》）；莱奥·冯·布赫的《政治经济学基本要素。第1集。劳动强度、价值和价格》（也有俄译本）。以马克思的观点分析柏姆—巴维克的批评的有：希法亭的《柏姆—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研究》，1904年维也纳版第1卷）及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

关于在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两大派别——“修正派”和激进派（“正统派”）的问题，见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德文原本189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有1901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1901年莫斯科出版的《社会问题》），并参看他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概述》（1902年圣彼得堡版）。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有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德文原本1899年斯图加特版；俄译本有1905—1906年出版的4种版本）。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茹尔·盖得的《阶级斗争的四年》、《警惕！》、《昨天和今天的问题》（1911年巴黎版）；

保·拉法格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巴黎版）。安·潘涅库克的《工人运动中的两种趋向》。

阐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问题的新著作有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1913年柏林版）。对该书中曲解马克思理论的部分进行分析的著作有：奥托·鲍威尔的《资本的积累》（《新时代》杂志第31年卷（1913年）第1册第831页和第862页）。埃克施泰因在《前进报》（1913年）上发表的和潘涅库克在《不来梅市民报》^[34]（1913年）上发表的文章。

俄国较早评述马克思的著作有：波·契切林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载于188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别佐布拉佐夫的《国务知识汇编》）及《政治学说史》（1902年莫斯科版第5册第156页）。季别尔的《契切林先生透过有色眼镜所看到的德国经济学家》（载于《季别尔文集》1900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该书是对上述的契切林著作的反驳。路·斯洛尼姆斯基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98年圣彼得堡版）。尼·季别尔的《大卫·李嘉图和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和《季别尔文集》两卷集（1900年圣彼得堡版）。还有伊·考夫曼（伊·考一曼）的一篇对《资本论》的评论文章（载于1872年《欧洲通报》杂志第5号），这篇文章颇为有名，因为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用了伊·考一曼的话，认为这篇文章正确地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

俄国民粹派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尼·康·米海洛夫斯基针对彼·司徒卢威《评述》一书（载于1894年圣彼得堡版）所发表的文章（载于《俄国财富》杂志1894年第10期和1895年第1期和第2期，后收入他的《文集》），对这本《评述》，克·士林（即弗·伊林）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35]（1895年圣彼得堡版，已被书报检查机关销毁）中曾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过分析，该文收入弗·伊林的《十二年来》^[36]（1908年圣彼得堡版）。其次，民粹派的著作还有：瓦·沃·的《我们的方针》（1892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

《从70年代到1900年》（1907年圣彼得堡版）。尼古拉一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1893年圣彼得堡版）。维·切尔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和土地问题》（1906年圣彼得堡版）和他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

除民粹派的著作外，还有：尼·卡列耶夫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旧评论文集》（1896年圣彼得堡版，1913年第2版书名改为《经济唯物主义批判》）。马萨里克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1900年莫斯科版）。柯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02年圣彼得堡版）。

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

以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批评马克思的著作的有：瓦·切尔克佐夫的《马克思主义学说》（1905年圣彼得堡版，共两册）；韦·捷凯尔的《代替一本书》（1907年莫斯科版）。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的《现代经济学的社会研究》（1908年莫斯科版）。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47—95页

[1] 恩格斯在《政治学词典》第6卷第603页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伯恩施坦在1911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关于马克思的条目中，都把年代误为1853—1860年。见1913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

[22] 根据现有资料判断，这篇文章未能通过书报检查，手稿也未保存下来，其内容可参看马克思1842年7月9日给阿·卢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28—431页）。——39。

[23] 《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刊物（月刊），由奥托·吕宁编辑。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勒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博恩出版。——40。

[24]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

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40、83。

[25] 指《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The 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勒斯·格里利创办，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给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利用当时这个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马克思不再为该报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41。

[26] 这一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马克思。此处是沿用旧说。——41。

[27] 英国自由党是一个反映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代替辉格党的位置而与保守党相对立。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由党多次执政，在英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16—1922年，自由党领袖戴·劳合—乔治领导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政府。20世纪初，在工党成立后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自由党力图保持它对工人的影响，推行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政策，但也不惜公然动用军队来对付罢工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党的势力急剧衰落，它在英国两党制中的地位为工党所取代。——41、124。

[28]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

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44。

[29] 《欧洲通报》杂志（《Европей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45。

[30] 《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历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著名成员的政论家。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45。

[31] 《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即《施穆勒年鉴》（《Schmollers Jahrbuch》），是德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871年创刊，1877年起由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弗·霍尔岑多尔夫和路·布伦坦诺出版，1881年起由古·施穆勒出版。——46。

[32] 实证论者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哲学流派，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反动。实证论者自命为“科学的哲学家”，只承认“实证的”、“确实的”事实，实际是只承认主观经验，认为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实证论的创始人奥·孔德把实证论等同于科学的思维，而科学思维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描述和简化经验材料的联系。孔德反对神学，但同时又认为必须有“新的宗教”。他把所有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和可知性的理论都宣布为“形而上学”，企图证明实证论既“高于”唯物主义也“高于”唯心主义。实证论在英国传播甚广，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斯·穆勒和赫·斯宾塞。穆勒的著作突出地表现了实证论哲学的经验主义，表现了这一哲学拒绝对现实作哲学的解释。斯宾塞用大量自然科学材料来论证实证论。他认为进化是万物的最高法则，但他形而上学地理解进化，否认自然和社会中质的飞跃的可能性，认为进化的目标是确立普遍的“力量均衡”。在社会学方面斯宾塞主张“社会有机论”，宣称各个社会集团类似生物机体的不同器官，各自担任严格规定的职能，而为社会的不平等作辩护。在19世纪下半叶，实证论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也相当流行。恩·马赫和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是实证论的进一步发展。马赫主义者同早期实证论者有所不同的是更露骨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唯物主义，主张一种“摆脱了形而上学”（即摆脱了唯物主义）的“纯粹经验”的哲学。

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新实证论是实证论发展的新阶段。新实证论宣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妄命题”，而哲学科学的任务只是对科学语言作“句法的”和“语义的”分析。——47、149。

[33] 《经济评论集》是列宁的第一本文集，1898年10月用弗·伊林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文集包括列宁的以下著作：《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

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我们拒绝什么遗产？》和《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47。

[34] 《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于1890—1919年出版。1916年以前是不来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施加压力，迫使当地党组织改组该报编辑部。同年该报转到了考茨基分子和谢德曼分子手里。——49。

[35] 《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即《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5页中提到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于1895年4月由公开的印刷所印了2 000册。除列宁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外，文集还收入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悲观论是经济现实的反映》、《向我们的论敌进一言（俄国著作界的文明史资料）》，彼·伯·司徒卢威的《致我的批评者》以及其他文章。沙皇政府先是禁止该文集发行，一年后又将其没收焚毁。保存下来的仅有100册，在彼得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秘密传阅。——50。

[36] 《十二年来》是列宁的文集，由彼得堡种子出版社出版。按出版社的计划，该文集应出3卷，但实际上只出了第1卷和第2卷第1分册。

《十二年来》文集第1卷于1907年11月中旬出版（封面上印的是1908年）。这一卷不久即被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出来，并继续秘密流传。第1卷包括下列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预定编入第2卷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鉴于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第2卷改称《土地问题》文集而不再用《十二年来》文集这一书名。第2卷分两册出版，第1分册于1908年初问世，收有《评经济浪漫主义》、《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以及《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第1—11章）。第2分册是列宁刚刚写成而尚未发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一分册未能问世，在印刷厂就被警方没收并销毁了。

第3卷也因当局的查禁未能出版。按计划，编入该卷的将是列宁在《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等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发表过的一批纲领性和论战性文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2\)](#)

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经济制度在造成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目标就应该对准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40年代参加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当时的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父的专横暴戾的斗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脓疮，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姓名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37]中，应该简要地叙述一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

恩格斯1820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時候，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

士专制国家，他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身份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认为同现状、同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同流行罪恶进行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么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剥夺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面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将它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生产力的发展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发展本身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要了解，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的；1842年他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供职。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

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成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⁴⁾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叙述这些思想的著作写得很动人，通篇都是描述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还没有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这么真实。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出版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⁵⁾。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

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38]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⁶⁾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⁵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⁷⁾。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主编在科隆出版的民主派的《新莱茵报》⁸。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斗中为自由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士逃往伦敦。

马克思也迁居伦敦。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40年代服务过的那家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8\]](#)，《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1895年圣彼得堡第3版）[\[9\]](#)，《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1892年日内瓦版）[\[10\]](#)，一篇论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文章[\[41\]](#)（俄译文刊登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42\]](#)第1集和第2集上），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精彩文章[\[43\]](#)，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的俄译本，1894年日内瓦版）[\[44\]](#)。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艰巨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2卷，1894年出版了第3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4卷[\[45\]](#)整理好）。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将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

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¹¹⁾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1848—1849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马克思在1864年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¹²，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

“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就是在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的团结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精神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党人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党人，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党人，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党人，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对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的深刻理论认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在他

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46]，——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1870年的战争^[47]造成了德法之间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负担而松一口气，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12页

(1) 本文为悼念恩格斯而作。列宁概述了恩格斯的光辉一生，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不朽功绩，赞颂了恩格斯作为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所具有的崇高品格以及他同马克思的伟大友谊，指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2]见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纪念杜勃罗留波夫》。——编者注

^[3]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

^[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596—625页。——编者注

^[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86页。——编者注

^[8]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39]。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一小部分译成了俄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40]1892年日内瓦第2版）。

^[9]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75页。——编者注

[10] 同上书，第207—254页。——编者注

[11] 见1884年10月15日恩格斯给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9页）。——编者注

[37] 指《工作者》文集。

《工作者》文集（《Работник》）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由劳动解放社编辑，1896—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读者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列宁是出版这个文集的发起人。1895年5月，他在瑞士同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商谈了出版这个文集的问题。1895年9月回国以后，他又多方设法为这个文集提供物质支援和组织稿件。到1895年12月被捕为止，他除为文集撰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外，还给文集编辑部寄去了别人写的几篇通讯。这个文集一共出了6期（3册）；另外，还出了附刊《〈工作者〉小报》10期。

[38] 指《德法年鉴》杂志。见注4。

[39] 指《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64页。

[40] 这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92年俄文版使用的书名。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

[41] 指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13—57页）。这篇文章是维·伊·查苏利奇以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撰写的，刊载于1890年2月和8月出版的该评论集第1集和第2集。

[42]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43] 指恩格斯1872—1873年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几篇文章后来以《论住宅问题》为标题出了单行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550页）。

[44] 指恩格斯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629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494—510页）。

[45] 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这部著作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

[46] 参看马克思的《协会临时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1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6页和第1卷第244页）。

[47] 指1870年的普法战争。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48]（1913年3月1日〔14日〕）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态发展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学说呢？

马克思首次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2）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3）从这次俄国革命至今。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学说在每个时期的命运。

一

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它们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原理，不能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并且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关于“人民”、“正义”、“权利”等等的词句来掩盖各种民主变革的资产阶级实质。

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各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显露出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巴黎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里枪杀工人，最终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这个阶级的独立行动，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怯懦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转而支持现存秩序，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巴黎公社（1871年）最终结束了资产阶级变革的这一发展过程；只是靠无产阶级的英勇，共和制这种最明显地表现出阶级关系的国家组织形式才得以巩固下来。

在欧洲所有的其他国家，比较错综复杂和不那么彻底的发展过程也导致同样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到第一个时期（1848—1871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¹²（1864—1872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

二

第二个时期（1872—1904年）同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西方进入了为未来变革的时代作“和平”准备的阶段。到处都在形成就其主要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构、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挑选和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的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解释成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的生活状况以便去同雇佣奴隶制作斗争解释成奴隶们为了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讲和平），宣扬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人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同情者”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三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对“社会和平”赞不绝口，还在对实行“民主制”可以避免风暴赞不绝口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人不注意群众斗争进行准备和得以发展的条件，看到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时间地推迟，就陷入绝望和无政府主义。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绝望是多么近视，多么懦弱。

八亿人民的亚洲投入了为实现和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从这个事实中应当得到的不是绝望，而是振奋。

亚洲各国的革命同样向我们揭示了自由派的毫无气节和卑鄙无耻，民主派群众独立行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之间分明的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价的飞涨和托拉斯的压榨已使经济斗争空前尖锐化，这甚至使那些受自由派腐蚀最深的英国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就是在德国这个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容克²⁰国家里，政治危机也在迅速成熟。疯狂的扩充军备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目前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解体和无产阶级的成熟的过程正在持续地进行。

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的这三大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4页

(1) 本文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作。列宁在文中回顾和总结了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在同各种反动势力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广泛传

播和不断发展的历程；指出1848年革命以来世界历史所经历的每一个时期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列宁高度评价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民主革命风暴，并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48\]](#)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发表于1913年3月1日（14日）《真理报》第50号。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49] (1913年3月)

马克思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某种“有害的宗派”。也不能期望有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像期望厂主在应不应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会采取公正态度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不仅如此，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现在我们就来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同一切中世纪废物，同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展开决战

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全力来“驳倒”、败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为宗教辩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知识是相对的。不管那些“重新”回到陈腐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怎样说，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都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²⁾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看到，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二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工人用工作日的一部分来抵偿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报酬地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的胜利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是在农业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优势日益扩大，采用机器愈来愈广泛，农民经济纷纷落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造成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品却被一小撮资本家所占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创造着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最初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的或新的）的经验，使工人中一年比一年多的人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这一学说的正确性。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的胜利的前阶。

三

当农奴制被推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一下子就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谴责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臆想较好的制度，劝富人相信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导致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崩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却日益明显地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整个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战胜农奴主阶级而赢得政治自由，没有一次不遇到拼命的反抗。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

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要粉碎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到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可以（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来说应当）成为能够除旧立新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衡量自己的成绩，他们正在锻炼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不可遏止地成长壮大。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1—48页

(1) 本文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作。列宁在文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科学体系和本质特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完备而严密的科学世界观，而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列宁还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力量，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2\]](#)原文为“ослбсавіе”，是指和一定理论观点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机构。——编者注

[\[49\]](#)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发表于1913年3月《启蒙》杂志第3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50]（1913年底）

早已预告出版的两位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通信集，现在终于问世了。恩格斯曾嘱托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出版这个通信集，而倍倍尔在辞世前不久才结束他负责的那一部分编辑工作。

几个星期前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刊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共4大卷。全书共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至1883年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所写的书信1 386封。

编辑工作，也就是为各个时期的通信写前言的工作，是由爱德·伯恩施坦担任的。这个工作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伯恩施坦既已完成向极端机会主义观点的臭名昭著的“演进”，本来也就不能担任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书信的编辑。伯恩施坦写的前言，一部分空洞无物，一部分简直错误百出，例如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拉萨尔和施韦泽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确切、明白、直接的说明，而只有一些折中主义的语句和攻击，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并不全对”（第3卷第XVIII页），又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问题上与其说同李卜克内西“接近”，不如说同施韦泽更为“接近”（第4卷第X页）。这些攻击除了掩盖和粉饰机会主义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遗憾的是，在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对马克思同他的许多论敌所作的思想斗争持折中主义态度的人愈来愈多了。

从技术方面来看，索引编得不能令人满意，4卷书只有一个索引（例如，考茨基和斯特林的名字均未收入）；对各封书信所加的注解太少，并且不是像左尔格那样，把注解同有关的书信放在一起，而是分散在编辑写的前言里，还有其他一些不足。

这个通信集定价太贵，4卷书将近20卢布。毫无疑问，整个通信集可以而且也不应该印得那么讲究，书价可以便宜一些；此外，为了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可以而且应该把最重要的原则摘要出版。

这个版本存在的这些缺点，对研究这部通信集当然会造成困难。这很可惜，因为这些信件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都非常大。从这些书信中读者清晰地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风貌。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主义的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阐述得非常透彻，一目了然，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谈到他们学说的各个方面，同时对最新（就与先前的观点比较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加以强调和说明，有时又是共同讨论，互相切磋。

读者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到非常生动的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看到其中最重要的时期和最重大的事件。特别有价值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旧大陆各个国家和新大陆所发生的各种各样事件，探讨了有关工人阶级政治任务问题最原则的提法。而这部通信集所包括的时代，正是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离出来的时代，独立工人运动兴起的时代，确定无产阶级策略和政策原则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由于资产阶级的停滞和腐败，由于工人领袖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日常琐事上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各国工人运动深受机会主义之害，对这些现象观察愈深，这部通信集极其丰富的材料的价值就愈大，因为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通信人对无产阶级变革的根本目的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并且从这些革命目的出发异常灵活地规定了相当的策略任务，对机会主义或革命空谈则寸步不让。

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

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准备首先对通信集作一概述，然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最有意思的评论和见解作一个大概的介绍，但绝不奢望对信件的全部内容作详尽的叙述。

(1) 本文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价值，指出全部通信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的最重要的、最新的贡献，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

[50]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是列宁为1913年9月德文版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参看注10）的出版而计划写的一篇长文的开头部分。1913年10月30日或31日（11月12日或13日）列宁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已读完德文版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认为其中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准备为《启蒙》杂志写一篇关于这部通信集的文章（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244号文献）。列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原打算发表在1914年的《启蒙》杂志上，1913年12月14日（27日）《无产阶级真理报》第7号曾就此作过报道，但是这篇文章没有写完。直到1920年11月28日恩格斯诞辰一百周年时，文章才在《真理报》第268号上发表。列宁在文章付排前，给它加了一个副标题：《恩格斯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加了一个脚注，说明这是1913年或1914年初写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的开头。

一 概述

通信集的开头，就是24岁的恩格斯1844年写给马克思的信。德国当时的情况历历在目。头一封信是1844年9月底写的，寄自巴门。恩格斯的家就住在这里，这里也是他的出生地。恩格斯当时还不满24岁。家庭环境使他厌倦，因此他急于要离开。他父亲是个专横的、信教的工厂主，对儿子四处参加政治集会，对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很生气。恩格斯当时写道：我很爱我的母亲，要不是为了她，那我就连离开家前的几天时间也是呆不住的。他向马克思诉说：你想象不到，家里为了反对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¹⁾

当恩格斯还在巴门的时候，——他因为谈恋爱，又在巴门逗留了一些时候，——他对他父亲作了让步，到工厂的办事处里（他父亲是工厂主）工作了约两个星期。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做资产者，而且还要做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恩格斯继续写道：不过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正在写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大家知道，这本书出版于1845年，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外表地位上做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既要广泛地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从事买卖和工业，那就不行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此外，再加上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里的沉闷生活，实在使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留在这里，到头来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²⁾这就是年轻的恩格斯写的。1848年革命后，他为生活所迫，又回到他父亲的办事处去做了多年“做生意的牲口”，然而他却在这种情况下支撑了下来，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不是基督教普鲁士的，而完全是另一种同志式的环境，成了一个毕生毫不留情地反对“把庸人习气带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的人。

1844年德国外省的社会生活，正与20世纪初期1905年革命前俄国社会生活相似。大家竞相参加政治活动，大家充满了反政府的愤懑情绪，牧师们因为青年相信无神论而呵斥青年，资产者家庭的子弟因为反对父母“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或工人”而同父母争吵。

普遍的反政府情绪表现在大家都自称为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我到过科隆，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主义者！“有一位热心的共产主义者，画讽刺画的美术家，他的名字叫泽尔，两个月以后将要到巴黎去。我将把跟你们接头的地点告诉他。你们大家都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爱好音乐，作为一个讽刺画家是会用得着的。”^[3]

“爱北斐特这里正在出现奇迹。昨天〈此信是1845年2月22日写的〉，在我们这个城市一个上等饭店的最大的客厅里召开了共产主义者第三次大会。第一次大会有40人参加，第二次大会有130人参加，第三次大会至少有200人参加。整个爱北斐特和巴门，从金融贵族到小商人都有人参加，所缺少的只是无产阶级。”^[4]

恩格斯就是这样写的，一字不差。在德国，当时人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除外。当时共产主义是大家，特别是资产阶级表达他们的反政府情绪的一种形式。“最迟钝、最无所用心、最庸俗的人士，对世界上任何事情从不感到兴趣，现在也简直欢迎起共产主义来了。”^[5]当时共产主义的主要宣传者，是类似我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51]、“人民社会党人”^[52]等等的人物，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些好心的资产者，多少有点痛恨政府的人。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怕同许许多多好心人、激烈的革命者反而是坏的共产主义者决裂。

1846年，恩格斯到了巴黎。当时巴黎政治生活沸腾，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如饥似渴地研究社会主义，

与卡贝、路易·勃朗以及当时其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结识，奔走于各报刊编辑部和各小组之间。

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最重要的和当时传播最广的社会主义学说，即蒲鲁东主义^[53]上。早在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前（该书1846年10月出版，马克思的答复——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于1847年问世），恩格斯就对蒲鲁东的根本思想进行了严酷无情和异常深刻的批判，而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则竭力为之鼓吹。恩格斯的英语非常好（马克思掌握英语比恩格斯晚得多），熟悉英国书刊，这使他一下子就能够（1846年9月16日的信）指出标榜一时的蒲鲁东的“劳动市场”在英国遭到破产的例证^[6]。蒲鲁东玷污了社会主义，——恩格斯愤慨地说道，——因为照蒲鲁东的说法，工人应该赎回资本！

26岁的恩格斯干脆就在消灭“真正的社会主义”^[54]——这一用语我们在他1846年10月23日，即《共产党宣言》出版前很久所写的一封信中就看到过，那封信已经指出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学说，“空洞的词句”，各种“全人类的”意向，“对‘粗鄙的’共产主义〈Löffel-Kommunismus——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的迷信般的恐惧”，为人类“造福的和平计划”，——这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所作的评断。

恩格斯写道：“蒲鲁东主义问题争论了三个晚上，当时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由格律恩领头来反对我。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846年10月23日）^[7]最后，我发火了，迫使对方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我宣布，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来集会的。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来这里集会的，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我当时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使他们无法回避问题的本质。恩格斯写道，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

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这是1848年革命前一年半写的）。

[\(8\)](#)

讨论的结果是，会议以13票对格律恩分子的2票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定义。将近20个木工手工业者参加了这些会议。这样，67年前，在巴黎便奠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础。

一年后，1847年11月24日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已经拟好了《共产党宣言》的草稿，并且说他反对用原来决定的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恩格斯写道，“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9\)](#)

恩格斯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谈到这部著作的最初详细提纲，这部著作后来传遍全世界，它的一切基本上至今还是正确的，有生命力而且有现实意义，就好像是昨天写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74—281页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讲话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5页。——编者注

[\[2\]](#) 同上书，第21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6页和第8页。——编者注

[\[4\]](#) 同上书，第23页。——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24页。——编者注

[\[6\]](#) 同上书，第47—48页。——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70页。——编者注

[\[8\]](#) 同上书，第71页。——编者注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123页。——编者注

[\[51\]](#)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

[\[52\]](#)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 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

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

[53] 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

[54] “真正的社会主义”，亦称“德国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莫·赫斯、卡·格律恩、奥·吕宁、赫·克利盖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他们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些范畴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改造，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实现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他们还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拒绝进行政治活动，从小市民的利益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对在德国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用超阶级的“博爱”和“人性”等道德说教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今天，我们为世界工人革命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所造成的不堪言状的惨祸，无论在哪里都激起被压迫群众英勇精神的高涨，大大加强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力量。

愿一个个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都来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正挺身奋起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通过共同的斗争，我们一定会粉碎资本的压迫，最终赢得社会主义！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64—165页

(1) 列宁在这篇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终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55]（1899年8月）

某地⁽²⁾17个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把它公布，交全体同志讨论

近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出现了一种离开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的倾向，即离开由党的创始人和先进战士们——“劳动解放社”²⁴成员宣布过，又由90年代俄国工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宣布过的原则的倾向。下面所引的《信条》，旨在表明某些（所谓的“青年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观点，它试图系统而明确地叙述“新观点”。这个《信条》的全文如下。

西欧存在过行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这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全部历史，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资产阶级必须争得自由的形式和力求摆脱束缚生产的行会规章，所以它（资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因素；它西欧各国都是从主张liberté, fraternité, égalité（自由、博爱、平等），从争取自由的政治形式开始活动的。但是，正如俾斯麦所说的，它争得了这种形式，却给了自己的对手即工人阶级一张将来必须兑现的期票。在西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争得过民主制度，而只是坐享其成。有人可能会反驳我们，说工人阶级参加过革命。但是从历史上加以考证就会推翻这种意见，因为正当1848年西欧确立宪法的时候，工人阶级还只是城市手工业者，还只是小市民民主派；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不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人，只会骚动，根本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1848年的宪法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是由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手艺人争得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手艺人与手工工场工人，印刷工，织工，钟表匠等等）从中世纪起，就习惯于参加各种组织，参加互助储金

会、宗教团体等等。西欧熟练工人中间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组织精神，这也就使他们同工厂无产阶级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要组织工厂无产阶级既很难又很慢，他们只能加入所谓lose Organisation（临时组织），而不能参加订有规章的永久性组织。这些手工工场的熟练工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比较容易和完全可能进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又有可能把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受到训练的工人吸收来有计划地组织这个斗争。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就形成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议会政治斗争为出发点，其前途（只在表面上近似布朗基主义，成因的性质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是Zusammenbruch（崩溃）。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在比利时、法国，特别是在德国，工人组织政治斗争非常容易，而组织经济斗争则感到困难重重，意见纷纭。直到现在，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比较起来（除开英国不说），仍然异常薄弱，极不稳定，到处都 laissent à désirer quelque chose（尚嫌不足）。在政治斗争的精力尚未消耗殆尽之前，Zusammenbruch曾是一个必要的、起组织作用的Schlagwort（流行提法），它本应起巨大的历史作用。在研究工人运动时所能得出的基本规律就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在西欧，这样的路线就是政治活动，而《共产党宣言》表述出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是运动当时所应采取的最合适不过的形式。但是，由于目前政治活动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政治运动已经搞得过于紧张，以至难以进展，甚至无法进展（近来选票数目增长得很慢，集会的群众情绪冷淡，书报上的论调低沉），另一方面，由于议会活动软弱无力，以及无组织的和几乎无法组织的工厂无产阶级愚昧群众走上舞台，所以，在西欧造成了现在称为伯恩施坦主义的东西，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工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时期是一种最合事物逻辑的进程，把这全部进程加以细心研究，就能像天文学家那样准确地断定这个“危机”的结

局。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伯恩斯坦主义的成败问题，因为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这里说的是党内早已逐渐发生的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党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党将承认社会；党的狭隘小团体的、多半是宗派主义性的任务，将扩大为社会的任务，而它的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政治”这一概念的内容，就会扩大得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而目前的一些实际要求就会具有更大的分量，就会引起比以前更大的注意。

从上面关于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中，不难得出对于俄国的结论。我们这里阻力最小的路线，绝对不在政治活动方面。不堪忍受的政治压迫虽然使人们不得不时常谈到这种压迫，并专心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它却始终不会推动人们采取实际行动。在西欧，力量薄弱的那部分工人，一卷入政治活动就在其中成长壮大起来，我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力量薄弱的工人面对很沉重的政治压迫，不仅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来同这种压迫作斗争，从而求得本身的发展，而且还经常为这种政治压迫所窒息，甚至发不出纤弱的幼芽。更何况我国工人阶级又不像西欧战士那样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所以我们这里的情景将会十分悲惨，连那些认为每增加一个工厂烟囱就是一件莫大幸事的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感到沮丧。进行经济斗争也很困难，极其困难，但它终究还是可能进行的，并且群众自己也已经实际进行了。俄国工人既然能在经济斗争中学习如何组织，并能时时刻刻在这个斗争中触及政治制度问题，他们就终究会建立起称得上工人运动形式的一种东西，建立起某个或某些最适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组织。现在可以

肯定地说，俄国工人运动还处在原始状态中，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形式。罢工运动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因此还不能称为俄国运动的固定形式，至于不合法组织，单从数量来看，也是不值得注意的（更不必说这种组织在现时条件下有什么益处了）。

情形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饥荒和农村破产现象助长着破坏罢工的行为，因而也就更难把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到比较过得去的程度……试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能有什么办法呢？！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的结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处在一种可怜的状态。他们现在的实际任务还很渺小，而他们的理论知识——由于不是用做研究的工具，而是当做活动的公式，——甚至对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而且，从他人手中接过来的这些公式，从实践的意义来说也是有害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西欧工人阶级是在已经打扫干净的政治活动场所行动的，因此也就过分藐视了其他一切非工人的社会阶层所进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只要有人对带有自由主义政治性质的社会现象稍表关注，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就会表示反对，他们忘记了，许多历史条件使我们不能成为西欧那种马克思主义者，而要求我们拿出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种适合俄国条件并且为俄国条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每个俄国公民都缺乏政治感觉和政治嗅觉，这一点显然不能靠对政治的高谈阔论或者向根本不存在的势力呼吁来求得弥补。政治嗅觉只能用教育来培养，就是说，只有参加俄国的现实生活（尽管它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性的）才能得到。在西欧，“否定”曾是（一时）适宜的，在我国就有害了，因为由一个有组织有实力的团体提出否定是一回事，而由没有组织起来的散漫的一群人提出否定，又是另一回事。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以“否定者”的身份出现了，这种否定削弱了他本应用在政治激

进主义方面的那一份精力。这一切暂时还不可怕，可是，如果阶级公式妨碍俄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实际生活，并且使之远离各个反对派集团，结果就会使所有在争取法的形式时只好不同尚未提出政治任务的工人阶级携手合作的那些人受到重大损失。俄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那种以政治空谈来掩盖的政治上的天真，可能使他们上一个大当。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无疑总会有人赞成这种思想的。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且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上面引录的《信条》，第一，是“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第二，是“对于俄国的结论”。

首先，《信条》作者们对于以往西欧工人运动的看法就是完全不正确的。说西欧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过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是不正确的。宪章运动¹⁸的历史，1848年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就是一种反证。“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正当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⁵⁴等等）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共产党宣言》立即出来反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¹²的时候，政治斗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在英国有限隘的工联主义，在罗曼语国家^[56]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⁵³）。在德国，拉萨尔的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工人阶级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信条》作者们企图把这两种斗争形式分开，就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其次，《信条》作者们对于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以及作为这个运动旗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持有完全不正确的见解。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臭名远扬的“伯恩斯坦主义”^[57]，按照广大公众特别是《信条》作者们通常所了解的含义来说，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而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派别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遭到忠实地恪守革命国际社会民主党原则的党的谴责。我们深信，把机会主义观点搬到俄国来的一切企图，也会遭到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

与《信条》作者们所说的相反，也根本谈不到西欧工人政党有什么“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40年代就已经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的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³⁾。

过了20年左右，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工会和经济斗争的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党人和工人既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对这种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58]中间，有过这种表现）。决议认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工会不仅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且是必然的现象；认为工会对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的日常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决议认为工会不应该仅仅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工会不应该抱着“狭小的”目的，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工人大众普遍的解放。从那时起，各国工人政党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将来当然还会不止一次提出一

个问题：在某个时候是否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是总的或原则的问题，现在还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提出的一样。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其次，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

工人政党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更谈不到有什么重大变化。就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指明了一个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夸大政治的意义，反对密谋主义（布朗基主义^[59]等等），另一方面又反对轻视政治，或者把政治缩小为对社会进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修补（无政府主义，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60]，教授社会主义等等）。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做“反动的一帮”^[61]，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信条》作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只是证明他们力图抹杀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用所谓空洞的“承认社会”来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我们深信，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坚决摒弃这种曲解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的观点。由于《信条》作者们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不正确，他们得出的“对于俄国的结论”就更不正确了。

硬说俄国工人阶级“尚未提出政治任务”，这只能证明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无知。1878年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62]和1875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63]，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经过80年代的反动时期以后，工人阶级又在90年代不止

一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断定“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这也只能证明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任务。《信条》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纲领，显然是想使工人阶级“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样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纲领能够出现一事，就足以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位先进战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表示的忧虑是多么有根据。他在1897年底谈到有可能出现这种前途：

“工人运动不越出工人和企业主间的纯经济冲突的狭小范围，它本身整个说来也就缺乏政治性质，而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在为政治自由斗争的时候，就会追随由所谓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小组和派别。”

（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第19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坚决宣战，因为这种思想会直接使上述的前途得以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极力设法实现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下面所说的另一种前途：

“另一种前途就是社会民主党把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它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因为^[4]将来会有这种派别）并肩战斗并结成联盟，另一方面要把知识界中最热爱人民的最革命的分子直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引导他们前进。”（同上，第20页）

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写这段话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固然，有一家彼得堡工人报纸，即《工人思想报》^[64]，好像同意了《信条》作者们的思想，竟令人遗憾地在发刊词（1897年10月创刊号）中发表了一种根

本错误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说“运动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力求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起来”。但是同时彼得堡另一家工人报纸，即《圣彼得堡工人小报》^[65]（1897年9月第2号），却坚决主张，“只有组织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工人“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就能使自己和整个俄国从一切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还有一家报纸，即《工人报》^[66]，在第2号（1897年11月）的社论上写道：“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俄国工人运动要是成为具有共同名称和严密组织的统一而严密的整体，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增加十倍……”“各个单独的工人小组应当组成一个共同的政党。”“俄国的工人政党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当时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赞同《工人报》的这种信念，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1898年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67]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承认《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可见，《信条》作者们竟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达到了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上明文确定了的发展阶段大大倒退了一步。现在，俄国政府的残酷迫害使党的活动暂时削弱，使党的正式机关报停刊，因此，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竭力使党彻底巩固起来，制定党纲，恢复党的正式机关报。像上面分析过的《信条》那样的纲领竟能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现在存在着一种思想动摇，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宣言》中所阐述的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着重说明一下。第一，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自始至终都要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针对当前的经济要求进行鼓动，而且要针对一切政治压迫进行鼓动；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

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像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时髦”理论了）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现在社会民主党应当全力以赴地到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同时不应该忘记，随着运动的扩大，一定会有家庭工人、手工业者、农村工人以及千百万破产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加入它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队伍。

第二，“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承担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社会民主党既然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当前任务，它就应当做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而且仅仅为了这一点也必须从各方面援助俄国居民中所有的民主分子，吸引他们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坚固堡垒，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政党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第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派别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当做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68]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传统，要求社会民主党现在集中全力来组织党，加强党内纪律并发展秘密活动的技术。如果说老“民意党”的活动家在俄国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当时拥护这些为数不多的英雄的社会阶层十分狭小，运动的旗帜也根本不是革命的理论，那么社会民主党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一定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以使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作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我们请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和一切工人小组都来讨论上面引用的《信条》和我们的决议，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便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进组织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业。

各团体和各小组的决议，可以报告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69]，该联合会按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决议第10条的规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并且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5]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

(1) 这是列宁批驳俄国经济派错误思想的文章。列宁在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统一的阶级斗争中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的重要观点，指出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列宁坚决反对经济派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庸俗的改良主义，强调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努力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被曲解和庸俗化。

^[2]《工人事业》杂志的单行本增加了“（俄国境内）”几个字。——俄文版编者注

^[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161页。——编者注

^[4]以下无手稿。——俄文版编者注

^[5]在《指南》中缺最后一段。——俄文版编者注

^[55]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是列宁在流放地接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个经济派文件之后于1899年8月写的。列宁的姐姐称这个文件为“青年派的信条”，它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成员。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这个经济派文件和列宁起草的《抗议书》。与会的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他们是：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瓦·瓦·斯塔尔科夫、I. 斯塔尔科娃、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涅夫佐罗娃、弗·威·林格尼克、叶·瓦·巴拉姆津、阿·亚·瓦涅耶夫、B. 瓦涅耶娃、米·亚·西尔文、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以及彼得堡工人奥·亚·恩格贝格、亚·西·沙波瓦洛夫、J. J. 帕宁。赞同《抗议书》的还有未出席会议的伊·卢·普罗明斯基、I. B. 叶菲莫夫、切卡利斯基、柯瓦列夫斯基以及图鲁汉斯克的流放者（尔·马尔托夫等人）和维亚特卡省奥尔洛夫市社会民主党人流放者。列宁把《抗议书》寄到了国外。格·瓦·普列汉诺夫收到后立即将它发排，供《工人事业》杂志最近一期刊用。然而，参加该杂志编辑部的国外联合会青年派成员，没有通知普列汉诺夫，就于1899年12月将《抗议书》单另印出，并附一篇编后记，说《信条》只反映某些人的看法，这些人的立场对俄国工人运动并无危险，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内部不存在经济派，等等。1900年初，普列汉诺夫把《抗议书》收入他所编辑的批评经济派的文集《〈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收录的本文献，前一部分按手稿刊印，后一部分按《工人事业》杂志单行本刊印，并和《〈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一书核对过。——83。

^[56] 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87、149。

[57] 伯恩斯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斯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斯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斯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斯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87、121、155、277。

[58]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88、118、252。

[59] 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89、108、139、172、231。

[60]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为约·卡·洛贝尔图斯和斐·拉萨尔。洛贝尔图斯主张由普鲁士王朝制定工资标准，实施社会改革，以逐步实现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拉萨尔主张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抹杀国家的阶级性，企图加强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对讲坛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影响。——89。

[61] 指拉萨尔派的一个论点：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写入了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这个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15页）。——89。

[62]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俄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革命政治组织之一，1878年底在彼得堡成立。创建人是钳工维克多·奥布诺尔斯基和木工斯捷潘·哈尔图林。会员和同情者各约200人。协会只吸收工人参加，其活动是秘密的。协会的纲领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阶级，工人争得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纲领号召俄国工人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进行阶级斗争，并提出协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

和经济制度”。这个纲领也还带有民粹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协会在彼得堡各工厂进行革命宣传，领导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1880年2月15日，它出版了俄国最早的秘密工人报纸《工人曙光报》创刊号。此后不久，报纸的印刷厂被破坏，协会也由于主要成员被捕而停止活动。——89。

[63] “南俄工人协会”是俄国第一个工人革命政治组织，1875年7月间由革命知识分子叶·奥·扎斯拉夫斯基在敖德萨创立。协会有会员60人，同情者150—200人。协会章程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到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指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工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承认，并且和70年代前半期一些民粹主义纲领截然不同，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但是这个章程总的说来还未摆脱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协会成员阅读和传播革命书刊，积极参加组织罢工，并试图在南俄其他工业城市开展协会的活动。协会于1875年底—1876年初被沙皇政府破坏。——89。

[64] 《工人思想报》（《М[^]js>{ I wmgx}》）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91、96。

[65] 《圣彼得堡工人小报》（《N. -Lbnbl[^]ol ‘mfø/M[^]jsø/Hemn^jf》）是俄国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2月（报上印的是1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300—400份；第2号于同年9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91。

[66] 《工人报》（《М[^]js>{ A]dbn]》）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91。

[67]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早在1895年12月列宁就在狱中草拟了党纲草案，并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由于彼得堡等地的组织遭到警察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基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担任。出席代表大会的有6个组织

的9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1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2名，崩得的代表3名。大会通过了把各地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在民族问题上，大会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大会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被宣布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

中央委员会在会后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把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的总任务结合了起来。宣言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页）。

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而且大会闭幕后不久大多数代表和中央委员遭逮捕，所以统一的党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

[68]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13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

[69]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

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

我们的纲领（为《工人报》写的文章）

[\[70\]](#)

（不早于1899年10月）

目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理论的牢固基础，但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说这些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凡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打算出版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人，都应该以明确的态度对待这个不仅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它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怎样使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怎样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必然。它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

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评”作了无情的批判^[71]，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摒弃了伯恩施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72]。

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会受到百般的责难，有人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想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正统教徒”会，迫害那些背弃“教条”、具有独立见解等等的“异端分子”。我们熟悉所有这些时髦的刻薄话。不过这些话一点也不正确，也毫无意义。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在俄国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时，究竟会产生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

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⁶⁴的那些人大概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像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好像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

会党人的帮助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73]，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将在我们的报纸上系统而全面地发挥这些观点。我们深信，这样做我们就能沿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⁶⁷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0—164页

(1) 这是列宁批判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的文章。列宁在文中驳斥了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完备”和已经“过时”的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为这门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明了详细研究和继续发展这门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同时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70] 《我们的纲领》是列宁在流放中为《工人报》写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1899年崩得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工人报》时，编辑部曾先后建议列宁参加编辑和撰稿。由于《工人报》复刊未成，这组文章当时也就没有发表。

^[71]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和《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两篇文章中对爱·伯恩斯坦的批判。

^[72]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于1899年10月9—14日举行。代表大会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问题通过决议。代表大会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这项专门的决议，是因为以爱·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

革命政策和策略。奥·倍倍尔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列宁给予这个报告以高度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82—388页）。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该决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至今并未提供任何理由使党放弃或改变自己对它的基本看法。党一如既往立足于阶级斗争，而根据这一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此，党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以便借助于政权，通过生产工具社会化和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方式来保障最普遍的幸福生活。”在不拒绝与资产阶级各政党为达到一定的实际目标而进行暂时联合的同时，“党任何时候在自己全部活动中都完全保持独立自主，并把所取得的每一成就只看成是使它接近它的最终目标的一步”。决议最后写道：“党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自己的主要要求和基本观点，或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名称……党坚决反对模糊或改变党对待现存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一切尝试。”

汉诺威决议虽然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没有对伯恩斯坦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有力的批判。这引起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罗·卢森堡等）的不满。伯恩斯坦的拥护者也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

[73] 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1/2)小时的法令。

游击战争（节选）（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游击活动问题引起我们党和工人群众的极大兴趣。我们已经不止一次顺便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打算把我们的观点作一次比较完整的叙述，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1]。

一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74]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

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何典

第一卷 第十期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二七」鬥爭六週年紀念
漢口水災與最近灰日運動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從「革命評論」到「民衆先鋒」

戰爭危機與反軍國主義

軍國主義化的歐洲聯盟

南京海關關稅

共和國際在此產國...

我們的死者——第二次世界大

王君同進

每册定價：

0

○ 在於揭破帝國主義

之不可避免。

（本文根據

國家圖書館

1994

游擊戰爭

中國革命發展中

這是目前中國正統的認識，即

的主張，也就

因此對於三

是吸國過去革命

有極大的
木材的游擊隊等一

行醫的夢曲便是目前

究竟應該怎樣？

馬克思和富主觀的

22

列寧論游擊戰爭

漢易

無產階級及其革命階級的任務，在於掃蕩帝國主義戰爭。在未來的戰爭中，國主權化的實質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不可避免。〔本文根據去年九月日俄外交文一件中對俄國主權化實質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不可避免。〕

洪易譯

列寧

遊歷戰爭問題是以前中國革命運動發展中很重要的問題，不但一般自衛革命的份子沒有正確的認識，即我們黨內也有不少同志的觀念。因此對於這個問題，我敢請批評。這篇文字對於我國一九〇五年大革命失敗後農村游擊戰爭異常發展的時機是有關的。中國革命游擊戰爭問題有極好的史料，是俄國過去大革命途中最可寶貴的經驗。

自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後，農村的游擊戰爭一直到現在雖然仍在斷斷不斷的起伏，但已有消息。最近如平江莊在蘇州的游擊戰是目前游擊戰爭中最大的一個火花，我們文章對於游擊戰爭的態度，竟應該怎樣，將要怎樣，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在這篇文章裏面都可以找出極正確的確切而客觀的主張的答覆，所以我們把牠翻譯出來，以供革命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理。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证实上述原理的例证。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议会制度和工会运动是目前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他们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75]和无题派^[76]之类的自由派资产者的意见相反，过去承认过起义，并且在将来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是完全准备承认起义的。70年代，社会民主党不承认总罢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丹，不承认它是通过非政治途径能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手段，但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特别是有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后）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斗争手段。社会民主党承认过19世纪40年代的街垒斗争，以后又根据19世纪末的一定情况把它否定了，而在有了莫斯科的经验以后，又表示完全愿意修改这种否定街垒斗争的观点，承认这种斗争是适当的，因为莫斯科的经验，用考茨基的话来说，提供了新的街垒战术。

四

俄国革命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特点是斗争形式繁多。考茨基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在1902年说过，将来的革命（他补充说，也许俄国例外），与其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我们看到，在俄国，这第二种斗争显然要比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得更广。我国革命的敌人在人民中间为数不多，但是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在发生全民政治罢工的时代，起义也就不能采取那种只适用于间隔时期很短和地区很小的单独行动的旧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即采取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形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战争，只能是连续发生的几次间隔时期较长的大战役和大量的、在这些间隔时期内发生的小冲突。既然这样——而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民主党也就绝对应该提出自己的任务：建立能够在这些大战

役中也能够尽量在这些小冲突中最大限度地领导群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应当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交战的一方，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不用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正如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全体人民都在斗争中重新受到教育和进行学习一样，我们的各级组织也应当受到教育，应当根据实际经验进行改造，以适应这个任务。

我们一点也不想硬要实际工作者接受什么杜撰的斗争形式，甚至也不想书斋里解决某种游击战争形式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总进程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决不想把具体估计某种游击行动的问题，看做是社会民主党的方针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就是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因为它们妨碍觉悟工人正确地提出这一新的困难问题并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1—3、10—12页

[\[1\]](#)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1页。——编者注

(2) 本文是列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考察当时俄国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游击战争这一新的斗争形式的文章。在节选的部分，列宁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时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着眼于形势的变化和运动的发展，向群众的实践学习，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二是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考察，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74\]](#) 学理主义指盲目地拘守某种学理，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的表现，意思同“教条主义”相近。

[\[75\]](#)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

[76] 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在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

序言（1907年2月5日〔18日〕）

现在我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¹⁷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全部汇集成册出版，目的是想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通信中对他自己的私事谈得很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这些材料都是异常宝贵的。但是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于俄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书信内包含着理论和政治材料的那些地方，却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我国，在目前的革命时代，细心研究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材料，是特别富有教益的。《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说得完全对：

“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在1907年，俄国社会党人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从这种认识中间可以得到许多极宝贵的指示，从而了解他们在本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务。俄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直接榜样。

因此，我们现在只是简单地提一下马克思书信中理论上特别重要的地方，而比较详细地谈谈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采取的革命政策。

从更全面和更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68年7月11日写的一封信（第42页及以下各页）[\(2\)](#)。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通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的方式，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自己对所谓“劳动”价值论的见解。马克思把素养较差的《资本论》读者会很自然产生、因而被庸俗的“教授式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百般利用的那些反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意见，作了一个简单扼要而又异常透彻的分析。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他怎样说明和应当怎样说明价

值规律。他以最通常的反对意见为例，说明了他自己所运用的方法。他阐明了价值论这样一个（似乎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同那些要求“把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联系。我希望，凡是开始研究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钻研《资本论》最难懂的头几章的时候，能把我们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反复地读一读。

书信中另外一些在理论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马克思的这些评论写得非常生动，充满热情，可以看到他对一切重大思潮都全神贯注地进行考察分析。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聆听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除了那些顺便谈到的对于狄慈根的评论以外，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蒲鲁东派⁵³的评论（第17页）。只是轻轻几笔就把那些在社会大动荡时期投靠“无产阶级”，但不能领会工人阶级的观点，不能刻苦认真地在无产阶级组织“行列中间”进行工作的资产阶级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描绘得惟妙惟肖。[\(3\)](#)

对杜林的评论（第35页）[\(4\)](#)好像是预示了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在9年以后所写的有名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内容。这本书有策杰尔包姆的俄译本，可惜这个译本翻译得很糟，不仅有许多遗漏，而且有不少错误。信里还有对杜能的一段评论，其中也牵涉到李嘉图的地租论。[\(5\)](#)马克思早在1868年就坚决驳斥了“李嘉图的错误”，而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则已把这些错误彻底驳倒了。但是，直到现在，从我国十足资产阶级的、甚至是“黑帮”[\[77\]](#)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起，直到“准正统派”马斯洛夫，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者都仍然在重复这些错误。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毕希纳的评论，其中谈到他的庸俗唯物主义和从朗格著作（“教授式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正常的依据！）中抄来的“肤浅的废话”（第48页）[\(6\)](#)。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克思的革命政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居然流行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市侩观念，以为具有特殊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的特殊任务的革命时期是变态，而“宪制”和“极端反对派”却是常规。当今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像俄国那样发生这样深刻的革命危机，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对革命采取这样怀疑和庸俗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降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我们这里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马克思在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是多么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看法呀！拿1866年4月6日写的一封信来说吧。马克思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在他写这封信的14年前，他已经最后作出了对于德国1848年革命的估价。[\[78\]](#) 1850年，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在1848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幻想[\(7\)](#)。在1866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日益增长的时候，便写道：

“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派资产者〉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79\]](#)……”（第13—14页）[\(8\)](#)

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的，而不是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个革命只是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大的信心啊！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巨大作用的无产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

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前夜，马克思指出法国发生了“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马克思描写了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

后，得出结论说（第56页）：“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也会这样呢！”^[9]

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像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应该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谈，全是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80]、司徒卢威主义^[81]和桑巴特主义^[82]。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田园诗般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临近，而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导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逐流”、悄悄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采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83]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是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84]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就马上扮做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85]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在九月声明中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像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件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⁵⁹呢？他是否像一位女训导员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像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86]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¹⁰⁾，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做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蠢举，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对待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批评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空想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87]看到这种所谓暴动意图和空想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作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像绝顶聪明的^鲋鱼^[88]那样害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讨论的正是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好像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这是在1871年4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写的……
一个是当起义者开始了冲天的“蠢举”（这话是1870年9月说的）时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另一个是当在1905年12月必须用武力来抵抗敌人夺取我们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侵犯时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继续从技术上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是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群众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终究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业绩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的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11\)](#)

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件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⁷⁵的福音书。

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

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较。

马克思立刻（1871年4月17日）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驳斥。

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做蠢举。但一旦群众举行了起义，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打官腔，教训他们。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成功的机会，

谁就是有意欺骗，或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种提法。

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在1870年9月认为起义是蠢举这一事实。

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12]

我们对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训的简短介绍就到此结束。

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1907年2月5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73—382页

(1) 列宁在这篇序言中强调，应该学习马克思坚定的革命信念，学习他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坚持革命斗争的本领，学习他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列宁把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作了对比，指出马克思最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坚持从正在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来观察世界历史，始终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369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0—361页。——编者注

[\[4\]](#) 同上书，第365—366页。——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525页。——编者注

[\[6\]](#) 同上书，第567页。——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512—514页。——编者注

[\[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518页。——编者注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584—585页。——编者注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编者注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3—404页。——编者注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编者注

[\[77\]](#) 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以及和平革新党等。他们力图保持旧的专制制度。这些党派和组织的成员通称黑帮分子。

[\[78\]](#)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一些最重大问题的观点，是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0—597页）中阐述的。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原是一组论述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文章。1851年8月初，《纽约每日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因忙于经济学研究工作，转请恩格斯为该报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和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文章寄发之前，也都经马克思看过。文章发表时署名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这些文章没有重新出版过。以后出版的一些单行本也都用马克思的名义。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

[\[79\]](#) 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80] 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人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

[81] 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

[82] 桑巴特主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威·桑巴特得名。桑巴特在其活动初期是个涂上了薄薄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自由主义的活动家，后来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列宁曾指出，桑巴特之流“利用马克思的术语，引证马克思的个别论点，伪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布伦坦诺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03页）。

[83] 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X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

[84] 1905年11月，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一文中写道：“只是得到左轮手枪或匕首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会使用它们。70年代的革命家们在这方面是行家，我们的同志们还远不及他们。我们必须尽快填补自己革命教育中的这一空白。善于使用武器应成为我们中间拥有武器者理所当然地自豪的事情和尚未得到武器者羡慕的事情。”（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3卷第352页）

[85] 指马克思在1870年9月6—9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352页）。

[86] 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的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十二月武装起义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最高点。1905年12月5日（18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表达工人的意志，决定宣布总罢工并随即开始武装斗争。次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了同样的决议。12月7日（20日），政治总罢工开始。12月10日（23日）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起义的中心是普列斯尼亚区、莫斯科河南岸区、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和喀山铁路区。武装斗争持续了9天，莫斯科工人奋不顾身地进行战斗。但由于起义者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武器不足、同军队的联系不够、打防御战而没有打进攻战以及起义一开始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就遭逮捕等原因，莫斯科起义终于在沙皇政府从其他城市调来军队进行镇压之后遭到失败。1905年12月—1906年1月，继莫斯科之后俄国

还有许多城市和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这些零星分散的起义也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关于十二月武装起义，参看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5—372页）。

[87]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

[88] 绝顶聪明的 鱼出典于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一条鱼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便常常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度日，而却自以为绝顶聪明。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

（1907年4月6日〔19日〕）

现在介绍给俄国读者的这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贝克尔以及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其他领袖的书信集，对我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我们打算详谈这些书信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对于全面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无须说明的。我们只想指出一点，这就是，要了解这些书信，就必须熟悉论述国际史的基本著作（见耶克的《国际》俄译本，知识出版社出版），熟悉论述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著作（见弗·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莫里斯·希尔奎特的《美国社会主义史》）等等。

我们也不打算对这部书信集的内容作概括的叙述，以及对这些书信所涉及的各个历史时期加以评论。这一点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新时代》¹⁷第25年卷第1册和第2册）一文中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出版者大概会把它附在本书后面，或者以俄文单行本形式发行。[\[89\]](#)

在我们所处的革命时代，对俄国社会党人具有特殊价值的东西，乃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从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近30年（1867—1895年）的私人交往的活动中应当得出的那些教训。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的文献最初尝试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左尔格书信的时候，也正是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方面的“迫切”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的《现代生活》[\[90\]](#)，孟什维克的《评论》[\[91\]](#)），这是毫不奇怪的。现在我们要请读者注意的，也就是对本书

信集中那些从俄国工人政党目前任务来看特别重要的地方所作的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谈得最多的是英美两国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当时住在英国，而且又是同他们那位住在美国的同志通信。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问题，特别是巴黎公社的问题，马克思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库格曼的信^[2]中谈得最多，也最详细。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这些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大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尖锐地批评它脱离了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英国“社会民主联盟”^[92]（Social-Democratic Federation）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大量言论中，始终贯穿着的是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刻板的（starre）正统思想”，责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3]，责备他们不善于适应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很旺盛、气势很磅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的信里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么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4]在这封信以前的一封信里（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谈到亨利·乔治思想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影响问题时写道：

“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bona fide”）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5]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话。我们这里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急忙引用这段话来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93]的主张或建立拉林的“广泛的工人党”一类的主张辩护。我们要问问这些急于“引用”恩格斯的话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一段话为“左派联盟”辩护呢？这几封被引证的信是在美国工人投票选举亨利·乔治的那个时期写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一位嫁给俄国人的美国人，翻译过恩格斯的著作——当时请求恩格斯（这可以从恩格斯给她的回信中看出）把亨·乔治狠狠批评一顿。恩格斯回信说（1886年12月28日），这样做的时机还没有来到，最好是让工人政党根据不完全纯正的纲领开始形成起来。然后，工人自己就会明白问题在哪里，就会“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而妨害“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巨大的错误”^[6]。

至于亨·乔治的思想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是完全荒谬的反动的这一点，恩格斯自然非常清楚，而且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给左尔格的书信中，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的一封信很值得注意，在这封信里，他对亨利·乔治作了评价，说他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当时写道：“亨·乔治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total arrière）。”^[7]但恩格斯并不怕同这位货真价实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起去参加选举，只是要有人善于事先向群众说明“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的信）^[8]。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谈到当时美国工人的一个组织“劳动骑士”^[94]（Knights of Labor）时说：“‘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直译是：腐败的地方，faulste）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

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 [\(9\)](#)

显然，这里一点也找不到可以替从社会民主党跳到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等等主张作辩护的东西。而任何一个不愿意被恩格斯指责为把马克思主义贬低成“教条”、“正统思想”和“宗派主义”等等的人，则应当从这里认识到有时候必须同激进的“反动社会主义者”一起搞选举运动。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谈论美俄两国的这些对比（我们提到这些，只是为了回答论敌），而是要分析英美工人运动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比较重大的全国性的民主任务；无产阶级还完全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支配；一小撮社会主义者由于宗派主义立场而脱离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丝毫不受工人群众欢迎等等。谁要是忘记了这些基本条件而从“美俄两国的对比”中得出一些广泛的结论，那就暴露出他自己极其肤浅。

恩格斯所以强调在这种条件下要成立工人的经济组织，是因为当时已经非常稳固地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向无产阶级提出了纯粹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所以强调成立一个即令是纲领欠妥的独立工人政党的重要性，是因为当时所说的那两个国家中的工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独立性，他们在政治上过去和现在多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

如果企图把从这种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应用到如下的国家或历史时期，在这些国家或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比自由派资产者更早成立了自己的党，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投票选举资产阶级政客的传统，直接摆在面前的不是社会主义任务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企图这样做，那就是对马克思历史方法的嘲弄。

如果我们把恩格斯对英美两国运动的评论和对德国运动的评论对照一下，读者就会更加明了我们的意思。

对德国运动的评论在本书信集中也很多，并且非常值得注意。所有这些评论贯穿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想：要谨防工人政党中的“右翼”，要向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无情地（有时是猛烈地，如马克思在1877—1879年间所做的那样）开战。

我们先从书信中引证一些论述来证实这一点，然后再来作出评价。

这里首先必须指出卡·马克思对赫希柏格之流的评论。弗·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一文中竭力缓和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机会主义者的抨击，而且做得我们认为有点过分。例如，在谈到赫希柏格之流的时候，梅林固执己见，认为马克思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⁵⁸的评价不正确。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里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某些社会主义者的抨击是否正确或者是否过分，而是马克思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某些派别所作的原则性的评价。

马克思抱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拉萨尔派和杜林妥协（1877年10月19日的信），同时也指责“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德语“博士”是相当于我国“副博士”和“大学优等毕业生”的一种学位）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fraternité）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95]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第70封信）^[10]。

在过了将近两年以后（1879年9月19日）写的另一封信里，马克思驳斥了那种说他和恩格斯支持约·莫斯特的谣言，并向左尔格详细说明了他们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未来》杂志是赫

希柏格、施拉姆、爱·伯恩施坦三人主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拒绝参加这种刊物的工作，可是当谈到由同一个赫希柏格参加并提供经费创办一种新的党的机关刊物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要求接受他们所指定的主笔希尔施去监督这个“由博士、大学生和讲坛社会主义者^[96]拼成的大杂烩”，然后又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警告他们说：如果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不改变自己的路线，那他们就要公开反对“这种糟蹋〈Verluderung——这个词的意思在德语中还要厉害些〉党和理论的行为”。⁽¹¹⁾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处于像梅林在他的《党史》中所说的《混乱的一年》（《Ein Jahr der Verwirrung》）。在“非常法”²¹颁布以后，党并没有立刻找到正确的道路，最初还迷恋于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和赫希柏格之流的机会主义。马克思当时在谈到赫希柏格时写道：“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像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¹²⁾

马克思所进行的“猛烈的”进攻，使机会主义者退却以至……销声匿迹了。马克思在1879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里通知说，赫希柏格已被排除于编辑委员会之外，而党的所有有名望的领袖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都已摒弃了他的那种思想。⁽¹³⁾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97]已经由当时站在党的革命派方面的福尔马尔担任编辑。又过了一年（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可悲的”（miserabel）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wobei’ s oft scharf

hergeht”）。李卜克内西1880年曾到过马克思那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14\]](#)

和平恢复了，战争还没有一点迹象。赫希柏格隐退了，伯恩施坦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时候止。

1882年6月20日，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这一斗争已成往事：“一般说来，德国的情况非常好。虽然，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经企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转变，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处处受到的侮辱，使他们普遍地比三年前更加革命了。……这班先生〈党内著作家〉当时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的稿费收入。只要这个法令一旦被取消，就一定会发生公开的分裂，而菲勒克、赫希柏格……之流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右翼；在他们还没有最后垮台以前，可以间或同他们进行谈判。这种意见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刚一颁布时就说过了，当时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年鉴》[\[98\]](#)上发表了一篇可耻到了极点的文章，评论过去党的活动，并要求党采取比较文雅礼让〈原文是“jebildetes”，不是gebildetes。恩格斯这里是指德国著作家的柏林口音〉的做法。”[\[15\]](#)

1882年对伯恩施坦派所作的这种预言，在1898年以及后来的年代已被光辉地证实了。

从那时起，特别是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在“过分地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

1884年底。恩格斯斥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投票拥护航运补助金[\[99\]](#)（“Dampfersubvention”，见梅林的《党史》）时所表现的那种“市侩偏见”。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说，他不得不为此写很多信（见1884年12月31日的信）。

1885年。恩格斯在评述航运补助金案全部经过时写道（6月3日）：“事情几乎弄到分裂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议员的“小市民欲

望”是“多么巨大”。恩格斯说：“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16]

1887年。左尔格写信给恩格斯说，党选举菲勒克之类的人（赫希柏格式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国会议员，只会使自己丢脸。恩格斯在回信中辩解说，没有别的办法，工人政党无法找到参加国会的理想人选。“右翼的先生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有反社会党人法；一旦党重新获得行动自由，他们就会立即被驱逐出去。”并且一般说来，最好是“党比自己的议会英雄们好，而不要与此相反”（1887年3月3日）。恩格斯抱怨说，李卜克内西是一个调和分子，他总是用空话来掩盖分歧。但是事情一旦弄到分裂的地步，在决定关头，他是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17]

1889年。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100]。机会主义者（以法国的可能派^[101]为首）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了，恩格斯（他当时已经68岁）像一个少年一样投入战斗。有许多书信（从1889年1月12日至同年7月20日）都是谈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的。当时不仅机会主义者受到了抨击，而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德国人也因为他们的调和态度而受到了抨击。

恩格斯在1889年1月12日写道：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政府。他还揭露了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 D. F.）成员同可能派的联盟。^[18]

“为了这个该死的代表大会，我东奔西走，写许多信，没有工夫做别的事。”（1889年5月11日）恩格斯气忿地说，可能派奔走张罗，而我们的人却在睡大觉。现在连奥尔和席佩尔都要求我们去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但是这“终于”使李卜克内西睁开了眼睛。^[19]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共同写了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小册子（由伯恩施坦署名，但是恩格斯称它们为“我们的小册子”）。^[102]

“除社会民主联盟外，可能派在整个欧洲没有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拥护（1889年6月8日）。所以他们只得回到非社会主义的工联方面去。”（请我国崇拜广泛的工人党和工人代表大会等等的人们注

意！）“从美国来参加他们大会的只有一个劳动骑士的代表。”对手还是在同巴枯宁派¹⁴作斗争中遇到的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布鲁斯（可能派的领袖）和海德门（同可能派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正在攻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企图组成一个“新国际的核心”。

“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连向倍倍尔说明问题所在，也花了很大力气”（1889年6月8日）。^[20]当两个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当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数量上超过可能派（可能派当时同工联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以及部分奥地利人等等联合起来了）的时候，恩格斯简直高兴极了。（1889年7月17日）^[21]他高兴的是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调和主义方案和提案都宣告失败了。（1889年7月20日）

“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22]

……梅林说得对（《与左尔格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叫苦。”恩格斯有一次写道：“如果以为他们的那些小针头能够刺穿我这一层又老又厚的硬皮，那他们就错了。”^[23]梅林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写道：他们希望别人也养成他们那种不为情感所动的性格。

1893年。把“费边派”^[103]鞭打了一顿，这是……谴责伯恩施坦派的时候自然要做的事（要知道，伯恩施坦在英国“费边派”那里“培养”他的机会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

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²⁷当做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煞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24\)](#)

(1) 在这篇序言中，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针对英美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发表的有关言论，结合俄国工人运动实际，总结了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他们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善于针对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不同的任务，制定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还指出，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书信中吸取教益，就不能拘泥于其中的个别词句，而应当理解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总结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

[\(2\)](#) 见《马克思致库格曼医生书信集》，俄译本由尼·列宁编辑并作序。1907年圣彼得堡版（序言见本书第103—112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566页。——编者注

[\(4\)](#) 同上书，第585页。——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576页。——编者注

[\(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8—459页。——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191页。——编者注

[\(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页。——编者注

[\(9\)](#) 同上书，第456页。——编者注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281页。——编者注

[\[11\]](#) 同上书，第388、390页。——编者注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89页。——编者注

[\[13\]](#) 同上书，第400页。文中提到的信的日期应为1879年11月14日。——编者注

[\[14\]](#) 同上书，第449页。——编者注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327—328页。——编者注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321页。——编者注

[\[17\]](#) 同上书，第608—609页。——编者注

[\[1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128—129页。——编者注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193页。——编者注

[\[20\]](#) 同上书，第222页和第223页。——编者注

[\[2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241—243页。——编者注

[\[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245页。——编者注

[\[2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57页。——编者注

[\[2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8页。——编者注

[\[89\]](#) 弗·梅林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一文没有收进本书的这一版。

[\[90\]](#) 《现代生活》杂志（《Современная Жизнь》）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1906年4月—1907年3月在莫斯科出版。为杂志撰稿的除格·瓦·普列汉诺夫外还有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人。

[\[91\]](#) 《评论》文集（《Отклики》）是孟什维克的刊物，1906—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3集。第1集以《评论》为书名，另外两集以《〈评论〉社刊》为书名。为文集撰稿的有尔·马尔托夫、费·唐恩、德·柯尔佐夫等。

[\[92\]](#)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

[\[93\]](#) 指非党工人代表大会。

关于召开非党“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05年夏首次提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召开各种工人组织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

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思想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孟什维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43—53页和第147—171页，第15卷第165—168页和第243—256页）等文。

[94] 劳动骑士即高尚的劳动骑士团，是美国的群众性工人组织，在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该团是缝衣工人尤·斯蒂芬斯等人于1869年在费拉德尔菲亚建立的，起初是一个秘密团体。该团最早试图把美国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它联合不分民族的各工种工人，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另外也吸收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该团的纲领带有浓厚的拉萨尔主义色彩，曾提出以建立合作社组织、推行合作的工业体系来代替工资制度，并要求实行土地改革。该团于1878年转入公开活动，以后逐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1874年仅有成员1万人，1886年已有成员70万人以上。在此期间，该团组织过几次成功的罢工。1886年以后，该团领导人走上否定阶级斗争的道路，该团的影响急剧降低，1893年成员减少到7万人。19世纪末，该团实际上已不存在。

[95] 《未来》杂志（《Die Zukunft》）是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办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杂志，1877年10月—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社会慈善家卡·赫希柏格是该杂志的出版者。卡·施拉姆和爱·伯恩斯坦是该杂志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的方向。

[96] 讲坛社会主义者是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新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开始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适应资产阶级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他们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忽视劳资问题的解决，资产阶级自由派反过来嘲讽他们那一套为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俾斯麦策划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专卖都叫做“社会主义”。他们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对工人的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以及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

[97]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反社会党人法施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周报）。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79年9月—1880年1月格·亨·福尔马尔任编辑，1881—1889年爱·伯恩斯坦任编辑。该报虽然在初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恩格斯持续不断的指导和帮助下，坚持了革命策略，在聚集和组织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力量方面起了卓越作用。恩格斯曾称赞它是德国党的旗帜。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

[98] 《年鉴》即《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是社会改良派的杂志，1879—1881年由卡·赫希柏格（用笔名路·李希特尔）在苏黎世出版。共出了3卷。这里谈到的文章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批判性的格言）》，刊登于《年鉴》第1卷。

[99] 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

[100] 两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是指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法国可能派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同时在那里召开的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根据法国社会党人的倡议，在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人支持下召开的。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把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抓到自己手里，从而使自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恩格斯坚决反对他们的这种企图，并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恩格斯在揭露机会主义者的阴谋时，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待可能派的调和主义态度，同时也批评了法国社会党人在策略上的错误。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工人立法问题。在就该问题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工人们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还要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党的工作和工会的工作结合起来。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建立第二国际的正式决议，但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代表大会。可能派及其拥护者召开的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101] 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

1905年，法国社会党和法兰西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102] 指《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和《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II. 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两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573—585、591—612页）。

[103] 费边派是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费边社于1884年成立。其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四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和第26卷第278—284页）。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1894年。农民问题。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0日写道：“在大陆上，随着运动的日益发展，渴望获得更大成就的心理也在加强，而名副其实的猎取农民的活动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通过拉法格在南特不仅声明说：直接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也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河流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农，而是中农，甚至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地买卖牲口和粮食的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1\)](#)

1894年12月4日：“……巴伐利亚人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的了，并且几乎成了普通的人民政党（我指的是大多数领袖和许多新入党的人）；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他们投票赞成整个预算，特别是福尔马尔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雇农，而是为了吸引上巴伐利亚的大农，这些人占有土地25—80英亩（10—30公顷），就是说非使用雇工不可。……”[\(2\)](#)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批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庸俗习气和市侩习气。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事实。一般人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看做实行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的模范，但是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经常不断地同该党“右翼”（恩格斯的说法）作斗争。恩格斯逝世不久，这种斗争就从秘密转向公开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所作的劝告、指示、纠正、威胁和教导中，贯穿着两条路线。对于英美社

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号召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自己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总是坚持不懈地教导不要陷入庸俗习气、“议会迷”^[104]（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信里使用的说法）⁽³⁾和市侩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长舌妇喋喋不休地谈论前一种劝告，而闭口不谈后一种劝告，这难道不值得玩味吗？在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时所表现的这种片面性，难道不是我们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片面性”的明证吗？

现在，当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严重动荡和动摇的征兆的时候，当机会主义、“议会迷”和庸俗改良主义的极端表现引起完全相反的革命工团主义^[105]的极端表现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英美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时所采取的总路线就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工党、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议会、不论在选举中或报刊上都根本看不到一贯的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教导社会党人无论如何要打破狭隘的宗派圈子，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振作起来，因为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无产阶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舞台——在几乎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历史任务的条件下——完全被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占据着，被这个在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上举世无双的资产阶级占据着。

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各特定国家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而是为了打知识分子的、派别组织的小算盘。

相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过去和现在都被“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使用的说法）^[4]统治着、无产阶级早已参加政治生活并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活动来限制和用庸人观点来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我们尤其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加以强调，提到首位，因为我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广大的、“出色的”、富有的报刊正用各种办法向无产阶级鼓吹邻邦德国工人运动“模范的”忠顺态度和合法的议会活动，鼓吹它如何温文尔雅。

背叛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制造这种别有用心的谎言，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由于立宪民主党⁷⁵营垒中某些过去的大臣或未来的大臣品德败坏。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俄国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资产者的根本的经济利益。俄国一切社会党人在同这种谎话、这种“愚化群众”（“Massenverdummung”——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信中使用的说法）^[5]的行为作斗争中，都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当做必不可少的武器。

自由派资产者制造的别有用心的谎言，要人民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止如何“文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则告诉我们说：

“法国人的革命言论和行动，使菲勒克分子及其同伙（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分子）的哀鸣显得更加丑恶了（这里是指法国众议院里工人政党的形成和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106]迫使法国激进党人离开法国无产阶级一事）。在最近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中，就只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发了言，他们两人都讲得很好。有了这样的辩论，我们又能在上流社会出头露面了，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常有的。特别是在德国人派了这么多庸人参加帝国国会（不过这也难免）以后，有人出来同他们争夺一下领导权，一般

说来是件好事。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1886年4月29日的信）[\(6\)](#)

这就是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好好吸取的教训。

给予我们这种教训的，并不是19世纪两位最伟大人物的书信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坦率的，绝无外交辞令，决不使用心计。

至于这种精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中究竟贯穿到什么程度，还可以从下面一些虽属较为局部性的但是极能说明问题的言论中看出来。

1889年，英国开始了由没有受过训练的不熟练的普通工人（煤气工人、码头工人等）进行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充满新的革命精神的运动。恩格斯对这件事特别高兴。马克思的女儿“杜西”（Tussy）当时在这些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恩格斯对她极为夸奖。1889年12月7日他从伦敦写信说：“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例如，我绝不相信约翰·白恩士（Burns）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和一般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Champion）（退伍的中尉）在多年以前就同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保守派分子串通一气，而他在教会的教士会议上却鼓吹社会主义等等。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Mann）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7\)](#)

这段话是用不着解释的。

再举一个例子。1891年，欧洲出现了战争危险。恩格斯当时常常同倍倍尔通信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德国受到俄国侵犯，德国社会党人就要同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德国如被扼杀，我们也会和它一起同归于尽。若是发生有利的转变，斗争就会异常激烈，那时德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因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权，演一次1793年。”（1891年10月24日）^[8]

请那些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俄国工人政党在1905年所设想的“雅各宾式的”远景不合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们听听吧！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向倍倍尔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不得不参加临时政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对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从这本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们将近二十年来始终这样热情地期待着俄国的革命。

拿马克思1877年9月27日的一封信来看。东方的危机^[107]使马克思非常高兴。“俄国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打击了……变革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按照一般规则（“*secundum artem*”），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il y aura un beau tapage*）。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9]（马克思当时59岁）

老天没有让而且看来也不可能让马克思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但是“立宪的把戏”被他说中了，他的话就像是昨天针对俄国第一、二两届杜马^[108]说的。要知道，告诫人民防止“立宪的把戏”，正是自由派和机会主义者非常痛恨的那个抵制策略的“灵魂”
.....

再看看马克思1880年11月5日的一封信。由于《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109]，他感到十分高兴，并站在民意党人⁶⁸一边反对当时刚刚产生的土地平分派^[110]。马克思准确地看出了土地平分派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当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民粹派—土地平分派后来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用尖刻的讥讽词句猛烈地抨击了土地平分派：

“这些先生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⁷⁴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10]

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会怎样估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革命行动”对于1905年和以后年代的俄国的重要意义了^[11]。

再看看恩格斯1887年4月6日的一封信。“而俄国看来会发生危机。最近的几次谋杀^[112]使一切都陷入混乱……”^[12]1887年4月9日的信上也这样说：“军队中充满了心怀不满的从事密谋活动的军官（恩格斯当时对民意党人的革命斗争印象很深，他把希望寄托在军官身上，还看不到俄国士兵和水兵在18年后极其光辉地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我不认为这种局面能拖到年底……只要俄国一干起来（“losgeht”），那就太好了！”^[13]

1887年4月23日的一封信说：“在德国，一个迫害接着一个迫害（迫害社会党人）。看样子，俾斯麦想准备好一切，以便俄国一旦爆发革命（现在看来，这也许只是几个月内的事），德国也会立即干起来（“losgeschlagen werden”）。”^[14]

事实证明，这几个月很长很长。毫无疑问，肯定会有一些庸人要皱眉蹙额，严厉指责恩格斯的“革命主义”，或者取宽容态度，对这位亡命国外的老革命家的陈旧的空想一笑置之。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

“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为共和国捐躯”，——恩格斯回忆他1848—1849年期间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情绪时这样称呼那个时代^[113]），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写的是“我们”，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朋友，见1871年7月21日的第14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一个人所能牺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同一封信里还说：“如果我们能在三四月间多筹集一些钱，我们也许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29页）但是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

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人以没有错误而自夸吧。

尼·列宁

1907年4月6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196—216页

^[1]同上书，第510—511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318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91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2页。——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页。——编者注

^[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471页。——编者注

^[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编者注

^[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8卷第181页。——编者注

[\[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275页。——编者注

[\[10\]](#)同上书，第453页。——编者注

[\[11\]](#)顺便谈一下，我记得是普列汉诺夫还是维·伊·查苏利奇1900—1903年期间对我说过，恩格斯曾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谈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和俄国当前革命的性质。我们很想知道是否确实有过这样一封信，它是否还保存着，现在是否应该把它公布出来。[111](#)

[\[1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622—623页。——编者注

[\[13\]](#)同上书，第624—625页。——编者注

[\[14\]](#)同上书，第629页。——编者注

[\[104\]](#) “议会迷”是列宁著作中多次出现过的一个词。列宁用它来形容那种认为议会制度是万能的、议会活动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政治斗争的唯一的、主要的形式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使用过这个词。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道：“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5页）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里写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同上书，第578页）。

[\[105\]](#) 革命工团主义是19世纪末在一系列西欧国家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思潮。工团主义者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工会（工团）只要组织工人举行总罢工而不必进行革命，就能推翻资本主义，把生产的管理掌握在自己手里。列宁曾指出：“在西欧，革命工团主义在许多国家里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议会迷的直接的和必然的产物。”（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1页）

[\[106\]](#) 德卡泽维尔工人罢工是指法国阿韦龙省德卡泽维尔市2 000名矿工的自发罢工，从1886年1月开始到6月结束，持续了5个月。罢工是由于劳动条件不堪忍受和阿韦龙矿业公司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把军队开进德卡泽维尔，这在法国引起了更大的风潮。在巴黎和各省举行了许多抗议集会。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在巴黎的集会上发言抗议政府和企业主的行为。社会党报纸《人民呼声报》和《强硬派报》开展了支持罢工者的签名运动。在法国众议院讨论德卡泽维尔罢工问题时，资产阶级议员，其中包括激进派，支持政府镇压罢工工人。原来参加激进派的工人议员因此脱离了激进派，在众议院中组成了独立的工人党团。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法国这一事态的发展，认为“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敢的独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438页）。

[107] 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战后，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正式独立，保加利亚获得自治。土耳其把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割让给俄国，把塞浦路斯岛割让给英国。奥匈帝国暂时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并向俄国赔款8亿法郎。

[108] 第一届国家杜马，亦称维特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第一届国家杜马共有代表47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届杜马（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间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同第一届国家杜马一样，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

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法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法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除土地问题外，第二届国家杜马还讨论了预算、对饥民和失业工人的救济、大赦等问题。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沙皇政府在弄清革命力量不强之后，便决定驱散杜马。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

[109] 指1872年由格·亚·洛帕廷和尼·弗·丹尼尔逊合译的第一个《资本论》俄译本的出版。这也是《资本论》第一次被译成外文。随着《资本论》的出版，70年代在《祖国纪事》、《欧洲通报》等俄国合法杂志上展开了关于《资本论》的广泛辩论。俄国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辩论。70年代的革命青年秘密小组和秘密报刊也对《资本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110] 土地平分派指土地平分社的成员，他们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主要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雅·瓦·斯特凡诺维奇、维·伊·查苏利奇、奥·瓦·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阿·彼·布拉诺夫等。土地平分派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土地平分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成员则加入了民意党。到1881年底，土地平分社作为组织不再存在。

[111] 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和俄国将发生的革命的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300—305页）。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1925年出版的《劳动解放社》文集第3集。

[112] 最近的几次谋刺是指1887年3月以列宁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为首的一批民意党人在彼得堡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事件以及当时流传甚广的关于在加契纳将发生新的谋刺事件的传闻。

[113] 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一章题为《为共和国捐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190—235页）。

反对抵制

（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114\]](#)（节选）

（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一

抵制布里根杜马[\[115\]](#)无疑是我国革命在实行抵制方面最重要的经验。况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功。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历史条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会看到两点。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是一场反对我国革命转上（即使是暂时地转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像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论断来反对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⁷⁴。这样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那些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他们并不懂得问题之所在。

其次，如果说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该机关的斗争，那么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类型的机关的斗争。1905年清楚地表明，存在

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116]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117]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事实。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最狭窄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的法令^[118]也是事实。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和君主立宪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当时需要对革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选择，并且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这些或那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而力量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就是坚持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反对立宪君主制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立宪君主制道路上也可能有斗争，不但可能有，而且还不可避免有斗争。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也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论证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然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的议论都是“文不对题”，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来代替历史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一场选择下一步斗争道路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表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也许很短，也许较长）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由人民以直接的冲击去扫除（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察觉到的问题，而1905年秋天，历史却把这个问题向俄国各革命阶级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对积极抵制的宣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提出一个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宣传积极抵制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历史客观地提出的问题。1905年10—12月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起伏很大：起初革命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扫除了警察自由派类型的代表机关，建立了纯革命类型的代表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10—12月时期是群众最自由、主动精神最充分、工人运动发展得最广泛最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种种障碍，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权空白时期”——旧政权已被削弱，而人民的革命新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胜利了，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1905年十二月起义得到了继续，表现为1906年夏天爆发了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抵制维特杜马的口号是为把这些起义集中和联合起来而斗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抵制的客观根据是一场由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决定下一步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决定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来召开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走直接的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过去在书刊中常常出现而在讨论本题时又一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抵制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一些，曲折一些。

在所有孟什维克的书刊中，尤其是1905年（10月以前）的书刊中，都贯穿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孟什维克书刊的这个特征也是一种空谈的例证，他们好像在说什么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119\]](#)，用这种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方法来混淆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⁸⁷，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像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警察的御用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所走的革命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恩格斯有一次在一篇论公社布朗基派⁵⁹流亡者的宣言⁽²⁾（1874年）的文章中非常清楚生动、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妥协的态度。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拒绝利用形势注定我们实行的妥协（或者是：形势强迫我们实行的妥协——因为无法查对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谨向读者致歉），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³⁾。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向群众提出的抵制口号的简单、直接和明了的特点加以评价。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在布里根杜马时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了的口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争取简单的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任务。

试问，究竟根据什么标准，说当时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呢？究竟根据什么主要的标志，说客观形势的特点使简单、直接、明了的口号没有成为空话，而成了唯一适合实际斗争的口号呢？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

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像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像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⁴⁾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理智的自发势力”

（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das tolle Jahr”的译法，德文本意为“丧

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¹⁸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120\]](#)，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像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⁷⁵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121\]](#)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普遍向群众介绍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终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和莫尔恰林习气[\[122\]](#)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来，其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

我们必须注意——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意——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窒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莱金^[123]和莫尔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呸！呸！）报刊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¹²《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124]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

抵制的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证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不行的。

1905年和1906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会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¹⁰⁸和第三届杜马^[125]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卖给了黑帮⁷⁷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被六三政变^[126]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一届¹⁰⁸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说，1907年六三政变是1905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

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手段，它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他们引入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127]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扬扬得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10—12月的战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像第二届杜马那样加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要是“利用”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到简单而微不足道的⁽⁵⁾目的（宣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机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宣传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而有时还要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马的原因。由于1905年12月的失败，由于1906—1907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糟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做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1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130]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131]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种抵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8、19—27页

（1）列宁在本文中科学地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去抵制国家杜马、现在反对抵制国家杜马的原因，强调必须根据客观形势来制定革命策略。在节选的部分，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列宁强调，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传统，严厉抨

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同时要求革命家善于思考，善于运用不同的斗争手段，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

[\[2\]](#)这篇论文编入德文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俄译本：《〈人民国家报〉论文集》知识出版社版。

[\[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2—594页。——编者注

[\[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584页。——编者注

[\[5\]](#)参看1905年《无产者报》[128](#)（日内瓦出版）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页。——编者注），该文指出：我们并不笼统地拒绝利用杜马，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的另外一个课题——为争取直接的革命道路而斗争。还可参看1906年《无产者报》[129](#)（俄国出版）第1号上的文章《论抵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36—343页。——编者注），这篇文章强调，杜马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114\]](#) 《反对抵制》一文载于1907年7月底出版的小册子《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是当时持相反观点的列·波·加米涅夫写的《赞成抵制》，该文所署时间是1907年6月28日（7月11日）。

这本小册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彼得堡秘密印刷厂印刷的，但伪装成为合法的印刷品，封面上印的出版地点是莫斯科，印刷单位是虚构的哥里宗托夫印刷厂。1907年9月，小册子被沙皇当局没收。

[\[115\]](#) 布里根杜马是指沙皇政府计划在1906年1月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因为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所以这个拟成立的国家杜马被人们称做布里根杜马。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在布里根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包括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主张在杜马选举中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布里根杜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举，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就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抵制策略获得了成功。关于布里根杜马的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宪法交易》、《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7—71页，第11卷第160—167、172—180、188—199页）等文。

[\[116\]](#) 指1905年1月9日事件。

1905年1月9日事件是沙皇大规模枪杀彼得堡和平请愿工人的事件，史称“流血星期日”。1905年1月3日（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爆发了罢工，1月7日（20日）罢工发展成全市

总罢工。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讨论请愿书的工人集会上，布尔什维克进行解释工作，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但工人对沙皇的信仰还很牢固，因此和平请愿未能被阻止。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通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沙皇政府从外地调集4万名士兵和警察加强彼得堡的卫戍部队，并于1月8日（21日）批准了驱散请愿队伍的计划。1月9日（22日），14万工人手执圣像和沙皇像向宫廷广场进发。根据彼得堡总督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打死，两千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

[117] 指黑海舰队“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

“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发生于1905年6—7月间。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1905年6月14日（27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8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所属的第267号雷击舰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与此同时，“普鲁特号”教练舰于6月19日（7月2日）为支持“波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I. 彼得罗夫为首的军舰委员会。该舰立即开往敖德萨，但由于“波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而未能与它会合。6月20日（7月3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被沙皇政府两艘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一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

[118] 8月6日的法令是指沙皇政府1905年8月6日（19日）颁布的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参看注115。

[119] “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语出自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文学教师》。小说描写一个名叫伊波利特·伊波利特奇的史地教师，他平时沉默寡言，而一开口总是说些诸如“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之类的人所共知的“大道理”。“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是他临终时说的一句话，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空话、废话和老生常谈。

[120] “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犯的错误和过失。

[121]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

[122] 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衷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

[123] 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

[124] 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对法国工人的下述忠告：“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0页）

[125] 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

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26] 六三政变是指俄国沙皇政府在1907年6月3日发动的反动政变，史称六三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

[127]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前者是根据孟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后者则是根据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3—155、209—210页）。

[128] 《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

[129] 《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

[130]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

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

[\[131\]](#) 指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

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和第11卷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32]（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方教授按官方意图讲授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关于这种科学和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同样卖力地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在无产阶级的中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40年代前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133]。40年代末，在经济学说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⁵³的斗争。50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60年代，斗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从国际中清除巴枯宁主义¹⁴。70年代初在德国名噪一时的是蒲鲁东主

义者米尔柏格，70年代末则是实证论者³²杜林。但是他们两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到上一世纪90年代，这一胜利大体上完成了。甚至在蒲鲁东主义传统保持得最久的罗曼语各国⁵⁶，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把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立即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倾向就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起因改变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躏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眼前转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的社会民粹派无论在土地问题上（全部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正”来代替他们的自成系统而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究竟怎样。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134\]](#)。

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神父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带着傲慢的微笑嘟哝着（同最新出版的手册一字不差），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轻蔑地把黑格尔视做一条“死狗”⁽²⁾，耸肩鄙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报官家给的俸禄，修正主义者就向他们靠拢，竭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的“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正”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地着重指出这一点现在尤其必要，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³⁾。

谈到政治经济学，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正”更广泛详细得多，他们竭力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们说，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根本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他们说，现在危机已经比较少见、比较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们说，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的“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的趋势。最后他们说，就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的观点来加以纠正。

在这些问题上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正像20年前恩格斯同杜林的论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思想有了颇见成效的活跃。人们用事实和统计数字分析了修正主义者的论据，证明了修正主义者一

贯地粉饰现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辩驳的材料证实了。但是在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要弱得多，而现代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都不大善于特别注意那些表明农业愈来愈卷入世界经济交换的农业专业部门（有时甚至是专门的作业）。在自然经济的废墟上，小生产是靠营养不断恶化，经常挨饿，延长工作日，家畜质量及其饲养情况恶化，总之，是靠手工业生产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那些手段来维持的。科学和技术每前进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出路，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学术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没有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上来说，他们的毛病就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势必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

在危机论和崩溃论方面，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这是指一次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不久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全欧洲失业人数惊人的增

加，更不用说有许多迹象预示快要到来的工业危机，——这一切使大家都忘记了修正主义者不久以前的“理论”，似乎连许多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忘记了。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给工人阶级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

关于价值理论，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维克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根本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确实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根据，并且使《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⁴⁾这个旧原理变得不正确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做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正在消灭阶级和阶级的划分，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19世纪下半叶的全部欧洲史和20世纪初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这不会消除危机和政治革命，只会在这种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达到最激烈的程度。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表明这种激烈的情况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立刻就同全民族的敌人，同蹂躏其祖国的外国军队勾结起来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谁不懂得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

烈地用群众的暴力去解决争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种议会制度的基础上去进行坚持原则的宣传鼓动工作，真正培养工人群众去胜利地参加这种“争执”。在西欧同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同自由主义改良派（立宪民主党⁷⁵）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识，因为这种妥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斗争的真实意义，把正在斗争的人同最不能斗争、最动摇、最容易叛变的人拴在一起。法国的米勒兰主义^[136]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它给修正主义作了一个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的实际评价。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见到的局势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每一个稍有见识、稍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丝毫不会怀疑：德国正统派和伯恩施坦派⁵⁷、法国盖得派^[137]和饶勒斯派^[138]（现在尤其是布鲁斯派^[139]）、英国社会民主联盟⁹²和独立工党^[140]、比利时布鲁凯尔和王德威尔得、意大利整体派^[141]和改良派、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关系实质上到处都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的现状来说，民族条件和历史因素极不相同。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里现在实质上已经是按

同一条路线进行的，这表明比30—40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那时在不同的国家里相互斗争的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类型的倾向。现在在罗曼语各国出现的“革命工团主义”¹⁰⁵这种“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趋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对它加以“纠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总是不求助于过去被人误解的马克思学说，而求助于现在被人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学说。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还没有经受过同任何一国社会党的实际的大搏斗。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分析上述那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差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

（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十分自然，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会如此，因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目前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领域经历的事情，即同理论上修正马克思学说的人进行的争论，目前在实践上只是在工人运动某些局部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

几点上，将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小市民的种种动摇和弱点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1—19页

(1) 本文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60年的战斗历程，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列宁系统揭露了修正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分析了修正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指明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将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4页。——编者注

[\[3\]](#)见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等人合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135](#)。分析这本书不是本文的任务，我现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一切，实质上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谟派和新贝克莱派修正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5—379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编者注

[\[132\]](#)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卡尔·马克思（1818—1883）》文集，署名弗拉·伊林。文集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而编的，由克德罗夫出版社于1908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除列宁的这篇文章外，文集还收有尤·涅夫佐罗夫的《卡·马克思的生平和活动》、尼·罗日柯夫的《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弗·巴扎罗夫的《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罗·卢森堡的《纪念卡·马克思》、格·季诺维也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加米涅夫的《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普·奥尔洛夫斯基的《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米·塔甘斯基的《马克思论俄国》等文。

[\[133\]](#) 青年黑格尔派也称黑格尔左派，是德国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卢格、布·鲍威尔、戴·施特劳斯、麦·施蒂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

[\[134\]](#) 新康德主义者是在复活康德哲学的口号下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新康德主义19世纪中叶产生于德国，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1865年李普曼出版了《康德及其追随者》一书。该书每一章都以“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结束。他还提出纠正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这一“根本错误”。朗格则企图用生理学来论证不可知

论。新康德主义后来形成两大学派：马堡学派（赫·柯亨、保·格·纳托尔普等）和弗赖堡学派（威·文德尔班、亨·李凯尔特等）。前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利用数学方法向物理学的渗透，来论证唯心主义，后者则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宣称历史现象有严格的独特性，不受任何规律性的支配。两个学派都用科学的逻辑根据问题来取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宣布“自在之物”是认识所趋向的“极限概念”。他们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认识的对象并不是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而仅仅是意识的现象。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不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变种，断言科学没有力量认识和改变现实。新康德主义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伦理社会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依据自己的认识论，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不可能达到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斯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新康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格·瓦·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和弗·梅林都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列宁揭露了新康德主义的反动实质并指出了它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内在论者、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联系。

[135]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是一本哲学论文集，刊载了7篇论文：弗·亚·巴扎罗夫的《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雅·亚·别尔曼的《论辩证法》、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无神论》、帕·索·尤什凯维奇的《从经验符号论观点看现代唯能论》、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偶像之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K. F. 格尔方德的《狄慈根的哲学和现代实证论》、谢·亚·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该书于1908年由种子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

[136] 米勒兰主义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

[137]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国政府。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38] 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

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139\]](#) 布鲁斯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也被称为可能派。1902年，布鲁斯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

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140\]](#)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

[\[141\]](#) 整体派是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一个派别，整体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其领袖是恩·费里。整体派在一些问题上同持机会主义立场的改良主义派进行了斗争。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

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²⁾。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形势，改变了迫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只要各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没有改变，这样的任务是不会随着历史出现转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像俄国社会各个阶级间的根本的对比关系一样，近几年，比如说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为了说明这个意思，我们且看看近六年来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马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划分为两个三年，前三年大约在1907年夏季结束，后三年大约在1910年夏季结束。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前三年的特征是俄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特点发生

了迅速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进展很不平衡，向两边摆动的幅度很大。“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俄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各个不同舞台上的活动（杜马内外的活动、出版、结社、集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形式之公开，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巨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反之，后三年的特征（我们再说一遍，这里也是只从纯理论的“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演进十分缓慢，几乎等于停滞不动。在国家制度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比较显著的变化。前一时期各个阶级展开各种公开的和多方面的活动的“舞台”，现在大多数都完全没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活动了。

这两个时期的相同之处在于：俄国的演进在前后两个时期都仍旧是先前的、资本主义的演进。这种经济演进同现存的许多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这个矛盾还是同从前一样，并没有因为某种局部的资产阶级的内容渗入这些或那些个别制度而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时期摆在历史活动的舞台最前面的问题，是上述那些迅速的、不平衡的变化究竟会引起什么结果。由于俄国的演进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变化的内容也就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采取某种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地位而害怕剧烈的变化，力求在土地制度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方面保存大量旧制度的残余。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同“自食其力”的农民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不能不力求实现另一种资产阶级的改革，给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保留的余地要少得多。雇佣工人既然自觉地对待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就不能不对这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明确的态度，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趋向虽然都仍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但是它们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及其发展速度和进步影响所波及的广度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在过去的三年，通常称做策略问题的那些问题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形形色色的路标派分子[\[142\]](#)认为，由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和分歧，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争论，是“争取对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斗争”，是“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表现，没有再比这种意见更其错误的了。恰恰相反，正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它才不能对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不能不提出适应（直接地或间接地适应，正面地或反面地反映）这两种不同趋向的理论公式。

在后三年，俄国资产阶级发展中的两种不同趋向的冲突没有成为迫切问题，因为这两种趋向都被“死硬派”压下去了，被推到了后面，被逼了回去，被暂时湮没了。中世纪的死硬派不仅挤满了舞台的最前面，而且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广大阶层的内心充满了路标派的情绪，充满了沮丧心情和脱离革命的思想。这时呈现出来的不是改革旧制度的两种方式的冲突，而是对任何改革的丧失信心、“顺从”和“悔罪”的心情、对反社会学说的迷恋、神秘主义的风行等等。

这种异常剧烈的变化，既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单是“外界”压力的结果。前一个时期使那些几辈子、几世纪以来一直不关心政治问题、不过问政治问题的居民阶层受到了极其剧烈的震动，这就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在这个高度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不能不停顿一下，不能不回头去研究基本问题，不能不做一番新的准备工作，这有助于“消化”那些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使更广大

的阶层掌握这种经验，使这种经验深入到所谓底层，深入到各阶级的落后群众中去。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划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带着各种唯心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马赫主义^[143]的流行病上。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如露骨的或者羞羞答答的“召回主义”^[144]，又如把召回主义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合理的色彩”。

另一方面，遍及资产阶级最广大阶层的路标主义精神和脱离革命的思想，也渗透到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温和谨慎”的轨道的那个思潮中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所剩下的已经只是用来掩盖浸透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关于“等级制度”和“领导权”等等议论的词句了。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是研究这些议论。仅仅指出这些议论，就足以说明前面讲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经受的危机的深重，以及这种危机同现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联系。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

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前三年唤起了广大阶层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这些阶层往往是现在才第一次开始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的刊物炮制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荒谬言论，而且散布得也更加广泛。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瓦解是特别危险的。因此，弄明白目前必然发生这种瓦解的原因，并且团结起来同这种瓦解进行彻底的斗争，的确的确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84—89页

(1) 本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的不同特点，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因此必然要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随着具体的政治形势和直接行动的任务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及其同时代任务之间的联系。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6、459页。——编者注

[\[142\]](#) 路标派是指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

[\[143\]](#) 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马赫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孟什维克中的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免遭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44\]](#) 召回主义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

·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主义的变种是最后通牒主义。最后通牒派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1908年春天开始的。1908年3—4月在讨论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5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过了召回主义的决议。5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议案仅以18票对14票被否决。1908年6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31号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1908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同这些违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致伊·费·阿尔曼德（节选）（1916年11月30日）

亲爱的朋友：关于“保卫祖国”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没有意见分歧。您认为我发表在《纪念马克思》文集上的那篇文章^[145]和我目前的说法有矛盾，但又没有具体地摘出任何一处文字，因此使我难以回答。我手头没有《纪念马克思》文集。当然我不能一字不差地记得我在那里是怎么写的。没有当时的和目前的文章的具体的引文，我无法答复您所提出的这种论据。

总的说来，我觉得，您的论断多少有些片面性和形式主义。您抓住《共产党宣言》上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²⁾，似乎打算无条件地运用它，直到否定民族战争。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 α ）历史地，（ β ）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 γ ）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祖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为推翻民族压迫而斗争的时代，或者确切些说，在这样的时期，祖国是一回事；在民族运动早已结束的时期，祖国则是另一回事。关于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原理不可能对“三种类型的国家”（我们关于自决的提纲第6条）⁽³⁾都同样适用，在一切条件下都同样适用。

《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没有祖国。

这是对的。但是，那里不仅仅指出这一点。那里还指出，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无产阶级的作用有些不同。如果只抓住第一个原理（工人没有祖国），而忘记了它同第二个原理（工人组织成为民族的阶级，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⁴⁾的联系，这将是天大的错误。

这种联系是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联系就是，在民主运动中（在这样的时期，在这样的具体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拒绝支持这个运动（因而，也不能拒绝在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可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马克思在1848年，恩格斯在1859年（恩格斯在《波河与莱茵河》这本小册子的末尾直接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直接号召德国人进行民族战争）。1891年，鉴于法国（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反对德国的战争当时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直接承认要“保卫祖国”。^[5]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头脑不清呢？不是的。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91年真的应该在反对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会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战争。

顺便提一下：我说这些，是在重复我在驳斥尤里的文章^[6]中说过的东西。不知您为什么对这篇文章只字不提。我觉得，关于您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恰恰在该文中有一系列论点透彻地（或者几乎透彻地）说明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464—466页

（1）列宁在信中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问题，批评那种只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片言只语而不去完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思想的错误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和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应当历史地、联系其他原理、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编者注

^[3]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2—263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297—299页和第22卷第293—298页。——编者注

^[6]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19—126页。——编者注

^[145] 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见本书第148—156页）。

论策略书^[146]（节选）（1917年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

^[146] 《论策略书》这本小册子在1917年内由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波涛出版社出了3版，每一版都附有列宁的《四月提纲》。小册子的第1版是在4月27日（5月10日）前、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4月29日（5月12日）表决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案的前几天出版的。

第一封信对形势的估计

列寧全集第二種

討論進行計畫書

列寧著
成則人譯

廣州人民出版社印行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人民出版社1921年出版的列宁
《论策略书》中译本(当时译《讨论进行计划书》)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²⁾，他们公正地讥笑了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做法，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根据哪些确切肯定的客观事实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呢？

在登载于1917年3月21日和22日《真理报》^[147]第14号和第15号上的我的第一封《远方来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中，以及在我的提纲里，我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因此我认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口号或“当前任务”就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组织的奇迹，以便为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作好准备。”（《真理报》第15号）⁽³⁾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

1917年二、三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掌握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阶级的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个新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这里，我们会听到喜欢把自己称做“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反对者的喧嚷声：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主张总的说来已得到历史充分的证实；但是具体实现的结果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重蹈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覆辙，他们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⁴⁾，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⁵¹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

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做“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关于这些变异，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5\)](#)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才可能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政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因为不要忘记，彼得格勒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政府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无论警察、脱离人民的军队或是权势极大的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都不存在。这是事实。这正是反映了巴黎公社类型国家的特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实际生活，而不是重复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以便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执政的是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也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阶级吗？怎么能得出结论说这一阶层不能取得政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

我的回答是：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形势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自由地进入了第二个政府即附属政府，自由地补充、发展和完善着这个政府。同时，他们又同样自由地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这是一种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論的现象，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曾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维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还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太可笑了。

农民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我不仅没有忘记这种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我在直接地确切地表述土地纲领时还估计到一种新现象，即贫雇农和农民业主之间发生着更深刻的分裂。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农民会听从社会革命党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劝告；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受了资产者的影响，转向护国主义，劝告人们等待立宪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6\)](#)

可能，农民会继续保持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协议，保持他们目前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记土地运动和土地纲领，将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忘记现实，同样会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实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同农民已达成协议的事实，或者用更确切的、少带法律含义而多带经济和阶级含义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同农民已实行阶级合作的事实。

只有这一事实不再成为事实，只有农民离开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而这一点要留待以后专门去谈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想到将来可能有这样的阶段，而忘记在农民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现在自己所负的责任，他就会变成一个小资产者。因为他在实际上会鼓动无产阶级去信任小资产阶级（“它，这个小资产阶级，这些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就一定会同资产阶级分开”）。他只想到“可能”有一个愉快而甜蜜的未来，那时农民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之流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他只想到“可能”有这样一个愉快的未来而忘记了不愉快的现在，忘记了农民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尾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目前还在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充当李沃夫“陛下”的反对派^[148]。

我们上面所假设的这种人，很像甜蜜蜜的路易·勃朗和媚人的考茨基分子，决不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149]，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

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

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⁵⁹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详细论述过的^[7]，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

愚昧无知的人或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可以叫喊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谁只要肯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样的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自然不会而且绝对不会陷入布朗基主义的泥潭。这样做，也不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因为无政府主义就是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向无产阶级统治过渡的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张在这个时期必须有国家，不过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国家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是没有常备军、没有同人民对立的警察、没有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吏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先生在他的《统一报》^[150]上拼命地叫喊无政府主义，这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我在《真理报》（第26号）上曾向普列汉诺夫挑战，要他谈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1872、1875年在国家问题上是怎样教导的^[8]，普列汉诺夫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只能是默不作答，只能像被激怒了的资产阶级那样咆哮一通。

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顺便提一下，在他那本论无政府主义的德文小册子^[151]里，

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懂的迹象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6—143页

(1) 列宁在本文中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确定斗争任务和活动方式时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应当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实际检验的分析，应当根据客观事实对自己的政策进行科学的论证。列宁批评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公式”去背诵和简单重复而不去研究生动现实的做法，指出理论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6、459页。——编者注

[\(3\)](#)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0页。——编者注

[\(4\)](#)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

[\(5\)](#)见约·沃·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6\)](#)为了使我的话不被人误解，我马上要预先声明：我绝对赞成雇农和农民苏维埃立刻夺取全部土地，但是，它们自己要严格遵守秩序和纪律，丝毫不能毁坏机器、建筑物和牲畜，万万不能破坏经济和粮食生产，而要加强生产，因为士兵需要加倍的粮食，人民也不应当再挨饿。

[\(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4—336、371—386页。——编者注

[\(8\)](#)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8页。——编者注

[\[147\]](#) 《真理报》（《П р а в д 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

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

[148] 陛下的反对派一语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的一次讲话。1909年6月19日（7月2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1909年6月21日（7月4日）《言语报》第167号）

[149]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亚·李·帕尔乌斯在1905年提出的，后来成了俄国托洛茨基分子的一个论点。

[150] 《统一报》（《Единство》）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翼集团统一派的报纸，在彼得格勒出版。1914年5—6月出了4号。1917年3—11月为日刊。1917年12月—1918年1月用《我们的统一报》的名称出版。编辑部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尼·瓦·瓦西里耶夫、列·格·捷依奇和尼·伊·约尔丹斯基。该报持极端沙文主义立场，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用下流报刊的手法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

[151]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该书最初于1894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52]

（1917年8—9月）

^[152]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写于1917年8—9月，1918年5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在此以前，1917年12月17日（30日），《真理报》发表了它的序言和第1章的头两节。为了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著作，列宁于1916年秋和1917年初在苏黎世精心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并把收集到的材料汇集成了一本笔记，取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30—222页）。因笔记本封面为蓝色，通称“蓝皮笔记”。1917年4月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后，由于忙于革命实际活动，不能立即进行国家问题的著述，但也没有把这一计划完全搁置一边。1917年6月，他曾拟了一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书单，并了解过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工作制度。1917年七月事变后，列宁匿居在拉兹利夫，才得以着手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为此他请人把“蓝皮笔记”送到拉兹利夫，后又请人送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和俄文版）等。8月上旬到芬兰的赫尔辛福斯后，他继续专心写作。按原定计划，本书共7章。列宁写完了前6章，拟了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详细提纲和《结束语》的提纲（同上书，第230—231页和第241—242页）。列宁曾写信告诉出版者，如果第7章完稿太晚，或者分量过大，那就有必要把前6章单独出版，作为第1分册。本书最初就是作为第1分册出版的。在本书手稿的第1页上，为了应付临时政府的检查，作者署了一个从未用过的笔名：弗·弗·伊万诺夫斯基。但是这本书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也就没有使用这个笔名而用了大家都知道的笔名：弗·伊林（尼·列宁）。1919年本书再版时，列宁在第2章中加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

第一版序言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派¹⁰³，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

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者

1917年8月

(1) 这是列宁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本观点，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批判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歪曲，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阐发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学说，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指明它们是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并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列宁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阐明了国家消亡的社会经济基础，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才会消亡，而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保持国家，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第二版序言

本版，即第2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节。

作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做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列宁1917年7—8月在拉兹利夫藏匿地写作《国家与革命》

〔苏〕M.索科洛夫作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

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了第6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153\]](#)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1\)](#)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 and 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

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⁵¹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十分明确地得出来的。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忘记”和歪曲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要详细地证明。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编者注

[\[153\]](#) 乔·威·弗·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的结尾部分阐述了国家的理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这一理论的详细分析和批判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45—404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5页）。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织^[154]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划分“很自然”，但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所没有的。……”⁽¹⁾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种“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同武装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觉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

19世纪末，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只能是这样。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特殊的、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

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盖了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就其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等等来说，固然会不同于拿着树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恩格斯在上面的论述中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时，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使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2\)](#)

这段话至迟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3]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竞争的侵略者”，即进行掠夺的大国瓜分完了。从此陆海军备无限增长，1914—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即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使贪婪的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酿成大灾大难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个大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167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编者注

^[3]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4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页）。——编者注

^[154] 氏族组织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内部严禁通婚。若干氏族为一个部落，若干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在氏族组织中，人们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生产资料公有，集体从事生产，产品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氏族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为母权制，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逐步过渡到父权制。氏族组织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而解体。关于氏族组织，可参看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第328—571页）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5页）。
克兰是克尔特民族（主要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对氏族的称呼。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特殊的、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站在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比克兰代表更大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¹⁾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论问题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²⁾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的俾斯麦，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开始迫害革命无产阶级以后，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3\)](#)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结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考虑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说普选制是

“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4\)](#)。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他们的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

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这种荒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白、准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荒谬性，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今的”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传最广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⁵⁾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这种引用也多半好像是对神像鞠一下躬，也就是为了例行公事式地对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而丝毫不去考虑，先要经过多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他们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168页。——编者注

⁽²⁾同上书，第168页。——编者注

⁽³⁾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编者注

⁽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编者注

⁽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编者注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所说的国家“自行消亡”这句话是这样著名，这样经常地被人引证，又这样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社会主义的手法的实质，以致对它必须详细地考察一下。现在我们把谈到这句话的整段论述援引如下：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

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德文第3版第301—303页）[\(1\)](#)

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被现代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接受的只有这样一点：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废除”说不同，按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样来削剪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意味着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

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歪曲，所以产生这种歪曲，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忘记了我们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极重要的情况和想法。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这样一来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人们是“照例不”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句话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按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这个出色的极其深刻的定义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人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

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就是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一种（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也是国家、因而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本身，就是说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说明这个原理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且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国家自行消亡”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

可以担保，在1万个读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论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10个人中可能有9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伟大的革命学说竟然这样被人不知不觉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观念。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被千百次地重复，庸俗化，极其简单地灌到头脑中去，变成固执的偏见。而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却被抹杀和“忘记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除了对于民主概念的市侩的、夸张的描写，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由于当时是在合法地用这个口号暗示民主共和国，恩

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上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个口号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155]

第五，在恩格斯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还有关于暴力革命意义的论述。恩格斯从历史上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评述变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颂扬。但是，“谁都不记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党内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这些思想在对群众进行的日常宣传鼓动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论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是联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的。

请看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²⁾；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⁷⁹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德文第3版第193页；第2编第4章末）⁽³⁾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一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说里呢？

人们通常是借助折中主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随心所欲（或者为了讨好当权者），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时而抽出这个论述时而抽出那个论述，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正是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鲜，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可以见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下面还要更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4]，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30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156]的时候，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过头话”，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都详细而具体地发展了他们的这些观点。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他们学说中这个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321页。——编者注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224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和第285—286页。
——编者注

[\[155\]](#) 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第4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5、320—321和26—33页）。

[\[156\]](#) 哥达纲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在德国两个社会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哥达纲领比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倒退了一步，它是爱森纳赫派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合并、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的产物。纲领宣布党的目的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回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并写进了一系列拉萨尔主义的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所谓对无产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普选权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国家”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草案作了彻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5页），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认真考虑。哥达纲领于1891年被爱尔福特纲领代替。

第二章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

1. 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部著作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从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作出结论以前不久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885年德文版第182页）[\[1\]](#)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第37页）[\[2\]](#)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157\]](#)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占支配地位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人忘记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的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

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158]，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和第272页。——编者注

[\[157\]](#) 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时还不知道马克思在1871年以前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笔记中曾写道：“查对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以前是否说到过‘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没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49页）在《国家与革命》出版以后，列宁才看到了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列宁作了相应的补充。

[\[158\]](#) 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

2. 革命的总结

关于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159]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黑体是我们用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半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160]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职能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第4版第98—99页）⁽¹⁾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1848—1851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无产阶级在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

种联系。工人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寄生机体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当然，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竟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和粉饰的市侩，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无可置疑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为数很多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还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情况吧：以前优先给予黑帮分子⁷⁷的官吏位置，现已成为立宪民主党人⁷⁵、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猎取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且又把立宪会议慢吞吞地推迟到战争结束再举行！至于瓜分战利品，攫取部长、副部长、总督等等职位，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的例子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年这三年法国历史更广阔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

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907年版第4页）^[2]

最后一句评语已经过时了，因为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使阶级斗争达到彻底的结局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692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602页。——编者注

[\[159\]](#) 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通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难的譬喻。

[\[160\]](#) “掘得好，老田鼠！”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使用善于掘土的老田鼠这一形象来比喻为新社会开路的革命。

3. 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¹⁾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¹⁷上（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²⁾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

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书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侏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3]）。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161]

^[1]第2版增加的一节。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编者注

^[3]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161]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多种多样形式的论点，列宁最早是在1916年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15—170

页）一文中提出来的。但这篇文章直到1924年才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列宁在191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和1923年写的《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63—277页和第43卷第369—372页）中也都涉及了这一问题。

第三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1. 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1]但是，当1871年3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像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斗争，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162]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163]，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3]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

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709页）⁽⁴⁾（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⁵⁾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

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164]或土耳其革命^[165]，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0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2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编者注

[\[5\]](#)见本书第103—112页。——编者注

[\[162\]](#)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和《再论我们的处境（给X同志的信）》两篇文章（载于1905年11、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3、4期）中发表的意见。

[\[163\]](#) 指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

[\[164\]](#) 指1910年的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共和派在陆海军部队支持下举行起义，迫使国王逃亡英国。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实行了某些民主改革，但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赋税和高利贷盘剥没有减轻。这次革命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165\]](#) 指1908—1909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史称青年土耳其革命。1908 年7月，驻马其顿的军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发动了革命。他们提出恢复1876年宪法的口号，希望把封建神权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国。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被迫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 年4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了叛乱。叛乱被击败后，议会废黜了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选举马赫穆德五世为苏丹，青年土耳其党人组织了新政府。新政府同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表者。这次革命没有发动也不敢发动广大群众，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上层的革命。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1\)](#)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

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2\)](#)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做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3\)](#)}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1—375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7页。——编者注

3. 取消议会制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 [\(1\)](#)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议会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评，现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之列。部长和职业议员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把批评议会制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又根据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宣布，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党人”就产生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像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做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摒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问题，如果把议会看做国家的一种机构，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任务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摆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一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读做：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不知道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击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带有腐朽的市侩习气的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议会，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党人”部长先生们用空谈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人民。在政府里，不断地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在官厅里，在司令部里，却在“干着”“国家”工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166\]](#)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上流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党人”（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还是旧的，还在按旧的方式行使职权，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坏革命的创举！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情况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待在官场里的切尔诺

夫、鲁萨诺夫、晋季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满不在乎地在公众面前像谈小事情一样厚着脸皮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佬的，官吏的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联合的实质。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除非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是空谈，除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不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是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像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产阶级民主需要的那种官吏的职能时，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作比喻，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作比喻。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就像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而从来不对这些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像普列汉诺夫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或者像策列铁里说“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一样。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19世纪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样式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对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如同对所有“国家”官吏的工作一样，付给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在对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它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考虑到了实际上已经由公社开始了的尝试（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1\]](#)同上书，第375页和第376页。——编者注

[\[166\]](#) 《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B. B. 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郭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以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

4. 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 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个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1\)](#)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167\]](#)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理解，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多么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 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想必他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像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

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第136页）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東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他们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施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融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但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充耳不闻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物这样的话。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376页。——编者注

[\[167\]](#)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

5. 消灭寄生物——国家

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的言论，现在还应当补充几段。

马克思写道：“……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bricht——打碎〉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168]〉……是反对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1]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被废弃”，——这就是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在国家问题上使用的说法。

所有这些都是将近半世纪以前写的，现在必须把这些话发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观察了他经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作出的结论，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骗人的东西。……” [\(2\)](#)

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做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对法国历史作了精确的观察，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导致的结论：事情已到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地步。

当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6—377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编者注

[\[168\]](#)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

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派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吉伦特派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

第四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马克思对公社经验的意义问题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

1. 《住宅问题》

恩格斯在他论住宅问题的著作（1872年）[\(1\)](#)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几次谈到了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今的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说明了向消灭国家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为社会福利所要求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1887年德文版第22页）[\(2\)](#)

这里没有考察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谈到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剥夺和占据住宅是根据现今国家的命令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⁵³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

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第68页）[\(3\)](#)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触及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⁵⁹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时，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第55页）[\(4\)](#)

一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从事剿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认“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做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也算做“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给国际主义者加上无政府主义的罪名现在是愈来愈时行了。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们来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是特别有益的。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550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编者注

[\(3\)](#)同上书，第544—545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页。——编者注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文章^[169]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文章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

（《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40页）⁽¹⁾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

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讥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权威主义者”，也就是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轮船来说吧，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设施，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 [\(2\)](#)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做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第39页) [\(3\)](#)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

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种十足的市侩式的庸俗论调：“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的庸俗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头脑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地提出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可以

说是把它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含糊地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无论在对待银行方面还是在对待国家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5—556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554页。——编者注

[\[169\]](#) 指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和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5—560、551—554页）。

3. 给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附带说一下，据我们所知，倍倍尔第一次发表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2卷里，也就是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36年之后。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170]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 and 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322页）⁽¹⁾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曾作过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为了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出来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在修改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建议。困难也许只是在用词上。德文中有两个词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词不是指单个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也许只好采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词，虽然这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再是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无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这种攻击有正确之处，因为“人民国家”像“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都是无稽之谈，都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使它摆脱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搁置了36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诫过的那些错误。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也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却可以看到国家问题上一种完全错误的论调：

“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们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页）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9版（第9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听任一些人如此顽固地重复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调，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编者注

[\[170\]](#) 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71—198页）。

4. 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10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对爱尔福特纲领^[171]草案的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顺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¹⁾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回过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方面的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

的联系；第三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²⁾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²¹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³⁾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

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4\)](#)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5\)](#)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恩格斯在谈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制共和国问题时写道：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6\)](#)

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而在这些特殊条件中，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虽然无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问题来掩盖这种反动性的行为，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

主义者在反对“自己”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这种倾向。

在英国，无论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语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似乎已经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他承认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前进一步”。自然，这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

但是，恩格斯绝对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坚决不要这样的官吏，就像不要普鲁士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

下：“省〈省或州〉、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7]

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党人”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¹⁴⁷（1917年5月28日第68号）上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所谓革命民主派的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们是如何令人气愤地背弃民主主义。^[8]自然，这些通过“联合”而把自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推翻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非常流行的偏见，即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见。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关于地方自治这整个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没有充分注意。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72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73页。——编者注

^[4]同上。——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75—276页。——编者注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76—277页。——编者注

^[8]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80—183页。——编者注

^[171] 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

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263—280页）。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

5. 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3版写的导言中（导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顺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问题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还对公社的教训作了极其鲜明的概括。这个概括，由于考虑到了公社以后20年的全部经验而作得非常深刻，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对国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1)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172]）落到了“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列铁里身上。他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173]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既说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又说成这就是“国家的”需要！

策列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研究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证明策列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恩格斯顺便提出的另外一个也是有关国家问题的意见是谈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它的日益腐化而愈来愈机会主义化，愈来愈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进行庸俗的

歪曲。就是说，把这个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问题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起来反对的就是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完全背叛，但恩格斯在1891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内机会主义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说得很谨慎：

“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2\)](#)

恩格斯故意强调“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侩的水平，这种市侩可以容许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

将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在探讨该党1914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时，会找到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材料：从该党思想领袖考茨基的论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门的暧昧言论起，直到党对1913年的与教会分离的运动[\[174\]](#)的态度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后20年是怎样为斗争的无产阶级总结公社教训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认为最重要的教训：

“……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

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3\)](#)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 000法郎[\(4\)](#)。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以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5\)](#)

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荣耀的”职位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部找到肥缺的桥梁，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所犯的那种错误：他们说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巧妙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论断，对于任何一种民主制度，包括给官吏发微薄薪金的办法在内，都可以套得上，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彻底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任何民主都是会消亡的。

这是一种诡辩，正像一句古老的笑话所说的：一个人掉了一根头发，他是否就成了秃子呢？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恩格斯继续写道：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3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6\)](#)

恩格斯告诫德国人，叫他们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原理。他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直

接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的教训，因为他们在“联合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形式，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2）为什么只有新一代才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呢？这个问题是同民主的消除问题联系着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6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0—331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页。——编者注

[\[4\]](#)名义上约等于2 400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6 000卢布。有些布尔什维克提议，例如在市杜马内，给9 000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议全国以6 000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是完全不可饶恕的。[175](#)

[\[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页。——编者注

[\[6\]](#)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336页。——编者注

[\[172\]](#) 列宁谈到伊·格·策列铁里在1917年6月11日（24日）的演说中声言要解除工人武装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拿法国将军路·欧·卡芬雅克的行为来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4—317页）。

[\[173\]](#) 1917年6月11日（24日），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在1917年6月10日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夺取政权的阴谋”。策列铁里声称要解除工人的武装，说什么“对于那些不善于恰当掌握手中武器的革命者，要从他们手中把武器夺走。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让他们迄今拥有的过多的技术兵器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关枪和武器留在他们手里”。

[\[174\]](#) 与教会分离的运动，又称退出教会的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发生的群众性的反教会运动。1914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修正主义者保尔·格雷的《与教会分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开始就党对待反教会运动的态度问

题展开讨论。格雷断言党应当对这一运动取中立态度，应当禁止党员以党的名义进行反宗教和反教会的宣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们在讨论过程中始终没有批判格雷的错误。

[\[175\]](#) 这里说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纸币。俄国的纸卢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贬值得很厉害。

6. 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给自己那本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写道，在所有的文章里，他都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而不用“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⁵⁸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然而，对真正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1\)](#)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

也许哪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话来安慰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有真正的政党，它在很好地发展；就连“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名词，这个除了表示我们在1903年布鲁塞尔—伦敦代表大会[\[176\]](#)上占多数这一完全偶然的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词，也还“可以过得去”……现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

市侩民主派在7、8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177]，“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除此而外，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对我在4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²⁾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

但是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告诫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会担心，是不是我们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

⁽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490页。——编者注

[\[2\]](#)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01、110、116页。——编者注

[\[176\]](#)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

[\[177\]](#) “七月事变”后，布尔什维克被加上了“力图占领城市”、“强奸”苏维埃意志、“侵犯苏维埃的权力”等等罪名。反革命势力炮制了所谓列宁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案件，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发出逮捕列宁的命令。与此同时，

《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22日（8月4日）的报纸登载消息说，将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审讯列宁和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列宁从7月5日（18日）起被迫转入地下。

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第9年卷第1册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¹⁾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编者注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同我们在前面研究过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粗略地对照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纲领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一词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¹⁾，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仿佛存在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要解决的任务不同。恩格斯的任务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概括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十分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题目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时，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

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造成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²⁾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以后，就来提出问题，并且好像是告诫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实肯定了的科学材料。

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

⁽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编者注

⁽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1页。——编者注

2.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1\)](#)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关于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材料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 [\(2\)](#)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是怎样变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得惊人地长久和稳定，几乎有半世纪之久

（1871—1914年），而在这个时期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来“利用合法性”，来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举世未有的高度。

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看到的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 500万雇佣工人中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 500万雇佣工人中有300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3\)](#)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并不像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线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4\)](#)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千百万次地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而且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很明显，剥削者少数要能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就必须实行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就必须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其次，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

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过程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动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6页。——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编者注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扣除后备基金、扩大生产的基金和机器“磨损”的补偿等等，然后从消费品中还要扣除用做管理费用以及用于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像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估计。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他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1\)](#)

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做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2\)](#)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教授，包括“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3\)](#)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4\)](#)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编者注

[\(3\)](#)对杜冈的批判，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90—393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编者注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1\)](#)

只是现在我们才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正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像夏洛克^[178]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179]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正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许诺，谈到“实施”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仅没有许诺过，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实施”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为这根本无法“实施”。

这里我们也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不正确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来着重谈论它就很不可笑了，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个别无政府主义者（在克鲁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尔纳利森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已经“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者如少数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格耶所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话）。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

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阶段之一。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

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如下的结果：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会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2\)](#)

当大多数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编者注

[\(2\)](#) 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是“政治国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上面第4章第2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178\]](#) 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267。

[\[179\]](#) 指19世纪俄国民主义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于1862—1863年所写的《神学校特写》。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像整个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直接遇到这个问题的時候，他们还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和助长机会主义的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庸俗化。

为了说明（哪怕是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吧。

1. 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书名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诺夫竟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论述这个主题而完全回避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他的这本小册子有两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

这两个主题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理主义者，半庸人。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怎样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自己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¹⁵闭幕才两年。”[\(1\)](#)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不理睬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

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已经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编者注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多。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见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又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现过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180]，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论战，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81]上提出的决议叫做“橡皮性”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一些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现在，当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就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本身来看，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来看，我们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Spreng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像样的了。

而考茨基在详尽驳斥伯恩施坦主义的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182]，考茨基却只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斯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页）

这不是反驳伯恩斯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40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偷换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做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这一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他那本论“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课题。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在谈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限于此，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得政权。恰巧马克思在1872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中已经“过时的”东西⁽²⁾，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这样一节：“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其中既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又讲到国内战争，又讲到“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已经给了工人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德国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纲领”。接着他叙述了纲领的各条。至于1871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像“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进行持久的和深入的斗争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通过“深入的”斗争这种空洞而浮夸的言词回避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在口头上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么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来组织。”（1903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148页和第115页）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训作例子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一个工厂、大商店和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都绝对要求严格地遵守纪律，要

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给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会有完全停产或损坏机器和产品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像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

（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3\]](#)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像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我们国内最反动的时期出版的[\[183\]](#)）。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像1899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

泛谈革命纲领，也不像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涉及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问题而泛谈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那些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纪元”已经到来的具体情况。

作者明确地指出，阶级矛盾一般都在尖锐化，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的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应当把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当做一个尺度来衡量一下，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答应要做什么，在战争爆发时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比它表面看来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像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年）；但是，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1852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编者注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229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页。——编者注

[\[180\]](#) 《曙光》杂志（《З а р 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第1期曾刊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略论最近一次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批评了卡·考茨基在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

[\[181\]](#) 指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的代表791名。俄国代表团由24名代表组成，在大会上分裂为以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派。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与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的瓦尔德克—卢梭政府这一事件有关的“夺取公共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俄国代表团多数派投票赞成考茨基的这个含糊其词的“橡皮性”决议案，少数派支持茹·盖得提出的谴责米勒兰主义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建立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局和在布鲁塞尔设立国际局书记处的决议。

[\[182\]](#) 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0—691页）。

[\[183\]](#)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的俄译本是1918年出版的。

3. 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态。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就接触到了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国家的强力工具……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辞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清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缺点，这里暂且不谈），那么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出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实质抓住了，而就在这个根本的具

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在这场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因为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使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而他把“夺取”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后路。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1850年曾说必须“坚决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184\]](#)。考茨基就得意扬扬地问道：潘涅库克是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呢？

这不过是一种把戏，正像伯恩斯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管理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取消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前（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öst——直译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有各部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为了避免误会，我再说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今的国家。”（第725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革命问题。这无论在他那篇文章的标题上或在上所引的那段话中都讲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照他的意思：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再专门来谈。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

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破坏它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选举产生，还可以随时撤换，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¹⁾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这个绝妙的理由，证明考茨基是在重复过去伯恩施坦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阐述的英国工联的经验^[185]。据说，工联根据自己70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役下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

“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只需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来代替和怎样代替要破坏的东

西。”——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拼命的策略，而不是为完成具体的任务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时考虑到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革命的工作。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看，公社就是通过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来扩大民主制度和根绝官僚制，得以在数星期内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做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群众能过新的生活，使大多数居民无一例外地人人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²⁾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派^[186]（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¹³⁸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187]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费边派和“独立党人”（即“独立工党”¹⁴⁰，实际上始终依附于自由派的党），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重大的区别。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

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无数的后路。

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为着解决究竟由英国还是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还是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而去屠杀千百万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時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3]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编者注

^[3]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第七章 1905年和191

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184] 这句话出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告同盟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底写的，1885年恩格斯把它作为附录发表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

^[185] 指悉·维伯和比·维伯的著作《产业民主》（德文版和俄文版的书名译为《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186] 《社会主义月刊》派是围绕《社会主义月刊》杂志而形成的集团。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87] 指意大利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

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处于多数地位的中派拒绝同改良派决裂，拒绝完全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该党左翼代表于21日退出代表大会并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

第一版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月间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2册（《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彼得格勒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

《 共产主义 》 [\[188\]](#)

为东南欧国家办的共产国际杂志（德文版），维也纳，自1920年2月1日第1—2期合刊至1920年5月8日第18期

（1920年6月12日）

维也纳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是一份出色的杂志，它提供了很多有关奥地利、波兰和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令人极感兴趣的资料，同时也登载了国际运动的新闻、关于匈牙利和德国的文章、关于总任务和策略等等的文章。但是只要把杂志翻一下就立刻可以发现，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明显症候，这个杂志正害着这种幼稚病，我的那本在彼得格勒刚刚出版的小册子[\[189\]](#)分析了这种病症。

我想现在就扼要地指出《共产主义》这份出色的杂志的幼稚病的三个症候。在第6期（1920年3月1日）上登载了卢·乔·同志的一篇文章：《论议会活动问题》，编辑部称它为供讨论的文章，而库·贝·同志，即《论抵制议会的问题》一文（1920年5月8日第18期）的作者（幸而）干脆否定了这篇文章，也就是声明他不同意这篇文章。

卢·乔·的文章左得很，糟得很。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分是臆想出来的；对十分明确的历史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注意到最本质的东西（即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等）。

库·贝·同志在第14期（1920年4月17日）《德国发生的事件》一文中批评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0年3月21日的声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中也批评过这个声明。但是我们两人的批评性质根本不同。库·贝·同志是援引马克思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是这些话所指的情况跟目前的情况不同。他全盘否定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

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既然多数城市工人离开谢德曼派靠拢考茨基派，而在考茨基那个（“独立”于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党^[190]内他们又继续离开右翼靠拢左翼，即实际上靠拢共产主义运动，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是否可以一点不考虑对这样的工人采取一些过渡的、妥协的办法呢？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5月间实行的实质上正是妥协的政策，那时他们声明，不能简单地把临时政府（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等）推翻，因为苏维埃中还有工人支持它，必须首先使这些工人中的多数或者相当一部分人改变观点。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经验，是否可以不加考虑，只字不提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最后，上面提到的《共产主义》第18期上的库·贝·同志的那篇文章，特别明显、清楚、有效地揭示了他的错误在于赞同目前欧洲那种抵制议会的策略。作者在摒弃“工团主义的抵制”、摒弃“消极的”抵制的同时，臆想出一种特殊的“积极的”（哦，多么“左”呀！……）抵制，这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他的论断的错误极其严重。

作者写道：“所谓积极的抵制，就是共产党不要满足于传布反对参加选举的口号，为了有利于抵制，就要像党参加了选举那样，像党的鼓动和行动（工作、活动、行为、斗争）指望获得尽可能更多的无产阶级的选票那样，展开广泛的革命的鼓动工作。”（第552页）

这真是精彩的妙论。这比任何批评都更能置反议会派于死地。臆想出“积极的”抵制，“就像”我们参加了选举那样！！大批愚昧无知的和半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是认真地参加选举的，因为他们还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偏见，还是这些偏见的俘虏。而我们不去帮助这些愚昧无知的（虽然有时也还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小市民通过自身的经验抛掉他们的偏见，反而要回避参加议会，并以臆想出一种没有日常的资产阶级恶习的策略来作消遣！！

好极了，好极了，库·贝·同志！您为反对议会活动进行的辩护，比我的批评能更快地杜绝这种愚蠢行为。

1920年6月12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27—129页

(1) 本文是列宁针对《共产主义》杂志的错误倾向发表的评论。列宁认为，空谈马克思主义，对十分明确的历史情况不作具体分析，不去努力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缺点和病症。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188] 《共产主义》杂志（《Kommunismus》）是共产国际东欧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周刊），1920—1921年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81期。该刊主编是伊斯列尔。——292。

[189] 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95页）。

[190] 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

重要论述摘编

马克思一方面能够吸收并进一步发展同中世纪封建势力和僧侣势力斗争的“18世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吸收并进一步发展19世纪初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辩证法），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科学上最新成就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1页

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价值规律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现象，创立了这门科学，由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同前者一起用反封建主义反僧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丰富了这门科学，由于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尽管他们抱有反动观点）进一步阐明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发展了辩证方法，并把它用于或开始用于社会生活，从而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又向前跨出了几大步，所以它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1页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仅仅是19世纪一位社会主义者

——虽说是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著述，而成为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他们已经运用这个学说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实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98—299页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2页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

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1—292页

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严格的无产阶级纲领和策略就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正是无产阶级的经验，正是从德国到美国，从英国到意大利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运动1848年第一次登上广阔的政治舞台起，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形成，并且壮大起来，成为百万大军；它们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既有过右倾，也有过左倾，既反对过机会主义，也反对过无政府主义。而整个这一伟大的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证明。

《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1905年6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71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

《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1915年8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5页

被革命工人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光辉地加以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帮助我们懂得了当前事变的发展完全合乎规律。今后它还将帮助为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加明确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加扎实地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

《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1919年3月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506页

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6页

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3页

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那么在俄国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方面，那就不足为奇了。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

《我们的取消派》（1911年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129页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

《合法派同反取消派的对话》（1911年4月29日〔5月12日〕），
《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24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决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做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报告》（1918年11月2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19页

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办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63—164页

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惩治、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比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更重要。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8—209页

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致尼·达·基克纳泽》（1916年12月14日以后），《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477页

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一种现象转化为另一种现象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

《致伊·费·阿尔曼德》（1916年12月2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493页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因为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

《政论家札记》（1917年8月29日〔9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05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任何郑重的政策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根据。

《政论家札记》（1917年9月1日〔1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20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29页

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个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扩大群众的集体行动的广度，其中每一个行动单独来看，有的是进攻性的，有的是防御性的，但是总的说来，它们将导向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坚决的冲突。

《论工人运动的形式》（1914年4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9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82—83页

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902年2月1日〔1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51页

在欧洲，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统治，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几乎完全是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只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大约30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德

国也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在德国占优势的，老实说，是介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的、混合的、折中的见解。而在罗曼语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在先进工人中最流行的学说是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学说所反映的显然是小资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无产者的观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恰恰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个迅速的和完全的胜利呢？现代社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发展，革命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全部经验，都日益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则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最好的宣传。

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最近25年来的全部俄国革命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7—38页

在停滞时期必然会提到重要地位的理论工作，也同样要求我们团结一致地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动员一切力量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作斗争的时候更应如此。

《论统一》（1910年1月23日和2月1日〔2月5日和14日〕之间），《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97页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以及我党的全部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现在被提到党的整个生活的首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社会的所有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整个世界观（直到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直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原则）的深刻基础都发生了兴趣，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被革命卷入由策略问题引起的尖锐斗争中来的群众，在

缺乏公开言论的时代，提出了对一般理论知识的要求，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应当重新对这些群众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论党内状况》（不晚于1910年12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59—60页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学说。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随时可以看到引自马克思著作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得不对头的时候），这是不足为奇的。

《给同志们的信》（1917年10月17日〔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07页

列宁专题文集

责任编辑：郇中建

装帧统筹：曹 春

编辑助理：崔继新

技术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赵立新 徐林香 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7888-5

I.列… II.中… III.列宁著作—资本主义 IV.A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690 号

书 名 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

LIENING ZHUANTI WENJI

LUN ZIBENZHUYI

编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7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7888-5

目 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节选）（1895年底—1899年1月）](#)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一 社会分工](#)

[二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三 小生产者的破产](#)

[四 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五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六 马克思的实现论](#)

[七 国民收入论](#)

[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九 第一章的结论](#)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

[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03年2月）](#)

[讲演提纲](#)

[第一讲的提要](#)

[一般理论](#)

[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统治](#)

[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29日〕）](#)

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1912年11月30日〔12月 13日〕）

亚洲的觉醒（1913年5月7日〔20日〕）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年5月10日〔23日〕）

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1913年10月29日〔11月11日〕）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节选）（1914年10月1日〔14日〕）

打着别人的旗帜（节选）（1915年1月以后）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1916年1—6月）

序言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四 资本输出

五 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

六 大国瓜分世界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节选）（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银行国有化

辛迪加国有化

取消商业秘密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节选）（1918年10—11月）](#)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7月20日）](#)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20年7月19日）](#)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

[重要论述摘编](#)

[注释](#)

[返回总目录](#)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1]（节选）（1895年底—1899年1月）

第二版序言^[2]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1895—1896年大罢工^[3]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1901年的示威运动^[4]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5]。从工役制^[6]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点。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7]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

遗嘱执行人将是近似十月党人^[8]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完成革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1907年6月3日的政变^[9]，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何况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较自觉地力争达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顾一切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10]和劳动派^[11]），显然沾染上了温和谨慎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12]和自满这种立宪民主党精神，这种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13]即民粹派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³⁾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

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2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资料等等。

作 者

1907年7月

(1) 这是列宁全面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科学分析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节选的部分，列宁分析批判了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阐明了关于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其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和条件等一系列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指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行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列宁还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作了阐述，指出资本主义既有其进步的历史作用，即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也具有历史暂时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3\)](#) 这种修订可能要求写本书的续篇，要是这样，第1卷就只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结果。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14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才能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弄清楚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应当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来探索它如何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一 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生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单独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数量增加。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而且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准备好以供消费的各个工序都变成单独的生产部门。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15]、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类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178页，俄译本第526页。⁽¹⁾黑体是我们用的，以下引文中凡未另行注明者也都是我们用的）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把产品的各种加工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生产部门的那种专

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日益专业化的种种农业区域（和农业系统^[2]），不仅引起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把这种发展过程说成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是“离开道路”的结果等等，极力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极力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瓦·沃·先生在其《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分工》（1884年《欧洲通报》^[16]第7期）一文中，“否认了”“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第347页），宣称我国的社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深处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硬挤进去”（第338页）。尼·一逊先生在其《论文集》中，对于出售粮食数量的增加发表了如下的议论：“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生产的粮食是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现在吃到萨马拉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鱼佐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37页）没有任何资料，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在这里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民粹派除了否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几种较早中译本和载这一著作的1942年
解放社版《列宁选集》第1卷的封面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718页。列宁在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本论》文字，都取自《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1872年第2版；第2卷，1885年版；第3卷，1894年版）。所有引文都是列宁自己翻译的。这里所说的俄译本是指丹尼尔逊的俄译本。——编者注

[\[2\]](#) 例如，伊·亚·斯捷布特在其《俄国的大田作业原理以及改进大田作业的措施》一书中，按照主要的市场产品来区分农业的经营系统。主要的农业系统有三：（1）大田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谷物的）；（2）畜牧业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畜产品）

和（3）工厂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技术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经过技术加工的农产品。见亚·斯克沃尔佐夫《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1890年华沙版第68页及以下各页。

二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代，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¹⁾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很大，因为它既与工业的演进，也与农业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关于这一规律在俄国表现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第8章详细论述）。在瓦·沃·先生和尼·一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理论中，漏掉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人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对农业的影响。⁽²⁾

⁽¹⁾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2\)](#) 我们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2—231页。——编者注）一文中已经指出，西欧浪漫主义者和俄国民粹派对工业人口增加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一样的。

三 小生产者的破产

在此以前，我们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说，假定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而是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雇佣工人即劳动力的出卖者。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以其丧失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困化”、“破产”为前提。有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减”，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上引尼·一逊先生的书第185页，和第203、275、287、339—340页及其他各页。在瓦·沃·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不谈这个过程在俄国发展的实际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详细考察。现在是纯粹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关于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时的一般商品生产的问题。上述两位著作家也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们只从小生产者破产这一事实断定国内市场的缩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顽固地残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参看上面注释中所指的文章⁽¹⁾）。他们忘记了，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必然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又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忘记了，对市场来说，重要的决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拥有货币；早先主要经营自然经济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要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从土地

上〉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物质要素。”（《资本论》第1卷第776页）⁽²⁾“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同上，第778页）⁽³⁾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況与尼·一逊先生和瓦·沃·先生想从这个破产中作出的结论相反，是国内市场的建立，而不是缩小。如果同一位尼·一逊先生先验地宣称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表明国内市场的缩小，而又引证我们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相反论断（《论文集》第71页和第114页），那么，这只证明这位著作家有引用《资本论》的话来打自己耳光的卓越才能。

⁽¹⁾ 指《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文。——编者注

⁽²⁾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编者注

⁽³⁾ 同上书，第252页。——编者注

四 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现在谈国内市场理论的下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的价值分为下列三部分：（1）第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即补偿先前是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的形式存在的，并且只是在成品的一定部分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2）第二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即偿付工人的生活费；最后，（3）第三部分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通常认为（我们照尼·一逊先生和瓦·沃·先生那样来叙述这个问题），头两部分的实现（即找到相当的等价物，在市场上销售）并不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用于生产，第二部分用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剩余价值怎样得到实现呢？它又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得出了结论：“获得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17]的“困难的出路”。（尼·一逊《论文集》第2篇第15节整节，特别是第205页；瓦·沃·在1883年《祖国纪事》^[18]上发表的《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一文和《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179页及以下各页）上述两位著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是因为资本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产品。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民破产和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而国外市场又是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年轻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请看，仅仅根据先验的（并且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见解，就宣布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

尼·一逊先生论述实现问题时，谈的显然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论文集》中讲这个问题的地方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但是他根本不懂这个学说，并且正像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的，把这个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就是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完全和瓦·沃·先生的观点相同，而瓦·沃·先生我们决不能责备他“不懂”理论，因为即使怀疑他只懂得一点点理

论，就会是极大的不公平。两位作者都那样论述自己的学说，好像他们是第一个讲到这个问题，“靠自己的头脑”使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两人神气十足地看也不看旧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而且两人都重复着被《资本论》第2卷详尽批驳了的旧错误⁽¹⁾。两位作者把整个产品实现问题归结为额外价值的实现，显然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现并不困难。这个幼稚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最严重的错误，民粹派实现学说的其后一切错误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本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其产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制造消费品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全部困难正在这里，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看到这种困难。瓦·沃·先生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积累，而是消费，他一本正经地说：“落到少数人手里的大量物品，超过了目前发展水平下的机体消费能力（原文如此！）”（上引书第149页）；“产品过剩不是因为厂主俭朴和节欲，而是因为人的机体有局限性或者缺乏伸缩性（！！），不能用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来扩大自己的消费能力”（同上，第161页）。尼·一逊先生则竭力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好像他注意到了生产资料在实现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弄清楚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而被一系列的矛盾搞糊涂了。我们不想详细分析这一切矛盾（尼·一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03—205页），这是一件枉费精力的工作（这件工作布尔加柯夫先生⁽²⁾在其《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一书中完成了一部分，见该书1897年莫斯科版第237—245页），况且要证明刚才对尼·一逊先生的论断所作的评价，只要分析一下他所作的最终结论就行了，这个结论是：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一逊先生的这个结论（实质上是简单地重复瓦·沃·先生的结论）很清楚地表明，他既根本不了

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这样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有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道理呢？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态（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对外贸易撇开，因为把对外贸易扯在一起丝毫也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而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把问题从一国转移到数国。就是这位在对外贸易上找到了“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的尼·一逊先生，例如对工资问题是这样议论的：用直接生产者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年产品，“能从流通中取得的只是在价值上与工资总额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第203页）。试问，我们这位经济学家从哪里知道，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恰好能够由工资来实现呢？他又从哪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国外市场呢？显然，他是不能知道的，他只是撇开了国外市场问题，因为在议论可变资本的实现时，重要的是以一部分产品去替换另一部分产品，至于这种替换是在一国内还是在两国内进行，则根本无关紧要。然而讲到额外价值，他却抛开这个必要前提，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干脆回避问题，谈论国外市场。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本身是要加以说明的，即要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找到能够替换销售部分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道，在分析实现问题时，要“完全撇开”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3\)](#)。瓦·沃·先生和尼·一逊先生自以为指出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就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估计。其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决不单单对额外价值，而

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不仅在实现消费品产品时，而且在实现生产资料产品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即各个单独的生产者为他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1\)](#) 在这里，瓦·沃·先生那种越出一切著作常规的勇气特别惊人。瓦·沃·先生阐述了自己的学说并暴露出对正是论述实现问题的《资本论》第2卷毫无所知，但他立即毫无根据地宣称，他“在自己的体系中所采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经济学概论》第3篇《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资本主义规律〈原文如此！？！〉》第162页）

[\(2\)](#) 不妨提醒现在的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以及下面常常引证的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1899年曾力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他们却都顺利地“从马克思的批判家”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第2版注释）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528—529页。——编者注

五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为了弄清实现的学说，我们应当从亚当·斯密谈起，因为这个问题的错误理论是他创立的，而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亚·斯密把商品价格只分成两部分：可变资本（照他的术语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他没有把“利润”和“地租”并在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把商品价格总共算成三部分）。^[1]同样，他把全部商品，即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也分成这样两部分，并把它们直接当做社会两个阶级——工人与资本家（斯密称做企业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2]

他究竟根据什么把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抛掉呢？亚当·斯密不可能不看到这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也该归在工资和额外价值中。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例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3]马克思称斯密这个理论是“令人惊异的”。“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第2卷第366页）^[4]斯密是在“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19]”（第2版第1卷第612页）^[5]。斯密在谈到农具的价格本身分为这三个部分时，忘记加上一句：还有制造这些农具时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亚·斯密（继他之后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错误地把资本的不变部分从产品价格中排除掉，是同错误地理解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积累，也就是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即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有关的。亚·斯密在这里也抛掉了不变资本，认为所积累的即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完全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说完全用做工资，而事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做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加上工资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积累过程》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第2节《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中批判了斯密（以及李嘉图、穆勒等）的这个观点，并在那里指出：在第2卷中“将表明，亚·斯密的这个为他的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教条，甚至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第1卷第612页）^[20]。亚当·斯密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把产品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混同起来了：新创造的价值确实分为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产品的价值，则除此而外还包括不变资本。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就揭露了这个错误，他确定了创造新价值的抽象劳动和把早先存在的价值在新形态的有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有用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⁶⁾。

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时，阐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在谈到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时，已经不能坚持他那个把不变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的错误理论了。“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不占用资本就可以列入消费储备或用于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部分。”（亚·斯密的书第2篇《论储备之本性、积累和使用》第2章，第2卷第18页；俄译本第2卷第21页）这样，亚·斯密把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断定它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即（纯）收入；可是他却把资本包括在社会总收入中，把它同消费品（＝纯收入）分开。马克思就抓住了亚当·斯密的这个矛盾：既然资本不包括在产品中，资本又怎么能包括在收入中呢？（参看《资本

论》第2卷第355页) ⁽⁷⁾在这里，亚当·斯密自己不知不觉地承认了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有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且还有不变资本。在接下去的议论中，亚当·斯密遇到了另一个在实现论中有巨大意义的极重要的区别。他说：“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有用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原料，还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不论是（劳动）“价格”，“或者是”（劳动）“产品”，“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上引亚·斯密的书）这里透露出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的想法：一种劳动提供能够加入“纯收入”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提供“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加入个人消费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绝对必须区分两种消费：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投入生产）。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

至于说到亚当·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他们全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⁸⁾，并没有前进一步。因此，在关于收入的种种学说中充满着多么糊涂的观念，这一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在关于是否可能发生整个商品生产过剩的争论中，站在一方的李嘉图、萨伊、穆勒等人和站在另一方的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查默斯、基尔希曼等人，所依据的都是斯密的错误理论，因此，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公正的评论来说就是：“由于出发点不正确和问题本身的提法不正确，这种争论只会导致空洞的和烦琐的争吵。”（上引书第21页。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些争吵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

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377—404页)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1年第4版第1卷第75页。第1篇《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劳动产品在国民各阶层间进行分配的自然秩序》，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比比科夫的俄译本(1866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71页。

[\[2\]](#) 上引书第1卷第78页，俄译本第1卷第174页。

[\[3\]](#) 上引书第1卷第75—76页，俄译本第1卷第171页。

[\[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413—414页。——编者注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647页。——编者注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25—227页。——编者注

[\[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402—404页。——编者注

[\[8\]](#) 例如，李嘉图断言：“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用做计件工资，另一部分用做利润，第三部分用做地租。”(《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本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页)

六 马克思的实现论

从以上所述自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个原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一样，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对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的人来说，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原理，必须区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第I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不是由人消费而是由资本消费的物品的生产；第II部类是消费品的生产，即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仅仅这一划分，就比早先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吵更有理论意义。”（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7页）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品按其实物形式作这样的划分，而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划分，根本不谈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呢？根据什么，我们能把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纳入完全建立在产品交换价值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去呢？问题是：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关于产品在哪里和怎样出售，工人在哪里和怎样购买消费品，以及资本家在哪里和怎样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被撇开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助于这种分析并且与这种分析无关。那时我们所考察的只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值和生产的结果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Stoffersatz。——《资本论》第2卷第389页）⁽¹⁾，因此把各种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以区分，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首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即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

上的重复，没有积累。显而易见，第II部类的（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来实现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任何一部分剩余价值都不转化为资本）。其次，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第I部类）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必须交换成供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第II部类）不变资本，只有交换成生产资料，以便下年度重新投入生产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进行了交换：生产资料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因而获得生活资料，而消费品部类中的资本家则销售了自己的产品并获得进行新的生产的不变资本。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交换部分应当彼此相等，即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之和应该等于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相反，如果假定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是说有积累，那么前者就应该大于后者，因为必须有生产资料的多余部分来开始新的生产。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简单再生产。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社会产品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它的实现，部分是通过本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例如煤和铁的交流，因为其中每一种产品都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所必需的材料或工具），部分是通过直接投入生产（例如，为在本企业中重新用于采煤而开采的煤，农业中的种子等等）。至于积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来源是生产资料的剩余（它们取自本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这种剩余也要求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价值转化为资本。这种追加生产怎样同简单再生产结合的问题，我们认为无须详加考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专门考察实现论，而为了说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为了能对国内市场问题作出一定的理论结论，上面所说的就已经足够了。[\(2\)](#)

在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上，从马克思的实现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

超过消费品的增长。事实上我们看到，消费品（第II部类）中的不变资本是在同生产资料（第I部类）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进行交换。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因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应该比消费品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增长得快，而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应该增长得最快，它既要超过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的增长，也要超过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最终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说道：“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2卷第3篇）[\(3\)](#)，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思指的是经本部类资本家之间交换而实现的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4\)](#)

这里所谓更多地使用不变资本，不过是用交换价值的术语来表达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是由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所需要的材料、机器、工具、建筑物和其他一切装备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创立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时，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所组成的那部分社会财富，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里（即在制造生产资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像西尼耳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

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a）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b）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资本论》第2卷第436页，俄译本第333页）⁽⁵⁾对自己同生产的关系的这种“明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丧失殆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品。因为对个别企业来说，他所生产的物品的种类完全无关紧要（一切产品都提供“收入”），所以这种肤浅的、单个人的观点就被经济理论家用来说明整个社会，并且阻碍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是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这种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一些原理中也确认了这种矛盾，而民粹派却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所谓国内市场在缩小、资本主义不先进等等的观点。下面是其中的几

个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⁶⁾

“……实现……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 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同上，第3卷第1部分第225—226页）⁽⁷⁾ “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第3卷第1部分第232页，俄译本第194页）⁽⁸⁾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⁹⁾（第3卷第2部分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¹⁰⁾ 在所有这些原理中，只不过是确认了上面讲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已。⁽¹¹⁾ 如果从《资本论》的这些地方得出结论，说什么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实现额外价值的可能，说什么他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马克思在分析实现时指出：“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流通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¹²⁾；但是这个分析也指出了这种“限制”的真正性质，指出了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生产资料小些。其次，如果从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和不进步的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显的现实，而躲到虚无缥缈的浪漫主义幻想中去。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

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根本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13\)](#)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437—438页。——编者注

[\(2\)](#) 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389—397页。——编者注），本篇详细地研究了积累、消费品之分为必需品与奢侈品、货币流通、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对没有机会阅读《资本论》第2卷的读者，可向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叙述。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较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第407—438页）令人满意，因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制定自己的图式时很不恰当地背离了马克思，并且对马克思的理论说明得不够；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也较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叙述（《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281—295页）令人满意，因为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关于利润和地租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持有不正确的观点。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470—474、478—484页。——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489—490页。——编者注

[\(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351页。——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272—273页。——编者注

[\(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279页。——编者注

[\(9\)](#) 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21）爱·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中引证的正是这一段。自然，我们这位从马克思主义转到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者赶紧声明说，这是马克思的危机论中的矛盾，马克思这种观点“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而事实上，“矛盾”仅存在于下边两个方面之间：一方面是伯恩施坦的自负，另一方面是他的荒谬的折中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求甚解。伯恩施坦是何等地不懂得实现论，这从他十分可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似乎剩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因为请看，资本家本身及其“仆役”（原文如此！第51—52页）是不能把全部剩余产品都“消费”掉的！！（第2版注释）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548页。——编者注

[\(1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这些原理同马克思自己对实现的分析相矛盾（1898年《世间》22第6期第123页《资本主义与市场》一文）。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他在分析实现时就已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341页。——编者注

[\[13\]](#) 参看《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2—231页。——编者注）

七 国民收入论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出这个实现论在国民“消费”、国民“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中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济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亚·斯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我们在这里举几个这种糊涂观念的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有不同的表述。他说：

“甲（指一切私有主，即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业，预先把它付给工人，工人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甲这样把自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一年以后，重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用提供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必需的工资一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清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陷入日益沉重的债务和贫困之中。于是一定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工人生产十而只能消费九；或者工人只把自己的工资付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和苦难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偿付。”（迪尔《蒲鲁东传》第2卷第200页，转引自《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条目选，1896年莫斯科版第101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还是瓦·沃·先生和尼·一逊先生穷于应付的那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蒲鲁东只不过用略有特殊的形式表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实现额外价

值（按蒲鲁东的术语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困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

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刺地说：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9页，俄译本第698页，有错误）[\(1\)](#)

马克思引了一个名叫福尔卡德的庸俗经济学家反驳蒲鲁东的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他说道，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即利润，而且也包含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在反驳蒲鲁东时得出结论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自己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虽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2\)](#)这一论点，但他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正确的方法”（上引书第26页）其任务将会如何时，也讲到了国民产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国民经济科学”，——黑体是洛贝尔图斯用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如何经常用来补偿生产上使用的或损耗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作为国民收入如何用来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27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指出这一点，可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读者看到，洛贝尔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当·斯密的话，看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只字不提。他把他的理论（这个由我提出来与以往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第32页）概括成几个论点，首

先这样开始谈到国民产品的分配：“就产品是收入来说，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所用的这个术语就是通常说的额外价值〉和工资是产品分解成的部分。”（第33页）这个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的问题，因为他刚刚说过，所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洛贝尔图斯在这里没有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附带条件就径直地谈论“产品分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第49—50页及其他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提出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³⁾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事实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他在给冯·基尔希曼的第4封社会问题书简（《资本》1884年柏林版）中长篇大论地谈什么货币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自相矛盾。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它是“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⁴⁾（《资本论》第2卷序言第XXI页）⁽⁵⁾。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中（上述文集第81页）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5节《分配》）时，认为卡·亨·劳的论断是“中肯的”，而劳只是重复亚·斯密的错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几种收入。罗·迈耶尔在他写的《收入》一条（同上，第283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格纳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定义，并且坦白地承认“把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而“最困难的是区分收益（Ertrag）和收入（Einkommen）”。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懂得社会

总资本再生产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补偿的过程，就不可能谈“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把“分配”和“消费”作为同经济生活中某些独立过程和现象相应的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划分出来，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底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就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进一步的问题，由正是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式的论断、释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并且，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以后，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单独存在。剩下的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冠以名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Rohertrag）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总产品（Bruttoprodukts oder Rohprodukts）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5—696页）^[6]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7]？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从来不能成为收入的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3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阐述“收入”问题的《资本论》第3卷最末一篇中，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单独部分以名称和引用了第2卷中的这个分析^[8]。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54页。——编者注

^[2]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1875年柏林版第72页及以下各页。

^[3]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1875年柏林版第32页：“……我不得不给这个关于卓越方法的概述，加上一个与这种卓越方法相适应的至少是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理论。”

^[4] 因此卡·迪尔说洛贝尔图斯提供了“分配收入的新理论”（《政治学辞典》，《洛贝尔图斯》条，第5卷第448页）是完全错误的。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4卷第23页。——编者注

^[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

^[7] 同上书，第955页。——编者注

^[8] 见《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7篇《收入》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俄译本第688—70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41—963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出了阻碍以前的经济学家了解这个过程的一些情况（第379—382页，俄译本第698—70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53—956页。——编者注））。

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对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理论，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国外市场的原理相矛盾？

必须记住：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分析是从没有对外贸易这个假定出发的，这个假定已在上面指出，其必要性也在进行这种分析时说明了。显然，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只会把事情搅乱，对阐明问题丝毫没有帮助。瓦·沃·先生和尼·一逊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国外市场扯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这样来谈国外市场根本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掩盖他们的理论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使他们能够用这些错误“理论”支吾搪塞，而无须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事实⁽¹⁾。对他们来说，“国外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抹杀市场）发展的一种遁词，而且是更为方便的遁词，因为它还使他们可以不必去考察那些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²⁾。

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未必能用“资本家不可能消费掉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支吾过去。这里必须考察——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问题——对外贸易发展史，商品流通发展史。考察了这个历史，当然就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第二，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必须有的假定，并且事实上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不知道的市场而生产的各个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相适应经常遭到破坏。彼此互为

“市场”的各种生产部门，不是平衡发展，而是互相超越，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这决不像民粹派喜欢一本正经地断定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这只是说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不成比例。在国民资本另一种分配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能够在国内实现。但是，要使资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因此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止受到这种危机威胁的资本家不去寻求国外市场，不去寻求促进输出的补助费和奖金等等呢？

第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技术基础上的重复。地主的徭役经济、农民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者的手工艺生产就是如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规模上都没有变化，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民的村庄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业者（所谓手工业者）的附近小市场的界限。相反，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必须“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必须寻求国外市场，决不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我们从这里看到，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后两个原因也还是历史性的原因。要弄清这些原因，就必须考察各个单独的生产部门，它在国内的发展，它向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转化，——一句话，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事实，而民粹派拿国内市场 and 国外市场都“不可

能”这种毫无价值的（和毫无内容的）空话作掩护，乘机回避这些事实，是不足为怪的。

[\(1\)](#)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上引书中非常正确地指出：“直到现在，依靠农民市场的棉纺织业，还在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国民消费的绝对缩减……”（这正是尼·一逊先生所说的）“……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想象”。（第214—215页）

[\(2\)](#) 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71—76页。

九 第一章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面分析的那些与国内市场问题直接有关的理论原理总括一下。

(1) 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就是：各种原料加工（以及这一加工的各种工序）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商品）交换农产品的各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日渐形成。这样，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2) 从上述原理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正在发展的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快，它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工业中来。

(3) 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建立了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这种建立过程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小生产者从中“游离”出来的生产资料转化为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这样，甚至是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现在也需要购买这些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就是说提供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其次，现在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这种小生产者的生活资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即变成了企业主（无论是土地占有者、承包人、木材业者、厂主等都一样）雇用工人所花费的货币额的物质要素。这样，这些生活资料现在也变成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4) 如果不弄清楚下面两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的实现（因而也包括额外价值的实现）是无法说明的：（1）社会产品，如同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解为三部分而不是分解为两部分（分解为不变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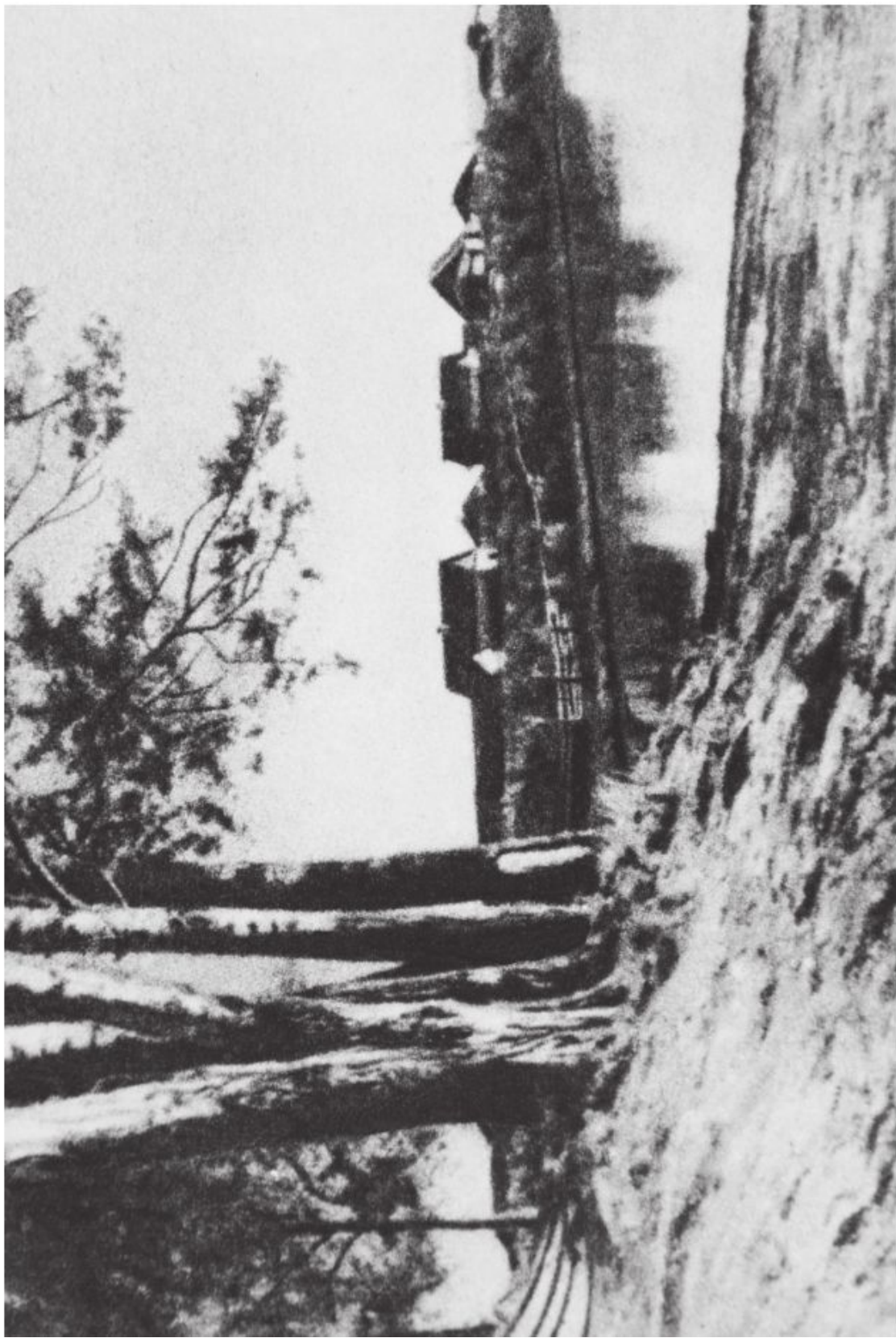
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不像亚当·斯密和继他之后而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教导的那样，只分解为可变资本+额外价值）；（2）社会产品按其实物形式应当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上消费）和消费品（个人消费）。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理论原理，就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指出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是完全错误的。

（5）马克思的实现论又阐明了国民消费和国民收入的问题。

由上述各点自然可以看出，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独提出这个问题的。国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的，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囊括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本身建立的，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因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

以下各章就是要考察答复这些问题的资料。



舒申斯克村。列宁在此流放期间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写作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对著作界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即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总结。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叙述事实的每一阶段上都力求详细指明这一点）。正是民粹派竭尽全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人，正是他们犯了过低估计（有时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的毛病，他们掩盖农民的分化、我国农业演进的资本主义性质、具有份地的农村雇佣工人与手工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掩盖资本主义最低级最恶劣的形式在著名的“手工”工业中完全占优势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可以用两个简短的论点来概括：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但这两个事实是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各种极不相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大机器工业时代才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这个高级阶段以前，还保持着手工生产与原始技术，这种技术的进步纯粹是自发的，极端缓慢的。改革后的时代，在这方面与以前各个俄国历史时代截然不同。浅耕犁与连枷、水磨与手工织布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犁与脱粒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这样完全的技术改革。这种改革的过程，根据资本主义的本质，只能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与不合比例来进行：繁荣时期被危机时期所代替，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引起另一工业部门的衰落，农业的进步在一个区域包括农业的一方面，在另一区域则包括农业的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增长，等等。民粹派著作家的许多错误，都来

源于他们企图证明这种不合比例的、跳跃式的、寒热病似的发展不是发展。[\(1\)](#)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特点，是生产资料（生产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个人消费的增长。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这个现象在农业与工业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实现的一般规律所产生的，是与这个社会的对抗性质完全适应的。[\(2\)](#)

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劳动社会化，表现在下列过程中。第一，商品生产的增长本身破坏自然经济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并把小的地方市场结合成为广大的国内市场（然后结合成为世界市场）。为自己的生产变成了为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愈高度发展，生产的这种集体性与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就愈剧烈。第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和工业中都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生产集中以代替过去的生产分散。这是我们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特点的最明显和最突出的但决非唯一的表现。第三，资本主义排挤人身依附形式，它们是以前的经济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显著，因为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在我国不仅曾经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继续存在）于农业中，并且还存在于加工工业（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采矿工业及渔业中[\(3\)](#)等等。与依附的或被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比起来，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是一种进步的现象。第四，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这种人口流动是以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所不需要的，在这些经济制度下也不可能有较大规模。第五，资本主义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在农业中最落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形式始终占着统治地位），增加大工业中心数目。第六，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居民对联盟、联合的需要，并使这些联合具有一种与以前的各种联合不同的特殊性质。资本主义破坏中世纪社会狭隘的、地方的、等级的联盟，造成剧烈的竞争，同时使整个社会分裂为几个在生产中占着不同地位的人们的大集团，大大促进了每

个这样的集团内部的联合。⁽⁴⁾第七，上述一切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旧经济制度的改变，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经济发展的跳跃性，生产方式的急剧改革及生产的高度集中，人身依附与宗法关系的一切形式的崩溃，人口的流动，大工业中心的影响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生产者性格的深刻改变，而俄国调查者们有关这方面的观察，我们已经指出过了。

我们再来谈谈民粹派经济学。我们曾经不断同这一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进行论战，现在可以把我们与他们的意见分歧的原因概述如下。第一，民粹派对正在俄国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理解，以及他们对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关系结构的观念，我们不能不认为是绝对错误的，而且在我们看来，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忽视农民经济（不论是农业的或手工业的）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矛盾。其次，至于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快慢的问题，那么这完全要看把这种发展同什么东西相比较。如果把俄国前资本主义时代同资本主义时代作比较（而这种比较正是正确解决问题所必要的），那就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这一发展速度与现代整个技术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比较，那就确实必须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⁵⁾。最后，我们与民粹派的意见分歧的最深刻原因，可以说是对社会经济过程基本观点的不同。在研究社会经济过程时，民粹派通常作这种或那种道德上的结论；他们不把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看做是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创造者；他们的目的不是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看做是利益不同与历史作用各异的这些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如果本书作者能为阐明这些问题提供若干材料，那么他就可以认为自己的劳动不是白费的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1—52、548—553页

[\[1\]](#) “我们看一看……即使我们把英国沉入海底并取其地位而代之，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尼·一逊先生《论文集》第210页）英国和美国的棉纺织工业，满足了世界消费的2/3，其所雇用的工人仅有60余万。“由此可见，即使我们获得了最大一部分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也还不能够使用它现在正不断使之丧失职业的全部劳动力。事实上，与几百万整月整月坐着没有事干的农民比较起来，英国和美国的区区60万工人又算得了什么呢。”（第211页）

“以前有历史，现在没有了。”以前，纺织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农民的分化，商业性农业及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人口的离开农业而转入工业，“成百万农民的”转入建筑业、木材业及其他各种非农业的雇佣劳动，大批人口的迁移到边疆地区，以及这些边疆地区的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不再有这类事情了！

[\[2\]](#) 对生产资料的意义的忽视和对“统计”缺乏分析的态度，使尼·一逊先生作出下述经不住任何批判的论断：“……在加工工业部门中，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新的价值，最多不会超过4—5亿卢布。”（《论文集》第328页）尼·一逊先生以三分税和摊派税的资料作为这个计算的根据，没有想一想这类资料能否包括“加工工业部门中的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此外，他采用了未包括（根据他自己的话）采矿工业的资料，并且只把额外价值与可变资本算做“新价值”。我们的理论家忘记了，在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工业部门中，不变资本对于社会也是新价值，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采矿工业、建筑业、木材业、铁路建筑等等）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进行交换。如果尼·一逊先生不把“工厂”工人人数与加工工业中按资本主义方式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混淆起来，那么他就会容易看出自己计算的错误。

[\[3\]](#) 例如，在俄国渔业主要中心之一的摩尔曼斯克沿岸，“古老的”与真正“万古神圣的”经济关系形式，就是在17世纪已经完全形成而直到最近差不多没有改变的“分成制”[\[23\]](#)。“分成制渔工同其主人的关系并不只限于捕鱼的时候；相反，这些关系包括了分成制渔工的一生，他们终身在经济上依附自己的主人。”（《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4年圣彼得堡版第2编第33页）幸而资本主义在这个部门中大概“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抱着轻蔑的态度”。“垄断……正被使用自由雇佣工人捕鱼的资本主义组织所代替。”（《俄国的生产力》第5编第2—4页）

[\[4\]](#) 参看《评论集》第91页脚注85；第198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08页和第330—332页。——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207页。——编者注

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

工商业危机延续快两年了。显然，危机愈来愈扩大，波及到新的工业部门，扩展到新的区域，并且由于又一批银行的破产而更加尖锐化了。我们的报纸从去年12月开始，每一号都以某种方式指出了危机的发展和它的毁灭性的作用。现在是提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它的意义这个总问题的时候了。这种现象，对俄国来说，还是比较新的，正像我国整个资本主义还是新的一样。在一些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那里大多数产品为销售而生产，大多数工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劳动工具，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他人，受雇于那些占有土地、工厂、机器等等的私有者，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危机是一种老现象，不时反复出现，好像慢性病发作一样。所以，对危机是可以作预言的，当资本主义在俄国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书刊里就对目前的危机作过预言。1897年底写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里曾说过：“我们现在显然正处在资本主义周期（这是一种像四季循环一样不断重复着同样一些现象的过程）的这样一个时期：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²⁾ 破产终于到来，来势凶猛，在俄国还是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可以预言的按时复发的可怕的慢性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只能跳跃式地发展，即进两步退一步（有时两步都退回来）。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是为市场生产商品。而管理生产的是单个的资本家，他们各干各的，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哪些产品。他们盲目地进行生产，所关心的只是要超过对手。这样，产品的数量就可能

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而当广大市场突然扩展到新的、未曾开拓过的、广阔的领域时，这种可能性就尤其大了。不久前我们所经历的工业“繁荣”开始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整个欧洲的资本家把魔掌伸向拥有亿万居民的世界的另一洲——亚洲，那里在此以前，只有印度和不大一部分边缘地区同世界市场有密切联系。外里海铁路已开始为资本“开辟”中亚细亚，“西伯利亚大铁路”（所谓大，不仅指它的长度，而且指建筑人无限掠夺国家钱财，无限剥削筑路工人）开辟了西伯利亚。日本已开始变成工业国，并曾试图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打开缺口，而当它发现这块肥肉的时候，这块肥肉已经一下子被英、德、法、俄以及意大利的资本家叼走了。大铁路的修筑、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昌盛，——这一切引起了工业的突然活跃，新企业的增加，对销售市场的疯狂追逐，对利润的追逐，以及新公司的创建和大批新资本（其中一部分是小资本家为数不多的储金）的投入生产。对情况不明的新市场的这种世界性的疯狂追逐，引起了巨大的破产，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要想认清这种追逐，就应当注意一下有哪些巨头参加了追逐。当人们说到“单个的企业”，“单独的资本家”时，常常忘记，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确切的。实质上，只有利润的占有才是单个的和单独的，而生产本身已成为社会的了。巨大的破产之所以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是因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受一伙唯利是图的富豪所支配。关于这一点，让我们用俄国工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近来危机已经扩展到石油工业方面。而在石油工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这样一些企业。1899年该公司售出石油产品16 300万普特，价值5 350万卢布，而1900年已售出19 200万普特，价值7 200万卢布。一年之内，一个企业的生产竟增加了1 850万卢布！这样“一个企业”的存在是靠几万以至几十万工人的联合劳动来维持的，这些工人有的开采石油，提炼石油，通过输油管、铁路、海洋和河流运输石油，有的建造这些方面所必需的机器、仓库、材料、驳船、轮船等等。这几

万工人都是为整个社会工作的，而支配他们劳动的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这一小撮富翁把群众的这种有组织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利润据为己有。（诺贝尔公司1899年所获纯利润为400万卢布，1900年为600万卢布，其中股东每5 000卢布股金可得1 300卢布，而5个董事得到的奖金共528 000卢布！）如果有几个这样的企业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夺取地盘而展开疯狂的追逐，那么，危机的到来还有什么奇怪呢？

况且，要想从企业中获得利润，就必须把商品卖出去，就必须找到主顾。而主顾应该是所有的居民，因为大企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产品。可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居民有十分之九是穷人：工资微薄的工人和大多比工人过得还要坏的农民。就这样，大工业在繁荣时期拼命大量生产，把大量产品抛向市场，而占人口多数的穷人则无力购买。机器、工具、仓库、铁路等等的数量日益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不时中断，因为人民群众仍然处于赤贫境地，而所有这些改善了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群众准备的。危机表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么，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更丰富得多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危机表明，工人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争取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俄国工人在1894—1898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争得了让步），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收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更大幅度地降低工资。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大军还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之前，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危机表明，两年前吵吵嚷嚷说破产的可能性现在变得更小了的那些社会主义者（这些人自称为“批评家”，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抄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的目光是多么短浅。

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性；它给人们的教训极其深刻，以致资产阶级报刊现在也要求加强监督了，例如对银行的监督。但任何监督也无碍于资本家在复苏时期开办一些日后必然要

破产的企业。已经破了产的原哈尔科夫土地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创办人阿尔切夫斯基，曾不择手段地弄到几百万卢布来开办和支持一些估计可能获得巨额利润的矿业企业。工业的停滞毁掉了这些银行和矿业企业（顿涅茨—尤里耶夫公司）。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的这种“毁灭”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较弱的资本家，“二等”资本家被更强的百万富翁所排挤。哈尔科夫的百万富翁阿尔切夫斯基被莫斯科的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所代替，这个更富有的资本家将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二等富翁被头等富翁代替，资本力量增大，大批小私有者破产（如小额存款人随着银行的破产而丧失全部财产），工人阶级极端贫困化，——这就是危机所造成的后果。我们还要提一提《火星报》[\[24\]](#)上所谈到的情况：资本家延长工作日，极力设法解雇有觉悟的工人，换上俯首听命的农民。

在俄国，危机的影响，一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在我们这里，工业停滞的同时，还有农民的饥饿。可以把失业的工人从城市赶到农村，但又把失业的农民赶到哪里去呢？赶走工人，原是想把不安分的人从城市里清除出去，可是，被赶走的人难道不可能使一部分农民从世代相传的那种俯首听命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并发动他们不仅提出请求，而且提出要求吗？现在工人与农民日益接近起来，这由于他们不仅都面临着失业与饥饿，而且都面临着警察的压迫，这种压迫使工人无法进行联合与自卫，使农民甚至得不到乐善好施者的救济。警察的魔掌，对于千百万丧失一切生活资料的人民，变得百倍可怕。城市的宪兵和警察，农村的地方官和巡官清楚地看到，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日益加深，他们不仅开始害怕农村食堂，而且害怕报纸上关于募捐的公告。害怕捐款！真是做贼心虚。当窃贼看到过路人施舍东西给他行窃过的那个人时，就开始感到：他们相互帮助，是要齐心协力来对付他。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72—76页

（1）列宁在本文中联系俄国出现工商业危机的经济现实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指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暴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性。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5—446页。——编者注

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25]（1903年2月）

讲演提纲

第一讲。土地问题的一般理论。资本主义农业的形成。商业性农业发展的各种形式和农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所谓的批评学派（布尔加柯夫先生，赫茨先生，大卫先生，切尔诺夫先生，马斯洛夫先生也可以算一个，还有其他人）学说的资产阶级性质，该学派企图用自然规律（如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解释为什么存在土地占有者向社会索取的贡赋。农业中资本主义的矛盾。

第二讲。农业中的小生产和大生产。

所谓的批评学派竭力抹杀小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奴隶地位。分析被该学派（莫·黑希特，卡·克拉夫基，奥哈根）完全曲解的专题研究著作。

第三讲。续上。巴登调查。调查结果完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材料。关于大资本的大地产退化的神话。农业中的机器。中等农户耕畜的极端恶化。农业中的合作社；德国1895年关于奶品协作社的大量材料。农业中的合作社和工业中的托拉斯在形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使所谓的批评学派无法理解两者的社会经济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第四讲。土地问题在俄国的提法。民粹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这种世界观作为土地民主派原始形态的历史意义。农民问题（村社^[15]和人民生产）的中心意义。农民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研究这一过程的方法及其意义。资本主义经济代替徭役经济。民粹主义观点的反动性。当前历史时期的要求：肃清农奴制残余和使农村阶级斗争自由发展。

(1) 列宁在本文中概要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理论既适用于工业，也适用于农业。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也是商品生产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产物，但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增长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在形式上不同于工业，其形成过程是不平衡的、多样的。在资本主义农业中，由于除了土地私人经营的垄断外，还有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所以除级差地租外，还存在绝对地租。

第一讲的提要

一般理论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理论，既适用于工业，也适用于农业。不要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它在农业中和工业中的不同形式混淆起来。

现在来分析一下，形成资本主义农业制度的过程有哪些基本特点和哪些特殊形式。产生这一过程的原因有两个：（1）商品生产和（2）这时，作为商品出现的，不是产品，而是劳动力。当劳动力一进入交换，整个生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形成了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的阶级。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增长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其形式不同于工业，因此，在这里应用马克思的理论可能使人觉得不正确。但是必须知道农业是以怎样的形式变成资本主义农业的。为此，首先要弄清楚两个现象：

一、商业性农业是怎样发展的？和

二、工人阶级是怎样形成的？

一、这一过程的主要现象就是工业人口迅速增长和产品运往市场。这就是说，要广泛地发展商业性农业，就必须大大增加非农业人口。这个过程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在进口粮食或出口粮食的国家都可以看到。工业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工业国家的粮食不足，也就是说，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从别国进口粮食就无法维持。在全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对粮食的需求不断提高，其结果就形成了垄断价格。

这一点对于说明地租很重要。

商业性农业的形成过程本身，同工厂工业不尽相同。在工业中，这采取简单的、直线的形式；在农业中，情况却不同：那里大多是商业性农业和非商业性农业相互掺杂，各种不同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每一个地区，运往市场的主要是某一种产品。一方面，地主的生

别是农民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又保留着自己的消费性质。

获得货币的需要，使得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转化。货币的权力不仅压迫着西欧的农民，也压迫着俄国的农民。地方自治局统计表明，甚至在宗法式经济的残余非常严重的地方，农民从属于市场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二、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就是农民分裂为下述两个阶层的过程，即（1）把农业当成工业的农场主；（2）雇佣工人。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农民的分化。特别在俄国，这个过程表现得很突出。早在封建制度时代，这个过程就为经济学家觉察到了。

形成的特点。

这个过程进行得不平衡。在雇佣工人阶级形成的同时，既有宗法制度存在，又有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形成。雇佣工人阶级同土地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这个过程的形式也就多种多样。

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统治

地租

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分为三个阶级：（1）雇佣工人，（2）土地占有者，（3）资本家。有些地方可能还不存在这种明确的划分，在研究制度时，对这些地方特点只能不予理会。

马克思认为，产品主要分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剩余产品中的某一部分，即扣除了资本的平均利润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就是地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平均利润是在竞争影响下形成的，竞争使剩余产品不是按工人人数的比例，而是按投入企业的资本总量的比例，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考察了平均利润的形成过程。在肥力不同的土地上，资本将获得不同的利润：在较坏土地上利润较少，在较好土地上利润较多，即获得超额利润。（还在马克思以前，李嘉图就奠定了地租理论的基础。）由于粮食市场价格的垄断，由于粮食数量普遍不足，价格就由较坏土地来决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同较坏土地和距离市场最远的土地相比，从较好土地或距离市场近的土地上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叫做级差地租。

地租是土地占有者从农场主那里索取的。

超额利润的数量不同可以有两种情况：（1）由于肥力不同，（2）由于资本使用不同。其次，除了土地私人经营的垄断而外，还有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这就是说，土地占有者要到粮食价格上涨时，才肯把土地租给农场主，这样他就能获得绝对地租，这种地租是一种基本的垄断。绝对地租可能是：（1）一种纯粹的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严格分析起来，它不应当叫做地租）。（2）绝对地租可以从农业资本的超额利润中产生，这是由于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农业中，技术水平较低，因此可变资本（＝创造利润的资本）所占的比重比工业中高。因而农业中的利润率应当比工业中高。而土地私有权的垄断阻碍农业中的高额利润同工业中的低额利润平均化。于是从不受平均化影响的

较高的农业利润中产生了名副其实的绝对地租。绝对地租的来源就是粮食价格的上涨。级差地租则来自产品。近几年的特点是一些新国家被吸引到商业中来，这就引起了危机。

土地价格是一种预先计算出来的地租。因此它被看做是从一定数量的资本中所得到的收入。在购买土地时，需要花费资本，这种资本可以提供平均地租这种收入。因此工业的迅速发展进程在欧洲大大抬高了地租，并使之固定下来。

不久以前出版的马斯洛夫的《俄国农业发展的条件》一书，大部分都是论述地租理论的，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所持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只是重复诸如布尔加柯夫先生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所谓马克思的“批评家们”所提出的论据。马克思曾经指出，旧的英国政治经济学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不是把它看做一个创造特殊历史条件的过程，而是看做一个创造自然条件的过程，因此就提出论断说：地租是由于较好土地必然转到较坏土地形成的。但是往往也有相反的情况，因为土地常常是能改良的。这些批评家从马克思倒退到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去了。

对地租理论的另一种狭隘理解，就是把级差地租的形成规律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结合起来，根据后一种规律，在同一块土地上，利润似乎会递次减少。李嘉图认为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的原因，是由于不可能向土地投入愈来愈多的资本。俄国的“批评家们”全都起来维护土地肥力递减的理论，在其他问题上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斯洛夫也是如此。然而为这一理论辩护的论据无非是一些俏皮话，如说什么要是不承认这个理论，那就得承认一小块土地可以养活整个国家。

马克思曾经同这种理论进行了斗争。这种理论从算术的角度来看待资本的耗费，忽视了一般经济条件，因而陷入了谬误。假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投入愈来愈多的资本，那么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但是这要以改变耕作制度为前提，而农业中的耕作制度好几个世纪都一成不变，这就使投资受到一定的限制。技术如果不发生变化，就不可能继

续投资，或者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继续投资。马克思指出，在工业中也不能在同一块土地面积上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如果企业占有一定的土地面积，那么要发展企业，就必须扩大企业。如果土地得到合理的耕种，那只会改进生产，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样使用土地不仅没有坏处，反而有好处。这个“如果”正好被那些反对马克思理论的人忽视了。于是，那位冒牌马克思主义者马斯洛夫，就能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把很多人引入歧途。在我们的时代里，有无数的例子：要后退，不前进；马斯洛夫的著作就是这样一个实例。

农业人口在绝对地减少，农业生产却在日益进步。在19世纪，这种进步是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密切相联的。它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农业中的竞争、农业市场和居民的分化已经形成。这种进步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每一个进步都引起矛盾，这些矛盾使人们无法利用新的、科学的农业的全部生产力。资本主义建立了大生产，产生了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生产力受到掠夺。人口集中于城市，使土地无人耕种，并且造成了不正常的新陈代谢。土地的耕作没有得到改善，或者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社会主义的批评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如马克思）。赫茨先生，以及后来我国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切尔诺夫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却指出，以李比希的学说为依据的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过时了。“批评家们”的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破坏了土地经营和土地肥力之间的平衡（由于城市同农村的分离），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著作家赞成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但是他们自己的材料却驳倒了他们。例如诺西希（Nossig）就是如此。根据他的材料，看来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得到补偿，没有把从土地上索取的东西归还给土地。必须有人造肥料和厩肥。要求每公顷土地平均所施

的60 000公斤肥料中有 $\frac{1}{3}$ 是天然肥料，但是在现有的耕作制度下，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总之，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影响表现如下：

它要求雇佣工人获得自由，它排斥一切旧的盘剥形式。但是农业雇佣工人依旧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压迫加重了，这就要求进行更加激烈的斗争。

资本主义大大增加了土地占有者所索取的贡赋，大大提高了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飞涨的地租又阻碍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91—98页

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最近，欧洲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比从前高得无可比拟的阶段。

在波斯，爆发了一场以独特的方式把类似俄国的解散第一届杜马[26]同类似俄国1905年底的起义结合起来的反革命运动。可耻地被日本人打败的俄国沙皇军队，正在为雪耻而卖力地替反革命效劳。哥萨克在俄国建立了讨伐、掠夺、杀戮无辜等功勋以后，接着又在波斯建立了镇压革命的功勋。尼古拉·罗曼诺夫站在黑帮地主和被罢工与内战吓破了胆的资本家的前列，疯狂地镇压波斯的革命者，这是理所当然的。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的俄国军人也不是第一次充当国际刽子手的角色了。英国一面假装置身事外，一面对波斯的反动派和专制制度拥护者采取明显的友好的中立态度，这是稍有不同的现象。英国自由派资产者被自己家里工人运动的发展激怒了，被印度革命斗争的高涨吓坏了，他们愈来愈经常、愈来愈露骨、愈来愈强烈地表明，在立宪方面阅历最深的最“文明的”欧洲政治“活动家”，在群众奋起同资本、同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即奴役、掠夺和暴力的制度作斗争的时候，竟会变成什么样的野兽。波斯的革命者在国内的处境是困难的，印度的主人和俄国的反革命政府差不多已经准备好要瓜分波斯了。但是，大不里士的顽强的斗争、似乎已经被击溃的革命者屡次在军事上转败为胜，都表明波斯王的军队即使有俄国的利亚霍夫们和英国的外交官的援助，也会遭到来自下面的极其有力的反抗。一个革命运动能在军事上反击复辟行动，迫使有这种行动的英雄们去向异族人求援，这种革命运动是会被消灭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波斯反动派取得最完全的胜利，那也只能是人民的新的愤怒的开端。

在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人^[27]领导的军队中的革命运动获得了胜利。当然，这种胜利只是胜利了一半，甚至只是胜利了一小半，因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用恢复著名的土耳其宪法的诺言暂时敷衍过去了。但是，革命的这种一半的胜利、旧政权被迫作出的这种仓猝的让步，必然会使内战发生更重要得多、更剧烈得多、能吸引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的新的转折。而内战这所学校，人民并没有白进。这是一所要经受严重考验的学校，它的全部课程必然包括反革命的胜利、凶恶的反动派的猖獗、旧政权对反叛者的野蛮镇压等等。但是，只有愚蠢透顶的书呆子和没有头脑的木乃伊才会因人民进入这个受苦的学校而痛哭流涕；这个学校教被压迫的阶级进行内战，教他们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把现代奴隶群众中的仇恨集中起来。这种仇恨长期隐藏在闭塞的、迟钝的、无知无识的奴隶的心中，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奴隶生活的屈辱，这种仇恨就会引导他们去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勋。

在印度，替“文明的”英国资本家当奴隶的当地人正巧也在最近使得他们的“老爷们”感到惶惶不安。被称为英国对印度的管理制度的暴力和掠夺是没有止境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俄国当然除外——群众都没有这样贫困，居民也没有这样经常地挨饿。自由不列颠的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最激进的活动家，像约翰·莫利（Morley）这种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立宪民主党人眼中的权威、“进步的”（实际上是在资本面前卑躬屈节的）政论界的明星，都当了印度的统治者，变成了真正的成吉思汗，他们竟能批准“安抚”他们治下的居民的一切措施，直到杀戮政治抗议者！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周报《正义报》^[28]（《Justice》）在印度竟被莫利这样一些自由派和“激进派”恶棍所查禁。当英国的国会议员、“独立工党”^[29]（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领袖凯尔一哈第胆敢来到印度，向当地人谈论民主的最起码的要求的时候，所有的英国资产阶级报刊都向这个“反叛者”狂吠起来。现在，最有影响的英国报纸都在咬牙切齿地谈论扰乱印度的“煽动者”，欢迎对印度的民主派政论家采取纯

粹俄国式的、普列韦式的法庭判决和行政镇压手段。但是，印度的市井小民开始起来卫护自己的作家和政治领袖了。英国豺狼对印度民主主义者提拉克（Tilak）的卑鄙的判决（他被判处长期流放，最近几天向英国下院提出的质询表明，印籍陪审员认为提拉克无罪，是英籍陪审员判定他有罪的！），财主的奴才向民主主义者进行的这种报复，在孟买引起了游行示威和罢工。印度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了，——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英国和俄国在印度的秩序已经好景不长了！欧洲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在这些国家中锻炼出一个日本，使它获得了保证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发展的伟大军事胜利。毫无疑问，英国人对印度的长期的掠夺，目前这些“先进的”欧洲人对波斯和印度的民主派的迫害，将在亚洲锻炼出几百万、几千万无产者，把他们锻炼得也能像日本人那样取得反对压迫者的斗争的胜利。欧洲的觉悟的工人已经有了亚洲的同志，而且其人数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

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也强有力地开展起来了。的确，对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明确的估计，因为关于这个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造反的消息却很多，但是，“新风”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某些参加殖民掠夺的人这一回已经感到惶惶不安，这可以从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举动中看出来：他们竟帮助中国的“历史政权”镇压革命者！他们也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亚洲属地的安全而担心。

但是，使法国资产阶级感到不安的不单单是亚洲的属地。在巴黎附近的维尔纳夫—圣乔治修筑街垒，枪杀修筑街垒的罢工者（7月30日（17日）星期四），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欧洲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代表资本家统治法国的激进派克列孟梭在拼命地摧毁无产阶级头脑中剩下的最后一点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幻想。军队奉“激进派”

政府的命令枪杀工人，这类事件在克列孟梭执政时恐怕比过去更多了。克列孟梭已经因此从法国社会党人那里得到了“血人”的外号，现在，当他的暗探、宪兵和将军们又在使工人流血的时候，社会党人想起了这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有一次向工人代表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和你们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是的，法国无产阶级和最极端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已经完全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了。法国工人阶级为了建立共和国和保卫共和国流过很多鲜血，而现在，在共和制度已经完全巩固的基础上，私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决战已经日益临近了。《人道报》^[30]就7月30日的事件写道：“这不是简单的屠杀，这是战役的一部分。”将军们和警察们总想向工人挑衅，想把和平的、非武装的游行示威变成大血战。但是，当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罢工者和示威者，向手无寸铁的人们进攻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反击，街垒迅速地修筑起来了，以至发生了轰动整个法国的事件。该报写道，这些用木板筑成的街垒糟糕得令人发笑。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个。重要的是第三共和国曾使修筑街垒不再风行。现在“克列孟梭又使之风行起来”，——而且他明目张胆地谈论这一点，就像“1848年6月的刽子手、1871年的加利费”明目张胆地谈论内战一样。

不只是社会党人报刊在评论7月30日的事件时追溯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日子。资产阶级的报纸穷凶极恶地攻击工人，指责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一家报纸叙述了一个能够说明双方在出事地点的情绪的小小的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插曲。当工人们抬着一个受伤的同志从指挥攻击罢工者的维尔威尔将军身边走过的时候，示威的人群中发出了喊声：“Saluez！”（“敬礼！”），于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将军就向受伤的敌人敬了礼。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现象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政治制度和工人运动的形式不同，同样的趋势有不同的表现。在美国和英国，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无产阶级缺乏任何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或者至少是缺乏比较生

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为反对托拉斯的运动的加强、社会主义运动的空前增长和有产阶级对这一运动的注意力的相应增长，表现为工人组织（有时纯粹是经济组织）转而进行有计划的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奥地利和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情况也部分相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在选举斗争上面，表现在政党的关系上面，表现为各种色彩的资产者都彼此接近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表现为法庭和警察加紧进行迫害。两个敌对阵营都在缓慢地但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组织，彼此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歧愈来愈尖锐，好像都在一声不响地聚精会神地准备进行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在罗曼语国家^[31]，如意大利，特别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为特别猛烈的、急剧的、往往简直是革命的爆发，那时无产阶级埋藏在心底的对压迫者的仇恨突然爆发出来，“和平的”议会斗争局面被真正的内战场面所代替。

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进行的。只有各个国家的工人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在一切实活动场所充分地、全面地利用一切机会。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创的特点汇入总的潮流里来，但是，在每个国家里，运动都有某种片面性的毛病，都有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某些理论上或实践上的缺点。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百万大军已经在同敌人的一系列的具体冲突中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近。这次斗争，从工人阶级方面来说，准备得将比无产者最近一次伟大起义即巴黎公社的时期要好许多倍。

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进步，以及亚洲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尖锐化，使俄国革命处于特殊的和特别困难的条件之下。俄国革命在欧洲和在亚洲都有伟大的国际同盟军，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不仅有国内的敌人，不仅有俄国的敌人，而且有国际的敌人。针对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反动活动，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不

可避免的，这种反动活动把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团结起来去反对一切人民运动，反对亚洲的、特别是欧洲的一切革命。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像大多数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至今还在幻想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推开”资产阶级，不要吓倒他们，不要产生“过分的”反动，不要造成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局面。这真是白日做梦，真是庸人的空想！在世界各先进国家里，易燃物极其迅速地增多，烈火极其明显地延烧到昨天还在沉睡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去，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活动的加强和各个国家的民族革命的尖锐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俄国的反革命没有完成而且也不能完成我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俄国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倾向于国际反无产阶级和反民主的潮流。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指靠自由派同盟者。它应当独立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向革命的完全胜利迈进：相信农民群众自己必然要用暴力来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帮助他们推翻黑帮地主和黑帮专制制度的统治，给自己提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任务，并要记住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它的胜利同国际革命运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反革命的（俄国的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少抱幻想，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多加关心！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55—163页

（1）列宁在本文中评述了亚洲国家民主革命运动的作用，指出波斯、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等亚洲国家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明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百万大军已经在同敌人的一系列具体冲突中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斗争已经愈来愈近。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活动的加强和各个国家的民族革命的尖锐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29日〕）

一

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背离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主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这两种背离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表现出来的。

单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两种倾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某些个别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的影响等等造成的。应该有一些由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所决定的、经常产生这两种倾向的根本原因。去年出版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潘涅库克所著《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Anton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Erdmann Dubber, 1909）这本小册子，是用科学态度研究这些原因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下面我们就要向读者介绍潘涅库克所作出的那些不能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结论。

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个事实本身，是周期性地产生策略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工人运动，而是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周期性地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

其次，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民经济部门是不一样的。在大工业最发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它的思想家领会马克思主义最容易、最迅速、最完整、最扎实。落后的或发展上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那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决裂。

再其次，处在矛盾中的并通过矛盾来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是经常引起分歧的根源。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而同时，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又阻碍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一方面培养和组织工人，加强他们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又压制和压迫工人，使他们走向退化和贫穷等等。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本身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而同时，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善于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些矛盾。但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那些自由派和民主派，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个荒谬的极端跳到另一个荒谬的极端。他们一会儿说一切都是由于心怀叵测的人“挑唆”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结果，一会儿又以工人政党是“和平的改良政党”来自我安慰。应当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条件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这些各

不相同的趋向，正好像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一样，既包含缓慢的演进，也包含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拒绝利用议会讲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阻碍了这样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坚强有力、很好地发挥作用的、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组织，团结成为坚持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树立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织。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们要稍微离开本题附带说明一下，潘涅库克仅仅引用了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历史中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分析，而根本没有提到俄国。即使有时觉得他是在暗示俄国，那只是因为我们这里也出现某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基本趋向，虽然俄国在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历史和经济各方面都与西欧大不相同。

最后，引起工人运动参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者至少始终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用一个样子或者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其实，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利益和捍卫自己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交替使用，时而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毫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这就是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这种政策在西欧各国愈来愈不成其为土地占有者阶级的政策，而成为整个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个变种了。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

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用心险恶的算计，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这种一定程度的文化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的飞速发展等等条件所造成的。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向所谓让步方式的转变，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例如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采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典型国家，而德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则始终采取暴力方法等等。

当这种方法盛行于德国的时候，对这种资产阶级管理方式的片面反应，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发展（90年代初的“青年派”^[32]，80年代初的约翰·莫斯特）。1890年转而采取了“让步”，这种转变照例对工人运动更加危险，因为它引起了一种同样片面的、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反应，即引起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潘涅库克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积极的实际的目的就是把工人引入歧途，在工人中间制造分裂，把工人的政策变成软弱的、始终是软弱的和昙花一现的所谓改良运动的一种软弱的附属品。”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实际上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

所有上述一类原因，在工人运动内部，在无产阶级内部，引起了策略上的分歧。况且，在无产阶级与那些同它关系密切的小资产者阶层（包括农民在内）之间，并没有隔着而且也不可能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个别人、个别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自然也就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本身策略方面的动摇。

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根据具体实践问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帮助比较年轻的国家更清楚地认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的真正阶级意义，并比较顺利地去同这些背离倾向作斗争。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63—70页

（1）列宁在本文中认为，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列宁分析了这两种倾向产生的原因，并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性质：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而同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资本主义又阻碍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而同时，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而是要把工人组织起来，逐渐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实现质的飞跃。

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乌托邦是一个希腊语词，在希腊文中，“οὐ”意为“没有”，“τόπος”意为“地方”。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

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愿望，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

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

在现代俄国，有两种政治乌托邦最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具有诱惑力而对群众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这就是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

自由派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谐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赶走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俄国，在俄国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这是一个自由的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睦相处的乌托邦。

民粹派的乌托邦，就是民粹派知识分子和劳动派¹¹农民所抱的幻想，他们以为可以用公平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或者以为在资本的统治下，在金钱的支配下，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可以维持“公平的”、“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

这两种乌托邦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在现代俄国相当根深蒂固呢？

这两种乌托邦的产生反映了这样一些阶级的利益，它们进行反对旧制度、反对农奴制、反对政治压迫，一句话，“反对普利什凯维奇

之流”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它们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乌托邦、幻想，就是这种不独立性，这种软弱性的产物。沉迷于幻想是弱者的命运。

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和十足的无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远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过去，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群众的创举和首倡精神，仇视他们那种如马克思形容19世纪欧洲一次群众运动时所说的“冲天”的气魄⁽²⁾。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俄国政治解放事业中的软弱无能的乌托邦，是那些唯利是图，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平”分享特权并把这种高贵的愿望诡称为俄国民主派“和平”胜利论的富豪们的乌托邦。自由派的乌托邦是这样一种幻想，既要战胜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而又不使他们遭受伤害，既要摧毁他们而又不使他们感到痛苦。很明显，这种乌托邦之所以有害，不仅由于它是乌托邦，而且由于它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相信这种乌托邦的群众，永远也不会争得自由；这样的群众不配享受自由；这样的群众完全应该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嘲弄。

民粹派和劳动派的乌托邦，是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小业主的一种试图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幻想。当经济解放问题也如现时政治解放问题这样成为俄国当前的迫切问题的时候，民粹派的乌托邦的害处就不亚于自由派的乌托邦的了。

但是，现在俄国所处的时代还是资产阶级改革的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改革的时代；彻底成熟了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经济解放的问题，而是政治自由即（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

即使在后面这个问题上，民粹派的乌托邦也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乌托邦在重分土地应有（和将有）什么经济结果的问题上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是农民群众，即在资产阶级农奴制的现代俄国占人口多数的群众的波澜壮阔的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在纯粹资产阶级的俄国，也像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欧洲一样，农民是不会占人口多数的）。

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它却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

民粹派和劳动派在俄国土地问题上，用来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的是，他们提出并推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重分土地的“平均制”是乌托邦，但是重分土地必须与一切旧的，即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土地占有制完全决裂，这却是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最迫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法。

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 [\(3\)](#)

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有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现在，在20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正在为此坚决奋斗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的（也许不仅是俄国一国的，而且是在20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的）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

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

自由派的乌托邦教农民群众放弃斗争。民粹派的乌托邦则反映了农民群众斗争的愿望，答应胜利以后让他们享受千万种福利，尽管这种胜利实际上只能给他们一百种福利。但是，世代处在闻所未闻的黑暗、匮乏、贫困、肮脏、被遗弃、被欺压的境遇中的奋起斗争的千百万民众，把可能得到的胜利果实夸大十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对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饰。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者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们要把资本主义新剥削者“一并”消灭掉的虚幻的冀望。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乌托邦，应当坚持本阶级的独立性。这个阶级之所以能够奋不顾身地反对封建制度，正是因为它丝毫没有“落入”那种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主，而且往往同封建主结成联盟的私有制的“网”。而农民“落入了”小商品生产的“网”；他们在顺利的历史情况下，能够做到完全消灭封建制度，但他们永远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

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129—134页

(1) 本文分析了俄国当时存在的自由派乌托邦和民粹派乌托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本质。自由派的乌托邦是想用和平的方法，不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俄国在政治自由、劳动人民的地位等方面得到重大改善。这种乌托邦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他们一方面玩弄民主的把戏，另一方面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民粹派的乌托邦则幻想用公平重分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权力的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反对一切乌托邦，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1912年11月30日〔12月13日〕）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社会民主党队伍里的某些机会主义者硬说，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发生群众的贫困化。所谓“贫困化的理论”是不正确的：群众的物质福利虽然增长很慢，但是在增长着；有产者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不是在加深，而是在缩小。

近来，这类论断的谬误已经在大众面前暴露无遗了。生活费用在不断飞涨。即使在工人进行了最顽强而且非常成功的罢工斗争的情况下，工人工资的增加还是比劳动力必要费用的增加慢得多。与此同时，资本家的财富却在飞速地增长着。

就拿德国的某些材料来说吧。——那里工人的生活状况远胜于俄国，那是由于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罢工和结社的自由，有政治自由，以及由于有几百万工会会员和几百万工人报纸的读者。

根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家从官方得来的材料，德国工人的工资，在最近30年中平均增加了25%。而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至少上涨了40%！！

食品、衣服、燃料和住房的费用都涨了。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就是说，他们确实愈来愈穷，不得不生活得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多的人栖身在地窖里和阁楼上。

但是，工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比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愈来愈快了。

在俄国没有所得税，没有关于社会富裕阶级财富增长情况的材料。我国更为悲惨的实际情况被一层帷幕，一层愚昧无知、没有公开性的帷幕遮盖起来了。

在德国有关于有产阶级财富的确切材料。例如，在普鲁士被列为第一等的、总数为100亿马克（50亿卢布）的应纳税财产，在1902年属

于1 853人所有；而在1908年则属于1 108人所有。

最大富翁的数目减少了，他们的财富却增加了。1902年，他们每个人的平均财产是500万马克（250万卢布），而1908年达到了900万马克（450万卢布）！

人们常谈到“1万个上层分子”。普鲁士“21000个上层”富翁拥有财产135亿马克，而其余130万个应纳税的财产所有者总共只拥有30亿马克。

普鲁士4个特大的百万富翁（1个公爵、1个大公、2个伯爵）1907年共有财产14 900万马克，而1908年竟达48100万马克。

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239—240页

（1）列宁在本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困化。一方面，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工人在社会收入中所得的份额日益减少，也就是说，工人的相对贫困化更为明显。

亚洲的觉醒（1913年5月7日〔20日〕）

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是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在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荷属印度^[2]，即爪哇岛及其他荷属殖民地，人口共达4 000万。

这个民主运动的代表者：第一是爪哇的人民群众，他们在伊斯兰教旗帜下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第二是资本主义在已经习惯了当地风土人情的欧洲人中间培养的当地知识分子，这些欧洲人主张荷属印度独立；第三是爪哇和其他岛上的数量很多的华侨，他们从本国带来了革命运动。

荷兰马克思主义者万拉维斯泰因在描述荷属印度的这种觉醒时指出，荷兰政府历来的暴政与专横现在正遭到土著居民群众的坚决反击和抗议。

革命前夕常见的现象出现了：各种社团和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在产生。政府加以禁止，但却激起更大的怒火，激起运动更加蓬勃的发展。例如，不久前荷兰政府解散了“印度党”^[33]，因为该党的章程和纲领提出了争取独立的要求。荷兰的“杰尔席莫尔达”^[34]（顺便说说，教权派和自由派都是赞成他们的，因为欧洲自由主义已经腐朽了！）认为这是想脱离荷兰的罪恶要求！当然，被解散了的政党在更换了名称之后又恢复了活动。

在爪哇，产生了土著人的民族协会^[35]，这个协会已有8万名会员，并组织了群众大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

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以关切、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全球各地各种形式的世界解放运动的这种气势磅礴的发展。被工人运动的力量吓坏了的欧洲资产阶级，投到反动势力、军阀、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怀抱里去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亚洲各国年轻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对群众充满信任的民主派，正在起来代替这些气息尚存但已日趋腐朽的资产阶级。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60—161页



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4号封面和该刊所载列宁《亚洲的觉醒》
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两文的中译文

(1) 列宁在本文中高度评价了亚洲被压迫被奴役国家的人民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2\)](#) 即印度尼西亚。——编者注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年5月 10日〔23日〕）

把标题中的这两个词组作对比，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不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用做本文标题的这两个词组却包含着一个辛辣的真理。

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全面、实行立宪、文明又先进的欧洲，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正在衰朽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已经衰朽的和正在衰朽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摇摇欲坠的雇佣奴隶制。

在先进的欧洲，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当今欧洲之所以先进，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而是由于不顾资产阶级的反对，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争取美好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壮大起来，只有它才能保持和传播对落后、野蛮、特权、奴隶制和人侮辱人现象的无情的仇视心理。

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活着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

欧洲资产阶级为了金融经纪人和资本家骗子的自私目的而支持亚洲的反动势力，这可以说是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腐朽的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

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那些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人！

请看一笔很简单而又很有教益的账吧。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支持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借款数目将近25000万卢布，但要按100卢布折合84卢布的行市计算。这就是说，“欧洲”资产者实际付给中国人21000万卢布；而他们向公众则要去22500万卢布。你看，在几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1500万卢布的纯利！这岂不确实是一笔很大的“纯”利吗？

要是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借款呢？中国不是建立了共和制而国会中的多数又反对这笔借款吗？

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喊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那时它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冒险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勾结起来扼杀“落后的”亚洲的共和制！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

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一胜利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65—167页

（1）列宁在本文中高度评价亚洲国家的民主革命运动，痛斥欧洲资产阶级为了金融经纪人和资本家的自私目的而支持亚洲的反动势力；指出亚洲革命人民有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同盟者，无产阶级的胜利一定能使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获得解放。

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1913年10月29日 〔11月11日〕）

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移民方式。工业迅速发展的国家大量采用机器，把落后国家排挤出世界市场，同时又把工资提高到平均工资水平以上，从落后国家招收雇佣工人。

这样，数以万计的工人就奔向几百几千俄里以外的地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强行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使他们离开穷乡僻壤去参加全世界历史性的运动，使他们面对一个强大的联合起来的国际工业主阶级。

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背井离乡；毫无疑问，资本家剥削移民工人丧尽天良。但是，只有反动派才会无视当前这种移民的进步意义。不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不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阶级斗争，就谈不到也不可能摆脱资本的压迫。也正是资本主义吸引全世界劳动群众参加这场斗争，不断打破地方生活的沉寂和保守状态，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偏见，把来到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最大的工厂和矿山的各国工人联合起来。

各国中以美国输入工人最多。下面是向美国移民的人数的材料：

1821—1830年的10年间	99 000人
1831—1840年的10年间	496 000人
1841—1850年的10年间	1 597 000人
1851—1860年的10年间	2 453 000人
1861—1870年的10年间	2 064 000人
1871—1880年的10年间	2 262 000人
1881—1890年的10年间	4 722 000人
1891—1900年的10年间	3 703 000人
1901—1909年的 9年间	7 210 000人

移民增加，十分迅速，并且有增无减。1905—1909年的5年间，平均每年到美洲的移民（这里仅指美国）达100万人以上。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即移居美国的侨民）成分的变化。1880年以前，大部分是所谓老侨民，来自文明古国英国、德国、一部分来自瑞

典。即使到了1890年，英德侨民的总数也还超过侨民总数的一半。

从1880年起，来自东欧和南欧即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的所谓新侨民开始猛增。这三个国家在美国的侨民人数如下：

1871—1880年的10年间	201 000人
1881—1890年的10年间	927 000人
1891—1900年的10年间	1 847 000人
1901—1909年的 9年间	5 127 000人

因此，在整个生活制度中农奴制残余保留得最多的旧世界最落后的国家，可以说，被强迫去学习文明。美国资本主义使落后的东欧（其中包括俄国，1891—1900年它提供的移民为594 000人，1900—1909年则为1 410 000人）的数百万工人摆脱了半中世纪状态，加入了先进的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行列。

去年出版了一本很有教益的英文书《移民与劳动》，该书作者古尔维奇作了很有意义的考察。1905年革命后，移居美国的人数激增（1905年是100万，1906年是120万，1907年是140万，1908—1909年达190万）。在俄国经历过各种罢工的工人，把更勇敢、更具有进攻性的群众性罢工的精神也带到了美国。

俄国把自己的一部分优秀工人送到国外，而本身却愈来愈落后了；美国由于从世界各国吸收了最积极、劳动力最强的工人而日益迅速向前发展⁽²⁾。

德国和美国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同，它从一个输出工人的国家变成为招收他国工人的国家。1881—1890年的10年间，自德国移居美国的达1 453 000人，1901—1909年的9年，就减少到310 000人了。1910—1911年，在德国的外国工人是695 000人，而1911—1912年就有729 000人。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人的职业和国籍的分布，就会得到下列情况：

1911—1912年德国的外籍工人(单位千)		
	在农业方面	在工业方面
共 计		
来自俄国	274	34
来自奥地利	101	162
来自其他国家	22	135
共 计	397	331
		728

国家愈是落后，它所提供的未经训练的、“干粗活的”农业工人就愈多。先进的民族可以说总是捞取好的工种，把坏的工种留给半开化的国家。欧洲（“其他国家”）总共给德国提供了157000名工人，其中 $\frac{8}{10}$ 以上（157000人中有135000人）是产业工人。落后的奥地利提供的产业工人只占 $\frac{6}{10}$ （263000人中有162000名产业工人）。最落后的俄国总共只提供 $\frac{1}{10}$ 的产业工人（308000人中有34000名产业工人）。

可见，俄国因为落后到处挨打。但是，俄国工人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民来，就更加努力地摆脱这种落后和野蛮的状态，更能给祖国的这些“可爱”特征以坚决的反击，更能紧密地同各国工人团结成一支全世界的解放力量。

资产阶级唆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千方百计分裂他们。觉悟的工人懂得，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因此他们正在竭力帮助启发落后国家的同志，并使他们组织起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95—98页

(1) 列宁在本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移民方式，即从落后国家招收雇佣工人并强行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但这种移民也具有进步意义：这些移民被强迫去学习文明，加入先进的国际无产阶级大军行列，从而使各国工人团结成一支全世界的解放力量。

(2) 除美国外，其他美洲国家也在迅速前进。去年，到美国去的移民将近25万，到巴西去的将近17万，到加拿大去的达20多万，全年共计62万。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36]（节选） （1914年10月1日〔14日〕）

报道

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性质。

为了弄清这种性质，必须研究一下以前的各次战争是怎么回事，帝国主义战争又是怎么回事。

列宁相当详细地分析了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的各次战争的性质。这些战争都是民族战争，它们总是伴随着并且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

这些战争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反映了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同封建社会的斗争。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语言自由和人民代议制的斗争，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建立这个在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上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基础。

从法国大革命起直到意大利的和普鲁士的多次战争，其性质都是如此。

民族战争的这个任务，有的由民主派本身完成，有的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完成，——这是不以战争参加者本身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使现代文明获得胜利，使资本主义繁荣昌盛，把全体人民和各个民族都吸引到资本主义方面来——这就是民族战争即资本主义初期的战争的目的。

帝国主义战争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一点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派别的社会党人之间过去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应采取的态度的决议案时，大家都一致地认为这次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战争。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达到同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们都已经提供了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自己的最高形式，输出的已经不是商品，而是资本了。资本主义在本

国范围内已经容纳不下，所以现在便来争夺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些未被占据的地盘。如果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民族战争曾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开始，那么帝国主义战争则表明资本主义的终结。

整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都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政治。

帝国主义给当前的战争打上完全不同的烙印，把它和以往所有的战争区别开来。

只有把这次战争同它的特殊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像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到的那样，我们才能弄清自己对它应采取的态度。否则我们就会搬用那些在另一种环境中、在旧的环境中使用的陈旧的概念和论据。关于祖国的概念和上面提到的把战争划分为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就属于这类陈腐的概念。

当然，就是在当前，在活生生的现实画面上也还残留着旧色彩的斑痕。例如，在所有交战国当中，唯有塞尔维亚人还在为民族生存而战。在印度和中国，觉悟的无产者也只能走民族的道路，因为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国家。如果中国为此而不得不进行进攻性战争的话，我们也只能加以支持，因为这在客观上将是进步的战争。马克思在1848年所以可以宣传对俄国的进攻性战争，道理也就在这里。

总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特征是帝国主义政治。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社会党人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的时代。当前的斗争就是为了瓜分剩下的一点地盘。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项历史任务。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这样的战争可能会爆发若干次，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完全不是过去那种战争，因此，社会党人面临的任务也在发生变化。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4—36页

(1) 列宁在报告中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指出这场战争不是过去那种民族战争，而是帝国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自己的最高形式，在本国范围内已经容纳不下，所以要争夺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些未被占据的地盘。因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特征是帝国主义政治。

打着别人的旗帜^[37]（节选）（1915年1月以后）

二

亚·波特列索夫给自己的文章加的标题是：《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他的文章^[38]登在同一期的《我们的事业》杂志^[39]上）的诡辩的根本之点，或者说，他们两人的、使他们两人得出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族自由主义的结论的根本的历史性错误，正是在这一方面。

问题在于，亚·波特列索夫举出的1859年意大利战争这个他“特别有兴趣”的例子，以及考茨基列举的历史上的许多类似的例子，“恰恰不属于”我们生活于其“交界点”的“两个历史时代”。我们正在进入（或者说已经进入，但还处在开始阶段）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现代（或第三个时代）。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叫做昨天的时代（或第二个时代）。这样，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举出例子的那个时代，我们就得把它叫做前天的时代（或第一个时代）。亚·波

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议论所以都是令人厌恶的诡辩和难以容忍的谎言，就因为它们用前天的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条件来偷换现代（第三个时代）的条件。

下面就来说明一下。

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这种分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被多次引用过，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亚·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文章里也采用了。当然，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

正是考茨基自己在一系列文章和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里（1909年出版），十分明确地描述了正在到来的第三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指出了这个时代同第二个时代（昨天的时代）的根本区别，承认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民主派的当前任务以及斗争的条件和形式已经改变。现在，考茨基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付之一炬[\[40\]](#)，而最令人难以置信地、最不体面地、最无耻地改变了立场。在上述的小册子里，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战争临近的征兆，而且谈的正是在1914年成为事实的这种战争。只要把这本小册子的好些地方同考茨基今天的大作对比一下，就足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考茨基已经背叛了

他自己原来的信念和庄严声明。在这方面，考茨基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甚至也不只是德国特有的例子），而是在危机的时刻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现代民主派整个上层的典型代表。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所举的历史上的例子，全都属于第一个时代。不但在1855年、1859年、1864年、1866年、1870年的战争时期，而且在1877年（俄土战争）和1896—1897年（土希战争和亚美尼亚骚动）时期，作为历史现象的主要客观内容的，都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或资产阶级社会摆脱各种封建制度过程中的“痉挛”。那时，在许多先进国家里，还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民主派的真正独立的、与资产阶级过度成熟和衰落的时代相适应的行动。资产阶级是当时的主要阶级，它在这些战争中，在参加这些战争的过程中，处于上升的阶段，唯有它能以压倒的力量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当时，在不同国家里，以各种有产的商品生产者阶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是进步的，有时甚至是革命的（例如1859年时意大利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而作为这个时代的总的特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就是说，它同封建制度的斗争还没有完成，没有结束。因此，现代民主派以及他们的代表马克思，当时要遵循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能够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这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去解决“哪一方获胜”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这是十分自然的。当时，在战争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国家里，人民运动是一般民主运动，也就是说，就其经济内容和阶级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此，当时无法提出别的问题，而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出现什么样的力量组合，哪一股反动的（阻碍资产阶级崛起的封建专制的）势力失败，才能给现代民主派开辟更广阔的“天地”，这是十分自然的。

而且，正如亚·波特列索夫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马克思在“估计”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而引起的国际冲突时，他所考虑的是：哪一方获胜更能有助于民族运动和一般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亚·

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的第74页)。这就是说,因某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上升到执政地位而发生军事冲突时,马克思像在1848年那样,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更“卑微的”群众,吸引整个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各贫苦阶级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扩大和加强这一运动。马克思考虑的是如何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如何使运动得到发展,正是这种考虑使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根本不同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联合民族主义自由派的策略。

第三个时代的国际冲突,在形式上仍同第一个时代的国际冲突一样,但其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已经根本改变了。客观的历史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上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已经被最反动的、衰朽的、过时的、走下坡路的、趋向没落的金融资本反对新生力量的斗争所取代。在第一个时代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人类发展生产力的支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这个框子,现在到了第三个时代,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下降的、没落的、内在死亡的、反动的阶级。现在,上升的阶级——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另一个阶级了。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抛弃了这个阶级的观点,向后倒退,重复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似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进步运动在今天依然是历史进程的客观内容。而实际上,现在要现代民主派跟着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走,是根本办不到的,不管这个资产阶级带着什么样的“色彩”。

在第一个时代,客观上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怎样在其反对衰亡的封建制度主要代表的斗争中,“利用”国际冲突使整个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派赢得最大的胜利。当时,在第一个时代,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封建制度奴役的资产阶级希望他们“自己的”封建压迫者失败,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况且,这种主要的、中心的、有全欧影响的封建堡垒是为数很少的。所以马克思才要作这样

的“估计”：在这种具体环境（形势）下，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获胜对于破坏全欧的封建堡垒更为重要。

现在，在第三个时代，全欧性的封建堡垒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当然，“利用”冲突也是现代民主派的任务，但是这种国际性的利用，与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看法相反，其目标不应当是反对某几个国家的金融资本，而应当是反对国际金融资本。而且从事利用的，也不应当是50—100年前处于上升地位的那个阶级。当时所谈的是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国际行动”（亚·波特列索夫语）；而现在，历史地产生的和客观情况提出的这种任务，已经摆在全然不同的另一个阶级面前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2—147页

（1）这是列宁批判孟什维克首领波特列索夫的错误观点的文章。在节选的部分，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判断时代特征，把法国大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时代：第一个时代（1789—1871年）是资产阶级崛起并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第二个时代（1871—1914年）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1914年以后）刚刚开始，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41]（1916年1—6月）

序言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是1916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工作条件下，我自然感到法文和英文的参考书有些不足，俄文参考书尤其缺乏。但是，论述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书^[42]，我还是利用了，而且我认为是给了它应得的重视。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作“合法”著作时不得不采用的那种伊索式的——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重读小册子里这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像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在谈到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谈到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谈到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等等问题时，我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现在，只好请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去看我那些即将重新刊印的1914—1917年间在国外写的论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第119—120页⁽²⁾上的一段文字。当时为了用书报检查通得过的形式向读者说明，资本家以及转到资本家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同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很不彻底的）怎样无耻地在兼并问题上撒谎，怎样无耻地掩饰自己的资本家的兼并政策，我不得不拿……日本做例子！细心的

读者不难把日本换成俄国，把朝鲜换成芬兰、波兰、库爾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斯兰和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作 者

1917年4月26日于彼得格勒

(1) 这是列宁系统阐述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垄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概括为五个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给帝国主义下了科学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但这种垄断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同竞争混合和并存的垄断，在垄断条件下竞争会更激烈、更残酷。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表现出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但是，如果以为这种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比从前要快得多，只是发展更加不平衡。帝国主义发展存在两种趋势：迅速发展的趋势和停滞腐朽的趋势。通过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2\)](#) 见本书第207—208页。——编者注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43]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说过，1916年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现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写一遍，而且改写也未必适当，因为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不改写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无益处，因为他们根据这本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认为合法的书的例子可以看到，甚至像在目前的美国或在法国，在不久以前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被逮捕之后，还是有可能和有必要利用共产党人还保有的一点点合法机会，来揭露社会和平主义观点和“世界民主”幻想的极端虚伪性。而在这篇序言中，我只想对这本经过检查的书作一些最必要的补充。

二

本书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之总和。

我在说明1876年和1914年瓜分世界的情况（第6章）以及说明1890年和1913年瓜分世界铁路的情况（第7章）时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些驳不倒的综合材料。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

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表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44]，以及后来美、法这些“民主的”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残暴得多、卑鄙得多的凡尔赛和约^[45]，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文丐，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却歌颂“威尔逊主义”^[46]，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得到和平和改良的反动小市民，全都揭穿了。

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上述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

压迫、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47]在1912年所估计的正是1914年爆发的这样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现在仍是一个历史见证，它彻底揭露了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可耻破产和叛变行为。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次请读者注意：这篇宣言中确切、明白、直接地谈到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的那些地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想方设法避开，就像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四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有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及其一伙，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神父。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类观点，正好完全背弃了这位著作家在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伯恩施坦、米勒兰、海德门、龚帕斯等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因此，现在“考茨基派”在全世界都同极端机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48]）和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所以要这样做，

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全世界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及其一伙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

五

关于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有必要说几句话。在本书正文中已经指出：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49]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比露骨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50]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分子和诺斯克及其一伙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51]；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80—100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52]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

1920年7月6日

在最近15—20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年）^[53]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54]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作者所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55]（俄译本1912年在莫斯科出版）。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质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茨^[56]和巴塞尔两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阐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

下面，我们准备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阐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尽管这还是值得一谈的。所引资料的出处及其他注释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的，所以放在本书的最后。[\(1\)](#)

Имперіалізмъ, какъ высшая
стаді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популярный очерк).

За послѣдніе 15-20 лѣтъ, особенно послѣ испа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1898) и англо-бурской (1899-1902) войнъ,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 также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тараго и новаго свѣта все чаще и чащ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на понятіи "имперіалізмъ" дл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переживаемой нами эпохи. Въ 1902 году въ Лондонѣ и Нью-Йоркѣ вышло въ свѣтъ сочиненіе англійскаго экономиста Дж. А. Гобсона: "Имперіалізмъ". Авторъ, стоящій на точкѣ зрѣнія буржуазнаго социаль-реформизма и пацифизма —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й, в сущности, съ перемѣненъ позиціей бывшаго марксиста Р. Каутскаго, — далъ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е и обстоятельное описаніе основна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го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имперіализма. Въ 1910 году въ Роттердамѣ вышло въ свѣтъ сочиненіе австрійскаго марксиста Рудольфа Гильфердинга: "Финансов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ъ" (рус.

1916年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手稿第1页

(按原稿缩小)

(1) 在本书中，这些已分别移至当页正文下面作为脚注。——编者注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在德国，每1 000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50人以上的大企业，1882年有3个，1895年有6个，1907年有9个。每100个工人中，这些企业的工人分别占22人、30人、37人。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在大企业中劳动的生产率要高得多。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内）来说，情况如下：在3 265 623个企业中，大企业有30 588个，只占0.9%。在1 440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570万，即占39.4%；在880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660万马力，即占75.3%；在150万千瓦电力中，它们占有120万千瓦，即占77.2%。

不到1%的企业，竟占有总数3/4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而297万个小企业（雇佣工人不超过5人的），即占总数91%的企业，却只占有7%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

德国在1907年雇用工人1 000人和1 000人以上的企业，有586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1/10（138万），它们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乎占总数的1/3（32%）。⁽¹⁾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银行使极少数最大企业的这种优势变成更强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就是说，几百万中小“业主”，甚至一部分大“业主”，实际上完全受几百个金融富豪的奴役。

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迅猛。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单独列出，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 900个（占企业总数216 180个的0.9%），它们有14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550万的25.6%），产值为56亿美元（占总产值148亿美

元的38%)。5年之后，即1909年，相应的数字如下：3 060个企业（占企业总数268 491个的1.1%），有20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660万的30.5%），产值为90亿美元（占总产值207亿美元的43.8%）。[\(2\)](#)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而这3 000个大型企业包括258个工业部门。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下。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

美国的统计材料说：在250个工业部门中有3 000个大型企业。似乎每个部门只有12个规模最大的企业。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联合制把各种行情拉平，从而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贸易的消除。第三，联合制使技术改进有可能实现，因而与‘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的企业）相比，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第四，联合制使联合企业的地位比‘单纯’企业巩固，使它在原料跌价赶不上成品跌价的严重萧条（营业呆滞，危机）时期的竞争中得到加强。”[\(3\)](#)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曼写了一部描述德国钢铁工业中“混合”（即联合）企业的专著，他说：“单纯企业由于原料价格高、成品价格低而纷纷倒闭”。结果是：

“一方面剩下几个采煤量达几百万吨的大煤业公司，它们紧密地组成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是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组成钢铁辛迪加的一些大铸钢厂。这些大型企业每年生产40万吨（一吨等于60普特）钢，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钢制品，有1万个住在工厂区集体宿舍中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专用的铁路和港口。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某些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6家大银行做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德国采矿工业确切地证实了卡尔·马克思关于集中的学说是正确的；诚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性的关税和运费率来保护采矿工业的国家。德国采矿工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 [\(4\)](#)

这就是一个诚实的（这是一个例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势必得出的结论。必须指出，他把德国似乎看得很特殊，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导致垄断，尽管时间稍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请看赫尔曼·莱维教授根据大不列颠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专著《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中的一段话：

“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包含着垄断的趋势。一方面，由于集中的结果，对每一企业必须投入大量资本，因此，新企业在必要资本额方面面临着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就使新企业难以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同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异常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地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和那些有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和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

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5\)](#)

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某些表现，同时却继续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但是，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的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我们可以从1860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个别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现在极常见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这一切无疑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垄断组织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是从19世纪70年代国际性的工业萧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

“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当时，英国建成了它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组织。在德国，这种组织同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的存在形式。”

“大转变是从1873年的崩溃时期，确切些说，是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开始的；这次萧条在欧洲经济史上持续了22年，只是在80年代初稍有间断，并在1889年左右出现过异常猛烈然而为时甚短的高涨。”

“在1889—1890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人们大力组织卡特尔来利用行

情。轻率的政策使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彩地埋葬在‘崩溃这座坟墓’里了。后来又经过了5年不景气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笼罩在工业界的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情绪了。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什么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之前的一种间歇。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它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是占领原料加工部门。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在组织焦炭辛迪加（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时，卡特尔就创造了后来基本上再没有发展的组织卡特尔的技术。19世纪末的巨大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至少在采矿和钢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的标志下发生的。当时人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6\)](#)

综上所述，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它们规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它们确定价格。它们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德国的卡特尔在1896年约有250个，在1905年有385个，参加卡特尔的企业约有12 000个[\(7\)](#)。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缩小了的数字。从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国工业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单是这12 000个最大的企业，就集中了大约占总数一半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北美合众国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185个，在1907年是250个。美国的统计把所

有的工业企业分为属于个人的和属于合伙商行、公司的。后者在1904年占企业总数的23.6%，在1909年占25.9%，即 $\frac{1}{4}$ 以上。这些企业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总数的70.6%，在1909年占75.6%，即 $\frac{3}{4}$ ；产值分别是109亿美元和163亿美元，即占总产值的73.7%和79%。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时，集中了该地区总采煤量的86.7%，到1910年则已经达到95.4%⁽⁸⁾。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导致组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1900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15 000万美元。当时发行了1亿美元的普通股票和10 600万美元的优先股票。1900—1907年，每年支付的优先股票的股息分别为：48%、48%、45%、44%、36%、40%、40%、40%，共计36 700万美元。1882—1907年的纯利为88 900万美元，其中60 600万付股息，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⁹⁾“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所有企业的职工，在1907年达210 180人。德国采矿工业中最大的企业盖尔森基兴矿业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在1908年有46 048名职工。”⁽¹⁰⁾钢铁托拉斯在1902年就生产了900万吨钢⁽¹¹⁾。它的钢产量在1901年占美国全部钢产量的66.3%，在1908年占56.1%⁽¹²⁾。它的矿石开采量，在1901年占43.9%，在1908年占46.3%。

美国政府专门委员会关于托拉斯的报告中说：“它比竞争者优越，是因为它的企业规模大，技术装备优良。烟草托拉斯从创办的时候起，就竭力在各方面大规模地采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为此目的，它收买了与烟草加工多少有关的一切发明专利权，在这方面花费了巨额款项。有许多发明起初是不适用的，必须经过在托拉斯供职的工程师的改进。在1906年年底设立了两个分公司，专门收买发明专利权。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设立了自己的铸造厂、机器厂和修理厂。设在布鲁克莱恩的一个这样的工厂有大约300名工人；这个厂对有

关生产纸烟、小雪茄、鼻烟、包装用的锡纸和烟盒等等的发明进行试验，在这里还对各种发明进行改进。”⁽¹³⁾“其他托拉斯也雇有所谓技术开发工程师（developping engineers），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明新的生产方法，进行技术改良的试验。钢铁托拉斯给那些在提高技术或减少费用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和工人以高额奖金。”⁽¹⁴⁾

德国的大工业，例如近几十年来获得巨大发展的化学工业，也是这样组织技术改良工作的。到1908年，生产集中的过程已经在这个工业中造成了两大“集团”，它们也都按自己的方式逐步走向垄断。起初，这两个集团都是由两对大工厂组成的“双边联盟”，各有资本2 000—2 100万马克：一对是美因河畔赫希斯特的前行东……颜料厂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卡塞拉公司；另一对是路德维希港苯胺苏打厂和爱北斐特的前拜尔公司。后来，一个集团在1905年，另一个集团在1908年，又各同另一个大工厂达成了协议。结果构成了两个“三边联盟”，各有资本4 000—5 000万马克，而且这两个“联盟”已经开始“接近”，“商定”价格等等。⁽¹⁵⁾

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像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蕴藏铁矿的土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它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司。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纳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著作，所谓“局外人”，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家。他给这本著作取名为《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粉饰资本主义，就应当说是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单是看看垄断者同盟为了这种“组织”而采取的种种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手段，也是大有教益的。这些手段有：（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主要手段之一”）；（2）用“同盟”方法剥夺劳动力（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3）剥夺运输；（4）剥夺销路；（5）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计划地压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人”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不惜耗费巨资，在一段时间内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在汽油工业中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把价格从40马克压到22马克，差不多压低了一半！）；（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下面就是这一过程在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中的反映。

克斯特纳写道：“甚至在纯粹经济的活动方面，也在发生某种转变，原先意义上的商业活动转变为投机组织者的活动。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善于根据自己的技术和商业经验来判断购买者需要，找到并且可以说是‘开发’潜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善于预先估计到，或者哪怕只是嗅到组织上的发展，嗅到某些企业与银行可能发生某种联系的投机天才（？！）……”

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下面我们会看到，那些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小市民式的反动批评的人，怎样“根据这一点”而梦想开倒车，恢复“自由的”、“和平的”、“诚实的”竞争。

克斯特纳说：“由卡特尔的组成引起的价格长期上涨，至今还只出现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方面，特别是煤、铁和钾碱等方面，而在成品方面则从来没有过。随之而来的收益的增加，同样也只限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对此还要作一点补充：原料（而不是半成品）加工工业不仅因组成卡特尔而获得高额利润，使那些进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工业受到损失，而且它还取得了对这一工业的一定的统治关系，这是自由竞争时代所没有的。” [\(16\)](#)

我们作了着重标记的几个字，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不愿意而且很少承认的，也是以卡·考茨基为首的当代的机会主义辩护士所竭力支吾搪塞、避而不谈的。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势力极大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

我们再举一个说明卡特尔如何经营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的原料产地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尔的产生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就特别容易。但是，如果以为在无法霸占原料产地的其他工业部门中不会产生垄断组织，那就错了。水泥工业的原料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在德国，就连这个工业也高度卡特尔化了。水泥厂联合成了区域性的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辛迪加等等。规定了垄断价格：成本为180马克的一车皮水泥，售价竟达230—280马克！企业支付12%—16%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记，现代的投机“天才”除分得股息之

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润滚进自己的腰包。为了从如此盈利的工业部门中排除竞争，垄断者甚至使用各种诡计：散布谣言，说水泥工业情况很坏；在报上登匿名广告说，“资本家们！当心，别在水泥业投资！”；最后是收买没有参加辛迪加的“局外人”的企业，付给他们6万、8万至15万马克的“出让费”⁽¹⁷⁾。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从偿付“微薄的”出让费起，直到像美国那样“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

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严重。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特点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所谓重工业，尤其是煤铁工业的特权地位，使其余工业部门“更加严重地缺乏计划性”，正如论述“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的最佳著作之一的作者耶德尔斯所承认的那样⁽¹⁸⁾。

资本主义的无耻的辩护士利夫曼说：“国民经济愈发展，就愈是转向更带冒险性的企业或国外的企业，转向需要长时间才能发展的企业，或者转向那些只有地方意义的企业。”⁽¹⁹⁾冒险性的增大，归根到底是同资本的大量增加有关，资本可以说是漫溢出来而流向国外，如此等等。同时，技术的加速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不相适应的因素、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同一个利夫曼不得不承认说：“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又会碰到技术方面的一些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组织的大变革”……如电力、航空……“在发生这种根本性的经济变动的时候，通常而且照例会有很厉害的投机事业发展起来……”⁽²⁰⁾

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我们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意义，耶德尔斯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论断：

“遭到1900年危机的，除了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有许多在今天说来结构上已经过时了的‘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起来的企业），它们是乘着工业高涨的浪头浮上来的。价格的跌落，需求的减少，使这些‘单纯’企业陷于灾难的境地，这种情况，大型的联合企业或者根本没有遇到过，或者仅仅在极短的时期内碰到过。因此，1900年的危机引起的工业集中，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873年的危机。1873年的危机虽然也起了一种淘汰作用，使一些较好的企业保存下来，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这种淘汰并没有能够使那些顺利地渡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长期地占据这种垄断地位的，是现在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中的大型企业（因为它们的技术复杂，组织分布很广，资本雄厚），而且垄断程度很高；其次是机器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某些部门的企业，不过垄断程度较低。”^[21]

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组织的实际力量 and 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

^[1] 数字是根据1911年《德意志帝国年鉴》^[57] 察恩的文章综合的。

^[2] 《美国统计汇编（1912年）》第202页。

^[3] 《金融资本》俄译本第286—287页。

^[4] 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56、278—279页。

^[5] 赫尔曼·莱维《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1909年耶拿版第286、290、298页。

^[6] 泰·福格尔施泰因《资本主义工业的金融组织和垄断组织的形成》，见《社会经济概论》1914年蒂宾根版第6部分。参看同一作者所著《英美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组织形式》1910年莱比锡版第1卷。

^[7] 里塞尔博士《德国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1912年第4版第149页；罗·利夫曼《卡特尔与托拉斯以及国民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1910年第2版第25页。

^[8] 弗里茨·克斯特纳博士《强迫加入组织。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研究》1912年柏林版第11页。

[\[9\]](#) 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值证券业的研究》1909年耶拿第1版第212页。

[\[10\]](#) 同上书，第218页。

[\[11\]](#) 齐·契尔施基博士《卡特尔与托拉斯》1903年格丁根版第13页。

[\[12\]](#) 泰·福格尔施泰因《组织形式》第275页。

[\[13\]](#) 《专门委员会委员关于烟草工业联合公司的报告》1909年华盛顿版第266页。——引自保尔·塔弗尔博士《北美托拉斯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一书，1913年斯图加特版第48页。

[\[14\]](#) 同上页脚注⑤，第48—49页。

[\[15\]](#) 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3版第547页及以下各页。据报纸报道（1916年6月），新近又成立了一个把德国整个化学工业联合起来的大型托拉斯。

[\[16\]](#) 克斯特纳的上述著作第254页。

[\[17\]](#) 路·埃施韦格《水泥》，见1909年《银行》杂志[\[58\]](#)第1期第115页及以下各页。

[\[18\]](#) 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业的关系》[\[59\]](#)1905年莱比锡版第271页。

[\[19\]](#) 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434页。

[\[20\]](#) 同上书，第465—466页。

[\[21\]](#) 耶德尔斯的著作第108页。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银行基本的和原来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来谈一谈银行业的集中。

在1907—1908年度，德国所有资本在100万马克以上的股份银行，共有存款70亿马克；到1912—1913年度，已达98亿马克。5年中增加了40%，而且这新增加的28亿马克中，有275 000万马克属于57家资本在1 000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存款在大小银行中的分配情形如下⁽¹⁾：

在存款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柏 林 9 家 大银行	其余48家 资本在 1 000万马克 以上的银行	115家资本在 100—1 000万 马克的银行	资本不到 100万 马克的 小银行
1907—8年度	47	32.5	16.5	4
1912—3年度	49	36	12	3

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大银行当中仅仅9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但是，这里还有许多情况没有考虑进去，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关于这些下面就要讲到。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计算，1913年底，存款总额约为100亿马克，而柏林9家大银行就占了51亿马克。^[60]这位作者不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银行资本，他写道：“1909年年底，柏林9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113亿马克，即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额的83%。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约30亿马克，与普鲁士国有铁路管理局同为旧大陆上资本聚集最多、而且分权程度很高的企业。”⁽²⁾

我们在提到“附属”银行的地方用了着重标记，因为这是最新资本主义集中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它们的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体系等等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用术语说，就是加入自己的康采恩。利夫曼教授写了一本500页的大“著作”，描述现代的参与和投资公司^[3]，可惜，这本书里给那些往往未经消化的原始材料加上了十分低劣的“理论”推断。^[61]关于这种“参与”制在集中方面造成的结果怎样，说得最清楚的是银行“活动家”里塞尔那本论德国大银行的著作^[62]。但是，在引用他的材料之前，我们先举一个“参与”制的具体例子。

德意志银行集团，在所有大银行集团当中，不说是最大的集团，也是最大的集团之一。要弄清楚把这一集团所有的银行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应当区分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参与”，或者说是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依附（比较小的银行对德意志银行的依附）。具体情况如下^[4]：

		第一级依附：	第二级依附：	第三级依附：
德意志 银行	始终参与·····	17家银行；	其中有9家又参与34家银行；	其中有4家又参与7家银行
	不定期参与·····	5家银行；	——	——
	间或参与·····	8家银行；	其中有5家又参与14家银行；	其中有2家又参与2家银行
	共 计·····	30家银行；	其中有14家又参与48家银行；	其中有6家又参与9家银行

在“间或”隶属于德意志银行的8家“第一级依附”的银行中，有3家国外银行：一家是奥地利的（维也纳的联营银行——Bankverein），两家是俄国的（西伯利亚商业银行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直接和间接地、全部和局部地加入德意志银行集团的，共有87家银行，这个集团所支配的资本，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共有20—30亿马克。

一家银行既然领导着这样一个集团，并且同其他6家稍小一点的银行达成协议，来办理公债之类的特别巨大、特别有利的金融业务，那么很明

显，这家银行已经不仅仅扮演“中介人”的角色，而成了极少数垄断者的同盟。

从下面我们简略地摘引的里塞尔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发展得多么迅速：

年份	柏林6家大银行拥有的机构			机构总数 ⁶³
	在德国的分行	存款部和兑换所	始终参与的德国股份银行	
1895	16	14	1	42
1900	21	40	8	80
1911	104	276	63	450

我们看到，银行渠道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面那段引文中代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个“分权”，实际上却是愈来愈多的从前比较“独立的”、确切些说是地方性的同外界隔绝的经济单位，隶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心。其实，这是集权，是垄断巨头的作用、意义和实力的加强。

在比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银行网”更密。英国，包括爱尔兰，1910年所有银行的分行共有7 151个。其中4家大银行各有400个以上的分行（447个至689个），另外还有4家大银行各有200多个分行，11家银行各有100多个分行。

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贴现银行和总公司^[64]的业务和分行网发展的情形如下⁽⁵⁾：

	分行和部所数目			资 本 额	
	在地方上	在巴黎	共计	自有的	他人的
1870年	47	17	64	200	427
1890年	192	66	258	265	1 245
1909年	1 033	196	1 229	887	4 363

为了说明现代大银行“联系”的特点，里塞尔引用了德国和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它的资本在1914年已

经达到3亿马克)收发信件的统计数字:

	信 件 数 目	
	收到的	发出的
1852年	6 135	6 292
1870年	85 800	87 513
1900年	533 102	626 043

巴黎大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的账户数目: 在1875年是28 535个, 而在1912年就增加到633 539个。[\(6\)](#)

这些简单的数字, 也许比长篇大论更能清楚地表明: 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 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账, 似乎是在从事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 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 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 通过往来账及其他金融业务, 首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 然后加以监督, 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 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 决定他们的收入, 夺去他们的资本, 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

我们刚才谈到柏林的贴现公司有3亿马克的资本。贴现公司资本增加的经过, 是柏林两家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争夺霸权斗争中的一幕。在1870年, 德意志银行还是一家新银行, 资本只有1 500万马克, 贴现公司有3 000万马克。在1908年, 前者有资本2亿, 后者有资本17 000万。到1914年, 前者的资本增加到25 000万, 后者因为同另一家第一流的大银行沙夫豪森联合银行合并, 资本就增加到了3亿。当然, 在进行这种争夺霸权的斗争的同时, 这两家银行也订立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巩固的“协定”。这种发展的进程, 使得那些在观察经济问题时决不越出最温和、最谨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围的银行专家, 也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的《银行》杂志就贴现公司资本增加到3亿马克这一点写道: “其他银行也会跟着走上这条道路的, 现在在经济上统治着德国的300人, 将会逐渐减到50人、25人甚至更少一些。不要以为最新的集中运动将仅限于银行业。各个银行间的紧密联系, 自然会使这些银行所保护的工业家的辛迪

加也接近起来…… 会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将惊奇地发现我们面前尽是托拉斯，到那时我们必须以国家垄断来代替私人垄断。然而，除了听凭事情自由发展、让股票稍稍加速这种发展以外，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责备自己的。” [\(7\)](#)

这段话是资产阶级政论界束手无策的典型表现，而资产阶级学术界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那么坦率，力图掩饰事情的本质，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见集中的后果而感觉“惊奇”，“责备”资本主义德国的政府或资本主义的“社会”（“我们”），害怕采用股票会“加速”集中，例如德国的一个“卡特尔问题”专家契尔施基就害怕美国托拉斯，“宁愿”要德国的卡特尔，因为德国的卡特尔似乎“不会像托拉斯那样过分地加速技术和经济的进步” [\(8\)](#)，——这难道不是束手无策的表现吗？

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德国没有托拉斯，“只”有卡特尔，但统治德国的，不超过300个资本巨头。而且这些巨头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在任何情况下，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有什么样不同的银行法，银行总是大大地加强并加速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形成的过程。

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里写过：“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

（俄译本第3卷下册第144页 [\(9\)](#)）我们所引用的关于银行资本的增长、关于最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数目及其账户数目的增加等材料，都具体地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这种“公共簿记”，而且不仅是资本家阶级的“公共簿记”，因为银行所收集的（即使是暂时收集的），是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其中也有小业主的，也有职员的，也有极少数上层工人的。“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从形式上看来，是从现代银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最大的银行在法国不过3家到6家，在德国有6家到8家，它们支配着几十亿几十亿的款额。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分配，就其内容来说，决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大资本（首先是最大的、垄断的资本）的利益的，因为大资本正是在民众挨饿，农业的整个发展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工业中“重工业”向其他一切工业部门收取贡赋的条件下活动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化方面，储金局和邮政机构开始同银行竞争，它们是更加“分权”的，也就是说，它们把更多的地区、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广大的居民群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下面是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收集的对比银行和储金局存款增加情况的统计材料^[10]：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银行	储金局	银行	储金局	银行	信贷协	储金局
	存款	存款	存款	存款	存款	会存款	存款
1880年	8.4	1.6	?	0.9	0.5	0.4	2.6
1888年	12.4	2.0	1.5	2.1	1.1	0.4	4.5
1908年	23.2	4.2	3.7	4.2	7.1	2.2	13.9

储金局为了支付4%和4.25%的存款利息，就必须给自己的资本找到“有利的”投资场所，如从事票据、抵押等业务。银行和储金局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失”。例如波鸿和爱尔福特的商会，就要求“禁止”储金局经营票据贴现之类的“纯”银行业务，要求限制邮政机构经营“银行”业务^[11]。银行大王好像是在担心国家垄断会不会从意料不到的地方悄悄地钻到他们身旁。不过，这种担心当然没有超出可以说是一个办事处的两个科长之间的竞争。因为储金局的几十亿资本，实际上归根到底是由同一些银行资本巨头们支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

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被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所替代，还表现在交易所作用的降低上面。《银行》杂志写道：“交易所早已不再是必要的流通中介人了，它过去曾经是，因为过去银行还不能把发行的大部分有价证券推销到自己的顾客中间去。”^[12]

“‘任何银行都是交易所’，——这是一句现代的名言。银行愈大，银行业的集中愈有进展，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13]“从前，在70年代，像年轻人那样放荡的交易所（这是对1873年交易所的崩溃^[65]，对滥设投机公司的丑事^[66]等等所作的一种“微妙的”暗示），开辟了德国的工业化时代，而现在银行和工业已经能‘独立应付’了。我国大银行对交

易所的统治……正表明德国是一个十分有组织的工业国。如果说这样就缩小了自动起作用的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而大大扩大了通过银行进行有意识的调节的范围，那么少数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方面所负的责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14]——德国教授舒尔采—格弗尼茨就是这样写的，这位教授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是各国帝国主义者眼中的权威，他力图抹杀一件“小事情”，即这种通过银行进行的“有意识的调节”，就是由极少数“十分有组织的”垄断者对大众的掠夺。资产阶级教授的任务不是暴露全部内幕，不是揭穿银行垄断者的种种勾当，而是加以粉饰。

一位更有威望的经济学家和银行“活动家”里塞尔也完全一样，他用一些言之无物的空话来回避无可否认的事实：“交易所正在愈来愈失去为整个经济和有关证券流通所绝对必需的性能，即不仅作为汇集到它那里的各种经济运动的最准确的测量器，而且作为对这些经济运动几乎自动起作用的调节器。”^[15]

换句话说，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在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性事物、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混合物的鲜明特征。人们自然要问，这种最新的资本主义是在向哪里“过渡”呢？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学者是不敢提出的。

“在30年前，不属于‘工人’体力劳动范围以内的经济工作， $\frac{9}{10}$ 都是由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来做的。现在，这种经济上的脑力工作 $\frac{9}{10}$ 都是由职员们来担任了。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银行业。”^[16]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这种供认，使人们又再次触及这样一个问题：最新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究竟是向哪里去的过渡呢？——

在少数几个经过集中过程而仍然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银行中间，达成垄断协议、组织银行托拉斯的倾向自然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强烈。美国现在已经不是9家，而是2家最大的银行，即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和摩根的银行，控制着110亿马克的资本^[17]。在德国，我们上面指出的贴现公司吞并沙夫豪森联合银行的事实，引起了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兰克福报》^[67]如下的一段评论：

“随着银行的日益集中，只能向愈来愈少的机构请求贷款了，这就使大工业更加依赖于少数几个银行集团。在工业同金融界联系密切的情况下，需要银行资本的那些工业公司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大工业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看待银行的日益托拉斯化（联合成或转变为托拉斯）；的确，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各大银行康采恩之间开始达成某种限制竞争的协议。” [\(18\)](#)

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成就还是垄断。

说到银行和工业的密切联系，那么，正是在这一方面，银行的新作用恐怕表现得最明显。银行给某个企业主贴现票据，给他开立往来账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地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也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账使银行能够愈来愈详细和充分地了解它的顾客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么，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

同时，银行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所谓人事结合也发展起来，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通过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而日益融合起来。德国经济学家耶德尔斯搜集了关于这种形式的资本集中和企业集中的极为详细的材料。柏林6家最大的银行由经理做代表，参加了344个工业公司，又由董事做代表，参加了407个公司，一共参加了751个公司。它们在289个公司中各有两个监事，或者占据了监事长的位置。在这些工商业公司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如保险业、交通运输业、饭馆、戏院、工艺美术业等等。另一方面，在这6家银行的监事会中（在1910年）有51个最大的工业家，其中有克虏伯公司的经理、大轮船公司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Hamburg—Amerika）的经理等等。在1895—1910年间，这6家银行中的每一家银行都参加了替数百个（281个至419个）工业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工作 [\(19\)](#)。

除银行同工业的“人事结合”以外，还有这些或那些公司同政府的“人事结合”。耶德尔斯写道：“它们自愿把监事职位让给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当局打交道的时候得到不少方

便〈！！〉……” “在大银行的监事会里，常有国会议员或柏林市议会的议员。”

可见，所谓大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正在通过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途径十分迅速地创立和发展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几百个金融大王之间的某种分工正在有步骤地形成：

“除了某些大工业家活动范围的这种扩大（如加入银行董事会等等）以及地方银行经理分别专管某一工业区以外，大银行领导人的专业化也有所加强。这样的专业化，只有在整个银行企业的规模很大，尤其是在银行同工业的联系很广的时候，才能设想。这种分工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把联系整个工业界的事情交给一个经理去做，作为他的专职；另一方面，每个经理都负责监督几个企业或几组在行业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有组织地监督各个企业的程度了）。某个经理专门管德国工业，甚至专门管德国西部的工业（德国西部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另一些经理则专门负责同外国和外国工业联系，了解工业家等等的个人的情况，掌管交易所业务等等。此外，银行的每个经理又往往专管某个地方或某个工业部门：有的主要是在电力公司监事会里工作，有的是在化学工厂、啤酒厂或制糖厂里工作，有的是在少数几个孤立的企业中工作，同时又参加保险公司监事会……总而言之，在大银行里，随着银行业务的扩大和业务种类的增多，领导人的分工无疑也就更加细密，其目的（和结果）是使他们稍微超出纯银行业务的范围，使他们对工业的一般问题以及各个工业部门的特殊问题更有判断力，更加懂行，培养他们在银行势力所及的工业部门中进行活动的能力。除了这一套办法以外，银行还竭力挑选熟悉工业的人物，挑选企业家、过去的官吏、特别是在铁路和采矿部门中工作过的官吏，来参加本银行的监事会”等等。[\(20\)](#)

在法国银行业里，也有这一类的机构，不过形式稍微有点不同。例如，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之一里昂信贷银行，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金融情报收集部（service des études financières）。在那里工作的经常有50多个工程师、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等。这个机构每年耗资60—70万法郎。它下面又分8个科：有的科专门收集工业企业情报，有的研究一般

统计，有的研究铁路和轮船公司，有的研究证券，有的研究财务报告等等。[\(21\)](#)

这样，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或者用尼·伊·布哈林的很恰当的说法，日益长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我们认为有必要引用在这方面最有研究的作家耶德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准确的说法：

“我们考察了全部工业联系，结果发现那些为工业工作的金融机构具有包罗一切的性质。大银行同其他形式的银行相反，同某些著作中提出的银行应当专门从事某一方面业务或某一工业部门工作，以免丧失立脚点这样的要求相反，力求在尽可能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同工业企业发生联系，力求消除各个地方或各个工业部门因各个企业历史情况不同而形成的资本分配不均现象。”“一种趋势是使银行同工业的联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另一种趋势是使这种联系更加巩固和加强；这两种趋势在六大银行中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已经在同样程度上大规模地实现了。”

在工商界经常听到有人抱怨银行的“恐怖主义”。既然大银行像下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发号施令”，那么听到这样的抱怨也就不奇怪了。1901年11月19日，柏林所谓D字银行（4家最大银行的名称都是以字母D开头的）之一，给西北德一中德水泥辛迪加管理处写了这样一封信：“兹阅贵处本月18日在某报上登载的通知，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贵辛迪加定于本月30日召开的全体大会，可能通过一些改革贵企业而为敝行所不能接受的决议。因此我们深感遗憾，不得不停发贵辛迪加所享有的贷款……但如此次大会不通过敝行不能接受的决议，并向敝行提出将来也不通过这种决议的相应保证，敝行仍愿就给予贵辛迪加以新的贷款问题举行谈判。”[\(22\)](#)

其实，这也是小资本对大资本的压迫发出的抱怨，不过这里列入“小”资本的是整整一个辛迪加罢了！大小资本之间过去的那种斗争，又在一个新的、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上重演了。当然，拥有亿万巨资的大银行企业，也能用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例如，银行设立了各种专门的技术研究会，研究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业企业来享用。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路问题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

大银行的领导人自己不会看不到，国民经济中正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但是他们在这些情况面前束手无策。

耶德尔斯写道：“凡是近几年来注意大银行经理和监事人选变更情形的人，都不会不觉察到，权力逐渐转到了一些认为积极干预工业的总的发展是大银行必要的、愈来愈迫切的任务的人物手中，于是这些人和老的银行经理在业务方面，往往也在个人方面意见愈来愈分歧。实质的问题是：银行这种信贷机构会不会因为干预工业生产过程而受到损失，会不会因为从事这种同信贷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业务，从事这种会使它比从前更受工业行情的盲目支配的业务，而牺牲掉自己的稳固的原则和可靠的利润。许多老的银行领导人都说会这样。但是，大部分年轻的领导人却认为积极干预工业问题是必然的，正像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必然会产生大银行和最新的工业银行业一样。双方的意见只有一点相同，就是大家都认为大银行的新业务还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²³⁾

旧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新资本主义是向某方面的过渡。想找到什么“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来“调和”垄断和自由竞争，当然是办不到的事情。实践家的自白，听起来和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之流的“理论家”的颂扬完全不同，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在用官场口吻颂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美妙。

大银行的“新业务”究竟是什么时候完全确立起来的，——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从耶德尔斯那里找到相当确切的答案：

“工业企业间的联系及其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机构即既集权又分权的大银行，成为国民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大概不会早于19世纪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1897年，当时许多企业实行了大‘合并’，从而根据银行的工业政策第一次采用了分权组织的新形式。也许还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更晚一些的时候，因为只有1900年的危机才大大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过程，巩固了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同工业的关系变成大银行的真正垄断，并大大地密切了和加强了这种关系。”⁽²⁴⁾

总之，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¹⁾ 阿尔弗勒德·兰斯堡《五年来的德国银行业》，见1913年《银行》杂志第8期第728页。

[\[2\]](#) 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蒂宾根版第12页和第137页。

[\[3\]](#) 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值证券业的研究》1909年耶拿第1版第212页。

[\[4\]](#) 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德国银行业中的参与制》，见1910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500页。

[\[5\]](#) 欧根·考夫曼《法国银行业》1911年蒂宾根版第356页和第362页。

[\[6\]](#) 让·莱斯居尔《法国储蓄业》1914年巴黎版第52页。

[\[7\]](#) 阿·兰斯堡《一家有3亿资本的银行》，见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426页。

[\[8\]](#) 齐·契尔施基的上述著作第128页。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686页。——编者注

[\[10\]](#) 美国全国金融委员会的材料，见1910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1200页。

[\[11\]](#) 美国全国金融委员会的材料，见1913年《银行》杂志第811、1022页；1914年第713页。

[\[12\]](#) 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316页。

[\[13\]](#) 奥斯卡尔·施蒂利希博士《货币银行业》1907年柏林版第169页。

[\[14\]](#) 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蒂宾根版第101页。

[\[15\]](#) 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4版第629页。

[\[16\]](#) 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蒂宾根版第151页。

[\[17\]](#) 1912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435页。

[\[18\]](#) 转引自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著作，见《社会经济概论》第155页。

[\[19\]](#) 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和里塞尔的上述著作。

[\[20\]](#) 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156—157页。

[\[21\]](#) 欧·考夫曼关于法国银行的文章，见1909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851页及以下各页。

[\[22\]](#) 奥斯卡尔·施蒂利希博士《货币银行业》1907年柏林版第147页。

[\[23\]](#) 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183—184页。

[\[24\]](#) 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181页。

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希法亭写道：“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做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¹⁾

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这个定义的这一章的前两章里，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作用。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现在我们应当来叙述一下，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经营”怎样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应当指出，德国（而且不只是德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如里塞尔、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辩护士。对于寡头形成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数量，寡头和议会的联系等等，他们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盖和粉饰。他们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讲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词句，号召银行经理们拿出“责任心”，赞扬普鲁士官员们的“尽职精神”，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监督”法案、“管理”法案的细枝末节，玩弄无谓的理论游戏，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商业是收集财富、保管财富、把财富供人支配的一种经营活动”⁽²⁾（着重号和黑体是该教授著作中原有的）……这样说来，商业在不知交换为何物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有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下去！

但是，有关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的统治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太触目惊心，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现了这样

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毕竟还是对金融寡头作了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评，当然是小市民式的批评。

应当作为主要之点提出的是前面已经简略谈到的“参与制”。德国经济学家海曼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了这一点，请看他是怎样描述问题的实质的：

“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直译是“母亲公司”），总公司统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女儿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如此等等。这样，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事实上，拥有50%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800万资本。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么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1 600万、3 200万以至更多的资本。”^[3]

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一个股份公司的业务^[4]，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较先进的或比较老、比较“有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准许发行票额较小的股票。德国法律不准许发行1 000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国金融巨头看见英国法律准许发行一英镑（等于20马克，约合10卢布）的股票，就很羡慕。1900年6月7日，德国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门子，在帝国国会中声称：“一英镑的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5]这个商人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同那位被认为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不光彩的作家^[68]比起来，显然要深刻得多，“马克思主义”得多，那位作家竟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

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齷齪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对女儿公司是不担负责任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去“实施”。下面是我们从1914年德国《银行》杂志5月号抄下来的一个例子：

“卡塞尔的弹簧钢股份公司在几年以前算是德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后来因为管理得很糟糕，股息从15%跌到0%。原来，董事会没有通知股东就出借了600万马克给自己的一个女儿公司哈西亚，而哈西亚的名义资本只有几十万马克。这笔几乎比母亲公司的股份资本大两倍的借款，根本没有记入母亲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法律上，这样的隐瞒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可以隐瞒整整两年，因为这样做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商业法。以负责人的资格在这种虚假的资产负债表上签字的监事长，至今仍旧是卡塞尔商会的会长。这笔借款被发现是个错误〈错误这两个字，作者应当加上引号〉，知道底细的人开始把‘弹簧钢’的股票脱手而使股票价格几乎下跌了100%，在这以后很久，股东们才知道有借款给哈西亚公司这回事……

这个在股份公司里极常见的、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最新技术，不但使董事会能够把所干的冒险勾当瞒过普通的股东，而且使主要的当事人在冒险失败的时候，能够用及时出卖股票的办法来推卸责任，而私人企业家却要用自己的性命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

许多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跟中世纪一种有名的隐迹稿本一样，要先把上面写的字迹擦掉，才能发现下面的字迹，看出原稿的真实内容。”（隐迹稿本是涂掉原来的字迹、写上别的内容的一种羊皮稿本。）

“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令人捉摸不透的办法，是成立女儿公司或合并女儿公司，把一个统一的企业分成几部分。从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现在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公司简直是一种例外。”^[6]

作者举出了著名的电气总公司（即A. E. G.，这个公司我们以后还要讲到），作为极广泛地采用这种办法的最大垄断公司的例子。据1912年的计算，这个公司参与了175—200个公司，自然也就统治了这些公司，总共掌握了大约15亿马克的资本。^[7]

好心的——即怀有维护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好心的——教授和官员们用来吸引公众注意的种种有关监督、公布资产负债表、规定一定的资产负债

表格式、设立监察机构等等的条例，在这里根本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谁也不能禁止股票的买卖、交换和典押等等。

“参与制”在俄国大银行里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欧·阿加德提供的材料作出判断。阿加德曾在俄华银行^[70]任职15年，他在1914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十分贴切，叫做《大银行与世界市场》^[8]。作者把俄国大银行分为两大类：（a）“参与制”下的银行，（b）“独立的”银行，然而他把“独立”任意地解释为不依附于国外银行。作者又把第一类分为三小类：（1）德国参与的，（2）英国参与的，（3）法国参与的，即指分别属于这三个国家的最大的国外银行的“参与”和统治。作者把银行资本分为“生产性”的投资（投入工商业的）和“投机性”的投资（投入交易所业务和金融业务的），他抱着他那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似乎可以把第一种投资和第二种投资分开，并且消除第二种投资。

作者提供的材料如下：

各银行的资产(根据1913年10—11月的表报)
(单位百万卢布)

俄 国 银 行 种 类	所投的资本		
	生产性的	投机性的	共 计
(a 1)4家银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俄罗斯银行、国际银行、贴现银行·····	413.7	859.1	1 272.8
(a 2)2家银行:工商银行、俄英银行·····	239.3	169.1	408.4
(a 3)5家银行:俄亚银行、圣彼得堡私人银行、亚速海—顿河银行、莫斯科联合银行、俄法商业银行·····	711.8	661.2	1 373.0
(11家银行)总 计·····(a) =	1 364.8	1 689.4	3 054.2
(b)8家银行:莫斯科商人银行、伏尔加—卡马银行、容克股份银行、圣彼得堡商业银行(前瓦韦尔贝尔格银行)、莫斯科银行(前里亚布申斯基银行)、莫斯科贴现银行、莫斯科商业银行、莫斯科私人银行·····	504.2	391.1	895.3
(19家银行)共 计·····	1 869.0	2 080.5	3 949.5

3

从这些材料看来，在近40亿卢布的大银行“活动”资本当中，有 $\frac{3}{4}$ 以上，即30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国外银行的女儿公司的那些银行；它们主要是巴黎的银行（著名的三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总公司）和柏林的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在1906—1912年间，把资本由4 400万卢布增加到9 800万卢布，把准备金由1 500万卢布增加到3 900万卢布，“其中有 $\frac{3}{4}$ 是德国的资本”；前一家银行属于柏林德意志银行的康采恩，后一家银行属于柏林贴现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对于柏林的银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国股东软弱无力，感到十分愤慨。自然，输出资本的国家总是捞到油水，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

压存了一年，然后以193%的行情，即几乎高一倍的行情售出，“赚了”约600万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希法亭所说的“创业利润”。

据该书作者计算，彼得堡各最大银行的全部“实力”为823 500万卢布，即将近82.5亿；同时作者又把各个国外银行的“参与”，确切些说，各个国外银行的统治，划分如下：法国银行占55%，英国银行占10%，德国银行占35%。据作者计算，在这823 500万职能资本当中，有368 700万，即40%以上用于各辛迪加，即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石油工业辛迪加、冶金工业辛迪加、水泥工业辛迪加。可见，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在俄国也有了长足的进展。^[71]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下面是希法亭从美国托拉斯“经营”的无数实例中举出的一个例子：1887年哈夫迈耶把15个小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糖业托拉斯。这些小公司的资本总额为650万美元，而这个托拉斯的资本，按美国的说法，是“掺了水”的，竟估定为5 000万美元。这种“过度资本化”是预计到了将来的垄断利润的，正像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就购买愈来愈多的蕴藏铁矿的土地一样。果然，这个糖业托拉斯规定了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额的收入，竟能为“掺水”7倍的资本支付10%的股息，也就是为创办托拉斯时实际投入的资本支付将近70%的股息！到1909年，这个托拉斯的资本为9 000万美元。在22年内，资本增加了十倍以上。

法国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反对法国金融寡头》——利西斯一本名著的标题，1908年出了第5版），只是在形式上稍有不同。4家最大的银行在发行有价证券方面享有不是相对的垄断权，而是“绝对的垄断权”。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垄断保证它们从发行证券获得垄断利润。在借债时，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额的90%；10%被银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银行从4亿法郎的中俄债券中得到8%的利润，从8亿法郎的俄国债券（1904年）中得到10%的利润，从6 250万法郎的摩洛哥债券（1904年）中得到18.75%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利西斯说：“法国人是欧洲的高利贷

者。”全部经济生活条件都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蜕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口、工商业和海运都发生停滞的情况下，“国家”却可以靠放高利贷发财。“代表800万法郎资本的50个人，能够支配4家银行的20亿法郎。”我们谈过的“参与”制度，也造成同样的结果：最大银行之一的总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为女儿公司埃及精糖厂发行了64 000张债券。发行的行情是150%，就是说，银行在每一个卢布上赚了50个戈比。后来发现这个女儿公司的股息是虚拟的，这样就使“公众”损失了9 000万至1亿法郎；“总公司有一个经理是精糖厂的董事”。难怪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结论说：“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10\)](#)

作为金融资本主要业务之一的有价证券发行业，赢利极大，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重大的作用。德国的《银行》杂志写道：“在发行外国债券的时候担任中介人，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国内没有任何一种生意能够获得哪怕是同它相近的利润。”[\(9\)](#)

“没有任何一种银行业务能够获得像发行业务那么高的利润。”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发行工业企业证券的利润每年平均如下：

1895年——38.6%	1898年——67.7%
1896年——36.1%	1899年——66.9%
1897年——66.7%	1900年——55.2%

“在1891—1900年的10年间，仅靠发行德国工业证券‘赚到’的钱就有10亿以上。”[\(11\)](#)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附于自己的好机会。”[\(12\)](#)

请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德的联合矿业股份公司，是在1872年创办的。发行的股份资本将近4 000万马克，而在第一个年度获得12%的股息时，股票行情就涨到170%。金融资本捞到了油水，稍稍地赚了那么2 800万马克。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个把资本很顺利地增加到3亿马克的德国最大的银行贴现公司。后来联合公司的股息降到了零。股东们只好同意“冲销”资本，也就是损失一部分资本，以免全部资本损失。经过多次“整理”，在30年中，联合公司的账簿上消失了7 300多万马克。“现在，这个公司原先的股东们手里的股票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5%了”⁽¹³⁾，而银行在每一次“整理”中却总是“赚钱”。

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抵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埃施韦格称做“泥潭”的局面：买卖城郊土地的狂热投机，建筑公司的倒闭（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诺尔公司的倒闭，这个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帮助，弄到了1亿马克的巨款，而这家银行当然是通过“参与”制暗地里在背后进行了活动，结果银行“总共”损失了1 200万马克就脱身了），以及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破产，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当局勾结起来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¹⁴⁾

欧洲的教授和善良的资产者一向装腔作势地对之表示痛心疾首的“美国风气”，在金融资本时代简直成了各国各大城市流行的风气。

1914年初，在柏林传说要组织一个“运输业托拉斯”，即由柏林的城市电气铁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这三个运输企业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银行》杂志写道：“当公共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转到其他两个运输公司手里的消息传出时，我们就知道有这种打算了。……完全可以相信，抱着这种目的的人希望通过统一调整运输业来节省一些费用，最终能使公众从中得到些好处。但是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因为站在这

个正在创建的运输业托拉斯背后的是这样一些银行，它们可以任意使自己所垄断的交通运输业服从自己的土地买卖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这件事情，就会相信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在创办城市电气铁路公司的时候，鼓励创办该公司的那家大银行的利益就已经渗透进来了。就是说，这个运输企业的利益和土地买卖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了。因为这条铁路的东线要经过银行的土地，当该路的建设已经有保证时，银行就把这些土地卖出去，使自己和几个合伙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15]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在德国经济著作中，通常是阿谀地赞美普鲁士官员的廉洁，而影射法国的巴拿马案件^[72]或美国政界的贿赂风气。但是事实是，甚至专论德国银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书刊，也不得不经常谈到远远越出纯银行业务范围的事情，例如，针对官员们愈来愈多地转到银行去服务这件事，谈到了“钻进银行的欲望”：“暗地里想在贝伦街（柏林街名，德意志银行的所在地）钻营一个肥缺的官员，他们的廉洁情况究竟怎样呢？”^[16]《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在1909年写了《曲意逢迎的经济影响》一文，其中谈到威廉二世的巴勒斯坦之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结果，即巴格达铁路^[73]的建筑，这一不幸的‘德意志进取精神的大事件’，对于德国受‘包围’一事应负的责任，比我们所犯的一切政治错误应负的责任还要大”

（所谓“包围”是指爱德华七世力图孤立德国、用帝国主义的反德同盟圈来包围德国的政策）^[17]。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埃施韦格，在1911年写了一篇《财阀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国官员弗尔克尔的事情。弗尔克尔当过卡特尔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很卖力气，不久以后他却在最大的卡特尔——钢铁辛迪加中得到了一个肥缺。这类决非偶然的事情，迫使这位资产阶级作家不得不承认说，“德国宪法所保证的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了失去内容的空话”，在现有的财阀统治下，“即使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们免于变成非自由民的民族”^[18]。

说到俄国，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报纸都登载过一个消息，说信用局局长达维多夫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到一家大银行任职去

了，按照合同，他在几年里所得的薪俸将超过100万卢布。信用局是个“统一全国所有信用机关业务”的机关，它给了首都各银行总数达8—10亿卢布的津贴。[\(19\)](#)—— —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至于这一过程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材料来判断。

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20\)](#)上发表了关于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最详尽最完备的对照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曾屡次被经济学著作分别引用过。[\[75\]](#)现将4个10年中的总计分列如下：

10年证券发行额(单位十亿法郎)

1871—1880年	76.1
1881—1890年	64.5
1891—1900年	100.4
1901—1910年	197.8

在19世纪70年代，全世界证券发行总额增加了，特别是由于普法战争以及德国战后滥设投机公司时期发行债券而增加了。大体说来，在19世纪最后3个10年里，增加的速度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快，直到20世纪的头10年才大为增加，10年之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见，20世纪初，不仅在我们已经说过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发展方面，而且在金融资本的增长方面，都是一个转折时期。

据奈马尔克计算，1910年全世界有价证券的总额大约是8 150亿法郎。他大致地减去了重复的数字，使这个数额缩小到5 750亿至6 000亿法郎。下面是这个数额在各国分布的情形（这里取的总额是6 000亿）：

1910年有价值证券数额(单位十亿法郎)

英国	142	} 479	荷兰	12.5
美国	132		比利时	7.5
法国	110		西班牙	7.5
德国	95		瑞士	6.25
俄国	31		丹麦	3.75
奥匈帝国	24		瑞典、挪威、罗马尼亚等国	2.5
意大利	14		共计	600.0
日本	12			

从这些数字一下子就可以看出，4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突出，它们各有约1 000亿至1 500亿法郎的有价值证券。在这4个国家中有两个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这一点我们以下就要说到）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其余两个是在发展速度上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生产中的普及程度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这4个国家一共有4 790亿法郎，约占全世界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4个国家、这4个国际银行家、这4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

现在，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资本输出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附和联系的国际网方面所起的作用。

[\(1\)](#) 鲁·希法亨《金融资本》1912年莫斯科版第338—339页。

[\(2\)](#) 罗·利夫曼的上述著作第476页。

[\(3\)](#) 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68—269页。

[\(4\)](#) 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1版第258页。

[\(5\)](#) 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话，见《社会经济概论》第5部分第2册第110页。

[\(6\)](#) 路·埃施韦格《女儿公司》，见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545页。

[\(7\)](#) 库尔特·海尼希《电力托拉斯之路》，见1912年《新时代》杂志[\[69\]](#) 第30年卷第2册第484页。

[\(8\)](#) 欧·阿加德《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从大银行对俄国国民经济和德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来看大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1914年柏林版。

[\(9\)](#) 1913年《银行》杂志第7期第630页。

[\(10\)](#) 利西斯《反对法国金融寡头》1908年巴黎第5版第11、12、26、39、40、48页。

[\[11\]](#) 施蒂利希的上述著作第143页和威·桑巴特《19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1909年第2版第526页，附录8。

[\[12\]](#) 《金融资本》第172页。

[\[13\]](#) 施蒂利希的上述著作第138页和利夫曼的上述著作第51页。

[\[14\]](#) 路·埃施韦格《泥潭》，见1913年《银行》杂志第952页；同上，1912年第1期第223页及以下各页。

[\[15\]](#) 《运输业托拉斯》，见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89页。

[\[16\]](#) 《钻进银行的欲望》，见1909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79页。

[\[17\]](#) 同上书，第301页。

[\[18\]](#) 1911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825页；1913年第2期第962页。

[\[19\]](#) 欧·阿加德的上述著作第202页。

[\[20\]](#)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74\]](#) 1912年海牙版第19卷第2册。第2栏关于各个小国家的材料，大致是按1902年的数目增加20%计算出来的。

四 资本输出

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

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起先，英国早于别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到19世纪中叶，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力图成为“世界工厂”，由它供给各国成品，这些国家则供给它原料作为交换。但是英国的这种垄断，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当时有许多国家用“保护”关税来自卫，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临近20世纪时，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

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下面是三个主要国家国外投资的大概数目⁽¹⁾：

国外投资(单位十亿法郎)

年 份	英国	法国	德国
1862	3.6	—	—
1872	15	10(1869年)	—
1882	22	15(1880年)	?
1893	42	20(1890年)	?
1902	62	27—37	12.5
1914	75—100	60	44

由此可见，资本输出是在20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 750—2 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80—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这种国外投资在各国之间怎样分配，投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问题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回答，不过这个大概的回答也能说明现代帝国主义的某些一般的相互关系和联系：

国外投资在世界各洲分布的大概情况(1910年前后)

	英国	法国	德国	
	(单位十亿马克)			共计
欧洲	4	23	18	45
美洲	37	4	10	51
亚洲、非洲、澳洲	29	8	7	44
总 计	70	35	35	140

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它在美洲也有广大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在亚洲等地就更不必说了。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同

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联系。关于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讲到。法国的情况不同。它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不下100亿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贷资本即公债，而不是对工业企业的投资。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贷帝国主义。德国又是另一种情况，它的殖民地不多，它的国外投资在欧美两洲之间分布得最平均。

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也一定会有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补偿的。

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例如柏林的《银行》杂志在1913年10月写道：

“在国际的资本市场上，近来正在上演一出可以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相媲美的喜剧。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现在货币市场上的情况并不怎么美妙，政治前景也未可乐观。但是没有一个货币市场敢于拒绝贷款，唯恐邻居抢先同意贷款而换得某种报酬。在缔结这种国际契约时，债权人几乎总要占点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接受大炮订货。” [\(2\)](#)

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而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作为贷款的条件。法国在最近20年中（1890—1910年）常常采用这种手段。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大的企业之间订立的契约，按照施尔德尔“婉转的”说法 [\(3\)](#)，往往“接近于收买”。德国的克虏伯、法国的施奈德、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就是

同大银行和政府关系密切、在缔结债约时不容易“撇开”的公司的典型。

法国贷款给俄国的时候，在1905年9月16日缔结的贸易条约上“压了”一下俄国，使俄国直到1917年为止作出相当的让步；在1911年8月19日同日本缔结贸易条约时，也是如此。奥地利同塞尔维亚的关税战争从1906年开始，一直继续到1911年，中间只有7个月的休战，这次关税战争部分是由奥地利和法国在供应塞尔维亚军用物资方面的竞争引起的。1912年1月，保尔·德沙内尔在议会里说，法国公司在1908—1911年间供给塞尔维亚的军用物资，价值达4 500万法郎。

奥匈帝国驻圣保罗（巴西）领事在报告中说：“巴西修筑铁路，大部分用的是法、比、英、德的资本；这些国家在办理有关修筑铁路的金融业务时已规定由它们供应铁路建筑材料。”

这样，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德国帝国主义者看到“老的”殖民国家在这方面特别“成功”，真是羡慕之至。在1904年，英国有50家殖民地银行和2 279个分行（1910年有72家银行和5 449个分行），法国有20家殖民地银行和136个分行，荷兰有16家殖民地银行和68个分行，而德国“总共只有”13家殖民地银行和70个分行。^[4]美国资本家则羡慕英德两国的资本家，他们在1915年诉苦说：“在南美，5家德国银行有40个分行，5家英国银行有70个分行……最近25年来，英德两国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投资约40亿美元，从而支配了这3个国家全部贸易的46%。”^[5]

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了，那是就瓜分一词的转义而言的。但是，金融资本还导致对世界的直接的瓜分。

^[1] 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年伦敦版第58页；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395页和第404页；保·阿恩特的文章，见1916年《世界经济文汇》^[76]第7卷第35页；奈马尔克的文章，见公报；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92页；劳合一乔治1915年5月4日在下院的演说，见1915年5月5日《每日电讯》^[77]；伯·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1912年耶拿版第235页及其他各页；齐格蒙德·施尔德尔博士《世界经济发展趋势》1912年柏林版第1卷第150页；乔治·佩什《大不列颠……

的投资》，见《皇家统计学会杂志》^[78]第74卷（1910—1911）第167页及以下各页；乔治·迪乌里奇《德国银行在国外的扩张及其同德国经济发展的联系》1909年巴黎版第84页。

^[2] 1913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1024—1025页。

^[3] 施尔德尔的上述著作第346、350、371页。

^[4] 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4版第375页和迪乌里奇的上述著作第283页。

^[5] 1915年5月《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79]第59卷第301页。在这卷第331页上又写着：据著名的统计学家佩什在最近一期的金融周报《统计学家报》^[80]上的计算，英、德、法、比、荷5国输出的资本总额是400亿美元，等于2000亿法郎。

五 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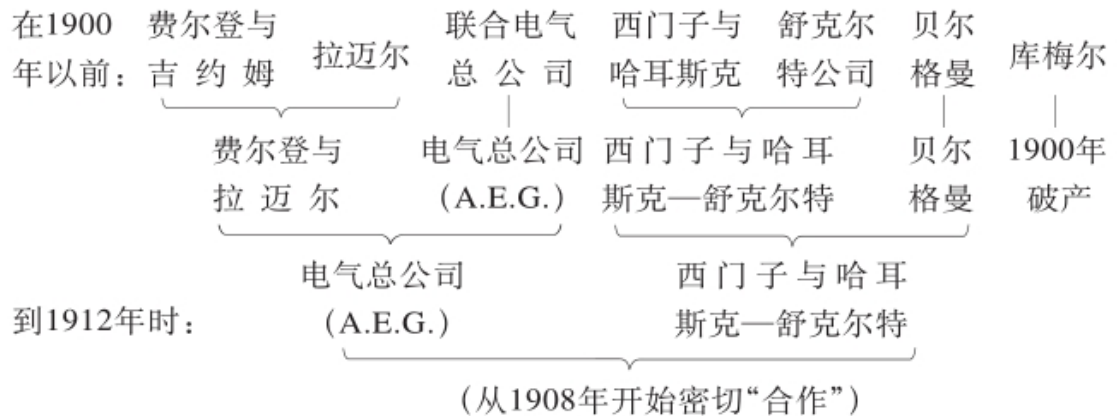
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

这是全世界资本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多的阶段。我们来看看这种超级垄断是怎样生长起来的。

电力工业是最能代表最新技术成就，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部门。它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在德国，1900年的危机对这个部门集中程度的提高发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已经同工业相当紧密地长合在一起的银行，在这个危机时期极大地加速和加深了较小企业的毁灭和它们被大企业吞并的过程。耶德尔斯写道：“银行停止援助的正是那些最需要援助的企业，这样就使那些同银行联系不够密切的公司，起初虽有蓬勃的发展，后来却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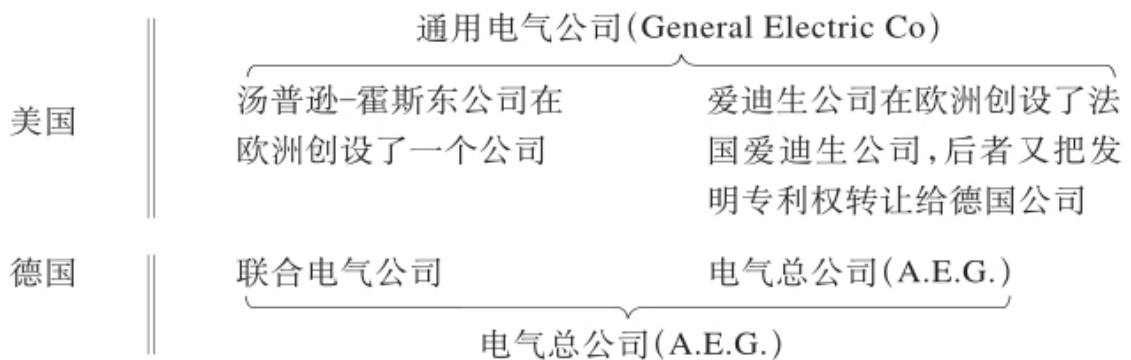
结果，在1900年以后，集中有了长足的进展。1900年以前，电力工业中有七八个“集团”，每个集团都由几个公司组成（总共有28个公司），这些集团背后各有2至11家银行。到1908—1912年时，所有这些集团已合并成两个甚至一个集团了。这个过程如下：

电力工业中的集团



这样生长起来的著名的电气总公司（A. E. G.）统治着175—200个公司（通过“参与”制度），总共支配着约15亿马克的资本。单是它在国内的直接代表机构就有34个，其中有12个是股份公司，分设在10多个国家中。早在1904年，德国电力工业在国外的投资就有23 300万马克，其中有6 200万投在俄国。不言而喻，这个电气总公司是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单是它的制造公司就有16个，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从电缆和绝缘体，直到汽车和飞行器为止。

但是，欧洲的集中也就是美国集中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情况如下：



于是形成了两个电力“大国”。海尼希在他的《电力托拉斯之路》一文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它们的电力公司。”关于这两个“托拉斯”的周转额和企业规模，下列数字可以使我们得到某种（远非完整的）概念：

	商品周转额 (单位百万马克)	职员人数	纯 利 (单位百万马克)
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 (G.E.C.)	1907年:252	28 000	35.4
	1910年:298	32 000	45.6
德国的电气总公司 (A.E.G.)	1907年:216	30 700	14.5
	1911年:362	60 800	21.7

1907年，美德两国的托拉斯订立了瓜分世界的协定。竞争消除了。通用电气公司（G. E. C.）“获得了”美国和加拿大，电气总公司（A. E. G.）“分得了”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还就女儿公司渗入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即尚未正式被瓜分的国家问题，订立了单独的（当然是秘密的）协定。此外还规定要互相交换发明和试验结果。[\(2\)](#)

这种实际上是统一的世界性托拉斯，支配着几十亿资本，在世界各地有“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代办处以及种种联系等等，要同这种托拉斯竞争，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两个强大的托拉斯瓜分世界的事实，当然并不排除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如果实力对比由于发展不平衡、战争、崩溃等等而发生变化的话。

煤油工业提供了企图实行这种重新瓜分，为重新瓜分而斗争的一个大有教益的例子。

耶德尔斯在1905年写道：“世界的煤油市场直到现在还被两大金融集团分占着：一个是洛克菲勒的美国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一个是俄国巴库油田的老板路特希尔德和诺贝尔。这两个集团彼此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几年以来，它们的垄断地位一直受到五大敌人的威胁”[\(3\)](#)：（1）美国石油资源的枯竭；（2）巴库的曼塔舍夫公司的竞争；（3）奥地利的石油资源；（4）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5）海外的石油资源，特别是荷兰殖民地的石油资源（极富足的塞缪尔公司和壳牌公司，它们同英国资本也有联系）。后面三个地区的企业是同最大的德意志银行为首的那些德国大银行有联系的。这些银行为了拥有“自己的”据点而有计划地独自发展煤油

工业，例如在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的煤油工业中，1907年有外国资本18500万法郎，其中德国资本占7400万。⁽⁴⁾

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在经济著作中就叫做“瓜分世界”的斗争。一方面，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想夺取一切，就在荷兰本土办了一个女儿公司，收买荷属印度⁽⁵⁾的石油资源，想以此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英荷壳牌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银行和其他柏林银行力求把罗马尼亚“保持”在“自己手里”，使罗马尼亚同俄国联合起来反对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拥有大得多的资本，又拥有运输煤油和供应煤油给消费者的出色的组织。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德意志银行完全失败，它果然在1907年完全失败了，这时德意志银行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放弃自己的“煤油利益”，损失数百万；或者是屈服。结果德意志银行选择了后者，同煤油托拉斯订立了一项对自己很不利的合同。按照这项合同，德意志银行保证“不做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德国通过国家煤油垄断法，这项合同即告失效。

于是一出“煤油喜剧”开演了。德国金融大王之一、德意志银行的经理冯·格温纳，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施陶斯发动了一场主张煤油垄断的宣传。这家最大的柏林银行的整个庞大机构、一切广泛的“联系”都开动起来了，报刊上一片声嘶力竭的反对美国托拉斯“压制”的“爱国主义”叫喊声。1911年3月15日，帝国国会几乎是一致地通过了请政府制定煤油垄断法案的决议。政府欣然接受了这个“受众人欢迎的”主张。于是，德意志银行旨在欺骗它的美国对手并用国家垄断来振兴自己业务的这场赌博，好像是已经赢了。德国煤油大王已经做着一种获得不亚于俄国糖厂主的大量利润的美梦……但是，第一，德国各大银行在分赃上彼此发生了争吵，贴现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银行的自私自利；第二，政府害怕同洛克菲勒斗争，因为德国是否能不通过洛克菲勒而获得煤油，还很成问题（罗马尼亚的生产率不高）；第三，1913年，正赶上德国要拨款10亿来准备战争。垄断法案搁下来了。斗争的结果是，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暂时获得了胜利。

柏林的《银行》杂志关于这点写道，德国只有实行电力垄断，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才能同煤油托拉斯斗争。这个杂志又说：但是，“电力

垄断只有在生产者需要的时候才会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在下一次电力工业大崩溃逼近、各私营电力工业康采恩现在在各地修建的已经从市政府和国家等等方面获得了某些垄断权的那些成本高的大电站不能获利的时候，才会实现。到那时候就只好使用水力；但是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也不能靠国家出钱来办，还是要交给‘受国家监督的私人垄断组织’去经营，因为私营工业已经订立了许多契约……争得了巨额的补偿…… 以前钾碱的垄断是如此，现在煤油的垄断是如此，将来电力的垄断也是如此。我们那些被美妙的原则迷住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总该明白：德国的垄断组织从来没有抱定过这样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结果，即为消费者带来好处或者哪怕是交给国家一部分企业利润，它们仅仅是为了用国家的钱来振兴快要破产的私营工业罢了。” [\(6\)](#)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这种宝贵的供认。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组织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组织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些环节而已。

在商轮航运业中，集中的巨大发展也引起了对世界的瓜分。德国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公司，即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和北德劳埃德公司，它们各有资本2亿马克（股票和债券），各有价值18 500—18 900万马克的轮船。另一方面，美国在1903年1月1日成立了所谓摩根托拉斯，即国际商轮公司，由美英两国的9个轮船公司合并而成，拥有资本12 000万美元（48 000万马克）。就在1903年，两家德国大公司和这个美英托拉斯签订了一项为瓜分利润而瓜分世界的合同。德国的公司在英美之间的航线上退出了竞争。合同明确地规定了哪些港口“归”谁“使用”，并且设立了一个共同的监察委员会等等。合同期定为20年，同时规定了一个附带条款：一旦发生战争，该合同即告废止。 [\(7\)](#)

国际钢轨卡特尔形成的历史，也是大有教益的。早在1884年工业极为衰落的时候，英国、比利时、德国三国的钢轨制造厂就作过组织这种卡特尔的第一次尝试。它们议定不在缔约各国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国外市场则按下列比例瓜分：英国占66%，德国占27%，比利时占7%。印度完全归英国。对于一个没有参加缔结协议的英国公司，它们就合力进攻，其耗费由

出售总额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但是到了1886年，有两个英国公司退出了同盟，这个同盟也就瓦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几次工业高涨时期，始终没有达成过协议。

1904年初，德国成立了钢铁辛迪加。1904年11月，国际钢轨卡特尔又按下列比例恢复起来了：英国占53.5%；德国占28.83%；比利时占17.67%。后来法国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三年中所占份额分别为4.8%、5.8%、6.4%，这是在100%以外，即以104.8%等等为基数的。1905年，又有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钢铁公司）加入，随后奥地利和西班牙也加入了。福格尔施泰因在1910年写道：“现在，地面已经分完了，于是那些大用户，首先是国营铁路——既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没有照顾它们的利益——，就可以像诗人一样生活在丘必特的天宫里了。”⁽⁸⁾

还要提一提1909年成立的国际锌业辛迪加，它把生产量在德、比、法、西、英五国的工厂集团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还有国际火药托拉斯，用利夫曼的话来说，它是“德国所有炸药厂的最新式的紧密同盟，后来这些炸药厂与法美两国用同样的方法组织起来的代那买特炸药工厂一起，可以说是共同瓜分了整个世界”⁽⁹⁾。

据利夫曼统计，德国所参加的国际卡特尔，在1897年共有将近40个，到1910年就已经接近100个了。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现在卡·考茨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完全背叛了像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用欺骗的手段为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现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资本家同盟是为了什么而互相斗争。后面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只有它才能向我们说明当前发生的事情的历史经济意义，因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只要阶级存在，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很明显，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瓜分世界），而强调这个斗争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这是符合比如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论见解方面实质上已经转到德国资产阶级

那边去了，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考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 [\(1\)](#) 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232页。
- [\(2\)](#) 里塞尔的上述著作；迪乌里奇的上述著作；第239页；库尔特·海尼希的上述文章。
- [\(3\)](#) 耶德尔斯的著作第192—193页。
- [\(4\)](#) 迪乌里奇的著作第245—246页。
- [\(5\)](#) 即今印度尼西亚。——编者注
- [\(6\)](#) 1912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629、1036页；1913年第1期第388页。
- [\(7\)](#) 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125页。
- [\(8\)](#) 福格尔施泰因《组织形式》第100页。
- [\(9\)](#) 利夫曼《卡特尔与托拉斯》第2版第161页。

六 大国瓜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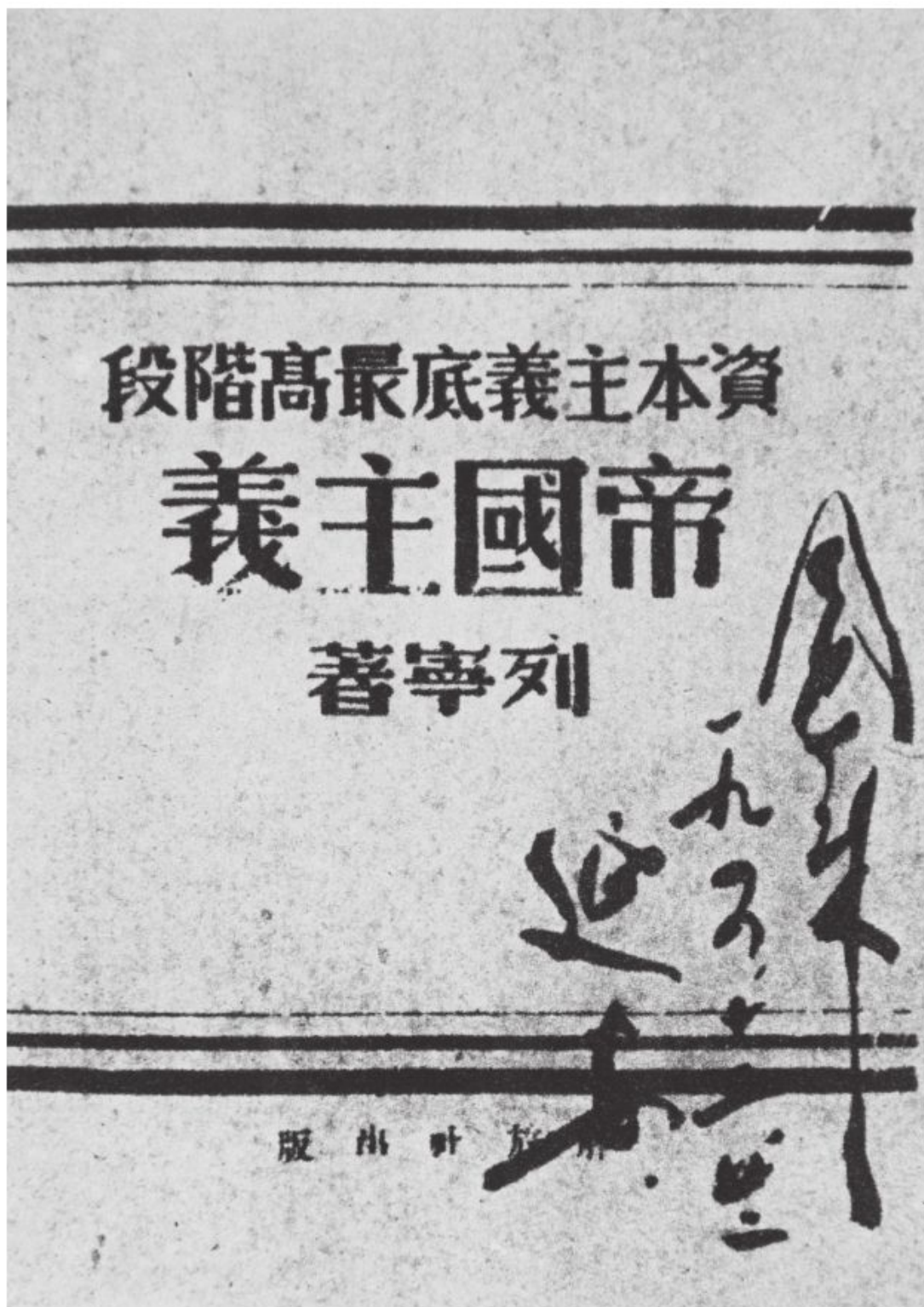
地理学家亚·苏潘在他的一本论述“欧洲殖民地的扩展”的书⁽¹⁾中，对19世纪末的这种扩展情况，作了如下简短的总结：

属于欧洲殖民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土地面积所占的百分比

	1876年	1900年	增减数
在非洲	10.8%	90.4%	+ 79.6%
在波利尼西亚	56.8%	98.9%	+ 42.1%
在亚洲	51.5%	56.6%	+ 5.1%
在澳洲	100.0%	100.0%	—
在美洲	27.5%	27.2%	—0.3%

苏潘得出结论说：“可见，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瓜分非洲和波利尼西亚。”因为在亚洲和美洲，无主的土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已经没有了，所以应当扩大苏潘的结论，应当说，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瓜分完毕。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一一，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

可见，我们是处在一个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密切联系的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因此，首先必须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实际材料，以便尽量确切地弄清楚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这里，首先就产生了两个事实问题：殖民政策的加强，争夺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是不是恰好在金融资本时代出现的，在这方面，现在世界瓜分的情况究竟怎样。



周恩来读过的列宁著作

美国作家莫里斯在他写的一本关于殖民史的著作中^[2]，对英、法、德三国在19世纪各个时期的殖民地面积的材料作了归纳。^[81]现在把他所得出

的结果简单列表如下：

殖 民 地 面 积						
年 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单位百万 平方英里)	(单位 百万)	(单位百万 平方英里)	(单位 百万)	(单位百万 平方英里)	(单位 百万)
1815—1830年	?	126.4	0.02	0.5	—	—
1860年	2.5	145.1	0.2	3.4	—	—
1880年	7.7	267.9	0.7	7.5	—	—
1899年	9.3	309.0	3.7	56.4	1.0	14.7

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1860—1880年这个时期，而且在19世纪最后20年还在大量地夺取。法德两国加紧夺取殖民地也正是在这20年间。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现在我们又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

霍布森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把1884—1900年这个时期划为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扩大领土）的时期。据他计算，在这个时期，英国夺得了3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5 700万人口，法国3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 650万人口，德国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 470万人口，比利时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 000万人口，葡萄牙8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900万人口。在19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已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1840—1860年英国自由竞争最兴盛的时期，英国居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麦·贝尔在1898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现代英国帝国主义”的文章⁽³⁾中指出，在1852年的时候，像迪斯累里这样一个一般说来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治家，尚且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而到19世纪末，成为英国风云人物的，已经是

公开鼓吹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塞西尔·罗得斯和约瑟夫·张伯伦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当时就清楚地看到现代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张伯伦鼓吹帝国主义是“正确、明智和经济的政策”，他特别举出目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遇到的来自德国、美国、比利时的竞争。资本家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就创办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随声附和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去夺取世界上尚未瓜分的土地。据塞西尔·罗得斯的密友新闻记者斯特德说，1895年罗得斯曾经同他谈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的主张，罗得斯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一个夙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 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4]

百万富翁、金融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塞西尔·罗得斯在1895年就是这样讲的。他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只是比较粗俗，比较肆无忌惮，而实质上同马斯洛夫、休特古姆、波特列索夫、大卫诸先生以及那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68等等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塞西尔·罗得斯是个比较诚实一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为了对世界领土的瓜分情况和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变化作一个尽可能确切的描述，我们要利用苏潘在上述那部关于世界各大国殖民地问题的著作中提供的综合材料。苏潘选的是1876年和1900年，我们则选用1876年（这一年选得很恰当，因为正是到这个时候，垄断前阶段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说来可以算是完成了）和1914年（用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上的比较新的数字来代替苏潘的数字）。苏潘只列出了殖民地；我们认为，把关于非殖民国家和半殖民地的简略数字补充进去，对描绘瓜分世界的全貌是有益的。我们把波斯、中国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

个国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第二个和第三个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82\]](#)

结果如下：

大国的殖民地								
(面积单位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单位百万)								
	殖民地				宗主国		共计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1914年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英国·····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国·····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国·····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国·····	—	—	2.9	12.3	0.5	64.9	3.4	77.2
美国·····	—	—	0.3	9.7	9.4	97.0	9.7	106.7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6个大国总计	40.4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其余大国(比利时、荷兰等)的殖民地							9.9	45.3
半殖民地(波斯、中国、土耳其)							14.5	361.2
其余国家							28.0	289.9
全 球							133.9	1 657.0

我们从这里清楚看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被瓜分“完毕”的情况。1876年以后，殖民地有极大的扩张：6个最大的大国的殖民地增加了一半以上，由4 0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6 50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2 500万平方公里，比各宗主国的面积（1 650万）多一半。有3个大国在1876年根本没有殖民地，另一个大国法国，当时也差不多没有。到1914年，这4个大国获得的殖民地面积为1 410万平方公里，即大致比欧洲面积还大一半，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差不多有1亿。殖民地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都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比德日两国殖民地的总和多两倍。不过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代的初期，法国金融资本的数量大概也比德日两国的总和多几倍。除纯粹的经济条件而外，地理和其他条件也在这些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影响到殖民地的大小。近几十年来，在大工业、交换和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世界的均等化，即各国经济条件与生活条件的平均化，虽然进展得很快，但差别

还是不小的。在上述6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近来进步比前面几国慢得多的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

除大国的殖民地以外，我们还列进了小国的小块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可以说是可能发生而且极可能发生的对殖民地的“重新瓜分”的最近目标。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存在着摩擦等等，妨碍了它们达到分赃的协议。至于“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是自然界和社会一切领域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例子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不过，对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的“中间”形式的典型。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⁵⁾。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

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

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施尔德尔写道：“可以作出一个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怪诞不经的论断，就是说，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长，在较近的将来与其说会遇到食品缺乏的障碍，远不如说会遇到工业原料缺乏的障碍。”例如木材（它变得日益昂贵）、皮革和纺织工业原料，都愈来愈缺乏。“工业家同盟企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内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平衡；1904年几个主要工业国家的棉纺业工厂主同盟成立的国际同盟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在1910年，欧洲麻纺业厂主同盟也仿照它成立了一个同盟。”[\(6\)](#)

当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中尤其是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总是企图贬低这种事实的意义，说不用“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殖民政策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取得原料，说“简单地”改善一下一般农业的条件就“可以”大大增加原料的供应。但是，这样说就成了替帝国主义辩护，替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因为这样说就是忘记了最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垄断。自由市场愈来愈成为过去的事情，垄断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天天地缩小自由市场，而“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条件，就得改善民众的处境，提高工资，减少利润。可是，除了在甜蜜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里，哪里会有能够关心民众的处境而不关心夺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要是投入大量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产地，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英国资本家用尽一切办法竭力在自己的殖民地埃及发展棉花生产

（1904年埃及的230万公顷耕地中，就有60万公顷，即 $\frac{1}{4}$ 以上用来种植棉花），俄国资本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也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就能较容易地打败外国的竞争者，较容易地垄断原料产地，成立一个实行“联合”生产、包揽棉花种植和加工的各个阶段的、更经济更盈利的纺织业托拉斯。

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在推动人们去夺取殖民地，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应的“联系”等等。

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说得很对：“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有一个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好像是在发挥和补充上述塞西尔·罗得斯的思想⁽⁷⁾，他写道，现代殖民政策除经济原因外，还应当加上社会原因：“愈来愈艰难的生活不仅压迫着工人群众，而且压迫着中间阶级，因此在一切老的文明国家中都积下了‘一种危及社会安定的急躁、愤怒和憎恨的情绪；应当为脱离一定阶级常轨的力量找到应用的场所，应当给它在外国找到出路，以免在国内发生爆炸’。”⁽⁸⁾

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种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典型。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金融上如此依附于伦敦，应当说是几乎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⁹⁾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1909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875 000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英国外交，同阿根廷资产阶级，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的领导人物有着多么巩固的联系。

葡萄牙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政治上独立而金融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稍微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实际上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起，这200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加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地位，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使用葡萄牙的港口、岛屿、电缆等等的便利。⁽¹⁰⁾某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一向就有，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瓜分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环节。

为了结束关于瓜分世界问题的讨论，我们还要指出下面一点。不但美西战争以后的美国著作和英布战争以后的英国著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十分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但最“忌妒地”注视着“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德国著作经常在估计这个事实，而且在法国资产阶级著作中，就资产阶级可以达到的程度来说，问题也提得相当明确而广泛。让我们来引证历史学家德里奥的一段话，他在《19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中论述“大国与瓜分世界”的一章里写道：“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大国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一切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因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对世界的大规模开拓，而这将是下一世纪即20世纪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所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的狂热，‘帝国主义’成了19世纪末最突出的特点。”作者又补充说：“在这种瓜分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大国，即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非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因为强大的殖民实力和占有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¹¹⁾

- [\[1\]](#) 亚·苏潘《欧洲殖民地的扩展》1906年版第254页。
- [\[2\]](#) 亨利·C. 莫里斯《殖民史》1900年纽约版第2卷第88页；第1卷第419页；第2卷第304页。
- [\[3\]](#) 1898年《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第1册第302页。
- [\[4\]](#) 1898年《新时代》杂志第16年卷第1册第304页。
- [\[5\]](#) 查·普·卢卡斯《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年牛津版，或克罗美尔伯爵《古代帝国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1910年伦敦版。
- [\[6\]](#) 施尔德尔的上述著作第38—42页。
- [\[7\]](#) 见本书第166—167页。——编者注
- [\[8\]](#) 瓦尔《法国在殖民地》，转引自昂利·吕西埃《大洋洲的瓜分》1905年巴黎版第165页。
- [\[9\]](#) 舒尔采—格弗尼茨《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1906年莱比锡版第318页，以及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46页。
- [\[10\]](#) 施尔德尔的上述著作第1卷第160—161页。
- [\[11\]](#) J. 爱·德里奥《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00年巴黎版第299页。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试作一个总结，把以上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归纳一下。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眼看着自由竞争开始转化为垄断：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更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中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垄断，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以及同它们相融合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障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先必须指出，帝国主义，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有充分根据的了解，我们故意尽量多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认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十分确凿的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从中可以看出银行资本等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看出量转化为质，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10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首先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这25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争论。在1915年，甚至早在1914年11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们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所表述的基本思想，他说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上的“时期”或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卡特尔、保护主义、金融家的统治、殖民政策），那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就成了“最乏味的同义反复”，因为那样的话，“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等等。为了最确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思想，我们引用他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直接反对我们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实质的（因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来贯彻类似思想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中所提出的反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所提出的反驳）。

考茨基的定义说：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1\)](#)

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无论就其本身还是就其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任意地和错误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和错误地突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

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完全，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是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是考茨基本人纳入他的定义中的经济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法国，恰好是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极度加强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世界已经瓜分完了，在重新瓜分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二，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比利时作为反英据点对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巴格达作为反德据点对英国来说也一样重要，如此等等）。

考茨基特地搬出、并且屡次搬出英国人来，似乎英国人确定的帝国主义一词的纯粹政治含义，是和他考茨基的意思相符的。现在就来看看英国人霍布森在他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是怎样写的：

“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被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政治扩张和贪图商业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 [\(2\)](#)

我们看到，考茨基笼统地搬出英国人来，是绝对没有事实根据的（他要搬的话，也只能是搬出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的公开辩

护士)。我们看到，考茨基标榜自己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历史的具体的”（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历史的具体性的嘲弄！）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互相竞争；（2）金融家比商人占优势。如果主要是工业国兼并农业国的问题，那就把商人抬上首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这一点以后还要讲到。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当叫做帝国主义还是叫做金融资本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说来，瓜分世界领土（这种瓜分恰巧是在金融资本时代完成的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考茨基同德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辩护士库诺争论过。库诺笨拙而又无耻地推论说：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这种话就像民粹派在1894—1895年讽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 and 进步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开起酒馆来培植资本主义。考茨基反驳库诺说：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政策的形式之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同帝国主义，同兼并等等作斗争。

这种反驳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隐蔽地（因此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调和，因为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

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充分暴露矛盾的深刻性，而是回避存在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显然，这种“理论”只能用来维护同库诺之流保持统一的思想！

考茨基写道：“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3]，也就是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4]。

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弃马克思主义到了何等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我们要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

如果纯粹经济的观点指的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概念，那么，说到底只能归结为这样一个论点：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像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个意义上，超帝国主义“论”就如同什么“超农业论”一样是荒唐的。

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20世纪初这个历史的具体时代，那么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它完全是为了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为帝国主义辩护士助长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83]

理·卡尔韦尔在他写的《世界经济导论》^[5]这本小册子里，对可以具体说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内部相互关系的最重要的纯粹经济材料，作了归纳的尝试。他把整个世界分为5个“主要经济区域”：（1）中

欧区（除俄国和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2）不列颠区；（3）俄国区；（4）东亚区；（5）美洲区。同时他把殖民地列入所属国的“区域”内，而“撇开了”少数没有按上述区域划分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亚等等。

现在把他所列出的这些区域的经济材料摘录如下：

世界主要 经济区域	面积 (单位 百万平 方公里)	人口 (单位 百万)	交 通 运 输 业			贸 易 工 业		
			铁路运输 (单位 千公里)	商船 (单位 百万吨)	(进出口 共 计) (单位十 亿马克)	煤炭 产量 (单位 百万吨)	生铁 产量 (单位 百万)	棉纺织业 纱锭数目 (单位 百万)
(1)中欧区	27.6 (23.6) ^①	388 (146) ^①	204	8	41	251	15	26
(2)不列颠区	28.9 (28.6) ^①	398 (355) ^①	140	11	25	249	9	51
(3)俄国区	22	131	63	1	3	16	3	7
(4)东亚区	12	389	8	1	2	8	0.02	2
(5)美洲区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我们看到，有三个区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时它正在殊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目前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分散。相反，在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政治上却高度集中，但是它们之间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争夺南美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有两个区域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

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小市民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做“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

国际卡特尔（正像“可以”把在实验室里生产片剂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由和平瓜分转为非和平瓜分、再由非和平瓜分转为和平瓜分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瓜分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按照以完全非和平的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吗？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铁路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发展速度不同的非常准确的材料。

(6)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最近几十年中，铁路长度变更的情形如下：

铁路长度(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欧洲	224	346	+ 122
美国	268	411	+ 143
所有殖民地	82	210	+ 128
亚美两洲的独立国和	} 125	} 347	} + 222
半独立国			
	43	137	+ 94
共 计	617	1 104	

可见，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殖民地和亚美两洲的独立国（以及半独立国）。大家知道，这里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他国家建筑20万公里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订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

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金融资本从特别盈利的殖民地企业和海外企业得到的贡款日益增加。在瓜分这种“赃物”的时候，有极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家手里。各最大的强国及其殖民地的铁路总长度如下：

(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美国	268	413	+ 145
不列颠帝国	107	208	+ 101
俄国	32	78	+ 46
德国	43	68	+ 25
法国	41	63	+ 22
5个大国共计.....	491	830	+ 339

可见，将近80%的铁路集中在5个最大的强国手中，但是这些铁路的所有权的集中程度，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还要高得多，例如美、俄及其他国家铁路的大量股票和债券都属于英法两国的百万富翁。

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铁路网增加了10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3倍。但是，谁都知道，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其速度之快是英国无法比拟的，更不必说法国和俄国了。1892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490万吨，英国为680万吨；但是到1912年，已经是1 760万吨比900万吨，也就是说，德国永远地超过英国了！^[7]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1] 1914年《新时代》杂志第32年卷第2册（1914年9月11日）第909页；参看1915年第2册第107页及以下各页。

^[2] 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年伦敦版第324页。

^[3] 1914年《新时代》杂志第32年卷第2册（1914年9月11日）第921页；参看1915年第2册第107页及以下各页。

^[4] 1915年《新时代》杂志第1册（1915年4月30日）第144页。

^[5] 理·卡尔韦尔《世界经济导论》1906年柏林版。

^[6] 1915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84]；1892年《铁路业文汇》^[85]；关于1890年各国殖民地间铁路分布方面的某些详细情形，只能作一个大致的估计^[86]。

^[7] 并参看埃德加·克勒芒德《不列颠帝国同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关系》，该文载于1914年7月《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第777页及以下各页。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尽管如此，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例如，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促进着各种变化的。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

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 000—1 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霍布森写道：“在1893年，不列颠在国外的投资，约占联合王国财富总额的15%。”^①我们要指出，到1915年，这种资本又增加了大约一倍半。霍布森又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要纳税人付出很高代价，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殊少价值，……然而对于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在英语里，这个概念是用“investor”一词来表示的，意即“投资者”，食利者），却是大量利润的来源。”“据统计学家吉芬计算，1899年大不列颠从全部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输入和输出）得到的全部年收入是1 800万英镑（约合17 000万卢布），这是按贸易总额8亿英镑的2.5%推算出来的。”尽管这个数目不小，它却不能说明大不列颠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能够说明它的是9 000—10 000万英镑从“投资”得到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阶层的收入。

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Rentnerstaat）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在国外投资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政治上附属的或结盟的国家的投资：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防止债务人造反。”⁽²⁾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他所著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一书中，把荷兰当做“食利国”的典型，并且说现在英国和法国也正在成为这样的国家。⁽³⁾施尔德尔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5个工业国家，是“明显的债权国”。他没有把荷兰算进去，只是因为荷兰“工业不大发达”⁽⁴⁾。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

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虽然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有了绝对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发行证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依我看来，这个事实正是帝国主义繁荣的经济基础。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卖主和买主之间的关系更巩固些。”⁽⁵⁾关于德

国的情形，柏林的《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兰斯堡1911年在他的《德国是食利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德国人喜欢讥笑法国人显露出来的那种渴望变为食利者的倾向。但是他们忘记了，就资产阶级来说，德国的情况同法国是愈来愈相像了。”[\(6\)](#)

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还是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因为谁也不会疑心他偏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是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金融资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霍布森在对英布战争的印象很鲜明的情况下，描述了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以及“金融家”从承包、供应等业务获得的利润增加的情形，他说：“资本家是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指挥者；但是同一动机对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也起作用。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要依靠政府的订货；冶金工业和造船工业中心的帝国主义，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事实。”这位作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旧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我们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

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就是大不列颠、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大不列颠。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斗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庞大的常备军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部非洲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

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这样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家臣，他们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当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目前英格兰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化也难以逆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对未来作出某种唯一的预测。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被引上另一个方面，它们就确实会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7\)](#)

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遇到抵抗，它就确实会走向这种结局。这里对于目前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欧洲联邦”的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经常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格尔哈德·希尔德布兰德过去因为替帝国主义辩护而被开除出党，现在满可以充当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给霍布森作了一个很好的补充，鼓吹“西欧联邦”（俄国除外），以便“共同”行动……反对非洲黑人、反对“大伊斯兰教运动”，以便维持“强大的陆海军”，对付“中日联盟”[\(8\)](#)，等等。

舒尔采一格弗尼茨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描绘，向我们揭示了同样的寄生性特征。从1865年到189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大约1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了8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用强制手段是不行的……），那么帝国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笨重的工业劳动，推给有色人种去干，自己则安然地当食利者，也许这样就为有色人种的经济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解放作好了准备”。

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人们谈到苏格兰这个最贵族化的、用做打猎和其他运动的地方时，都说“它是靠自己的过去和卡内基先生（美国亿万富翁）生活的”。英国每年单是花在赛马和猎狐上面的费用，就有1 400万英镑（约合13 000万卢布）。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100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百分比日益下降：

	英国人口	主要工业部门的 工人人数	工人在人口总数中 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百万)		
1851年……	17.9	4.1	23%
1901年……	32.5	4.9	15%

这位研究“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上层中间有大批人参加合作社、工会、体育团体和许多教派。选举权是同这个阶层的地位相适应的，这种选举权在英国“还有相当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谈论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的这个上层，例如，

“失业问题主要是涉及伦敦和无产阶级下层，这个下层是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⁹⁾ 应当说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们很少重视。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数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数（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面描述的一系列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数从1884年起开始减少：1884年有242 000人，而1900年只有169 000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数，在1881—1890年的10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1 453 000人，但是在后来的两个10年里，又减少到544 000人和341 000人。同时，从奥、意、俄及其他国家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1907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1 342 294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有440 800人，农业工人有257 329人。⁽¹⁰⁾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¹¹⁾。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¹²⁾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一直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这种联系。例如，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

的。”过了将近¹/₄世纪，恩格斯又在1881年8月11日写的信里说到了“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

国工联”。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又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的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¹³⁾（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¹⁴⁾）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只是比英国在1858年剥削的地方稍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7 50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6 500万平方公里，即86%集中在6个大国手里；有6 100万平方公里，即81%集中在3个大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总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像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取得完全胜利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成熟，已经过度成熟，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融合起来了。⁽¹⁵⁾

[\[7\]](#) 霍布森的著作第103、205、144、335、386页。

[\[8\]](#) 格尔哈德·希尔德布兰德《工业统治地位和工业社会主义的动摇》1910年版第229页及以下各页。

[\[9\]](#)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301页。

[\[10\]](#) 《德意志帝国统计》第211卷。

[\[11\]](#) 亨盖尔《法国的投资》1913年斯图加特版。

[\[12\]](#) 古尔维奇《移民与劳动》1913年纽约版。

[\[13\]](#)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290页；第4卷第43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344—345页；第35卷第18页。——编者注）。卡·考茨基《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1907年柏林版第79页；这本小册子是考茨基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书中所引的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351—354页。——编者注）。

[\[1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287页。——编者注

[\[15\]](#) 波特列索夫之流、契恒凯里之流、马斯洛夫之流等等先生们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无论是它的公开形式，或是它的隐蔽形式（如齐赫泽、斯柯别列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等先生），都是从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即从取消主义[\[87\]](#)生长起来的。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大量金融资本，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关系和联系网，从而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另一些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瓜分世界和统治其他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切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德国现在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而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88]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替帝国主义辩护，通常都是采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刻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改良”计划，诸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实质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肆无忌惮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的言论却比较少见，这些人倒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的想法是荒谬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文汇》这一刊物中，力图考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特别是那些非德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提到了印度的风潮和抗议运动，纳塔尔（南部非洲）的运动，荷属印度的运动等等。其中有人在评论一家英国刊物有关亚、非、欧三洲受外国统治的各民族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举行的从属民族和种族代表会议的报道时，对会议上的演说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据称，必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统治国应当承认从属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应当监督大国同弱小民族订立的条约的履行。除了表示这些天真的愿望以外，代表会议并没有继续前进。我们看不出他们对下面这个真理有丝毫的了解：帝国主义同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

同帝国主义作直接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仅限于反对某些特别可恶的过火现象。”^[1]因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没有“继续”前进，所以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就“继续”后退了，后退到在标榜“科学性”的幌子下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地步。这也是一种“逻辑”！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前进，去进一步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898年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的莫希干人^[89]的反对。他们把这次战争叫做“罪恶的”战争，认为兼并别国土地是违背宪法的，认为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阿奎纳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先答应阿奎纳多给菲律宾以自由，后来又派美国军队登陆，兼并了菲律宾），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话：“白人自己治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治理自己同时又治理别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2]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站在一起，那么这种批评就始终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呼吁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早。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批评银行支配一切，批评金融寡头等等的，还有我们屡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路·埃施韦格，在法国作家中有《英国与帝国主义》

这本肤浅的书（1900年出版）的作者维克多·贝拉尔。所有这些人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自由竞争和民主来反对帝国主义，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建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表示了维护和平的“天真的愿望”等等。最后还有从事国际证券发行统计的阿·奈马尔克，他在1912年计算出“国际”有价证券数达几千亿法郎的时候，不禁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设想和平会受到破坏吗？……有了这样大的数字，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吗？”⁽³⁾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显得这样天真，“郑重其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所谓社会党人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不过是抱着一种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想撇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典型例子。他举出1872年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看到这方面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⁴⁾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被他的俄国随从（也是俄国的一个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打掩护的人）斯佩克塔托尔先生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弹过的论断，是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较详细地谈一谈。我们从引证希法亭的言论开始，因为考茨基曾经多次（包括1915年4月那次在内）声称，希法亭的结论是“所有社会党人理论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写道：“无产阶级不应当用自由贸易时代的和敌视国家的那种已经落后的政策去反对向前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政策。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回答，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是不可能是恢复自由竞争这样的理想（这

种理想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5\)](#)

考茨基维护对金融资本时代来说是“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金融资本，那么英国同埃及（或者同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增长得”快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如果自由竞争没有受到任何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金融资本的“联系”或压迫（这也是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某些国家垄断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得快些呢？

考茨基的论断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却是毫无意思的。就假定会这样，如果没有任何垄断，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贸易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产生垄断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就愈是加强。况且垄断已经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现在垄断开始延缓发展，这也不能成为主张自由竞争的论据，因为在产生垄断以后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论断翻来覆去地看，这里面除了反动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即使把这种论断修改一下，像斯佩克塔托尔说的那样，现在英属殖民地同英国的贸易，比英属殖民地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得慢些，——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为打击英国的也是垄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他国家的（美国的、德国的）垄断和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卡特尔导致了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上就已经指出来了[\(6\)](#)）恰好是那些可供出口的物品。其次，大家知道，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套“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抛售”的做法：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极低廉的价格销售，以便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即使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德国比英国发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更强大、更有组织、水平更高，而

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因为这里并不是自由贸易同保护主义或殖民地附属关系作斗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优势，比殖民地疆界的屏障或保护关税的壁垒更厉害。如果由此得出主张自由贸易与“和平的民主”的“论据”，那是庸俗的，是忘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小市民的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虽然也同考茨基一样对帝国主义作了小市民式的批评，但是他对贸易统计材料毕竟作了比较科学的整理。他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国家，也不是单拿一个殖民地来同其余国家比较，而是拿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输出作比较：第一种是对在金融上依附于它、向它借钱的国家的输出，第二种是对在金融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结果如下：

德国的输出(单位百万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数
对金融上依附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罗马尼亚	48.2	70.8 + 47%
	葡萄牙	19.0	32.8 + 73%
	阿根廷	60.7	147.0 + 143%
	巴西	48.7	84.5 + 73%
	智利	28.3	52.4 + 85%
	土耳其	29.9	64.0 + 114%
总计		234.8	451.5 + 92%
对金融上不依附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大不列颠	651.8	997.4 + 53%
	法国	210.2	437.9 + 108%
	比利时	137.2	322.8 + 135%
	瑞士	177.4	401.1 + 127%
	澳大利亚	21.2	64.5 + 205%
	荷属印度	8.8	40.7 + 363%
总计		1 206.6	2 264.4 + 87%

兰斯堡没有作总结，所以他令人奇怪地没有察觉：如果这些数字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只能证明他自己不对，因为对金融上不独立的国家的输出，毕竟要比对金融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增加得快些，虽然快得并不

多（我们把“如果”两字加上着重标记，是因为兰斯堡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

兰斯堡在考察输出和贷款的关系时写道：

“在1890—91年度，罗马尼亚通过几家德国银行签订了一项债约。其实在前几年，这些德国银行就已经在提供这笔贷款了。这笔贷款主要是用来向德国购买铁路材料的。1891年德国对罗马尼亚的输出是5 500万马克。下一年就降到3 940万马克；以后断断续续地下降，到1900年一直降到2 540万马克。直到最近几年，因为有了两笔新的贷款，才又达到了1891年的水平。

德国对葡萄牙的输出，由于1888—89年度的贷款而增加到2 110万马克（1890年），在以后两年内，又降到1 620万马克和740万马克，直到1903年才达到原先的水平。

德国同阿根廷贸易的材料更为明显。由于1888年和1890年的两次贷款，德国对阿根廷的输出在1889年达到了6 070万马克。两年后，输出只有

1860万马克，还不到过去的 $\frac{1}{3}$ 。直到1901年，才达到并超过1889年的水平，这是同发行新的国家债券和市政债券，同出资兴建电力厂以及其他信贷业务有关的。

德国对智利的输出，由于1889年的贷款，增加到4 520万马克（1892年），一年后降到了2 250万马克。1906年通过德国几家银行签订了一项新的债约以后，输出又增加到8 470万马克（1907年），而到1908年又降到了5 240万马克。” [\[7\]](#)

兰斯堡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一种可笑的小市民说教：同贷款相联系的输出是多么不稳定、不均衡；把资本输出国外而不用来“自然地”、“和谐地”发展本国工业，是多么不好；办理外国债券时，克虏伯要付出几百万的酬金，代价是多么“巨大”，等等。但是事实清楚地说明：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

再说一遍，我们决不认为兰斯堡的统计是完备的，但是必须加以引用，因为它比考茨基和斯佩克塔托尔的统计科学一些，因为兰斯堡提供了对待问题的正确方法。要议论金融资本在输出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着重地、专门地说明输出同金融家骗人勾当的联系，同卡特尔产品的销售等等的联系。简单地拿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较，那就正是回避和掩饰问题的实质。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1915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8\)](#)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属地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合理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做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做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词头代替另一个词头，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唯一的进步，就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实质上是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部

非洲作战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交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成为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的考茨基抱着什么样的善良意图，考茨基的“理论”的客观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对群众的欺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6—7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大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瓜分上述亚洲国家，这将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90]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

“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明确地提出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大国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定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所有大国为了“安定”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而且是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着后天“和平的”总联盟来瓜分譬如说土耳其，如此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现代外交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当今的“商业帝国主义”时代^[9]。另一个作家则把1870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朝印度方向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1885—1902年），为了瓜分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年的“法索达”事件^[91]，——差一点同法国作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缔约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10]。早在1905年，银行“活动家”里塞尔就说过：“政治前哨战是在金融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他指出，法国金融资本在意大利进行活动，为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德英两国为了争夺波斯以及所有欧洲国家的资本为了贷款给中国而展开了斗争，等等。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同普通帝国主义的冲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活生生的现实。

考茨基掩盖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就必然会美化帝国主义，这在他对帝国主义政治特性的批评中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

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状态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逐渐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法。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营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11\)](#)

对此还要补充的是，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强政治上的反动，然而他不去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变得十分迫切的问题。他表示反对兼并，然而采取的却是毫不触犯机会主义者、最容易为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听众说话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例如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当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挚的，政治上是诚实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

- [\(1\)](#) 《世界经济文汇》杂志第2卷第193页。
- [\(2\)](#) 约·帕图叶《美国帝国主义》1904年第戎版第272页。
- [\(3\)](#)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第19卷第2册第225页。
- [\(4\)](#)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年纽伦堡版第72页和第70页。
- [\(5\)](#) 《金融资本》第567页。
- [\(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137—138页。——编者注
- [\(7\)](#) 1909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819页及以下各页。
- [\(8\)](#) 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144页。
- [\(9\)](#) 戴维·杰恩·希尔《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第1卷第X页。
- [\(10\)](#) 施尔德尔的上述著作第178页。
- [\(11\)](#) 《金融资本》第487页。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垄断的四种主要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这指的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20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那么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同样表明了垄断由生产集中产生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导致加紧抢占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工业部门，即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

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大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还是1876年的情况），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全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时开始的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论述德国大银行的那本著作的作者里塞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代（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时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业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像拿旧时邮车的速度同现代汽车的速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车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已经异常迅速地生长起来的金融资本，正因为生长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不反对转向比较“安稳地”占有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是要用不单

是和平的手段从更富有的国家手里夺取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正因为如此，最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特征就表现得特别鲜明。另一方面，就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作比较，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极大的政治差别大大减弱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谈的都是具有明显寄生性特征的资产阶级。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瓜分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发展特点的出现，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没有希望了，等等。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决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像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描述最

新资本主义时也常用“交织”、“不存在孤立状态”等等这样一些说法；他们也说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就是讲这话的里塞尔，却又非常郑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交织”这个说法说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表面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没有认识这些材料的含义和意义。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都是“偶然交织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交织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织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

料的 $\frac{2}{3}$ 甚至 $\frac{3}{4}$ ，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叹道：

“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么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人民福利说来，就比大多数国务大臣的活动还要重要（在这里，把银行家、大臣、工业家和食利者“交织”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 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趋势的发展情

况彻底想一番，那么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汇集在银行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办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工作的活动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只是形式上不同。”^{[\(1\)](#)}

这真是对马克思的一个绝妙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那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而已。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23—439页

^{[\(1\)](#)} 《社会经济概论》第146页。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92]（节选） （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措施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没有经过试验、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没有实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7]、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50]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

唉！的确有人竭力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93]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

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愿意把俄国从战争和饥荒中拯救出来的真正革命政府的纲领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为了开玩笑才叫做革命民主政府，那它只要在成立的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作出决定、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居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命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1）列宁在本文中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纲领以及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在节选的部分，列宁详细论证了克服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办法：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取消商业秘密，没收地主土地和全部土地国有化等。这些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

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像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做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15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15卢布的所有者，谁有1 500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1 500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

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

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账务。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

那些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便利公众等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小业主，对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然后调节经济生活，最后是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像“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像“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94\]](#)。

或《统一报》^[95]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做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做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

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掩护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就举糖业辛迪加这个例子来说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自然，这个联合组织充满了最反动的、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贱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已经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有利于资本巨头和富人的监督和调节。

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国民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大发其财。应当号召发挥独立主动精神，向民主派而不是向官僚号召，向工人和职员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要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联合”这些糖业大王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本来是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几天之内一举做到的。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1\)](#)

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已经使石油业在极大程度上“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就是他们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靠剪息票为生，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在国家经受极大的危机，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国民劳动和增加燃料生产的时候，尤其如此。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先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像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办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那些在原封未动的旧国家机构中被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留任原职的官吏）。

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他们。如果能在1917年4月立刻就采取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么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运在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种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这

一基础上的瓦解，仍然是对国民劳动的侵占，一切都和沙皇制度下一样，改变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发文和收文上的名称！

至于煤炭工业，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同样“具备”了实现国有化的“条件”；掠夺人民的煤业大王在管理上也同样卑鄙无耻，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坏和停止生产的桩桩事实有目共睹。甚至孟什维克部长的报纸《工人报》[\[96\]](#)也承认了这些事实。那又怎么样呢？除了举行几次工人代表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主张“联合”，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就是同工商界“联合”，而联合就意味着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从而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1\)](#) 写到这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克伦斯基政府正在实行糖业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职员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资本家！！

取消商业秘密

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要么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要么可能完全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来实现。尽管这一点对任何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十分明显，尽管《真理报》^[97]一直坚持取消商业秘密⁽¹⁾（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对真正监督的这一首要条件连想也没有想过。

这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暗中破坏生产的资本家的最敏感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不假思索一再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账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又在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这是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的经济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小手工业者或一般农民的经济，他们根本不记商业账，所以取消商业秘密同他们没有关系！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

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报表，那就是说，法律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可以实行）正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擦亮人民的眼睛，而是不让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全部真相。

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1 000或10 000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

此外还要考虑到战争。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家、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用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这一理由来反驳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要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²⁾。

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一直在盗窃国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为了战争俄国现在每天耗费5 000万卢布。每天5 000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在这5 000万中每天至少有500万，也许有1 000万以至更大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和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做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可耻的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书”，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通常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实、绕开“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明确无误地多次提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气吞声，都听任政府冠冕堂皇地谈论“监督”和“调节”！！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³⁾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来自下面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125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

的结果。而在这125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

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资本家激起人民公愤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维持的经济破坏现象也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最害怕的事情。

[\(1\)](#)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1—172、285、286—288、364—366、367—369、370—372页。——编者注

[\(2\)](#)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288页。——编者注

[\(3\)](#) 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90—93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98]供俄国“消遣”。

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

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

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做逃避兵役者加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他们也必须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只是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

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1905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5]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

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像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

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99]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87—205、216—219页劳动义务制，虽然

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00]（节选）（1918年10—11月）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谈论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

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²⁾。“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³⁾“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⁵⁾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⁶⁾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1918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像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像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像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15页。而在第16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18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101]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谢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诺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酬金酬谢考茨基先生，赏给他犹太之吻^[102]，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劝人们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统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说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绝口不谈“民主”共和国美国迫害国际主义者的大暴行，难道这不是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103]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104]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105]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20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1912—1914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106]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

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像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 and 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看不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看不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

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

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像夏洛克^[107]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43—251页

（1）这是列宁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要著作。在节选的部分，列宁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他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

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具有历史局限性。资产阶级民主，不管它如何“完善”，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它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都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页。——编者注

[\[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页和第376页。——编者

注

答美国记者问^[108]（1919年7月20日）

现在我来答复向我提出的五个问题，答复的条件是你们要履行已用书面对我所作的诺言，即我的答复将全文刊载在北美合众国的一百多家报纸上。

1. 苏维埃政府的纲领不是改良主义的纲领，而是革命的纲领。改良就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从这个阶级那里取得让步。革命就是推翻统治阶级。因此，改良主义的纲领总是罗列许多局部性的条文。我们的革命的纲领其实只有总括性的一条，那就是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压迫，推翻他们的政权，使劳动群众从这些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一纲领。实现这一纲领的局部措施有时应部分地加以改变，要把这些改变一一举出，就得写一整本书。我只想指出，我们的政府纲领中还有总括性的一条，由此产生的个别措施的改变也许是最多的。这一条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革命以后，我们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没有查封，更谈不到采用恐怖手段了。我们不仅释放了克伦斯基的许多部长，而且释放了同我们作过战的克拉斯诺夫。直到剥削者即资本家展开反抗以后，我们才开始有系统地加以镇压，甚至采取恐怖手段。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回答资产阶级的，因为他们同德、英、日、美、法各国资本家勾结在一起，阴谋在俄国恢复剥削者的政权，用英、法的金钱收买捷克斯洛伐克军，用德、法的金钱收买曼纳海姆和邓尼金，等等，等等。引起“改变”（即在彼得格勒对资产阶级采取更严厉的恐怖手段）的最近一次阴谋，就是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50]和孟什维克勾结起来出卖彼得格勒，军官阴谋分子占据红丘炮台，英、法资本家收买瑞士大使馆的职员和许多俄国职员等等。

2. 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对阿富汗、印度等等穆斯林国家所做的工作，也同我们在国内对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所做的工作一样。譬如我们让巴什基尔人在俄国内部建立自治共和国，我们

尽力帮助每个民族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帮助它们多出版、多发行本民族语言的书籍，我们还翻译和宣传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同“西欧”和美洲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比起来，这个宪法不幸更为殖民地、附属国的受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10亿以上的人民所喜爱，因为“西欧”和美洲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巩固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即巩固少数“文明的”资本家对本国劳动者和亚洲非洲等地殖民地几亿人民的压迫。

3. 对于美国和日本，我们首要的政治目的，就是击退它们对俄国的侵犯，它们这种侵犯是无耻的，罪恶的，掠夺性的，只会使本国资本家发财。我们曾多次郑重地向这两个国家建议媾和，但它们甚至没有回答我们，并且继续同我们作战，帮助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掠夺摩尔曼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特别是在西伯利亚东部大肆洗劫和破坏，那里的俄国农民对日本和北美合众国的资本家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对于一切民族，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我们今后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毫无例外地同一切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结成兄弟联盟。

4. 我们同意同高尔察克、邓尼金、曼纳海姆媾和的那些条件，已多次用书面形式十分明确地提出过，例如，我们向代表美国政府同我们（以及在莫斯科同我本人）进行谈判^[109]的布利特提出过，在给南森的信^[110]及其他场合也都提出过。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不敢把这些文件全部发表，向人民隐瞒真情，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只提一下我们的基本条件：我们准备偿还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债务，只要和约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就是说，这一和约要得到英、法、美、日、意等国政府的正式签署和批准，因为邓尼金、高尔察克、曼纳海姆等等不过是这些政府的走卒。

5. 我很想把以下情况告诉美国舆论界：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

如此，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代（“moderne”）奴隶主即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这种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雇佣奴隶制。

技术特别是交通的惊人进步，资本和银行的巨大发展，使资本主义达到成熟，而且成熟过度了。资本主义已经衰朽。它已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反动的障碍。它就是一小撮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统治一切，这些富翁推动各国人民进行厮杀，来解决帝国主义赃物、殖民地统治权、金融“势力范围”或“托管权”等等应当归德国强盗集团所有还是归英法强盗集团所有的问题。

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千百万人死亡了，残废了。对这一真理的认识，现在正迅速地不可抑止地在各国劳动群众中扩大着，尤其是因为战争在各地都引起了空前的破坏，各国（包括“战胜国”的人民）都必须为战时的债务支付利息。这些利息是什么呢？是献给百万富翁老爷们的几十亿贡款，以感谢他们仁慈地使千百万工农为解决资本家瓜分利润问题而互相残杀。

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群众的革命意识到处在增长着。成千上万种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点。有些迹象并不重要，但庸人看了也都一目了然，其中之一就是昂利·巴比塞的两本小说（《火线》和《光明》）。作者打过仗，而且是一个最和气、最安分、最守法的小资产者，一个庸夫俗子。

资本家、资产阶级能办到的，“至多”是延缓社会主义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取得胜利，为此再屠杀几十万工人和农民。但他们决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把政权交给劳动人民，并且只交给劳动人民，它委托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废除土地、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这种私

有制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根源，是群众贫困的根源，是只能使资本家发财的、各民族间的掠夺性战争的根源。

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是有保障的。

最后举一个小例子。美国的资产阶级吹嘘他们国内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以此欺骗人民。但是，不论是这个资产阶级还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资产阶级或政府，都不能也不敢根据真正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同我们的政府进行竞赛，比如说，订立一种条约，保证我国政府和其他任何政府自由交换……以政府名义用任何一种文字出版的刊有本国法律条文和宪法条文并说明该宪法比起其他宪法有哪些优点的小册子。

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不敢同我们订立这样一个和平、文明、自由、平等、民主的条约。

为什么呢？因为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一切政府都是靠压迫和欺骗群众来维持的。但是，1914—1918年的大战已经把大骗局戳穿了。

列 宁

1919年7月20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07—111页

(1) 本文是对美国合众社记者提问的答复。列宁在文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但资本主义只是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而没有改变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成熟并走向衰朽，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家、资产阶级能办到的，至多是延缓社会主义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取得胜利，但决不能挽救资本主义。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11]（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1920年6月5日）

我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12]准备了一个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提纲草案，请同志们讨论，并请全体同志，特别是具体了解这些极为复杂的问题中的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同志，以最简短（至多两三百页）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修正、补充或具体说明，尤其是关于以下各点：

奥地利经验。

波兰犹太人的经验和乌克兰的经验。

阿尔萨斯—洛林和比利时。

爱尔兰。

丹麦和德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关系。

巴尔干的经验。

东方各民族。

同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

高加索的关系。

巴什基尔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

吉尔吉斯斯坦。

土耳其斯坦及其经验。

美国的黑人。

各殖民地。

中国——朝鲜——日本。

尼·列宁

1920年6月5日



列宁同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东方各国代表在一起(1920年7月)

1. 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2.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做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这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谎言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谎言掩盖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3.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用事实表明，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凡尔赛条约^[45]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44]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强加于弱国的暴力。国际联盟^[113]和战后协约国^[114]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真相，它们到处加剧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更快地破灭。

4. 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

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5.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

6. 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

7. 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联邦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15]、芬兰苏维埃共和国^[116]、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117]，现在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118]）的关系中，或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同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联邦制已经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

8. 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国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第一，因为没有各苏维埃共和国最密切的联盟，便不能捍卫被军事方面无比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包围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第二，因为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必须有一个密切的经济联盟，否则便不能恢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便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福利；第三，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

9. 在国家内部关系方面，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决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地、实际上却不负任何责任地承认民族平等，就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不管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或者是像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那样，借社会党人的称号来掩饰自己，都是一样的。

不仅在各国共产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工作（议会讲坛上和议会讲坛外的宣传鼓动）中，应当不断地揭露各资本主义国家违背本国的“民主”宪法，经常破坏民族平等，破坏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种种事实，而且还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的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没有后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反对压迫附属民族和殖民地的斗争以及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就仍然是一块假招牌，正像我们在第二国际各党那里看到的一样。

10.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在第二国际各党中是最常见的现象，而且在那些已经退出这个国际的政党中，甚至在目前往往自称为共产党的政党中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做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更不用说这种承认纯粹是口头上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

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因此，在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拥有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人政党的国家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同歪曲国际主义的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市侩和平主义作斗争。

11. 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必须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2\)](#)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在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第六，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

12. 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多数正式领袖，在1914—1919年曾经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借口“保卫祖国”来保卫“本国”资产阶级压榨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权利”，他们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卑鄙行径不能不加深这种完全合乎情理的不信任心理。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性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也就必然使最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表现得特别厉害和顽固。既然这些偏见只有在各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经济生活全部基础急剧改变以后才能消逝，那么这些偏见的消逝，就不能不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各国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同样，为了更快地消除以上所说的不信任心理和各种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59—166页

(1) 本文是《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之一。列宁在这一提纲中阐述了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和任务，指出必须把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即统治阶级利益区分开来，把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区分开来。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要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封建主义的农民运动，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要同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紧密联盟。

[\(2\)](#) 列宁在校样上用大括号将第二点和第三点括在一起并写道：“第二点和第三点合并”。——俄文版编者注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

（1920年7月19日）

（热烈欢呼。全场起立，鼓掌。报告人准备讲话了，听众仍继续鼓掌，用各种语言欢呼。长时间欢呼。）同志们，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问题的提纲⁽¹⁾已经用各种文字发表了，这个提纲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新东西（特别是对俄国同志来说），因为这个提纲主要是要把我国革命经验的某些基本点和我国革命运动的教训推广运用于西方国家，运用于西欧。因此，对我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即国际形势部分，我要稍许多谈一点，当然也只能是简要地谈一谈。

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到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资本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极少数资本家有时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转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联合组织的手里。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金融方面、产权方面、部分地也在生产方面，控制了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极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把最自由的共和国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这一点，像法国的利西斯这样一些决非革命的著作家，在战前就已经公开承认了。

一小撮资本家的这种统治达到全盛时期是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夺走，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瓜分完毕。大约40年前，6个资本主义强国所属殖民地的人口不过稍稍超出25 000万。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殖民地人口已近6亿，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当时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匡算一下，约有10亿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受它们的压迫。大家知道，殖民地附属地位，

除了在政治上法律上直接处于附属地位之外，还必须有一系列财政和经济上的附属关系，还要进行一系列不能算做战争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常常不过是用最精良的杀人武器装备起来的欧美帝国主义军队残害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国家居民的大屠杀而已。

由于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这种统治，由于极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最多只有两三家、四五家）的无限权力，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4—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这场战争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这场战争是为了决定：极少数大国集团（英国集团或德国集团），谁可以、谁有权来掠夺、扼杀和剥削全世界。大家知道，战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英国集团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化了。战争一下子就把世界上近25 000万的人口置于同殖民地毫无差别的境地，把俄国约13 000万的人口，奥匈帝国、德国、保加利亚不下12 000万的人口置于这样的境地。这是包括像德国那样最先进、最文明、最有文化、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在内的25 000万人口！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赛条约⁴⁵，迫使先进的民族屈居殖民地附属地位，陷于贫困、饥饿、破产、无权的境地，今后世世代代都要受条约的束缚，这种遭遇是任何文明的民族所未曾有过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世界的图景：战后马上使不下125 000万人遭受殖民压迫，遭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自夸爱好和平，50来年前，它还可以勉强这样吹嘘，因为那时候，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垄断还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还可以比较和平地发展，而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如今这个“和平”时期已经过去，压迫更加骇人听闻了，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又重新抬头，而且变本加厉了。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以及其他许多战败国经济崩溃，无法生存，丧尽权利，备受屈辱。

有多少国家从中得到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想到美国。只有美国一国在战争中完全是获利的，它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它的人口不超过1亿。日本的人口是5 000万，它没有卷入欧美冲突，而攫取了亚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因此也获得了很大利

益。获利仅次于上述两国的是英国，它的人口有5 000万。如果加上战时发了财的中立国的极少数人口，总计约25 000万人。

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后世界状况的轮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125 000万，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因战败而沦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25 000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已仰赖美国，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是居民不到25 000万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从瓜分世界中得到好处。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是175 000万，构成世界人口的总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世界的这样的一幅图景，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了对第二国际作极其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主席同志讲到了这一点），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当然，这些数目字只是粗略地勾画出一幅世界经济的图景。同志们，在世界人口这样划分的基础上，金融资本的剥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加重了许多倍，是很自然的。

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附属地位，就是在每个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一切资本主义矛盾都尖锐化了。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

就拿国家债务来说吧。我们知道，从1914年到1920年，欧洲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债务至少增加了六倍。下面我再引证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经济材料，即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凯恩斯是英国外交家，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参加凡尔赛和谈，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直接作了观察，一步步地作了详尽的研究，并且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参加过各种会议。他作出的结论，比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引人注目，更发人深思，因为作出这个结论的人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在这个英国市侩的想象中，布尔什维主义的样子是畸形的狰狞可怕的。凯恩斯得出结论说，欧洲和

整个世界正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而走向破产。凯恩斯后来辞职了，写了一本书，指责政府说，你们在干蠢事。我现在把他的数字综合摘引一下。

列强之间的债务关系怎样呢？我按1英镑等于10个金卢布的比价来折算。那么，美国借出是190亿，贷入是零。战前它是英国的债务国。莱维同志1920年4月14日在最近一次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得很对，现在世界上只剩下英美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只是美国在财政上是绝对独立的。美国战前是债务国，现在却完全是债权国了。世界上其他强国都负了债。英国的状况是：借出170亿，贷入80亿，已经陷于半负债地位。而且在它借出的款项中，有近60亿是俄国欠的，其中包括俄国战时赊购军火的欠款。不久前，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代表克拉辛在同劳合—乔治安谈到贷款条约问题时，曾经明确地告诉过英国政府的领袖们、学者和政治家们，要是他们还指望收回债款，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外交家凯恩斯也早已指出了这种错误。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甚至根本不在于俄国革命政府不愿还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还这种债，因为这些债款是已经还本20次的高利贷的利息。连那位丝毫不同情俄国革命运动的资产者凯恩斯都说：“显然这些债务是不能算数了。”

至于说到法国，凯恩斯引用了这样的数字：借出35亿，贷入却是105亿！要知道，法国人曾自称是全世界的高利贷者，因为它有大量的“积蓄”，它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在金融上的掠夺积累了巨额的资本，使它能够几十亿几十亿地贷给别国，特别是贷给俄国。这些贷款提供了巨额收入。尽管如此，尽管法国是战胜国，它还是陷于负债地位。

共产党员布劳恩同志在《谁应该偿还战时债款？》（1920年莱比锡版）一书中，引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材料。材料得出了各国债务对国民财产的比例：英、法这两个战胜国的债务相当于全部国民财产的50%以上；意大利相当于60%—70%；俄国相当于90%。但是，大家

知道这些债务并没有使我们担心，因为在凯恩斯的著作出版前不久，我们就已经听从了他的绝妙忠告——废除了一切债务。（热烈鼓掌）

然而凯恩斯在这里不过是大发其庸人常有的怪癖罢了，他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忠告时说，法国当然只会占到便宜，英国损失当然不会太大，因为反正从俄国是捞不回什么了；只有美国要受很大的损失，但是凯恩斯指望美国能够“大发慈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同凯恩斯以及其他市侩和平主义者是不一致的。我们认为，他们既然要废除债务，就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的方面，朝另外的方向努力，而不应该指望资本家老爷们“大发慈悲”。

从这些最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战争同样给战胜国也造成了莫大的困难。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也说明了这一点。今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维护世界资产阶级秩序、防止革命日益高涨的机关，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最后号召人们遵守秩序，克勤克俭，当然，工人仍旧是做资本的奴隶。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个协约国的机构，全世界资本家的机构提供了以下的数字：

美国物价平均上涨120%，工资却只增加100%；英国物价上涨170%，工资只增加130%；法国物价上涨300%，工资只增加200%；日本物价上涨130%，工资只增加60%（这是我参照布劳恩同志在上述小册子里引用的数字和1920年3月10日《泰晤士报》[\[119\]](#)所载最高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得出的）。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愤怒必然日益强烈，革命思想和革命情绪必然日益加强，自发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必然日益高涨，因为工人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了。工人根据经验确信，资本家靠战争大发横财，而把一切军费和债务转嫁给工人负担。不久前我们得到的一则电讯说，美国为了肃清“有害的鼓动分子”，想再驱逐500个共产党员到我们俄国来。

不要说美国驱逐500个，就是把整整50万个俄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鼓动分子”驱逐到我们这里来，也无济于事，因为使他们束手无策的物价失调问题仍然存在。他们之所以对此束手无策，是

因为他们牢牢地保持着私有制，他们那里的私有制是“神圣的”。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因为现在只有俄国摧毁了剥削者的私有制。资本家对物价失调束手无策，而工人靠原来的工资已生活不下去了。任何老办法都解脱不了这种灾难，任何局部的罢工、任何议会斗争、任何投票表决都无济于事，因为“私有制是神圣的”，资本家已经放了这么多的债，以致全世界都在受一小撮人的盘剥，而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变得愈来愈不堪忍受了。只有消灭剥削者的“私有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拉品斯基同志在《英国与世界革命》这本小册子（我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20\]](#)于1920年2月摘录了其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中指出，英国煤的出口价格比工业当局预计的高出一倍。

兰开夏郡的股票甚至增值400%。银行赢利至少是40%—50%，还应该指出，所有的银行家在计算银行赢利时，都会巧妙地把大部分的赢利用奖金、酬金等名目隐藏起来，也就不算做赢利了。这些无可争辩的经济事实又一次证明：一小撮人大发其财，穷奢极欲，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则日益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应该着重指出，那就是莱维同志在上面提到的他的报告中所特别明确强调的币值变动。由于负债、发行纸币等原因，各国的货币都贬值了。根据上面我提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材料，即1920年3月8日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声明所作的计算，可以看出：同美元比较，英国货币贬值约 $\frac{1}{3}$ ，法国、意大利货币贬值 $\frac{2}{3}$ ，德国货币贬值竟高达96%。

这个事实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正在全面瓦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借以取得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贸易关系，已经无法维持了；正因为许多国家从属于一个国家，币值一变动，这种关系就无法维持了。现在，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国家也不能生存，不能进行贸易了，因为它无法出售自己的产品，也无法买进原料。

结果，连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做买卖了。这一点连凯恩斯那样一个在凡尔赛谈判中历尽千辛万苦的人也不得不承

认，尽管他有捍卫资本主义的坚强决心，尽管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深恶痛绝。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没有一篇共产主义的或任何革命的宣言就其效果来说能比得上凯恩斯书中描写威尔逊和实践中的“威尔逊主义”^[46]的那几页。像凯恩斯和第二国际的许多英雄（甚至包括“第二半”国际^[121]的许多英雄）这类市侩及和平主义者，曾经把威尔逊当做偶像，对他的“14点”顶礼膜拜，甚至撰写“学术”著作论述他的政策的“基础”，指望他能拯救“社会和平”，使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解，实行社会改良。后来凯恩斯却清楚地揭露了威尔逊原来是个愚人，这一切幻想一碰到以克列孟梭和劳合一乔治两位先生为代表的资本所采取的注重实际、专讲实利的商人政策，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工人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学究们甚至从凯恩斯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威尔逊政策的“基础”，归结起来不过是神父的蠢见，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和对阶级斗争的极端无知。

由于上述种种事实，完全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条件，产生了两种基本情况。一方面是群众的贫困、破产空前加重，这首先是指包括125 000万人口，即占全世界人口70%的地区。这是一些居民在法律上毫无权利的殖民地附属国，是被“委任”给金融强盗们统治的国家。此外，凡尔赛条约把战败国受奴役的地位固定下来了，有关俄国的秘密条约也起了这种作用，不过，这种秘密条约的实际效力，有时和那些写着我们负债几十亿几十亿的废纸不相上下。把125 000万人遭受掠夺、奴役、贫困、饥饿和屈居附属地位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债权国里，工人的处境也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战争使一切资本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了，这就是产生强烈的革命风潮的根源。这种风潮正在增长，因为战时人们受着军事纪律的约束，不是被拉去送死，就是随时都有受到军法制裁的危险。战争环境使人们不能去考察实际的经济情况。作家、诗人、神父和所有的报刊都一味地歌颂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揭露也就开始了：德帝国主义及其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44]被揭穿了；凡尔赛和约被揭穿

了，它本来应当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却变成了它的失败。凯恩斯这个例子还表明，欧美千千万万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多少受过教育有点文化的人不得不走上凯恩斯所走的道路。凯恩斯辞去了职务，写了一本书，揭露本国政府。他的行为说明，一旦千百万人懂得了所谓“为自由而战”等花言巧语不过是十足骗人的鬼话，其结果不过是极少数人发财而其余的人破产、受奴役，那么他们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资产者凯恩斯说，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用凯恩斯所提出的方法，就是废除一切债务！这不光是凯恩斯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一个人的主张，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千百万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千百万人听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呼声：只有废除债务，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此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他们已经把债务废除了）真该死”，让我们去乞求美国“大发慈悲”吧！！我认为，应该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这些为布尔什维主义进行鼓动的经济学家致谢。

如果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像凯恩斯所证实的那样，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那么，十分明显，世界革命的两个条件都正在成熟。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全世界的图景。我们懂得，125000万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向各国人民端出了一项国际联盟^[113]盟约，宣称国际联盟结束了战争，今后不允许任何人再破坏和平。全世界劳动群众寄予最后希望的这个盟约生效，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重大胜利。在盟约还没有生效的时候，有人说：对德国这样的国家不能不用特殊条件加以控制；你们瞧吧，有了盟约就好了。但是，盟约一正式公布，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就不得不背弃了它！盟约一开始生效，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克列孟梭、劳合一乔治、奥兰多、威尔逊这“四巨

头”，又坐下来磋商建立新关系了！盟约这部机器刚一开动，就完全垮了！

我们从侵犯俄国的战争中就看到了这一点。俄国这个又穷又弱、备受压抑的国家，这样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却抗击了所有的国家，抗击了统治全世界的富强国家的联盟，并且取得了胜利。双方力量悬殊，可是我们打赢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之间毫不团结，因为大国之间互相作对。法国希望俄国还它的债，并成为威慑德国的力量；英国则希望瓜分俄国，企图夺取巴库的石油，并同俄国边境上的几个国家缔结条约。英国官方的一个文件，非常诚实地列举了大约半年前（1919年12月）答应要攻占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国家（一共14个国家）。英国曾经打算利用这些国家来实行它的政策，给了它们几百万几百万的贷款。现在这一切指望都已落空，全部贷款也付诸东流了。

这就是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局势。这个盟约存在一天，就替布尔什维主义很好地作一天宣传，因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表明，在每个问题上他们都是互相拆台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为着瓜分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在猛烈地抨击和恶毒地咒骂自己的“伙伴”，斥责对方不该把自己快到口的肥肉抢走。我们看到，就上层来说，极少数最富裕的国家之间已经四分五裂。125 000万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的70%！英、美、日（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极少数最富有的国家，这两三个国家已经无法调整好它们的经济关系，它们把破坏国际联盟成员国和伙伴的政策作为自己政策的目标。这就产生了世界危机。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同志们！现在我们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

英国人文雅的口吻，把这种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人心惶惶”；另一种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况是没有的。现在资产阶级活像一个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的强盗，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局势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这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用微小的让步来麻醉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不可能把某一部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某种运动或起义镇压下去。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用的学究气，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个问题和类似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历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践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召开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种“证明”做准备工作。

我现在拿英国“独立工党”^[29]的领袖拉姆赛·麦克唐纳作例子，来说明机会主义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内还有多么大的势力，有些党的工作离训练好革命阶级去利用革命危机这一要求还多么远。麦克唐纳的《议会和革命》一书中谈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那些根本问题。他在这本书里对形势的描述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大致相同。他承认现在有革命危机，革命情绪正在增长，也承认工人群众是同情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请注意：这里讲的是英国），无产阶级专政比目前的英国资产阶级专政好。

但是，麦克唐纳仍旧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是幻想建立超阶级政府的小资产者。麦克唐纳同一切资产阶级的骗子、诡辩家、学究一样，只认为阶级斗争是一种“记叙的事实”。麦克唐纳绝口不谈俄国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⁵⁰建立似乎是超阶级的“民主”政府的尝试，以及匈牙利、德国等国家的类似的尝试。他却麻醉他的党，麻醉那些不幸把他这个资产者当做社会主

义者，把他这个庸人当做领袖的工人，说什么：“我们知道，这〈革命危机，革命风潮〉会过去，会平息的。”他说，战争必然引起危机，危机在战后虽然不会立即平息，但“总归会平息下去的”！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作报告(1920年7月19日)

一个愿意参加第三国际的党的领袖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样赤裸裸的暴露是罕见的，因而更有价值，它暴露了法国社会党^[122]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49]上层分子中间同样常见的情况，不仅不善于而且不愿意在革命意义上利用革命危机，换句话说，就是既不善于又不愿意使党和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真正的革命准备。

这就是许许多多目前退出第二国际的党的主要弊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谈得最多的是尽量具体而明确地规定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的任务。

再举一个例子。不久以前，出版了一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新书。现在，这种书在欧洲和美洲出版得特别多，可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书出得愈多，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情就愈强烈、愈迅速地增长起来。我指的是奥托·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德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它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已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主义的同情掩盖起来，可是他写的却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在欧洲和美洲，现在倒必须使更多的人更确切地了解什么是孟什维主义，因为这是一个概括所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派别的类概念。我们俄国人可能没有兴趣为欧洲写一本书来说明什么是孟什维主义。而奥托·鲍威尔写的书实际上做到了这一点。我们预先感谢那些要把这本书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和机会主义出版家。鲍威尔的书是共产主义教科书有益而独特的补充读物。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了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主义，指出他背叛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要是你解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你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最好不要加入共产党。（鼓掌）

奥托·鲍威尔用一句话绝妙地表达了世界机会主义观点的全部实质——为此我们应当在他生前就给他建立纪念碑，如果我们能够在维

也纳随意做主的话。他煞有介事地说，在现代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暴力，无异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这句话也许你们听起来很古怪、很费解吧？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糟蹋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可以把最革命的理论弄得何等庸俗，甚至用它来为剥削者辩护。只有德国那种市侩才能炮制出这样一种“理论”，说什么“各种社会力量因素”就是人数、组织能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积极性和教育程度。如果农村里的雇农和城市里的工人对地主和资本家使用了革命暴力，这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使用暴力，绝对不是。这是“对各种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

我举的这个例子也许听来有点可笑。但是，现代机会主义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总是会闹出笑话来。现在，引导工人阶级、引导工人阶级中一切肯动脑子的人参加国际孟什维主义（麦克唐纳之流、奥·鲍威尔之流）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对于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一件最有益、最迫切的事情。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在西欧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创造自己的文化都是靠了能剥削10亿被压迫的人民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他们能够从本国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

战前有人计算过，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100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中心城市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

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工人政党要治好这种病症比我们要困难。我们都知道，自从第三国际成立以来，医治这种病症已经获得了极其巨大的成效，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治愈，因为全世界工人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还远没有肃清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

我不打算再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这个工作。这一点在我发表的提纲中已经讲过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经济根源。这病拖的时间很久了，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经过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下定决心，把各国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同这一任务比起来，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将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我们在许多国家里看到反对议会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其说是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带来的，还不如说是受无产阶级的某些先进部队支持的，因为这些先进部队痛恨过去的议会活动，痛恨英、法、意等一切国家中议会活动家的所作所为，这种痛恨无疑是合理的、正当的和必要的。共产国际应当指导同志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俄国的经验，了解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我们的工作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运动中的这些错误缺点作斗争比较容易，而同那些以改良主义者的姿态加入第二国际旧党、并按资产阶级精神而

不是按无产阶级精神来指导党的全部工作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要困难一千倍。

同志们，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主席同志曾在会上说，这次代表大会可以称为一次世界性代表大会。我认为，他说得很对，特别是因为有不少殖民地、落后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了。而巩固这种团结，则要靠我们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工人的革命进攻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之外、只被看做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进攻联合起来，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帝国主义战争帮助了革命。资产阶级从殖民地、落后国家以及那些最偏僻的地方征兵来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英国资产阶级要印度士兵相信，抗击德国、保卫大不列颠是印度农民的义务；法国资产阶级要法属殖民地的黑人士兵相信，保卫法国是他们的义务。英法资产阶级教给了他们使用武器的本领。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本领，为此我们要向资产阶级深深致谢，我们要以全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特别要以全体俄国红军的名义向他们致谢。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在这些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这种苏维埃将不是工人苏维埃，而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

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会碰到许多困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或者指出一些实际工作的原则，使得到目前为止在亿万人当中无组织地进行的工作能够有组织地、协调地、有步骤地去做。

现在离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23]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们就战胜了第二国际。现在苏维埃思想不仅在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当中已经传播开来，他们不仅已经知道、已经懂得了这种思想。一切国家的工人都在嘲笑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自命为社会党人，以学者或准学者的态度，像好讲体系的德国人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体系”，或者像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124]那样谈论什么苏维埃“思想”。这种关于苏维埃“体系”和“思想”的议论，在工人当中往往会混淆视听，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但是，工人现在正在抛弃这种学究式的无稽之谈，拿起苏维埃给他们的武器。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

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

被剥削者必须奋起推翻剥削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这并不是十分复杂的道理。在有了我国的经验之后，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半之后，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全世界亿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懂得了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俄国由于比国际帝国主义弱，常常不得不实行妥协，等待时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维护125 000万人的利益。暂时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有绊脚石，还有偏见和无知这样的障碍，但是这些正在迅速地被克服，愈往后，我们愈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占世界人口70%的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宣传，只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基本的思想，只是在发出斗争的号召，我们还只是在了解什么地方有人能走这条路；而现在，我们到处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到处都有了无产阶级大军，虽然有时组织得不好，还需要改组。既然各国的同志们现在都在帮助我们组织一支统一的大军，那么任何缺点都阻碍不了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长时间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05—223页

[\(1\)](#)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79—195页。——编者注

(2) 本文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一。列宁在报告中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剖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列宁指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历巨大的革命危机，一方面群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在极少数势力极大的战胜国中间，瓦解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深。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践来证明，它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它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25]

（1920年7月26日）

同志们，我只简短地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我们委员会过去的秘书马林同志向你们详细地报告我们对提纲所作的修改。在他之后，补充提纲的起草人罗易同志也要发言。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¹⁾和补充提纲。这样，我们在一切最重要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现在，我就来作几点简短的说明。

第一，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

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10亿人以上，大概是125 000万人。我们把世界总人口按175 000万计算，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有些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有些是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还有一些则是被帝国主义大国的军队打败，由于签订了和约而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穿着整个提纲，不仅由我署名的、以前发表过的第一个提纲是这样，罗易同志的提纲也是这样的。后一个提纲主要是根据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的，因此，对我们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们提纲的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

的斗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它涉及的是世界上一个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第三，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某些意见分歧。我们争论的问题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样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结果我们一致决定：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但是当时有人反对说，要是我们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极力在被压迫民族中培植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在委员会里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唯有注意这种区别，把“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提法一般都改为“民族革命”才是正确的。我们这样修改，意思是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这样的改良派资产阶级。殖民地国家已经

有了改良主义的政党，这些党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上面指出的那种区别现在已经贯穿在整个提纲里面了，我认为，这就更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

此外，我还想对农民苏维埃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政府的殖民地里，在像土耳其斯坦这类落后国家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过在资本主义前的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谈不到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些国家里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如此，我们在那里还是担负起了领导者的作用，并且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表明，在这些国家里一定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我们工作的实际结果也表明，在这些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尽管有这些困难，仍旧可以在群众中激发起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愿望。这个工作对我们比对西欧国家的同志们更困难些，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正忙于国家事务。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同样明显的是，那些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剥削的被压迫群众，在本国的条件下也能够运用这种武器，这种组织形式。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委员会里有几个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讨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必须指出：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无论在落后国家或者在殖民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这一思想是各国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只要是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该立即进行建立劳动人民苏维埃的尝试。

这样，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在这方面我们的共同经验暂时还不很丰富，但是我们会逐步

地积累起更多的材料。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不但对我署名的提纲，而且更多地对罗易同志起草的提纲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罗易同志还要在这里对他那个提纲作些说明），并且一致通过了对后一个提纲的一些修正。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不可能预先指出。实际经验将会给我们启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建立苏维埃这一思想对于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殖民地各民族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126]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普通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

国的统治是背叛行为。的确，有琼果主义^[127]和沙文主义情绪的英、美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二国际最有力的支柱。的确，属于这个资产阶级国际的那些领袖和工人实行过最大的背叛。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47]中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各党也曾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第二国际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过被剥削附属民族所举行的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我认为，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公开地说出这一点，这是无法驳倒的。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人想来反驳。

我们草拟决议时就是把这些看法作为基础的。这些决议无疑是太长了些，但是我相信它们毕竟是有用处的，它们将有助于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开展和组织真正的革命工作，而这正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29—234页

^[1] 见本书第251—258页。——编者注

(2) 本文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三，是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说明。列宁在文中说明了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全世界分成了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和少数几个拥有巨额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强调共产国际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运动，特别要援助落后国家的农民运动。列宁还指出，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重要论述摘编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两个：（1）商品生产是生产的普遍形式。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机体中，产品都具有商品形式，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产品的这种形式才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个别的和偶然的。（2）不仅劳动产品具有商品形式，而且劳动本身即人的劳动力也具有商品形式。劳动力的商品形式的发展程度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底—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98页

目前，雇佣劳动，即为资本家做工，已经成了最普遍的劳动形式。资本不仅统治了从事工业的大批人的劳动，而且统治了从事农业的大批人的劳动。大工厂正是把这种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展到了顶点。各工业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所采用的、俄国全体工人群众深受其害的种种剥削方式，在这里，在工厂，被汇集一起，变本加厉，成为常规，扩展到工人劳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章，一套完整的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和1896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78页

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但它消除不了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

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

《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4—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9页

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

《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1页

我国“人民”手工业的组织，对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它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产生于、萌芽于简单协作的形式（陶器业中的III类）；其次，它向我们表明，由于商品经济而积蓄在个人手中的“储金”怎样变成资本，即先是垄断销路（“包买主”和商人），因为只有这些“储金”的所有者，才有做批发生意所必需的资金，可以等待时机在远地市场销售商品；再其次，它还向我们表明，这一商业资本怎样奴役大批生产者和组织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即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最后，它向我们表明，市场的扩大、竞争的加剧怎样使技术提高，这一商业资本怎样变成产业资本和组织大机器生产。当这种资本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这时我们机智的“人民之友”大喊大叫，说什么“培植资本主义”，“人为地造成”资本主义！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85—186页

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把工业中资本主义的一定阶段即最高阶段叫做大机器工业（工厂工业）。这个阶段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生产中使用机器体系。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剧烈的破坏，各个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一切阴暗面的加剧

和扩大，以及资本主义使劳动大量社会化。因而，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峰，是它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最高峰。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415页

俄国工厂工人的资料完全证实了《资本论》的理论：正是大机器工业对工业人口的生活条件进行了完全的和彻底的变革，使他们同农业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几百年宗法式生活传统彻底分离。但是，大机器工业在破坏宗法关系与小资产阶级关系时，另一方面却创造了使农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工业中的雇佣工人相接近的条件：第一，大机器工业把最初在非农业中心所形成的工商业生活方式带到乡村中去；第二，大机器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雇用农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的巨大市场；第三，大机器工业把机器应用于农业时，把具有最高生活水平的有技术的工业工人带到乡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497页

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将始终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始终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力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和统一成为国家的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资产者阶级，还有和它必然同时存在的死对头无产者阶级，才能各自团结起来，消灭一切古老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的隔阂。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48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向所代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24—325页

交换的发展，大生产的发展，这是几百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处处可见的基本趋势。在交换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大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即大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达到的阶段，交换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大生产达到了十分庞大的规模，以至自由竞争开始被垄断所取代。典型的已经不是“自由地”进行竞争（在国内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企业，而是企业家垄断同盟，托拉斯。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

《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1915年12月21日〔1916年1月3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41—142页

资本主义在战争时期比战前更加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把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抓在自己手中。早在1891年，即在27年前，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像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就是无计划性。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既然有了托拉斯，无计划性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战争做了25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工业国家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也得到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客观情况表明，战争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从垄断向国家化发展。这一切使社会主义革命临近了，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可见，战争的进程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1917年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53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波动才能达到；生产规模越大，它所依靠的消费者范围越广，这些波动也就越厉害。因此很明显，当资产阶级的生产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时，它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的范围：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并为自己找寻大量推销产品的国外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显然丝毫不违背下述这个规律，即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而它也和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这正如危机丝毫不违背价值规律一样。

《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秋），《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80—81页

国外市场所以需要，是因为与一切受村社、世袭领地、部落、地域或国家的范围所限制的旧的生产方式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向。同时，在一切旧的经济制度下，每次生产更新的形式和规模都和从前一样，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一形式的更新是不可能的，无限扩大和不断前进成为生产的规律。

《评经济浪漫主义》（1896年8月—1897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3—134 页

大工业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波动就愈大，而波动的情况如何，则要看整个国民生产或其每个部门是处于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而定。这种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如果没有随时都能给任何工业部门或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的过剩人口（也就是超过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的人口），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分析表明，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只要资本主义一渗入，过剩人口就会形成（农业中的情形和工业中的情形完全一样），过剩人口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主要的形式有三种：（1）流动的过剩人口。属于这一类的是工业中的失业工人。随着工业的发展，他们的人数必然增加。（2）潜在的过剩人口。属于这一类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丧失了自己的产业并找不到非农业工作的农业人口。这种人口随时都能给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3）停滞的过剩人口。他们的就业“极不规则”，生活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在家里替厂主和商店干活的城乡居民。所有这些阶层的总和就构成了相对过剩人口或者后备军。后一术语清楚地表明，这里是指哪一种人口。这里是指工人，他们是资本主义尽量扩大企业所必需的，但是他们永远不能经常得到工作。

《评经济浪漫主义》（1896年8月—1897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48—149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跳跃式、爆发式的。时而是工业的“极度”繁荣，时而是破产、危机和失业。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各个分散的、互不相干的业主凭借私有财产来支配大企业里成千上万名工人的联合劳动，为一个未知的市场“工作”。

《一个“时髦的”工业部门》（1913年7月21日〔8月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68页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

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同时维护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129页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决不在于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做工（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在于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的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的减少，单独的工业部门数目的增多；就是说，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制度的性质完全变了。在存在分散的小企业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了，只影响社会少数成员，并未造成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非常专业化的工业部门，而且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但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么，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只有有了这个企业的商品，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又由资本家各自经营，以他的意愿为转移，把社会产品归他私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同占有形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者，不能不也变成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45—146页

工厂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造成进行这场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在其余一切地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低级的形式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没有的，因为这里的生产分散为成千上万极小的经济单位（它们在最平均的村社土地占有制形式下仍然是分散的经济单位），被剥削者多半还有一点产业，因而被束缚在他们所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体系上。这就使得那些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受到阻碍，遇到困难。分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在一个地点上，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无法了解压迫的原因不在于哪个个人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反之，大资本主义必然割断工人同旧社会、同一定地点、同一定剥削者的任何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不得不思考，使他们处在有可能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地位。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自己的全部活动都集中在工人阶级身上。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资本主义的本性一方面要求无限地扩大生产消费，无限地扩大积累和生产，而另一方面则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把个人消费的扩大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很明显，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

产中的矛盾，而在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中，马克思所证实的也正是这个矛盾。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相反，第2卷对实现的分析根本没有排斥这个矛盾，相反，这个分析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不言而喻，如果根据资本主义的这个矛盾（或者根据它的其他矛盾），就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它同以前的经济制度比较起来没有进步性（这是我国的民粹派所喜欢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在一系列的矛盾中进行，而指出这些矛盾，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看到它要求过渡到更高级形式的条件和原因。

《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底），《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44—45页

大家知道，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极低的工资（=人民群众极低的消费水平）往往妨碍机器的采用。此外，甚至有这样的情形，企业主购置的机器竟闲置不用，因为劳动力的价格降得很低，使用手工劳动反而对业主更加有利！这种情况非常清楚地说明，在消费和生产之间，在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向和人民的无产阶级状况、贫困和失业现象对这一趋向的限制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样也很清楚，从这个矛盾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结论，即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导致资本主义被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经济所代替。相反，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必然经常产生过剩的产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一般不能实现产品，因而不能起任何进步的历史作用等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1899年5月下旬），《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2—143页

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想要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

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不管这是指一次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还是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崩溃。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5页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4—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页

资本主义把这些分散的小市场连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它造就少数巨大的“祖国栋梁”来替代无数善意的小吸血鬼，使劳动社会化并

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挣脱本地吸血鬼的支配而使他们受大资本的支配。后一种支配尽管引起种种惨状，使劳动者受压迫、死亡、粗野，使妇女儿童身心受到摧残等等，但它比前一种支配却是进步的，因为它启迪工人的思想，把隐约的和模糊的不满变成自觉的反抗，把零星的无意义的小骚动变成争取全体劳动者解放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从这个大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本身中吸取力量，因而绝对有希望获得可靠的成功。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1894年春夏)，《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02页

资本打击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造成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品却被一小撮资本家所占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创造着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6—47页

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整个文化，其中包括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苦难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历史现在正以火车头的速度飞驰前进。现在千百万人正在独立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了。

《当前的主要任务》(1918年3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76页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

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7页

注释

[1]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1895年底—1899年1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在彼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著作，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600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助收集到的。列宁于1898年8月9日（21日）写完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当时流放在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版事务，列宁委托给了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为争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尤其关心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1899年3月底，本书在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了24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宣传员在工人小组中传播。1908年，本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出了第2版。

[2]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版于1908年2—3月间出版。在这一版里，列宁根据新的统计资料对本书作了许多补充和修订，主要是：在第2章中增添了分析1896—1900年军马调查总结的一节（第11节）；引用了证明他先前所作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的新事实，特别是工厂统计的新材料；分析了1897年人口普查的总结，更全面地揭示了俄国的阶级结构。在这一版里，还总结了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本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此外，初版为应付检查而使用的“学生”、“劳动人民的拥护者”等用语，都相应改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并且不再用“新理论”这一说法，而直接提马克思著作或马克思主义。据计算，在第2版里共增添了24条脚注，新写了两节，加了一个表，新写了8段正文并对原有文字作了3处大的补充，还作了约75处小的补充和修改。在第2版出版后，列宁对本书的修订仍未停止。列宁在第2版序言的脚注中曾提到，将来修订本书，准备把它分为两卷：第1卷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2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成果。列宁的一系列著作，包括1907年底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85—397页），都是研究1905—1907年革命的总结和成果的。

[3] 指1895—1896年俄国发生的几次大罢工，包括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工厂的罢工、同年秋季彼得堡托伦顿工厂的罢工和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其中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的影响和意义特别大。这次罢工是彼得堡工人解放斗争协会领导的，有3万多工人参加。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关于缩短各类工厂工作日的法令。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认为它开辟了俄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

[4] 指1901年遍及俄国各地的罢工和“五一”示威。它们显示了俄国工人运动已由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和示威。在这一年发生的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的罢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厂方开除了一些参加“五一”罢工的工人，工人群众于5月7日举行抗议性罢工，提出开除为工人所痛恨的工头等要求。工人们对于调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持续三个小时的英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这次斗争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新形式，史称“奥布霍夫保卫战”。

[5] “容克”经济指从封建制演化到资本主义的普鲁士贵族地主经济。容克是德文Junker的音译，即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容克从16世纪起就利用农奴劳动经营大庄园经济，并长期垄断普鲁士军政职位，掌握国家领导权。为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普鲁士在19世纪前半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是：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1850年3月颁布了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允许农民以高额赎金赎免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通过这些改革，容克不仅获得了大量赎金，而且掠夺了1/3的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则丧失了土地和牲畜，成为半无产者：这就为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条件。在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容克农场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和农业机器，但容克仍保留某些封建特权，包括对自己庄园范围内的农民的审判权。列宁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普鲁士式的道路。

[6] 工役制是指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时用给地主干活来代替交纳地租的制度。它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而其最主要基础是割地。

[7]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

[8]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工业家和大工业家莫斯可夫房产主亚·伊

• 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

[9] 1907年6月3日的政变是指俄国沙皇政府在这一天发动的反动政变，史称六三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6月2日（15日）晚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

[10]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

[11]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

[12] 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衷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

[13] “劳动派”政党包括人民社会党、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

[14]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版（1899年）中，本章标题是《向理论求证》。

[15] 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这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做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

[16] 《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

[17] 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

[18] 《祖国纪事》杂志（《К nbsbmn_biiwb E]kemfe》）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

[19] 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

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

[20] 这里指的是1872年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在该书以后的版本中，恩格斯删去了这句话。

[21]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

[22] 《世间》杂志（《И ел ъжѳ》）是俄国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90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1898年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

[23] 分成制是俄国北方捕捉海兽和鱼类的劳动组合中的经济关系形式。在这种劳动组合里，生产工具属于主人，工人对主人处于依附地位。主人通常分得捕获物的2/3，而工人们只能分得1/3，并且还不得不把自己这一份低价让给主人，由主人用生活用品抵偿。

[24] 《火星报》（《И с к р 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

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1905年5月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1905年10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

[25] 《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列宁1903年2月10—13日（23—26日）在巴黎俄国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所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讲演的提纲和第一讲的提要。

俄国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是由一批被沙皇政府逐出俄国高等学校的自由派教授于1901年创办的，主要组织者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尤·斯·加姆巴罗夫和叶·瓦·罗别尔季。这是一所合法的学校，学员主要是巴黎俄国侨民区的流亡革命青年和俄国大学生。该校校务委员会在拟订1902年讲演人名单时，邀请了社会革命党人维·米·切尔诺夫和卡·罗·卡乔罗夫斯基讲土地问题。巴黎火星派小组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定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代表也争取一个在该校讲演的机会。他们要求聘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评论集》这两部合法著作的作者弗·伊林来校讲演。校务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1902年12月发出了正式邀请。后来，学校领导弄清了弗·伊林和列宁原来是一个人，曾企图撤销自己的决定，但是未能实现。列宁在该校作了四次讲演，都十分成功。在准备讲演时，列宁研究了大量有关土地问题的著作，摘译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摘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些有关土地问题的文章，以及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恩格尔哈特、瓦·巴·沃龙佐夫、埃·施图姆普费、罗·罗基尼、路·格朗多、阿·诺西希、胡·伯特格尔等人的书籍和文章。列宁写的讲演提纲要点（两稿）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9卷第225—228、230—240页。

本书所载的第一讲提要是该校一个学员在听讲时作的记录，经列宁审阅过。

[26] 第一届国家杜马，亦称维特杜马，因为第一届国家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1906年4月27日（5月10日）召开的。

在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发表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召开具有立法职能的国家杜马以代替被革命风暴扫除掉的布里根咨议性杜马，指望以此分化和削弱革命运动，把国家引上和平的君主立宪的发展道路。1905年12月11日，沙皇政府公布了《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命令》，这一命令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为选举布里根杜马而制定的以财产资格和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只是在原来的三个选民团——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之外，新增了工人选民团。就分得的复选人数额来说，各选民团的权利不是平等的。地主的1票相当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选举不是普遍的，全体妇女、不满25岁的青年、游牧民族、军人、学生、小企业（50人以下的企业）的工人、短工、小手工业者、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也不是直接的。一般是两级选举制，而为工人规定了三级选举制，为农民规定了四级选举制。

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一再限制曾经宣布过的杜马的权力。1906年2月20日的诏书给了国务会议以批准或否决国家杜马所通过的法案的权力。1906年4月23日（5月6日）又颁布了经尼古拉二世批准的《国家根本法》，将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置于杜马管辖之外。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于1906年2—3月举行。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但是没有能达到搞垮这次选举的目的。当杜马最终召集起来时，列宁要求利用杜马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并揭露杜马的本质，指出它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拙劣伪造品。

第一届国家杜马共有代表47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安·穆罗姆采夫。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过人身不可侵犯、废除死刑、信仰和集会自由、公民权利平等等问题，但是在这届国家杜马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杜马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于5月8日（21日）提出的由42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它力图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另一个是劳动派于5月23日（6月5日）提出的《104人法案》，它要求建立全民地产，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份额平均使用土地。

第一届国家杜马尽管很软弱，它的决议尽管很不彻底，但仍不符合政府的愿望。1906年7月9日（22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27] 青年土耳其党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参加者的泛称，也专指1889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组织“统一与进步”的成员。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限制苏丹的专制权力，把土耳其从封建帝国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家，加强土耳其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挽救陷于瓦解的奥斯曼帝国和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它的领土。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上层资产阶级革命，迫使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年4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的叛乱被粉碎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了新政府。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后很快就失去了革命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府保存了君主政体，并执行反动政策。它与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1918年11月，“统一与进步”党（由“统一与进步”组织改组而成）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自行解散。

[28] 《正义报》（《Justice》）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年1月—1925年初在伦敦出版。它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1911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自1925年2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1933年12月停刊。

[29]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

[30] 《人道报》（《L' 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31] 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

[32]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

[33] “印度党”即“东印度党”，是印度尼西亚的印尼—欧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欧洲人混血种）的政党，于1912年组成。因其纲领中反映了要求独立的愿望，成立后立即被荷兰殖民者所取缔。

[34] 杰尔席莫尔达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这里用做警察专制制度的代名词。

[35] 指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联盟。该联盟于1912年成立，前身为“伊斯兰商业联合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联盟发展成为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性组织。

[36] 列宁于1914年10月1日（14日）在瑞士洛桑市民众文化馆作了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三天前，格·瓦·普列汉诺夫也是在这里作了题为《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的报告。列宁的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这里收载的是1914年10月25日和27日《呼声报》第37号和第38号发表的该报记者（署名为：F. G.）的记录。

列宁还于10月2日（15日）在日内瓦作了题为《欧洲大战和社会主义》的报告，报告稿也没有保存下来。

[37] 《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是为原定于1915年在俄国出版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文集写的。文集遭到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改和扣压，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得见天日。

1917年3月，莫斯科浪涛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文集，作为第1辑。该文集收入了下列文章：列宁的《打着别人的旗帜》（署名恩·康斯坦丁诺夫）、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署名安·米哈伊洛维奇）、伊·伊·斯克沃尔佐夫的《尼·苏汉诺夫谈我们的派别》（署名伊·斯捷潘诺夫）、米·斯·奥里明斯基的《俄国自由派的计划》、弗·巴·米柳亭的《在新的道路上》（署名弗·巴甫洛夫）和维·巴·诺根的《战争与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署名：I. 法布里奇内）。

[38] 指卡·考茨基的《国际观点和战争》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914年11月27日《新时代》杂志第8期上，1915年由《前进报》编辑部出版了单行本。该文的俄译文载于1915年《我们的事业》杂志第1期和第2期。列宁对这篇文章的批判，还见《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95—200页）。

[39] 《我们的事业》杂志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主要刊物（月刊）。1915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被查封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共出了6期。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叶·马耶夫斯基、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涅·切列万宁等。

[40] 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付之一炬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是书中人物米哈列维奇的诗句，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背叛自己过去的信念。

[41]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一书是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根据马·高尔基的倡议，1915年12月在彼得格勒成立的孤帆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题为《战前和战时的欧洲》的通俗丛书，并委托在巴黎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编辑这套丛书。波克罗夫斯基约请列宁撰写这套丛书中带导言性质即关于帝国主义的一种，列宁接受了这一建议。

列宁很早就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他在1895—1913年写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揭示和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所具有的个别特征。他还非常注意论述资本主义的最新书籍的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领导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从1915年中开始，在伯尔尼集中力量认真研究有关帝国主义的问题。他从148本书籍（德文书106本，法文书23本，英文书17本和俄文译本两本）和刊登在49种不同的期刊（德文34种，法文7种，英文8种）上的232篇文章（德文206篇，法文13篇，英文13篇）中作了共约50个印张的摘录、提要、笔记等等（这些资料于1939年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书名在苏联首次出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列宁研究、检验和科学地分析了浩瀚的实际资料，为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作了准备。

1916年1月，列宁在伯尔尼开始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2月列宁移居苏黎世，继续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和撰写此书。他除了利用苏黎世州立图书馆的藏书外，还从其他城市借阅一些书籍。1916年6月19日（7月2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完稿，列宁把手稿挂号寄给了波克罗夫斯基。

高尔基在1916年9月29日给波克罗夫斯基的信里说，列宁的这本书“的确很出色”，可单独出版。然而孤帆出版社编辑部中的孟什维克却对列宁的书稿作了不少修改，如删去了对卡·考茨基和尔·马尔托夫的尖锐批评，把列宁原用的“发展成为”一词（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改为“变成”，“反动性”一词（“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1916年11月，《年鉴》以《最新资本主义》这一书名刊登了该书的出版预告。1917年中这本书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通俗的论述）》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出版，书中附有列宁回国后于1917年4月26日写的序言。列宁1920年7月为本书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对本书内容作了一些重要的概括和补充。

1935年，本书首次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并按照列宁手稿全文刊印于《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9卷。

在我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早在1925年2月就出版过以《帝国主义浅说》为书名的中译文单行本。

[42] 指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该书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列宁曾于1904年翻译过。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它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摘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450—484页），指出该书“一般说来是有益的，特别有益的是它有助于揭露考茨基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虚伪之处”（同上书，第105页）。列宁在利用霍布森这部著作中的大量事实材料的同时，批判了他的改良主义的结论和暗中维护帝国主义的企图。

[43]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德文版于1921年出版，法文版于1923年出版。这篇专为法文版和德文版写的序言先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题刊载于1921年10月《共产国际》杂志第18期。

[44] 布列斯特和约（布列斯特条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和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45] 凡尔赛和约（凡尔赛条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

[46] 威尔逊主义指美国总统伍·威尔逊（1913—1921年）的一套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装扮起来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1913年威尔逊就任总统以后，进行了一些无损

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实行了关税法、累进所得税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同时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方面发表“中立”宣言和“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另一方面加紧向拉丁美洲扩张。1917年美国参战后，他又叫嚷“以战争拯救世界民主”。1918年1月8日，他提出了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在巴黎和会上，他参与制定了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并积极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要求。

[47] 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

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斥责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为反对一切压迫小民族的行为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而斗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48] 指伯尔尼国际。

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斯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49]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1917年4月在哥达成立。代表人物是卡·考茨基、胡·哈阿兹、鲁·希法亭、格·累德堡等。基本核心是中派组织“工作小组”。该党以中派言词作掩护，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放弃阶级斗争。1917年4月—1918年底，斯巴达克派曾参加该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帮助工人党员摆脱中派领袖的影响。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

[50]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

[51]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

[52] 凡尔赛派是指法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胜利后在凡尔赛成立的以阿·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府的拥护者。凡尔赛派对公社战士实行极为残酷的镇压，是巴黎公社最凶狠的敌人。1871年后，凡尔赛派一词成了灭绝人性的反革命派的同义语。

[53] 美西战争是指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发动的战争。1898年4月，在古巴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美国借口其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而对西班牙宣战，向西属殖民地发动进攻。7月，西班牙战败求和，12月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将

其殖民地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古巴形式上取得独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列宁称这场战争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54] 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是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了并吞这两个黄金和钻石矿藏丰富的国家，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由于布尔人战败，这两个国家丧失了独立，1910年被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55]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列宁在肯定这本书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的同时，也批评了作者在帝国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和结论（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369—375、694—695页）。

[56]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于1912年9月20日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决议。该决议谴责帝国主义政策，强调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决议指出：“虽然只有通过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产物，但不能放弃任何旨在减少其一般性危险作用的工作。党代表大会决心尽一切可能促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协定来结束军备竞赛，因为它威胁和平，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党代表大会希望，党员同志要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为扩大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组织而奋斗，以便更强有力地反对专横跋扈的帝国主义，直到它被打倒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使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保障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独立和自由。”

[57] 《德意志帝国年鉴》即《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是德国杂志，1868—1931年先后在慕尼黑、莱比锡和柏林出版。

[58] 《银行》杂志（《Die Bank》）是德国金融家的刊物，1908—1943年在柏林出版。

[59] 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奥·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业的关系》一书作了详细的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156—171页）。

[60] 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格·舒尔采—格弗尼茨的《德国信用银行》和《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两本书作了批判性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37—55、496—512页）。

[61] 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一书作了批判性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414—423页）。

[62] 列宁利用了雅·里塞尔《德国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的两个版本：1910年耶拿版和1912年耶拿版。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详细分析了该书中历年的实际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382—412页）。

[63] 在原统计材料中，本栏数字是4类机构数字的总和，而列宁在本表中只列举了3类机构的数字。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389页。

[64] 总公司在我国亦称法国兴业银行。

[65] 1873年交易所的崩溃发生在这年上半年。19世纪70年代，信用扩张、滥设投机公司以及交易所投机达到空前规模。在工业以及商业都出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明显征兆的情况下，交易所投机还在继续发展。于是灾难终于在1873年5月9日降临到维也纳交易所。24小时之内，股票贬值好几亿，破产的公司数目惊人。这一灾难随即蔓延到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恩格斯曾对这一事件作过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93页）。

[66] 滥设投机公司的丑事指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加紧创办股份公司的热潮。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德国从法国得到赔款50亿金法郎。德国资本家为了趁机牟取暴利，就在各地纷纷开设股份公司和银行企业，进行投机活动。从1871年下半年到1874年之间就成立了857个股份公司，等于前20年所建立的公司总数的4倍。恩格斯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人们滥设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银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表面上叫做工业企业而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的事业。……过度的投机活动最终造成了普遍的崩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93页）

[67]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日报），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68]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看法见他的《论战争》文集，该文集于大战期间在彼得格勒出版。

[69]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70] 俄华银行以及它同北方银行合并后成立的俄亚银行过去在我国都被称为“华俄道胜银行”。

[71] 由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准备作为合法读物在沙皇俄国出版的，所以书中对俄国帝国主义的分析比较简略。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除了使用欧·阿加德的《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从大银行对俄国国民经济和德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来看大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一书外，还利用了>. J. 扎克《俄国工业中的德国人和德国资本》和B. 伊施哈尼安《俄国国民经济中的外国成分》这两本书中的资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106—127、264—266、291—292页）。此外，《关于帝国

主义的笔记》中还包含有其他大量论述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材料和列宁对俄国帝国主义各个方面的评价。

[72] 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是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大的贪污贿赂案。1879年法国为开凿穿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成立了巴拿马运河公司，由苏伊士运河建筑师费·莱塞普斯任董事长。1881年工程开工，由于管理不善和贪污舞弊，公司发生资金困难。公司负责人乃向政府和有关人员行贿，以进行股票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几十万股票持有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1893年议会大选前，这一贿赂事件被揭露，受贿者有总理、部长、议员等多人，结果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潮。为掩盖真相，法国政府匆忙宣告被控的官员和议员无罪，只有一些次要人物被判罪。1894年该公司改组；1903年公司把运河开凿权卖给了美国。后来“巴拿马案件”一词就成了官商勾结进行诈骗的代名词。

[73] 巴格达铁路是20世纪初人们对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波斯湾的铁路线（全长约2400公里）的通称。德国帝国主义为了向中近东扩张，从19世纪末就开始谋求修建这条铁路。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为此亲自访问了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1903年德国同土耳其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从科尼亚经巴格达到巴士拉的铁路的协定。这条铁路建成后可以吧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联系起来，使德国的势力延伸到波斯湾。这不仅威胁着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殖民统治地位，而且同俄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利益发生矛盾。因此，英俄法三国结成同盟来反对德国。这条铁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尚未建成，它是由英法两国的公司于1934—1941年最后修建完成的。

[74]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于1885—1912年在海牙出版。

[75] 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将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上列举的有关全世界的证券发行和各国占有有价证券的资料同他引自瓦·措林格尔《国际有价证券转移对照表》中的资料加以比较和核对，并作出了自己的计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140—146页和第430—431页）。

[76] 《世界经济文汇》（《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是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刊物，1913年起在耶拿出版。

[77]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是英国报纸（日报），1855年在伦敦创刊，起初是自由派的报纸，从19世纪80年代起成为保守派的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成为《每日电讯与晨邮报》。

[78] 《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是英国杂志，1838年起在伦敦出版。

[79] 《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是美国杂志，1890年起在费拉德尔菲亚出版。

[80] 《统计学家报》（《The Statist》）是英国保守派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报，1878年起在伦敦出版。

[81] 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摘引了亨·C. 莫里斯的《从上古到今日的殖民史》一书中的统计资料，认为该书汇集的统计材料很有趣。列宁根据该书提供的资料，计算出了说明各资本主义大国的殖民地占有情况的具体数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268—275页）。

[82] 列宁对亚·苏潘的资料和奥·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的详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322—336页。

[83] 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卡·考茨基及其他考茨基分子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作了批判性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105—106、193—195、285—291页）。

[84] 《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是德国杂志，1880—1941年在柏林出版。

[85] 《铁路业文汇》（《Archiv für Eisenbahnwesen》）是德国公共工程部机关刊物，1878—1943年在柏林出版。

[86] 从《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引用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列宁如何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了1890年和1913年不同国家（大国、独立国和半独立国、殖民地）铁路网发展的详尽数字（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536—544、545—550页）。他将这一研究的结果概括在两张简表之中（见本书第183—184页）。

[87] 取消主义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孟什维克中出现的一个派别的主张。该派别背弃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企图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

[88] 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1884年成立。费边社的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4章第7节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和第26卷第278—284页）。

[89] 最后的莫希干人一语源出美国作家詹·菲·库伯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小说描写北美印第安土著中的莫希干人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奴役和欺骗下最终灭绝的故事。后来人们常用“最后的莫希干人”来比喻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一组织、派别的最后的代表人物。

[90] 指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辛丑议定书）。该条约于1901年9月7日由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同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11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

[91] 指1898年9月英、法两国殖民军队在法索达（位于苏丹南部，现名科多克）武装对峙的事件。这一冲突是由英、法两国争夺非洲殖民地的斗争引起的。英国为巩固自己在埃及的统治，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法军撤离法索达。法国因处境不利，又恐在对英作战时德国乘机进攻，被迫于1899年3月21日同英国签订了放弃尼罗河上游的协定，但它也取得了乍得湖和过去双方一直有争议的瓦达伊地区作为补偿。

[92]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在印成小册子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

[93]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

[94] 《日报》（《Д е н ь》）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日报），1912年在彼得堡创刊。孟什维克取消派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站在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立场上批评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从1917年5月30日起，成为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

[95] 《统一报》（《Е д и н с т в о》）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国派极右翼集团统一派的报纸，在彼得格勒出版。1914年5—6月出了4号。1917年3—11月为日刊。1917年12月—1918年1月用《我们的统一报》的名称出版。编辑部成员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尼·瓦·瓦西里耶夫、列·格·捷依奇和尼·伊·约尔丹斯基。该报持极端沙文主义立场，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用下流报刊的手法攻击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

[96] 《工人报》（《Р а б о ч а я Г а з е т а》）是俄国孟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3月7日（20日）—11月30日（12月13日）在彼得格勒出版，8月30日（9月1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波·奥·波格丹

诺夫、库·安·格沃兹杰夫、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伊·格·策列铁里、尼·谢·齐赫泽、涅·切列万宁等。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

[97] 《真理报》（《П р а в д 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党的指示等。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1912—1914年，《真理报》刊登了300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912—1914年出版的总共645号报纸中，就有190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8次，每次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4月3日（16日）回到俄国，5日（18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10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

[98] 卡德里尔舞是一种有四人参加、分为两对的民间舞蹈，在欧洲颇为流行。

[99] 学理主义指盲目地拘守某种学理，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的表现，意思同“教条主义”相近。

[100]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是为批判卡·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而写的。

1918年8月，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是民主呢还是专政》。列宁在同年9月20日的《真理报》上看到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欧洲国家的三个使节——在柏林的阿·阿·越飞、在伯尔尼的扬·安·别尔津和在斯德哥尔摩的瓦·瓦·沃罗夫斯基——写信，提出了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作斗争的任务。列宁请他们在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小册子出版后立即给他寄一本来，同时寄来考茨基写的所有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

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即动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这部著作脱稿之前，列宁为了尽快占领阵地，又于10月9日用同一题目写了一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02—111页），发表在10月11日《真理报》上，并指示越飞、别尔津和沃罗夫斯基尽快把这篇文章译成外文发表。列宁的这篇文章

译成德文后，于1918年和1919年分别在伯尔尼和维也纳发表；1919年译成意大利文在米兰发表。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于1918年11月10日写成，12月在莫斯科出版。1919年用外文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出版。

[101] 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的两个政党，产生于17世纪70—80年代。

辉格党起初代表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19世纪中叶起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与其他政治团体合并后，组成英国自由党。

托利党代表大地主和英国教会上层僧侣的利益，同时也依靠中、小僧侣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它维护旧的封建传统，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19世纪中叶，在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辉格党和托利党曾在英国轮流执政。

[102] 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做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

[103] 德雷福斯案件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104] 指英国资产阶级血腥镇压1916年爱尔兰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起义一事。在这一事件中，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詹姆斯·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

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东北部分，居民以英格兰人为主；阿尔斯特的军队曾和英国军队一起镇压了爱尔兰人民的起义。

[105] 1917年4月3日（16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资产阶级报纸和临时政府一些部长在俄国政治流亡者取道德国回国等问题上大造谣言，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诽谤、诬蔑，并不断鼓吹以大暴行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为了揭露这些无耻的诽谤、诬蔑，列宁从4月5日（18日）起陆续写了《两个世界》、《资本家的无耻谎言》、《告士兵和水兵书》、《说谎同盟》、《反对大暴行制造者》、《公民们！应当懂得各国资本家采取的手法是什么！》等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25—126、205—206、209—211、218—221、225—228、229—231页）。1917年4月16日（29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资产阶级报纸诽谤、诬蔑布尔什维克。

[106] 第四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颁布的选举法于1912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5日（28日）召开的，共有代表442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这届杜马和上届杜马一样，也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和1名附和孟什维克而不享有完全权利的党团成员（华沙代表，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叶·约·亚格洛）。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向第四届杜马提出对政府的质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坚决反对战争，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14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被捕，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5年8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组成了所谓“进步同盟”，一半以上的杜马代表参加了这个同盟。列宁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十月党人为了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力量战胜德国这一纲领上达成协议而结成的同盟。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代表为了反对革命和挽救君主制度，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3月1日（14日）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达成协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10月6日（19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

[107] 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

[108] 本文是列宁对美国合众社提出的五个问题的答复。这五个问题是：

（1）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否对政府最初的对内对外政策纲领和经济纲领作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改变？什么时候和哪一些？

（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对阿富汗、印度和俄国境外的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策略如何？

（3）你们对美国和日本所抱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何在？

（4）你们准备在什么条件下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曼纳海姆媾和？（5）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美国舆论界？

列宁的答复经布达佩斯转给美国报界。但合众社在转发给各报时删掉了列宁对第5个问题的答复，说那“纯粹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1919年10月，美国左派社会党人的《解放者》杂志发表了《声明和挑战》一文，引述了列宁对第5个问题的答复，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了合众社转发给各报时加以删节的情况。

[109] 指1919年3月苏维埃政府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克·布利特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布利特前往莫斯科是要了解苏维埃政府同意在什么条件下同协约国媾和。

布利特在谈判中转达了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和英国首相戴·劳合一乔治的建议。苏维埃政府为了尽快缔结和约，同意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但对这些条件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美国政府代表布利特和苏俄政府共同制定的和平建议草案全文，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58年俄文版第2卷第91—95页）。

布利特离开苏维埃俄国之后不久，高尔察克军队在东线取得了一些胜利。帝国主义各国政府指望借助高尔察克的力量来消灭苏维埃俄国，于是拒绝了和平谈判。威尔逊不准公布布利特带回去的协定草案，劳合一乔治则在议会宣称他同与苏维埃政府谈判一事根本没有关系。

[110] 指苏维埃政府给挪威著名社会活动家弗·南森的复信。南森在1919年4月17日给列宁的信中谈到，他于4月3日写信给伍·威尔逊、乔·邦·克列孟梭、戴·劳合一乔治和维·埃·奥兰多，提出一项用粮食和药品援助苏维埃俄国的计划。4月17日，“四人会议”同意南森的建议，但有一个保留条件：在苏维埃俄国境内要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调运军队和各种军用物资。5月4日苏维埃政府从无线电中收到这封信后，在5月7日给南森发出了复信。由于这项计划不能保证停止军事行动不被反革命利用，苏维埃政府在复信中表示它只能同协约国各国政府就停止军事行动问题进行谈判。苏维埃政府的建议通过南森转达给了协约国各国政府。但是，协约国列强对这项建议未予答复。列宁对格·瓦·契切林起草的两份给南森的信稿作过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8卷第702号文献）。

[111]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是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之一，写于1920年6月5日。当天列宁将它寄给了斯大林、格·瓦·契切林、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莫·格·拉费斯、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帕·路·拉品斯基等征求意见。对寄来的某些不正确的意见，列宁明确表示不同意。例如，契切林没有很好考虑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农民要加以区别的意见，对此列宁写道：“我的提纲更强调同农民的联盟（而这并不完全=资产阶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意见中谈到未来社会主义欧洲各共和国同经济上落后的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时说：“如果不能同这些民族的领导集团达成经济协议，那么用强力镇压它们和用强制手段把经济上重要的地区并入欧洲共和国联盟就在所难免。”对此，列宁写道：“说得太过分了。‘用强力镇压’‘在所难免’之说是缺乏根据的和不正确的，完全不对。”

提纲初稿由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略加修改，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提纲于1920年7月28日被代表大会通过。

[11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举行（开幕式于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7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其中有27个共产党）的217名代表。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派代表列席大会，有发言权。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去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以俄共（布）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大会，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

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为了预先审议议程上的重大问题，在7月24日举行的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委员会：工会运动委员会、议会斗争委员会、土地问题委员会、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

[113] 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中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

[114] 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115]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于1919年3月21日诞生。从4月起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并利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的军队对它进行武装干涉。在匈牙利红军制止了罗捷军队的进攻并攻入斯洛伐克、协助建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时，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借助外交压力，强迫匈牙利红军停止进攻，撤退到1918年11月签订停战协定时由协约国划定的分界线内。此后，在罗马尼亚干涉军反攻得手的严重时刻，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与匈牙利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相勾结，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妨碍同协约国缔结和约和解除封锁为借口，迫使它于1919年8月1日辞职。

[116] 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是指1918年成立的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芬兰革命于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

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并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国内战争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

[117] 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是在拉脱维亚无产阶级和农民奋起反对德国占领军和乌尔曼尼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斗争高潮中诞生的。1918年12月17日，以彼·伊·斯图契卡为主席的拉脱维亚临时苏维埃政府发布宣言，宣布拉脱维亚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2月22日，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宣布承认苏维埃拉脱维亚独立。拉脱维亚各地纷纷起义。到1919年1月底，拉脱维亚全境除利耶帕亚外都已解放。1月13—15日，在里加举行了全拉脱维亚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宪法，宣布拉脱维亚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选举了拉脱维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制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将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国有。1919年3月，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德国军队和白卫军向苏维埃拉脱维亚大举进攻。5月首都里加陷落。1920年1月初拉脱维亚全境为干涉军占领。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

[118] 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是1917年12月成立的。1918年2月德奥军队侵入乌克兰，4月底乌克兰全境被占领。在赶走了侵略者及其帮凶以后，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恢复。1919年3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19]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

[120]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по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Дела м РСФСР》）是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1919年6月20日—1922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格·瓦·契切林、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费·阿·罗特施坦等参加过该刊的工作。

[121] 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社会党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122] 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法国社会党内公开的改良派和中派同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图尔代表大会上，革命派取得了多数地位。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创立了法国共产党。改良派和中派退党，另行建立一个独立的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一名称。

[123]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 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列宁主持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124]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基尔特”是拉丁语“gilda”一词的音译，意为“行会”）是20世纪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改良主义派别，创始人是费边社成员乔·科尔、阿·约·彭蒂等。1914年，该派建立了“基尔特”全国联盟，制定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纲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在工人中散布可以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幻想。他们提出在现有工联的基础上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按行业组成“基尔特”来管理工业生产，实行“产业民主”、“产业自治”，并由国家来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的消费，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使劳动者得到解放。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为了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相对抗，特别起劲地宣传他们的理论。20年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渐消失。

[125] 这是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所作的报告。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6个委员会之一，由英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德国、荷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中国、朝鲜、墨西哥、俄国、美国、土耳其、法国、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共20人组成。委员会于1920年7月25日讨论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对提纲稍作修改，于7月26日提交大会审议。提纲经代表大会第四次和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后，于7月28日通过。此外，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马·纳·罗易的补充提纲。

[126] 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

[127] 琼果主义即极端沙文主义。19世纪70年代俄土战争期间，在英国流行过一首好战的军国主义歌曲，其歌词中反复出现“by Jingo”（音译“琼果”）一语，意即“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琼果”后来就成了表示极端沙文主义情绪的专用名词。

列宁专题文集

责任编辑：郇中建
装帧统筹：曹 春
编辑助理：崔继新
技术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赵立新 徐林香 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7890-8
I.列… II.中… III.列宁著作—社会主义 IV.A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691 号

书 名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 LIENING ZHUANTI WENJI LUN SHEHUIZHUYI
编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36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7890-8

ISBN 978-7-01-007890-8



9 787010 078908 >

目 录

[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10日〔23日〕）](#)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节选）（1917年4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节选）（1917年8—9月）](#)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2.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节选）（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

[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节选）（1918年3月）](#)

[9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3月8日）](#)

[15就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当前的总口号](#)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提高劳动生产率

组织竞赛

“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结论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节选）（1918年5月5日）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

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节选）（1919年6月28日）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1919年12月2日）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节选）（1920年10月）

1决 议 草 案（10月8日）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节选）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节选）（1920年12月22日）

论统一的经济计划（1921年2月21日）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节选）（1921年3月）

2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3月8日）

5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3月15日）

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1921年4月14日）

论 粮 食 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节选）（1921年4月21日）

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

结束语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节选）（1921年6月13日）

4. 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5. 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6. 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7. 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8. 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9.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10月17日）

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变

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论农民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

战略退却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

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

斗争还将更加残酷

是最后的斗争吗？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

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

过时的方法

最大的奇迹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三大敌人

军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区别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节选）
（1921年10月29日）

1 报告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节选）
（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1. 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2. 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

3. 改行所谓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和工会

4. 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的私有制、由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的私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之间的重大区别

5. 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6. 工会和企业管理

7. 工会的作用和工会怎样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

8. 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9.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10. 工会和专家

11. 工会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节选）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节选）（1922年3月27日）

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

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
（1923年1月23日）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

[重要论述摘编](#)

[返回总目录](#)

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10日〔23日〕）

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0号上曾报道说，我们党的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决定把“欧洲联邦”口号问题推迟到报刊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之后再来解决。[\(1\)](#)

我们的代表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争论，只涉及政治一个方面。其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把这个口号直截了当地表述为政治口号（宣言说：“当前的政治口号……”），同时，宣言不但提出了共和制的欧洲联邦，而且还特地着重指出，“如果不提以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便是毫无意义的和欺骗性的。[\(2\)](#)

在对这个口号作政治评价的范围内反对这样提出问题，例如，认为这个口号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那是完全错误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不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相反，它们总是在促使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到来，为它扩展基础，吸引更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做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

但是，如果说同以革命推翻欧洲三国最反动的君主制度（以俄国君主制度为首）联系起来提出的共和制的欧洲联邦这一口号，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是无懈可击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一口号的经济内容和经济意义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来看，即从“先进的”和“文明的”殖民大国的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

资本已经变成国际的和垄断的资本。世界已经被少数几个大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瓜分完毕。欧洲四个大国英、法、俄、德，共有25 000—30 000万人口和将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它们所占领的殖民地却有近5亿（49 450万）人口和6 460万平方公里土地，即差不多占全球面积的一半（全球面积除两极地区外，共有13 300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亚洲三个国家，即中国、土耳其、波斯，现在正遭到日、俄、英、法这四个进行“解放”战争的强盗的分割。亚洲这三个可以称之为半殖民地（其实它们现在十分之九已经是殖民地）的国家，共有人口36 000万，土地1 45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全欧洲面积的一倍半）。

其次，英、法、德三国在国外的投资不下700亿卢布。保证从这笔相当可观的款项上每年能够得到30亿卢布以上的“正当”收益的，是百万富翁们的全国委员会即所谓的政府。这些委员会拥有陆军和海军，把“亿万富翁”的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充当总督、领事、大使、各种官员、牧师和其他吸血虫。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时代，少数几个大国对地球上将近10亿人口的掠夺，就是这样组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只能这样组织。能够放弃殖民地，放弃“势力范围”，放弃资本输出吗？谁这样想，谁就是把自己降低到牧师的水平，这些牧师每礼拜天都向富人宣扬基督教的崇高教义，劝他们周济穷人……每年如果不能拿出几十亿卢布，至少也拿出几百卢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根据别的基础、别的原则进行瓜分。一个亿万富翁只能“按资本”所占比例同别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而且还要多一点，要让最大的资本得到比它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平地”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小市民和庸人的痴想。瓜分只能“按实力”进行。而实力是

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变化的。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增强要比英法快两三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而要测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

当然，资本家之间和大国之间缔结暂时的协定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之间的协定，也是可能的……协定的内容是什么呢？仅仅是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不让他们被日本和美国夺走，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当前这种瓜分殖民地的状况感到极端委屈，而它们近半个世纪以来实力增强之快，远非落后的、君主制的、已经开始老朽的欧洲所能比拟。与美国相比，欧洲整个说来意味着经济上的停滞。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把反动势力组织起来去阻碍美国的更为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以前，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第一，因为它是和社会主义交融在一起的；第二，因为它会造成一种曲解，以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并且会使人曲解这样的国家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

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并根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64—368页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以后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讨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得出如下的结论：欧洲联邦口号是不正确的。

[\(1\)](#)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3页。——编者注

[\(2\)](#) 同上书，第17—18页。——编者注

(3) 列宁在本文中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编造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谎言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武装人民”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青年国际》杂志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很遗憾，罗·格里姆最近的提纲也对废除武装这一思想作了让步。《新生活》杂志和《先驱》杂志展开了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

一

基本的论点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确、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可是，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基本错误恰恰在于这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革命战争的反对者。各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而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的“提纲”第5条中看到这样一种说法：

“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20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从自己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出发称之为“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

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势必经常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在自己的小册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并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导致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介入，因此，任何民族战争也会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点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在1900—1914年间，许多次殖民地战争走的就不是这条道路。如果我们声称，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将以各交战国打得筋疲力竭而告结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一一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一一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

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²⁾，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事情，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最艰巨、最需要进行的斗争，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父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而他們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不愿设想，不愿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我们决不应该受别人的言词的欺骗。例如，很多人痛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因为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来遮盖和掩饰资产阶级在这场强盗战争中所说的谎话。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不再考虑政治口号的意义。认可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意味着认为这场战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义”战争，——如此而已，再没有别的意义。因为在任何战争中都不排除入侵。否定被压迫民族方面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或者否定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方面在它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加利费的战争中“保卫祖国”，那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而且必然会有：第

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这个一般的考虑。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得有关武器的知识，学会使用武器，占有武器，那它只配被压迫，被虐待，被人当做奴隶对待。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奴隶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武装起来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连瑞士的民兵也不例外，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我认为，这个基本的道理用不着加以说明。只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罢工时都出动军队就够了。

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社会神父和动辄哭泣的小资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死亡和流血等等，那么，相反地我们则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终结的恐怖。如果说当前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进行准备，使这个社会以恐怖而终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陷于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正当的革命战

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废除武装的说教、“要求”（正确些说，是梦想），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灰色的理论”、“干巴巴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方面是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人民而且使青年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此我们回答说：那更好！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么怎么会被青年的军事化等等所吓倒而灰心丧气呢？这并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使这些事实重演表示怀疑，那就真会使人感到绝望。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啊！”在公社时期，妇女和13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战斗。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坐视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差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像1871年那样，再次拿起武器，而且从目前“被吓倒了的”或灰心丧气

的民族中，正确些说，从目前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中，虽然迟早不定，但无疑会产生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军事化成为一切。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小国和中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习一切军事方面的东西——这是无产者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像在当前这场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像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谁由于当前的战争而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恰恰是这种宣传，——那他就最好干脆别说什么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武装人民，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让步。我们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接受这个要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和它必然产生的幻想会削弱和冲淡我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已提上了国际的议事日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的主要缺点之一，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关于同机会主义作斗

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更不用说在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意义上加以解决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第一，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以及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等先生们公开的、无耻的因而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第二，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耶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的其他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公开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政府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和实行“统一”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的一切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以及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一般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或者在不触犯警察禁令的条件下“加以回答”。尽管在这场战争之前不久人们曾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中又正式明确地指出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发，尽管我们很努

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假如我们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让给机会主义者，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就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在这样的纲领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说：“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认可保卫祖国，这完全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去败坏工人运动。”这样具体地回答具体问题，比要求废除武装和拒绝“任何”保卫祖国，在理论上更加正确，对于无产阶级要有益得多，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会更加感到难以忍受！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个人和一文钱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不去帮助资产阶级的民兵，即使在美国、瑞士、挪威等这样的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亲眼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特别是从1907年和1911年以来，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它已堕落到被用来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选举军官，废除一切军法，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像瑞士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无耻地剥削愈来愈多的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学习军事的自由团体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付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

学习军事，而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恰恰要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单靠纲领当然永远不能战胜机会主义，要战胜它只能用行动。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人们言行不符，昧着良心提倡虚伪和讲革命空话（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并且能够影响社会环境，而不仅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个别小国的狭小的、例外的“安静”生活条件，这些国家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且希望这样继续下去。且看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我们国小兵少，我们无法反对大国（因此也就无法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联盟……），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我们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大概是比利时那样的吧？）中立等等。

小国想站在一旁；小资产阶级企图远远离开世界上的大搏斗，利用自己的某种垄断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收到一定的成效并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企图是幻想的和反动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联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且得心应手地、安静地保持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我们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

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即与它毗邻的各交战国的语言。

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交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税”，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用三种语言为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且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广为散发，说明关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事实真相。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像《哨兵报》、《民权报》、《伯尔尼哨兵报》这几家优秀的报纸都已经在这样做，只可惜还做得不够。只有通过这样的活动，阿劳党代表大会的出色的决议才不致仅仅是一个出色的决议。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种方针？

显然，不符合。废除武装客观上符合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狭隘民族的、受小国眼界限制的路线。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地地道道民族的、特殊民族的纲领，而决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的纲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86—97页

(1) 列宁在本文中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而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他批评“废除武装”和“反对任何战争”的错误观点，指出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手段的继续。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仅有帝国主义战争，还有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阶级斗争引起的国内战争，以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资产阶级的战争，因此，社会主义者不能不加区别地反对任何战争。列宁认为，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节选） （1917年4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4月3日夜里我才回到彼得格勒，所以我在4月4日的会议上作关于革命无产阶级任务的报告时，当然只能用我个人的名义，并且预先声明没有充分准备。

为了使我自己和诚实的反对者便于工作，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准备了书面提纲。我宣读了这份提纲，并把它交给了策列铁里同志。当时我读得非常慢，而且读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后来一次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

现在我把我的这份提纲交去付印，只加了一些极其简短的注释，而在报告的当时，这些注释要发挥得详尽多了。



列宁在塔夫利达宫作报告，阐述四月提纲

提 纲

1. 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

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

觉悟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同意进行真正能够证明革命护国主义是正确的革命战争：（1）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2）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放弃一切兼并；（3）真正同资本的一切利益完全断绝关系。

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我们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

要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

举行联欢。

2.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而且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对这个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

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在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极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时必须善于适应这种特殊条件。

3. 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

4. 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比起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一切小

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盟——从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起直到组织委员会（齐赫泽、策列铁里等）、斯切克洛夫等等止——暂时还处于较弱的少数地位。

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

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5.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2\)](#)

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6. 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

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个大田庄（其面积约100俄亩至300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7. 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8.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9. 党的任务：

（1）立刻召开党代表大会；

（2）修改党纲，主要是：

- (a) 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 (b) 对国家的态度以及我们关于“公社国家”⁽³⁾的要求；
- (c) 修改已经陈旧的最低纲领；
- (3) 更改党的名称⁽⁴⁾。

10. 革新国际。

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⁵⁾相对立的国际。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3—116页

(1) 本文是列宁为正式发表他在二月革命胜利后拟定的《四月提纲》而写的，这里只节选了《提纲》。列宁在这个提纲中回答了俄国从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的一系列紧迫问题，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将地主土地收归国有、组建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等重要思想。

⁽²⁾ 即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³⁾ 即由巴黎公社提供了原型的那种国家。

⁽⁴⁾ 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在世界各地都背叛社会主义，投奔资产阶级了（如“护国派”和动摇的“考茨基派”），所以我们不应再叫“社会民主党”，而应改称共产党。

⁽⁵⁾ 所谓“中派”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摇摆于沙文主义者（=“护国派”）和国际主义者之间的那个派别，即德国的考茨基之流，法国的龙格之流，俄国的齐赫泽之流，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英国的麦克唐纳之流等等。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 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节选） （1917年8—9月）

第 五 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第9年卷第1册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2]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1）这是列宁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节选的部分，列宁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关系、国家消亡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列宁系统阐发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学说，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指明它们是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并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列宁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消费品分配上存在的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指出：从形式上的平等即“按劳动”分配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究竟需要经过哪些阶段和通过哪些实际措施，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实践来回答。社会主义不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将在迅速的、真正的、群众性的前进运动中不断发展。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编者注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同我们在前面研究过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粗略地对照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纲领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一词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¹⁾，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仿佛存在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要解决的任务不同。恩格斯的任务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概括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十分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题目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时，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

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造成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²⁾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以后，就来提出问题，并且好像是告诫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实肯定了的科学材料。

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

⁽¹⁾ 同上书，第21页。——编者注

⁽²⁾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1页。——编者注

2.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1\)](#)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关于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材料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 [\(2\)](#)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是怎样变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得惊人地长久和稳定，几乎有半世纪之久

（1871—1914年），而在这个时期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来“利用合法性”，来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举世未有的高度。

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看到的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 500万雇佣工人中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 500万雇佣工人中有300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3\)](#)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并不像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线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⁴⁾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千百万次地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而且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很明显，剥削者少数要能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就必须实行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就必须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其次，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

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过程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动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1\)](#) 同上书，第21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6页。——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编者注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扣除后备基金、扩大生产的基金和机器“磨损”的补偿等等，然后从消费品中还要扣除用做管理费用以及用于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像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估计。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他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1\)](#)

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做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2\)](#)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教授，包括“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3\)](#)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4\)](#)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编者注

[\[3\]](#) 对杜冈的批判，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90—393页。——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编者注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1\)](#)

只是现在我们才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正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像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正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许诺，谈到“实施”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仅没有许诺过，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实施”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为这根本无法“实施”。

这里我们也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不正确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来着重谈论它就很不可笑了，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个别无政府主义者（在克鲁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尔纳利森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已经“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者如少数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格耶所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话）。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

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阶段之一。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

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如下的结果：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会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2\)](#)

当大多数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79—98页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编者注

[\(2\)](#) 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是“政治国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上面第4章第

2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节选）（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确的、最认真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像司徒卢威那样死背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是把它和任何政权一样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照新生活派的意思直说：不是实行工人监督，而是实行国家监督，那得出的是一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话，实质上是一个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式，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点也不反对工人参加“国家”监督。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非常清楚，这种参加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上极巧妙地收买格沃兹杰夫、尼基京、普罗柯波维奇、策列铁里之流以及所有这帮歹徒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跟着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以此说明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俄国工人群众在它的统治下“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折磨”已经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的困难，主要任务。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维埃正在筹

划无产阶级的这种可以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组织工作。

这里我们就涉及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做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

这个“国家机构”（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拿过来”，使它“运转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阶级政府用一道命令就能够而且定会把这些职员变成国家职员，这正像资本主义的看门狗白里安等资产阶级部长用一道命令把罢工的铁路员工变成国家职工一样。我们需要而且能够找到更多的这样

的国家职工，因为资本主义简化了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使之成为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并不那么复杂的记录工作。

把银行、辛迪加、商业等部门的大批职工“国家化”，无论在技术上（由于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我们作好了准备工作），或者在政治上（在苏维埃进行监督和监察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应当和对待资本家一样，只能“从严”。他们一定会和资本家一样起来反抗。一定要粉碎这种反抗；一贯天真得可爱的彼舍霍诺夫是一个真正的“政界的黄口小儿”，他早在1917年6月就咿咿呀呀地说过，“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而无产阶级一定会认真地把这句小孩子话、这句幼稚的狂言变成现实。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问题只是粉碎极少数人，简直可以说是一小撮人的反抗；职员联合会、工会、消费合作社和苏维埃将对他们每个人实行监察，使所有的季特·季特奇之流都受到包围，就像一个法国人被困在色当城下一样。只要弄到一张经理、董事、大股东等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季特·季特奇的名字。他们在全俄国总共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拥有苏维埃、职员联合会等机构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给他们每个人指定10个甚至100个监督者，这样一来，甚至通过工人监督（监督资本家）也许就能使任何反抗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用不着去“粉碎反抗”了。

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税率）的办法来代替没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公开账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工人国家的工人监督。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受国家监督的联合组织，这就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办法，这就是容克国家在德国已经实现、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也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办法，它将保证我们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2\)](#)

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第四条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这个理由同前一个理由比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旧机构我们当然既不能掌握也不能使它运转起来。新机构苏维埃则借助“猛烈迸发出来的真正人民的创造力”已经运转起来了。不过必须解除领导这个机构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套在它身上的羁绊。这个机构已经在运转，不过必须去掉那些妨碍它全速前进的畸形的小资产阶级赘瘤。

为了补充以上所述，还应当研究两点：第一，不是我们而是资本主义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第二，在管理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方面加强民主制的意义。

粮食垄断和面包配给制不是我们而是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和它整个历史创造活动一样，是从资本主义那里获得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臆造”和“凭空创造”这种武器。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一旦用来对付资本家和所有富人，一旦由工人用来对付这班人，它就会产生一种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力量，使国家机构“运转起来”，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监督和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只能起震慑的作用，只能粉碎积极的反抗。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震慑”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且还要粉碎消极的、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们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强迫他们在新国家组织范围内工作。“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重新为国家服务。无论是对资本家，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以及某些高级职员等等，都应当如此。

我们也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一个正在打仗的资本主义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这个手段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

每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那时，这个证件对他并不是一种侮辱，虽然现在它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证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证明。

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的制度（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绝大多数农民大概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用不着劳动手册的）。劳动手册将不再是“贱民”的标志，不再是“下”等人的证件，不再是雇佣奴隶制的证明。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

富人应当向最接近他们的工作范围的工人联合会或职员联合会领取劳动手册，每周或每隔一定时间必须从该联合会取得他们工作踏实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不能领到面包配给证和其他一切食品。无产阶级的国家会说：我们需要银行业的和企业联合的优秀组织者（在这方面，资本家有比较多的经验，而使用有经验的人，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需要比从前愈来愈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识的专家。我们要所有这类工作人员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我们大概只能逐渐实现报酬的完全平等，在过渡期间

将保留这些专家较高的报酬，但是，我们要使他们受到工人的全面监督，我们要彻底地无条件地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最好的工厂、试验站、科学院等这些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我们只能借鉴先进国家最好的经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8—304页

(1) 列宁在本文中论证了布尔什维克能够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在节选的部分，列宁论述了“工人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列宁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困难、主要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并依靠工人阶级进行监督。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的计算机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而应使它们摆脱资本家的控制，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服务。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 参看我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那里更详细地说明了强迫辛迪加化的意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02—205页。——编者注）

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

今天，11月18日星期六，我在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有人当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立刻作了答复。这个问题以及我的答复必须立即让所有读者都知道，因为，从形式上说，我只是以个人名义讲话，而实质上我是代表整个布尔什维克党讲话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讲话中提到工人布尔什维克同目前许多农民所信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问题时作过论证，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相反地，以被剥削劳动阶级为一方同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联合”（联盟），由于两者的利益是根本相悖的，不可能是“真诚的联合”。

我说过：假定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占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少数，甚至只有一个农业人民委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是不是能够实现真诚的联合呢？

能够，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护国派）的斗争中固然决不调和，但在就有关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土地纲领中纯社会革命党的条文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则应当弃权。例如，土地平均使用和小业主中间重分土地就属于这样的条文。

布尔什维克在表决这样的条文时弃权，丝毫没有违背自己的纲领。因为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对工厂实行工人监督，接着是剥夺这些工厂，实现银行国有化，建立调节国内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高经

济委员会），工人们必须同意被剥削劳动农民小农提出的过渡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我说过：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1899—1909年），他多次肯定，大农业的国家和小农业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在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这类条文时，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弃权，因为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农民）同意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等条件下，土地平均使用不过是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无产阶级硬性规定这样的过渡办法是荒谬的；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它在选择这些过渡办法的时候，必须向被剥削劳动农民小农让步，因为这些办法不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当时有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费奥菲拉克托夫同志）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在立宪会议中，农民希望通过关于土地平均使用的法律，而资产阶级反对农民，如何解决取决于布尔什维克，这时布尔什维克将采取什么态度？”

我回答说：在实行了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等等措施、社会主义事业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必须投票赞成农民，反对资产阶级。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提出自己的特别声明，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等等，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弃权，那就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而出卖自己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出卖农民。只要政权掌握在工农政府手里，只要实行了工人监督，实行了银行国有化，建立了指导（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工农最高经济机构等等，土地平均使用等办法是决不会危害社会主义的。

这就是我的答复。

尼·列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98—100页

(1) 列宁在这封信中阐明了工农联盟的意义，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是工人的同盟者，雇佣工人和被剥削的农民必须而且也能够实现真诚的联合，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完全能够体现工农的利益，而且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真正得到实现。

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4—27日 〔1918年1月6—9日〕）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私人进取心及其他绝妙的品质和魅力。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品质的意义和不顾“人的本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稍微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意味着空前残暴地压制广大的、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而且还意味着排斥竞赛，而代之以社会阶梯上层的金融诈骗、任人唯亲和阿谀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的、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富人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下一步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由国家垄断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开辟了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性。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

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当然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不能不对那些顽固的寄生虫及其走卒采用暴力。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工人都不抱什么幻想。工人和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替剥削者做苦工，受到了剥削者无数的欺侮和凌辱，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他们经受了这些磨炼，他们知道要粉碎剥削者的反抗是需要时间的。工人和农民丝毫没有染上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和其他废物的幻想，这些人力竭声嘶地“高喊”反对资本家，“指骂”资本家、“痛斥”资本家，可是一到要真正行动，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去掉资本家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像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用全国广大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世界的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为自己的劳动取代被迫劳动，——这种伟大的更替除需要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作出组织方面的即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同采取军事措施无情地镇压昨天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已经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发号施令的，我们仍旧要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富人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工具。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的。从一己私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神父、录事、果戈理笔下的那类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且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赋予劳动者的那种伟大的、在世界上是真正豪迈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自我安慰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学问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劣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

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到了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的卑鄙私利的支持。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借掠夺来管理，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

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困于饥饿贫穷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破除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

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只求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一把，——这种旧习惯必须破除。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开始了这场斗争，坚决反击有些新进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因为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像从前那样，一心想“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头脑的农民和劳动群众，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么，实行计算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只要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这个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愿地和诚挚地进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

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因为俄国有足够的粮食、铁、木料、羊毛、棉花和亚麻，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是必须正确地分配劳动和产品，对这种分配建立切实可行的全民监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其次是骗子、懒汉和流氓。

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斗争，向骗子、懒汉、流氓开战。这前后两种人，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在这种社会中，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中，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欺骗也行；为了躲避和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少干一分钟也行；为了不挨饿，为了使自己 and 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捞到一块面包也行。

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种主要寄生虫，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章和法律，就要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任何动摇、任何怜悯，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犯罪。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地积极地用满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计算和监督。而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

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做到和完全能够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工作方面实行竞赛，并在全国内把这种竞赛组织起来，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学问的人请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监督那些“有学问的”人所常有的懈怠是另一回事。

这种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干什么事都是开一个头但又半途而废，——这是“有学问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们天性低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可悲的、但在目前不可避免的特点，由于工人对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作缺乏应有的监督，因而产生了一些错误、缺点和失策，这些东西在我国革命的错误、缺点和失策中占了不小的地位。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没有知识分子、专家这些有学问的人的建议和指导性的意见是不行的。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抱怨工农对他们不够重视，对他们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建议和意见是一回事，组织实际的计算和监督又是一回事。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建议和意见，可是他们“笨手笨脚”到了可笑、荒谬和丢脸的地步，没有本事去实行这些建议和意见，切实监督怎样把言论变成行动。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²⁾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惩治、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比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更重要。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³⁾。

必须组织来自工农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骗子，知识分子中间的懒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巴黎公社做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放开手脚，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须使苏维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供给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这种计算和监督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谁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穿上结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让一个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逍遥自在，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牢，或者给予最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处分；不让一个违反社会主义规章和法律的富人逃脱理所当然与骗子同样的命运。“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这就是必须实际安排好的事情。我们的“公社”、我们的来自工农的组织工作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应当为这些实际成就而自豪（这里加上

尤其二字，是因为知识分子太习惯于而且过分习惯于以自己的空泛的意见和决议而自豪）。

对富人、骗子和懒汉切实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成千上万种方式和办法，应当由公社本身、由城乡基层组织在实践中来创造和检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可以保证具有活力，保证成功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目标，即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肃清骗子这种跳蚤和富人这种臭虫，等等。有的地方会监禁十来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特别是党的各个印刷所，有许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这同样也是流氓行为）。有的地方会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在他们监禁期满后发给黄色身份证，使全体人民在他们改过自新以前把他们当做危害分子加以监视。有的地方会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还有的地方会想到把不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例如，把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有条件地释放，使他迅速改过自新。方式愈多愈好，方式愈多，共同的经验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看哪一个公社，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挨饿的人，没有失业的人，没有有钱的懒汉，没有资产阶级奴才中的恶棍和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看哪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看哪里在为穷人建造新的好的住宅、安置穷人住进富人的住宅、按时供给穷人家小孩每人一瓶牛奶等方面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各个公社、村社、消费生产合作社和协作社以及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应当展开竞赛。正是应当通过这些工作让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实践中脱颖而出，并且把他们提拔上来，参加全国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在人民中间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0—211页

(1) 列宁在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机勃勃的力量和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于它使劳动者从被迫劳动转变成为自己劳动，就在于它激发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使他们自觉投入创造性的伟大事业。由工农群众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面的计算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实际工作中开展竞赛。列宁还强调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编者注

[\[3\]](#) 见约·沃·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节选）（1918年3月）

9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3月8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问题从1917年4月起就在党内展开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因此，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就通过了看来不会引起很大争论、甚至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决议，即中央委员会建议更改我们党的名称，把它叫做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布尔什维克。我们都认为附上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整个事态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在我们的报刊上也已经作过解释。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只有巴黎公社是它的雏型，而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过，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²⁾。总之，既然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么，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开始消失，因此，我们就不能赞成旧形式的民主。

另外，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剥夺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有人可能因此把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混淆起来，这种意见在中央委员会里马上就遭到了否决，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把自己仅仅称为共产主义者，总是附加一些东西。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也是各式

各样的，但是这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改良派、民族社会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党派混淆起来。

另外，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

其次，同志们，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关于它的实践和政治部分的问题是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关于党纲的理论部分，我们已有了一些材料：莫斯科和彼得堡出版了关于修改党纲的文集，在我们党的两个主要理论刊物（彼得堡出版的《启蒙》和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上刊登过论述怎样修改我们党纲理论部分的文章。我们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材料。曾经有过两种基本观点，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分歧，至少没有原则上、根本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丢掉我们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我赞成这个观点。不过应该把关于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述补充进去，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还应当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论述补充进去。不管我们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我们这支队伍的命运如何，不管革命今后的变化如何，不管怎么样，卷入这场战争并把最先进国家弄到饥荒、破产和野蛮地步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都已经陷入绝境。这里应该用30年前（1887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估计欧洲战争的前途时说过的话。他说，在欧洲，王冠将成打地滚落街头而无人拾取；他说，许多欧洲国家都难免要遭到难以置信的经济破坏，欧洲战争惨祸只能有一个结局，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³⁾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

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拿自己过了时的谬论来炫耀的人，他们认为在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造成破坏、野蛮、痛苦，使群众遭受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同时，也不能保证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奋起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要恢复它虽然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消灭。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物质残余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文化。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保留旧的纲领，而把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开始的论述补充进去。

我已经在我发表的党纲草案⁽⁴⁾里表明了这个观点。另外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另一种观点反映在我们的一些交谈中，特别是反映在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把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全部删去或者差不多全部删去，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像我们的纲领那样论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论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以及直接向社会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观点有原则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对的。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曲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历史有过多

大的波折，这还是仅就我国来说的；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迅猛，转变也会更复杂），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波折中不至于迷失方向，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或敌人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在理论上设想过、符合我们愿望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些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看到的是俄国内战怎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以及内战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相互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论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依据的绝对确凿的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必须首先在纲领中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就是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这不仅是作鼓动宣传，而且是展示新的纲领，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按时间先后来说由我们担负了第一个角色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是有绝对确凿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这样就会使这些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策略，同我们所赞同的、每个觉悟工人都熟知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转化为帝国主义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论述，这个论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应该重申这个主要之点，以便更清楚地告诉西欧的劳动群众，他们的领导人应该在哪一点上受到谴责。

我认为这样的纲领结构在理论上是唯一正确的，其主要根据就在这里。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当做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质出发，因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在欧洲，这些过渡阶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然如此；所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带民族特色的过渡阶段上，从理论上说是错误

的，因为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却未必必要。我们应该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这样，我们就能从理论上占领和巩固阵地，任何一个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都不会把我们赶出这个阵地。从这里可以得出同样必然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我们这样做，始终是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的。

其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我在《国家与革命》[\(5\)](#)一书中曾尽力说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受到西欧占支配地位的正式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苏维埃革命和俄国建立苏维埃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苏维埃还有许多东西很粗糙，不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细心观察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时期，这种类型的国家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了几个星期，而且人们并没有理解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些创造了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是没有一个法国社会主义派别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我们之前有巴黎公社，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尽管苏维埃中存在着粗糙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特性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起来了。它已经活动了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好几个月了，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在好几个民族地区。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显示了威力，连芬兰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也接受了，那里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政权类型毕竟也是新的、无产阶级的。这就证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以新的民主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新的民主制把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推到了最

重要的地位，使他们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和武装保卫者，并建立能够重新教育群众的机构，——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在俄国这才刚刚开始，而且开始得并不好。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开始做的有哪些做得不好，我们是能够加以克服的，只要历史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一些时间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对新型的国家的论述在我们的纲领中应该占有显著的地位。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不得不在从事政府工作的条件下，在异常匆忙的条件下来制定党纲，我们甚至未能召集自己的委员会，拟出正式的纲领草案。分发给代表同志们的东西只能称为草稿⁽⁶⁾，这一点大家都会清楚地看到。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而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指给欧洲工人看，我们着手做了什么事情，怎样着手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样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在着手做一件好事，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么我们要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多的具体材料，说明我们试图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我们要竭力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竭力说明，这种还有很多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新型民主制，其活的灵魂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关。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关应该像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同群众要接近得多，它们提供了接近群众的机会，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教育这些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渴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着眼于我们一个国家，而且还号召欧洲工人来

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巴黎公社道路的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欧洲工人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一定会来援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要求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这一点也应适用于民主纲领的其他各条。我们应该自己来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审判工作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就在于竭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我们的这些任务，我们就会推动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在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产物，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人民革命的任何一次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靠重复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接触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也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那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而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且考验了这个政权，这就不早了⁽⁷⁾。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

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倒退回去，那是空想。

俄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在历史上是不容否认的。我们说，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类型的国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一点应该在纲领中写明。我们要制定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来代替最低纲领。对新型国家的论述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

显然，我们现在还制定不出纲领。我们应该拟定纲领的基本要点，交给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去制定基本提纲。甚至可以更简单些，可以根据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议的决议⁽⁸⁾来制定，因为那里已经提供了一个提纲。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这种论述，然后提出实际的改造措施。我觉得，在这里，在纲领的历史部分，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没收土地和工厂。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具体的任务，即组织消费，普遍设立银行，把银行变成遍布全国的国家机关网，为我们提供公共簿记，提供由居民自己来进行的计算和监督，这是社会主义的下一些步骤的基础。我认为这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应该以我们苏维埃政权的具体要求的形式写出来，即目前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在银行政策方面，在组织产品生产，组织交换、计算和监督，实行劳动义务制等等方面打算进行哪些改革。如果获得成功，我们就要补充说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大大小小的步骤。这里应该十分精确和清楚地说明，什么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的，什么是我们还没有做完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做完。我们丝毫不要夸大，不要脱离事实，要非常客观地在纲领中叙述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让欧洲的无产阶级看到真实情况，并对他们说：这是应该做的，——好让他们说：俄国人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我们会做得好些。当群众都一心要

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不可战胜。在大家眼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一场纯粹掠夺性的战争。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在大家眼中露出原形，变成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时，这将再一次给西欧无产阶级以新的推动。必须揭露这一点，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争。这就是我认为必须同你们谈谈的总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具体建议马上交换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然后或许就在这里制定几个基本要点，如果认为这样做有困难，那现在就不这样做，而把党纲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或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委托它根据现有的材料和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或秘书的详细记录来制定党的纲领，而党的名称应该立即更换。我觉得，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认为大家都会同意：由于我们遇到了种种事件，我们的纲领在起草工作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我相信，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党的各个派别中有足够的理论人才，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制定出纲领来。当然，纲领中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更不用说在文字和修辞方面不确切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进行这项工作，而安静却是文字工作所必需的。

所有这些错误我们将在工作过程中加以纠正，而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至少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为民主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剥夺剥夺者”这个一般的抽象的公式转到银行国有化和土地国有化这样一些具体的公式，而这些将是纲领的主要部分。

土地问题应该这样进行修改：这里要反映出愿意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愿意帮助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农是怎样在抱有各种偏见、各种旧观点的情况下开始给自己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的。我们不把这一点强加于别的国家，但这是事实。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

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有人责备我们想用暴力实施社会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主要是从小农经济的观点来公平地分配土地。同时我们要优先照顾公社和大的劳动组合。农民说：我们赞成垄断粮食贸易，我们赞成没收银行和工厂。我们愿意帮助工人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必须用各种文字出版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这个法令正准备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们要在纲领中具体地表达出这个思想，要在理论上谈清楚，同时丝毫不要离开确定不移的具体事实。在西欧将会有另外的做法。也许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西欧无产阶级会纠正它。我们请求欧洲的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在几个星期内制定我们的纲领，而我们可能犯的
错误，实际生活会纠正它，我们自己会纠正它。这些错误与我们将要取得的成绩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0—52页

(1) ①在这里节选的报告和发言中，列宁提出了修改党纲的指导思想，阐明了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的重要意义。他主张从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修改党的纲领，要求补充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时代的论述。他反对在党纲中具体描述所谓“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指出，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现在还没有实践。列宁认为，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页。——编者注

[\(4\)](#)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

[\(5\)](#)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编者注

[\(6\)](#)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5—71页。——编者注

[\(7\)](#)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

[\(8\)](#)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2—33页。——编者注

15 就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3月8日）

一

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布哈林同志的修正。纲领应该论述帝国主义和已经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而布哈林同志希望什么呢？他希望论述一下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这里他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我们目前是绝对主张要有国家的，至于说要论述国家不复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那只能谈谈那时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别的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但是，这些还是遥远的事，现在说这些，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除非是说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达到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说过的，已经够我们做的了。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那就是巨大的历史功绩。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说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说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工作，还想做些什么，——这些我们是知道的，也是我们要说的，而这会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可以说丝毫没有夸大自己的力量，而只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些什么，我们还打算做些什么。但是，要我们现在就知道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在理论上，在理论著作里，在文章里，在讲话里，在讲演里，我们将阐述这样一种看法，即像考茨基那样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点放到纲领里去，因为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我们不能再多说什么，而应当尽量谨慎和精确。我们纲领的吸引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要我们表示一点点奢望，硬要提供我们不能提供的东西，那就会削弱我们纲领的力量。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纲领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纲领要论述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和今

后我们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们现在还无法论述社会主义，所以提出这个任务是不正确的。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0—61页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取得了和平（虽然是条件极其苛刻和极不稳固的和平），因而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方面，即集中到组织任务上来。

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3月15日通过的决议第4段（第4部分），在谈到劳动者的自觉纪律以及同混乱和组织涣散现象作无情的斗争的那一段（或那一部分），已经把这个任务向一切被压迫劳动群众明确地提出来了。⁽²⁾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和平不稳固，自然不是由于它现在想要恢复军事行动；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及其应声虫（孟什维克等等）外，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会想到这种事情。和平不稳固，是由于在东西两面同俄国接壤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主战派随时可能占上风，俄国的暂时虚弱使他们跃跃欲试，仇视社会主义和酷嗜抢劫的资本家们也在怂恿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已经白热化的纠纷，对于我们说来，才是实际的而不是纸上的和平保证。这种纠纷一方面表现在西欧各国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在重新进行，另一方面表现为日美争夺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的帝国主义竞争极其剧烈。

很明显，防御力如此薄弱的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极不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使国防力量真正有所增强。

同样很明显，我们对西欧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能给予多少重大的援助，全看我们对面临的组织任务解决得如何。

顺利解决我们当前首要的组织任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人民的政治领导者即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劳动群众中一切觉悟的分子，能够完全理解过去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同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世纪制度这种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即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原因不仅在于受资本剥削的群众由于自身的涣散和不成熟，当时的反抗极其微弱，而且还在于自发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力量。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这种革命，只有在人口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大多数进行独立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能够十分积极地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现在成为俄国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构成目前政治局势的特点，要求苏维埃政权确定新的方针，就是说，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任务。

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无论在沙皇制度时代或在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同克伦斯基之流、基什金之流妥协的时期，这个任务都曾占据首要地位。现在这个任务当然还远未完成（而且无论何时都不会彻底完成），但是大体上已经解决了，因为在莫斯科举行的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大多数工人农民明显地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个任务也远没有彻底完成。因此对这个任务不能忽视，因为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以及他们的应声虫和走卒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仍然试图联合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可是，镇压剥削者反抗这个任务，在1917年10月25日到（大约）1918年2月或者说到鲍加耶夫斯基投降这个时期中，已经大体上解决了。

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当然，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就已经提出并且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可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剥削者还采取公开的内战形式进行反抗，管理的任务不可能成为主要的中心的任务。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任务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

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做到大体上完成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能够做到直接着手管理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应该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项最

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这也是一项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1）①这是列宁阐释苏维埃政权在转折时期的新任务和新方针的重要文章。列宁在文中指出，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应当把工作重心由过去的“直接剥夺剥夺者”转向在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要地位。围绕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目标，列宁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条件和措施，特别强调必须发挥专家的作用，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在劳动组织方面的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4—115页。——编者注

当前的总口号

条件极其苛刻和不稳固的和平，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其代表为克伦斯基和支持他的孟什维克以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遗留给我们的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失业和饥荒，——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客观形势，必然使广大劳动群众十分疲惫，甚至精疲力竭。他们迫切要求（也不能不要求）一定的休息。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医治由战争、军事失败、投机活动和资产阶级妄图恢复被推翻的剥削者政权的行径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苏维埃政权目前只有排除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抗，实际解决这些维持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和最基本的任务，才能保障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看来好像是一种怪论，但事实上，在上述客观条件下，这却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由于当前形势的具体特点，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关于土地社会化、工人监督等等法令，实际解决这些最基本的任务同克服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的组织工作上的困难，已经成为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正是这些从前被资产阶级用来掩饰他们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时受到革命无产者的正当讥笑的口号，现在，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的口号。一方面，劳动群众切实实现这些口号，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盗（以克伦斯基为首）弄得半死的国家的唯一条件；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法令来切实实现这些口号，又是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那些鄙夷地拒绝把这些如此“陈腐的”和“庸俗的”口号提到首要地位的人，正是不善于了解这个道理。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仅仅一年、摆脱克伦斯基之流还不到半年的小农国家里，当然还有不少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每一次长期的和反动的战争带来的野蛮残暴行为

更加强了这种无政府主义），还产生了不少悲观绝望和无端愤怒的情绪；如果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走狗（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挑拨政策，那么，非常明显，要使群众的情绪完全转变，要使群众转到正规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劳动，优秀的和最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需要作出多么长期而顽强的努力。只有贫苦群众（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实现了这种转变，才能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尤其是最顽固的和人数众多的农民资产阶级。

列寧全集第一種

勞農會之建設

列寧著
李立譯

廣州人民出版社印行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人民出版社1921年出版的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译本(当时译《劳农会之建设》)

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

拿西欧革命的规模来比较，我们现在大约处于1793年和1871年达到的水平。我们完全有理由引以自豪的是：我们达到了这种水平，并且在一个方面无疑还超过了一些，这就是用法令确认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最高的国家类型——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因为我们仅仅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做出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计算和监督。而不做到这一点，便谈不到实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虽然资本显然还没有被我们彻底击败，虽然向劳动者的这个敌人继续进攻也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规定当前任务就会不确切，不具体，其中没有估计到目前时局的特点：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

这一点可以打个比喻来说明。我们在反资本战争中的状况好比一支打胜仗的军队的状况，它已经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比如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地盘，它必须暂停进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弹药的储备，修理和加固交通线，建筑新的仓库，调集新的后备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打胜仗的军队暂停进攻，正是为了夺取敌人其余的地盘，即为

了取得完全胜利所必需的。目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正是要这样“暂停”向资本的进攻，谁不懂得这一点，那他就是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局势。

当然，所谓“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只能是带引号的，只是个比喻。在通常的战争中，可以下一道暂停进攻的通令，可以实际停止前进。而在反资本的战争中，却不能停止前进，也谈不上我们不再继续剥夺资本。这里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在此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进行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我们就能解决这个任务，就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就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整个“战役”。

但是，我们承认必须弥补疏忽了的事情，是否等于承认某些事情做错了呢？丝毫不是。我们再拿军事作比喻吧。如果单用轻骑兵就能够击溃并且击退敌人，那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只能取得一定限度的胜利，那就完全可以想见，要超出这个限度，就有必要调来重炮兵。我们承认现在应该弥补以前没有调来重炮兵这件疏忽了的事情，这绝不是承认轻骑兵的胜利的进攻是一个错误。

资产阶级的走狗常常责骂我们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这种责骂是荒谬的，只能出于富人的走狗之口。因为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是当时的情况所绝对要求的：第一，当时资本是通过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萨文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鲍加耶夫斯基等人进行军事反抗（格格奇柯利直到目前还在进行这样的反抗）。粉碎军事反抗非用军事手段不可，赤卫队正是完成了使被剥削劳动者摆脱剥削者压迫的极其崇高伟大的历史事业。

第二，当时我们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来代替镇压的方法，还因为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当时我们还不可能支配各种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因为他们或者是在鲍加耶夫斯基之流的队伍中作战，或者是还能用怠工不断进行顽强的消极反抗。现在我们已经粉碎了怠工。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收到了成效，获得了胜利，因为我们既战胜了资本的军事反抗，又战胜了资本的怠工反抗。

这是不是说对资本采取“赤卫队式的”进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形势之下都是适当的，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同资本作斗争呢？这样想是幼稚无知。我们用轻骑兵获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有重炮兵。我们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我们也能够用管理的方法获得胜利。形势改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善于改变。我们一分钟也不放弃采用“赤卫队”镇压萨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可是，我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竟在需要用赤卫队进攻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而且已经胜利地结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它绝不能再生长任何资产阶级这种时代已经来到的时候，还把“赤卫队式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代，或者确切些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要彻底战胜资本，就应该善于使我们的斗争形式适合这个阶段的特殊情况。

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社会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具体些说，用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迈进。而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这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迅

速地在全民范围内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当时由于战争和俄国的落后，这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在粉碎了怠工以后，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专家也完全服从我们。由于整个计算和监督工作搞得相当“晚”，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但还没有造成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大多数怠工者虽然“上班”了，但是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报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熟悉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仔细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背离，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名利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

自然，资产阶级的走狗，尤其是像孟什维克、新生活派³⁶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帮下等奴仆，会因为我们承认后退了一步而耻笑我们。可是我们丝毫用不着去理睬这种耻笑。我们应该研究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极端困难的新道路的特点，不要掩盖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而要努力及时做完尚未完成的事情。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

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遭受过局部的失败，在某一方面和某一地方暂时后退过。而我们所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役”，比最困难的战役还要困难百万倍，如果因为部分和局部的后退就垂头丧气，那是愚蠢而可耻的。

我们从实际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假设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需要1 000名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第一流的学者和专家来指导国民劳动，以便尽快地发展国家的经济。假设应当付给这些“头等明星”——当然，其中大多数叫喊工人腐化叫得最凶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受资产阶级道德腐化最深的人——每年每人25 000卢布。假设这个总数（2 500万卢布）增加一倍（假定对成绩特别优良而迅速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组织技术任务的人给以奖金），或者甚至再加三倍（假定还要聘请几百个要价更高的外国专家）。试问，为了按照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苏维埃共和国每年花费5 000万或1亿卢布，能不能说是花费过多或担负不起呢？当然不能。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能不损失数十亿卢布，而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能使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明星”人人自愿来参加我们的工作的程度。

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在急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冒险家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和各种委员当中那些无能的或者无耻的人，也是乐意充当“明星”——盗窃公产的“明星”的），也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每一个有头脑的正直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的做法，都会认识到：要一下子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是办不到的；要使苏维埃共和国免除5 000万或1亿卢布的“贡赋”（因我们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赋），就只有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

“保存资本主义遗产”、“拘守资本主义传统”的人，即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公产盗窃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产”）。如果觉悟的先进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苏维埃机关帮助之下，能够在一年内组织起来，有了纪律，振奋起精神，建立起强有力的劳动纪律，那么，一年以后我们便能免除这项“贡赋”，甚至在这之前，随着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的提高，就能缩减这种“贡赋”。我们工人农民通过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最好的劳动纪律和高级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快地免除向这些专家交纳的一切“贡赋”。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工作大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对于了解目前时局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各种任务是一个关键。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心正在转移到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上来。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在银行国有化、垄断对外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征收在无产阶级看来是适当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在实行劳动义务制方面，正确规定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当前任务。

在这些方面（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整个计算和监督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自然，这是最困难的任务中的一项任务，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形下，这项任务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可是，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恰恰是在这里同我们进行最严重的较量，他们破坏正在建立的监督，例如破坏粮食垄断，夺取阵地进行投机活动和投机买卖。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要继续实行银行国有化，坚决地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簿记的枢纽机关，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做出下列的实际成果：增加人民银行分行的数量，吸收存款，简化储户存款取款的手续，消灭“排队”现象，逮捕和枪毙受贿者和骗子等等。先把最简单的事情切实做好，把目前的事情安排好，然后再准备做比较复杂的事情。

巩固并且整顿那些已经实行了国家垄断的事业（如粮食垄断、皮革垄断等等），借此准备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没有这种垄断，我们就不能用交纳“贡赋”的办法“摆脱”外国资本。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能，就全看我们能否在一定的过渡时期内，用向外国资本交纳一些贡赋的办法保护自己国内经济的独立。

一般的征税工作，特别是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工作，我们也非常落后。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这是一项在原则上完全可行并且得到无产阶级赞同的措施）表明，我们在这一方面仍然更接近于夺取的方法（为了穷人，从富人手里把俄国夺取回来的方法），而不是管理的方法。可是，我们要想更加强大，要想更稳固地站住脚，就必须转而采用这后一种方法，就必须用常规的、照章征收的财产税和所得税来代替向资产阶级征收特别税的办法。这能给无产阶级国家更多的好处，但也要求我们有更高的组织程度，有更完善的计算和监督。

我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过迟再一次表明，当前迫切需要着手的正是组织准备工作，这项工作一方面是要彻底巩固已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为准备一次“包围”资本并迫使它“投降”的战役所必需的。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但在实行时应当十分慎重，逐步进行，用实际经验检验每一步骤，而且，第一步当然是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对每个资产者（农村资产者也在内）建立劳动消费收支手册，将是进到完全“包围”敌人和建立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真正全民计算和监督的一个重大步骤。

为全民计算和监督而斗争的意义

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国家的一切极端仇视和不信任。克服这一点，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在计算和监督的问题上，即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立即面临的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遗产”的影响表现得特别尖锐。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认识（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亲身的苏维埃的经验）并且感受到：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重新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就不可避免。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习惯和传统，也是反对国家监督而主张“神圣的私有财产”和“神圣的”私有企业不可侵犯。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的论点是多么正确，这些思潮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多么不可调和。努力把由苏维埃即国家实行监督 and 计算的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力求实现这种思想，力求破除把获得衣食看做“私”事，把买卖看做“只是与我有关”的这种旧时恶习，——这是一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自觉性反对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斗争。

我们已经把工人监督制定为法律，可是它刚刚开始深入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生活，甚至刚刚开始深入他们的意识。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没有表报，没有监督，就是扼杀社会主义的幼芽，就是盗窃公产（因为现在一切财产都属于公家，而公家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对计算和监督漫不经心就是直接帮助德国的和俄国的科尔尼洛夫之流，因为只有在我们解决不了计算和监督的任务的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推翻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全体农民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

助下“窥伺着”我们，待机而动，——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在鼓动工作中说得不够，先进的工人和农民也想得不够，说得不够。可是只要工人监督还没有成为事实，只要先进工人还没有对破坏这种监督或对监督掉以轻心的人组织并开展胜利的和无情的斗争，就不能从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工人监督）进到第二步，即转到工人调节生产。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7小时或6小时以至更少。这就非搞好对粮食和粮食生产（然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的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不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一种便于过渡到对产品分配实行广泛的计算和监督的群众组织——消费合作社。在俄国，这种组织不像在先进国家里那样发达，可是还是拥有1000万以上的社员。前几天颁布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清楚地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目前形势和任务的特点。

这个法令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社以及仍然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工人合作社达成的一种协议。说它是协议或妥协，是因为第一，上述这些组织的代表不仅参加了法令的讨论，而且实际上还取得了表决权，法令中有一部分条文因受到这些组织的坚决反对而删掉了。第二，这种妥协实质上就是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免费入社的原则（这是唯一的彻底无产阶级的原则），而且还放弃了一地全体居民加入一个合作社的原则。放弃这个同消灭阶级的任务相符合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原则，就给了“工人的阶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这种场合叫“阶级合作社”，只是因为它们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继续存在的权利。最后，苏维埃政权所提出的把资产阶级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完全排除出去的条文也大大放宽了，只禁止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的老板进入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如果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政权已经搞好了全国范围内的计算和监督，或者至少是搞好了这种监督的基础，那就不会有作这种妥协的必要。那时我们就能通过各地苏维埃的粮食部门，通过各地苏维埃下设的供给机关，使居民都参加统一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合作社，而用不着资产阶级合作社的协助，用不着对纯粹资产阶级的原则让步，这种原则使得工人合作社仍然与资产阶级合作社同时并存，而不是使这个资产阶级合作社完全服从自己，把两种合作社合并起来，自己掌握全部管理权，自己监视富人的消费。

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这种协议时，具体确定了自己目前在发展阶段上的策略任务和特殊的工作方法：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对他们作某些局部的让步，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向前进展的条件，这种进展比我们最初预计的要缓慢些，但是会更稳固，能更可靠地保证根据地和交通线，更好地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苏维埃现在能够（而且应该）用一种非常明显、简单、实际的尺度测量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成绩，这就是看合作社的发展有多少村社（公社或村庄、街区等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包括全体居民。

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我们苏维埃政权正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它已经战胜了剥削者——从克伦斯基到科尔尼洛夫，因而有可能立即开始解决这项任务，直接着手执行这项任务。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夺取国家中央政权可以只花几天工夫，在这个大国的各个角落镇压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可以只用几个星期，而要切实地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至少（尤其是在极其残酷和带来极大破坏的战争以后）需要几年的工夫。这个工作的长期性完全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

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需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条件非常优越，甚至在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也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如矿石（乌拉尔一带）、燃料（西西伯利亚的煤、高加索和俄国东南部的石油以及中部地区的泥炭）、极丰富的森林、水力、化学工业原料（卡拉布加兹湾）等等。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条件就是：第一，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现在这一工作正在突飞猛进，那些被资产阶级陈腐观念所蒙蔽的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了解，由于存在苏维埃组织，现在人民“下层”中的求知热情和首创精神是多么高涨。第二，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这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情况特别不好，要是相信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或为私利而替资产阶级效劳的人的说法，甚至是没有希望的。这些

人不懂得，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有一种革命是不被旧事物拥护者责骂为崩溃和无政府状态等等的。自然，刚刚摆脱空前残酷压迫的群众，他们的情绪是沸腾激昂的；要群众培植出劳动纪律的新基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没有完全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前，这种工作甚至还不可能开始。

我们绝不受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保住自己旧有的特权已经绝望）所散布的、往往是制造出来的那种悲观失望情绪的影响，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掩盖明显的坏事。恰恰相反，我们要揭发它，加强用苏维埃的方法同它斗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性不能战胜自发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克伦斯基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复辟的真正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便不能设想。

俄国无产阶级最觉悟的先锋队，已经给自己提出了加强劳动纪律的任务。例如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开始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法令草案。这项工作应该加以支持和全力推进。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以及使工资同产品的总额或铁路水路运输的经营总额等等相适应。

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在着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要考虑

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要求为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竞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采取强制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致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践中的软弱无力所玷污。

组 织 竞 赛

说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意义，这是资产阶级谈到社会主义时喜欢散布的一种谬论。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通过消灭阶级因而也消灭对群众的奴役，第一次开辟了真正大规模竞赛的途径。正是苏维埃组织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上的民主转到劳动群众实际参加管理，才第一次广泛地组织竞赛。在政治方面实行竞赛比在经济方面容易得多，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重要的正是经济方面的竞赛。

就拿公开报道这样一种组织竞赛的方法来讲吧。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保证这点，实际上却使报刊受资本的支配，拿一些耸人听闻的政治上的琐事供“小百姓”消遣，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在为经济竞赛而利用公开报道方面，我们几乎还没有做什么事。必须系统地进行工作，除了无情地压制那些满篇谎言和无耻诽谤的资产阶级报刊，还要努力创办这样一种报刊：它不是拿一些政治上的耸人听闻的琐事供群众消遣和愚弄群众，而是把日常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共同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我们差不多还没有着手进行这种艰巨的然而能收效的工作——组织各公社间的竞赛，在生产粮食衣服等等的过程中实行表报制度和公开报道的方法，把枯燥的、死板的官僚主义的表报变成生动的实例（既有使人厌弃的例子，也有令人向往的榜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合作社的榜样的意义，必

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小资产阶级幻想家，才会梦想用慈善机关示范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在资本主义社会，统计纯粹是“官府人员”或本行专家的事情；我们则应该把它带到群众中去，使它普及，让劳动群众自己能逐渐懂得和看到应该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样休息，休息多久，使各个公社经营的业务成绩的比较成为大家共同关心和研究的事情，使优秀的公社立即得到奖赏（如在一定时期内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提供许多文化或艺术方面的福利和奖品等等）。

一个新的阶级作为社会的领袖和指导者走上历史舞台时，从来没有不经过极大的“颠簸”、震撼、斗争和风暴时期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选择适合新的客观环境的新方法上，也从来没有不经过无把握的步骤、试验、动摇和犹豫时期的。趋于灭亡的封建贵族在报复战胜和排挤它的资产阶级时，不仅施展了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种种图谋暴动和复辟的活动，并且还不断讥笑那些没有王公贵族那种长期执政的素养而胆敢执掌国家“神圣大权”的“暴发户”、“无耻之徒”的低能、笨拙和错误，——现在，科尔尼洛夫之流和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所有这帮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或资产阶级怀疑论的英雄，对于“胆敢”夺取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也正是采用这种报复手段。

不用说，新的社会阶级，而且是以前一直受压迫、被贫困和愚昧无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阶级，要适应新的地位，认清环境，搞好自己

的工作，选拔出自己的组织家，这不是几个星期的事情，而是长年累月的事情。显然，领导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过去不可能取得从事大规模的、包括千百万公民的组织事业的经验和技能；要把旧的、差不多完全从事鼓动工作的技能改造过来，是一件很长期的事情。可是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只要我们明确意识到必须转变，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坚定决心，有达到这个伟大而困难的目标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在“老百姓”即工人和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农民中，有大量有组织家才能的人；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被资本摧残、毁灭和抛弃，而我们呢，也还不善于去发现、鼓励、扶持、提拔他们。可是，如果我们能以全部的革命热忱——没有这种革命热忱，便不会有胜利的革命——着手学习这项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学会。

历史上任何一次深刻而强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会有肮脏的泡沫泛起，不免有些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大王和大喊大叫的人混杂在没有经验的革新者中间，不免有瞎忙乱干、杂乱无章、空忙一阵的现象，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让资产阶级社会的哈巴狗——从别洛鲁索夫到马尔托夫，为采伐古老森林时多砍下一块碎木片而狂吠吧！既然是些哈巴狗，也就只能向无产阶级大象狂吠。让他们去狂吠吧！我们走自己的路，力求尽量慎重而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只有这样的人，经过多次考验，让他们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然后才应提拔到领导国民劳动和领导管理工作的负责岗位上来。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

“协调的组织”和专政

最近的（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建立“协调的组织”和加强纪律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¹⁾。现在大家都乐意“投票赞成”和“签署”这类决议，但是关于实现这些决议需要强制，而且正是专政形式的强制这一点，人们通常却不去仔细考虑。可是，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很早就十分明确地反对过这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胡说。1917—1918年的俄国，也在这方面非常明显、具体、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只有绝顶愚钝或硬不承认真理的人，才会在这方面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如果把科尔尼洛夫看做俄国式资产阶级的卡芬雅克的话），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个经过了几次非常急剧的转变而非常迅速地发展的国家，在灾难性的战争造成惨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出路。一切中间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资产阶级不能讲真话，不能说他们需要科尔尼洛夫），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切尔诺夫之流、策列铁里之流、马尔托夫之流的愚蠢念头（他们一味宣扬所谓民主派的统一、民主派专政、民主联合战线以及诸如此类的谬论）。如果1917—1918年俄国革命的进程都没有使一个人懂得不可能有中间的解决办法，那么对这样的人也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另一方面，不难了解，凡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面，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这些剥削者的财富，他们在组织能力上和知识上的优势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剥夺掉的，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试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外部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内部战争即内战，而内战造成的经济破坏会比外部战争造成的更大，内战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

极不明确、极不稳定、极为混乱的状态。旧社会的一切有害分子——其数量当然非常之多，而且大半都是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和毁灭——在这种深刻变革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大显身手”。而这些有害分子“大显身手”就只能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收买、投机活动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时间，需要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历次革命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群众革命热忱未能持久的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还不强大，而唯有它才能（如果它有足够的数量、觉悟和纪律）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简单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并且长期掌握政权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有害分子。

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已正确地开始实现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苏维埃组织在俄国一切民族地区的胜利进军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苏维埃政权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先进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这个先进阶级发动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来实行新的民主，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他们正根据亲身体验认识到，有纪律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自己最可靠的领袖。

但是，专政是一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软弱得很，往往不大像铁，却很像浆糊。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部进行活动，采取萨文柯夫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办法，

搞阴谋和暴动，以及通过他们污浊的“思想上的”反映，在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不断造谣诬蔑；另一方面，这种自发势力还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

随着政权的基本任务由武力镇压转向管理工作，镇压和典型的典型表现也会由就地枪决转向法庭审判。在这一方面，革命群众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证明了革命的生命力，在解散资产阶级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颁布以前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即工农的法院。可是，我们革命的人民的法院还非常非常软弱。还可以感觉到，人民把法院看做一种同自己对立的衙门，这种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而留传下来的观点，还没有彻底打破。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法院正是吸引全体贫民参加国家管理的机关（因为司法工作是国家管理的职能之一），法院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权力机关，法院是纪律教育的工具。人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就决不能凭一时的热情，而只能靠全面的、无所不包的、全民的组织和纪律来增产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工业所需要的粮食（燃料），把它们及时运到并且正确地进行分配。因此，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我们现在要最坚决反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表现在对饥荒和失业现象同组织和纪律方面的普遍自由散漫有着国民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一点认识不足，就表现在还牢固地保持着这样一种小私有者的观点：只要我能够多捞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在铁路这个可以说是最明显地体现着大资本主义造成的机构的经济联系的部门，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发势力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的这种斗争表现得特别突出。“蹲办公室的”人员中间产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贿者；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为纪律而斗争；而在前后两种人之间，自然有很多动摇的、“软弱的”人，他们无力抗拒投机活动、贿赂和私利的“诱惑”，不惜破坏整个机构来换取私利，而战胜饥荒和失业是要靠这些机构正确地进行工作的。

在这个基础上围绕最近颁布的关于铁路管理的法令，即赋予领导者个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的法令展开的斗争，是很说明问题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自觉的（而大部分大概是不自觉的）代表，想把赋予个人以“无限的”（即独裁的）权力看做是背离集体管理制原则，背离民主制和背离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些地方利用一些人的劣根性和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进行了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反对关于独裁权的法令。问题变得确实意义重大：第一是原则问题，即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人的这种做法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究竟是否相容；第二，这件事情，也可说是这个先例，同政权在目前具体形势下的特殊任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都应该非常仔细地加以研究。

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这一点上，咒骂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应声虫总是要弄手腕：一方面，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种荒谬的、无政府主义的、野蛮的东西，极力避开我们用来证明苏维埃是民主制的高级形式，甚至是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开端的所有历史对比和理论论据；另一方面，他们却向我们要求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民主制，并且说，个人独裁是同你们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民主制绝不相容的。

这种论断是十分拙劣的。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占少数的剥削者以利于占多数的被剥削者，其次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也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而且是由正是为了唤起和发动这些群众去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苏维埃组织就是这种组织）来实现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像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

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当然，这种过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当然，只有经过极大的动荡、震撼、倒退，经过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巨大努力，这个过渡才会实现。害了《新生活报》、《前进报》、《人民事业报》或《我们时代报》那种庸人的歇斯底里症的人，是不肯考虑这一点的。

就拿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心理来看，把这种心理同他的社会生活的客观物质条件比较一下吧。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实际上从来没有看到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真正作出过任何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大的牺牲或做过有利于他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把许诺过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给他，把和平给他，牺牲“大国地位”的利益和大国秘密条约的利益，牺牲资本和利润。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当他自己用强力取得了这种东西，并且必须用强力来保卫这种东西不受克伦斯基之流、郭茨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杜托夫之流、科尔尼洛夫之流侵犯的时候，他才看到了这种情形。当然，在一定时间内，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喘喘气，伸伸腰和舒展一下躯体，取得一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剥削者没有给过他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当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普通的群众才能不仅亲眼看见，不仅信服，而且还会亲身感到：这样随便地“取得”、夺得、捞一把是不行的，这样会助长经济破坏，招致灭亡，导致科尔尼洛夫之流的卷土重来。普通劳动群众生活条件上（因而还有心理上）相应的转变不过刚刚开始。我们的全部任务，被剥削者求解放愿望的自觉代表者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个转变，了解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领导为寻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众，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即遵守劳动纪律，把开群众大会讨论工作条件同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

资产者、孟什维克和新生活派嘲笑“开群众大会”，更常常恶意地加以指摘，认为这只是混乱、胡闹和小私有者利己主义的发作。可

是，不开群众大会，被压迫群众永远也不能由剥削者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转到自觉自愿的纪律。开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民主，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机会，是他们觉醒过来投入新生活的行动，是他们在这样一个活动场所的初步行动，他们自己从这个场所清除了恶棍（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他们自己还希望学会按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苏维埃的政权（不是别人的，不是贵族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整顿这个活动场所。正是要有劳动者战胜剥削者的十月胜利，正是要有由劳动者自己初步讨论新生活条件和新任务的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够稳固地过渡到更高形式的劳动纪律，过渡到自觉地领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渡到在工作时间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权代表的个人指挥。

这个过渡现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我们看到，劳动群众怎样在自己中间创造出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为推翻剥削者而共同奋斗。1905年10月以及1917年2月和10月这样一些阶段，是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

我们已经胜利地解决了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唤醒和发动被剥削者推下去的社会“下层”，这些人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才得到了推翻剥削者、开始认识环境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的完全自由。正是这些被压迫被蹂躏得最厉害的、受教育最少的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到处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便是革命的第二个伟大阶段。

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必须使我们自己夺得的东西，使我们自己颁布过的、确定为法令的、讨论过的、拟订了的东西巩固下来，用日常劳动纪律这种稳定的形式巩固下来。这是一项最困难而又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项任务，我们才能有社会主义的秩序。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这种民主精神，犹如春潮泛滥，汹涌澎湃，漫过

一切堤岸。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同劳动时无条件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学会。

这件事我们一定能学会。

昨天，我们曾遇到以科尔尼洛夫之流、郭茨之流、杜托夫之流、格格奇柯利之流、鲍加耶夫斯基之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剥削制复辟的威胁。我们战胜了他们。今天，这种复辟，这种同样的复辟，又以另一种形式威胁着我们，它表现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私有者“事不关己”心理的自发势力，表现为这种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纪律性进行的日常的、细小的、可是为数极多的进攻和袭击。我们必须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而且我们一定能战胜它。

[\(1\)](#)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14页。——编者注

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程序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

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是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过渡。

当然，小资产阶级涣散组织的自发势力（在任何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自发势力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而在我国革命中，由于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落后以及反动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表现得特别厉害），也不能不对苏维埃产生影响。

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8小时“分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这种转变是新鲜事物，是一件难事，当然会产生许多可说是摸索的步骤，许多错误和动摇，——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任何显著

的进步。在许多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十分独特，因为他们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又在两者之间意味深长地加上一个词：“飞跃”（有些人想起从恩格斯著作中看到的片言只语，作了更加意味深长的补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认真加以钻研的大多数所谓社会主义者，都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是从全世界历史上的转变这个角度把那种突然转折称之为“飞跃”的，这种飞跃要延续10来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在这样的时期，在所谓“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之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

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是同他们如出一辙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都厌恶苏维埃，羡慕体面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如60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贵族立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一样。

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例如，国民教育委员会，作为苏维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讨论和监督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会议，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赞同和支持的。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是再愚蠢不过的。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编者注

结 论

国际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困难和危险的；必须随机应变和退却；这是等待西欧极其缓慢地成熟起来的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在国内，是缓慢建设和无情“整饬”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简单说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革命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我们现在必须用全力抓住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才能顺利解决当前的任务，直至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这下一个环节闪耀着特别的令人向往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光辉。

我们可以把从当前阶段的特点产生出来的随机应变、退却、等待、缓慢建设、无情整饬、严守纪律、消灭自由散漫这些口号同通常流行的“革命家”这个概念放到一起试试看……有些“革命家”听到这些口号不禁义愤填膺，他们开始“痛斥”我们，说我们忘掉了十月革命的传统，说我们同资产阶级专家妥协，同资产阶级调和，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是改良主义，等等，等等，这有什么奇怪呢？

这些可怜的革命家的不幸就在于，连他们中间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动机并且绝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了解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不愉快的”状态，都缺乏经受住这个艰难过渡中的艰难时刻的坚毅精神。自然，对我们党持这种“正式”反对态度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集团和阶级的代表人物中，个人的例外当然是有的，而且总是会有的。可是，各类社会代表人物始终是存在的。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纯粹无产阶级人口占有巨大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差别必然会显露出来，而且有时会极其尖锐地显露出来。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事变的每一转折关头都会犹豫和动摇，由1917年3月间的激烈的革命态度转

到5月间的颂扬“联合”，转到7月间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或者为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主义”痛哭流涕），又转到10月底小心翼翼地回避布尔什维克，再转到12月间支持布尔什维克，最后，在1918年3月和4月间，这种人物又常常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说：“我可不是那种为‘机关’工作、实际主义和渐进精神唱赞歌的人。”

这种人物的社会来源就是小业主，他们被战争的惨祸、突然破产以及饥荒和破坏的空前折磨弄得暴怒发狂，他们疯狂地东奔西窜，寻求出路和解救办法，他们摇摆不定，时而信任和支持无产阶级，时而又爆发绝望情绪。应该清楚懂得和明确了解：靠这种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只有毫不动摇地走自己的路，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转变时刻也不灰心失望的阶级，才能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不需要狂热。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铁军的匀整的步伐。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0—188页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节选）（1918年5月5日）

三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不幸。读一读他们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中的下列词句，实在令人不禁失笑：

“……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

可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在一起，从而暴露了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

“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从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昨天，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碎的，比我们来得及加以计算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

我们的历史功绩，就是昨天（明天也会如此）在实行没收方面，在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怠工方面，我们是坚决的。如果今天把这一点

写入“目前形势的提纲”，就是面向过去而不懂得转向未来。

“……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项任务！但是我们这里的怠工已经完全“粉碎”了。我们所缺乏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进行计算，盘算一下应该把哪些怠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样组织自己的力量去实施监督，譬如说，派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监督者去监督一百个到我们这里来上班的怠工者，在这种情况下，侈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就是胡说八道。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只有疯狂反对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认为这样就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犯这种错误。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引的话使人不禁失笑，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发现就简直使人捧腹大笑了，他们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这可真要把人吓坏了！而且“左派共产主义者”又是多么卖力地在提纲中、在论文中，到处重复着这一骇人听闻的发现啊……

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左派共产主义者”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他们将在工人面前给“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评”。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因此，正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就因为他们看不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第三，他们拿出“国家资本主义”来吓人，这就暴露出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 （3）私人资本主义；
- （4）国家资本主义；
-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

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粹的空谈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他们要——在1918年4月！！——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真是胡闹！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

权，就像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一味空谈所谓“劳动”农民而看不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真理，但是有谁会认真地对待这些沉溺于空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呢？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 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 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 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

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

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没有一点政治经济学头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永远不会懂得这些真理，但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理。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值得争论，只要指出他们是空谈家的“可憎的样板”就够了；而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应该争论，因为这里是马克思主义者犯了错误，而分析他们的错误，可以帮助工人阶级找到正确的道路。

四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

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像纳尔苏修斯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和《前进报》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

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第27页和第28页）[\(2\)](#)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问题，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我们的威胁的论断，是一个极大的经济错误，它清楚地证明他们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五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³⁾，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显然，这个我们是指“左派共产主义者”〉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⁴⁾（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表明：第一，布哈林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高出一筹，他完全不是不可救药地堕入空谈，恰恰相反，他在极力思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痛苦而艰难的过渡——的具体困难。

第二，这个意见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布哈林的错误。

确实如此。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

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基本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⁵⁾；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

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韧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哪里，它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分掌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无情地

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

所以，尽管布哈林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因卡列林和格耶这类人为他“效劳”而马上“感到羞耻”这一点值得赞扬，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人来说，指出他们政治上的战友是些什么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例如，1918年4月25日的那一号《劳动旗帜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自豪地宣称：“我党现时的立场与布尔什维主义中的另一派（布哈林、波克罗夫斯基等人）是一致的。”又如，同一天的孟什维克的《前进报》刊登了有点儿名气的孟什维克伊苏夫的“提纲”：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一开始就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背道而驰，最近更日益公开地走上与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而带有明显的反工人的性质。在工业国有化的幌子下实行培植工业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复国家生产力的幌子下企图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计件工资和泰罗制，搞黑名单和黑籍证。这个政策会使无产阶级丧失经济方面的基本成果，而变成资产阶级任意剥削的牺牲品。”

说得太妙了，不是吗？

为了履行那些许诺俄国资本家兼并别国领土的秘密条约而同克伦斯基一起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克伦斯基的朋友们，打算在6月11日解除工人武装的策列铁里的同事们，用响亮的词句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李

伯尔唐恩之流，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在指责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妥协”，“培植托拉斯”（即培植“国家资本主义”！），采用泰罗制。

说实在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授给伊苏夫一枚奖章，他的提纲作为资产阶级挑拨言论的一个标本应该拿到每一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去展览。现在，工人们已经认清了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和伊苏夫之流的真面目，已经处处根据实际经验认识了他们，而用心思索一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这些走狗要挑拨工人们来反对采用泰罗制和“培植托拉斯”，这对于工人们是大有益处的。

觉悟的工人会把李伯尔唐恩先生们和策列铁里先生们的朋友伊苏夫的“提纲”，拿来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提纲作一番仔细的比较：

“在生产中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并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危险，它将不仅激起落后阶层，而且激起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者普遍仇视‘资本家怠工者’的情况下，为了推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工人，这就会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毁掉。”（《共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8页第2栏）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它表明“左派”落入了圈套，受了伊苏夫之流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奸细的挑拨。这对于工人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工人们知道，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主张实行劳动纪律，正是小资产阶级拼命破坏这个纪律。像上述的“左派”提纲这样的言论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事实上完全背弃了共产主义，完全转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左派共产主义者”想用这样的话来“辩解”。这种辩解是没有用的，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是在设有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下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的，这些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监督领导人的每一步骤，学习他们的领导经

验，不仅能够对他们的命令提出申诉，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来撤换他们。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履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要由它来修改和取消。第三，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做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者。而且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真正大型的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因为工人们在跨出可能被“左的”词句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资本家对托拉斯的领导，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就是说，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

只有那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因而也是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不了解这一点。奥新斯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中和在他们的杂志上的表现，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写道：

“……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将属于‘托拉斯的组织者’，因为我们不是想教导他们，不是想把他们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向他们学习。”（《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14页第2栏）

在这段话中所卖弄的讽刺，是针对我说的“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的。

在奥新斯基看来，这句话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组织者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如果这种言论是出于诗人所描写的“年方十五，不会超过？”……这种年龄的人的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

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不，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

如果不是抱着幼稚的目的要“教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社会主义，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他们的。对于他们，不是应该教导，而是应该剥夺（这一点在俄国做得相当“坚决”），他们的怠工应该粉碎，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俄国优秀的工人是懂得这层道理的。他们已经开始向资本家组织者，向工程师领导者，向技术专家学习了。他们已经开始坚定而谨慎地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学起，然后再逐渐学习最难的东西。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这件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那是因为它比较困难。而纺织工人、烟草工人和制革工人，不像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害怕“国家资本主义”，害怕“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这些工人在“制革工业总管理局”、“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这一类中央领导机关内同资本家坐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办理托拉斯，办理“国家资本主义”。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俄国先进工人的这种工作是同他们实行劳动纪律方面的工作一起进行的，并且在继续进行，他们并不大吹大擂，到处宣扬（大吹大擂对某些“左派”却是必需的），而是非常谨慎，循序渐进，汲取实践中的教训。这项艰难的工作，这项实际学习建设大生产的工作，是我

们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保证，是俄国的觉悟工人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反对小资产阶级无纪律现象⁽⁶⁾的保证，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2—291页



列宁在办公室阅读《真理报》(1918年10月)

(1) 这是列宁为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方面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空谈而写的文章。在节选的部分，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作了精辟论述，阐释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列宁列举了当时俄国

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俄国现实的经济，工人阶级一经学会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就会掌握全副王牌，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列宁强调指出，社会化大生产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218—219页。——编者注

[\[3\]](#)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编者注

[\[5\]](#) 这里也应该正视现实：我们还缺少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所必要的无情，而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决性。我们的坚决性是很足的，而是我们没有本领相当迅速地捉到人数相当多的破坏苏维埃措施的投机商、奸商、资本家。因为只有组织计算和监督，才能获得这种“本领”！第二，我们的法庭不够强硬，对于受贿者，不判处死刑，而只判处半年监禁。我们这两种缺点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它的软弱性。

[\[6\]](#)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提纲作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一声不响。他们只讲“组织性”等等。但是，这一点，就是害怕经济关系上的工人专政的小资产者也会承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能在这种时候“忘记”这个旨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即政治空谈，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设，建设中的种种事实，占的篇幅太少了。

有些简单明了、众所周知、群众已经相当清楚的事情，如资产阶级走狗孟什维克卑鄙地背叛、英国和日本为了恢复资本的神圣权利而发动入侵、美国亿万富翁对德国咬牙切齿等等，为什么不用20—10行，而要用200—400行来报道呢？这些事情要报道，这方面的每一个新事实要指出，但不必长篇大论，不要老调重弹；而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已有定论的旧政治的新表现，用“电报体”写上几行抨击一下就可以了。

在“资产阶级的美好的旧时代”，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符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的斗争，即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在新经济的建设中，大工厂、农业公社、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否真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

“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

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散漫、肮脏、捣乱、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有没有呢？没有。然而这样的工厂是有的。我们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作斗争，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要我们默许这样的工厂存在，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成了收破烂的人。我们不善于像资产阶级那样在报纸上进行阶级斗争。请回想一下，资产阶级是怎样出色地在报刊上抨击自己的阶级敌人，怎样讥笑他们，侮辱他们，置他们于死地的。而我们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仍然用老眼光看苏维埃国家（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从“它”那里捞钱则多多益善）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吗？即使是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尔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等工厂的工人中间，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

报刊对这一切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只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像一份革命报刊，不像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尽管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将被它的铁拳所粉碎。

在战争问题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抨击过那些胆小如鼠的将领和敷衍塞责的家伙呢？我们是否在全俄国面前揭露过那些不中用的部队的丑态呢？有一些人毫不中用、玩忽职守、延误军机，本来应该大张旗鼓地把他们清除出军队，我们是否“抓住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坏典型呢？我们没有同干坏事的具体人进行切实的、无情的、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连队的日常生活，这里创造的新

事物最多，这里最需要关心、报道和公众的批评，最需要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

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91—93页

(1) 列宁在文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强调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要求社会主义的报刊应当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得多（现时匈牙利有800万人口，300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领袖，无论是社会沙文主义派或考茨基派的领袖，都死死抱着几十年来较为“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制所养成的纯粹市侩的偏见，根本不可能懂得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把这些领袖抛弃，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使命。这班人完全或部分地相信了资产阶级关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谎言，不善于把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劳动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做“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

这些死死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的盲人，不懂得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他们把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发展史的某些特点同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意义混为一谈。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现在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种政权是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者拥护的。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²⁾。

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这些阶层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在这里，像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样，空谈一般“民主”，空谈“统一”或“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等等，是无济于事的。

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巩固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因循守旧的习气。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阶级斗争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和犹豫动摇，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组织影响，“中立”那些害怕离开资产阶级而很不坚定地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阶层，巩固新的纪律即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加强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牢固联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用这种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基础去代替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纪律，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饥饿纪律，“自由”雇佣奴隶制的纪律。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不仅如此。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所享用，它经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与过去决裂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极有希望但极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协约国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制止这种动摇。枪毙，这是胆怯者在战争中应得的命运。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斗，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列 宁

1919年5月27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74—378页

(1) ①本文为祝贺匈牙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写。列宁在文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作了阐述。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编者注

伟大的创举 （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
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节
选） （1919年6月28日）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院内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1920年5月1日)

我详尽无遗地援引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因为我们从这里无疑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

于这个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地加以重视，我们大家也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代表

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

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像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像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都千百次地亲身遭受过，他们的亲属也遭受过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为决定由英国资本或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而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更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英勇果

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创建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卵翼”下去的倾向不论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他们也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新的更高的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联合组织的权威以外，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威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威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问题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又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一位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雅科比（他在1870—1871年的教训之后没有转向沙文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曾经说过，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比萨多瓦会战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这话说得很对。萨多瓦会战所解决的，是在建立德意志民族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资产阶级君主国究竟哪一个当霸主的问题。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是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的一个小小的步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工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国人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为了英美法三国亿万富翁的利润而对千百万工人进行的屠杀，是垂死的、快胀死的和在活活腐烂的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而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

资产者老爷们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惯于自命为“舆论”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当然要嘲笑共产党人的希望，称这种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树”，讥笑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次数同大量存在的盗窃公物、游手好闲、生产率低落、损毁原料和产品等等现象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回答这班老爷们说：假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用来帮助劳动群众，而不是用来帮助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恢复他们的权力，那么变革会进行得快一些，和平一些。但这是空想，因为问题要由阶级斗争来解决，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将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是排除他们的对抗（至少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抛弃那些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改造和重新教育动摇的知识分子，使之服从自己，把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步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农奴制颠覆后过了半个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个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一贯替资本服务，至今还在强词夺理，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在革命之后，他们却要求我们以神奇的速度铲除过去的遗迹！

但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论据”的真正价值，也知道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旧习俗残余必然比新事物的幼芽占优势。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对它们极其关切，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们成长和“护理”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不免会死亡。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应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科学家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从中得出最适当的办法。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发起这种劳动的，并不是条件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还有并无专业的工人，也就是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我们大家都清楚，现在不仅在俄国一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出现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以及疾病和饥饿。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

动生产率。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家知道，这类矛盾在实践上是靠打破这种循环，靠群众情绪的转变，靠一些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群众情绪转变的背景下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铁路员工（当然指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投机者、管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白卫分子）是生活极端困难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吃不饱，而在目前青黄不接、粮食状况普遍恶化的时候，简直是在饿肚子。可是，就是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疲乏和衰弱，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度过四年艰苦的帝国主义战争、又度过一年半更艰苦的国内战争的挨饿的工人，1919年夏季尚且能在饥饿的莫斯科开始这件伟大的事业，一旦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争得和平，它又将获得怎样的发展呢？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非常可贵，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其难得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正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2\)](#)。

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

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0—19页

(1) 列宁在文中高度评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伟大的创举”，指出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了工人阶级自觉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而是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列宁给阶级下了经典的定义，并论述了消灭阶级的途径和条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同时还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为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7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曾打算用本文题目写一本小册子。但因忙于日常工作，直到现在还只是为某些部分作了初步的准备。⁽¹⁾所以，我决定试一试，把我认为是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思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自然，扼要的叙述有许多不便和缺点。但是一篇不大的杂志论文，也许还能达到一个小小的目的，就是把问题及其要点提出来，供各国共产党人讨论。

1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听到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第二国际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麦克唐纳、让·龙格、考茨基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在内，都是这样的代表，尽管他们挂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完全忘掉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2

由于我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是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会经济的

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表现为如下双方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大的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

说劳动在俄国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指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二，是指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

我们说俄国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1919年3月通过的我们的党纲也是这样说的），因为所有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实现了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段。凡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们用革命的打击一下子都办到了。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即1917年10月26日（1917年11月8日），就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无偿地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几个月内，又同样无偿地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即工厂、股份企业、银行、铁路等等的占有者。由国家来组织工业大生产，从“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铁路，——这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在农业方面，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办“国营农场”，即由工人国家在国有土地上办的大农场）。同样，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协作社这一从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的办法，也刚刚开始实行。⁽³⁾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来代替私营商业这件事，即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这件事，也是这样。下面将引用一些有关本问题的统计材料。

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总之，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为了说明这些抽象的原理，我们来引用一些具体的数字。

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统计资料，从1917年8月1日到1918年8月1日，俄国由国家收购的粮食约为3 000万普特。下一个年度约为11 000万普特。再下一个收购年度（1919—1920年）头三个月的数字看来可以达到4 500万普特，而在1918年同时期（8—10月）只有3 700万普特。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情况虽然改善得很慢，但总是不断地在改善着。尽管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动用世界列强的全部力量来组织国内战争，造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情况还是在改善着。

所以，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怎样造谣诬蔑，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策划阴谋活动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办不到的。

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短时期内，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下述总结数字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央统计局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苏维埃俄国26个省（不是全国）粮食生产情况和消费情况的统计材料，准备发表。

统计结果如下：

苏维埃 俄 国 26 省	人 口 (单位百万)	粮食产量 (不包括种 子和饲料) (单位百万 普特)	粮食供应量 (单位百万普特)		居民的粮 食拥有量 (单位百 万普特)	每人的粮食 消 费 量 (单位普特)	
			由粮食人 民委员部 供应的	由投机商 贩供应的			
产粮省	城市…… 4.4	—	20.9	20.6	41.5	9.5	
	乡村…… 28.6	625.4	—	—	481.8	16.9	
消费省	城市…… 5.9	—	20.0	20.0	40.0	6.8	
	乡村…… 13.8	114.0	12.1	27.8	151.4	11.0	
总计 (26省)		52.7	739.4	53.0	68.4	714.7	13.6

由此可见，城市的粮食大约有一半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另一半是由粮贩供应的。根据1918年的精确调查，对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的比例正是如此。不过工人购买国家的粮食比购买粮贩的粮食要少付九成的钱。粮食的黑市价格十倍于国家价格。这是精确研究工人收支情况所得出的结果。

4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上面引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准确的材料勾画出了目前俄国经济的一切基本特点。

劳动群众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跨出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和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对这一步却不加考虑。他们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意义上侈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却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获得利益最多和马上获得利益的是农民。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是经常挨饿的。在我国多少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农民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劳动，总是把亿万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自己只好挨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农民才第一次为自己劳动，而且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

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即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消灭阶级，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对农民的政策中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以下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那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等等）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是并不奇怪的。

这里所说的划分，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融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划分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必然产生的结果。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商人、投机者和他们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的压迫。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实际生活所给予的这种“教育”使农民不得不寻求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投机者，反对商人。同时，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不是任何时候，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商人和投机者。

我们上面引用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农民和投机农民的区别。例如，一种农民在1918—1919年间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价格，把4 000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尽管这些机关还有种种缺点（这些缺点是工人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的，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是无法消除的），——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工人真正的同志，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他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却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非法地按相当于国家价格十倍的高价，出卖了4 000万普特粮食，他们欺骗国家，使蒙骗、掠夺和欺诈勾当在各地应运而生并且日益猖獗——这种农民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因为，粮食是从全国公有土地上收获来的，所用的农具也不仅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等等花了某种劳动才创造出来的，而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

人们指着我们宪法上工农的不平等以及解散立宪会议、强行拿走余粮等等事情，从四面八方我们大叫大嚷：你们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破坏者。我们回答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除劳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事实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投机的农民，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平等，正如我们永远不承认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饱食者同挨饿者有“平等”，不承认前者有掠夺后者的“自由”一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就要用对待白卫分子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诺夫派或马尔托夫派。

5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和完全对立的因而也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正是由于他们遭到失败，他们反抗的劲头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比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说的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像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么情况就只能如此。

最后，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由于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最习惯于因循守旧，那就很自然，我们必然会看到他们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对于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于这些社会成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带领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

我们把所有的基本力量或基本阶级及其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所持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即“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

何等荒谬，何等愚蠢。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即以为“民主”具有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使一切形式都服从它。

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重复那些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意味着全面地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和原则立场上去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阐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偏见。⁽⁴⁾这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概念不同于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起码真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只要不忘记这个真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待续）⁽⁵⁾

1919年10月30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63—277页

⁽¹⁾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53—262、428—437页。——编者注

(2) 列宁在本文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结合俄国革命胜利后的实际，论述了过渡时期俄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相应的基本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列宁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无比困难的、长期的任务。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能延缓从个体小商品经济向公共的大经济的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³⁾ 苏维埃俄国的“国营农场”大约有3 536个，“农业公社”86大约有1 961个，农业劳动组合有3 696个。我国中央统计局现在正对全国的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作一次精确的统计。1919年11月间就会陆续得到统计结果。

⁽⁴⁾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147页。——编者注

[\(5\)](#) 本文没有写完。——俄文版编者注

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1919年12月2日）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但是协约国的干涉和饥饿封锁一直阻碍着这一工作的进行。

工农政府曾经多次向协约国列强提出媾和的建议，如：1918年8月5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给美国代表普尔先生的信，1918年10月24日给威尔逊总统的信，1918年11月3日通过中立国代表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信，1918年11月7日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名义发出的建议书，1918年12月23日李维诺夫在斯德哥尔摩给协约国各国代表的照会，1919年1月12日和17日的信，1919年2月4日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照会，1919年3月12日同布利特拟订的条约草稿，以及1919年5月7日通过南森提出的声明。

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完全赞同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并重申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法、美、意、日各协约国建议，与它们全体或单个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这一和平政策（或者：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这一和平政策，采取使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一切必要措施）。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54—357页

（1）本文是《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之四。列宁在文中论述了俄国苏维埃政权为实现和平外交所作的努力，表明了俄国人民希望与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的愿望。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节选）（1920年10月）

1 决 议 草 案（10月8日）

从10月8日的《消息报》上可以看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说的话，跟昨天我同他商定的正相反。

必须立即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一项决议草案，经中央通过后提交这届大会通过。今天就必须以中央名义把决议草案提交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通过，因为代表大会今天就要闭幕了。

决 议 草 案

1.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方面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一斗争是为了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2. 因此，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组织，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

3.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或多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

4.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5. 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坚持这一原则观点，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做法，如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相反，代表大会认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说，别人把他的意思曲解了。因此这个决议就更是十分必要的了。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1—333页

（1）列宁在本文中强调在文化教育事业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发展无产阶级文化也应以此为基础和方向。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同志们，请允许我发表几点意见，这些意见中有一部分是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研究组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问题时谈过的，有一部分是我对提交人民委员会的草案的意见。昨天这个草案已经基本通过，细节以后还要讨论。

说到我个人的意见，我只能说，起初我曾竭力反对你们这个机关改变名称。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和教学。我担任苏维埃工作以来，已经习惯于把各种名称看做儿戏，本来每个名称也就是一种游戏。现在新名称已经确定，叫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决定，你们就把我的意见当做个人意见看待好了。如果事情不只是改变叫法，那就只能表示欢迎了。

要是我们能吸收新的人员来参加文教工作，那就不只是换个名称的问题，那时这种给新事物、新机关加头衔的“苏维埃的”癖好也就可以原谅了。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取得的成绩会比现在大得多。

要使同志们和我们共同参加文教工作，关键在于教育同我们的政治的联系问题。如果有必要，名称是能够规定某种内容的，因为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思想一贯占着统治地位。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无非是对99%受教会控制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现在还在统治着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资产阶级，正是这样欺骗群众的。

在那里，机构愈重要就愈不能摆脱资本和资本的政治。

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同政治机构的联系都非常密切，虽然资产阶级社会不肯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同时，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教会和整个私有制来影响群众。

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利用我们的真话来揭穿资产阶级的“真话”，并使人们承认我们讲的是真话。

从资产阶级社会转向无产阶级政治是一个很艰难的转变，何况资产阶级还开动了全套宣传鼓动机器不断地诬蔑我们。资产阶级竭力抹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培养出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在对资产阶级作斗争时的无限忠诚，就是说，如果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为完全战胜其宿敌所必须提出的一切任务，那就谈不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赞成认为劳动群众已经有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备的空想观点。我们根据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的确切材料，了解到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有大工业、罢工斗争、政治组织才能使劳动群众作好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无产阶级必须善于采取一致行动，推翻剥削者，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已经具备了这一切必要的力量，并且把这些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夺得了政权。

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在考虑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十分注意的那些局部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至于如何建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使它如何同其他机关沟通，如何不仅同中央而且还要和地方机关联系等等问题，那就要由在这方面经验丰富、有专门研究的更在行的同志来回答了。我

只想在原则方面强调指出几个要点。与过去那些谎言不同，我们不能不公开提出问题，公开承认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以便把工人阶级几十年来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形成的习惯、风气和信念，用做教育全体劳动者的手段，至于究竟应如何教育的问题，这就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了。必须使人们懂得，现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广泛地扩大到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不可能也不容许置身于这个斗争之外，置身于国际政治之外。目前国际政治的真正基础，就是全世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俄国。必须认识到，这关系到资本主义国家亿万劳动者的命运。要知道，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不是处在一小撮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形势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置身于目前的斗争之外，或者是投身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置身于目前的斗争之外，就证明自己一点没有觉悟，像某些置身于革命和战争之外的愚人一样，看不见资产阶级对群众的全部欺骗，看不见资产阶级如何故意使群众愚昧无知。

我们完全公开地说无产阶级要进行这种斗争，任何人都必须决定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另一边。谁想既不站在这边又不站在那边，到头来总是身败名裂。

尤登尼奇、高尔察克、佩特留拉、马赫诺之流这些层出不穷的克伦斯基派、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余孽，使我们在俄国各地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所以可以说，我们比任何人都受到过更多的锻炼。看一看西欧，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正在他们那里发生，那里正在重演我们的历史。几乎各国资产阶级身边都有克伦斯基派。他们在许多国家里，特别是在德国占着统治地位。到处都是一样，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立场，只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不是白色专政（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武装起来反对我们，为实行这种专政作准

备），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一点我们都有十分深刻的体会，所以关于俄国共产党人我就不必多说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有关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一切议论和设想也应该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在这个机构的工作中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没有其他的形式，也没有一个国家创造了其他的形式。党在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方面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不够好，党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或改进，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形式。三年来，苏维埃俄国抗击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全部斗争，是与党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帮助无产阶级起到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这一点分不开的，无产阶级起不到这种作用，就无法打垮资本主义。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工农劳动群众必须战胜知识分子的旧习气，必须改造自己，不这样就无法着手建设事业。我们的全部经验表明，这个事业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要重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在讨论工作和组织建设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至于如何实现，要谈的问题还很多，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都还要对此加以研究。昨天批准的法令对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来说是一个基础，不过人民委员会还没有做完制定这项法令的全部工作。过几天，这个法令就会公布，你们将会看到，在最后定稿中没有直接谈到与党的关系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并且记住，从法律上和事实上来说，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都是：党在纠正缺点、制定措施和进行建设的时候，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要使那些同无产阶级息息相关的共产主义分子能够引导无产阶级贯彻他们的精神，服从他们的领导，摆脱我们一直在努力铲除的资产阶级的欺骗。教师组织曾经长期抗拒社会主义革命，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这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形式是公开怠工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偏见，我们只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夺取共产主义阵地。对于从事社会教育工作、解决社会教育和群众教育任务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特别突出的任务是：配合党的领导，使这一大批工作人员

——这支现在已经在为工人服务的50万教育大军——服从总委员会，贯彻它的精神，受到它的主动精神的激励。教育工作者和教员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习惯的教育，是敌视无产阶级的教育，他们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联系。现在我们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贯彻党的精神，它应该把工人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关心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

因为要同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决裂，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面前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对这个任务应该特别重视。的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如何使大部分是旧人员的教师能同共产党员建立起联系？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必须多加思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怎样才能把这些如此不相同的人从组织上联系起来。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因此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可是这些工作人员都不习惯于联系政治，特别是联系对我们有用的政治，即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政治来进行工作，因此就出现一个问题，如何使他们从组织上联系起来。我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认真地考虑了经验所提供的启示，我们认为，像今天我出席讲话的这种会议，像你们的这种会议，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过去都认为宣传员是属于一定的小组或一定的组织的，现在各级党委对每一个宣传员都应该有新的看法了。每一个宣传员都属于管理和领导整个国家、领导苏维埃俄国同全世界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斗争的党。他们

代表正在斗争的阶级，代表领导着并且应当领导巨大的国家机构的党。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受过斗争的考验和锻炼，但是，当他们由宣传鼓动员变成鼓动员的领导人，变成庞大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的时候，却不愿意或不能了解这种转变和变化的全部意义。至于要不要有一个相应的头衔，即使是像国民学校总监这种令人容易误解的头衔，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善于领导教师群众。

必须指出，几十万教师——这是一批应该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工作人员。教师群众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全身沾染了这种文化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没有知识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应该吸收数十万有用的人才来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这个问题在前线，在我们的红军里已经解决了，红军中吸收了上万的旧军人。经过长期改造，他们和红军融为一体了，最后还以自己的战功证明了这一点。在文化教育工作中我们也应该仿效这个榜样。的确，这件工作不那么轰轰烈烈，但是更为重要。每一个鼓动员和宣传员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要严格地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但又不能只局限于党的范围内，应该记住他们的任务是领导几十万教师，激发他们的兴趣，战胜旧的资产阶级偏见，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十分重大，只有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才能把这些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争夺过的群众引上正路。

这就是每个在学校范围以外进行工作的鼓动员和宣传员应该努力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不容忽视的。在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会碰到许多实际困难，那你们就应当帮助共产主义事业，不仅应当成为党小组派出的代表和指导者，而且应当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国家政权派出的代表和指导者。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这一改造群众的工作。我们所看到的群众对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知识的兴趣和向往，是我们在这方面取得胜利的保证，胜利也许不会像前线上那么快，也许要碰到很大的困难，有时还会遭到挫折，但是最后我们总是会胜利的。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对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这个名称的理解可能不正确。既然这里提到了政治这个概念，政治在这里就是最主要的。

但是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到目前为止，这个任务吸引了我们最大的注意力，妨碍了我们转向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似乎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而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来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工作中有十分之九的时间用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昨天看到了对弗兰格尔作战获胜的消息，这个消息你们今天或许明天就会看到，这些胜利表明，斗争的一个阶段将要结束，我们争得了同一系列西方国家的和平，而军事战线上的每一个胜利都能使我们腾出手来从事对内斗争，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

务，谁要是宣传仍作旧的理解，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担负起对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正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满足不了劳动人民的需要。一旦战争使我们有可能不把重心放在同资产阶级、弗兰格尔、白卫分子的斗争上，我们就将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那时，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就将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国家派出的指导者，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指导全体农民和工人。他应该告诉人们，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当知道、应当阅读哪本小册子，哪本书。我们就是要这样来改善经济，使它更加稳固，更带有社会性，增加生产，改善粮食问题，更合理地分配产品，增加煤产量，并且在没有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气味的条件下恢复工业。

什么是共产主义？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应该使工人群众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进行得还不好，错误百出。我们不掩饰这一点，但是，工农本身应该在我们的帮助下，在我们尽管不大的、小小的促进下建立和整顿我们的机构。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只是我们的纲领、理论和课题了，它已经是我们的实际建设事业了。在战争中，敌人使我们遭到过最惨重的失败，然而我们在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取得了全胜。现在，我们也应当在每次失败中吸取知识，我们应当记住，应该以过去的工作为例来教育工人和农民。指出我们什么地方还做得不好，以便将来避免再犯错误。

把建设工作中的事例翻来覆去地提出来，我们就能使不胜任的共产党员领导者变成名副其实的建设者，首先是经济事业的建设者。我们要取得必需的一切，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排除的障碍，就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要重新教育群众又只有靠鼓动和宣

传，应该首先把群众同国家经济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这应该是每一个宣传鼓动员工作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內容，谁领悟了这一点，谁在工作中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热烈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99—408页

（1）①这是列宁关于加强政治教育的一篇讲话。列宁在讲话中指出：教育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教育不能不问政治，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党和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建立一支同党和党的思想保持紧密联系、能贯彻党的精神的新的教育大军；为了重新教育群众，还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节选）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节选） （1920年12月22日）

现在我来谈最后一点，即电气化的问题，它是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你们就要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认为，我们是在一个大转变的时刻召开这次会议的，这个转变无论如何足以证明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首先树立这种风气，并且自上而下地在所有的苏维埃和团体中，在一切报纸上，在一切宣传鼓动机关内，在一切机构内都来树立这种风气。

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

你们将要听到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报告，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0年2月7日的决定建立的。2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签署了关于这一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的最后决定，首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许多优秀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共100多名，都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此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优秀力量参加。这一本书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今天或明天就要分发给给大家。我希望，你们不会被这本书吓倒。我认为，我不难使你们相信这本书的特殊意义。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党纲。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

已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对它作了极好的解释。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是我们的任务表，是阶级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但是同时必须记住，现在是实际走上这条道路并且衡量它的实际效果的时候了。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的纲领。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转入真正的建设。我们在谈到恢复农业、工业和运输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时，不能不谈到广泛的经济计划。我们必须有一定的计划；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计划。这个党纲不像我们的真正党纲那样，只有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才可以修改。不，这个纲领在每个工厂里，每个乡里天天都会改进、修改、完善和变更。我们需要这个纲领，它是展示在整个俄国面前的第一张草图，它是一个为期不下十年的、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我们在军事战线上进行过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当时使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精力增加十倍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什么呢？这就是意识到存在着危险。当时大家都在问：地主和资本家是否可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回答说：可能的。因此，我们百倍努力，我们全力以赴，终于取得了胜利。

如果提到经济战线，你们也会问：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同“苏哈列夫卡”作过斗争。前几天，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把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场所封闭了。（鼓掌）“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但可怕的并不是已经被封闭的“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的是苏哈列夫广场上的过去的“苏哈列夫卡”，封闭它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

度。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作过对比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已经制定了国家电气化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我们的200位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拟订的。一个为期很长的、不下十年的计划制定好了，这个计划给我们开了一笔物资账和资金账。这个计划指出，为了实现电气化，我们需要多少万桶水泥和多少万块砖。为了实现电气化的任务，在资金方面估计要用10亿至12亿金卢布。你们知道，我们的黄金储备远远抵不上这个数字。同时我们所备的粮食也不多。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我所谈的计划，用租让的办法来抵这笔账。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打算怎样在这个基础上计划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工作。

前不久，我在莫斯科省的边远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县参加了一个农民的节日，那里的农民已经用电灯照明了。在街头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一个农民上台讲话，祝贺农民生活中的这件新事。他说，我们农民过去处在愚昧这种黑暗之中，可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了光，有了“非自然的光，它将照亮我们农民的黑暗”。我个人对这些话并不感到惊奇。当然，对于非党农民群众来说，电灯光是“非自然的”光，但是

对我们来说，非自然的却是农民和工人竟然在这种黑暗和穷困中，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生活了几百年、几千年。这种黑暗是不能很快摆脱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使我们建成的每一座电站都真正成为教育的据点，都要对群众进行所谓电的教育。必须使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已有的几十座小电站关系到工业的恢复。我们现在有一个拟好的电气化计划，但是，完成这个计划却要好多年。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且缩短完成计划的期限。这方面也应当同执行我们第一批经济计划中恢复运输业的计划——第1042号命令一样，这个计划原定五年完成，但是现在已经缩短到三年半，因为它正在超额完成。我们可能需要花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电气化计划，完成可以挖掉资本主义复辟老根的改造。这样的社会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将是空前未有的。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且缩短完成计划的期限。

我们第一次这样从事经济工作：除了一些工业部门的单独计划，例如运输业部门的计划，除了这些已经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门的单独计划，我们还有为期多年的综合计划。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胜利。

但是应当知道和记住，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电气化的。我们的委员会还将努力扫除文盲。同过去相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同需要相比，那就做得很少。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必须使大多数农民都能明确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这个党纲应当成为各个学校必须讲授的主要课本。在这个党纲中，除了实现电气化的总计划，你们还会看到一些为俄国的每个地区制定的专门计划。每一个到地方上去的同志，都会得到他那一地区如何实现电气化，如何由黑暗转到正常生活的一定的规划。同志们，对于交给你们的一些条例可以并且应当在当地加以比较、研究和检验，并且在每个学校、每个小组里，使人们对于什么是

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不仅能用党纲上写的东西来回答，同时还能谈一谈怎样摆脱黑暗状态。

优秀的工作人员、经济专家已经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制定一项实现俄国电气化和恢复俄国经济的计划的任务。现在要努力使工人和农民知道这项任务多么伟大，多么艰难，应当从何着手，应当如何行动起来。

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座电站都变成教育的据点，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54—158页

（1）本文是《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三。这里节选了报告中论述电气化的部分。列宁指出，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而电气化对于一个小农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党的纲领应当成为领导经济建设的纲领，应当用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俄国电气化计划来补充。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论统一的经济计划（1921年2月21日）

一些谈统一的经济计划的文章和议论使人产生一种难堪的印象。请看看列·克里茨曼在《经济生活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吧（第一篇发表于1920年12月14日，第二篇——12月23日，第三篇——2月9日，第四篇——2月16日，第五篇——2月20日）。空话连篇。舞文弄墨。不愿考虑这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就，也不愿加以研究。一味议论（在五篇冗长的文章里！）应该怎样着手研究，却不去研究具体材料和事实。

再请看看米柳亭的提纲（2月19日《经济生活报》）和拉林的提纲（2月20日《经济生活报》），仔细听听“负责”同志们的言论吧。根本缺点也同克里茨曼一样。枯燥到极点的经院哲学，直到空谈什么链式联系的规律等等；这种经院哲学，文人气官僚气兼而有之，就是没有一点实际的东西。

更坏的是，人们竟用傲慢的官僚主义冷淡态度对待那种已经完成的和必须继续做下去的实际工作。几次三番毫无意义地“生产提纲”或凭空编造一些口号和草案来，却不仔细用心地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

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所写的唯一的一部严肃的著作，就是《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向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1920年12月出版并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分发给代表们的。在这部著作里叙述了我们共和国的优秀学者受国家最高机关委托所拟订的——当然只是大致拟订的——统一的经济计划。而同大官们的不学无术的自负和同共产党员作家们的知识分子的自负作斗争，就得从极平常的事情做起，即从简略地叙述这部著作的写作经过及其内容和意义做起。

1920年2月2日至7日，即在一年多以前，开了一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电气化的决议。在这项决议中有如下一段

话：

“……除必须完成整顿运输业、消除燃料危机和粮食危机、消灭流行病以及建立纪律严明的劳动军等方面最迫切最紧急最不容拖延的头等重要任务以外，现在苏维埃俄国初次有可能着手进行比较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科学地制定并彻底执行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电气化事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估计到电气化对工业、农业、运输业等等的重大意义，特决定：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一起制定建立电站网的计划草案……”

看来很明白了吧？“科学地制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难道这些话的意思，我们最高政权机关的这项决议的意思，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地方吗？如果那些在“专家”面前炫耀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著作家和大官不知道这项决议，那么我们只好提醒他们说：对我们自己的法律无知，并不是论据。

为了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1920年2月21日批准在电力局下设电气化委员会，后来国防委员会又批准了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条例。该委员会的人选，则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协商确定和批准。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在1920年4月24日就已出版了它所创办的《公报》第1期，上面载有极详细的工作计划，列出了负责人员、学者、工程师、农艺师和统计学家的名单，这些人员参加各种分委员会，领导各个地区的工作，担负各种明确规定的任务。单单这些工作项目及其负责人员的名单，就在第1期《公报》中占10页篇幅。凡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所知道的优秀人才，都被吸收来参加这项工作。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就是上述那部内容丰富的——并且是极为出色的——科学著作。参加该书编写工作的有180多位专家。他们送交“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著作共计200多篇。首先，书中载有对这些著作的综述（该书的第一部分，计占200多

页篇幅）：（一）电气化和国家经济计划；（二）燃料供应（附有详细制定的最近10年俄罗斯联邦“燃料预算”，以及对这方面所需的工人人数的估计）；（三）水力；（四）农业；（五）运输业；（六）工业。

这个计划预定大约在10年内完成，计划上载有工人人数和动力数量（单位为千马力）。诚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初步的、粗略的甚至含有错误的计划，只是一个“大致拟订的”计划，但它是一个真正科学的计划。专家们在计划中对一切基本问题作了确切的计算。他们对各个工业部门作了计算。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计划中有皮革生产的规模，按每人平均需要两双皮鞋（3亿双）的计算，等等。总之，计划中既有电气化的物资平衡表，又有电气化的资金（按金卢布计算）平衡表（需近37 000万个工作日，多少桶水泥，多少块砖，多少普特铁、铜等等，涡轮发电机总功率多大等等）。这个平衡表预计，在10年内加工工业的产量增加（“根据很粗略的估计”）80%，采掘工业的产量增加80%—100%。金卢布平衡表中的赤字（正数110亿，负数170亿，赤字共计将近60亿）“可以通过租让和信贷业务来抵补”。

计划上指明了第一批区域电站（20座火电站，10座水电站）的位置，并且详细说明了每座电站的经济意义。

在综述之后，该书还载有（分别标明页码的）下列各个地区的工程大纲：北部地区、中部工业区（这两个区的工程大纲规定得特别明白、详尽而确切，所根据的是极丰富的科学材料）、南部地区、伏尔加河沿岸区、乌拉尔地区、高加索地区（把高加索当做整体，因为预计各共和国在经济上将进行协调）、西西伯利亚以及土耳其斯坦。对于每一个地区的考虑都限于第一批电站。还有所谓“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甲号计划”，即最合理最经济地利用现有电站的计划。另一个不大的例子是：计划上预计在北部地区（即彼得格勒区）把彼得格勒所有电站联接起来后可以节省电力，约近半数的电力可以（北部地区工程大纲第69页）输送到北部浮运木材的地点，即摩尔曼斯

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地去用。在这种条件下，增加木材的采伐和向国外浮运，就有可能“在最近时期每年提供5亿卢布的外汇收入”。

“每年从出卖北部木材所赚得的钱，在最近几年内就能达到相当于我国黄金储备额那样大的数目”（同上，第70页），这里当然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从空谈计划转到研究并且实际执行由学者们制定的这个计划！

还必须讲到一点，就是问题（当然远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已有了初步的年度规划，即不仅是一般计划，而且作了预计：每年（从1921年起至1930年止）有多少座电站可以开始发电，以及现有的电站可能扩建的规模（也得具备上面所说的条件，这在我国知识分子文人习气和大官的官僚主义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可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为了认识清楚“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所完成的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全部价值，我们不妨看看德国的情形。德国有一位学者巴洛德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他编制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德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科学计划。这个计划在资本主义德国不免要落空，只是纸上谈兵和单枪匹马的工作。而我们则提出了国家任务，动员了几百个专家，在十个月内（当然不是像最初预定的那样在两个月内）制定了一个科学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我们理应以这一工作自豪；只是必须懂得应该怎样去利用这一工作的成果，现在我们正是必须对不懂得这一点的现象进行斗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写道：“……代表大会……赞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机关，特别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为制定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所进行的工作……认为这个计划是伟大经济创举方面的第一个步骤，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等完成这个计划的制定工作，并批准这个计划，而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完成……责成……采取各种措施来最广泛地宣传这个计划……共和国所有的学校毫无例外地都应当学习这个计划”[\(2\)](#)等等。

莫斯科某些人对这个决议所持的态度，他们企图胡乱“解释”这个决议，甚至对它置之不理，这最明显地表明我们机关中特别是上层机关中存在着毛病，即官僚主义病和知识分子病。著作家们不宣传这个已经制定的计划，却一味起草提纲，空洞地议论怎样着手制定计划！大官们纯粹官僚式地强调必须“批准”计划，他们指的不是提出某些具体任务（例如必须建设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建设，向国外购买什么东西等等），而是提出另定新的计划这类糊涂透顶的主张！他们什么都不懂，简直令人吃惊，竟然说什么在建设新东西以前至少先得把旧东西恢复一部分呀；说什么电气化很像电气幻想呀；说什么为什么不实行煤气化呀；说什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中都是资产阶级专家而很少有共产党员呀；说什么“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应当提供的是鉴定人员而不是计划委员会呀，如此等等。

危险的正是这种意见纷纭，因为这表明这些人不善于工作，表明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压倒了真正的实干。嘲笑计划是幻想，提出实行煤气化之类的问题，正是暴露了不学无术的自负。随随便便地纠正几百个优秀专家的工作，用一些庸俗的笑话来回避问题，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而狂妄自大——难道这不是可耻的行为吗？

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应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该学会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有系统地从事工作！

当然，关于“计划”这个东西本来可以无止境地谈论和争论下去。然而我们决不当容许对“原则”（即编制计划的“原则”）作空泛的议论和争论，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着手研究现有的这个唯一科学的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当然，“批准”和“不予批准”之权始终操在某个或某些大官手里。如果正确地理解这种权利，并且正确地解释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批准它赞同的以及它认为应当竭力广泛宣传的这个计划的决议，那就应当把“批准”理解为提出一些订货单和发布一些命令：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到

什么地方去购买，什么东西应该开始建设，什么材料应该收集和运到某地等等。如果官僚主义地解释问题，那么“批准”就是意味着大官们的刚愎自用，官场拖拉习气，玩弄审查委员会之类的把戏，一句话，就是用纯粹的官僚态度葬送实际工作。

我们且从另一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吧。必须着力把科学的电气化计划与日常的各个实际计划及其具体实施结合起来。这当然是完全不容争辩的。究竟怎样结合呢？为要知道这一点，经济学家、著作家和统计学家就不应当空谈一般计划，而应当详细研究我们的各种计划的执行情况、我们在这种实际工作中所犯的 error 以及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不进行这种研究，我们就会盲目行动。只要进行这种研究，同时研究实际经验，剩下的行政事务问题就完全是小问题了。我们的计划委员会真是太多了。要进行合并，应当从某甲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两个人来，再从某乙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一个人来，或是相反。再把这几个人并入总的计划委员会下面的某个分委员会。显然，这正是一种行政事务，如此而已。反复试验，选出最好的方案来，——为这样简单的事多费唇舌，就显得可笑了。

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人员不善于处理问题，他们用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日常的粮食计划和燃料计划。我们在这两种计划中都犯过一些明显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是不会有异议的。精明能干的经济学家不会去编制毫无意义的提纲，而会去细心研究事实、数字和材料，分析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指出：我们在某某地方犯了错误，要如此这般来加以改正。精明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一定会根据这种研究，提出建议或自行采取措施，来调换工作人员，改变汇报制度，改组机构等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看到过有人用这两种切实的态度来对待统一的经济计划。

毛病就在于，人们不正确地处理共产党员对待专家的态度问题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待学者及著作家的态度问题。在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

上，也像其他任何问题一样，有些事情（而且总是会出现一些新的事情）只需要共产党员来解决，或只需要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是不容争辩的。但这完全是抽象的说法。而目前在我们这里对这个问题持错误态度的正是共产党员作家和共产党员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能理解，这方面应该多向资产阶级专家和学者学习，少玩弄些行政手段。除了已经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计划以外，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应该根据仔细研究过的实际经验来补充、发展、修改和实施这个计划。如果持相反的意见，那就像党纲所说的，完全是一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³⁾。那种认为在俄罗斯联邦除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以外还可能有另外一个计划委员会的想法，同样是一种不学无术的自负，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对该委员会的成员作局部的切实的调整会带来益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只有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工作，才能在改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总计划方面做出某种重大的事情来，否则就是玩弄行政手段，或者简单一点说就是刚愎自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要少发号施令，确切些说完全不要发号施令，而要对科学和技术专家（正如俄共党纲所说的那样，“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⁴⁾）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要向他们学习，要帮助他们扩大眼界，要以相应的科学的成果和材料为根据，要记住，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如此等等。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了解事情的本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宁可拿出几十个来换一个老老实实研究本行业务的和内行的资产阶级专家。

至于那些没有参加“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他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帮助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计划。如果他们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或著作家，那么他们首先应该研究清楚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才能根据对有关事实的详细研究，提出改正错误、改进工作的意见。研究是学者的事情。既然我们这里早已不是在谈一般原则，而是谈实际经验，那么，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这种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无论白天或黑夜随时都愿意起草“提纲”，提出“口号”，发表完全抽象的议论。多了解一些事实，少来一些竞相标榜共产主义原则性的口角吧。

另一方面，如果某个共产党员是行政管理人员，那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防止热衷于发号施令，首先要考虑到科学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首先要问一问事实是否经过检验，首先要研究（通过报告、报刊、会议等等）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来纠正已经在进行的工作。少用些季特·季特奇式的手段（“我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多研究些我们的实际错误吧。

老早就有人指出过：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缺点就是如此。我们几十年来从事伟大的事业，宣传推翻资产阶级，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揭露这些专家，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会证实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我们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为劳动者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我们已经把剥削者镇压下去，现在我们应当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就必须学会谦虚，学会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切实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少来一些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多研究些我们在

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吧。

1921年2月21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45—354页

(1) ①列宁在文中高度评价由几百名优秀专家制定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即全国电气化计划，严厉批评党内一些同志对这一计划的错误态度。他指出，应该尊重科学，应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狂妄自大。共产党人应当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必须尊重科学技术专家，仔细分析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少一些官僚主义者的自负，多研究一些实际工作经验和新的科学技术成果。

[\[2\]](#) 引自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电气化的决议。这个决议的草案是列宁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2—193页）。——编者注

[\[3\]](#)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6页。——编者注

[\[4\]](#) 同上。——编者注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节选） （1921年3月）

2 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3月8日）

下面谈一谈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提出的贸易自由这一口号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关系中，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和任务。我指的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当无产阶级革命日益开展的时候，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来对待小业主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作用就是要领导这些小业主向社会化的、集体的、公社的劳动过渡。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许多立法文件中都说到了这个过渡，但是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立法文件，而在于实际执行，同时我们知道，只要我們有了实力雄厚的大工业，能够给小生产者好处，使他们实际看到这种大经济的优越性，就能保证实现这一过渡。

凡是对社会革命及其任务深思熟虑过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社会党人，在理论上总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而在我国，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我已经谈过，而且在俄国非常突出）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是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我们在保卫革命时所处的条件决定了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时必然空前困难。实际显示大生产的一切优越性，我们还办不到，因为大生产遭到了破坏，本身很难维持，只有让这些农民忍受牺牲，大生产才能得到恢复。必须振兴工业，但是，要振兴工业就要有燃料，要燃料就要有木柴，要木柴就要靠农民和他们的马匹。在危机深重、饲料缺乏、牲畜大批死亡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把东西贷给苏维埃政权来恢复暂时还不能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的大工业。就是这种经济情况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就是这种经济情况迫使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考虑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条件。在战时，我们只能对农民说：“必须把东西贷给工农国家，它才能摆脱困境。”此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当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恢复经济

的时候，我们必须懂得，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而大生产是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几十年，在我们这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的时间。在这以前，我们还要同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因此，自由贸易的口号是必然会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危险性不在于它掩饰了白卫分子和孟什维克的意图，而在于它会在农民群众中得到传播，尽管农民群众是仇恨白卫分子的。它所以会得到传播，是因为它符合小生产者生存的经济条件。中央出于这种考虑，对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作出了决定，开展了讨论，并且你们今天已经通过决定，同意在代表大会上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关于实物税和余粮收集制的立法问题，早在1918年年底我们就提出来了。实物税法在1918年10月30日就通过了。但是，这个向农民征收实物税的法令虽然通过了，却并没有执行。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我们接着又发布了几个条例，但是法令仍旧没有执行。另一方面，征收农户的余粮是战争环境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农民经济所处的稍为和平的生存条件就不再适合了。农民需要心中有数，需要知道究竟有多少要交出去，有多少可以用来在当地流转。

过去我们的全部经济，不论是就整个来说，还是就各个部分来说，都适应战时的条件。考虑到这种条件，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必须收集一定数量的粮食，而完全无法顾到这样做对社会流转会有什么影响。现在我们从战争问题转到和平问题上来了，因此对实物税的看法也就不同了：我们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我们应当了解小农经济自发势力用什么经济形式表露对无产阶级的不满；这种不满已经表露出来，并且在目前的危机中变得愈来愈激烈了。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这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情。应当让农民在当地流转方面有一定的自由，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使小业主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产，根据税额的多少来确定生产规模的大小。自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里，

这件事做起来是很难的。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生产资料都减少了，余粮无疑也减少了，甚至往往根本没有余粮。我们必须考虑这种情况，考虑这种事实。农民为了不让工厂和城市完全挨饿，自己不得不挨一点饿。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分散的贫困的农民业主能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这方面非采取强制手段不可，而破产农民对强制手段的反应十分强烈。别以为这种办法一定能使我们摆脱危机。不过，我们同时还要作最大限度的让步，使小生产者有最好的条件去发挥自己的力量。从前我们适应的是战争任务。现在则要适应和平时期的条件。这个任务已经摆在中央面前，这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改行实物税，这和实行租让也是有紧密联系的。你们将要对这个任务进行专门的讨论，你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政权通过租让办法，就能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而达成这种协议就能使我国工业得到加强；工业不加强，我们便不能向共产主义制度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在这个过渡时期，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会采取从经济上满足农民要求的办法，采取尽量多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当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当大机器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的自由。我们现在处在一种新旧交替的状态，我们的革命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只要我们还处在这种新旧交替的状态，我们就不得不寻求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的形式。过去我们在战争的重压下，不能集中精力考虑怎样处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它掌握着已经遭到空前的破坏的大生产）同小农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怎样找到同小农共处的形式；而只要小农还是小农，就必须保证小经济有一定的流转体系，否则小农便不能生存。我认为这个问题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对近一年来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开始向和平状态转变的时期所做的工作，从政治上作出总结。

这个转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暴露得十分明显，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这种自发势力。我们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

看待这一系列现象的。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在这方面，无产阶级政权要取得胜利，就要采取许多复杂的办法，确切些说，要采取一系列复杂的过渡办法——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看错过。1918年底，我们颁布了关于实物税的法令，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当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战争，我们没有能够实行这个法令。在国内战争的环境里，我们不得不采用战时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只能采用这种办法和态度，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必将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当我们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实行向和平转变的时候，应当想到，在拥有大生产的国家里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比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要容易些。完成这项任务要采取许多办法，我们决不能对这些困难视而不见，也决不能忘记，无产阶级是一回事，小生产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忘记现在还有各种阶级存在，不能忘记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势力是导致白卫分子卷土重来的政治跳板。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个问题，应当认识到，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要有高度的团结、沉着和纪律，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也要有一套办法，这些办法过去只是由于战争而没有能够实行。我们应当承认，实行租让，购买机器和工具来满足农业的需要，这是必要的，这样就能换得粮食，恢复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正常关系，保证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的生存。我希望我们以后再来谈谈这个问题。我重复一遍，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一年，可以说是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一年，它向我们提出了极端困难的任務。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25页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这次大会正式宣布改行新经济政策

(1)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报告中总结了实行“战时共产主义”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及其原因，指出：我们以前的纲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在理论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领导农民向社

会化的、集体的劳动过渡，但是在实践上，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列宁强调，把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改造小农要花几代人的时间。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要大规模使用农业机器，大规模实现电气化，才能根本改造小农。而现在必须给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使农民获得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和动力。

5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3月15日）

同志们，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作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我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为什么要作这种修正的问题。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好多情况，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

现在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或者说如何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需要采用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你们知道，为了争取这个条件，我们做的工作比以往多得多，然而，要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妥协，这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全部

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有些人把政治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看做和欺骗差不多，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必须纠正他们的错误。阶级是欺骗不了的。三年来，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群众从尖锐的斗争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根据我们的世界观，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经验和我国革命的教训，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这一妥协是不牢固的——这是客气一点说，“客气一点”这几个字不要写进记录。如果说得直率一点，那么这一妥协是相当糟糕的。我们至少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愿表达得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能够直率地说：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应当对农民说：“你们想要倒退，想要全部恢复私有制和自由贸易，那就必不可免地会再受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许许多多的历史实例和革命实例，都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共产主义初步原理或政治经济学初步原理稍作推论，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农民同无产阶级分道扬镳，向后倒退——并且让国家也倒退——以至再受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这对农民是不是合算呢？你们合计一下吧，或者让我们一起来合计一下吧。”

我们认为，如果合计得正确，那么，虽然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小农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我们所意识到的深刻矛盾，合计的结果是会有利于我们的。

不管我们的物资多么缺乏，满足中农要求这一问题还是必须解决的。在农民中间中农比过去大大增加，矛盾消除了，土地的分配使用平均得多了，富农已经大伤元气，一大部分已被剥夺了财产——在俄罗斯比在乌克兰要多些，在西伯利亚则要少些。可是，整个说来，统计材料完全无可争辩地表明，农村已经是均衡化了，平均化了，这就是说，向富农和无地农民这两方面的急剧分化已经消除了。一切都变得比较平均了，整个说来，农民已经处于中农的境况。

对于这种中农，对于这种有自己的经济特点和自己的经济根系的中农的要求，我们能不能予以满足呢？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竟然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老实说，这样的幻想家在我们中间是不少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幻想家，怎么能够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呢？实践显然已经表明，农业集体经营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创举，可以起多么巨大的作用。但是实践也表明，这种试验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人们怀着一片好心，到农村去组织公社、组织集体农庄，却不善于经营，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这些集体农庄的经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不该这样经营的例子，让周围农民见笑或者生气。

你们很清楚，这样的例子不知有过多少了。我再说一遍：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我说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倒不是说需要几百年。你们都很清楚，要获得拖拉机和机器，要实现一个大国家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客观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我们应当对他们

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怎样去满足农民呢？满足农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对怎样满足农民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自然，这要从农民的要求本身中去寻找。这些要求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要求加以审查，必须从经济科学的观点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农民的经济要求的一切加以考察。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对自己说：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交易，那还算什么贸易自由！那就会成为纸上谈兵；而纸上的东西是满足不了各个阶级的，只有用物质的东西才能使它们满足。必须好好地理解这两个条件。关于第二个条件——我们怎样弄到商品，我们能不能弄到商品——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至于第一个条件——流转自由——需要在这里谈谈。

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难道可以承认贸易自由，可以实行这种自由吗？这里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回答说：自然，这个问题在实际解决时是非常困难的。我事先就预见到，并且在和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在分发给你们的那个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初步草案中，发生问题最多的——发生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就是关于允许在地方经

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这一点。这一点是在第8节的结尾中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范围究竟怎样？它怎样实现呢？如果谁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他就错了。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立法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任务只是规定原则路线，提出口号。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因为播种的季节就要到来了。然后再来发动我们整个机关，运用我们全部的理论力量和全部的实践经验，来研究这个工作应当怎样进行。能不能这样做呢？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做呢？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如果我们能获得纵然是数量不多的商品，把这些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掌握在控制政权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那么我们作为国家，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能够获得经济权力。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就能够活跃小农业，这种小农业在严酷的战争和经济破坏的重压之下无法发展，现在已经陷于凋敝。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如果这种流转使国家能用工业品换得最低限度的一点粮食，以满足城市、工厂和工业的需要，那么在恢复经济流转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就能够仍旧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得到巩固。农民要求在实践中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流转关系。另一方面，一个交通不便、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悬殊、农业条件不同以及还具有其他种种特点的农业大国，必须让各地的农业和各地的工业在当地范围内有一定的流转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走得太远了：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分寸——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然而这样做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过去我们一直是生活在极端激烈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因此我们在经济方面也只能按战争方式行动，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竟然熬过了这样一场战争，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巨大的热情创造了这个奇迹；由于这种奇迹，我们打退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进攻。但是同时，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在鼓动和宣传当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允许地方流转自由，而又不破坏无产阶级政权，还能巩固这一政权。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的任务是向你们证明，这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如果它手里有什么物资的话，它完全可以把这些物资投入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农的要求，通过地方经济流转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现在，简单地谈谈地方经济流转问题。首先我要讲一下合作社问题。当然，在实行地方经济流转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合作社的，而现在合作社在我国已经奄奄一息。我们的党纲强调指出，最好的分配机构就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合作社，这个机构是需要保存下来的。党纲是这样说的。[\(1\)](#)这一点我们是否执行了呢？执行得非常不够，而且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执行，其部分原因还是我们犯了错误，部分原因则是军事上需要。合作社生成比较会经营的、经济地位较高的分子，从而在政治上生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是一种化学定律——是没有办法的事！（笑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些自觉不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帮助尤登尼奇之流的人。这同样是一种定律。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战。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我们当时必须保卫自己，而且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能不能

一成不变呢？不能。这样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无疑是一种错误。正因为如此，关于合作社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很短，我现在把它读一下：

“鉴于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²⁾完全是以承认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而现在余粮收集制已经为实物税所代替，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

撤销这项决议。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拟订一些决定，使之在党和苏维埃系统中获得通过，以便根据俄共党纲并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来改善和发展合作社的机构和活动。”

你们会说，这说得不明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说不明确，但这是必要的。为什么说这是必要的呢？因为要十分明确，那就必须十分清楚，我们在全年当中能做成什么事情。谁知道这一点呢？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

但是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这个决议说：“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是一个很好的机关；但是，当我们重新研究对小农的态度时，还规定合作社必须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从而束缚自己的手脚，那在政治上就犯了明显的错误。我们应当责成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和确定一定的办法并作一定的修改，检验我们要采取的前进和后退的步骤——看看这应当做到什么程度，怎样保持政治利益，应当放开多少才能松动些，以及如何检验试验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我们在这方面正面临着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和过渡办法。有一点我们心中明白：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设想我们的运动将沿着直线前进，而事实上，正像在革命史上常见的那样，运动是曲折前进的。用这样的决议把手脚束缚起来，这是政治错误。现在我们要撤销这个决议，我们说，应当以强调合作社机构的作用的党纲为指针。

[……]

我应当再就个体商品交换问题讲几句话。我们说流转自由，就是指个体商品交换，也就是鼓励富农。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要闭起眼睛不看这个事实：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意味着富农在这种制度下会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发展的地方发展起来。但是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不能采用禁止的办法，而应当自上而下由国家实行联合，由国家采取措施。如果你能给农民机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个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如果你还给不了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商品。如果商品在你手中，那你就能掌握住政权，而停止、割断和取消这种可能，那就是取消流转的一切可能，就不能满足中农的要求，就不能同他们友好共处。俄国农民中成为中农的人愈来愈多了，害怕交换会成为个体交换是不必要的。在交换中，任何人都能给国家一些东西。一些人能提供余粮，另一些人能提供蔬菜，还有一些人则能提供劳务。情况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这一点毫不讳言。你们可以看到，在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中（草案已经分发给你们了）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相互抵触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该草案的末尾写道：“代表大会基本上〈这个词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同意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一些规定，并责成党中央委员会迅速使这些规定协调起来”⁽³⁾。我们知道，这些规定不协调；我们还来不及做协调工作，我们还没有接触有关细节的工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将仔细地研究实行实物税的形式并通过相应的法律。预定的程序是这样：如果今天你们能通过这个草案，这个草案就将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也不颁布法律，而仅仅颁布一个经过修改的条例，然后再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

员会把它变为法律，而更重要的是，由它们规定具体的细则。重要的是要使各地了解这件事的意义，并能起来响应。

为什么我们需要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呢？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制为前提的。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

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业主能够而且一定会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向他征收的将不是他所有的余粮，而仅仅是实物税；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主要的是要有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必须适应中农经济的情况，我们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能够把中农经济改造过来，在今后十年内也还不能把它改造好。

国家必须供应一定的粮食。所以去年我们的征粮数曾经有所增加。现在税额必须少一些。数字还没有确定，而且也无法确定。波波夫的《苏维埃共和国及与它结成联邦的各共和国的粮食产量》这本小册子，引用了我们的中央统计局的材料，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切的数字，指出了农业生产下降的原因。

要是发生歉收，征收余粮就不可能了，因为余粮根本就没有。那就不得不从农民的口中拿走粮食。要是收成，那时大家稍微饿一点肚子，国家便可以因此而得救；或者是我们不能从那些吃不饱肚子的人那里取得粮食，那国家就会灭亡。我们必须向农民宣传这一点。要是收成还不坏，那就会有近5亿普特的余粮。这么多余粮就能保证消费，并且可以有一些储备。整个问题在于使农民有一种经济上的刺激和动因。应当对小业主说：“掌柜的，你生产粮食吧，国家只征收最低限度的实物税。”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58、62—64页

[\(1\)](#)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9页。——编者注

[\(2\)](#)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25页。——编者注

[\(3\)](#)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7页。——编者注

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 (1921年4月14日)

我热烈祝贺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它们的紧密联盟成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从来没有见过的、在资产阶级制度内决不可能有的民族和睦的典范。

尽管高加索各族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民族和睦非常重要，但更加重要得多的是保持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通道。任务是困难的，但是完全可以完成。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最重要的是要使外高加索的共产党员懂得他们的情况的特殊性，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懂得决不可以照搬我们的策略，而必须经过周密思考改变策略，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从任何地方得到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援助。恰恰相反，过去这几年来，它一直在同协约国的军事侵犯和封锁作斗争。

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却从俄罗斯联邦得到了政治上的援助和不大的军事援助。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

第二，现在不用害怕协约国方面的侵犯以及它在军事上对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的白卫分子的支援。协约国在俄罗斯境内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这迫使它暂时大概要放谨慎一些。

第三，高加索各共和国，同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

第四，俄罗斯在经济上过去是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这样；高加索却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

区别还不止这些。但是就从上述种种区别看来，已经足以懂得必须采取另一种策略。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温和一点，谨慎一点，通融一点。通过实行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在经济上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加强和加紧利用。石油、锰、煤（特克瓦尔切利煤矿）、铜——丰富的矿产资源还远远不止这一些。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同外国的商品交换。

应当广泛地、坚定地、巧妙地、谨慎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千方百计地利用这方面的工作来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和吸引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要利用同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商品交换，来尽力发展物产丰富的边疆的生产力，发展水力和灌溉。为了尽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灌溉是特别重要的。

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对于高加索各共和国来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俄罗斯联邦的特点。这就是必须懂得和善于实行的、跟我们的策略不同的策略。

我们曾致力于打开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缺口。现在缺口已经打开了。我们在反对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得到全体协约国的支援，协约国用封锁和军事援助了他们）的极端残酷、艰苦、剧烈、异乎寻常的战争中，捍卫住了自己的生存。

高加索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你们已经用不着去打开缺口了，你们应当善于利用1921年的有利于你们的国际形势，更谨慎地、更有步骤地创造新局面。1921年，无论欧洲或全世界，都已经不同于1917年和1918年了。

不要照搬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不要在你们那里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要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应当立刻在经济上依靠同资

本主义外国的商品交换，不要吝啬：就让它们得到几千万普特宝贵的矿产品吧。

应当立刻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开始兴建电气化和灌溉方面的巨大工程。灌溉是最需要的，它将最有效地改造边疆，复兴边疆，它将埋葬过去，可靠地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封信写得很潦草，请你们原谅，因为我必须赶快把它写出来，好交给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带去。让我再一次向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致最崇高的敬礼和祝愿。

尼·列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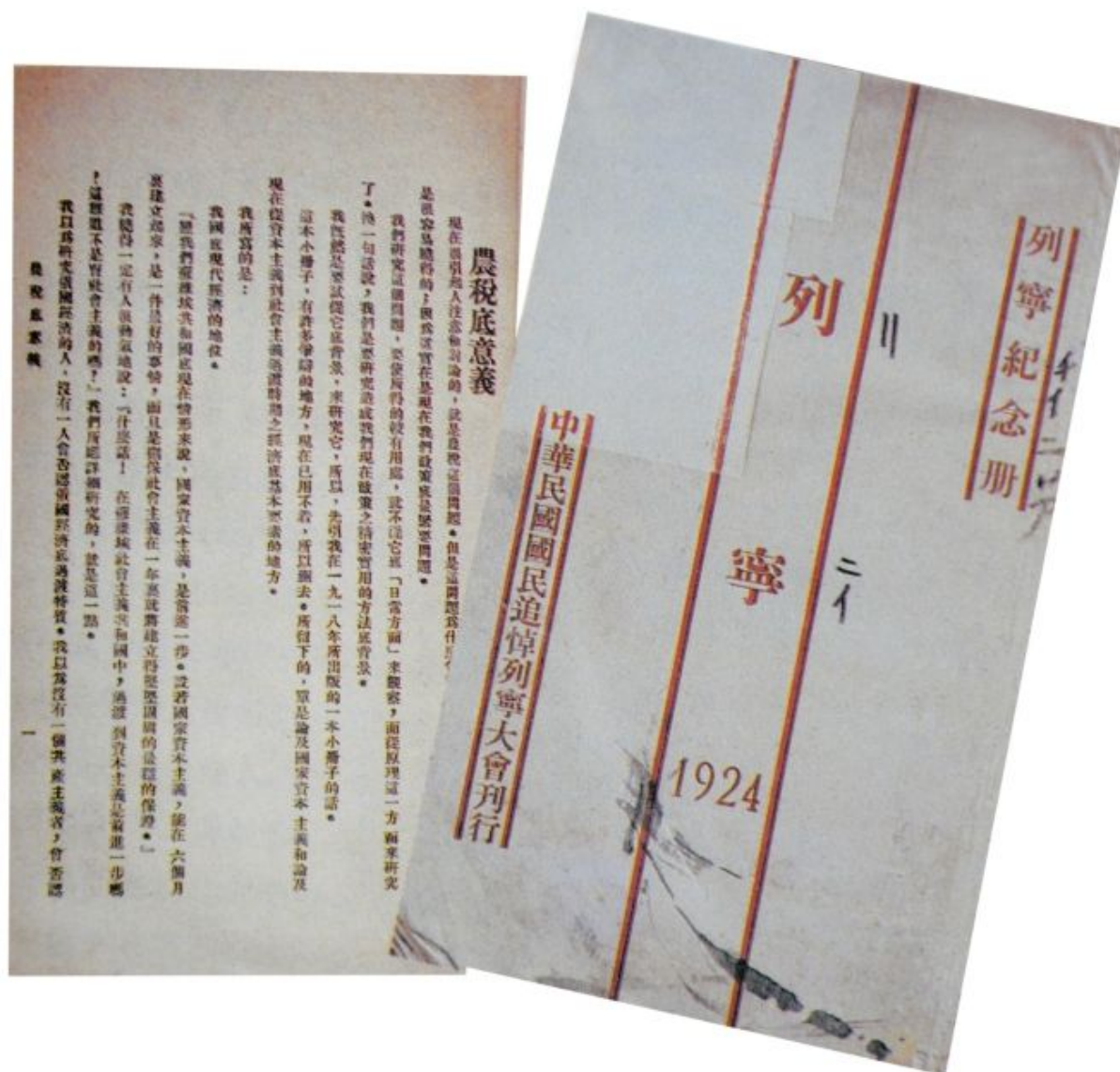
1921年4月14日于莫斯科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84—186页

(1) 列宁在文中阐明了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的原则。他指出，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同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条件不同，因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决不能照搬俄罗斯联邦的做法，而必须根据自身的特殊性，经过周密思考来制定相应的政策，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这样才能稳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 （节选）（1921年4月21日）

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



1924年3月为悼念列宁而在北京出版的《列宁纪念册》和该纪念册所载
列宁《论粮食税》一文(当时译《农税底意义》)

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为什么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呢？

因为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大的“阻碍”正是这方面引起的。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那些想不经过这种办法来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代表，实际上只会成为白卫分子和资本家的帮凶。这是因为不经过这种办法，就无异是把工人的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就无异是为了工人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牺牲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专政的利益，牺牲工农为反对地主、资本家而结成的联盟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在争取劳动摆脱资本桎梏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利益。

总之，首先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

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政策的实质何在呢？

关于这点，现在非常广泛地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这些观念所以不正确，大部分是由于人们不深入研究过渡的实质，不自问一下，究竟这一过渡是从什么过渡到什么。照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从共

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为了批驳这种错误看法，我不得不引用我在1918年5月说过的话。

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

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尽管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都支持我国的剥削者）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工人和农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英勇奇迹。这一事实也表明，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

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

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我国的经济破坏至今还十分严重，战争（昨天已经进行过，由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恶毒，明天还可能爆发）所造成的负担还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我们还拿不出工业品向农民换取我们所必需的全部粮食。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才实行粮食税，即把最必需（对军队和工人来说）的粮食作为税收征来，其余的粮食我们将用工业品去交换。

同时还不要忘记下面这一点：贫困和经济破坏到了这种程度，竟使我们不能立刻恢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的生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大工业中心有大量粮食和燃料的储备，必须以新机器代替破旧机器，等等。根据经验，我们深信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知道，经过这场破坏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甚至连最富裕和最先进的国家，也要在一定的、相当长的年限内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刻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

这样，结果又会怎样呢？

结果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贸易自由基础上复活。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

试问，有必要这样做吗？能够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吗？这样做不危险吗？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但这些问题多半只能暴露出提这些问题的人的幼稚无知（说得轻一点）。

请看我在1918年5月是怎样确定我国经济现有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组成部分）的。从宗法式的即半野蛮的直到社会主义的这五种结构、五个层次（或者说组成部分）都是存在的，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在一个小农国家内，不言而喻是小农“结构”，即部分是宗法式的、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现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是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向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我们已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

需要的全部产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来，至少在全国电气化第一批工程完成之前是拿不出来的。那该怎么办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

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

当然能够。我在1918年5月就反复论证过这一点，并且我相信在1918年5月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当时我还证明说，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现在有些人犯了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只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相比较，而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下，也应该把国家资本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生产作一番比较。

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尽可能明确地想到，在我们苏维埃体系内，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将是怎样

的，而且可能是怎样的。

苏维埃政权怎样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苏维埃政权怎样“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租让。现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一致认为租让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考虑过租让有什么意义。就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来看，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譬如说，我们有100个油田、矿山和林区。我们不能全部开发，因为我们的机器、粮食和运输工具都不够。由于同样原因，已经开发的产区我们工作得也不好。正由于大企业的开发工作做得不好、不充分，因此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在各方面都猖獗起来：附近的（以至整个的）农民经济遭到削弱，它的生产力受到破坏，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愈来愈不信任，盗窃公共财物的现象时常发生，小规模的最危险的投机倒把活动大量出现，等等。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租让政策执行得恰当而谨慎，无疑能帮助我们迅速（在某种不大的程度上）改进生产状况，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要以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租让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对我们有利而无害，这要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至于斗争的方式如何，将由实践来表明。

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在租让方面，任务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当订立租让合同时，一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而订立之后还要善于监督该合同的执行。这方面困难无疑是有的，而错误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困难，与社会革命的其他任务比较，尤其是与发展、推行、培植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比较，还是极其微小的。

由于要实行粮食税，党和苏维埃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租让”（即和“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的）政策的原则和原理运用到自由贸易及地方流转等等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

拿合作社来说吧。粮食税法立即引起了对合作社条例的修改和合作社“自由”与权利的一定的扩大，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显和一目了然，而比较复杂，因此它使我国政权在实践上遇到的困难更多。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在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会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把小资本家提到首位，给他们以最大的利益。既然小业主占优势，既然有交换的可能和必要，那么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无视这一明显的真理，便是干蠢事或犯罪。

但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它对我们是有利

的，有好处的，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说来，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不仅是由于上述一些原因，而且是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又是一大优点。

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租让和合作社比较一下。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租让在每一份租让合同中，只关系到一个资本家，或者一个公司，一个辛迪加，一个卡特尔，一个托拉斯。合作社则包括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个小业主。租让容许有、甚至要求有确切的合同和确切的期限。合作社则既不能有十分确切的合同，也不能有十分确切的期限。撤销合作社法令，要比解除租让合同容易得多，但中断租让合同就意味着一下子干脆地立即与资本家断绝在经济上的联盟或“共居”的实际关系，而撤销合作社法令也好，颁布任何法令也好，都不仅不能一下子就中断苏维埃政权与小资本家的实际“共居”关系，而且根本不能断绝实际的经济关系。“监视”承租人容易，“监视”合作社工作者困难。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就是说，是比较复杂的过渡，但是它一旦获得成功，却能包括比较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根深蒂固的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彻底铲除。租让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和我们的相比较——大企业；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些企业就会完全归我们所有。

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再拿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来说。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第四种形式就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赁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后两种形式，我们根本没有人谈过，根本没有人想过，根本没有人注意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不是由于我们又强又聪明，而是由于我们又弱又愚蠢。我们害怕正视“卑微的真理”，往往受“令人鼓舞的谎言”所摆布。我们经常爱谈论“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明确地想到这个“我们”究竟是指谁。我在1918年5月5日的文章中列举的我国经济中社会经济的一切——一切，绝无例外——组成部分，一切不同的结构，必须予以重视，务必使这一清楚的概念不致被遗忘。“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正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就在这里。

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

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业已完成的科学巨著，知道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电站可以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拿官僚主义问题来说，从经济方面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吧。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又过了一年。在1919年3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党纲，在这个党纲中，我们讲得很直率，我们不怕承认祸害，而愿意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唤起同祸害作

斗争的想法、意志、毅力和行动，我们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2\)](#)。

又过了两年。1921年春，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讨论了官僚主义问题以后，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呢？这种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正是为了反对工人的（部分地也是为了反对农民的）革命运动而需要官僚机构，首先是军事的、其次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机构。这种现象我们这里是没的。我们的法庭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法庭，我们的军队是反资产阶级的阶级军队。官僚主义并不在军队里面，而是在为军队服务的机关里面。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战争的结果。那时我们四面被封锁，被包围，与全世界隔绝，以后又与南方产粮区、与西伯利亚、与产煤区隔绝，我们无法恢复工业。那时我们不得不果断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不畏最大的艰险：我们宁可忍受半饥饿、甚至比半饥饿更坏的生活，也无论如何要捍卫住工农政权；尽管经济破坏空前严重，流转停顿，我们也要把它捍卫住。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吓坏了的情况（他们实际上往往是出于恐惧，出于害怕，才去追随资产阶级的）并没有把我们吓倒。我们的做法在一个被封锁的国家中，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曾是取得胜利的条件，然而正是到了1921年春，在最后一批白卫军彻底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领土以后，却暴露出它的坏的一面。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内，可以而且只能“堵塞”一切流转；由于群众发扬了非凡的英勇精神，这种情况可以忍受三年之久。此后，小生产者的破产更厉害了。大工业的恢复又往后拖，往后推了。于是，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了出来。

应当大胆承认这一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以便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做起——在我国的一切建设部门中，我们还不得不多次反复地从头做起，改正没有做好的事，选择各种完成任务的途径。既然大工业的恢复要推迟，既然工业和农业之间流转“被堵塞”的情况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致力于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即恢复小工业。从这方面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把被战争和封锁弄得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这一边先支撑起来。要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相当狭小而“适度”的。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

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培养和唤起各地方在经济建设事业中较大的主动性——省里的要大；县里的更大；乡和村里的还要大——其目的就是要迅速地振兴农民经济（即使是使用“小笔”资金在小范围里这样做也好），靠发展附近的小工业来帮助农民经济。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要求把这件事作为注意和关怀的中心，作为各项“突击”工作的中心。在这里，也就是在最接近极广泛极深厚的“基础”的地方所取得的某种改善，能使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更积极更顺利地把大工业恢复起来。

粮食工作者过去只知道一个基本指令：收集100%的余粮。现在则是另一个指令了，这就是要在最短期间内征收100%的粮食税，而后再用大工业和小工业的产品换取100%的余粮。一个征收了75%的粮食税、又用大小工业的产品换取了75%（指第二个百分数内的）的余粮的人，同另一个征收了100%的粮食税和换取了55%（指第二个百分数内的）的余粮的人相比，前者做的事情对国家更有利。粮食工作者的任务愈来愈复杂了。一方面，这是国库的任务。征收粮食税要尽量快，要尽量合理。另一方面，这又是总的经济任务。要努力循着扩大和巩固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这一方向来指导合作社，来帮助小工业，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还很不善于做这件事；官僚主义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

家学习。我们要一个个省、一个个县、一个个乡、一个个村地来比较实际经验的总结：在某个地方，私人资本家和小资本家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他们得到的利润大概有多少。这就是我们“为了学习”而付出的费用或酬金。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而在邻近的地方，采用办合作社的办法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合作社的利润有多少。至于第三个地方，则用纯粹国营的、纯粹共产主义的方式取得了什么什么成绩（这第三种情况在目前是罕见的例外）。

任务就在于每个区域的经济中心，每个省执行委员会所属的经济会议，应把交纳粮食税后余粮如何“流转”的各种试验或办法立即安排好，并把这一工作提到首位。几个月之后，就应当有一些实际结果，以便加以比较和研究。本地盐或外来盐；从中部地区运来的煤油；手工木材加工业；靠当地原料生产一些虽不很重要、但对农民却有用的必需品的手工业；“绿煤”（利用当地小水力来发电），等等——这一切全都应当利用起来，目的是想方设法活跃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甚至没有经过合作社，没有把这种资本主义直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奇谈怪论：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

但这一点也不是奇谈怪论，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经历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严重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少争论些字眼吧。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毛病还非常大。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际经验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常常有这

样的情况：模范的地方工作，哪怕是很小范围内的地方工作，往往比中央许多部门的国家工作具有更重要的全国性意义。我国目前在农民经济方面，特别在用工业品交换剩余农产品方面的情况恰恰就是这样。在上述方面，即使只是一个乡的模范工作，也比“模范地”改善某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具有更大的全国性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央机关在三年半来竟已沾染了某些有害的因循习气；我们还不能大大地迅速地改善这种机关，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帮助中央机关作比较彻底的改善，帮助它增加大批新生力量，帮助它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帮助它克服有害的因循习气，这种帮助应当来自地方，来自下层，来自一个不大的“整体的”模范工作，这里需要的正是“整体”，即不是一种经济，不是一个经济部门，不是一个企业，而是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是整个经济流转——哪怕是在不大的地方范围内——的总和。

我们中间一切必须留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将要——即使是在有限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改善机关工作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义。但在这方面，主要的帮助来自地方，今后也一定来自地方。据我看来，我们在地方上的情况一般比中央要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在这方面，莫斯科不能不是一个糟糕的城市，而且算得上是全国最糟糕的“地方”。在地方上有两种倾向；坏倾向比好倾向要少。坏倾向就是：混到共产党里来的旧官吏、地主、资产者以及其他败类滥用职权，他们有时做出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等恶劣行为。这就需要用恐怖手段进行清洗：就地审判，立即枪决。让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非党市侩去捶胸大叫：“感谢上帝，我不像‘他们’，向来不赞成恐怖手段。”这些傻瓜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为自己挑了这样的角色，即充当帮助白卫分子愚弄工人和农民的奴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不赞成恐怖手段”的，因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带领群众去受白卫分子的恐怖统治。俄罗斯的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和科尔尼洛夫叛乱，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叛乱，格

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芬兰、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英雄们也证明了这一点。让那些帮助白卫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奴才们去自吹自擂，说他们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们还是要说出一个严酷而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空前危机、旧的联系中断、阶级斗争激烈的国家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和伪君子及空谈家说的正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绝对不行的。或者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

好倾向就是：有成效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非常注意工人和农民的需要，非常关心经济的振兴，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地方上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这种好倾向虽然比坏倾向多，但毕竟还嫌太少。可是这些好倾向是有的。各地都在培养那些经受过国内战争和艰苦生活考验的新的年轻的有朝气的共产主义力量。至于经常不断地把这种力量从下面提拔上来，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这一点可以而且必须更广泛更坚决地做下去。某些工作人员可以而且应当调离中央机关到地方上去工作：他们以县和乡的领导者身份，在那里模范地做好整个经济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贡献，就能比有的中央机构做出更重要的有全国意义的事业。这是因为模范工作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园地，是可供仿效的榜样，有了榜样，仿效就会比较容易了，何况我们还能从中央给以帮助，使各地都来广泛地“仿效”这种榜样。

利用交清粮食税后的余粮和利用小工业主要是手工业来发展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流转”问题，实质上就是要求地方上发挥独立的、熟悉情况的、巧妙的首创精神，所以，从全国观点看来，一个模范县和一个模范乡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军事上，在最近的对波战争期间，我们就没有害怕违背官僚主义的等级制，没有害怕“降低官衔”，没有害怕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仍保留

他们在中央机关的高级职务)调到下面去工作。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某些委员,或者某些部务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们,调到下面去工作,甚至是担任县的、乡的工作呢?我们确实还没有“官僚化”到这样的程度,还不至于因为下调就“感到难堪”。而且我们这里可以找到几十个乐意担负这种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员。我们这样做了,全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会得到非常大的好处,模范乡或模范县将起到不仅是巨大的,而且简直是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作用。

顺便说说,必须指出在与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一问题的原则提法上所作的必要的改变,这虽是小问题,但却是很有意义的。凡是不逃避国家的监督的“正当”贸易,我们都应当加以支持,发展这种贸易对我们是有利的。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倒把,无视这一点是很可笑的。

怎么办呢?难道宣布投机倒把活动可以不受制裁吗?

不。应当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宣布一切盗窃公共财物行为,一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计算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事实上要比从前更严厉三倍地加以惩办)。正是要这样来提出问题(人民委员会已经开始这样做,就是说,人民委员会已下令开始重新审查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法令),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1) ①这是列宁阐释新经济政策的一篇重要文章。在节选的部分,列宁论证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指出,根据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还不能实行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详细评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和租赁制,同时指出,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政权,我们就一定能防范和克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08页。——编者注

结 束 语

现在来总结一下。

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

经济的极度破坏因1920年的歉收而更加严重，同时大工业又不可能迅速恢复，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实行这一过渡。

结论：首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方法：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

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有助于克服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这要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反对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应转变为反对盗窃公共财物、反对逃避国家监察、计算和监督的斗争。我们要通过实行这样的监督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我们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在活跃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要研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样。

支援为农业服务并帮助农业发展的小工业；为了支援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供给它一些国家的原料。把原料留着不去加工，是极大的罪恶。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

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要竭力帮助广大劳动者，接近他们，从他们中间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工作人员来做经济工作。而对于实际上不外乎是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一些“非党人员”，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打发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让他们去自由地领略纯粹民主的种种妙趣，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流思想吧。

1921年4月21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06—224、231—233页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节选）

（1921年6月13日）

4. 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在这种国内形势下，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这项任务在俄国特别艰巨，因为我国很落后，而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又使我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即使撇开这两个特点不谈，这项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其困难的任务之一，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将来都会碰到的，也许只有英国例外。然而就拿英国来说，也不能忘记：英国小佃农阶级的人数虽然特别少，但由于英“属”殖民地的几亿人民在事实上遭受着奴役，英国职工中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数占极高的百分比。

因此，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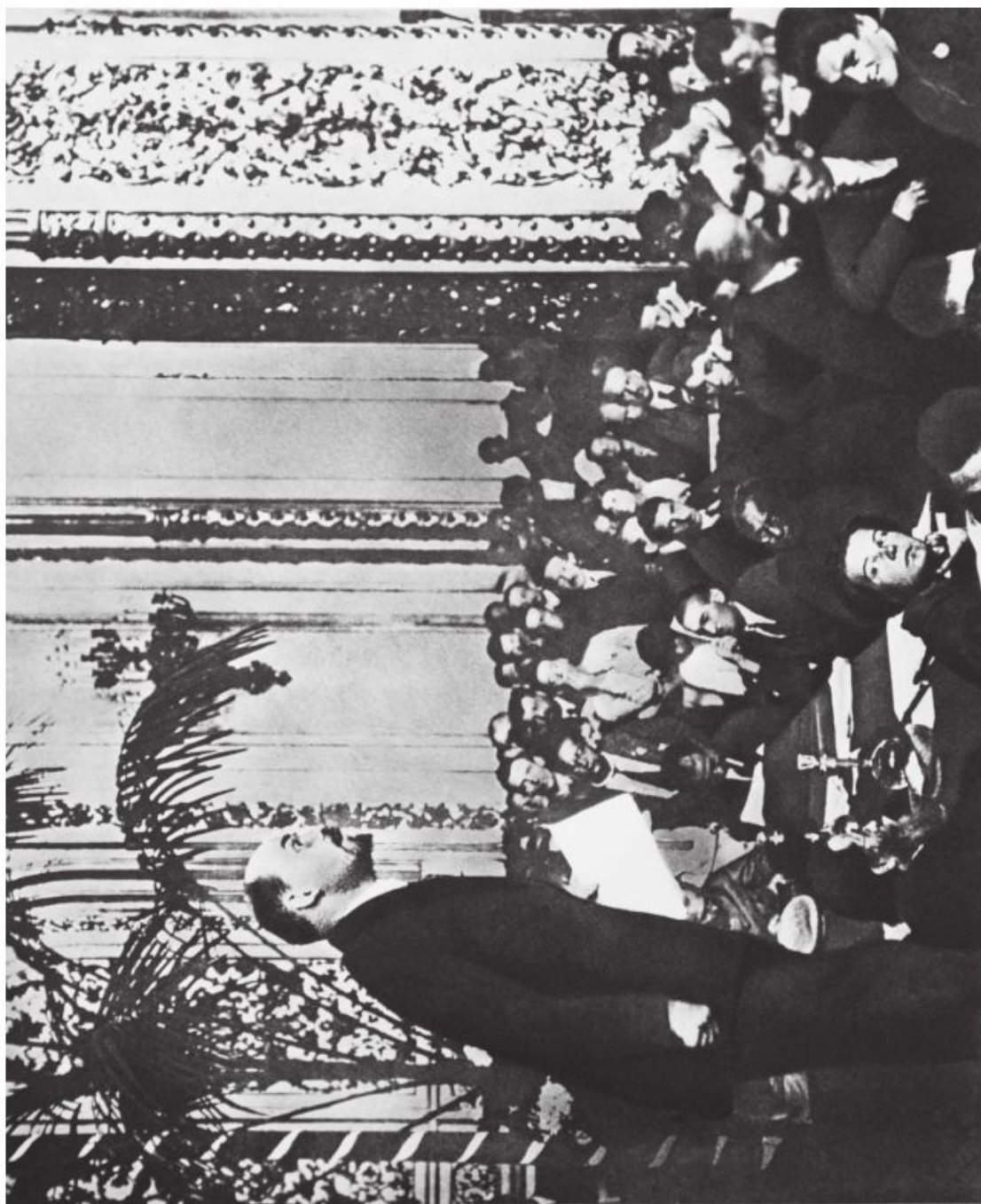
（1）本文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一。列宁在报告提纲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大机器工业，也就是全国电气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用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机械化、社会化的大农业。只要运输业和大工业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在某种限度内的发展就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这样有利于振兴农业，有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5. 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关系的基础，是在1917—1921年这个时期建立的。当时，资本家和地主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和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促使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结成军事联盟，并把这种联盟固定下来。国内战争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愈尖锐，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偏见在斗争烈火中就烧毁得愈迅速，而实践本身也就会愈加清楚地使人看到，甚至使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看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拯救农民，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际上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曾经是而且不能不是他们巩固的联盟的初步形式，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军事联盟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当时农民从工人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和免遭地主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则在大工业恢复以前从农民那里借到了粮食。

6. 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

粮食，小农和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完全正常和巩固。在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决不可能一下子做到的。对一个组织得尚不够完备的国家来说，为了能在反对地主的极端困难的战争中坚持下去，余粮收集制曾是最可行的办法。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改行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适量的粮食税能使农民的境况立刻得到很大改善，同时能使农民从扩大播种面积和改进耕作中得到好处。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转到工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办法。

7. 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粮食税自然意味着农民在完税以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既然国家还不可能拿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全部余粮，余粮的买卖自由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

但只要运输业和大工业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上述范围内这样做对于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可怕。恰恰相反，在一个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即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当然只是在某种限度内），因为这样能立刻振兴农业。租让制更是如此，因为工人国家并不取消国有化，只是把一些矿山、林区、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额外获得一些设备和机器来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

我们把一部分贵重产品付给承租人，这无疑是工人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交纳的一种贡赋；我们丝毫不掩饰这一点，但应当明确认识到，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改善工农生活状况，交纳这种贡赋对我们是有利的。

8. 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1917—1921年间，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无疑制定得很粗糙，很不完善，产生了许多舞弊行为。在执行上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政策。现在，这一政策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落后国家中保全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已逐渐完善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我们掌握全部政权的第一年（1918年8月1日—1919年8月1日），国家收集了11 0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收集了22 000万普特，第三年超过了28 500万普特。现在，有了实际经验以后，我们计划收集并指望收集到4亿普特（粮食税为24 000万普特）。工人国家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才能慢慢地但是不断地恢复大工业，才能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

9.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拟订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这一科学工作，本是我们应当做的，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在俄国两百多位优秀的学者、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参加下，这项计划业已编制出来，印成了厚厚的一大册，基本上已获1920年12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现已准备好在1921年8月召开全俄电气技术人员代表大会来详细审查这项计划，那时计划就将得到国家最后批准。电气化的第一期工程预计10年完成，共需37 000万个工作日。

1918年，我国新建了8个电站（装机容量为4 757千瓦），1919年新增数达36个（装机容量为1 648千瓦），而1920年达到100个（装机容量为8 699千瓦）。

不论这个开端对我们这个大国来说多么微不足道，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工作已经做起来了，而且做得愈来愈好。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他们一月比一月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使广大小农摆脱资本的奴役，走向社会主义。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8页

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

10月25日（11月7日）的四周年快到了。

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

这种意义和这种经验可以极其简要地（当然是极不充分极不精确地）说明如下。

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一切进步的障碍。

我们有权引以自豪的是，从对人民群众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所做的这种清除工作比125年多以前的法国大革命要坚决、迅速、大胆、有效、广泛和深刻得多。

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国际上这一社会阶层的俄国代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讲了不知多少糊涂话。四年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以往革命经验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哪一部分。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在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对一个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落后国家来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可是，我不准备多谈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懂得这一内容指什么。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

到1917年，俄国农奴制度究竟还有哪些主要表现、残余或遗迹呢？还有君主制、等级制、土地占有制、土地使用权、妇女地位、宗教和民族压迫。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顺便说一下，一切先进国家在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倍。

这些胆小鬼、空谈家、妄自尊大的纳尔苏修斯和哈姆雷特总是挥舞纸剑，可是连君主制都没有消灭！我们却把全部君主制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英、法、德这些最先进的国家至今还没有消除等级制的遗迹！）。等级制的老根，即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残余，也被我们彻底铲除了。伟大十月革命的土地改革“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问题“可以争论”（国外有足够的著作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来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些争论上，因为我们正在用斗争来解决这种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争论。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他们的一切传统都从俄国的土地上彻底扫除了。

就拿宗教、妇女的毫无权利或非俄罗斯民族的被压迫和不平等地位来说吧。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鄙俗之徒在这些问题上空谈了八个月。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的国

家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方针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在我国，这些问题已由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律彻底地解决了。我们一向在认真地同宗教进行斗争。我们让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在我们俄国，妇女无权或少权这种卑鄙、丑恶、可耻的现象，这种农奴制和中世纪制度的可恶的残余已经没有了，而这种现象却在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被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和愚蠢的吓怕了的小资产阶级重新恢复了。

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在150年和250年以前，这一革命（如果就同一类型的每一民族形式来说，可以说是这些革命）的先进领袖们曾向人民许愿，说要使人类排除中世纪的特权，排除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排除国家对这种或那种宗教（即“宗教思想”、“宗教信仰”）的种种优待，排除民族权利的不平等。许了愿，但没有兑现。他们是不可能兑现的，障碍在于要“尊重”……“神圣的私有制”。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就不存在这种对倍加可恶的中世纪制度和对“神圣的私有制”的可恶的“尊重”。

但是，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英雄们，都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

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努力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但是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

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的问题，从1914年起就成为世界各国全部政策中的基本问题。这是一个有关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关系到在我们眼看着资产阶级正准备的、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是否会有2 000万人死亡（而在1914—1918年的大战和附加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小”战中是1 000万人死亡），在这一不可避免的（如果有资本主义存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有6 000万人残废（而在1914—1918年是3 000万人残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资产阶级的奴仆和应声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嘲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是唯一的真理，虽然听

起来令人不愉快、粗暴、赤裸裸、无情，的确如此，但同无数极其精巧的沙文主义与和平主义谎言相比，终究是一个真理。这些谎言被戳穿了。布列斯特和约被揭露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糟糕的凡尔赛和约的作用和后果，一天比一天更加无情地被揭露出来。千百万人都在思考着昨天战争的起因和行将到来的明天战争的问题，他们愈来愈清楚地、明确地、必然地认识到一个严峻的真理：不经过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必然会产生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世界（如果我们还用老的正字法，我就会在这里写上两个含义不同的“hel”⁽²⁾），就不能摆脱这个地狱。

让资产阶级和和平主义者、将军和市侩、资本家和庸人、一切基督教徒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所有骑士们疯狂地咒骂这个革命吧。不管他们怎样不停地泄愤、造谣和诽谤，都不能抹杀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千百年来奴隶们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变奴隶主之间的分赃战争为各国奴隶反对各国奴隶主的战争。

这个口号千百年来第一次由一种模糊渺茫的期望变成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千百万被压迫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实际斗争，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消灭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全世界工人联盟对各国资产阶级联盟的第一次胜利，而资产阶级无论是和是战，无非都是牺牲资本奴隶的利益，牺牲雇佣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这次胜利是我国十月革命经历了空前的艰难、困苦和磨难，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以后取得的。难道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过失败和错误就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吗？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以便学会改正这些错误。但事实总是事实：用奴隶反对一切奴隶主的革命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

的诺言，千百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并且还在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得到实现。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保卫祖国”即保卫日本反对美国侵略、或保卫美国反对日本侵略、或保卫法国反对英国侵略如此等等的各国资本家先生们，请继续玩弄你们伪善的把戏吧！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骑士先生们以及全世界所有和平主义的市侩庸人，请继续用新的“巴塞尔宣言”（仿照1912年巴塞尔宣言的式样）来“敷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手段的问题吧！第一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地球上一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以后的革命一定会使全人类摆脱这种战争和这个世界。

我们最后的一项事业，也是最重要最困难而又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最多。开始这样一个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业，难道能没有失败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我们正在进行这一事业。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困难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习惯同巨大的困难作斗争。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叫做“硬骨头”和“碰硬政策”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三四年以来我们稍稍学会了实行急剧的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实行一种新的转变，学习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同个人利益结合，能够提高生产；我们首先需要和绝对需要的是增加生产。批发商业在经济上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把他们联系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实现生产中各种形式的联系和联合。我们已经开始对经济政策作必要的改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是不大的、局部的成就，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我们就要从这门新“学科”的预备班毕业了。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

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我们一定会修完整个“课程”，尽管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情况使这一课程的学习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困难要多得多。不管过渡时期的苦难如灾荒、饥荒和经济破坏多么深重，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1921年10月14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69—177页

(1) 列宁在本文中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他指出：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党和国家现在面临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是经济建设。我们曾经设想用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节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这一错误。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是既要借助革命热情，又要考虑个人利益，搞好经济核算，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2) “hel”一词是现代俄语，有“和平”与“世界”两种含义。这两种含义在旧的俄语中是两个词，即“helv”和“hylv”，前者意为“和平”、“和约”，后者意为“世界”。——编者注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在 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 （1921年10月17日）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确切些说，今天的讲话，打算谈谈新经济政策，并且就我的认识谈谈这一政策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觉得，在某一代表大会上就大会讨论范围之外的问题作报告，要是只介绍党内或苏维埃共和国内的一般情况，那是极不妥当的。

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变

我决不否认作这种介绍的好处，也不否认讨论各种问题的好处，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大多数代表大会的主要缺点是同摆在它们面前的实际任务缺乏直接联系。所以我想联系新经济政策和围绕新经济政策来谈谈这些缺点。

关于新经济政策，我将简略地谈一谈。同志们，你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虽然有些人还很年轻，但是都已经在我们革命初期为贯彻我们的总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正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工作，所以你们不会看不出，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实行了多么急剧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被叫做“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

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之后——例如在1918年初所写的东西（1918年初的情况是我们对旧俄国的第一次政治袭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尽管退出时俄国已经不像样子，但总比听从帝国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劝告继续“保卫祖国”造成的破坏轻一些），如果回忆一下当时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做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第一件事和刚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初期，我们关于经济建设任务所说的，要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所做的要小心谨慎得多。

（1）列宁在这篇报告中阐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目的和指导思想。他指出，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民国家，要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实践证明，不顾客观条件，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这种构想

是错误的。新经济政策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实行粮食税和租让政策能改善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业。这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决策。为了使新经济政策得到贯彻，列宁要求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学会做经济工作，向科学进军，坚决反对狂妄自大、文盲和贪污受贿这“三大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论农民的作用

虽然当时你们并不都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分子，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会知道而且当然知道这样一些决定，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底的决定。这项决定指出必须注意农民经济。决定是根据一个报告作出的，那个报告估计到了国家资本主义在一个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强调了个人的、专人的负责制的意义，强调了这一因素在国家管理（它有别于建立政权的政治任务，有别于军事任务）中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

1918年初，我们曾经指望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可以进行和平建设。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好像危险已经过去，可以着手和平建设了。结果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在1918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和国内战争（它一直延续到1920年）的爆发，真正的军事危险向我们袭来了。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从1917年产生了接收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战略退却

当我们不得不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在建设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像把这一点遗忘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对于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当然，一部分人不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灰溜溜的、近乎惊慌失措的状态，而一旦实行退却，甚至会手足无所措。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要知道，当红军撤退的时候，它避开敌人就是取得胜利的开始，而无论在哪一条战线上，每一次撤退都会使一些人惊慌一阵子。但不论在高尔察克战线上、邓尼金战线上、尤登尼奇战线上，或者在波兰战线上、弗兰格尔战线上，每当我们被痛打一顿（有时甚至不止一顿）之后，“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这句谚语都在我们身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挨过一顿打后，就开始从容地、有步骤地和谨慎地发起进攻。

当然，经济战线上的任务要比军事战线上的任务困难好多倍，但在战略的基本轮廓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1\)](#)

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采取某种从我们的路线和政策来看只能叫做最严重的失败和退却的步骤。而且不能说，这种退却和

红军那种秩序井然地退到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去的退却是一样的。诚然，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这一点可以查证，只要把我们党1921年春的决定同我上面提到的1918年4月的决定对照一下就行了。阵地是事先准备好的，但是向这些阵地的退却（外省很多地方现在还在退却）非常混乱，甚至太混乱了。

[\(1\)](#)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4页。——编者注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

在这里，政治教育委员会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任务就提到了第一位。从新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要善于尽快利用当前的形势。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诚然，已经签订的合同还很少，特别是同我们提出的建议相比），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上萌发出来的。因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就意味着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完税后的剩余农产品，而实物税征收的只是他们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农民在全国人口和整个经济中占极大的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不可能不滋长资本主义。

这是经济学初级读本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识，而在我国，除此以外，每一个粮贩也都这样教我们，他们撇开经济学和政治学，出色地教我们认识经济。从战略上看，根本的问题在于谁能更快地利用这种新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无产阶级力求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资本家则说：“我们回头吧，这样保险一些，别让他们用什么社会主义来打扰我们了。”

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

目前这场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有许多大门，因为打开这些大门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而是违反我们的意愿的）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能够依靠什么？一方面是依靠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在这方面应当想到农民。虽然我们遭到了像饥荒这样的严重灾难，人民在受灾的情况下生活状况仍有改善，而这种改善正是来之于经济政策的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成长。资本家将得益于我们的政策，并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严重的经济破坏，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就是说，它已经失去本阶级的生活常态，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做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

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做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干其他一些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的“活计”。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的关于政治自由的议论我们可以找到很

多，如果看一看国外的俄国即第二个俄国，更是如此。在国外，各种政党出版几十种日报，用世上所有的曲调来赞美政治自由。这一切都是废话、空话。我们必须善于抛弃这些东西。

斗争还将更加残酷

四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严峻的战斗，我们知道：进行严峻的战斗是一回事，而关于严峻战斗的空谈、特别是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的空谈又是一回事。必须善于抛弃这种思想、这种空谈，而去思索问题的实质。而问题的实质是：不论目前还是今后，斗争都比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因为那种军事斗争是司空见惯的。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打仗。用战争杀人的本领大有长进。

诚然，几乎在每一个地主的大本营里都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高喊民权、立宪会议，叫喊布尔什维克破坏了一切自由。

完成军事任务毕竟要比完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军事任务可以用猛攻、袭击和热情来完成，可以直接依靠看到地主正向自己进攻的广大工农拼体力来完成。现在没有公开的地主了。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匪徒，一部分去见尼古拉·罗曼诺夫了，一部分则躲在国外安全的地方。人民看不见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明显的敌人。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原来的敌人，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以往的一切革命碰到这道深渊后都退回去了）。人民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他们是文盲，非常无知。各种特设委员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用特殊手段扫除文盲，还很难说。

人民怎么会知道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垮台以后，在我们中间还存在着葬送了以往一切革命的敌人呢？要知道，如果资本家战胜我们，那就意味着恢复老样子。这一点已为以往一切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作战，因为全世界都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我们。

现在，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资产阶级仍然比我们强大好多倍。我们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惊慌失措，因为过去他们的兵力也比我们强，然而这并不足以在战争中击溃我们，虽然他们拥有比我们强得多的炮兵和空军，在战争中击溃我们本当容易得多。也许反对我们的某个资本主义强国只要及时地再拼凑几个军，再借给高尔察克几百万金卢布，就能把我们打垮。

然而这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不论是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英国士兵，或是迫使舰队撤离敖德萨的法国水兵，都已深深地认识到他们是非正义的，我们是正义的。现在，反对我们的力量仍然比我们强大。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必须依靠最终的力量源泉。而最终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

或者是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权，那我们就会取得胜利，而先进的工人和少数先进的农民是会理解这项任务，会在自己周围组织起人民运动的。

或者是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技术上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就一定会把我们打垮。

是最后的斗争吗？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里取得了胜利，但是它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比较弱。它应当认识到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把全体工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常常在歌中唱道：“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惜这有点不符合实际，可惜这并不是我们最后的斗争。或者你们能在这场斗争中把工农团结起来，或者你们得不到胜利。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种斗争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但是农民和地主间的战争，从奴隶占有制初期起，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种战争曾多次发生，但一个国家政权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各国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战争还从来没有过。

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在以往几十次革命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战争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民不可能有这种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自己创造这种经验，在创造这种经验时，我们只能依靠工农的觉悟。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也是任务的最大困难所在。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有人对我们说：“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结合，就是恢复私有制。”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废除过农民对消费品和工具的个人所有制。我们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农民并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在许多国家里都存在过这种制度。这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地方。困难在于如何同个人利益结合。必须使每个专家也从生产的发展中得到好处。

我们是否善于这样做呢？不，不善于！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已丧失其阶级特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办法，否则我们就不能使无产阶级认识这种过渡。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任务。我们曾尝试用所谓正面攻击的办法来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失败了。这种错误在每次战争中都有，而人们并不把它们看做错误。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采用围攻和对壕战。

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

我们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整个新经济政策要求我们把这两者分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当人民转到新的经济条件下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讨论起来：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应当怎样按新方式来做。开始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非经过大家讨论不可，因为几十年几百年来，人民一直被禁止讨论任何事情，而革命不经过一段普遍开群众大会讨论各种问题的时期，是不能得到发展的。

这造成了许多混乱现象。确实是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该说这并不危险。我们只有及时学会区分哪些事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哪些事需要管理，才能使苏维埃共和国达到应有的水平。可惜我们还没有学会这样做，大多数代表大会离务实很远。

我国代表大会之多，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任何一个民主共和国都没有像我们那样召开这么多代表大会，而且它们也不会允许这样做。

我们应当记住，我国是一个损失惨重和贫穷不堪的国家，必须使它学会如何开群众大会才不致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把需要开群众大会讨论的和需要管理的混淆起来。一方面要开群众大会，一方面要毫不犹豫地进行管理，要比以前资本家管得更严。否则，就不能打败他们。应该记住，一定要比以前更严更紧地进行管理。

在红军里，经过好几个月开群众大会讨论的阶段之后，它的纪律已经不亚于旧军队的了。红军采取了连旧政府都没有采取过的直到枪决的严厉措施。市侩们在书刊上号叫：“看啊，布尔什维克采用枪决的办法了。”我们应当说：“是的，我们采用了，而且是完全有意采用的。”

我们应当说：或者是那些想毁灭我们的人、我们认为理应灭亡的人灭亡，这样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生存下来；或者相反，是资本家生存下来而共和国灭亡。在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里，或者是那些不能振作起来的人灭亡，或者是整个工农共和国灭亡。在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而且也容不得有任何温情主义。温情主义是一种并不亚于战争中的利己行为的罪恶。现在谁不守秩序，不守纪律，谁就是把敌人放进我们的队伍中来。

所以我说新经济政策还有学习方面的意义。你们在这里讨论应当如何进行教育。你们应当得出结论说：我们这里决不容许有学得不好的人。到了共产主义，学习的任务会轻一些。可是现在，在灭亡的威胁下，学习不能不是一项严峻的任务。

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

过去在我们军队中有开小差现象。劳动战线上也有这种现象，因为你是为资本家工作，为剥削者工作，那时不好好干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你是为自己工作，为工农政权工作。应该记住，现在必须解决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共和国就会灭亡。所以我们要像在军队中说过的那样说：或者是让所有想毁灭我们的人灭亡，为此我们要采取最严厉的纪律措施；或者是拯救我们国家，使我们的共和国生存下来。

这就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路线，这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从你们那里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

你们应当记住，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应当高度紧张地从事每天的劳动，否则我们就必然灭亡。

在目前的形势下，整个世界发展得比我们迅速。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世界正调动一切力量来反对我们。问题就这样摆着！这就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个斗争的原因。

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

了。也许其他国家到了建设它们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会这样来解决这项任务。但是我们不能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必须学会这样经营商业，即设法使工业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能通过商业满足自己的需要。办事情应能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巩固工农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大工业。

必须使群众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这种认识付诸实现。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因此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人民是否已经理解了他们所得到的教训。非常遗憾，对这个问题只能回答：没有。如果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教训，那我们动手建立大工业就会迅速得多，早得多。

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它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

过时的方法

这些宣言、声明、布告和法令在当初是需要的。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够多了。为了向人民表明我们要怎样建设和建设什么，要为哪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奋斗，这些东西在当初是必要的。但是，能不能继续向人民表明我们要建设什么呢？不能！要是这样，连一个最普通的工人也要取笑我们了。他会说：“你怎么老是向我们说你要怎样建设，让我们看看你的行动，——你会不会建设。如果不会，那我们就走不到一块，滚你的吧！”他这样说是对的。

应当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已经到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现在没有这种经济基础。我们应当做的正是这件工作。

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正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如果这样的委员会果真能为政治教育服务（“政治教育”是它给自己选的名称）的话。取名并不难，可是，工作做得怎么样呢？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材料。我们的扫除文盲委员会是1920年7月19日成立的。在出席这次大会之前，我特地看了一下有关的法令。是叫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而且是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希望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能够得到说明有多少个省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的材料，希望能够得到准确的工作报告。但是，不得不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好像是一些（怎样说得轻一点呢？）半野蛮人，因为，在一个不是半野蛮人的国家里，是耻于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文盲是在学校里扫除的。那里有像样的学校，人们在学校里学习。学习什么呢？首先是识字。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

最大的奇迹

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新政策呢？既然我们得采取特殊措施来扫除文盲，上帝保佑，那还是让我们设法维持旧的吧。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更明显的是，我们无论在军事方面或其他方面都创造了许多奇迹。我想，要是能够把扫除文盲委员会本身彻底扫除掉，那会是这些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我还希望不要产生如我在这里听说的要把它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分出来的提案。如果我听说的是事实，如果你们仔细想想，那你们就会同意我的看法：必须成立一个扫除某些坏提案的特设委员会。

此外，仅仅扫除文盲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苏维埃经济，而在这件事上，光能识字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的读写本领，必须使他有东西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必须合理分配这些书刊，使它们能到人民手里，不致中途散失，而现在人们读到的还不及一半，其余的都在办公室里派了用场，到达人民手里的恐怕还不到四分之一。我们必须学会利用我们现有的一点点书刊。

因此，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应当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

苏维埃的法律是很好的，因为它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没有给工人和农民提供这种可能。然而有人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吗？几乎没有！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

众的帮助才行。我们的共产党员至少有一半不会进行斗争，且不说还有一些人妨碍斗争。不错，你们中间99%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些妨碍斗争的共产党员，清党委员会在做这件事。但愿能从我们党内清除10万人左右。有人说20万人左右。我更喜欢后面这个数字。

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10万到20万混进来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我们将把一二十万人清除出党，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这只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的极小一部分。应当使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适应这个目的。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这项任务就落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肩上了。

应当使政治教育工作者不用官僚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任务。但有一种情况却常常可以看到，比如有人问，可否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代表也吸收进省经济会议。对不住，不必把你们编进什么机关去，你们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们一进什么机关就会官僚化。如果你们同人们打交道，从政治上教育他们，经验就会告诉你们，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却处处可见。人们会问你们：怎样才能消灭贪污受贿现象，防止执行委员会里有人贪污受贿呢？请你们教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政治教育工作者回答说：“这事不归我们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出了小册子和布告”，那么人们就会对你们说：“你们是坏党员。这事固然不归你们管，有工农检察院来管，可是你们也是共产党员呀！”你们给自己取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当你们取这个名称时，就曾提醒你们，名称不要搞得太显眼，还是用一个普通一点的好。可是你们要用“政治教育”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含义很广。你们没有把自己称为教人民识字的人，而用了政治教育这个名称。于是人们可以对你们说：“很好，你们教人民读书写字，搞经济运动，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并不是政治教育，因为政治教育是要使一切事情都有结果。”

我们正在进行反对野蛮行为和反对贪污受贿这类毛病的宣传，我希望你们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政治教育并不限于这种宣传，它意味着实际的结果，意味着教会人民怎样取得实际结果，并且不是以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给人们示范。政治教育工作者由于在政治上比别人有修养，不仅会责骂一切拖拉现象（这在我们这里非常风行），并且能以行动表明怎样克服这一弊病。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不普遍提高文化水平，不使工农群众比现在更有文化，就不能掌握这种艺术！我希望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特别注意这项任务。

现在我把我所说的概括一下，把省政治教育委员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归纳一下。

三大敌人

在我看来，现在每一个人，不论他的职务是什么，面前都有三大敌人，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话（而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是党员），面前都摆着这三项任务。他们面前的三大敌人就是：（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贪污受贿。

第一个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所谓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是指一个人置身于共产党内，还没有被清洗出去，就以为可以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来解决他的一切任务。他以为，只要他是执政党的党员和某某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就有资格谈论政治教育成就的大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只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要学会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可是我们还没有学会，而且我们还没有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第二个敌人——文盲

至于第二个敌人——文盲，我可以这样说：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

第三个敌人——贪污受贿

最后，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应该懂得，为了能向人民说明我们的政治任务，能向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必须力求完成的任务”（而这本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就要提高群众的文

化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任务。

军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区别

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应当懂得，现在前进的条件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没有这些品质，甚至无法着手做政治教育工作。而政治教育的成果只能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我们不仅需要消灭文盲，消灭靠文盲这块土壤滋养的贪污受贿行为，而且应该使我们的宣传、我们实行的领导、我们的小册子真正为人民所接受，并且使这些工作的成果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改善上。

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向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我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0—201页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节选）（1921年10月29日）

1 报 告

同志们！在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以前，首先应该声明，我对这个题目的理解可能出乎在座许多同志的意料，或者说得确切些，我只能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的主要兴趣可能在于了解和评价苏维埃政权最近一些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法令和决定，这是很自然的。这类决定愈多，完善、整理这些决定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需要愈迫切，对于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也就愈自然。根据我在人民委员会的所见所闻，现在已深感有这种需要。大家都希望知道现有的一些能说明新经济政策的成果的事实和数字，这同样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些事实经过查证核实的为数还很少，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毫无疑问，为了了解新经济政策，注意这些事实并试加总结，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关于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我都不能谈，如果你们对这些感兴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找到谈这些问题的报告人。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即策略问题，或者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我们随着政策的改变而采取的革命战略问题，以及对下述情况的估计，即这个政策同我们对我们任务的一般理解符合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今天党内的认识和觉悟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适应到什么程度。我想谈的，就只是这个专题。

我感兴趣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评价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说它错误是否正确；最后，如果正确，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种评价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估计今天我们党内在目前经济政策的一些最根本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程度是有意义的。

党现在是否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个经济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至少有时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估计实行这个政策的一般条件上，放在如何使党内的觉悟、兴趣和注意力适应于这些一般条件上？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对新经济政策还不那么清楚；我们如果对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即给新经济政策打基础并最终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方向。

为了说明我的看法，为了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而且我认为应该说）我们过去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我想拿日俄战争中的一个事件来作比喻。我认为，这个事件会帮助我们更确切地认识像在我国所发生的这种革命中不同的政治办法和手段的相互关系。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日本乃木将军攻克旅顺口这个事件。使我对这个例子感兴趣的主要一点，就是攻克旅顺口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了，使这位著名的日本统帅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第二阶段是不得不对这个要塞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地地道道的围攻，而过了一些时日，正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攻克要塞的任务。我们看一看这些事实，就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这位日本将军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的第一种战法是错误的呢？强攻要塞是否错误？如果是错误的，那么日军为了正确完成任务，应该在什么条件下承认这是错误，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有多大？

当然，乍看起来，答案是再简单不过了。既然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毫无结果（这是事实），既然进攻者的牺牲非常大（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显而易见，对旅顺口要塞采取直接强攻的战术是错误的，这已无需任何证明了。但是从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完成这种包含很多未知数的任务时，如果不作适当的实际试探，就很难有绝

对的把握——哪怕是相当大的把握——大致准确或完全准确地确定用什么战法来攻克敌人要塞。不实际试探一下要塞的实力，即工事坚固程度、守军情况等等，这是无法确定的。不经过试探，就是一个优秀的统帅（乃木将军无疑算得上）也无法解决用什么正确战法攻克要塞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说，胜利结束整个战争这个目的和前提，也要求从完成这项任务的多种方法中选择速决战法；同时，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即使牺牲极大，如果这对于用强攻拿下要塞是必要的话，那也还是得多于失。因为这样就能把日军腾出来，调到其他战场上去作战，就能在敌人即俄军把大批兵力调到这个远方战场以前，在把大批兵力训练得更好，在俄军或许变得比日军强好几倍以前，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如果看一看整个战役的发展和日军作战的条件，我们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旅顺口的多次强攻不仅说明日军不惜巨大牺牲，作战非常英勇，而且还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即在战役初期，这是唯一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做法，因为不用强攻要塞这一实际行动来检查一下兵力，不试探一下抵抗的力量，是没有理由采取比较长期比较艰苦的战斗方式的，要知道这种战斗方式仅仅由于时间长就蕴含着许多别的危险。从整个战役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把由强攻和冲击组成的战役第一阶段看做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阶段，因为，我再说一遍，日军不经过这种试探，就不可能摸清这次战斗的具体条件。日军在对敌要塞进行强攻的阶段结束时情况是怎样的呢？成千上万的士兵被打死了，就是再死上几千士兵，用这种战法要塞还是拿不下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部分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已得出结论：必须放弃强攻而改用围攻。既然在战术上犯了错误，那就必须加以纠正。同这一错误战术有关的一切都应认为有碍于作战，需要作出调整：必须停止强攻而改用围攻，变更军队部署，重新分配作战物资。至于改变个别作战方法和作战行动，那就更不待说了。必须坚决地、明确地承认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要让它阻碍新战略和新战术的发展，阻

碍作战行动的发展。这时作战行动必须完全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而且如我们所知道的，新的作战行动取得了全胜，尽管时间比预料的长得多。

我认为，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我国革命在解决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所处的境况。在这方面，十分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

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就可以发现，我们那时已认为，革命的发展、斗争的发展的道路，既可能是比较短的，也可能是漫长而艰辛的。但是，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²⁾，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设想。

那时正好是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一项根本任务，政治上需要先行完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就是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制度来代替从前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接着又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这项任务，而且大家知道，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我们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签订了十分屈辱的、条件极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⁶³。在和约签订以后，从1918年3月到夏天这段时期，军事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但是后来事变表明：情况并非如此；1918年3月，我们在完成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之后，只是接近了国内战争的开端。从1918年夏天起，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国内战争愈来愈迫近。那时，1918年3、4月间，在谈论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就已把搞斗争的行动方式同渐进过渡的方法作过对比，前者主要是用于剥夺剥夺者，而这项任务正是1917年底和1918年初革命头几个月的主要特点。那时我们已经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剥夺剥

夺者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所剥夺的要比我们所能计算、监督、管理等的多得多。因此便提出由实行剥夺、由破坏剥削者和剥夺者的政权的任务转向组织计算和监督的任务，转向所谓平凡的经济任务即直接从事建设的任务。那时我们已经在许多问题上都需要后退。例如1918年3、4月间出现了专家报酬这样的问题：专家报酬的标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关系而符合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符合劳动的艰辛程度或特别艰苦的劳动条件而符合资产阶级习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给专家以这种非常高的、资产阶级式的报酬，原先并没有列入苏维埃政权的计划，甚至不符合1917年底所颁布的许多法令。但是在1918年初，我们党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后退一步，应该承认要作某种“妥协”（我这里用的是当时所用的字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4月29日的决定承认有必要在总的工资制度中实行这一变动。

当时我们把建设工作、经济工作提到首位，只是从一个角度看的。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设想，国家的生产和分配同私营商业的生产和分配这两种制度将互相斗争，而斗争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将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逐步夺回敌对制度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阵地。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剥夺剥夺者，不如说是计算、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这是我们在1918年3、4月间说的，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当1918年春我们同一部分曾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同志论战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我们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会快一些。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这一情况，因为我觉

得，为了了解我们经济政策有什么转变以及怎样评价这个转变，这是必要的。

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它可以更具体、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当时的斗争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展开的。不久以前，我在莫斯科看到一份私人办的《广告小报》。在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执行了三年以后，这份《广告小报》给人一种十分特殊、十分新奇的印象。但从我们经济政策所采取的一般方法来看，这里又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举这个虽然很小但却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时，需要回想一下，在我们整个革命中，斗争是怎样发展的，它的任务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这样来理解。关于银行业的一些法令也有与此相似的地方，为了不使例子复杂化，我就不谈它们了。

那么，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头几个星期里颁布的这项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命运如何呢？它的命运是这样的：很快就被踢开了。现在我们回想起斗争的发展和从那以后的斗争条件，一想到我们那么天真，竟在1917年底大谈国家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真是可笑。在进行殊死斗争的时期，哪会有什么私人广告！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世界——对苏维埃政权这项法令的回答是：继续进行斗争，把斗争推向白热化，把斗争进行到底。法令设想，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非常巩固，因此任何其他经济都不可能再存在，所有私人企业主和个体业主都非常清楚必须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国家政权在什么地方布置斗争，他们就会在什么地方应战。当时我们说，你们还可以保留私

人报刊、私人经营企业的权利以及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刊登广告的自由，我们只规定国家对广告征税，只规定把广告业务集中在国家手中，对私人广告制度本身不但不去破坏，而且相反，由于信息业务的适当集中，只会让你们得到某些好处。然而事实表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斗争。我们的敌人资本家阶级用完全否认整个国家政权来回答它的这项法令。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广告，因为残留在我们制度中的一切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势力当时已经全力以赴地投入夺取政权基础的斗争。当时我们向资本家建议：“你们服从国家的调节吧，服从国家政权吧，那么一切符合居民的旧利益、旧习惯、旧观点的东西就不会被完全消灭，而是通过国家的调节逐渐地加以改变。”但是他们却向我们提出了我们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资本家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迫使我们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因而我们对旧关系的破坏比原来设想的要彻底得多。

关于垄断私人广告业务的法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它依然是一纸空文。实际生活，即资本家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的国家政权把全部斗争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不是把斗争放在我们在1917年底曾天真地研究过的那些琐碎得可笑的问题上，而是放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粉碎整个职员阶级的怠工，击退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支持的白卫军。

我认为，这一小段关于广告法令的插曲，对我们了解旧的策略是否错误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我们现在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这个背景上来评价事件，不能不认为这个法令是天真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其中也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坏。而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却施展一切手段，迫使我们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做法。从敌人方面说，这在战略上是否正确呢？当然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如果不在这方面通过直接的搏斗来试一下自己的力

量，怎么会突然服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资产阶级回答我们说：“对不起，可敬的先生们，我们要和你们谈的根本不是什么广告问题，而是我们能否再找到一个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国际资产阶级是否会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的也决不是你们要不要有国家银行的问题。”关于国家银行，正如关于广告问题一样，我们在1917年底写了很多东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废纸。

当时资产阶级用正确的（从他们的利益来看）战略回答了我们：“我们首先要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进行斗争：你们是否真的是国家政权，抑或这只是你们的错觉。这个问题当然不能靠法令，而要靠战争、靠暴力来解决。这种战争很可能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被赶出俄国的资本家进行的战争，而是所有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人进行的战争。如果事实表明这同其余的世界有相当的利害关系，那么国际资产阶级就会支持我们这些俄国资本家。”资产阶级这样做，从维护他们利益的角度看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们还有一线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战争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接受苏维埃政权为了用比较渐进的办法过渡到新制度而对他们作出的局部性让步。“根本不要过渡，根本不要新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回答。

这就是事态发展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的原因。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在1917—1918年在人民意气风发的条件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试行了一种经济政策，起初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打算比较慎重地向新制度过渡，这一点也表现在我所举的那个小小的例子里。但是，苏维埃政权从敌人的阵营得到的回答却是：决心进行残酷的斗争，以确定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站住脚。这个问题只能用战争来解决，而且既然是国内战争，它就是非常残酷的。斗争愈艰巨，实行慎重过渡的余地就愈小。我已经说过，资产阶级按照这种斗争逻辑来行动，从他们方面来说是正确的。而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能

说：“资本家先生们，你们吓不倒我们。你们在政治方面已经连同你们的立宪会议被打垮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要再次把你们打垮。”我们不能不这样做。采用任何其他的行动方式，从我们方面说，都等于完全交出我们的阵地。

回想一下我们斗争的发展条件你们就会懂得，这种看来似乎不正确和偶然的改变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依靠普遍高涨的热情和政治上的稳固统治能够轻而易举地解散了立宪会议，又为什么在这同时我们却必须试用一系列的措施来逐渐地慎重地实行经济改造，最后，为什么斗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的反抗迫使我们改用内战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拼命的、不顾一切的斗争方式，从而使俄国遭受了三年的破坏。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

如果这种转变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悲泣、颓丧和不满，那么应该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军事斗争比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要简单得多，我们所以战胜了高尔察克之流，是因为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把没有做完和做得不好的工作再三重做。

在社会主义经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这场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斗争中也应该这样。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会像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

我希望除个别情况外，谁也不能说在三年国内战争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是这种人。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都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

理论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能使我们看到旧的方式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可能学会用新的方式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所以提出改行新经济政策的任务，是因为经过了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强迫我们采用残酷斗争的形式的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之后，到192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要动手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

我今天不能用数字、总结或事实来说明这种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给了我们什么好处。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们知道，顿巴斯是我国经济几大中心之一。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原来是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它们已达到西欧资本主义企业的水平。你们也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先恢复大工业企业，因为我们靠数量不多的工人恢复顿巴斯的工业比较容易。但是在春天改变政策以后，我们今天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相反的情况——生产发展得特别顺利的是租给农民的小矿井。我们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发展。农民矿井的生产情况很好，他们把开采的煤拿出大约30%作为租金交给国家。顿巴斯生产的发展表明，与今年夏天的惨状相比，目前情况已经普遍有了显著的好转，在这方面，小矿井生产的好转以及它们按国家资本主义原则经营这一点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不能在这里分析全部有关材料，但你们从这个例子里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政策的改变所取得的某些实际结果。经济生活的活跃（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是我们绝对需要的），这些，我们通过局部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得到了。至于今后的成绩如何，将取决于我们的本事，取决于我们今后执行这一政策的正确程度。

现在回过头来阐发一下我的基本思想。今年春天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这种退却是否已经够了，以致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呢？不，实际表明退得还不够。理由如下。如果按我开头所讲的那个比喻（战争中的强攻和围攻）来说，那么我们还没有重新部署好军队，还没有重新分配好作战物资，如此等等。一句话，我们还没有作好新战役的准备，而根据新的战略和战术，新战役将按另一种方式进行。既然我们现在正在转向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试问，是不是应该设法使适合于以前的经济政策的活动方式现在不来妨碍我们呢？不言而喻，而且我们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今年春天我们说过我们不怕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还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固定下来。自1921年春天以来，我们制定了一连串法令和决定，写了大批文章，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和立法工作，这一切都是在适应发展商品交换的需要。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怎样呢？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你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情况，否则买卖的自发势力、货币流通的自发势力会把你们卷走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仍然不得不退却，以便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到以前的

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以便弄清目前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当前的转变的特点是什么。对外任务目前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军事任务也不是我们的迫切任务。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是经济任务，而且我们应该记住，眼下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在三年内还没有能搞好我们的工作（经济工作）。我国的经济破坏和贫困是这么厉害，文化是这么落后，要在这样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这项任务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说来，过去的强攻并不是毫无影响和毫无益处的。

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中间有人对实行这一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还认识得不够清楚。例如，当你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变成一个批发商或者学会经营批发商业，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奇怪，有些人甚至感到非常可怕。他们说：“共产党员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说什么现在要把商业任务，把最平常、最普通、最庸俗、最微贱的商业任务提上日程，这样共产主义还能剩下什么呢？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万念俱灰，说了一声‘唉，一切都完了！’这有什么不应该呢？”我想，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就能发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使人难于清醒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任务。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而且现在，秋季，乃至1921年到1922年的这个冬季，我们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要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进行工作和斗争。

如果一支军队已经确信不能用强攻方式拿下要塞，但仍然表示不同意撤出旧阵地，不去占领新阵地，不改用新方法来完成的任务，那么对于这样的军队应当说：只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在某些困难条件下为了适应这种条件必须实行退却，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自始至终全是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有过也是例外。就普通的战争来说，情况就是这样。而在决定整个阶级的命运、决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战争中，是否有合理的根据设想第一次解决这个课题的人民一下子就能找到唯一正确无误的方法呢？有什么根据作这样的设想呢？毫无根据！经验证明恰恰相反。在我们所完成的任务中，没有一项是不经过反复而一次完成的。失败了再来，一切重新做过，相信一项任务总有办法可以完成，即使做得不能绝对正确，至少也能差强人意。我们过去是这样工作的，今后还应该这样工作。如果面对眼前的情况我们的队伍不能齐心协力，这是最令人痛心的，这说明在我们党内有一种非常危险的颓丧情绪。相反，如果我们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甚至是痛苦的严重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学会、绝对能学会如何战胜一切困难。

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害怕这样的任务吗？或者说这不是共产主义的任务吗？如果这样，那就说明我们不懂得革命斗争，不懂得革命斗争的性质，不懂得革命斗争是一种最紧张的斗争，伴有许多我们决不可以漠视的急剧转变。

现在我作几点总结。

我来谈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既然现在，即1921年秋季和冬季，我们又一次退却，那么究竟要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时常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想起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听到的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签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后有人问我们：

“你们对德帝国主义作了这样那样的让步，到底要让到哪年哪月为止呢？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到时候停止让步呢？你们这样做不是使处境更加危险了吗？”当然，我们是增加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但是不应当

忘记一切战争的基本规律。战争的要素是危险。在战争中你无时无刻不被危险包围着。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比过去任何战争更残酷、更持久和更顽强得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时时处处都有危险。

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谁也不作这样的梦想。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我们在今年春天说，我们要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¹¹⁶，要颁布法令，规定交纳粮食税以后剩下的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当时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自由。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根本不懂得基本的经济关系，根本不可能认清形势和正确行动。当然，斗争方法改变后，发生危险的条件也改变了。在解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时，危险来自政治方面。这种危险是微不足道的。在全世界资本家所支持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到来后，出现了军事上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比较严重了。而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

我们必须懂得：目前的具体条件要求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正应当在这方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目前经济现实中的矛盾比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要多：居民中某些阶层即少数人的经济状况有了部分的、些许的改善，但是另一些阶层，即大多数人，他们得到的物质资料同他们的基本需要则完全不相适应。矛盾增加了。不难理解，在我们经历大变革的时候，要一下子消除这些矛盾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我的报告中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一般性问题：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承认在新经济政策以前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党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我举了某次战争中的一个例子，力求用它来说明由强攻转为围攻的必要性，说明开头实行强攻的必然性以及认识到强攻失败后采取新的战法的意义的必要性。

其次，到1921年春天才明确起来的第一个教训和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新的道路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矛盾。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个领域。

第三个是，自从1921年春天我们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建设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之后，我们看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已提上日程。不管我们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着手解决极其迫切的经济需要问题。也只有这样，通过一条比较漫长然而比较可靠的、也是目前我们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我们才能保证大工业有恢复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应该看清的主要之点。我们在解决这一政策的种种问题时，应当认清基本的发展路线，以便对现时我们在经济关系中所看到的表面上的混乱现象有清楚的认识。当前，在看到旧事物的破坏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新事物的仍很孱弱的幼苗，也常常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方式还不适应新的条件。我们既已提出提高生产力和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的任务，我们就应当努力做到正确地对待这一任务，并且务必完成这一任务。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16—233页

(1) 列宁在报告中回顾了苏维埃政权几年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指出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想一劳永逸地找到一条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是不可能的。共产

党人应当敢于承认失败，善于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学会用符合俄国实际的新的方式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这种新的方式方法就是新经济政策。列宁根据客观形势和具体条件，首次提出了苏维埃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指出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才能提高生产力，才能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73—77、264—293页，本书第79—115页。——编者注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

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现在，有一些根本性的任务革命还没有完成，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把握某种新的（同至今革命已经做到的相比）事物，在这种时候用上述办法来庆祝革命特别适当而且必要。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一“新事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引起了许多问题和疑虑。

理论问题是：在革命总的说来是胜利推进的条件下，在同一个领域里，在采取了许多最革命的行动之后，又转而采取非常“改良主义的”措施，这该怎样解释呢？这里有没有“放弃阵地”、“承认失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呢？我们的敌人，从半封建的反动分子到孟什维克或第二国际的其他骑士，当然说有。要是他们不假托各种理由或者不要任何理由就发出这样的叫嚣，那他们就不成其为敌人了。一切政党，从封建主到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惊人的一致，不过再一次证明所有这些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确实是“反动的一帮”（顺便说一句，这正像1875年和1884年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所预见的一样⁽²⁾）。

但是，在朋友中间也有某种……“疑虑”。

我们要恢复大工业，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业社会化。为了恢复大工业，我们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从农民那里借来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原料。这就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以前的三年多时间内所实行的方案（或方法、制度）。从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结构以便代之以新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上说，这是完成任务的一种革命办法。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動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这是完成任务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

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

有人问，既然你们试用革命方法以后承认这种方法失败而改用改良主义方法，那岂不证明你们是在宣布革命就是根本错误的吗？那岂不证明根本不应该从革命开始，而应该从改良开始，并且只限于改良吗？

孟什维克和类似的人所作的就是这样的结论。但这种结论，不是政治上饱经“风霜”的人的诡辩和骗人伎俩，就是“初出茅庐”的人的幼稚无知。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動，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動，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

谁“异想天开”要这么干，那他就完了，因为他想在根本问题上干蠢事，而在激烈的战争（革命就是最激烈的战争）中干蠢事是要受到失败这种惩罚的。

凭什么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该只采用革命的方法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绝对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纯理论原理来看，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是不言而喻的。我国革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的不正确。从理论上讲，在革命时期也和在其他任何时期一样，都会干出蠢事来。这是恩格斯说的⁽³⁾，他说得对。应该尽量少干蠢事，尽快地纠正已经干了的蠢事，尽量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方法完成，哪些任务不能用革命方法完成。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看：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决非革命行动而是改良行动的例证，这种行动甚至比改良行动更糟，因为这是倒退行动，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的策略的正确性，现在已得到充分的证实，大家都很清楚，一致公认，因此对这个问题用不着多讲。

我国革命充分完成了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工作。我们完全有权以此自豪。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三大项：（1）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两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盗集团的大厮杀并使这场战争打不下去；从我们方面说，这一点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是要从各方面都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2）建立苏维埃制度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有世界意义的转变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还要靠许多国家来改进和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工作还得不止一次地补做、改做或重做。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

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如果因此而“面有愧色”，那就荒谬绝顶了（如果不是比荒谬更糟的话）。（3）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这是我们最靠得住的事业，——无论从原则来看或从实践来看，也无论从俄罗斯联邦的现状来看或从国际方面来看，都是最靠得住的事业。

既然在打基础上最主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就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这里的困难在于过渡的形式。

我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4\)](#)

当前，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活动领域里，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这看起来很奇怪：共产主义与商业？！这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相去甚远的东西。但是，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距离更远。

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这样使用黄金，对于当今几代人来说是最“公正”而富有教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怎样由于黄金的缘故，在1914—1918年“伟大的解放的”战争中，即在为了解决是布列斯特和约坏些还是凡尔赛和约坏些这个重大问题的战争中，曾使1 000万人死于非命，3 000万人变成残废；怎样又是由于黄金的缘故，不知是在1925年前后还是在1928年前后，是在日美之间还是在英美之间的战争中，或者在诸如此类的战争中，一定还会使2 000万人死于非命，6 000万人变成残废。

但是，无论上述那种使用黄金的办法多么“公正”，多么有益，多么人道，我们仍然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应当像1917—1921年间那样紧张、那样有成效地再干它一二十年，不过工作的舞台比那时要广阔得多。目前在俄罗斯联邦仍然应当爱惜黄金，卖黄金时要卖得贵些，用黄金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假定……假定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缆纵横的先进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工业按其技术能力和有组织的“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伴生的条件来说，能够比从前更迅速更便宜更多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假定”没有的东西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但是，某一个国家，而且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在试图马上直接实现即实际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种新的联系时未能用“强攻”方法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围攻”行动来完成这项任务。

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现在举一个小例子，一个小小的例子。在顿巴

斯，一方面由于国营大矿井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把小矿井出租给农民，经济已经开始活跃，虽然活跃的程度还很小，但无疑是活跃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额外得到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煤（对于先进国家来说，这个数量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国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却是很可观的）。我们所得到的煤，假使成本是100%，而我们卖给国家机关是按120%，卖给私人是按140%（附带声明一下，这些数字完全是我随便举的，因为第一，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第二，即使知道，我现在也不会公布）。看来我们已开始掌握——哪怕是规模极小——工农业之间的流转，掌握批发商业，掌握这样的任务：抓住现有的落后的小工业或被削弱被破坏了的大工业，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使商业活跃起来，使中等的普通的农民（他们是农民的多数，农民群众的代表，自发势力的体现者）感到经济上的活跃，利用这一点来更有步骤、更顽强、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我们决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各种过渡经济形式都可以利用，而且既然有利用的必要，就应该善于利用它们来巩固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立即活跃我们这个满目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为今后采取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措施如电气化等创造条件。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个方面，只能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在哪个国家取得第一次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做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础，是一个起码常识，而第二国际卖身求荣的领袖们以及第二国际半是迂腐、半是装腔作势的骑士们却歪曲和抹杀这种起码常识。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从原则上说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实行布列斯特的退却呢？因为我们已前进了相当远，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在几个星期之内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个大倒退，我们仍然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可以利用“喘息时机”再胜利前进，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不足以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又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我们即使被迫退却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所谓在物质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保持兵力的充分优势，使敌人不能彻底打垮我们。所谓在精神方面坚持下去，就是不使自己精神沮丧，组织瓦解，仍保持对情况的清醒估计，保持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退得虽远但退得适度，能及时停下来并重新转入进攻。

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我们退得适度。现在我们正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会退得适度的。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不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这次必要的退却进行得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么，我们就会愈快停止退却，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愈有把握，愈迅速，愈波澜壮阔。

1921年11月5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4—252页

(1) 列宁在文中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出现了马克思本人当年预见不到的新情况，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俄国的实际问题。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指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可以采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

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苏维埃政权只有紧紧抓住商业这一环节，才能掌握整个历史事变的链条，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252—253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4页。——编者注

[\[4\]](#) 见本书第112页。——编者注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节选）（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俄共中央全会1921年12月28日审议了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会上听取了鲁祖塔克、安德列耶夫、施略普尼柯夫三位同志的报告（原定的卢托维诺夫同志的报告由于没有及时通知报告人而没有作）。经过交换意见，决定把鲁祖塔克和安德列耶夫两位同志的提纲草稿（加上列宁同志的补充）交给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拟出提纲草案，提交政治局审批。

（在委员会和政治局批准该草案后对这段话还要补充几句。）

草 案

1. 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因而也使工会的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比如说，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1) ①列宁在草案中简要阐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意义，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各方面全力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苏维埃俄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的，工会应当成为国家政权最亲密的、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也是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的学校。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2. 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

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这种调节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而且更取决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即使这种调节十分成功，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项任务应当公开提到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工会的机构应当作相应的改组、改变或扩充，应当设立，或确切些说，应当着手设立罢工基金等等。

3. 改行所谓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和工会

国营企业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这种企业即使不会成为唯一的一种，也必定会是主要的一种。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由于迫切需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衷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

4. 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的私有制、由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的私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之间的重大区别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阶级。俄共纲领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还只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共产党也好，苏维埃政权也好，工会也好，都应当公开承认：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因此而被铲除，阶级斗争就会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因此，目前我们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显然是破坏国家机构，推翻现有的、阶级的国家政权。而在我们这种过渡型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通过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等等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因此，无论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都决不能忘记，而且也不应当向工人和劳动群众隐瞒：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在它的机构中还存在着各种资本主义旧残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群众政治上不开展和文化上落后。既然法院和其他一切国家机关都是由劳动者自己在阶级基础上建立的，而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选民之外，那么，解决劳资之间、受雇者和雇用者之间的冲突，应当愈来愈多地采取由劳动者直接投诉国家机关这种正常的方式。

5. 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把所有工人强行登记为工会会员的做法，既不符合工业社会化实际达到的水平，也不符合群众的觉悟水平。此外，强制入会的做法还使工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弊病。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决恢复自愿入会的做法。对工会会员决不能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在这一点上，也和对待宗教的问题一样，工会应当是非党的。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工会会员，只应要求他们懂得同志纪律，懂得工人团结起来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和忠于劳动者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从权利上和物质上鼓励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但是工会如果不尽义务，就不应当有任何权利。

6. 工会和企业管理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这项在俄共纲领上已经明确提出的任务，今天由于战后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而变得格外紧迫了。因此，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俄国目前的环境下，又绝对需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这些通常按个人管理制原则组成的管理机构，在享有最大的机动自由、极其严格地检查在提高生产和扭亏增盈方面的实际成绩、十分认真地选拔最优秀最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条件下，应当独立地处理规定工资数额以及分配纸币、口粮、工作服和其他种种供应品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绝对有害的，不能允许的。

但是把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解释成工会不得参加社会主义的工业组织和国营工业的管理，那就完全错了。在以下几种严格规定的形式下，工会的参加是必要的。

7. 工会的作用和工会怎样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

无产阶级是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的阶级基础。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非常巧妙地、谨慎地和逐渐地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才能顺利完成过渡这一任务。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工会一般说来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尤其应当是全体工人群众以至全体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以后也逐渐管理农业）的学校。

根据这些原则，应当为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规定以下几种基本形式：

（1）工会用推荐候选人、提供咨询的方式参与一切经济机关以及同经济有关的国家机关的人事安排；工会也参加这些机关，但不是直接参加，而是通过由它们推举并经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批准的领导人选来参加，这些人选包括最高一级国家机关的委员、经济部门的委员、工厂管理机构的委员（在实行这种集体管理制的单位），还有行政管理人员及其助手，等等。

（2）工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中提拔和培养行政管理人员。目前这种工业行政管理人员，完全称职的我们有几十个，比较称职的有几百个。但是不久我们就需要几百个完全称职和几千个比较称职的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应当远比现在更细致更坚持不懈地系统登记一切有能力担任这种工作的工人和农民，从各方面切实认真地检查他们学习管理工作的成绩。

（3）工会参加无产阶级国家一切计划机关的工作同样重要。除了参加一切文化教育工作和生产宣传工作之外，工会的这一活动应当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吸引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使他们熟悉经济生活的整个情况，熟悉工业从采购原料到销售产

品的全部工作，使他们更具体地了解国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实现这一计划同工农的实际利害关系。

（4）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参加工业管理方面，工会工作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就是制定工资标准和供给标准等。特别是纪律审判会应当不断加强劳动纪律，不断改进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率的文明工作方法，但决不可干涉人民法院和管理机构的职权。

以上列举的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项最重要的职能，当然还应当由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有关机关作出详细规定。最重要的是，工会要自觉地坚决地放弃对管理工作进行没有准备的、外行的、不负责任的、危害不浅的直接干预，而去进行顽强的、切实的、预计需要做许多年的工作：实地训练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管理全国的国民经济。

8. 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大多数工人以至全体劳动者，这是工会任何一项工作取得成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工会组织及其机关从下级到最上级，应当培养出一批负责同志，并在多年的实践中加以考察，这些负责同志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他们应当生活在工人群众之中，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正确无误地判断群众的情绪，判断他们真正的需要、愿望和想法，能够不带半点虚假拔高成分来确定群众的觉悟程度，确定这样那样的旧偏见和旧残余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一家拥有优良发动机和第一流机器的上等工厂，如果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传动装置坏了，那就不能开工，同样，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位置摆得不正或工作得不正常，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遭殃。这个道理，仅仅加以解释、提醒、论证是不够的，还应当从组织上把它落实到工会的一切机构中，落实到工会的日常工作中。

9.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按照以上的论述，工会各项任务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一方面，工会的主要工作方法是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就不能拒绝参加强制。一方面，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是最直接最切身这种意义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者，就不能拒绝实行压制。一方面，工会应当按照军事方式来工作，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顽强、最激烈的阶级战争；另一方面，正是工会最不宜采用专门适合军事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工会又决不当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而要坚持不懈地提高他们的水平，如此等等。

这些矛盾不是偶然的，而且不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所能消除的。因为第一，这是一切学校所固有的矛盾。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没有几十年的时间，休想使大多数劳动者达到高度发展水平，从而能把成人“学校”的痕迹和回忆统统抹掉。第二，只要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残余还存在，在整个社会制度中这些残余和社会主义幼芽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实际结论。第一个结论：工会要有效地进行工作，仅仅正确地理解工会的任务、仅仅有适当的机构设置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特殊的机智，善于在各种具体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群众，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群众提高一步，而又能尽量减少摩擦。

第二个结论：上述种种矛盾必然会引起冲突、不协调和摩擦等现象。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权威的上级机关及时地解决这类问题。这种机关就是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¹³。

10. 工会和专家

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已经在俄共纲领中阐明。但是，如果不经常注意事实，不看这些原则贯彻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些原则还会停留在纸上。最近就有这样的事实：第一，不仅在乌拉尔的而且在顿巴斯的社会化矿山中，都发生了工人打死工程师的事件；第二，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瓦·奥登博格尔自杀。⁽¹⁾

造成这种现象，共产党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当然要比工会大得多。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要确定政治责任的大小，而是要作出一定的政治结论。我们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还是工会，如果不能做到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同共产主义完全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以前，专家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我们应该使专家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不仅在物质上和权利上如此，而且在同工农的同志合作方面以及在思想方面也如此，也就是说，使他们能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满足，能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再受资本家阶级私利左右而有益于社会。这一切我们还不能很快办到，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办到。如果某个主管部门在保障专家的各种需要、鼓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他们的利益等方面工作无计划，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那么，谁也不会承认这个部门办得还不坏。工会应当不是着眼于本部门的利益，而是着眼于劳动和国民经济整体的利益，来进行所有这些工作（或者经常参加各部门的有关工作）。在专家问题上，工会担负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经常教育广大劳动群众同专家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做才能收到真正重大的实际效果。

⁽¹⁾ 请看1922年1月3日《真理报》关于此事的报道：（（援引该报第4版《新闻栏》报道的全文））。

11. 工会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工会只有把极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联合起来，才算是真正的工会。这样一来，作为资本主义残余和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在工会中相当稳固地存在，在一个农民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尤其如此。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在俄国的变种）的影响，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只有在这些流派中还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出于自私的阶级动机而是在思想上维护资本主义，继续相信他们所鼓吹的一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具有超阶级的含义。

正是应当用上述社会经济原因而不是用个别集团的作用，更不是用个别人物的作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工会中还存在着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有时甚至是复苏）。因此，共产党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以及工会中的全体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重视同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思潮和倾向进行思想斗争，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加强，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65—376页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节选）

1922年2月20日库尔斯基同志：

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看来还完全不适应新经济政策。

以前，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机关主要是陆军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现在战斗性特别强的职能则由司法人民委员部承担。遗憾的是，看不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和主要工作人员已经理解了这一点。

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采取最迅速、最符合革命要求的方式加以惩治；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哈尔科夫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必须安排一批示范性审判（在从速从严惩治方面，在法院和报刊向人民群众说明这些审判的意义方面作出示范）；通过党对人民审判员和革命法庭成员施加影响，以改进审判工作和加紧惩治；——这一切应当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并且必须执行汇报制度（汇报要简明扼要，用电报文体，但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并且一定要用统计数字说明司法人民委员部怎样惩办和怎样学习惩办在我们队伍中占多数的、只会讲空话和摆架子而不会工作的“共产主义”坏蛋）。

司法人民委员部在保证新经济政策实施方面的战斗职能同样重要，因而它在这方面的软弱无能和精神不振更加令人愤慨。现在看不出他们已经理解到：我们过去承认和今后也要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因此，应当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理解国家概念和国家任务，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任务是限制、制

止、监督、当场抓住犯罪行为，是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

在这方面，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和人民法院肩负着战斗性特别强、责任特别重大的任务。然而看不出他们对此有所理解。报纸上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议论纷纷。这种现象多不胜数。

可是，对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坏蛋的示范性审判，什么地方有过议论呢？没有，因为并没有进行过这类审判。司法人民委员部“忘记了”：这是它的事情；没有能督促、推动、整顿人民法院的工作，没有能教会它们无情地（直至枪决）和迅速地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而这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责。它要对此负责。在这方面一点也看不到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生气勃勃的工作，因为它根本没有这样做。

审判的教育意义是巨大的。我们是否关心过这件事呢？是否考虑过实际效果呢？没有，而这却是整个司法工作的起码常识。

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而司法人民委员部对此同样漠不关心。

沙皇时代是根据胜诉的百分比来撤换或提升检察官的。我们从沙皇俄国学到了最坏的东西，也就是简直要把我们窒息死的官僚主义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可是高明的东西却没有学到手。对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每一个部务委员和每一个工作人员进行鉴定应当依据他的履历，先问问他：在你监禁的共产党员中有几个判刑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人员更重？你监禁了多少个犯有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罪过的官僚主义者？你把多少个滥用新经济政策的商人判处了枪决，或者处以其他并非儿戏的（像在莫斯科在司法人民委员部鼻子底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惩罚？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吗？——那就是说你是个不干正事的人，这种人由于“共产党员的空谈”和“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当驱逐出党。

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司法人民委员部在“随波逐流”，这种情况我看得出来。可是它是应当同潮流作斗争的。不要因袭（确切点说，不要被那些昏庸的资产阶级旧法学家所愚弄，他们总是因袭）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概念，而要创造新的。不要受“因职责关系”沿用“适合欧洲”的行动方式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影响，而要同这种行动方式作斗争，制定新的民法，确定对“私人”契约的新的态度，等等。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如上所述，就是我们。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通过一批示范性审判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表明应当怎样动脑筋、花力气做这件事；通过党来抨击和撤换那些不学习这个本事和不愿理解这一点的革命法庭成员和人民审判员。

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立即振作起来，不立即全力以赴地承担起战斗任务，走上新的轨道，就会在热那亚会议150面前（也在全世界面前）声誉扫地。

建议您：

1. 向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宣读我的信；
2. 召集100—200名从事民法、刑法和国家法实际工作的人，都要共产党员，向他们宣读我的信；
3. 禁止乱谈此事（此信），违者给予党纪处分，因为向敌人泄露我们的战略是愚蠢的；
4. 让一些在法院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完全同意本信精神的共产党员就这些问题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作一些公开的专题报告；
5. 组织全体部务委员（尽可能也包括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担任重要职务的其他共产党员）分工负责：

(1) 新民法的各个部分（这是特别重要和最为重要的）

(2) 刑法的各个部分

(3) 国家法

和政治法的各个部分

} 迫切性稍小

(4) 在上述中心城市安排和进行若干有声势的、有教育意义的示范性审判

(5) 对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进行切实有效的而不是有名无实的监督，使它们真正能够既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加紧惩治（如果不加紧惩治，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是头号罪犯），也对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加紧惩治。

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审判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

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按上述任务分工的情况，请尽快通知我，使我能十分准确地知道（除人民委员负责全盘工作外）究竟是谁负责民法（其次是刑法等等）的某某部分，谁负责进行示范性审判（每一个部务委员都应当通过安排和进行若干示范性审判来显显身手），谁负责切实监督某个省或莫斯科某个区的革命法庭和人民法院以及法院侦查人员等等的工作。

不是把“各部分”分隔开来，也不是就此采取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态度，而是要使每一个参加部务委员会的共产党员都亲自负责某一

项生动的革命工作，——这就是人民委员应当做到而且应当证明他能够做到的事。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24—429页

（1）列宁在信中要求加强司法工作，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犯罪行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严肃性，作好法制宣传，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节选）（1922年3月27日）

主要问题当然是新经济政策。整个报告年度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标志下度过的。如果说我们这一年取得了什么重大的和不可剥夺的成就（对这一点我还不那么深信无疑），那也不过是从开始实行这个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我们学到的东西不多，可是我们这一年确实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至于我们是否真正学会以及学会了多少，这大概就要由后来发生的很少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来检验，比如由当前面临的财政危机来检验。我觉得，在我国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主要应当注意如下三点，这是讨论如何吸取上一年的经验、如何为下一年提供实际教训的基础。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前一时期，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主要放在或者说几乎都放在抵抗入侵的任务上，我们不可能很好地考虑这种结合，还顾不上这一点。那时我们刻不容缓的万分紧急的任务，是如何防止立刻被世界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扼杀的危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这种结合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次代表大会151完全一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决定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应当承认，一般说来我们党是非常一致的）。这种一致表明，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以不同观点来估计形势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由于军事事态的发展，由于政治事态的发展，由于旧的文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在我国还是经济最落后

的国家，至少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的时候，首先在资本主义旧世界打开一个缺口。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经营着小个体经济。我们把我们制定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中可以立刻实现的东西先建立起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把很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理由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在这方面有丝毫犹豫。从整体上说，这个理由农民是接受了的，虽然我们犯了一些无法避免的错误。总的说来，农民群众看到并且懂得，为了保卫工农政权不被地主推翻，为了不致被可能夺走全部革命成果的资本主义入侵所扼杀，他们肩负起这些重担是必要的。但当时在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这一点我们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就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在新经济政策势在必行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发生过任何摇摆。

看看国外俄国各党派大量出版的报刊对我们这个决定的各种评价，真觉得好笑。这些评价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生活在往事的回忆里，现在还一再说左派共产主义者至今仍在反对新经济政策。他们在1921年回忆着1918年的事情，回忆连我们这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自己都已忘记的事情，他们至今还在反复唠叨这一点，硬说这些布尔什维克自然是狡猾撒谎之徒，说他们向欧洲隐瞒内部的意见分歧。读到这些话，心里就会想：就让他们执迷不悟吧！既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持这种看法，那就可以根据这点看出这些现在逃往国外的似乎极有教养的旧人物的认识程度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有实际必要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我们试着建立的新经济并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现在是否结合了呢？还没有。我们只是开始寻求这种结合。我们的报刊现在还常常到处探寻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但是找的不是地方，其实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

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不然，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革命家了。

我们不顾一切旧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固执己见，认为我们既然无所畏惧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那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这有什么根据呢？没有任何根据。

我们一开头就说过，我们要进行的是崭新的事业，如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同志不能很快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定会犯许多错误。主要的是应该善于清醒地看出在什么地方犯了这样的错误，接着一切从头做起。既然不是一两次，而是很多次地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那这正说明我们没有成见，我们是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肩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的。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现在主要是要正确地吸取过去一年的经验。应该这样做，我们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们想务必做到这一点（我们是想做到这一点，而且一定会做到！），那就应该知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以前没有这种结合，所以现在我们要首先建立这种结合。一切都应当服从于这种打算。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这种结合，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东西。

我们在同农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经济。我们要一次次地改造这种经济，并把它组织得能使我们在大工业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工作同每个农民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农民是能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求摆脱贫

困，而且是会怎么干就怎么干，决不卖弄聪明（因为他们要摆脱惨遭饿死的直接威胁，哪里还顾得上卖弄聪明呢？）。

要让人看到这种结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让全体人民看到它，让全体农民群众都看到，他们现在空前破产、空前贫穷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同人们为了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工作之间是有联系的。要做到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了解，他的境况得到了某种改善，而且这种改善与地主当政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少数农民境况的改善不同，那时每一点改善（改善无疑是有的，甚至很大）都是同对庄稼人的讥笑、侮辱和嘲弄分不开的，是同对群众的暴行分不开的，这一点俄国哪个农民也没有忘记，再过几十年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目的是恢复这种结合，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这是我们过去一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教训，也可以说是我们下一年度的主要政治准则。农民是在贷款给我们，他们有了过去的经历，当然不会不给。农民大都同意这样做：“好，既然你们不会，那我们就等一等吧，也许你们会学会的。”但是这种贷款不会是取之不尽的。

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且借了钱总得抓紧学。要知道，农民国家不再贷款给我们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如果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农民就会要求现金交易了。“最敬爱的执政者，时间虽然拖延了好几个月、好几年，但你们现在终于找到了帮助我们摆脱贫困、饥饿和破产的最正确最可靠的办法。你们学会了，你们已经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受的一次考试，归根到底这次考试将决定一切，既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命运。

我们能不能完成我们眼前要做的事情呢？这种新经济政策是否有点用处呢？既然退却是正确的，那么，在退却之后同农民群众汇合起来一道前进，虽然缓慢百倍，却能坚定地稳步前进，使他们随时看到我们毕竟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我们。第一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这是应当直率地说清楚的。但我深信（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十分明确肯定地作出这个结论），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巨大危险，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薄弱环节，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依我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第二个是较为局部的教训，就是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进行检查。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合营公司——关于合营公司我下面还要略微谈一谈——这些公司也和我们的全部国营商业以及整个新经济政策一样，都是我们共产党人运用商业方法，资本主义方法的表现。这些公司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办法和我们的办法进行实际竞赛。请作实际的比较吧！我们过去写了纲领，许了诺言。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没有纲领和诺言就不能发动世界革命。如果白卫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在内，为这一点骂我们，那只说明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社会党人根本不懂得革命是怎样发展的。不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就无从着手。

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检查，不过不是通过那些正在由共产党员建立的监察机关来检查，虽然这些监察机关非常好，虽然在苏维埃机关系统中，在党的机关系统中都设有这种监察机关，虽然它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的监察机关，这种检查从农民经济的实际需要看来是可笑的，但从我们的建设来看决不可笑。我

们现在正在建立这些监察机关，但我这里说的不是这种检查，而是一种着眼于民众经济的检查。

资本家会做供应工作。他们做法恶劣，像强盗那样行事，他们侮辱我们，掠夺我们。这一点连不谈论共产主义（因为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知道。

“但是，资本家毕竟会做供应工作，你们会吗？你们不会。”这就是去年春天听到的，并不总是听得很清楚的一种议论，而这种议论说出了去年春天整个危机的内在原因。“你们这些人倒是很好，可就是不会干你们所抓的事务，经济事务。”这就是去年农民以及一些工人阶层通过农民对共产党提出的最朴实、最致命的批评。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这个老早就有的论点所以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其原因就在这里。

检查必须是真正的检查。旁边资本家在活动，在抢劫，在攫取利润，但他们有这种本领。而你们呢，你们试行新的一套，你们没有利润，原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好的，你们简直像圣人，真可以活着升天堂，但是，你们会不会办事呢？这需要检查，需要真正的检查，但不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和提出指责，再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处分的那种检查——不是这样，而是需要一种着眼于国民经济的真正的检查。

共产党人得到的贷款比任何其他政府多，而且可以一再延期归还。当然，共产党人曾帮助农民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农民很珍视这一点，所以才答应延期还债，但总有一定的期限。接着就要检查了：你们是不是会经营得不亚于别人？旧日的资本家会经营，你们却不会。

这就是第一个教训，中央政治报告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我们不会经营。这是一年来已经证明了的。我真想能举出几个国营托拉斯⁽²⁾（如果用这种曾受到屠格涅夫如此赞扬的优美的俄罗斯语言来说）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会不会经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生病，我不能很好地准备报告的这一部分，只能根据自己对现状的观察谈一些看法。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基本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全体共产党员、负责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会经营，让我们从头学起，那我们就会把事情办好——依我看，这就是主要的根本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谁这样想，谁就是无知的人，没有学过共产主义——也许学一下就会懂得的。不，对不起，问题不在于农民和非党工人没有学过共产主义，而在于需要阐发纲领、号召人民实现这一伟大纲领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证明，你们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有本事实际帮助工人和庄稼汉的经济，让他们看到你们能在竞赛中取胜。

我们开始设立的合营公司，既有俄国和国外的私人资本家参加，也有共产党员参加，这种公司是一种可以正常展开竞赛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表明并且学会，我们能够不比资本家逊色地建立起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就在农民目前这种十分愚昧的情况下（因为要在短期内使农民改观是不可能的），也能帮助他们前进。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竞赛，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并且我认为也是党的政策的全部实质。我们这里纯政治的问题和困难，要多少有多少。这你们都知道，又有热那亚会议，又有武装干涉危险。困难很大，但是同上述困难比起来，它们全都微不足道。在那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该怎么办，在那方面我们已经学会很多东西，领教过资产阶级的外交。这套玩意孟什维克已经教了我们15年，也教会了我们一些有益的东西。这并不新鲜。

然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这些人到农民那里，并不是去争论共产

主义（你看，不是去争论共产主义），而是去争论：如果你们需要弄到什么东西，把交易做好，建筑得好，那可以由我来办，价钱虽然贵，可是让共产党人来办也许更贵，甚至贵上10倍。这种宣传反映了现在问题的本质，经济的根基也就在这里。

我再说一遍，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们获得了人民的贷款，并且可以延期偿还，如果用新经济政策的用语来说，这叫做期票，但这些期票并没有写明期限，至于什么时候要求兑现，从票面上是看不出的。危险就在这里，这些政治期票和普通商业期票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共产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训练的普通资本主义店员。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用了了不起的俄罗斯语言来说，就是 *фjhs_]imn_*。j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优秀，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他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即使没有40座金字塔，也有40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看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他这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革命者，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

同志们，哪怕我们能改变一下不知道自己不懂行这种状况，那也是一个极大的胜利。这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我们应该带着这种信念回去：我们不懂这一行，我们要从头学起。我们毕竟还是革命者（虽然很多人说，甚至不是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已经官僚化了），我们能够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始了，碰壁了，从头再来——哪怕反复重做十次，但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认为你是共产

党员，那是非党店员，也许还是白卫分子，甚至确实是个白卫分子，但他却会办经济上非办到不可的事，而你却不会。如果你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有成百个官衔和称号，又有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勋章”，只要 you 了解这一点，你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是可以学会的。

一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没有意识到，没有使全体共产党员普遍相信，现在我们俄国最忠诚的负责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本领比任何一个旧店员都差。我再重复一遍，应当从头学起。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考试就能及格，这是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举行的一场严峻的考试，是俄国和国际的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割不断的联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场重大的竞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克服我国政治经济困难的途径和办法。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是，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把各种途径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了。请允许我毫不夸大地告诉你们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许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斗争，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因为这是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通过这次考试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本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就是缺本领。如果我们能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吸取这个简单的教训，把它当做我们在整个1922年的行动指南，那我们就连这个困难也能战胜，虽然这个困难要比以前的困难大得多，因为这个困难在我们本身。这并不是什

么外来的敌人。这个困难在于我们自己不愿意认识我们非接受不可的不愉快的现实，也不愿做我们应该做的不愉快的事情：从头学起。我看，这是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

第三个教训，补充的教训，是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教训。可惜，布哈林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我本想同他稍微争论一下，不过还是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再说吧。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如果像我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所试图做的那样，在脑子里综观一下我国报刊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就会确信，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没有谈到点子上。

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但是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依靠无产阶级，给无产阶级种种政治上的优先权，并通过无产阶级把下层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你们记得，我们是从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开始这项工作的）。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把很多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要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记住基本的一点，我们现有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们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

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缺少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会怎样，这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

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掌握着足够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其余的一切对于他们，对于这个阵营，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其余的一切，他们是可以迁就的。你们共产党员，你们工人，你们负责管理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你们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你们的意志来行动。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应该在这个基本领

域从头学起，而只有当我们完全领会到和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担保说，我们能够学会这点。

现在我来谈谈停止退却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谈过了。⁽³⁾从那时起，无论在党的报刊上，在同志们的私人来信中，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里，我都没有听到过任何反对意见。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我的报告提纲，提纲要求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这次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突出强调停止退却，并请求代表大会代表全党作出相应的必须执行的指令。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我们已经到达新的地点，总的说来，我们的退却总算进行得比较有秩序。不错，从各方面听到过不少想使这次退却陷入慌乱的喊叫声。有些人说，你们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退得不对，例如，那个叫做“工人反对派”（我认为他们这个名称取错了）的集团中某些代表就是这样。由于热心过头，他们本来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跑进了那个门，这一点现在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时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活动不是在纠正我们的运动，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散布惊慌情绪，妨害有纪律地退却。

退却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对于已经习惯于进攻的革命家，尤其是在他们几年来习惯于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周围的各国革命家一心向往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更难了。他们中间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像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在最近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也许我现在已经很难体会西欧人的这种心理了，尽管我在这些美好的民主国家侨居过好多年。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实在难于理解，只好放声大哭。不管怎样，我们是没有工夫伤感的。我们明白，正因为 we 许多年来这样胜利地实行了进攻，获得

了这么多不平常的胜利（而且是在一个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破坏和缺乏物质前提的国家里！），为了巩固这种进攻，我们在取得这么多的战果之后完全有必要实行退却。我们不能保持住迅速夺得的全部阵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依靠工农蓬勃的热情迅速取得了无数的胜利，我们才有这么宽广的地盘，使我们可以退得很远，甚至现在还可以退得很远，而丝毫不会丧失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虽然惊慌失措的喊叫，其中包括“工人反对派”的喊叫（他们最大的害处也就在这里！），使我们这里发生过局部的偏差，即违反纪律，不能正常地退却，但是总的说来，退却是相当有秩序的。退却时最危险的就是惊慌失措。假如全军（我打个比方）在撤退，那就不会有全军前进时的那种情绪。这时处处都会看到某种沮丧的情绪。我们甚至有过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写道：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诗作。

可以理解，这是退却造成的。正是在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在伟大的胜利进攻之后，实行退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退却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进攻的时候，即使维持不了纪律，大家也会自动向前飞奔；但在退却的时候，就必须自觉地遵守纪律，百倍地需要纪律，因为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它不清楚、也看不见退到哪里为止，看见的只是退却，所以有时只要有一点惊慌的喊叫，就会使大家逃跑。这里的危险是很大的。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常的退却发生混乱，就下令“开枪！”这样做是对的。

当我们实行空前困难的退却的时候，当全部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秩序的时候，如果有人散布惊慌情绪，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们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也必须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不仅对于我们党内的某些事情应该如此，而且对于孟什维克或第二国际的所有先生们更应该如此。

前几天我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上读到了拉科西同志的一篇评论奥托·鲍威尔新著的文章，我们大家过去曾向鲍威尔请教过，但是，他在战后和考茨基一样成了可怜的市侩。他现在写道：“看，他们在退向资本主义；我们一直说，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都在宣传这些东西，听到我们说要枪毙进行这种宣传的人，都感到惊奇。他们感到惊异，然而问题很清楚，当军队退却的时候，纪律必须比进攻时严格百倍，因为在进攻时大家都拼命向前冲。可是如果现在大家都开始拼命向后逃，那就必然会立刻灭亡。

正是在这种关头，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如果孟什维克说：“你们现在在退却，而我一直主张退却，我同意你们的做法，我是你们的人，让我们一块退却吧！”那我们就要这样回答他们：“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说：“这些人的独裁作风有多厉害！”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我们所以要惩办孟什维克，是因为他们在日内瓦同我们吵过架。如果我们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的政权大概连两个月也保持不住。其实，奥托·鲍威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作的这种说教反映了他们的本性：“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直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让我们再来重申这一点吧。”而我们对这一点回答说：“正因为这样，让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收起你们的观点，要么你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处境比遭到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困难得多的条件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对不起，我们就要把你们当做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待。”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点。

我说停止退却，我讲这话的意思决不是指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如果我讲的话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说明我

的话被误解了，说明我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

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无谓奔忙的现象，那种追求一切都按新样子建立和赶浪头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合营公司。诚然，这种公司还很少。在我们这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批准成立9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柯里尼柯夫委员会批准了6个，白海北部地区森林工业特别管理局也办了两个。这样，现在由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17个了（当然，由于我们各机关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数量还不多。这个小小的却又是实际的开端表明，对共产党人已作出评价，根据他们的实践作出评价，而且作出评价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些高级机关。当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尽管如此，当这些机关考查共产党员时……你们瞧，国际市场是不承认它们的权威的。（笑声）而当俄国的和外国的普通资本家同共产党人一起办合营公司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总算会办一些事情了，尽管我们还办得不好，少得可怜，但作为一个开端我们毕竟取得了一点成绩。”当然，成绩还不怎么多；请想一想，我们宣布要把全副精力（据说，我们的精力很充沛）放到这件事上已经有一年了，而一年来还只办了17个合营公司。

这一点证明，我们是多么不灵活、多么笨拙，证明我们还有多少奥勃洛摩夫习气，为此我们一定还要挨打。但我再说一遍，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开端，侦察工作已经完成。如果资本家连起码的活动条件都没有，他们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的。现在既然已经来了一小部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取得了部分胜利。

当然，他们还会在合营公司内部揍我们，会把我们揍得几年以后才明白过来。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说这就是胜利，这只是一种

侦察，它表明我们已经有了活动场所，有了一块地方，我们已经可以停止退却了。

侦察探明，同资本家签订的合同并不多，但毕竟是签订了。这方面还应该继续学习，继续进行活动。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中止神经过敏、大喊大叫和无谓奔忙的时候了。人们纷纷写条子和打电话来问：

“既然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我们这里能不能也改组一下？”大家都在无谓奔忙，杂乱无章；谁都不做实际工作，却去议论怎样适应新经济政策，结果是一无所成。

商人们却在嘲笑共产党人，大概还会说：“过去有过劝说司令，现在又出了空谈司令。”资本家挖苦我们，我们动手迟了，错过了机会——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提议，要用代表大会的名义批准这个指令。

退却已经结束。主要的活动方法，即如何同资本家共事的方法，已经订出来了。样板已经有了，虽然为数甚少。

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不要再卖弄聪明、高谈阔论了！诗，让诗人去写好了，这是他们诗人的事。但是，经济工作者，请不要再侈谈新经济政策了，请你们更多地建立这种合营公司，查一下善于同资本家竞赛的共产党员有多少。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这就是代表大会应当作出的指令，这个指令应当结束忙乱现象。安静点吧，不要自作聪明，这是有害的。需要在实践上证明，你工作得并不比资本家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在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我们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许多经济手段；如果我们击溃了资本主义，建立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那我们就会成为绝对不可战胜

的力量。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作为沧海一粟的共产党的事业，而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了；那时，普通农民就会看到，我们在帮助他；那时，他就会跟着我们走，虽然这种步子要慢百倍，却稳当可靠百万倍。

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谈停止退却，所以用这种那种形式把这个口号变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路标转换派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你们知道，他们是俄国流亡者中的一种派别，一种社会政治派别，领导这一派别的是立宪民主党的一些著名人士，前高尔察克政府的一些部长，他们确信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俄罗斯国家，因此应当跟这个政权走。路标转换派议论说：“但是这个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困难关头把私人资本家糊弄过去，然后再达到自己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历史是殊途同归的。”

他们有些人装做共产党人的样子，但是也有比较坦率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好像在高尔察克手下当过部长。他不同意他的伙伴们的意见，他说：“关于共产主义你们随便怎么说都行，而我断定，这并不是他们的策略，而是演变。”我认为，乌斯特里亚洛夫这种直言不讳的声明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常常听到一种甜蜜的共产主义谎言，“fjh_l]ix£”，尤其是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每天都听得到，有时听得简直恶心死了。最近到了一期《路标转换》杂志，它不说这种共产主义谎言，而是直率地说：“你们那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不过是你们的想象而已，其实，你们正在滚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那里只不过摇动着几面写着各种空话的共产主义小旗子罢了。”这话很有好处，因为我们从这些话里看到的，已经不是简

单地重复在我们周围经常听到的话，而完全是阶级敌人的阶级真话了。看看这种东西是很有益的，之所以这样写并不是由于在共产主义国家中通常都这样写而不许有另一种写法，而是由于这确实是阶级敌人粗鲁地公开说出的阶级真话。乌斯特里亚洛夫虽然是立宪民主党人、资产者，支持过武装干涉，但现在他却说：“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之所以赞成，是因为它踏上了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

这是很有益的话，我觉得必须予以重视；路标转换派这样写，对我们说来，比起他们中间某些装得很像共产党人的人要好得多，这种人远远看去真假难分——他们也许信仰上帝，也许信仰共产主义革命。无可讳言，这种坦率的敌人是有益的。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应当欢迎路标转换派的这种坦率的声明。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敌人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者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因此，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会得胜？我说的是竞赛。现在没有人向我们直接进攻，没有人掐住我们的喉咙。至于明天会怎样，我们还要看看再说，不过今天还没有人拿着武器向我们进攻，可是我们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却残酷、危险百倍，因为我们不能随时看清楚，反对我们的敌人在什么地方，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不是从同情共产主义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发展的角度来谈共产主义竞赛的。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

主义之间拼命的激烈的斗争，即使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殊死斗争。

这里必须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这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在处理某个实际问题时，在某个办事机构中，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权力不够。有些人还是这样认为，这些人都无可救药地向后看，而不懂得应该向前看。主要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不管租赁在某些地方得到多么广泛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它的比重总的说来是微乎其微的。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如果拿莫斯科4 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像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听到的情况。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 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不错，这里似乎可以给人一种印象，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但毕竟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他们的文化低得可怜，微不足道，可是总比我们那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干部高一些，因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管理本领。共产党员担任机关领导的时候，往往被人愚弄，因为怠工者有时巧妙地故意把他们推到前面当做招牌。承认这一点是很不愉快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很愉快的，但我觉得，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问

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看，这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教训，而且1922年的斗争也将在这个标志下进行。

俄罗斯联邦和俄国共产党的负责共产党员，是否了解他们不会管理呢？是否了解他们自以为在领导，其实是被领导呢？如果他们能了解这一点，那他们当然能学会，因为是可以学会的，但为此就应该学习，可是我们的人不学习。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

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看起来这种竞赛是在所有国家机关中进行的，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即使在莫斯科各中央机关，从文化上来说斗争也还没有过去。因为资产阶级人士往往比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懂行，我们党员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

我想从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的一本小册子中引证一段话。这本小册子是在韦谢贡斯克城（特维尔省有这样一个县城）于俄国苏维埃革命一周年——1918年11月7日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韦谢贡斯克的这位同志看来是个党员。这本书我是很久以前读的，因此不敢担保现在不会引错。他谈到自己怎样着手装备两个苏维埃工厂，怎样吸收两个资产者参加工作，怎样用当时的办法，即以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相威胁做到了这一点。这两个人被吸收参加了恢复工厂的工作。我们知道1918年是怎样吸收资产阶级参加工作的（笑声），所以用不着详细讲，而现在我们正用另一种办法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请看他的结论：“仅仅战胜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致命打击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

这是多么精彩的话啊。这句精彩的话说明，甚至在韦谢贡斯克这样的县城，甚至在1918年，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正确的认识。

我们痛打了剥削者的双手，使他不能为害，给了他致命打击，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可是在我们莫斯科，在100个负责工作人员里，大约有90个都认为，问题仅仅在于给剥削者以致命打击，使他不能为害，痛打他的双手，如此而已。我关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所说过话，往往被人只理解成使他们不能为害，痛打他们的双手（也许不光是打他们的手，还打别的地方），给他们致命打击。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甚至在1918年韦谢贡斯克的那位同志说这话的时候，这还是事情的一半，而现在连事情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我们应当强迫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双手来为我们工作，而不能让负责的共产党员身居领导地位，头戴官衔，却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他们只有不仅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是正确地确定了道路，才能领导人民走他们的道路。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来看，我们确定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每个国家都在证实我们确定的道路是正确的，但在我们的祖国，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也应当正确地确定这条道路。确定这条道路不仅靠这一点，还要看有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能不能用商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农民会说：“你是好人，你保卫了我们的祖国；因此我们一直听你的，可是现在你如果不会经营，那就走开吧。”是的，农民会这样说的。

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而有的共产党员自以为我什么都懂，因为我是负责的共产党员，我打败的不是什么店员，我们在前线打过仗，难道打的是这种人吗——正是这种最常见的情绪在害我们。

我们使剥削者不能为害，痛打并斩断他们的双手，这不过是事情的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这是要做的。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我们的

法院都要做，而且不应当像以前那样软弱无力，要记住，它们是受全世界敌人包围的无产阶级的法院。不过这并不难，我们基本上已经学会了。这方面应当施加点压力，但这是容易做的。

至于胜利的第二部分，即用非共产党人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切实做好经济上非做不可的事情，那就是要找到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满足农民的需要，让农民说：“不管饥饿多么难受，多么痛苦，多么严重，但我看到，尽管对这个政权不习惯，尽管它很特别，但它带来了实际的、确实可以感觉到的好处。”我们必须设法让那些与我们共事的、为数众多的、超过我们许多倍的人这样工作，使我们能够观察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工作，用他们的手做一些有益于共产主义的事情。目前形势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还只有个别共产党员懂得和看到这一点，而广大党员群众还没有认识到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工作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已写过多少通告，说过多少话，可是一年来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在我们100个党委会中，能够拿出自己实际成绩来的连5个也没有。看，我们是多么严重地落后于当前的迫切需要，我们是多么厉害地保持着1918年和1919年的传统。那是伟大的年代，那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事业。如果只回头看这些年代，而看不到目前面临的任務，那就是自取灭亡，毫无疑问必定自取灭亡。而整个症结就在于我们不愿意认识这一点。

[……]

俄国革命的成果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夺去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苏维埃国家已经建立这一事实。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也许我们的机关还不好，但是据说，最先发明的那台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发明出来了。就算头一台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火车头。就算我们的国家机关糟透了，但它毕竟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

最伟大的发明，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全欧洲，千万家资产阶级报纸都说我们这里乱七八糟，贫困不堪，劳动人民只有受苦受难，就让它们宣传去吧，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还是向往苏维埃国家的。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不可剥夺的伟大成果。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共产党的代表来说，这还只是打开了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点做到了没有呢？没有，还没有做到。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些共产党人以为已经有了这种基础，这是极其错误的。全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坚决地、明确地、冷静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哪些我们还做得很不好，哪些还没有建立起来，哪些还要多次重新做起。

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挑哪个环节。1917年的整个关键是什么呢？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革命的俄国摆脱了战争。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注意到了人民的基本要求，因而保证了我们多年的胜利。人民感觉到，农民看到，从前线回来的每个士兵也都十分明白，苏维埃政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的政权。不管在其他方面我们做了多少愚蠢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一切都是正确的。

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什么呢？是武装抵抗。当时称雄世界的协约国89向我们进攻，要扼杀我们，因此用不着进行宣传，任何一个非党农民都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地主来了。共产党员能同他们作斗争。这就是大多数农民拥护共产党员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原因。

1921年的关键是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所以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纪律。“工人反对派”说：“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主动性应当表现在有秩序退却和严格遵守纪律上。谁要是稍微发出点惊慌的声调或破坏纪律，他就会断送革命，因为最困难的事

情，就是同那些习惯于进攻、浸透革命观点和理想、认为任何退却都是卑劣行为的人们一起退却。最大的危险就是破坏秩序，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持秩序。

目前的关键是什么呢？目前的关键，也是我想把它作为这次报告的结论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所有这些谈论都是徒劳无益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我们有人开始忙乱起来，又是改组机构，又是建立新机构。这是最有害的空谈。我们得出了结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一个习惯于反对抓小事、反对单纯文化工作的革命家，是难以领会这一点的。但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对此在政治上应当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前进得太远了，所以不能而且也不应保持所有的阵地了。

在国际方面，我们的境况近年来有极大的改善。我们争得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是全人类的一大进步，共产国际每天从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的消息都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但是在实际工作方面情况却是这样：共产党员如果不能给农民群众实际的帮助，农民群众就不会支持他们。注意力不应集中在立法、颁布更好的法令等等上面。我们有一个阶段把法令当做宣传的形式。人们嘲笑我们，说布尔什维克不知道人们并不执行他们的法令；所有白卫分子的报刊也充满了这种嘲笑，但是这个阶段是合理的，那时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他们告诉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说：我们想这样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法令，请试试看吧！我们用法令的形式把我们的政策设想迅速告诉普通的工人和农民。结果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过去和现在都获得了极大的信任。这是革命初期必然经过的阶段，不然我们就不会走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而只会充当尾巴。不然所有那些想在新基础上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就不会信任我们。但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我们却不愿了解这一点。现在再有人下命令来设立和改组什么机构，工人农民就要嘲笑了。现在普通的工人农民对这点已不感兴趣，他们

是对的，因为现在重点不在这里。你，共产党员，现在不应当向人民宣传这一套。虽然我们这些坐在国家机关里的人总是埋头于这种琐事，但是该抓的不是链条上的这一环节，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人员安排不当，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不通的工商业，他们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后。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执行情况进行实际检查。这是一种平凡的小任务，是些小事情，可是我们在最伟大的政治革命之后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必须与资本主义成分并存，全部情况的关键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报上所说的全是些政治高调，没有丝毫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在于决议，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改组。这些只要对我们有必要，我们会做的，但决不要向人民灌输这些东西，而要挑选所需的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这才是人民所重视的。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现在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使他们能看到情况确有改善，而且符合农民的需要和习惯。农民熟悉市场，熟悉商业。我们不能实行直接的共产主义分配。要这样做，我们的工厂和设备都不够。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商业来供给，而且要做得不比资本家差，否则人民就不能忍受这种管理。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这就应当成为我们1922年全部工作的关键，不过要有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武装干涉。我们虽然在外交上尽力避免它，但是每天都有发生的可能。我们确实应当时刻戒备，并且为了加强红军，我们应当作某些重大牺牲，当然也要严格规定牺牲的限度。我们面对着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它不过是在寻找扼杀我们的方式。而我国

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这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罢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如此。

第二个条件是财政危机不过分严重。危机正在逼近。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听有关财政政策问题的报告。如果危机太厉害、太严重，有许多事情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调整，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某一点上。如果危机不过于严重，那甚至还可能有好处，因为它会把所有国营托拉斯中的共产党员清洗一下。只是不要忘记做这件事。财政危机能清理我们的机关和企业，其中不中用的会首先垮台。不过不要忘记，不能把垮台都归咎于专家，说什么负责的共产党员都很好，他们在前线打过仗，工作一贯很好。所以财政危机要是不过分严重，那么从中还可能得到好处，它不会像中央监察委员会或中央审查委员会那样进行清洗，而是对经济机关中的全体负责共产党员来一次认真的清洗。

第三个条件是要在这期间不犯政治错误。当然，如果我们犯了政治错误，那整个经济建设就要受挫，那就不得不去争论纠偏和确定方针的问题。如果不犯这种可悲的错误，那最近的关键就不在于法令，也不在于政治，狭义的政治，不在于机构，也不在于机构的组织——这些事将根据需要由负责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机构来做，而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挑选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学到东西，收到实际成效，那我们就能再次克服一切困难。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72—97、106—110页

(1) 本文是《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之二。列宁在报告中总结了一年来执行新经济政策的三点经验：（1）用新经济政策来检验无产阶级政权是否真正做到了把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和政策基础之所在；（2）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检验共产党人的经营管理水平，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就是促进共产党人努力提高管理经济工作的能力；（3）充分运用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学会管理的本领，合理地利用和限制国家资本主义，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列宁还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对后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连马克思也没有对此写下只言片语，一切都要靠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一起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2\)](#) 原文为“‘jmn1bmn”，并不是地道的俄语词。——编者注

[\(3\)](#)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15页。——编者注

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

根据192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编成的俄国居民识字状况一书（《俄国识字状况》1922年莫斯科中央统计局国民教育统计处版）日前出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现将该书中1897年和1920年俄国居民识字状况表抄录如下：

	每一千男子中 识字人数		每一千妇女中 识字人数		每一千人口中 识字人数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1897年	1920年
1. 欧俄·····	326	422	136	255	229	330
2. 北高加索·····	241	357	56	215	150	281
3. 西伯利亚 （西部）·····	170	307	46	134	108	218
共 计·····	318	409	131	244	223	319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

我们不应当光讲这个不容争辩的但过于理论化的道理。应当在最近修改我国季度预算的时候，实际着手干起来。当然，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今年这个粮食供应还比较不错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

目前在国民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一般说来，范围并不算太窄。为了推动旧的教师们前进，吸引他们来执行新的任务，使他们注意教育学一些问题的新提法，注意宗教之类的问题，我们做了很不少的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因为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像我国的人民群众这样关心真正的文化；没有哪一个地方像我国这样把文化问题提得这样深刻，这样彻底；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像我国那样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而大多数工人深知自己的——且不说在文化方面，而是在识字方面——不足；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像我国工人阶级这样，为了改善自己在这方面的状况，情愿忍受并且正在忍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做得还远远不够。甚至在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里也经常可以看到编制过分庞大的现象，一个国家出版总局的编制就大得不像话，而丝毫没有注意到国家首先要关心的不应是出版机构，而是有读书的人，有更多能阅读的人，使出版机构在未来的俄国有更大的政治影响。我们还是按照旧的（很坏的）习惯，用在出版机构这类技术问题上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国民识字这个一般的政治问题上的要多得多。

拿职业教育总局来说，我们深信，这儿也能发现有许多机构是多余的，这是由于从部门利益考虑而膨胀起来的，并不适应广泛的国民教育的需要。在职业教育总局里，远非一切都是从首先发展我国青工教育并使这种教育有具体方向这一合理愿望出发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仔细考察一下职业教育总局的编制，其中有很多是臃肿的和形同虚设的，应予撤销。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那些在上述统计材料所表明国民识字情况下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构一律撤销。

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

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应当不断地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无一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脱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我想简短地指出，经常下农村的做法在这方面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在进行，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发展。对于下农村这类措施，不要舍不得花钱，我们常常在几乎完全属于旧历史时代的国家机关上白花钱。

我曾收集过一些材料，准备在1922年12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城市工人支援农村居民的报告，但这个报告没有作成。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有些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给我提供的，既然我自己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个问题并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来发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请同志们研究。

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资产阶级国家不断地极力愚弄城市工人，使国家、沙皇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出钱办的所有出版物配合这一目的，而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使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说了“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要赶快声明一下，以免引起误会或过于机械的理解。决不能把这话理解为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

不能这样做。应当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这种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这种目标是不合时宜的。提出这种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可是，在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之间建立交往，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他们之间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互助形式，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为此就必须在工厂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个人的）。

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分配”给相应的农村支部的工人支部经常注意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呢？或者还能找到其他联系形式？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为的是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举出现有的西伯利亚西部的经验（这经验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告诉我的），并充分地把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提出来。

除了我们的正式预算或正式联系，我们几乎没有为农村做任何事情。诚然，我国今天城乡的文化联系自然而然地、必然地具有另一种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予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可是这一切正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进行的，如果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就可以加强起来（而且以后更会百倍地加强起来）。

只有当我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人团体（尽量防止它们官僚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并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前进（那时我们定能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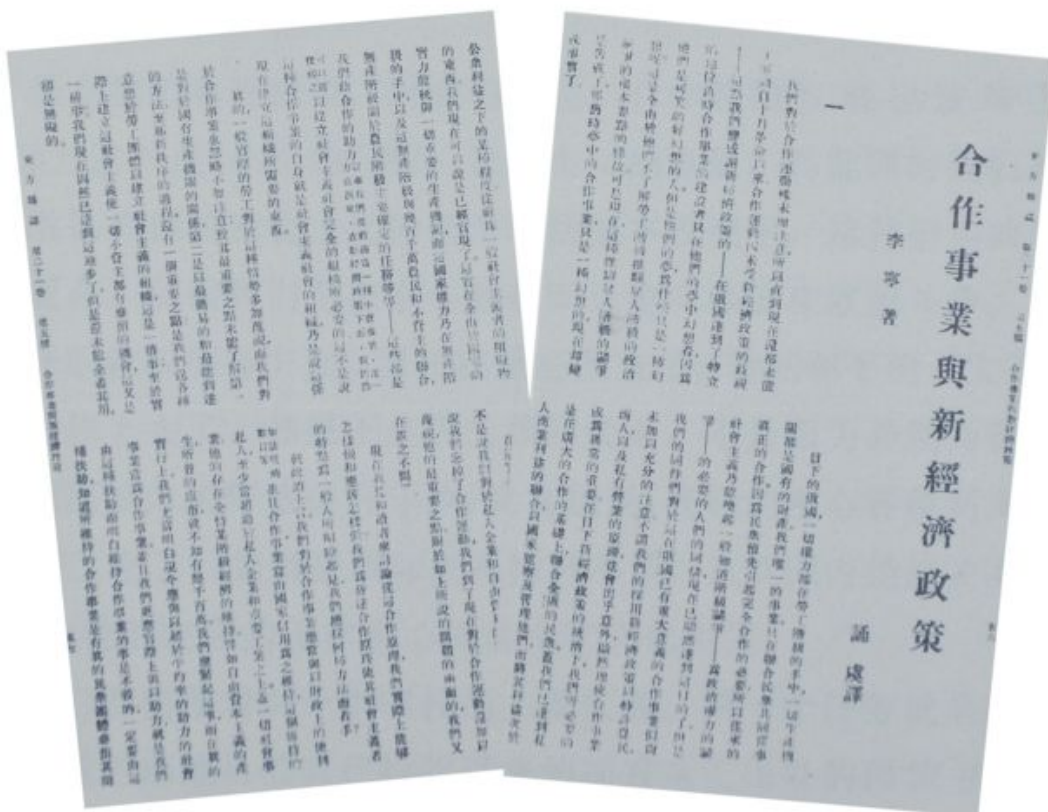
1923年1月2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6—360页

（1）这是列宁关于加强国民教育的口授记录。列宁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一方面，要使国家预算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应该把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列宁还提出加强城乡文化联系的任务，要求城市在农村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论 合 作 社 （1923年1月4日和6日）

一



1924年3月10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5期封面和该刊所载列宁《论合作社》的中译文(当时译《合作事业与新经济政策》)

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相反，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有很多幻想。他们常常由于这种幻想而显得可笑。可是他们的幻想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现在，我国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正在成为不加任何粉饰的现实。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正确坚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们曾合理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现在在居民最大限度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俄国的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多么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此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

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而这又正是主要之点。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级台阶。毫无疑义，我们虽然达到了这级台阶，却绝少利用它。

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

我现在想跟读者谈一谈，从这个“合作社”原则出发，立即在实践上可以而且应当做到的是些什么事情。立即可以而且应当用哪些手段来着手发挥这个“合作社”原则，使得人人明白这一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

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优待（如银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但是支持合作社制度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

转。奖励参加合作社流转的农民，这种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况，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合作社工作者来到农村开设合作商店，严格地说，居民还完全没有参加这一工作，但同时出于个人得益的考虑，他们又会急于试试参加。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须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因此，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尽量少卖弄聪明，尽量少耍花样。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现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取得完全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这里我几乎要说）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所谓做商人的本领，我指的是做文明商人的本领。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做买卖，那就是说有本领做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虽然在做买卖，但这离有本领做个文明商人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

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

现在结束我的话：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但这还只是一般地提出任务，因为在实践上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还是不清楚的，还没有详细规划出来，也就是说，应该善于找出我们对合作化的“奖励”方式（和奖励条件），找出我们能用来充分帮助合作社的奖励方式，找出我们能用来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1923年1月4日

二

每当我写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我总要引我1918年那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²⁾。这曾不止一次地使某些青年同志产生疑问。但他们的疑问主要是在抽象的政治方面。

他们觉得，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这工人阶级，这样的制度就不能叫做国家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第一，是为了指明我们现在的立场同我在与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时的立场之间有历史联系，而且那时我就已证明过，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我很重视判明普通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在帮助读者认识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的联系。第二，我一向很重视实际目的。而我国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目的就是实行租让；在我国条件下，租让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在谈这一方面时我们可能要涉及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至少要同国家资本主义作一对比。这就是合作社问题。

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同样毫无疑问，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中，当我们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但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同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无论生产资料或企业占用的土地以及整个企业都属于国家）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就出现了第三种企业的问题，即合作企业的问题，从原则意义上说，这种企业以前是没有起过独立作用的。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首先是私人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

我们有些人在谈论合作社时，对于这一情况估计不足。他们常常忘记，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点，合作社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把租让（顺便说一句，租让在我国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单独划开，那么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现在来说明我的看法。为什么说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梦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合作”社会主义看做彻头彻尾的幻想，把以为只要实行居民合作化就能使阶级敌人变为阶级朋友、使阶级战争变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梦想，看做浪漫主义的，甚至庸俗的东西。

毫无疑问，从当代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不进行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但是你们看，现在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让给

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1923年1月6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1—368页

(1) 列宁在本文中批评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忘记了合作社，对发展合作社的深远意义重视不够、估计不足的倾向，论述了合作社的性质和通过合作社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强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他认为，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在工人和农民结成牢固联盟的形势下，苏维埃政权完全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合作社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还深刻地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为此我们需要认清并完成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一是改造我们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国家机关；二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一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唯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做榜样。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到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富有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之后还没有能调整好“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即硬充革命家的小资产者，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个极限（不可逾越的极限），而且他们对于这种“正常”的理解是极其死板、极其狭隘的。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做口头禅了。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试问，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西欧所有多少有些影响的国家也被卷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次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

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那该怎么办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1923年1月16日

二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不用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

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1923年1月17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9—372页

(1) 本文总结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驳斥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借口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来否定俄国革命的论调，运用革命辩证法论证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欧洲，东方各国的革命道路又将不同于俄国，这种特殊性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确需要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俄国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可以先夺取革命的胜利，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和文化水平。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1923年1月23日）

毫无疑问，工农检查院对我们说来是一个大难题，而且这个难题至今没有解决。一些同志用否认工农检查院的好处或必要性来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是不对的。但同时我并不否认，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所以，为了找到真正革新这些机关的办法，我觉得应该向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

在国内战争比较危急的关头我们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把党的优秀力量集中在红军里，我们动员了我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

照我的看法，我们也应当按这个路子去寻找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源泉。我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采纳下面这个以特殊方式扩大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改组计划。

我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它现在平均每两月至多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则由我们的政治局、我们的组织局、我们的书记处等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我认为，我们应当走完这条已经走上的道路，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而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根据下述条件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

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

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

另一方面，应该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300—400人，这些职员要经过专门考查，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

据我看来，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为了在以下两方面正确地完成任务，它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一方面，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

我预见到，那些使我们机关成为旧机关的人，也就是那些主张让我们机关照现在这样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的人，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反对意见（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得到了历史上很少有的机会，可以测定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所必需的期限，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什么可以在5年内做到，什么需要更长的时期）。

这种反对意见认为我提出的改革只会造成混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将在各机关游逛，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去干什么，去找谁，弄得到处一片混乱，打断职员们的日常工作，如此等等。

我觉得，这种反对意见是哪些居心险恶的人提出来的，十分明显，甚至用不着回答。自然，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及其部务委员会（相应的还有我们的中央书记处）来说，需要顽强地努力若干年，才能恰当地组织自己的人民委员部及其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的工作。我认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可以（而且应当）仍旧是人民委员，整个部务委员会也是一样，仍旧领导整个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包括所有“派来”听他调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

工作。按照我的计划，工农检查院留下来的300—400个职员，一方面要在工农检查院其他委员和增派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领导下做纯粹秘书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应该是高度熟练、经过特别审查、非常可靠的人，同时要给他们很高的薪金，使他们完全摆脱目前工农检查院官员们的真正不幸的（如果不说得更重的话）处境。

我相信，把职员减少到我所说的那个数目，会使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质量和整个工作的质量提高许多倍，同时也会使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有可能集中全力安排工作，有步骤地、不断地提高工作质量，而提高工作质量对于工农政权和我们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还认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设法把我们共和国现有的12个以上的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中央劳动研究所、科学劳动组织研究所等等）一部分合并，使另一部分的工作协调起来。过于雷同也好，因此而要求统统合并也好，都是有害的。恰恰相反，应该在把所有这些机构合并成一个和使它们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条件下适当分工这两者之间，找出一个合理的适当的折中办法。

由于这种改革，我们中央委员会本身所得到的好处无疑不会少于工农检查院，这个好处就是，中央委员会能增进同群众的联系，使它的工作更有条理、更扎实。那时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准备政治局会议方面规定更严格更负责的制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有一定人数的委员出席这种会议，其人数视某一时或某一组织计划而定。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应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分一下工，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出席政治局会议和检查送交政治局审理的各种文件，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抽出工作时间来学习理论和研究科学组织劳动，或者根据他们是否必须实际参加监督和改善从上层国家机构到基层地方机构的我国国家机关的工作，等等。

经过这种改革，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委员，刻

不容缓的事情除外，这类事情要通过特别程序通知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加以解决）。我认为，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

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它的威信不相称。我提出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

1923年1月23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3—377页

（1）列宁在文中围绕改组工农检察院问题，论述了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推进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出改革的目标是增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领导机关的纪律检查和监督。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

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工农检查院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当然，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是太低了。但是在头五年里，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相信和怀疑。例如，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因此，在国家机关问题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做已达到的成就。而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只是匆忙地抓过来，没有经过检验，没有经过考验，没有为经验所证实，没有固定下来，如此等等。当然，在革命时代，在五年之内就使我们从沙皇制度转到苏维埃制度这样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之下，也不能不是这样。

应当及时醒悟过来。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等一概不相信。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宣布，每分钟都在实行，而后又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未被理解的那些前进步骤。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或者总还有不少人能用来建立真正新的机关，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如此等等。

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机关人员，是少得可笑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许多多年的时间。

我们有哪些人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呢？只有两种人。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知识这种缺陷。

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毋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以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察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要想使工农检察院达到应有的水平，就必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周到地、熟悉情况地利用我们社会制度中真正的精华来建立新的人民委员部。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即第一，先进工人，第二，真正受过教育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提出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

这种状况终究应该改变了。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

我知道，这条准则很难坚持，很难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我知道，相反的准则会通过无数渠道在我们这里得到奉行。我知道，需要大力抵制，需要表现出无比坚韧的精神，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在头几年内是极难收效的。然而我深信，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立名副其实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等。

许多读者也许认为我在前一篇文章⁽²⁾中举出来作例子的数字太小了。我相信，可以用很多计算来证明这些数字是很不够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真正合乎标准的质量这一点看得比一切计算更重要。

我认为，对我们国家机关来说，正是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好好地对它进行一番工作的时候了，对于这种工作，急躁几乎是最有害的。所以我要竭力防止扩大这些数字。相反地，依我看，在

这里对数字要掌握得特别紧。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如果我们真正抱定目的要在几年后建成这样的机关：第一，它应当是模范的，第二，它应当得到大家绝对信任，第三，能向所有的人证明，我们所做的确实不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一个高级机关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就必须牢记这一点。我认为，应该立即坚决冲破一般的职员编制标准。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职员。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并且得不到任何信任，说话毫无威信，说实在的，那又何必设立它呢？我想，在进行我们现在所谈的改组工作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

我们吸收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应当是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我想，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胜任工作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其次，在这项工作中，应有一定数目的秘书人员做助手，在任用他们以前，必须再三审查。最后，凡是我們决定要破例立刻委派为工农检查院职员的公职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他们必须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

第二，他们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

第三，他们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

第四，他们必须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赖整个机关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要达到这些要求还要有许许多多先决条件，所以我很担心工农检查院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会说这些要求是无法执行的，或者轻蔑地加以嘲笑。但我要问一问工农检查院任何一个现任领导人或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真心地告诉我，像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在实践上有什么必要？我想，这个问题会帮助他们掌握分寸。

要么不值得去做改组工农检查院这样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类改组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次），要么应当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

如果没有耐心，如果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我认为，应该从我们在高级劳动研究所等等方面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检查它们是否完全认真地工作，只有它们的工作确实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并能使我们得到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成果，才能继续工作。这样，指望在几年之内建成一个能胜任工作的机关，就不是空想了；所谓胜任，就是能得到工人阶级、俄国共产党以及我们共和国全体居民的信任，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为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而工作。

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如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同意这个改造计划，它现在就可以开始采取准备措施，以便有条不紊地工作到彻底完成，既不要急躁，也不要拒绝重做已经做过的事情。

在这里，任何不彻底的解决办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凡是根据其他任何考虑制定的工农检查院的编制，实质上都是根据旧官僚的考虑，根据旧的偏见，根据已经受到批判、引起大家讥笑等等的观点制定出来的。

实质上，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

要么现在就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五年里也该学到点东西了）；要么承认，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这个程度，那就不必动手去做。

我想，就我们现有的人才而论，认为我们学到的东西已经足以有条不紊地重建一个人民委员部了，这并不是不谦逊。不错，这一个人民委员部应能确定我们整个国家机关的面貌。

现在就发征稿启事，争取写出两本或更多的关于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劳动的教科书。我们现有的叶尔曼斯基的那本书可以作为基础，附带说一句，虽然他很明显地同情孟什维主义，不适于编写适合苏维埃政权的教科书。其次，不久以前出版的克尔任采夫的那本书也可以作为基础；最后，在现有的专题参考书中还有一些可能有用。

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我提出英国，是考虑到派人去美国或加拿大可能做不到。

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草拟工农检察院职员候选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考试的初步纲要。

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当然不会使人民委员为难，也不会使工农检察院部务委员会委员们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难。

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物色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我相信，现在在各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中，在我们苏维埃学校的学员中，能担任这项职务的候选人是绰绰有余的。事先排除某一类人未必是正确的。最好是使这个机构有各种各样的人员，在这个机构里我们应当设法把多种素质和不同优点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得下功夫拟好候选人名单。举例来说，如果新的人民委员部是由一个模子出来的人组成的，假定是由官吏型的人组成的，或者排除鼓动员型的人，或者排除善于交际或深入他们不太熟悉的群众中去的人等等，那就糟糕透了。

我想，如果把我的计划和学院式的机关比较一下，那我的意思就表达得更清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也包括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习。

但是我认为，他们决不能只限于做这类学院式的工作。除这些工作以外，他们还要学会做别的工作，这种工作，我可以不客气地说，虽然不是学会捉拿骗子，也是捉拿诸如此类的家伙，同时还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进攻、接近等等。

这样的建议在西欧国家机关中会引起空前的不满、道义上的愤慨等等，但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地步。在我们这里，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人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一想到可能捉人就恼怒起来。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还不很久，却已积了这样一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会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计、有时要用寻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侦察方法来挖掘这些渣滓就恼怒起来，假如有，那也可以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痛快地嘲笑这种人的。

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查院会丢掉法国人称之为pruderie的毛病，这种毛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妄自尊大，它对我们的官僚，不论是苏维埃官僚还是党官僚最为合适。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我在上面说，我们必须学习，到高级劳动组织研究所等机构去学习，但这决不是说，我把这种“学习”理解为有点像学校式的学习，或者我的想法仅仅限于学校式的学习。我希望，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怀疑我，说我不承认这里所说的“学习”包含着某种半玩笑式的手法，某种巧计，某种花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庄重严肃的国家里，这种意见一定会使人大为震惊，任何一个体面的官员连讨论这个意见都不会容许。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这种程度，在我们这里讨论这种意见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真的，为什么不把愉快和有益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能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去暴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半有害等等的现象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工农检查院把这些想法研究一下，那会获益匪浅；记载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或它在工农检查院工作的同事们取得

过几次极其辉煌胜利的奇案录，将增添我们未来的“工农检查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不少奇遇，在那些古板正经的教科书不易提及的地方所发生的奇遇。

怎么可以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呢？这里难道没有什么不可容许的东西吗？

这个问题倒不是我要提出的。我在上面说过官僚主义者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这个问题是代表我这句话所暗指的那些人提出的。

真的，为了工作的利益，为什么不把两种机关结合起来呢？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这样的人民委员部里，这种结合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这难道还有谁没有看到吗？为了挫败外国的计谋（姑且这样说吧），难道在政治局里没有从党的角度讨论过关于我们用什么“招数”来对付外国的“招数”这方面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吗？难道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这种灵活的结合，不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泉源吗？我想，在我们对外政策方面证明正确和确立起来的東西，已经成为惯例而在这个部门已毫无疑问的东西，对于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至少是同样适用的（而我认为是更为适用的）。工农检察院本来就是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它的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一切国家机构：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公务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总之，各机关一无例外。

对于活动范围这样广，又需要活动方式非常灵活的机关，为什么不能容许它用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呢？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障碍。而且我认为，这种结合是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我认为，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的那些落满灰尘的角落里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而对这种怀疑只有付之一笑。

还有些人怀疑：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是否合适？我觉得不但合适，而且应该。一般说来，虽然我们对西欧的国家制度采取了革命的

态度，但还是沾染上了它的许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官僚有意使我们沾染上这类偏见的，他们有意一再在这类偏见的浑水中摸鱼；他们这种浑水摸鱼的勾当已经猖狂到如此地步，我们中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

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文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迈出最勇敢的前进步伐的是早就成为理论研究对象的那个领域，是主要从理论上、甚至几乎完全从理论上耕耘过的那个领域。俄国人躲开令人厌恶的官僚制的现实，而在家里酝酿非常大胆的理论构想，因此这些非常大胆的理论构想在我们这里就具有非常大的片面性。在我们这里提出一般构想的理论勇气和在微不足道的办公制度改革上的惊人畏怯兼而有之。我们以举世无双的勇气进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极其伟大的土地革命，但在极其次要的办公制度改革上却又缺乏想象力，缺乏把在一般问题上收到“辉煌”效果的一般原理运用到这种改革上去的想象力或耐心。

因此，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凡的勇敢行动同对最微小变革的畏怯心理令人吃惊地同时并存。

我想，在任何真正伟大的革命中，也历来如此，因为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事物同改造旧事物的意向和追求新事物（要新得连一丁点旧事物也没有）的抽象愿望这种矛盾中产生的。

这种革命来得愈猛，许多这样的矛盾就会存在愈久。

现在我们生活的一般特征是这样的：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工业，曾力求完全摧毁中世纪设施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培植出小农和极小农，他们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果而跟着它走。但是我们靠这种信任一直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比较发达的国家

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小农和极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还停留在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此外，国际环境也把俄国抛回到过去的水平，我国国民劳动生产率，整个说来，现在比战前低得多。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半自觉半自发地尽一切可能把我们抛回到过去的水平，利用俄国国内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尽量破坏我国经济。当然正是这样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它们看来是最有利的：即使我们推翻不了俄国的革命制度，至少也要使它难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列强大致上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它们的角度也不能不这样考虑。结果，它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它们并没有推翻革命所创立的新制度，但是它们也不让新制度能够立刻大步前进，以证实社会主义者的预言，使他们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所有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潜力，并向所有的人直观地清楚地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前途的发展阶段。

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就是德国。其次，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那种动荡。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

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小心。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而且因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而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所谓西方的一切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啄食它，不让它抬起头来。而另一方面，拥有亿万过着极端贫困生活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整个东方已陷入这样的境地：其体力、物力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的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相比。

我们能不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呢？过去西方和东方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东方和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日本和美国营垒中的矛盾，曾使西欧反革命势力发动的援助俄国反革命势力的进攻遭到失败，现在能不能指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像过去那样，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呢？

我觉得，对这一问题应当这样来回答：这里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许许多多的情况；整个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终于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训练和培养下起来斗争了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

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但是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者说，为了自救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大量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浪费现象的痕迹铲除干净。

这岂不是会成为农民局限性的天下吗？

不会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

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工农检查院特别关心、特别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利等等，在我看来，理由就在这里。

这个理由是说，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削减机关非绝对必要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有十分把握地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我为了工农检查院而打算把一个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机关和一个“普通的”人民委员部合并起来的原因。

1923年3月2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8—392页

(1) 列宁在文中指出，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认真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革。要反对官僚主义，切实改进作风；要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现象；要大力培养优秀人才，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为此，列宁给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

[\(2\)](#) 见本书第361—365页。——编者注

重要论述摘编

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1902年1—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93页

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不应该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让千百万人民受穷。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个社会的学说就叫社会主义。

《告贫苦农民》（1903年3月1日和28日〔3月14日和4月10日〕之间），《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12页

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1918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20页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

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1919年12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6—37页

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包括最革命的时刻，都不会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性，不会放弃我们的思想体系的彻底的不妥协性。

《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1905年2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57页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这一教导不仅已经由整个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决议中正式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85页

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需要有全世界工

人的合作，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1月中旬），《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8页

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或推翻地主，——一切革命都这样做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保证建立秩序、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计算和监督，建立比过去更巩固更坚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1918年4月2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42页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一般是反对对人使用暴力的。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笼统地谈论“暴力”，而不分析那些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87页

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绝对必需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55页

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对人民群众实行军事领导以对付专制制度军事力量的残余所必需的。革命军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靠暴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暴力组织就是军事组织。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18—319页

废除武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战争，因此，废除武装将会实现。但是，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专政是直接依靠暴力的国家政权。在20世纪这个时代（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把“废除武装”写进纲领，就意味着笼统地说：我们反对使用武器。这也和假使我们说我们反对使用暴力一样，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论“废除武装”的口号》（1916年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72页

恩格斯说过：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一个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胆小的市侩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86页

到目前为止，军事一直是资本家地主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一种工具，到目前为止，整个欧洲的资本家政权还靠资产阶级军官所统率的旧军队的残部来支持。但是，一旦工人拿起枪杆子，开始建立自己的庞大的无产阶级军队，开始教育士兵，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使他

们保卫 工人、农民和工厂，不让地主和资本家重掌政权，那时，资产阶级的这个最牢固的支柱就会倒塌。

《普遍军训节讲话》（1919年5月2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73页

我们在采取和平步骤的同时，也应当全面加强我们的作战准备，绝对不能解除我们军队的武装。我们军队是使帝国主义列强丝毫不敢轻举妄动、不敢侵犯我国的切实保障，因为列强纵然可以指望起初获得某些暂时的胜利，但结果任何一国都不免被苏维埃俄国所粉碎。这是我们应当知道的，这应当成为我们鼓动和宣传的重点，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作好准备，要完成好在日益疲惫的情况下把和与战两者结合起来这一任务。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78页

我们不止一次地公开申明我们的和平愿望，申明我们需要和平，以及我们愿意向外国资本提供最慷慨的租让和保障。但是我们无意让人假借和平来扼杀我们。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有无限制的生意往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能这样做。我们并不反对使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机车和农业机器，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反对利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小麦、亚麻和白金呢？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粮食的味道同任何其他国家粮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是吗？当然，他们不得不同可怕的布尔什维克，即同苏维埃政府有生意往来。

《同美国〈世界报〉记者林肯·埃尔的谈话》（1920年2月20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65页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和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1921年4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67页

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它们沿着这条路走得愈远，今天我在1921年的工作报告中只能用一些可怜的数字向你们描绘的那种前景就会展现得愈广阔愈迅速。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32页

苏维埃政权现在所面临的管理国家这一提到首位的任务，还有一个特点：现在（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所说的管理，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通常，人们正是首先把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政治的活动同“管理”一词联系在一起。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而现在，特别是有了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存在四个多月的实际经验之后，我们应当十分清楚，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医治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恢复生产力，调整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归结为经济改造的任务。

可以说，这一任务分为两个主要项目：（1）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各种形式实行最广泛的、遍及各地的和包罗万象的计算和监督；

（2）提高劳动生产率。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集体或国家，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地造成了完成这两项任务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基本前提这种条件下，才能够解决这些任务。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22—123页

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这一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

坏了的生产这一任务上去。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否则，我们不仅支持不了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79—280页

没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完成的；如果工人阶级没有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千百万受资本主义压抑的、受尽折磨的、不识字的和分散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完成。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60页

要使农村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获得成功，就要求：第一，各国共产党教育工业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忍受牺牲和具有承担牺牲的决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和引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意味着这个先锋队也善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承担最大的牺牲和表现出英勇精神；第二，要取得成功，还要使农村中受剥削最重的劳动群众能从工人的胜利中靠剥夺剥削者来立刻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否则就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取得农村的支持，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无法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

《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年6—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76页

这里只需要弄清楚，我们大家看法最一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从我国整个革命和未来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来看，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就是经过大工厂长期艰苦而有成效的锻炼的先进工人是否能够搞好工作，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地主、被自己贫困而粗陋的旧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向他们证明，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而不管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困

难很多，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像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大厮杀那样的祸害，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奇怪的矛盾，即为数极少的几个最有钱的强国被财富噎得要死，而地球上广大的居民却贫苦不堪，无法享受现有的文明和利用那些由于流通不畅而没有出路的丰富资源。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32—333页

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是完全不适合做一个管理人员。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的全部情况，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具备的条件。

《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1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40页

要竭力做到：管理工作上花费人力最少，管理人员个个都有能力，不论是专家还是工人都要做工作，都要参加管理，如果他们不参加管理，就要被认为是犯了罪。要学习自己的实际经验，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他们善于保持自己的阶级统治，他们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经验；拒绝吸取这种经验，就是妄自尊大，就会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

《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1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41页

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应该具有吸收人才的高超能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基本的方面。不然，工作就不能做好。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他要善于做行政管理工作，并且在这方面有一个或几个得力的助手。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1922年12月27日），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6页

为了表明苏维埃政权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服务，我冒昧地说一句骤然听来似乎是奇谈怪论的话：学习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向托拉斯的领导者学习，学习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最大的组织者学习。正是大工厂，正是把对劳动者的剥削发展到空前规模的大机器工业，是唯一能够消灭资本统治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个阶级集中的中心；凡是考虑到这一点的人都不难相信，上面的说法并不是奇谈怪论。因此，当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提到日程上时，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的实际任务，我们就必须吸收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曾经从事过资本主义的最大生产的实际组织工作，首先是组织过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的人来协助苏维埃政权，这是毫不奇怪的。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3日和2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28页

必须利用现成的机构，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在理论上都懂得，经过这一年，我们更从实践中看到：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来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1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16页

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家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的工夫，有时是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检查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倒退回去，

经过多次纠正，才能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选拔出高级和低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几百年的经验和习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
（1921年1月2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86页

什么是租让呢？它是国家同资本家订立的一种合同，资本家负责安排或改进生产（如采伐和浮运木材，开采煤炭、石油和矿石等等），把所得的一部分产品交给国家，另一部分作为利润归自己所有。

苏维埃政权赶走了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而现在却把外国资本家请到俄国来，这样做对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既然其他国家的工人革命迟迟没有到来，那我们就不得不作出某些牺牲，只要能迅速改善甚至立即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所谓牺牲，就是我们要在许多年内把几千万普特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而所谓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就是我们将立即得到更多的石油、煤油、食盐、煤以及农具等等。我们没有权利不去立即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因为在我国经济破坏的情况下这是必要的，而我们并不会因为作出上述牺牲就遭到毁灭。

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租让是一种特殊的租赁合同。根据合同，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是一部分国家财产的租借者，但不是所有者。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

《留声机片录音讲话》（1921年4月2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38—239页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

《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1922年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63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现在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就是十足的空想，就是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进行建设的，是在同劳动者身上同样存在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点作斗争中进行建设的。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38页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06页

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

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99页

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维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不应当吸取旧学校的这样一种做法，即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建立不了共产主义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99页

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05页

现在已经到了同浩如烟海的公文作斗争，不信任这些公文，不信任永无休止的“改组”的时候了；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颁布法令，不是改组，而是选拔人才，建立个人对所做的工作负责的制度，检查实际工作。不这样做，就无法克服窒息着我们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

《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1922年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94页

通过对人的考核和对实际工作的检查同腐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压缩编制，撤换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工作方针就应该是这样。

《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1922年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95页

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

《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1922年3月2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4页

只要我们还处于孤立状态，落在我们肩上的恢复我国国民经济的任务就会是非常沉重的。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状况以及即使是一点一滴地恢复我们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农民和全体工人的力量，必须改进还很糟的国家机关，减少用于国家机关的经费。

《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9月1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11—212页

我们这里的机关仍是旧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改造一新。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它改造过来，但我们必须把我们现有的共产党员正确地分配好。要让这些共产党员掌握他们所在的机关，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常见的那样，让机关掌握他们。这一点用不着隐瞒，应该坦率地说出来。这就是目前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我们面临的困难，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做

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

“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1922年11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00—301页

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承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仅因为他们是最彻底的民主派。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同志般团结一致的利益要求各民族最充分的平等，以消除民族间最微小的不信任、疏远、猜疑和仇恨。

《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1914年5月10日〔2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53页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帝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41页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1918年1月7日〔20日〕—2月11日〔24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54页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12月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2页

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3页

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页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政论家札记》（1917年8月29日〔9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11页

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7月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6页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各国无产者必须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事先必须保证不会遭到失败，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迂腐气，谁就常常会在实际上滚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像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比较少见）那样。

《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55—56页

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准确地知道道路怎样走。但是我们必然会确定不移地走向共产主义。

《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报告》（1918年11月2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17页

列宁专题文集

责任编辑：郇中建

装帧统筹：曹 春

编辑助理：崔继新

技术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赵立新 徐林香 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7887-8

I. 列… II. 中… III. ①列宁著作—辩证唯物主义②列宁著作—历史唯物主义
IV. A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689 号

书 名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LIENING ZHUANTI WENJI

LUN BIANZHENGWEIWUZHUYI HE LISHIWEIWUZHUYI

编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2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7887-8

ISBN 978-7-01-007887-8



9 787010 078878 >

目 录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节选）（1908年2—10月）

第一版序言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

1. 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二）

1. “自在之物”或维·切尔诺夫对弗·恩格斯的驳斥

4. 有没有客观真理？

5.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论亚·波格丹诺夫所发现的恩格斯的折中主义

6. 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三）

1. 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

3. 自然界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5. 空间和时间

6. 自由和必然

第五章 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8. “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和意义

第六章 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 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4. 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结论

哲学笔记（节选）（1895—1916年）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批语摘选）（1914年9—12月）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批语摘选）（1915年）](#)

[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批语摘选）「《小逻辑》（《哲学全书》）的目录」（1915年）](#)

[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批语摘选）（1915年）](#)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批语摘选）（1915年）](#)

[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节选）（1894年春夏）](#)

[第一编](#)

[第三编](#)

[附录三](#)

[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

[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节选）（1911年1—2月）](#)

[纪念赫尔岑（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1913年5月5日〔18日〕）](#)

[第二国际的破产（节选）（1915年5—6月）](#)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节选）（1918年10—11月）](#)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论国家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1919年7月11日）](#)

[论妥协（1920年3—4月）](#)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节选）（1921年1月25日）](#)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

[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

[重要论述摘编](#)

[注释](#)

[返回总目录](#)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1]（节选）⁽¹⁾（1908年2—10月）

⁽¹⁾*这是列宁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思潮，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重要哲学专著。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驳斥了俄国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总结当时革命斗争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列宁揭露了马赫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实质，考察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列宁还阐明了真理的客观性以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分析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一些自然科学家没有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批驳了唯心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和“社会唯能论”，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列宁还论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实质，阐明了哲学的党性原则。

第一版序言

许多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今年在我们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真正的讨伐。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中，首先是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苏沃洛夫的论文集《关于〈？应当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2]，其次是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别尔曼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和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所有这些人都会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因敌视辩证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人（尽管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哲学上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别尔曼说，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巴扎罗夫随便一说，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看来被我们的勇士们驳倒了，他们自豪地引证“现代认识论”，引证“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论”^[3]），引证“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或者甚至引证“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我们的这些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消灭的人，以所有这些所谓最新的学说为依据，竟肆无忌惮地谈起公开的信仰主义^[1]来了（卢那察尔斯基最为明显，但决不只是他一个人！^[5]），可是到了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态时，他们的全部勇气和对自已信念的任何尊重都立即消失了。在事实上，他们完全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口头上，他们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掩饰他们的背弃行为，用某一个唯物主义者来代替整个唯物主义，根本不去直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数唯物主义言论。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正说法，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因为只有修正主义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又不敢或者是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

确地“清算”被他们抛弃的观点，才获得了这种不好的名声。正统派在反对马克思的过时见解（例如梅林反对某些历史论点^[6]）时，总是把话说得非常明确、非常详细，从来没有人在这类论著中找到过一点模棱两可的地方。

不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中也有一句近似真理的话。那句话是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也许我们（显然就是《论丛》的全体撰稿人）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第161页）这句话的前半句包含着绝对真理，后半句包含着相对真理，这一点我将在本书中力求详尽地指出来。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如果我们的哲学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是用几个“正在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讲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和对马克思主义就显得尊重些了。

至于我自己，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就是说，我在本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作 者

1908年9月

^[1]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4]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一)

1. 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他们的早期哲学著作中，直言不讳地、简单地叙述了他们的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著作，至于这些著作家后来所作的修正和删改，则留到以后论述时再去分析。

马赫在1872年写道：“科学的任务只能是：（1）研究表象之间的联系的规律（心理学）；（2）揭示感觉之间的联系的规律（物理学）；（3）阐明感觉和表象之间的联系的规律（心理物理学）。”^[1]这是十分清楚的。

物理学的对象是感觉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物或物体（我们的感觉就是它们的映象）之间的联系。1883年，马赫在他的《力学》^[2]一书中重复同样的思想：“感觉不是‘物的符号’，而‘物’倒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东西）。”^[3]

关于“要素”这个名词，这个经过12年“思考”的成果，我们在下面再讲。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马赫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承认物或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同一种相反的、认为感觉是物的“符号”（确切些说，物的映象或反映）的理论对立起来。这后一种理论就是哲学唯物主义。例如，唯物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的这位有名的合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就经常毫无例外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物及其在思想上的模写或反映（Gedanken-Abbilder），不言而喻，这些思想上的模写不是由别的，而是由感觉产生的。看起来，凡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尤其是以这种哲学的名义著书立说的人，都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观点。但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7]却造成了异乎寻常的混乱，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众所周知的东西再重复一下。翻开《反杜林

论》第1节，我们就可以读到：“……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
(4) 或者翻开哲学编第1节，那里写道：“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指一切认识的基本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在想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可又不能彻底贯彻唯物主义的杜林那里则相反〉，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它把现实的相互关系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来构造现实世界……”（同上，第21页）(5) 我们再重复一遍：恩格斯到处都毫无例外地贯彻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只要看到杜林稍微从唯物主义退向唯心主义，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任何人只要略为留心读一读《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其中恩格斯讲到物及其在人的头脑中，在我们的意识、思维中的模写等等。恩格斯并没有说感觉或表象是物的“符号”，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应该用“映象”、画像或反映来代替“符号”，关于这点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详尽的说明。我们现在谈的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任何狡辩、任何诡辩（我们还会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狡辩和诡辩）都不能抹杀一个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恩·马赫关于物即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如果物体像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像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么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我论。不管马赫、阿芬

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怎样宣布他们同唯我论无关，但事实上，如果他们不陷入惊人的逻辑谬误，就不可能摆脱唯我论。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马赫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要素，我们再从马赫的著作中作一些引证。下面就是引自《感觉的分析》（科特利亚尔的俄译本，1907年莫斯科斯基尔蒙特出版社版）的一个例证：

“我们面前有一个具有尖端S的物体。当我们碰到尖端，使它和我们的身体接触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刺痛。我们可以看见尖端，而不感觉刺痛。但是当我们感觉刺痛时，我们就会发现尖端。因此，看得见的尖端是一个恒定的核心，而刺痛是一种偶然现象，视情况不同，它可能和核心联系着，也可能不和核心联系着。由于类似现象的经常重复，最后人们习惯于把物体的一切特性看做是从这些恒定的核心中发出并通过我们身体的中介而传给自我的‘作用’；我们就把这些‘作用’叫做‘感觉’……”（第20页）

换句话说，人们“习惯于”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感觉看做物体、物、自然界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这个“习惯”对哲学唯心主义者是有害的（然而整个人类和全部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马赫非常讨厌它，于是就去摧毁它：

“……但是，这些核心因此便失去它们的全部感性内容，成为赤裸裸的抽象符号了……”

最可敬的教授先生，这是陈词滥调啊！这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贝克莱所说的物质是赤裸裸的抽象符号这句话啊！实际上，赤裸裸的正是恩斯特·马赫，因为，他既然不承认客观的、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实在是“感性内容”，那么在他那里就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抽象的”自我，一个必须大写并加上着重标记的自我，也就是“一架发了疯的、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才存在的钢琴”。既然外部世界不是我们感觉的“感性内容”，那么除了这个发表空洞“哲学”怪论的赤裸裸的自我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真是一个愚蠢的毫无结果的勾当！

“……因而，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这是正确的。但这样一来，我们所知道的也就仅仅是我们的感觉了，而关于那些核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是感觉）的假定，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了。这样的观点仅仅对不彻底的实在论或不彻底的批判主义来说才是好的。”

我们把马赫的“反形而上学的意见”的第6节全部抄下来了。这些话完全是从贝克莱那里剽窃来的。除“我们感觉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感觉”这一点以外，没有丝毫创见，没有一点思想的闪光。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仅仅由我的感觉构成。”马赫用“我们的”这个字眼来代替“我的”这个字眼，是不合理的。就在这一个字眼上，马赫暴露出了他所谴责别人的那种“不彻底性”。因为，如果关于外部世界的“假定”，关于针不依赖于我而存在以及我的身体和针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假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所有这些假定的确都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那么关于别人是存在着的这一“假定”就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了。存在的只是自我，而其余的一切人，也和整个外部世界一样，都属于没有意义的“核心”之列。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能说“我们的”感觉了，可是马赫却这样说了，这只是表明他的惊人的不彻底性。这只是证明：他的哲学是连他本人也不相信的没有意义的空话。

下面的例子特别明显地说明马赫的不彻底性和思想混乱。就在《感觉的分析》的第11章第6节里，我们读到：“假使正当我感觉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用一切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来观察我的头脑，那就可以确定一定种类的感觉和有机体中所发生的哪些过程有联系……”（第197页）

好极了！这不是说我们的感觉和整个有机体中、特别是我们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定过程有联系吗？是的，马赫十分肯定地作出了这种“假定”，因为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不作出这种“假定”是困难的。但是对不起，这正是我们这位哲学家宣布为多余的和没有意义的

关于“核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假定”！经验批判主义者对我们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马赫硬要我们相信，如果超出这一点，认为感觉是物体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那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没有意义的多余的假定等等，这和贝克莱如出一辙。但头脑是物体。就是说，头脑也不过是感觉的复合。结果是，我（我也无非是感觉的复合）依靠感觉的复合去感觉感觉的复合。多妙的哲学！先宣布感觉是“世界的真正要素”，并在这上面建立“独出心裁的”贝克莱主义，然后又偷运相反的观点，说感觉是和有机体中的一些过程有联系的。这些“过程”是否跟“有机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有联系呢？如果某一有机体的感觉不向该有机体提供关于这个外部世界的客观正确的表象，这种物质交换能够发生吗？

马赫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些麻烦的问题，而是机械地把贝克莱主义的一些片断言论和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见解掺杂在一起……马赫在同一节里写道：“有时候人们也提出‘物质’（无机的）是否也有感觉的问题……”这不是说有机物质具有感觉是不成问题了吗？这不是说感觉并非什么第一性的东西，而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吗？马赫越过了贝克莱主义的一切荒谬之处！……他说：

“从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出发，这个问题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按照这种物理学观念，物质是直接的、无疑地存在着的实在的东西，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是由它构成的……”我们要好好记住马赫的这个确实有价值的自供：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认为物质是直接的实在，而且只有这种实在的一个变种（有机物质）才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感觉特性……马赫继续写道：“那么在这样的场合下，感觉应当是在物质所构成的大厦中不知怎么地突然产生的，或者应当是存在于所谓这个大厦的基础本身中。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根本是荒谬的。对我们来说，物质不是第一性的东西。这种第一性的东西只是要素（要素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叫做感觉）……”

这样说来，感觉是第一性的东西了，尽管它只和有机物质中的一些过程有“联系”！当马赫说这种荒唐话时，仿佛是在责难唯物主义（“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说它没有解决感觉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问题。这是信仰主义者及其喽啰们“驳斥”唯物主义的例证。难道有什么其他哲学观点能够在解决问题所需的材料还没有充分收集起来的时候就“解决”问题吗？马赫自己在同一节中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他说：“当这个任务（即解决“感觉在有机界里扩展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特殊场合下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时，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区别，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归结如下：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以明显形式表现出来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例如，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英国生物学家劳埃德·摩根等人的假定就是这样，至于我们上面所讲的狄德罗的猜测就更不用说了。马赫主义坚持相反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于是就马上陷入荒谬之中。因为，第一，它不顾感觉只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的一些过程相联系这一事实，把感觉当做第一性的东西；第二，除了那个大写的自我之外，它假定存在着其他生物和其他“复合”，这就破坏了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一基本前提。

“要素”这个字眼被许多天真的人看成（我们以后会看到）一种新东西、一种发现，其实“要素”是一个什么也不能说明的术语，它只是把问题弄糊涂，只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种假象所以虚妄，是因为：对于那种看来完全没有感觉的物质，跟那种由同样原子（或电子）构成但却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感觉能力的物质如何发生联系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再研究。唯物主义明确地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从而促进这一问题的解

决，推动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实验研究。马赫主义，即一种混乱的唯心主义，却用“要素”这个空洞的狡辩的辞令把问题弄糊涂，使它离开正确的途径。

下面的一段话引自马赫的最后一部带有综合性和结论性的哲学著作，这段话表明了这种唯心主义怪论的全部虚伪性。在《认识和谬误》中，我们读到：“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aufzubauen）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但不能设想（ist keine Möglichkeit abzusehen），任何心理体验怎么可以由现代物理学所使用的要素即质量和运动（处在仅仅对这门特殊科学有用的那种僵化状态——Starrheit——的要素）构成（darstellen）。”[\(6\)](#)

关于许多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概念的僵化，关于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按马克思主义对这个词的理解，即反辩证法的）观点，恩格斯曾经不止一次十分明确地讲到过。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马赫正是在这点上走入了歧途，因为他不懂得或者不知道相对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所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要在这里指出：尽管马赫使用了混乱的、似乎是新的术语，但他的唯心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你们看，由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是的，这样的构成当然是没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纯粹字面上的构成，是偷运信仰主义的空洞的经院哲学。因此，马赫把他的著作献给内在论者，而最反动的哲学唯心主义的信徒内在论者又来拥抱马赫，这就不足为奇了。恩斯特·马赫的“最新实证论”只是迟了约200年，因为贝克莱早已充分地表明：“由感觉即心理要素”所能“构成”的不是别的，只是唯我论。至于说到唯物主义（马赫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和明确地把它叫做“敌人”，然而在这里也把自己的观点和它对立起来），我们从狄德罗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唯物主义者的真正观点了。这种观点不在于从物质的运动中引出感觉或者把感觉归结为物质的运动，而在于承认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一种特性。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狄德罗的观点。顺便提一下，恩格斯所以和“庸

俗”唯物主义者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划清界限，就是因为他们迷惑于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大脑分泌思想正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而经常把自己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的马赫，当然也会完全像其他一切御用哲学的御用教授一样，无视一切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

为了说明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要谈一谈1876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独立的哲学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纯粹经验批判绪论》）。波格丹诺夫在他的《经验一元论》（1905年第2版第1卷第9页注释）中说道：“在马赫的观点的发展中，哲学唯心主义是出发点，而阿芬那留斯的特点则在于他一开始就有实在论的色彩。”波格丹诺夫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信了马赫的话，见《感觉的分析》俄译本第288页。但是波格丹诺夫枉然相信了马赫，他的论断也就完全违反了事实的真相。相反地，阿芬那留斯的唯心主义在上述1876年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连阿芬那留斯本人在1891年也不得不承认这点。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的序言中说：“谁读了我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谁马上就会推测到：我是企图首先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去阐明《纯粹经验批判》一书中的问题的”（《人的世界概念》1891年版序言第IX页），但是“哲学唯心主义的无效”，使我“怀疑我以前所走的道路的正确性”（第X页）。在哲学文献中，阿芬那留斯的这个唯心主义出发点是大家所公认的。从法国著作家中，我可以举出科韦拉尔特，他说阿芬那留斯在《绪论》^{[\(7\)](#)}中的哲学观点是“一元论唯心主义”^{[\(8\)](#)}；从德国著作家中，我可以举出阿芬那留斯的学生鲁道夫·维利，他说：“阿芬那留斯在青年时代，特别是在他的1876年的著作中，完全处在所谓认识论唯心主义的影响之下（ganz im Banne）。”^{[\(9\)](#)}

如果否认阿芬那留斯的《绪论》中的唯心主义，那的确是可笑的，因为他在那里直言不讳地说：“只有感觉才能被设想为存在着的

东西。”（德文第2版第10页和第65页，引文中的黑体都是我用的）阿芬那留斯自己就是这样来叙述他的著作第116节的内容的。这一节的全文如下：“存在着的东西（das Seiende）被认为是有感觉能力的实体；实体消失了（你们看，设想“实体”不存在，设想什么外部世界都不存在，是“更经济些”，“费力更小些”！）……而感觉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当把存在着的東西设想为感觉，在它的基础中没有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nichts Empfindungsloses）。”

于是，感觉可以不要“实体”而存在，也就是说，思想可以不要头脑而存在！难道真的会有替这种无头脑的哲学作辩护的哲学家吗？有的，理查·阿芬那留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关于这样的辩护，尽管正常的人很难认真地去对待它，但我们却不能不稍微谈一谈。下面就是阿芬那留斯在同书第89—90节中的议论：

“……运动引起感觉这个论点，仅仅是以一种假象的经验为根据的。这种包括知觉这一行为在内的经验似乎就在于：感觉是由于传来的运动（刺激）并在其他物质条件（例如血液）的协助下而在某种实体（大脑）中产生的。尽管这个产生过程从来也没有人直接（selbst）体验过，但是为了使设想的经验成为各部分都是真实的经验，至少必须用经验的证据来证明：那种似乎由传来的运动在某一实体中所引起的感觉，不是早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这个实体中的；因此，只能把感觉的出现理解为传来的运动的一种创造作用。于是，只有证明在现在出现感觉的地方以前没有任何感觉，甚至没有最低级的感觉，才能确定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表示某种创造作用，因而同其余的全部经验相矛盾，并且根本改变其余的全部自然观（Naturanschauung）。但是任何经验都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明，而且任何经验都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明；相反地，实体在具有感觉之前的那种根本没有感觉的状态，只不过是一种假说而已。这样的假说不是使我们的认识简单明白，而是使我们的认识复杂模糊。

如果这种所谓的经验（即感觉似乎是通过传来的运动而在实体中产生的，而实体从这时起才开始具有感觉）在仔细的考察下原来只是假象的经验，那么，或许在残存的经验内容中还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肯定感觉至少相对地起源于运动的条件，就是说，可以肯定现有的然而潜伏的、或者最低级的、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没有被我们意识到的感觉，由于传来的运动而解放出来了，或者上升了，或者被意识到了。然而，这一点残存的经验内容也只是一种假象。假使我们用一种理想的观察方法去探究从运动着的实体A中发出并经过一系列媒介中心而传达到有感觉能力的实体B的运动，那么我们至多能发现实体B中的感觉在接受传达到的运动的同时便发展或上升起来，但是我们不会发现这是由于运动而产生的……”

我们特意把阿芬那留斯驳斥唯物主义的这段话全部摘录下来，使读者可以看到“最新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在玩弄着多么可怜的诡辩。我们现在把唯心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的议论和波格丹诺夫的唯物主义的议论……比较一下，就算是对波格丹诺夫背叛唯物主义的一个惩罚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整整9年以前，当波格丹诺夫一半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即绝大多数现代自然科学家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只有一半被糊涂人奥斯特瓦尔德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他写道：“从古代到现在，记述心理学一直把意识的事实分为三类：感觉和表象的领域、情感的领域以及冲动的领域……属于第一类的是外部世界或内部世界的现象在意识中如实出现的映象……这样的映象，如果是直接由与它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经过外部感觉器官引起的，就叫做‘感觉’。”⁽¹⁰⁾稍后几页写道：“感觉……在意识中的产生，是通过外部感觉器官传来的外部环境的某种刺激的结果。”

（第222页）又写道：“感觉是意识生活的基础，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第240页）“在感觉过程的每一步上，都发生着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第133页）甚至在1905年，当波格丹诺夫

在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的善意的协助下，在哲学上已经从唯物主义观点转到唯心主义观点时，他（由于健忘！）还在《经验一元论》中写道：“大家知道，外部刺激力在神经末梢器官中变为‘电报’形式的神经流，这种形式的神经流虽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丝毫没有神秘性。这样的刺激力首先到达分布在神经节、脊髓、皮质下神经中枢等所谓‘低级’中枢里面的神经原。”（1905年第2版第1卷第118页）

任何一个没有被教授哲学弄糊涂的自然科学家，也和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一样，都认为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这种转化每个人都看到过千百万次，而且的确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做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做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做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做“唯一存在的东西”。阿芬那留斯只是把这种早已被贝克莱主教用滥了的旧诡辩在形式上略微改变了一下。既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每分钟所看到的感受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之间的联系的一切条件，因此我们承认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着的，阿芬那留斯的诡辩就是如此。

为了结束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的唯心主义前提的评述，我们简略地提一下这一哲学流派在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关于英国人卡尔·毕尔生，马赫直言不讳地说：“我和他的认识论的（*erkenntniskritischen*）观点在一切主要点上是一致的。”（《力学》上引版本第IX页）卡·毕尔生也表示他和马赫是一致的。⁽¹¹⁾在毕尔生看来，“实物”就是“感性知觉”（*sense impressions*）。他宣称，凡是承认在感性知觉之外有物的存在的，都是形而上学。毕尔生最坚决地攻击唯物主义（尽管他既不知道费尔巴哈，也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的论据与上面所分析过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毕尔生却一点也不想冒充唯物主义者（这是俄国马赫主义者的特长），他如此地……不谨慎，竟不替自己的哲学想出“新的”称号，而直截

了当地宣布他和马赫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上引版本第326页）！毕尔生认为自己的家谱是直接从贝克莱和休谟那里续来的。我们在下文中将不止一次地看到，毕尔生的哲学按其完整性和思考的周密性来说，大大地超过了马赫的哲学。

马赫特地表示自己是同法国物理学家皮·杜恒和昂利·彭加勒一致的^[12]。关于这些著作家的特别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哲学观点，我们在论新物理学的那一章中再讲。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彭加勒认为物是“感觉群”^[13]，而杜恒也顺便说过类似的观点^[14]。

现在我们来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承认他们的最初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之后，又怎样在以后的著作中修改这些观点。

^[1]恩·马赫《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1年11月15日在波希米亚皇家科学学会上的讲演）1872年布拉格版第57—58页。

^[2]即《力学发展的历史评述》。——编者注

^[3]恩·马赫《力学发展的历史评述》1897年莱比锡第3版第473页。

^[4]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904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编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74页。——编者注

^[6]恩·马赫《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第12页注释。

^[7]即《纯粹经验批判绪论》。——编者注

^[8]弗·万科韦拉尔特《经验批判主义》，载于1907年2月《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8]第51页。

^[9]鲁道夫·维利《反对学院智慧。哲学批判》1905年慕尼黑版第170页。

^[10]亚·波格丹诺夫《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216页。

^[11]卡尔·毕尔生《科学入门》1900年伦敦第2版第326页。

^[12]《感觉的分析》第4页。参看《认识和谬误》第2版序言。

^[13]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1905年巴黎版，有俄译本，散见各处。

^[14]参看皮·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1906年巴黎版第6、10页。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二)

1. “自在之物”或维·切尔诺夫对弗·恩格斯的驳斥

关于“自在之物”，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写了好多东西，如果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真是堆积如山。“自在之物”对于波格丹诺夫和瓦连廷诺夫，巴扎罗夫和切尔诺夫，别尔曼和尤什凯维奇来说，真是怪物。他们对“自在之物”用尽了“恶言秽语”，使尽了冷嘲热讽。为了这个倒霉的“自在之物”，他们究竟同谁战斗呢？在这里，俄国的马赫主义哲学家就按政党分化了。一切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都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谴责他糊涂和陷入康德主义，谴责他背弃恩格斯（关于前一个谴责，我们把它放到第四章里去讲；关于后一个谴责，我们就在这里谈）。民粹派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死敌、马赫主义者维·切尔诺夫先生，为了“自在之物”直接攻击恩格斯。

这一次，由于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公开地仇视马克思主义，因而他同在党派上是我们的同志而在哲学上是我们的反对派的那些人比较起来，是较有原则的论敌^[9]，承认这一点令人羞愧，可是隐瞒它却是罪过。因为只有不干净的心地（也许再加上对唯物主义的无知？）才会使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圆滑地撇开恩格斯，根本不理费尔巴哈，而专门围着普列汉诺夫兜圈子。这正是纠缠，正是无聊而又琐碎的吵闹，正是对恩格斯的学生吹毛求疵，而对老师的见解却胆怯地避免作直接分析。由于我们这个简略评述的任务是要指出马赫主义的反动性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不谈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的吵闹，而直接谈论经验批判主义者维·切尔诺夫先生所驳斥的恩格斯。在切尔诺夫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除少数几篇之外，都是在1900年以前写的）里，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先验哲学》的文章，它一开始就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谴责恩格斯的学说是“素朴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是“最粗陋

的唯物的独断主义”（第29、32页）。维·切尔诺夫先生说，恩格斯反对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谟的哲学路线的议论就是“充分的”例证。我们就从这个议论谈起吧。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宣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基本派别。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它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把思维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却相反。恩格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的哲学家所分成的“两大阵营”之间的这一根本区别提到首要地位，并且直截了当地谴责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词的那些人的“混乱”。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接着他又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1\)](#)

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包括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例如，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某种永恒的“绝对观念”的体现，而且人类精神在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现实世界认识“绝对观念”。

“但是，此外〈即除了唯物主义者 and 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2\)](#)

维·切尔诺夫先生在引了恩格斯的这些话之后，就拼命加以攻击。他给“康德”这个名词作了以下的注释：

“在1888年，把康德、特别是休谟这样的哲学家叫做‘近代’哲学家，是相当奇怪的。在那个时候，听到柯亨、朗格、黎尔、拉斯、李普曼、戈林等人的名字更自然一些。看来，恩格斯在‘近代’哲学方面不怎么行。”（第33页注释2）

维·切尔诺夫先生是始终如一的。不论在经济问题上还是在哲学问题上，他都跟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伏罗希洛夫^[10]一样，简单地抬出一些“学者的”名字，一会儿用来消灭不学无术的考茨基⁽³⁾，一会儿用来消灭无知的恩格斯！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被切尔诺夫先生提到的权威，就是恩格斯在《路·费尔巴哈》的同一页上讲到的那些新康德主义者^[11]，恩格斯把他们看做是企图使早已被驳倒的康德和休谟学说的僵尸重新复活的理论上的反动分子。好样儿的切尔诺夫先生不懂得，恩格斯在自己的议论中所要驳斥的正是这些（在马赫主义看来是）权威的糊涂教授们！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已经提出了反对休谟和康德的“决定性的”论据，费尔巴哈在这些论据上补充了一些与其说深刻不如说机智的见解，接着恩格斯继续说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或谬论，Schrullen）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理解的，unfaßbaren——这个重要的词在普列汉诺夫的译文里和维·切尔诺夫先生的译文里都漏掉了）‘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上引书第16页）⁽⁴⁾

维·切尔诺夫先生引完这段议论，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要彻底消灭可怜的恩格斯。请听：“可以‘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茜素^[12]，这当然是任何新康德主义者都不会觉得奇怪的。但是，在提炼茜素的同时可以用同样便宜的方法从同样的煤焦油里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真是了个了不起的闻所未闻的发现，当然，这样看的不仅是新康德主义者。”

“显然，恩格斯知道了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于是他就把这个定理改成逆定理，断言一切未被认识的东西都是自在之物……”（第33页）

马赫主义者先生，请你听着，胡扯也要有个限度！你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歪曲上面引证的恩格斯的那段话，甚至你不懂得这儿说的是什么，就想去“捣毁”它！

第一，说恩格斯“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是不对的。恩格斯曾经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过：他驳斥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把恩格斯关于物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搞乱了。第二，如果康德的定理说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那么“逆”定理应当说不可认识的东西是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却用未被认识的代替了不可认识的，他不理解由于这样一代替，他又把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搞乱和歪曲了！

维·切尔诺夫先生被他自己所奉为指导者的那些御用哲学的反动分子弄得糊里糊涂，他根本不了解自己所引用的例子便大叫大嚷地反对恩格斯。我们不妨向这位马赫主义的代表说清楚，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他既反对休谟，又反对康德。但是休谟根本不谈什么“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那么这两个哲学家有什么共同点呢？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但是，休谟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在之物”，他认为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在哲学上

就是不可容许的，是“形而上学”（像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而康德则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不过宣称它是“不可认识的”，它和现象有原则区别，它属于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即属于知识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发现的“彼岸”（Jenseits）领域。

恩格斯的反驳的实质是什么呢？昨天我们不知道煤焦油里有茜素，今天我们知道了。试问，昨天煤焦油里有没有茜素呢？

当然有。对这点表示任何怀疑，就是嘲弄现代自然科学。

既然如此，那么由此就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

（1）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因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样，我们昨天关于这个存在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没有从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觉，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2）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屏障把我们同关于某一部分尚未认识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Schrulle）、狡辩、捏造。

（3）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

只要你们抱着人的认识是由不知发展起来的这一观点，你们就会看到：千百万个类似在煤焦油中发现茜素那样简单的例子，千百万次从科学技术史中以及从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得来的观察，都在向人表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都在表明，当我们的感官受到来自外部的某些对象的刺激时，“现象”就产生，当某种障碍物使得我们所明明知道是存在着的对象不可能对我们的感官发生作

用时，“现象”就消失。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与此相反的马赫的理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是可鄙的唯心主义胡说。而切尔诺夫先生在他对恩格斯的“分析”中再一次暴露出他的伏罗希洛夫式的品质：恩格斯举的简单例子在他看来竟是“奇怪而又幼稚的”！他认为只有学究的臆说才是哲学，他不能区别教授的折中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至于切尔诺夫先生往后的全部议论，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去分析它们，因为它们都是同样狂妄的胡说（譬如他说：原子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自在之物！）。我们只须指出一个和我们题目有关的（并且看来迷惑了某些人的）对马克思的议论：马克思似乎跟恩格斯不同。这里讲的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以及普列汉诺夫对此岸性（Diesseitigkeit）这个词的译法。

下面就是提纲第2条：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⁵⁾

普列汉诺夫不是译成“证明思维的此岸性”（直译），而是译成证明思维“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于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就大叫大嚷地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矛盾被异常简单地排除了”，“结果马克思似乎和恩格斯一样，也肯定了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彼岸性了”（上述著作第34页注释）。

请同这位每说一句话就增加好多糊涂思想的伏罗希洛夫打一次交道吧！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不知道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这就是无知。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跳

过这一条的第一句话，不想一想思维的“对象的真理性”（gegenständliche Wahrheit）无非是指思维所真实反映的对象（=“自在之物”）的存在，这就是无知或极端的马虎。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断言似乎可以从普列汉诺夫的转述（普列汉诺夫只是转述而不是翻译）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拥护思维的彼岸性，这也是无知。因为只有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才使人的思维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一切唯物主义者，其中包括贝克莱主教所攻击的17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见《代绪论》），都认为“现象”是“为我之物”，或者是“自在客体”的复写。当然，那些想知道马克思的原文的人是不一定需要普列汉诺夫的自由转述的，但是必须细心推敲马克思的言论，而不应该伏罗希洛夫式地卖弄聪明。

有一种情况指出来是有意思的：我们发现一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不愿意或不能够细心推敲马克思的《提纲》，而一些资产阶级著作家、哲学专家，有时候倒比较认真。我知道这样一个著作家，他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且为此还探讨了马克思的《提纲》。这个著作家就是阿尔伯·莱维，他在自己写的有关费尔巴哈的著作的第2部分第3章里专门研究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⁶⁾。我们不谈莱维是否在每一个地方都正确地解释费尔巴哈以及他如何用通常的资产阶级观点去批判马克思，我们只举出他对马克思的著名《提纲》的哲学内容的评价。关于提纲的第1条，阿·莱维说道：“一方面，马克思和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都承认，同我们关于物的表象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单独的（独立的，distincts）客体……”

读者可以看到，阿尔伯·莱维一下子就清楚了：承认我们表象与之“相符合的”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是任何唯物主义、“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这种关于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知识，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不知道。莱维继续说道：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遗憾的是：唯物主义曾经让唯心主义去评价能动力（即人的实践）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些能动力从唯心主义手中夺过来，也把它们引入唯物主义的体系，但是，当然必须把唯心主义不能承认的那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特性给予这些能动力。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是这样的：正像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一样，同我们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活动、物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不仅是通过理论认识而且还通过实践活动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样，整个人类活动就获得了一种使它可以同理论并驾齐驱的价值和尊严。革命的活动从此就获得形而上学的意义……”

阿·莱维是一个教授。而一个循规蹈矩的教授不会不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在唯心主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的教授们看来，任何唯物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因为它在现象（为我之物）之外还看到我们之外的实在；因此，当阿·莱维说马克思认为同人类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的是“物的活动”，即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的时候，他的话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实践标准在马赫和马克思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在适当地方（第6节）将详细地加以说明。“人类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就是说：人的认识反映绝对真理（见下面第5节），人类的实践检验我们的表象，确证其中与绝对真理相符合的东西。阿·莱维继续说道：

“……马克思谈到这点时，自然会遭到批驳。他承认自在之物是存在的，而我们的理论是对自在之物的翻译。他就不能避开通常的反驳：究竟什么东西向你保证这种翻译是正确的呢？什么东西证明人的思想给你提供客观真理呢？对于这种反驳，马克思在提纲第2条中作了答复。”（第291页）

读者可以看到，阿·莱维一分钟也没有怀疑马克思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

[\[1\]](#) 弗·恩格斯《路·费尔巴哈》德文第4版第1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1页。——编者注）。1905年日内瓦俄译本第12—13页。维·切尔诺夫先生把Spiegelbild译做“镜中的反映”，责怪普列汉诺夫“以十分无力的方式”表达恩格斯的理论，因为在他的俄译本里只说“反映”，而不说“镜中的反映”。这是吹毛求疵。Spiegelbild这个词在德文里也只是当做Abbild（反映、模写、映象。——编者注）来使用的。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编者注

[\[3\]](#) 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第195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0页。——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222页。——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编者注

[\[6\]](#) 阿尔伯·莱维《费尔巴哈的哲学及其对德国著作界的影响》1904年巴黎版第249—338页（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第290—298页（对《提纲》的分析）。

4. 有没有客观真理？

波格丹诺夫宣称：“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包括对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的否定，对任何永恒真理的否定。”（《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IV—V页）什么叫绝对客观性呢？波格丹诺夫在同一个地方说，“永恒真理”就是“具有绝对意义的客观真理”，他只同意承认“仅仅在某一时代范围内的客观真理”。

在这里显然是把下面两个问题搞混了：（1）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2）如果有客观真理，那么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

波格丹诺夫明确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根本否认绝对真理，并且因恩格斯承认绝对真理而非难恩格斯搞折中主义。关于亚·波格丹诺夫发现恩格斯搞折中主义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另行论述。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波格丹诺夫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但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否定人的某些表象中的相对性因素，可以不否定客观真理；但是否定绝对真理，就不可能不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

稍后，波格丹诺夫在第IX页上写道：“……别尔托夫所理解的客观真理的标准是没有的；真理是思想形式——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

这里和“别尔托夫的理解”毫无关系，因为这里谈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根本不涉及别尔托夫。这和真理的标准也毫无关系，关于真理的标准要另行论述，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和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混为一谈。波格丹诺夫对后一问题的否定的回答是明显的：如果真理只是思想形式，那就是说，不会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

赖于人类的真理了，因为除了人类的思想以外，我们和波格丹诺夫都不知道别的什么思想。从波格丹诺夫的后半句话来看，他的否定的回答就更加明显了：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形式，那就是说，不会有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不会有客观真理了。

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就是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这种否定的荒谬，即使从前面所举的一个自然科学真理的例子来看，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真理，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是不容许怀疑的。这一点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完全符合的：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客观真理。自然科学的这个原理同马赫主义者的哲学以及他们的真理学说，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地球存在于任何人类经验之外的论断就不可能是真理了。

但是不仅如此。如果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天主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真理了。因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波格丹诺夫本人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的这种惊人的谬误，我们来看看他怎样企图从他所陷入的泥坑中爬出来，倒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里读到：“客观性的基础应该是在集体经验的范围内。我们称之为客观的，是这样一些经验材料，它们对于我们和别人都具有同样的切身意义，不仅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毫无矛盾地组织自己的活动，而且我们深信，别人为了不陷于矛盾也应该以它们为根据。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所有的人说来都是存在的（不对！它是不依赖于“所有的人”而存在的），并且我深信，它对于所有的人，就像对于我一样，具有同样确定的意义。物理系列的客观性就是它的普遍意义。”（第25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所遇见的那些物理物体的客观性，归根到底是确立在不同人的意见的相互验证和一致的基础

上的。总之，物理世界是社会地一致起来的、社会地协调起来的经验，一句话，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第36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

这是根本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定义；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类经验而存在的；在不可能有人类经验的任何“社会性”和任何“组织”的时候，物理世界就已经存在了，等等。关于这些我们不再重复了。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揭穿马赫主义哲学：它给客观性下这样的定义，就会使宗教教义也适合这个定义了，因为宗教教义无疑地也具有“普遍意义”等等。再听一听波格丹诺夫往下说吧！“我们再一次提醒读者：‘客观’经验决不是‘社会’经验……社会经验远非都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它总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因而它的某些部分和其他一些部分是不一致的。鬼神可以存在于某个民族或民族中某个集团（例如农民）的社会经验范围之内，但还不能因此就把它包括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或客观的经验之内，因为它们和其余的集体经验不协调，并且不能列入这种经验的组织形式中，例如，因果性的链条中。”（第45页）

波格丹诺夫自己“不把”关于鬼神等等的社会经验“包括”在客观经验之内，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以否定信仰主义的精神来作出的这种善意修正，丝毫没有改正波格丹诺夫的整个立场的根本错误。波格丹诺夫给客观性和物理世界所下的定义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宗教教义比科学学说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人类的大部分至今还信奉宗教教义。天主教由于许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是“社会地组织起来、协调起来和一致起来的”；它无可争辩地可以“列入”“因果性的链条”中，因为宗教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在现代条件下宗教得到人民群众的信奉，决不是偶然的，而哲学教授们迎合宗教的意旨，也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如果说这种无疑具有普遍意义的和无疑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宗教的经验与科学的“经验”“不协调”，那么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的根本的差别，而波格丹诺夫在否认

客观真理时却把这种差别抹杀了。无论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说信仰主义或僧侣主义是和科学不协调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毕竟是无可怀疑的，即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和信仰主义完全“协调”的。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对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么一切信仰主义就无条件地被否定了。如果没有客观真理，真理（也包括科学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这就是承认僧侣主义的基本前提，替僧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为宗教经验的“组织形式”开拓地盘。

试问：这种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出自不肯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本人呢，还是出自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如果世界上只存在着感觉（1876年阿芬那留斯是这样说的），如果物体是感觉的复合（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是这样说的），那么就很明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哲学主观主义，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如果把感觉叫做“要素”，这种“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构成物理的东西，在另一种联系上构成心理的东西，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并没有因此被否定，而只是被搞乱。阿芬那留斯和马赫都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因此，他们都抱着经验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或感觉论（一切知识来自感觉）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只会导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别，而不会排除它们之间的差别，不管你们给这种观点套上什么“新”字眼（“要素”）的服饰。无论唯我论者即主观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贝克莱和狄德罗都渊源于洛克。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马赫承认了第一个前提，但是搞乱了第二个重要前提：人通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从感觉出发，

可以沿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沿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在第一种观点（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在第二种观点（唯物主义）看来，承认客观真理是最要紧的。这个哲学上的老问题，即关于两种倾向的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关于从经验论和感觉论的前提中得出两种可能的结论的问题，马赫并没有解决，也没有排除或超越，他只是玩弄“要素”这类名词，把问题搞乱。波格丹诺夫否定客观真理，这是整个马赫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离开马赫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路·费尔巴哈》中，把休谟和康德叫做“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哲学家。因而恩格斯提到首要地位的是休谟和康德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的分歧点。同时他又指出：“对驳斥这一〈休谟的和康德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德文第4版第15—16页）⁽¹⁾因此，指出黑格尔讲的下面一段话，在我看来不是没有意思的。黑格尔在宣称唯物主义是“彻底的经验论体系”时写道：“在经验论看来，外部东西（das Äußerliche）总是真实的；即使经验论容许某种超感觉的东西，那也否认这种超感觉的东西的可知性（soll doch eine Erkenntnis desselben（d. h. des Übersinnlichen）nicht statt finden können），经验论认为必须完全遵循属于知觉的东西（das der Wahrnehmung Angehörige）。而这个基本前提经过彻底的发展（Durchführung），便产生了后来所谓的唯物主义。在这种唯物主义看来，物质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das wahrhaft Objektive）。”⁽²⁾

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不论你是否承认自在之

物的可知性和时间、空间、因果性的客观性（像康德那样），还是不容许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像休谟那样），反正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经验论、经验哲学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你否定经验中的客观内容，否定经验认识中的客观真理。

康德和休谟路线的维护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包括在休谟路线的维护者之内，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贝克莱主义者）把我们唯物主义者叫做“形而上学者”，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在经验中感知的客观实在，承认我们感觉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泉源。我们唯物主义者，继恩格斯之后，把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叫做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定客观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不可知论者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在希腊文里 α 是不的意思， $gnosis$ 是知的意思。不可知论者说：我不知道是否有我们的感觉所反映、模写的客观实在；我宣布，要知道这点是不可能的（见上面恩格斯关于不可知论者的立场的叙述）。因此，不可知论者就否定客观真理，并且小市民式地、庸俗地、卑怯地容忍有关鬼神、天主教圣徒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教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自命不凡地提出“新”术语、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却是糊涂地混乱地重复不可知论者的回答：一方面，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纯粹的主观主义、纯粹的贝克莱主义），另一方面，如果把感觉改名为要素，那就可以设想它们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官而存在的！

马赫主义者喜欢唱这样一种高调：他们是完全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的哲学家，他们认为世界确实像显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样，是充满着声音、颜色等等的，而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死的，世界没有声音和颜色，它本身和它的显现不同，等等。例如，约·彼得楚尔特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和《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1906）里面唱的都是这类高调。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对这一“新”思想称赞不已，他跟着彼得楚尔特喋喋不休地重复这种论调。其实，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实在是我

们感觉的泉源。他们不把感觉看做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相反地，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比它的显现更丰富、更生动、更多样化，因为科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会发现它的新的方面。唯物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客观实在的映象，所谓最终的，并不是说客观实在已经被彻底认识了，而是说除了它，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客观实在。这种观点不仅坚决地堵塞了通向一切信仰主义的大门，而且也堵塞了通向教授的经院哲学的大门。这种经院哲学不是把客观实在看做我们感觉的泉源，而是用成套臆造的字眼来“推演出”客观的这一概念，认为客观的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等等，它不能够而且也往往不愿意把客观真理和关于鬼神的教义分开。

马赫主义者对“独断主义者”即唯物主义者的“陈腐”观点轻蔑地耸耸肩膀，因为唯物主义者坚持着似乎已被“最新科学”和“最新实证论”驳倒了的物质概念。关于物质构造的新物理学理论，我们将另行论述。但是，像马赫主义者那样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电子）的新特性和认识论的老问题，即关于我们知识的泉源、客观真理的存在等等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有人对我们说，马赫“发现了世界要素”：红、绿、硬、软、响、长等等。我们要问：当人看见红，感觉到硬等等的时候，人感知的是不是客观实在呢？这个老而又老的哲学问题被马赫搞乱了。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不是客观实在，那么你们就必然和马赫一起陷入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你们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内在论者即哲学上的缅施科夫式人物的拥抱。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是客观实在，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关于这种客观实在的哲学概念，而这个概念很早很早以前就制定出来了，这个概念就是物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因此，如果说这个概念会“陈腐”，就是小孩子的糊涂话，就是无聊

地重复时髦的反动哲学的论据。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宗教和科学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否定客观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超感觉知识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

接受或抛弃物质概念这一问题，是人对他的感官的提示是否相信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认识的泉源的问题。这一问题从一开始有哲学起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教授小丑们可以千方百计地把这个问题改头换面，但是它正如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是否是人的认识的泉源这个问题一样，是不会陈腐的。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只引证费尔巴哈以及两本哲学入门书里的话，以便读者可以看清楚，这是一个多么起码的问题。

路·费尔巴哈写道：“否认感觉是客观救世主的福音、通告（Verkündigung），这多么无聊。”^[3]你们可以看到，这是稀奇古怪的术语，然而却是一条十分鲜明的哲学路线：感觉给人揭示客观真理。“我的感觉是主观的，可是它的基础〈或原因，Grund〉是客观的。”（第195页）请把这句话同上面引证过的那段话比较一下，在那段话里费尔巴哈说过，唯物主义是从感性世界，即最终的（ausgemachte）客观真理出发的。

在弗兰克的《哲学辞典》^[4]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感觉论是“把认识归于感觉，从感觉的经验中”引出我们的一切观念的学说。感觉论分为主观的感觉论（怀疑论和贝克莱主义）、道德的感觉论（伊壁鸠鲁主义^[14]）和客观的感觉论。“客观的感觉论是唯物主义，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物质或物体是能够作用于我们感官（atteindre nos sens）的唯一客体。”

施韦格勒在他的《哲学史》中说：“既然感觉论断言只有依靠感官才能感知真理或存在物，那么只要〈指18世纪末的法国哲学〉客观

地表述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唯物主义的论点：只有感性的东西是存在着的；除了物质的存在，没有别的存在。”^[5]

这就是写进教科书的一些起码的真理，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把它们忘记了。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编者注

^[2]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黑格尔全集》1843年版第6卷第83页，参看第122页。

^[3]《费尔巴哈全集》1866年版第10卷第194—195页。

^[4]《哲学辞典》1875年巴黎版。

^[5]阿尔伯特·施韦格勒博士《哲学史纲要》第15版第194页。

5.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论亚·波格丹诺夫所发现的恩格斯的折中主义

波格丹诺夫的这一发现写在1906年《经验一元论》第3卷的序言中。波格丹诺夫写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说的意思，同我刚才所说明的真理相对性的意思差不多”（第V页），就是指否定一切永恒真理，“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恩格斯的错误就在于不坚决果断，就在于他透过自己的全部讥讽言论，流露出对某些尽管是可怜的‘永恒真理’的承认。”（第VIII页）“在这里，只有不彻底性才会容许像恩格斯所作的那些折中主义的保留……”（第IX页）现在我们来举出波格丹诺夫如何反驳恩格斯的折中主义的一个例子。为了向杜林说明，凡是奢望在历史科学中发现永恒真理的人会局限于哪些东西，会满足于哪些“陈词滥调”（Plattheiten），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永恒真理”这一章）里说到“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于是波格丹诺夫反驳恩格斯说：“这是什么‘真理’啊？它有什么‘永恒的’呢？确证对于我们这一代大概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个别关系，这不能作为任何活动的出发点，而且也不会引导我们到达任何地方。”（第IX页）他在第VIII页上还说：“难道‘陈词滥调’可以叫做‘真理’吗？难道‘陈词滥调’是真理吗？真理就是经验的生动的组织形式。它在我们的活动中引导我们到达某个地方，它在生活斗争中提供支撑点。”

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波格丹诺夫不是在反驳恩格斯，而是在唱高调。如果你不能断定“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或是不确切的，那么你就得承认它是真理。如果你不能断定它在将来会被推翻，那么你就得承认这个真理是永恒的。把真理是“经验的生动的组织形式”这类词句叫做反驳，这就是用一堆无聊的话来冒充哲学。地球具有地质学所叙述的历史呢，还是在七天内被创造出来的^[15]呢？难道能够用“引导”我们到达某个地方的“生

动的”（这是什么意思？）真理等等词句来回避这个问题吗？难道关于地球历史和人类历史的知识“没有现实意义”吗？这只是波格丹诺夫用来掩饰他退却的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他在证明恩格斯对永恒真理的承认就是折中主义的时候，既没有推翻拿破仑确实死于1821年5月5日的事实，也没有驳倒那个认为这一真理将来会被推翻的见解是个荒谬见解的论点，而只是用响亮的词句来回避问题，这样的做法就是一种退却。

恩格斯所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浅显的，关于这类永恒的、绝对的、只有疯子才会怀疑的真理（正像恩格斯在举“巴黎在法国”这个例子时所说的），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想出几十个例子。为什么恩格斯在这里要讲到这些“陈词滥调”呢？因为他是要驳斥和嘲笑不会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应用辩证法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正是这个“这样或那样”，就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杜林同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区别开来了。在一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最复杂的问题上，杜林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这些字眼。恩格斯嘲笑了他，回答说：当然，永恒真理是有的，但是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gewaltige Worte）是不聪明的。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30年前在杜林和恩格斯之间展开了斗争。而波格丹诺夫却假装“没有看到”恩格斯在同一章中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所作的说明，波格丹诺夫由于恩格斯承认了对一切唯物主义来说都是最起码的论点，就想尽办法非难恩格斯搞“折中主义”。他这样做，只是再一次暴露了他无论对唯物主义还是对辩证法都绝对无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上述那章（第1编第9章）的开头写道：“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Anspruch），如果能，那么是哪些产物能这样。”（德文第5版第79页）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如下：

“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绝对真理的认识和至上的思维〉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做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至少对我们说来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或构造，Anlage〉、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第81页）[\(1\)](#)

恩格斯继续说道：“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2\)](#)

这个论断，对于一切马赫主义者所强调的相对主义问题，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原则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马赫主义者都坚决认为他们是相对主义者，但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在重复德国人的话的时候，却害怕或不能直截了当地明白地提出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波格丹诺夫（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看来，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根本不承认绝对真理。在恩格斯看来，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波格丹诺夫是相对主义者。恩格斯是辩证论者。下面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同一章中讲的另一段同样重要的话：

“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

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辩证法的基本前提〉，他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是说，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第86页）

[\(3\)](#)接着恩格斯举了波义耳定律（气体的体积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作为例子。这个定律所包含的“一粟真理”只有在一定界限内才是绝对真理。这个定律“只是近似的”真理。

因此，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绝对真理这一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约·狄慈根在《漫游》[\(4\)](#)中说：“我们可以看到、听到、嗅到、触到绝对真理，无疑地也可以认识绝对真理，但它并不全部进入（geht nicht auf）认识中。”（第195页）“不言而喻，图像不能穷尽对象，画家落后于他的模特儿……图像怎么能够和它的模特儿‘一致’呢？只是近似地一致。”（第197页）“我们只能相对地认识自然界和它的各个部分；因为每一个部分，虽然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相对的部分，然而却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具有认识所不可穷尽的自在的自然整体（des Naturganzen an sich）的本性……我们究竟怎样知道在自然现象背后，在相对真理背后，存在着不完全显露在人面前的普遍的、无限的、绝对的自然呢？……这种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天赋的，是同意识一起为我们所禀赋的。”（第198页）最后这句话是狄慈根的不确切的说法之一，这些不确切的说法使得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指出：狄慈根的观点中存在着混乱。[\(5\)](#)只有抓住这类不正确的地方，才能谈论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狄慈根的特殊哲学。但是狄慈根自己在同一页上就改正了，他说：“虽然我说，关于无限的、绝对的真理的知识是天

赋的，它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先于经验的知识，但是这种天赋知识还是由经验证实的。”（第198页）

从恩格斯和狄慈根的所有这些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波格丹诺夫完全不懂得这点，他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它〈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希望成为对于事物本质的绝对客观的认识〈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因而同任何思想体系的历史条件的制约性不能相容。”

（《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IV页）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

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宣称：我们是相对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和一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也随声附和地说：我们是相对主义者。是的，切尔诺夫先生和马赫主义者同志们，你们的错误正在这里。因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

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可以认为拿破仑是否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件事是“有条件的”，可以纯粹为了人或人类的“方便”，在承认科学思想体系（它在一方面是“方便”的）的同时，又承认宗教思想体系（它在另一方面也是很“方便”的），等等。

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波格丹诺夫加上着重标记写道：“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像永恒真理“这样的独断主义和静力学”（《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IX页）。这是一句糊涂话。如果世界是永恒地运动着和发展着的物质（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物质为不断发展着的人的意识所反映，那么这同“静力学”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谈的根本不是物的不变的本质，也不是不变的意识，而是反映自然界的意识和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之间的符合。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仅仅在这个问题上，“独断主义”这个术语具有特殊的、独特的哲学风味，它是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在反对唯物主义者时所爱用的字眼，这一点我们从相当“老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举的例子中已经看到过了。总之，从臭名昭彰的“最新实证论”的观点出发对唯物主义所进行的一切反驳，都是陈词滥调。

[\(1\)](#)参看维·切尔诺夫的话，上引著作第64页及以下几页。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完全站在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的立场上。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波格丹诺

夫竭力掩饰他和恩格斯的分歧，认为这是偶然的，等等；而切尔诺夫则觉得，这是既同唯物主义又同辩证法进行斗争的问题。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126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编者注

[\(4\)](#) 即《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编者注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567页。——编者注

6. 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16]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里说：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即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是经院哲学。恩格斯重复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Schrullen）的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他反驳不可知论者说：“我们的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Übereinstimmung）。”⁽¹⁾

请把马赫关于实践标准的言论和上面的言论对比一下。“在日常的思维和谈话中，通常把假象、错觉同现实对立起来。把一支铅笔举在我们面前的空气中，我们看见它是直的；把它斜放在水里，我们看见它是弯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说：‘铅笔好像是弯的，但实际上是直的。’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一个事实说成是现实，而把另一个事实贬斥为错觉呢？……当我们犯着在非常情况下仍然期待通常现象的到来这种自然错误时，那么我们的期待当然是会落空的。但事实在这点上是没有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谈错觉，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有意义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却是毫无意义的。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或者它只是我们的像梦一样的错觉，这个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同样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就连最荒唐的梦也是一个事实，它同任何其他事实比较起来并不逊色。”（《感觉的分析》第18—19页）

真的，不仅荒唐的梦是事实，而且荒唐的哲学也是事实。只要知道了恩斯特·马赫的哲学，对这点就不可能有什么怀疑。马赫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诡辩论者，他把对人们的谬误、人类的种种“荒唐的梦”（如相信鬼神之类）的科学史的和心理学的研究，同真理和“荒唐”在认识论上的区分混淆起来了。这正好像一位经济学家说：西尼耳所谓资本家的全部利润是由工人的“最后一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理论

[17]和马克思的理论同样都是事实，至于哪一种理论反映客观真理以及哪一种理论表现资产阶级的偏见和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卖身求荣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制革匠约·狄慈根认为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短篇哲学著作集》[18]第55页），而正教授恩斯特·马赫却认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差别，“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没有意义的”！科学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斗争中是无党性的，这不仅是马赫一个人所喜爱的思想，而且是现代所有的资产阶级教授们所喜爱的思想，这些教授，按照约·狄慈根的公正的说法，就是“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同上，第53页）。

恩·马赫把每个人用来区别错觉和现实的实践标准置于科学的界限、认识论的界限之外，这正是这种生造的教授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那些想离开实践来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尝试称为“经院哲学”和“哲学怪论”。但马赫认为，实践是一回事，而认识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可以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不用前者来制约后者。马赫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认识 and 谬误》中说：“认识是生物学上有用的（förderndes）心理体验。”（德文第2版第115页）“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 and 谬误区别开来。”（第116页）“概念是物理学的作业假说。”（第143页）我们俄国的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天真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们竟把马赫的这些话当做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证明。但是，马赫在这里接近马克思主义，就像俾斯麦接近工人运动或叶夫洛吉主教接近民主主义一样。在马赫那里，这些论点是和他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并列在一起的，但是它们并不决定在认识论上选择哪一条确定的路线。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生物学上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

开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马赫说：就算实践是唯物主义的，但理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写道：“在实践方面，我们在从事某种活动时不能缺少自我这个观念，正如我们在伸手拿一个东西时不能缺少物体这个观念一样。在生理学方面，我们经常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正如我们经常看到日出一样。但是在理论方面，我们决不应该坚持这种看法。”（第284—285页）

这里说到利己主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它根本不是认识论的范畴。这里和表面看到的太阳环绕地球的运行也毫不相干，因为，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剩下来的只是马赫的有价值的供状：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完全地唯一地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至于在“理论方面”逃避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尝试，只不过是表现着马赫的学究式的经院哲学的倾向和生造的唯心主义的倾向罢了。

为了给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扫清地盘，竭力想把实践作为一种在认识论上不值得研究的东西加以排除，这毫不新鲜，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史上的例子看出。在康德与费希特之间有一个戈·恩·舒尔采（在哲学史上叫做舒尔采—埃奈西德穆）。他公开拥护哲学上的怀疑论路线，自称为休谟（以及古代哲学家皮浪和塞克斯都）的追随者。他坚决否认任何自在之物和客观认识的可能性，坚决要求我们不要超出“经验”、感觉之外，同时他也预见到了来自另一阵营的反驳：“既然怀疑论者在参加实际生活时承认客观对象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并且依据这点进行活动和承认真理的标准，那么他自己的这种行为就是对他的怀疑论的最好的和最明白的驳斥。”^[2]舒尔采愤慨地回答说：“这类论据只是对于小民百姓（Pöbel）才是有用的”（第254页），因为“我的怀疑论并不涉及到日常生活的事情，而只是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第255页）。

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同样也希望在唯心主义哲学的范围内给这样一种实在论留个地盘，“这种实在论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最坚决的唯心主义者在行动时都不能回避的（sich aufdringt），也就是承认对象是完全不依赖于我们，在我们之外存在的”（《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455页）。

马赫的最新实证论并不比舒尔采和费希特高明多少！作为一个笑柄，我们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巴扎罗夫还是以为除普列汉诺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了，再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巴扎罗夫嘲笑“普列汉诺夫的获生的跳跃的哲学”（《论丛》第69页）^[19]，的确，普列汉诺夫曾经写过这样拙劣的词句，说什么“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就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获生的跳跃（salto vitale）”（《〈路·费尔巴哈〉注释》第111页）。“信仰”这个字眼，是重复休谟的，虽然加上了引号，但暴露了普列汉诺夫用语的混乱，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为什么要找普列汉诺夫呢？？为什么巴扎罗夫不举其他的唯物主义者，哪怕是费尔巴哈呢？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费尔巴哈吗？但无知并不是论据。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也向实践作了在舒尔采、费希特和马赫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跳跃”。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时候，费尔巴哈引证了费希特的一段典型的话来说明唯心主义的实质，这段话绝妙地击中了整个马赫主义的要害。费希特写道：“你所以认为物是现实的，是存在于你之外的，只是因为你看到它们、听到它们、触到它们。但是视、触、听都只是感觉……你感觉的不是对象，而只是你自己的感觉。”（《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第185页）费尔巴哈反驳说：人不是抽象的自我，他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可以把世界是否是感觉的问题同别人是我的感觉还是像我们在实践中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不是我的感觉这一问题同等看待。“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出并解决世界的客观性或主观性、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问题。”（同上，第189页）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做认识论的基础。他说：当然唯心主义者在实践中也承认我们的自我和他人的你的实在性。不

过在唯心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只适合于生活而不适合于思辨的观点。但是，这种和生活矛盾的思辨，把死的观点、脱离了肉体的灵魂的观点当做真理的觀點的思辨，是僵死的、虚伪的思辨”（第192页）。我们要感觉，首先就得呼吸；没有空气，没有食物和饮料，我们就不能生存。

“愤怒的唯心主义者大叫大嚷地说：这样说来，在研究世界的观念性或实在性的问题时要讨论饮食问题吗？多么卑下！在哲学和神学的讲坛上竭力谩骂科学的唯物主义，而在公共餐桌上却醉心于最粗俗的唯物主义，这多么有失体统啊！”（第195页）费尔巴哈大声说：把主观感觉和客观世界同等看待，“就等于把遗精和生孩子同等看待”（第198页）。

这种评语虽然不十分文雅，却击中了宣称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那些哲学家的要害。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么，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例如，波格丹诺夫同意承认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具有客观真理性，而把那种认为这个理论具有“超历史的客观的”真理性的见解叫做“独断主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VII页）。这又是一个糊涂观点。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原因很简单，正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真理是永恒的一样。但是，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为客观真理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明显，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

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1930—1950年我国出版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部分中译本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16页；第4卷第221页；第3卷第387页。——编者注

[\(2\)](#)戈·恩·舒尔采《埃奈西德穆或关于耶拿的赖因霍尔德教授先生提出的基础哲学的原理》1792年版第253页。

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 (三)

1. 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

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其中也包括马赫主义者，经常拿第一个问题追问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经常拿第二个问题追问马赫主义者。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物质的问题，阿芬那留斯说道：

“在清洗过的‘完全经验’内部没有‘物理的东西’，即没有形而上学地绝对地理解的‘物质’，因为这样理解的‘物质’只是一种抽象，也就是一切中心项都被抽象掉的对立项的总和。正如在原则同格中，也就是说，在‘完全经验’中，没有中心项的对立项是不可设想的（undenkbar）一样，形而上学地绝对地理解的‘物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Unding）。”（《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载于上述杂志第2页第119节）

从这段莫名其妙的话中可以看出一点：阿芬那留斯把物理的东西或物质叫做绝对物和形而上学，因为根据他的原则同格（或者用新的说法：“完全经验”）的理论，对立项和中心项是分不开的，环境和自我是分不开的，非我和自我是分不开的（如约·戈·费希特所说的）。这种理论是改头换面的主观唯心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有关地方说过了。阿芬那留斯对“物质”的抨击的性质十分明显：唯心主义者否认物理的东西的存在是不以心理为转移的，所以不接受哲学给这种存在制定的概念。至于物质是“物理的东西”（即人最熟悉的、直接感知的东西，除了疯人院里的疯子，谁也不会怀疑它的存在），这一点阿芬那留斯并不否认，他只是要求接受“他的”关于环境和自我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

马赫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比较简单，没有用哲学上的遁词饰语：“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东西，只是要素（“感觉”）的一定的有规律的联系。”（《感觉的分析》第265页）马赫以为，他提出这样一个论

断，就会使普通的世界观发生“根本的变革”。其实这是用“要素”这个字眼掩盖了真面目的老朽不堪的主观唯心主义。

最后，疯狂地攻击唯物主义的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说道：“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不能反对把某些比较恒久的感性知觉群加以分类，把它们集合在一起而称之为物质。这样我们就很接近约·斯·穆勒的定义：物质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但是这样的物质定义完全不同于如下的定义：物质是运动着的东西。”（《科学入门》1900年第2版第249页）这里没有用“要素”这块遮羞布，唯心主义者直接向不可知论者伸出了手。

读者可以看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的这一切论述，完全是在思维对存在、感觉对物理东西的关系这个认识论的老问题上兜圈子。要有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无比天真才能在这里看到某种和“最新自然科学”或“最新实证论”多少有点关系的东西。所有我们提到的哲学家都是用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代替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从存在到思维、从物质到感觉），只是有的质直明言，有的吞吞吐吐。他们否认物质，也就是否认我们感觉的外部的、客观的泉源，否认和我们感觉相符合的客观实在，这是大家早已熟知的他们对认识论问题的解答。相反地，对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所否定的那条哲学路线的承认，是以如下的定义表达的：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等等。

波格丹诺夫胆怯地避开恩格斯，装做只跟别尔托夫争辩，对上述定义表示愤慨，因为，你们要知道，这类定义“原来是简单地重复”（《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VI页）下面的“公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加上：恩格斯的公式）：对哲学上的一个派别说来，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对另一个派别说来，则恰恰相反。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都喜出望外地重复波格丹诺夫的“驳斥”！可是这些人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不可能，实质上不可能再

下别的定义。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例如，当我下定义说驴是动物的时候，我是把“驴”这个概念放在更广泛的概念里。现在试问，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这是些极为广泛的、最为广泛的概念，其实（如果撇开术语上经常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超出它们。只有欺诈或极端愚蠢才会要求给这两个极其广泛的概念“系列”下一个不是“简单地重复”二者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定义”。就拿上面所引的三种关于物质的论断来说吧！这三种论断归结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归结起来就是：这些哲学家是从心理的东西或自我到物理的东西或环境，也就是从中心项到对立项，或者从感觉到物质，或者从感性知觉到物质。实际上，阿芬那留斯、马赫和毕尔生除了表明他们的哲学路线的倾向以外，能不能给这些基本概念下什么别的“定义”呢？对于什么是自我，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感性知觉，他们是不是能下别的定义，能下什么更特别的定义呢？只要清楚地提出问题就可以了解，当马赫主义者要求唯物主义者给物质下的定义不再重复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时候，他们是在说些多么荒唐绝顶的话。

顺便说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也表现在：他们蔑视学究式地玩弄新奇的名词、古怪的术语、狡猾的“主义”，而直截了当地说，哲学上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在两者之间有各式各样的不可知论。劳神费力寻找哲学上的“新”观点，正如劳神费力创造“新”价值论、“新”地租论等等一样，是精神上贫乏的表现。

关于阿芬那留斯，他的门徒卡斯坦宁说，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我既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也不知道心理的东西，只知道第三种东西。”有一位著作家指出，阿芬那留斯没有提出这个第三种东西的概念。彼得楚尔特回答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提出这样的概

念。因为第三种东西没有对立概念（Gegenbegriff，相关概念）……什么是第三种东西这个问题提得不合逻辑。”（《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第329页）不可能给这个概念下定义，这一点彼得楚尔特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懂得，援用“第三种东西”不过是一种狡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物理的东西，什么是心理的东西，可是目前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第三种东西”。阿芬那留斯只是用这种狡辩掩盖痕迹，事实上他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现在我们来查看一看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里是怎样使用“经验”一词的。《纯粹经验批判》一书的第1节叙述了如下的“假设”：“我们环境的任何构成部分都和个人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如果前者呈现，那么后者就申述自己的经验，说某某东西是我从经验中知道的，某某东西是经验；或说某某东西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是依赖于经验的。”

（俄译本第1页）这样，经验还是由自我和环境这两个概念来确定的，可是关于二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学说”暂时收藏起来了。再往下读：“纯粹经验的综合概念”，“就是作为这样一种申述的经验的概念，在这种申述的所有构成部分中，只有我们环境的构成部分才是这种申述的前提”（第1—2页）。如果认为环境是不依赖于人的“申述”或“言表”而存在着的，那么就有可能唯物地解释经验了！“纯粹经验的分析概念”，“就是作为这样一种申述的经验的分析概念，在这种申述中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因而这种申述本身不外就是经验”（第2页）。经验就是经验。竟有人把这种冒牌学者的胡说当做真正的深奥思想！

必须再补充几点：阿芬那留斯在《纯粹经验批判》第2卷里把“经验”看做是心理的东西的一种“特殊状态”；他把经验分为物的价值（sachhafte Werte）和思想的价值（gedankenhafte Werte）；“广义的经验”包含思想的价值；“完全经验”被视为和原则同格是同一的（《考察》）。一句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经验”掩盖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使二者的混同神圣化。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轻信地把“纯粹经验”当做真的，可是在哲学著作中，各种派别的代表都一致指出阿芬那留斯滥用这个概念。阿·黎尔写道：“什么是纯粹经验，在阿芬那留斯的书中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他说‘纯粹经验是一种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的经验’，这显然是在兜圈子。”（《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02页）冯特写道，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有时是指任何一种幻想，有时是指具有“物性”的言表（《哲学研究》杂志^[20]第13卷第92—93页）。阿芬那留斯把经验这个概念扩大了（第382页）。科韦拉尔特写道：“整个这种哲学的意义取决于经验和纯粹经验这两个术语的精确定义。阿芬那留斯没有下这样的精确定义。”（《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907年2月号第61页）诺曼·斯密斯说道：阿芬那留斯在反唯心主义的幌子下偷运唯心主义的时候，“经验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很好地帮了他的忙”（《思想》杂志^[21]第15卷第29页）。

“我郑重声明，我的哲学的真谛和灵魂在于：人除了经验以外什么也没有；人所要获得的一切，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获得……”这岂不是一位狂热的纯粹经验的哲学家吗？讲这段话的人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约·戈·费希特（《向广大读者所作的有关最新哲学真正本质的明白报道》第12页）。我们从哲学史中知道，对经验概念的解释，使古典的唯物主义者和古典的唯心主义者划分开来了。目前，各式各样的教授哲学都以侈谈“经验”来掩饰它们的反动性。一切内在论者都援用经验。马赫在他的《认识和谬误》一书第2版序言里对威·耶鲁萨伦姆教授的一本书称赞不已。在那本书中我们读到：“承认神的原初存

在，和任何经验都不矛盾。”（《批判的唯心主义和纯粹的逻辑》第222页）

我们只能怜惜那些相信阿芬那留斯之流的人，他们以为靠“经验”一词就可以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陈旧”差别。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责备同纯粹马赫主义略有分歧的波格丹诺夫滥用了“经验”一词，这些先生在这里只是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没有过错”，因为他只是盲目地接受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糊涂观念。当他说“意识和直接心理经验是同一概念”（《经验一元论》第2卷第53页），物质“不是经验”，而是“引出一切已知物的未知物”（《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III页），这时候他是在唯心地解释经验。当然，他不是第一个⁽¹⁾但也不是最后一个用“经验”这个字眼来建立唯心主义体系的人。当他驳斥反动的哲学家们，说那些想超出经验界限的尝试事实上“只会导致空洞的抽象和矛盾的映象，而这些抽象和映象的一切要素毕竟是从经验中取得的”（第1卷第48页），这时候他把在人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东西同人的意识的空洞抽象对立起来，就是说，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

完全同样地，马赫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物体是感觉或“要素”的复合），却常常不由自主地对“经验”一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在《力学》一书（1897年德文第3版第14页）中说道：“不要从自身中推究哲理（nicht aus uns herausphilosophieren），而要从经验中推究。”在这里，他把经验同从自身中推究哲理对立起来，就是说，他把经验解释为某种客观的、人从外界得到的东西，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在自然界里观察到的东西，虽然我们还不理解，还没有加以分析，但是已经印入我们的表象，以后这些表象在最一般、最稳定的（stärksten）特征上模仿（nachahmen）自然过程。这种经验就成为永远在我们手边的财宝（Schatz）……”（同上，第27页）在这里自然界被看做是第一性的，感觉和经验被看做是派生的。如果马赫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始终坚持这种观点，他就会

使人类摆脱许多愚蠢的唯心主义的“复合”。第三个例子：“思想和经验的密切结合创立了现代自然科学。经验产生思想。思想经过进一步的精炼，又来和经验相比较”，等等（《认识和谬误》第200页）。马赫的特殊“哲学”在这里被抛弃了，这位作者自发地转到唯物地看待经验的自然科学家的普通观点上去了。

总结：马赫主义者用来建立自己体系的“经验”一词，老早就在掩盖各种唯心主义体系了，现在它又被阿芬那留斯之流用来为由唯心主义立场转到唯物主义立场或由唯物主义立场转到唯心主义立场的折中主义效劳了。这个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只是表现着被恩格斯十分鲜明地揭示出的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1\]](#)在英国，贝尔福特·巴克斯同志老早就这样做了。不久以前，一位评论巴克斯的著作《实在的根源》的法国评论家辛辣地对他说：“经验不过是意识的代用语”，你就公开地做一个唯心主义者吧！（1907年《哲学评论》杂志[\[22\]](#)第10期第399页）

3. 自然界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因果性问题对于确定任何一种最新“主义”的哲学路线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稍微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谈起。路·费尔巴哈的观点，在前面提到的他对鲁·海姆的反驳中讲得特别清楚。

“海姆说，‘在他（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自然界和人类理性是完全分开的，它们之间有一条双方都不能逾越的鸿沟’。海姆是根据我的《宗教的本质》第48节提出这个谴责的。我在这一节中说过：‘自然界只有通过自然界本身才能被理解；自然界的必然性不是人类的或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必然性；自然界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存在物，对于它是不应当，也不能够运用任何人类尺度的，尽管为了使自然界能够为我们理解，我们也拿自然现象同类似的人类现象相比，甚至把人类的用语和概念（如秩序、目的、规律等）用于自然界，而且按照我们语言的性质也必须把它们用于自然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任何秩序，比方说，秋去可以夏来，春去可以冬来，冬去可以秋来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目的，比方说，肺和空气之间，光和眼睛之间，声音和耳朵之间没有任何适应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规律，比方说，地球时而按椭圆形运转，时而按圆形运转，时而一年环绕太阳一周，时而一刻钟环绕太阳一周呢？这是多么荒谬啊！我在这段话里究竟想说什么呢？无非是把属于自然界的東西同属于人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这段话里没有说自然界中任何真实的東西都跟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和观念不相符合，这段话只是否认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否认秩序等等之存在于自然界就像存在于人的头脑或感觉中一样。秩序、目的、规律不外是一些词，人用这些词把自然界的事物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以便了解这些事物；这些词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客观内容的（nicht sinn-d. h. gegenstandlose Worte）；但是，我还

是应当把原文和译文区别开来。人理解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是有些随意的。

有神论根据自然界的秩序、合目的性、规律性的偶然性公然断定它们是任意产生的，断定有一个和自然界不同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把秩序、合目的性、规律性加给本身（an sich）就是混乱的（dissolute）、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自然界。有神论者的理性……是和自然界相矛盾的理性，是绝对不了解自然界本质的理性。有神论者的理性把自然界分成两个存在物，一个是物质的，另一个是形式的或精神的。”（《费尔巴哈全集》1903年版第7卷第518—520页）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被人类的秩序、规律等等观念仅仅近似正确地反映着的客观因果性。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同他承认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所有其他的观点，说得更确切些，因果性问题上的另外一条哲学路线，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被费尔巴哈公允地列为信仰主义的派别。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离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做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无论是休谟的还是康德的因果论，都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

至于说到恩格斯，如果我没有弄错，他当时用不着专门在因果性问题上以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去反对其他派别。对他来说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他在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十分明确地同一切不可知论者划清了界限。但是，谁要是稍微认真

地读过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就一定会明白，恩格斯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我们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章里说道：“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或世界现象总画面的个别方面〉，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natürlich）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第5—6页）这种自然联系即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恩格斯特别强调用辩证观点来看原因和结果：“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第8页）因此，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恩格斯说，如果我们注意到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那么我们发现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相符合，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明显，“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Naturzusammenhang）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第22页）⁽¹⁾。世界现象的自然的、客观的联系是存在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恩格斯经常讲到“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解释这些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原理。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同样可以读到：“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

此。”（第38页）恩格斯责备旧的自然哲学“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自然现象的）”（第42页）[\(2\)](#)。十分明显，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我们人类用某些概念对这个规律性所作的近似的反映具有相对性。

在讲到约·狄慈根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从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歪曲事实的无数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的作者之一格尔方德先生告诉我们：“狄慈根的世界观的基本点可以归结为如下论点：‘……（9）我们加给物的因果依存关系实际上并不包含在物本身中’。”（第248页）这完全是胡说。格尔方德先生本人的见解是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真正杂烩。他肆意歪曲约·狄慈根的观点。的确，从约·狄慈根那里可以找出不少糊涂观念、不确切之处和错误，这些东西使马赫主义者称快，使一切唯物主义者不能不承认约·狄慈根是一位不十分彻底的哲学家。但是，硬说唯物主义者约·狄慈根根本否认唯物主义的因果观，这也只有格尔方德之流，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干得出来。

约·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德文版）中说道：“客观的科学认识，不是通过信仰或思辨，而是通过经验，通过归纳去寻找自己的原因，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去寻找原因。自然科学不是在现象之外或现象之后，而是在现象之中或通过现象去寻找原因。”（第94—95页）“原因是思维能力的产物。然而它们不是思维能力的纯粹产物，而是由思维能力和感性材料结合起来产生的。感性材料给这样产生的原因提供客观存在。正如我们要求真理是客观现象的真理一样，我们也要求原因是现实的，要求它是某个客观结果的原因。”（第98—99页）“物的原因就是物的联系。”（第100页）

由此可见，格尔方德先生提出的论断是和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的。约·狄慈根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承认“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

存性”。为了制造马赫主义的杂烩，格尔方德先生需要把因果性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混淆起来。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第二条路线。

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我们在第81节里读到：“我们既然感觉不到〈没有在经验中认识到：erfahren〉某种引起运动的力量，也就感觉不到任何运动的必然性……我们所感觉到（erfahren）的一切，始终只是一个现象跟着一个现象。”这是最纯粹的休谟观点：感觉、经验丝毫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必然性。断言（根据“思维经济”的原则）感觉是唯一存在的哲学家，不能得出任何别的结论。我们往下读到：“既然因果性的观念要求力量和必然性或强制作作为决定结果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因果性的观念也就和它们一起完蛋。”（第82节）“必然性是表示期待结果的或然率的程度。”（第83节，论题）

这是因果性问题上的十分明确的主观主义。只要稍微彻底一点，那么，不承认客观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就不能得出别的结论。

拿马赫来说吧！我们在关于“因果性和说明”的专门一章（《热学原理》1900年第2版第432—439页）中读到：“休谟〈对因果性概念〉的批判仍然有效。”康德和休谟对因果性问题的解答是各不相同的（其他哲学家，马赫不予理会！）；“我们赞成”休谟的解答。

“除了逻辑的必然性〈黑体是马赫用的〉，任何其他的必然性，例如物理的必然性，都是不存在的。”这正是费尔巴哈十分坚决地反对的一种观点。马赫从来没有想到要否认他和休谟的血缘关系。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会断言休谟的不可知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在马赫的《力学》里读到：“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1897年第3版第474页）“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Trieben）中产生

的；对自然界说来，并没有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必然性。”（第495页）

在这里应当指出，我们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幼稚得惊人，他们用关于因果律的这种或那种说法的问题来代替关于因果律的一切论断上的唯物主义趋向或唯心主义趋向的问题。他们相信了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教授们，以为只要说“函数关系”，那就是“最新实证论”的发现，那就会摆脱类似“必然性”、“规律”等等说法的“拜物教”。当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冯特完全有理由嘲笑这种一点也没有改变问题实质的字眼更换（上引论文，载于《哲学研究》第383页和第388页）。马赫自己也说到因果律的“一切形式”，并在《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278页）中作了一个很明白的声明：只有在能够用可测的量来表达研究的结果时，函数概念才能够更精确地表达“要素的依存性”，但是这甚至在化学那样的科学中也只能够部分地做到。大概，在我们那些轻信教授们发现的马赫主义者看来，费尔巴哈（不必说恩格斯了）不知道秩序、规律性等等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数学上规定的函数关系来表达！

划分哲学派别的真正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些记述是否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而在于：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正是这个问题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同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阿芬那留斯、马赫断然分开了。

马赫（如果责备他始终如一，那就错了）在他的著作的一些地方常常“忘记”他同休谟的一致，“忘记”他的主观主义的因果论，而“只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说以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谈论问题。例如，我们在《力学》中读到：“自然界教导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发现均一性。”（法译本第182页）如果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发现均一性，那是不是说这个均一性是客观地、在我们心之外存在着呢？

不是的。关于自然界的均一性这个问题，马赫却说出这样一些话：“推动我们把那些只观察了一半的事实在思想中加以充实的力量，是联想。这种力量由于不断重复而加强起来。于是我们就觉得它是一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个别事实的力量，是一种既指导思想也〈黑体是马赫用的〉指导事实并且作为支配二者的规律而使它们相互符合的力量。至于我们认为自己能借助于这种规律而作出预言，这仅仅〈！〉证明我们环境的充分的均一性，但决不证明我们的预言实现的必然性。”（《热学》[\(3\)](#)第383页）

这样说来，可以而且应当在环境即自然界的均一性以外去寻找某种必然性！到哪儿去寻找，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秘密，这种哲学害怕承认人的认识能力不过是对自然界的反映。马赫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认识 and 谬误》里甚至断定自然规律是“对期待的限制”（第2版第450页及以下各页）！唯我论又显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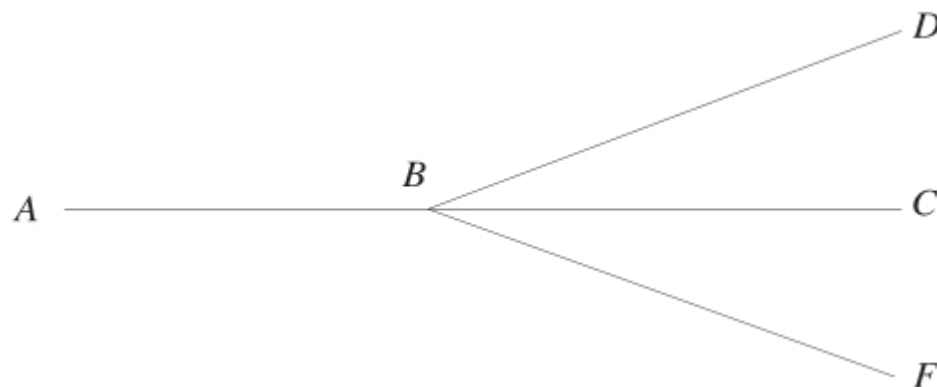
我们来看看这个哲学派别的其他著作家的立场。英国人卡尔·毕尔生以他特有的明确性表示：“科学的规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科学入门》第2版第36页）“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sovereign）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太健忘了：他们为之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像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物。”（第185页）“自然规律的广括性质应当归功于人心的独创性。”（同上）第3章第4节这样写道：“人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一说法要比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这一相反的说法有意义得多”，虽然这位尊贵的教授痛苦地承认，这后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幸现在太流行了”（第87页）。第4章是论述因果性问题的，其中第11节表述了毕尔生的论点：“必然性属于概念的世界，不属于知觉的世界。”应当指出，对毕尔生说来，知觉或感性印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在一定知觉系列不断重复时具有的均一性中，即在知觉的常规中，没有任何内在必然性；可是知觉常规的存在是思维者存在的

必要条件。因此，必然性包含在思维者的本性中，而不包含在知觉本身中；必然性是认识能力的产物。”（第139页）

我们的这位马赫主义者（恩·马赫“本人”曾一再表示和他完全一致）就这样顺利地达到了纯粹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问题不在于重复康德的先验性学说，因为这一点所决定的不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路线，而是这条路线的一个特殊说法。问题在于：理性、思维、意识在这里是第一性的，自然界是第二性的。理性并非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它的最高产物之一、它的过程的反映，而自然界倒是理性的一小部分。理性便这样自然而然地从普通的、单纯的、谁都知道的人的理性扩张成像约·狄慈根所说的“无限的”、神秘的、神的理性。“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个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公式是信仰主义的公式。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在恩格斯的书中读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自然界而不是把精神当做第一性，因而就非常惊异，这只是表明他们在分辨真正重要的哲学派别同教授们的故弄玄虚、咬文嚼字方面无能到了什么地步。

约·彼得楚尔特在他的两卷集著作中阐述和发挥了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他可以说是反动的马赫主义经院哲学的最好的典范。他郑重其事地说：“直到今天，在休谟死后的150年，实体性和因果性仍旧麻痹着思维的勇气。”（《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1页）当然，唯我论者比任何人都“更有勇气”，他们发现了没有有机物质的感觉、没有头脑的思想、没有客观规律性的自然界！“我们还没有提到的关于因果性的最后一个说法，即事件的必然性或自然界的必然性，在自身中包含着一种模糊的神秘的东西”——“拜物教”、“拟人观”等等的观念（第32页和第34页）。可怜的神秘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自然界的必然性，而且还把休谟路线的拥护者叫做理论上的反动派……彼得楚尔特是超出一切“拟人观”的。他发现了伟大的“一义性规律”，这个规律消除了一切模糊性、一切

“拜物教”的痕迹，如此等等。就以力的平行四边形为例（第35页）。我们不能“证明”它，应当承认它是“经验的事实”。我们不能假定物体受到同样的撞击而有各种不同的运动。“我们不能容许自然界的这种不规定性和任意性；我们应当向它要求规定性和规律性。”（第35页）是的，是的！我们向自然界要求规律性。资产阶级向它的教授们要求反动性。“我们的思维向自然界要求规定性，而自然界总是服从这个要求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它不得不服从这个要求。”（第36页）当物体在 AB 线上受到撞击时，为什么它向 C 运动，而不向 D 或 F 等等方向运动呢？



“为什么自然界不从无数其他可能的方向中选择一个方向呢？”（第37页）因为这些方向是“多义的”，而约瑟夫·彼得楚尔特的伟大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发现要求一义性。

“经验批判主义者们”以诸如此类不可名状的谬论充塞着好几十页篇幅！

“……我们一再指出，我们的原理不是从个别经验的总和中汲取力量的，相反地，我们要求自然界承认它（*seine Geltung*）。事实上，这个原理在还没有成为规律之前，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我们对待现实的原则即公设了。它可以说是先验地、不依赖于任何个别经验而发生作用的。乍看起来，纯粹经验哲学不应当宣传先验的真理，从而回到最空洞的形而上学去。但它所说的先验只是逻辑的先验，不是心理的先验，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先验。”（第40页）当然，如果把先验

叫做逻辑的先验，那么这种观念的一切反动性就会因此而消失，并且它会上升到“最新实证论”的高峰！

约·彼得楚尔特接着教训我们说：不可能有心理现象的一义规定性，因为幻想的作用、伟大发明家的意义等等在这里造成了例外，而自然规律或精神规律是不容许有“任何例外”的（第65页）。我们面前是一位十足的形而上学者，他对偶然和必然之间的差别的相对性一无所知。

彼得楚尔特继续说：也许人们会引用历史事件的或诗歌中人物性格发展的动因来反驳我吧？“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就会看到并没有这样的一义性。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任何一出戏剧，我们都可以设想，其中的人物在同样的心理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行动。”（第73页）“不但在心理的领域中没有一义性，而且我们有理由要求在现实中也并没有一义性（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我们的学说就是这样提高到……公设的地位……即提高到任何以前的经验的必要条件的地位、逻辑的先验的地位。”（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第76页）

彼得楚尔特在他的《引论》⁽⁴⁾两卷集和1906年出版的小册子《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中继续使用这个“逻辑的先验”。⁽⁵⁾我们看到的是卓越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的第二个例子。他不露声色地滚到康德主义那边，并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宣扬最反动的学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因果说根本就是唯心主义的谎话，这是无论用多么响亮的有关“实证论”的词句也掩盖不了的。休谟和康德在因果论上的差别是次要的、不可知论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就注定他们必然得出某些唯心主义的结论。比起约·彼得楚尔特稍微有点“良心”的经验批判主义者鲁道夫·维利，由于自己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羞惭，例如，他不同意彼得楚尔特的全部“一义性”理论，认为它除了“逻辑的形式主义”，什么也没有提供。然而鲁·维利是否因为摒弃了彼得楚尔特就使自己的立场有所改进呢？一点也没有。因为他

摒弃康德的不可知论，完全是为了拥护休谟的不可知论。他写道：

“我们从休谟的时代起就早已知道‘必然性’不是‘超越的’，而是纯粹逻辑的标记（Merkmal），或者像我很乐意说的并且我已经说过的，是纯粹语言上的（sprachlich）标记。”（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1905年慕尼黑版第91页；参看第173、175页）

不可知论者把我们对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叫做“超越的”观点，因为从维利并不反对而只是加以清洗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学院智慧”来看，凡是承认我们在经验中感知的客观实在，都是非法的“超越”。

在属于我们所研究的哲学派别的法国著作家中，昂利·彭加勒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常常误入同一条不可知论的道路。帕·尤什凯维奇当然把他的错误宣称为最新实证论的最新成就。这种实证论“最新”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还需要加上一个新“论”：经验符号论。在彭加勒看来（在论新物理学的一章中将会谈到他的全部见解），自然规律是人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符号、约定。“唯一真正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内部和谐”，并且彭加勒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多数人或所有的人都承认的东西叫做客观的东西⁽⁶⁾，也就是说，他像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纯粹主观主义地取消客观真理，而关于“和谐”是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问题，他断然说：“毫无疑问，不是。”十分明显，新术语一点也没有改变不可知论的陈旧不堪的哲学路线，因为彭加勒的“独创的”理论的本质就是否认（虽然他远不彻底）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因此，很自然，和那些把旧错误的新说法当做最新发现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不同，德国康德主义者欢迎这样的观点，认为这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转到他们一边，转到不可知论一边。我们在康德主义者菲利浦·弗兰克的著作中读到：“法国数学家昂利·彭加勒维护这样的观点：理论自然科学的许多最一般的原理（惯性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等），往往很难说它们的起源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实际上，它们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纯粹是一

些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约定的前提。”这位康德主义者喜不自胜地
说：“这样一来，最新自然哲学就出乎意料地复活了批判唯心主义
的基本思想，那就是：经验只不过充实人生来就有的框架而已……”[\(7\)](#)

我们举这个例子是要让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尤什凯维奇之流天
真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把一种什么“符号论”当做真正的新货色，可
是稍微有点学识的哲学家们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转到批判唯心主义
的观点上去了！因为这种观点的实质并不一定在于重复康德的说法，
而是在于承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基本思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性，从主体、从人的意识中而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某些“经验的条
件”，引出某些原则、公设、前提。恩格斯说得对，实质不在于一个
哲学家归附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许多学派中的哪一派，而在于他
把自然界、外部世界、运动着的物质看做第一性的呢，还是把精神、
理性、意识等等看做第一性的。[\(8\)](#)

有学识的康德主义者埃·路加对马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其
他哲学路线的特征也提出了评述。在因果性问题上，“马赫完全附和
休谟”[\(9\)](#)。“保·福尔克曼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中引出思维的必然
性。这个观点承认必然性的事实，它同马赫相反而和康德一致；但是
福尔克曼又和康德相反，认为必然性的泉源不是在思维中，而是在自
然过程中。”（第424页）

保·福尔克曼是一位物理学家，写过许多有关认识论问题的著
作。他也像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倾向于唯物主义——虽然是一
种不彻底的、怯懦的、含糊的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
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
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上述引文中唯一不确切的地方，是
认为马赫对一切必然性一概否定。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马赫，或者
是坚决离开唯物主义而不可避免地滚向唯心主义的整个经验批判主义
派别，都不是这样的。

关于俄国马赫主义者，我们还要专门说几句话。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读过”恩格斯坚决把唯物主义和休谟的派别区分开来的论述，他们不会不从马赫本人或任何一个稍许熟悉马赫哲学的人那里听说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是遵循休谟路线的，但是他们在因果性问题上对休谟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尽量一声不响！支配他们的是十足的糊涂思想。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宣扬“新”经验符号论。无论是“所谓纯粹经验的材料，如蓝色、坚硬等感觉”，或者是“所谓纯粹理性的创造，如契玛拉^[25]或象棋游戏”，都是“经验符号”（《论丛》第179页）。“认识是充满了经验符号的，它在发展中走向愈来愈高度符号化的经验符号。”“所谓自然规律……就是这些经验符号。”（同上）“所谓真正的实在、自在的存在，就是我们知识所力求达到的那个无限大的（尤什凯维奇先生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终极的符号体系。”（第188页）“作为我们认识的基础的”“知觉流”是“非理性的”、“非逻辑的”（第187、194页）。能量“就像时间、空间、质量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一样，不能说是物、实体：能量是常数，是经验符号，它像其他经验符号一样，暂时地满足人要把理性、逻辑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这个基本要求”（第209页）。

我们面前是一个穿着用斑驳陆离、刺人眼目的“最新”术语做成的小丑服装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外部世界、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是我们认识的符号。知觉流是没有理性、秩序、规律性的，是我们的认识把理性导入其中的。天体是人类认识的符号，地球也在其内。尽管自然科学教导我们说，地球在人类和有机物质可能出现以前就早已存在了，而我们却把这一切都改了^[26]！行星运动的秩序是我们给予的，是我们认识的产物。当尤什凯维奇先生感到人类理性被这种哲学扩张为自然界的创造主、缔造者时，便在理性旁边写上“逻辑”，即抽象的理性——这不是一般的理性，而是特殊的理性；这不是人脑的机能，而是一种先于任何头脑而存在的东西、一种神灵的东

西。“最新实证论”的最新成就，就是费尔巴哈早已揭露过的那个陈旧的信仰主义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亚·波格丹诺夫吧！1899年，当他还是一个半唯物主义者，由于受到一位很有名的化学家但也是很糊涂的哲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而刚刚开始动摇时，他写道：“现象的普遍因果联系，是人类认识的最终的也是最好的产物；它是普遍的规律，它是那些（用一个哲学家的话来说）由人类理性加给自然界的规律中的最高的规律。”（《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41页）

天晓得波格丹诺夫的这段话那时候是从谁那里引来的。但是事实上，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轻信地加以复述的“一个哲学家的话”就是康德的话。这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更不愉快的是：这甚至不能“单纯”用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来解释。

1904年，波格丹诺夫已经丢开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奥斯特瓦尔德，他写道：“……现代实证论认为因果律仅仅是从认识上把许多现象联结成连续系列的一种方法，仅仅是使经验协调的一种形式。”

（《社会心理学》第207页）这种现代实证论就是否认存在于一切“认识”和一切人以前和以外的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的不可知论，关于这一点，波格丹诺夫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知而不言。他完全相信德国教授们称为“现代实证论”的东西。最后，在1905年，当波格丹诺夫经过了上述几个阶段和经验批判主义阶段而处在“经验一元论”阶段时，他写道：“规律决不属于经验的范围……规律不是在经验中得出的，而是思维创造出来用以组织经验、和谐地把经验协调成严整的统一体的一种手段。”（《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40页）“规律是认识的抽象；正如心理学的规律很少具有心理性质一样，物理学的规律很少具有物理性质。”（同上）

这么说来，秋去冬来，冬去春来的规律不是我们在经验中得出的，而是思维创造出来的一种用以组织、协调、调合的手段……波格丹诺夫同志，组织、协调、调合什么和什么啊？

“经验一元论之所以能成立，只是因为认识积极地协调经验，排除经验的无数矛盾，为经验创造普遍的组织形式，以派生的、有秩序的关系世界代替原始的、混乱的要素世界。”（第57页）这是不对的。似乎认识能够“创造”普遍的形式，能够以秩序代替原始的混乱等等，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只能反映这个规律性。

总结：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盲目地相信“最新的”反动教授们，重复着康德和休谟在因果性问题上的不可知论的错误，他们既看不到这些学说同马克思主义即唯物主义处于怎样的绝对矛盾中，也看不到这些学说怎样沿着斜坡滚向唯心主义。

[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2、74—75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242页。——编者注

[3] 即《热学原理》。——编者注

[4] 即《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编者注

[5] 约·彼得楚尔特《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1906年莱比锡版第130页：“即使从经验论的观点来看，也可以有逻辑的先验，因为对于我们环境的经验的（erfahrungsmäßig，在经验中感知的）恒久性来说，因果性是逻辑的先验。”

[6] 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1905年巴黎版第7、9页，有俄译本。

[7] 1907年《自然哲学年鉴》[23]第6卷第443、447页。

[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1页。——编者注

[9] 埃·路加《认识问题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载于《康德研究》杂志[24]第8卷第409页。

5. 空间和时间

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这首先就和康德主义不同。康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在站在唯心主义方面的，它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人的直观形式。派别极不相同的著作家、稍微彻底一些的思想家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根本的分歧。我们先从唯物主义者谈起。

费尔巴哈说道：“空间和时间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根本条件（Wesensbedingungen）。”（《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32页）费尔巴哈承认我们通过感觉认识到的感性世界是客观实在，自然也就否认现象论（如马赫会自称的）或不可知论（如恩格斯所说的）的时空观。正如物或物体不是简单的现象，不是感觉的复合，而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实在一样，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

恩格斯在揭露不彻底的糊涂的唯物主义者杜林时，抓住他的地方正是：他只谈时间概念的变化（这对于各种极不相同的哲学派别中多少有些名气的现代哲学家来说是无可争辩的问题），躲躲闪闪地不明确回答下面的问题：空间或时间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我们的相对的时空观念是不是接近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或者它们只是发展着的、组织起来的、协调起来的和如此等等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这就是而且唯有这才是真正划分根本哲学派别的认识论基本问题。恩格斯写道：

“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

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就是说用概念的可变性这类词句）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反杜林论》德文第5版第41页）[\(1\)](#)

看来，这非常清楚，就连尤什凯维奇先生们也都能了解问题的本质吧？恩格斯提出了大家公认的、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十分明了的关于时间的现实性即客观实在性的原理来反对杜林。他说，光凭谈论时空概念的变化是回避不了直接承认或否认这个原理的。这并不是说，恩格斯否认对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变化和发展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科学意义，而是说，我们要彻底解决认识论问题，即关于整个人类知识的泉源和意义的问题。多少有些见识的哲学唯心主义者（恩格斯在说到唯心主义者的时候，指的是古典哲学的天才的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容易承认我们的时空概念是发展的，例如，认为发展着的时空概念接近于绝对的时空观念等等，但他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如果不坚决地、明确地承认我们的发展着的时空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时间和空间，不承认它们在这里也和在一一般场合一样接近客观真理，那么就不可能把敌视一切信仰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到底。

恩格斯教训杜林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 and 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同上）[\(2\)](#)

为什么恩格斯要在前半句话里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费尔巴哈的话，而在后半句话里提起费尔巴哈同有神论这种非常荒诞的事情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呢？因为，从恩格斯这本著作的同一章里可以看到，要是杜林不时而依恃世界的“终极原因”，时而依恃“第一次推动”（恩格斯说，这是神这个概念的另一种说法），他就不能够使自己的哲学自圆其说。也许，杜林想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诚意并不亚于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可是他没有能够把那种确实可以使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荒诞事情失去任何立足之地的哲学观点贯彻到底。既然杜林不承认，至少不是明确地承认（因为杜林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和糊涂）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他也就不能

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沿着斜坡一直滚到“终极原因”和“第一次推动”中去，因为他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客观标准。既然时间和空间只是概念，那么创造它们的人类就有权利超出它们的界限，资产阶级教授们就有权利由于保卫这种超越的合法性、由于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中世纪的“荒诞事情”而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了。

恩格斯曾经向杜林指出，否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在理论上就是糊涂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上就是向信仰主义投降或对它束手无策。

现在看一看“最新实证论”有关这个问题的“学说”吧！在马赫的著作里，我们读到：“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的调整了的（或者协调了的，wohlgeordnete）体系。”（《力学》德文第3版第498页）这是很明显的唯心主义谬论，它是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个学说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是具有感觉的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而是空间和时间存在于人里面，依赖于人，为人所产生。这就是从马赫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马赫感到自己在滚向唯心主义，于是就“抗拒”，提出一大堆保留条件，并且像杜林一样把问题淹没在关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相对性等等冗长的议论中（着重参看《认识和谬误》）。但是，这没有挽救他，而且也挽救不了他，因为只有承认了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才能真正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这是马赫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干的。他根据相对主义的原则建立时间和空间的认识论，仅此而已。实质上，这样的构造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点我们在谈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

马赫为了抵制从他的前提中必然得出的唯心主义结论，便反驳康德，坚持说空间概念起源于经验（《认识和谬误》德文第2版第350、385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经验中感知客观实在（像马赫告诫的那样），那么这样反驳康德就一点也没有抛弃康德和马赫的共同的不可知论立场。如果空间概念是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但不是我们以外

的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马赫的理论仍旧是唯心主义的。在人和人的经验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于以百万年计算的时间中，这一点就证明这种唯心主义理论是荒谬的。

马赫写道：“在生理学方面，时间和空间是判定方位的感觉，它们同感性的感觉一起决定着生物学上合目的的适应反应的发出（Auslösung）。在物理学方面，时间和空间是物理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同上，第434页）

相对主义者马赫只限于从各个方面考察时间概念！他也像杜林一样踏步不前。如果说“要素”是感觉，那么物理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就不能存在于人以外、人出现以前、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如果说时间和空间的感觉能够使人具有生物学上合目的地判定方位的能力，那也只有在这些感觉反映了人以外的客观实在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因为，假如人的感觉没有使人对环境具有客观的正确的观念，人对环境就不能有生物学上的适应。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学说是同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感觉是物体和物的映象呢，还是物体是我们的感觉的复合。马赫只是在这两种解答之间无所适从。

马赫说道，在现代物理学中保持着牛顿对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观点（第442—444页），即对本来的时间和空间的观点。他接着说，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唯物主义者 and 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观点是无害的（unschädlich）（第442页），因而它在长时期内没有受到批判。

关于唯物主义观点无害的这种天真说法，使马赫露出了马脚！首先，说唯心主义者“很久”没有批判这种观点，是不确实的；马赫简直无视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他回避直截了当地叙述这两种观点。其次，马赫承认他所反驳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无害”的，实质上也就是承认它们是正确的。因为不正确的东西怎么能够在许多世纪以来都是无害的呢？马赫曾经向之递送秋波

的实践标准到哪儿去了？唯物主义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之所以是“无害的”，只是因为自然科学没有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即没有超出物质世界的界限，而把这件事让给反动哲学的教授们去做了。这种“无害”也就是正确。

“有害的”是马赫对空间和时间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第一，它向信仰主义敞开了大门；第二，它引诱马赫本人作出反动的结论。例如，马赫在1872年写道：“不必去设想化学元素是在三维空间中的。”（《功的守恒定律》^[3]第29页，第55页重述）这样做，就是“作茧自缚。正如没有任何必要从音调的一定高度上去设想纯粹思维的东西（das bloß Gedachte）一样，也没有任何必要从空间上即从可以看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上去设想纯粹思维的东西”（第27页）。“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令人满意的电学理论，这也许是由于总想用三维空间的分子过程来说明电的现象的缘故。”（第30页）

根据马赫在1872年公开维护的那种直率的没有被搞乱的马赫主义观点，毋庸置疑地会作出如下的论断：如果人们感觉不到分子、原子，一句话，感觉不到化学元素，那么，这就是说化学元素是“纯粹思维的东西（das bloß Gedachte）”。既然如此，既然空间和时间没有客观实在的意义，那么很明显，大可不必从空间上去设想原子！让物理学和化学以物质在其中运动的三维空间来“自缚”吧，——可是为了说明电，却可以在非三维空间中寻找它的元素！

尽管马赫在1906年重述过这个谬论（《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418页），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空间的看法问题，不能支吾搪塞，不能有任何“调和”这个对立的企图。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70年代，当马赫还默默无闻，甚至“正统派的物理学家”都拒绝刊登他的论文的时候，内在论学派的首领之一安东·冯·勒克列尔就不遗余力地抓住马赫的这个论断，说它出色地否认了唯物主义，承认了唯心主义。因为，那时候勒克列尔还没有发

明或者说还没有从舒佩、舒伯特—索尔登或约·雷姆克那里剽窃到“内在论学派”这个“新的”称号，而是坦率地自称为批判唯心主义者⁽⁴⁾。这位信仰主义的毫不掩饰的维护者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公开宣扬信仰主义，他一看到马赫的那些话，就立刻宣称马赫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最好的革命者”（第252页）；他这样做是完全对的。马赫的论断是从自然科学阵营向信仰主义阵营的转移。不论在1872年或在1906年，自然科学都曾经在三维空间中探求，而且现在还在探求和发现（至少在摸索）电的原子即电子。自然科学毫不怀疑它所研究的物质只存在于三维空间中，因而这个物质的粒子虽然小到我们不能看见，也“必定”存在于同一个三维空间中。从1872年起，30多年来科学在物质构造问题上获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唯物主义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一直是“无害的”，也就是说跟过去一样，和自然科学是一致的，而马赫之流所持的相反的看法却是对信仰主义的“有害的”投降。

马赫在他的《力学》里维护那些研究设想出来的 n 维空间问题的数学家，使他们不致于因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出“怪异的”结论而遭到谴责。这种维护无疑是完全正当的，但是请看一看马赫是站在什么样的认识论立场上维护他们的。马赫说道，现代数学提出了 n 维空间，即设想出来的空间这个十分重要而有用的问题，可是只有三维空间才是“现实的”（ein wirklicher Fall）（第3版第483—485页）。因此，“由于不知道把地狱安放在什么地方而感到为难的许多神学家”以及一些降神术者想从第四维空间得到好处，那是白费心思。（同上）

很好！马赫不愿意加入神学家和降神术者的队伍。但是他在自己的认识论中怎样和他们划清界限呢？他说，只有三维空间才是现实的！如果你不承认空间和时间具有客观实在性，那又怎么能防范神学家及其同伙呢？原来，当你需要摆脱降神术者的时候，你就采用不声不响地剽窃唯物主义的方法。因为，唯物主义者既然承认现实世界、

我们感觉到的物质是客观实在，也就有权利由此得出结论说，任何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人类臆想，不管它的目的怎样，都不是现实的。而你们呢，马赫主义者先生们，当你们和唯物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就否认“现实”具有客观实在性，可是当你们要同彻底的、毫无顾忌的、公开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又偷运这个客观实在性！如果在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的概念里除了相对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如果这些相对的概念所反映的客观（=既不依存于单个人，也不依存于全人类的）实在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人类，为什么人类的大多数不能有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的概念呢？如果马赫有权在三维空间以外探求电的原子或一般原子，那么为什么人类的大多数无权在三维空间以外探求原子或道德基础呢？

马赫在同一本书中写道：“还没有过借助第四维来接生的产科大夫。”

绝妙的论据，但是，只有对那些认为实践是证实客观真理、证实我们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标准的人们来说，才是绝妙的论据。如果我们的感觉给我们提供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客观真实的映象，那么这种援引产科大夫、援引整个人类实践的论据是适用的。但是这样一来，整个马赫主义这个哲学派别就毫不中用了。

马赫在提到自己1872年的著作时继续写道：“我希望没有人会用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想、所说和所写的东西替任何鬼神之说辩护（die Kosten einer Spukgeschichte bestreiten）。”

不能希望拿破仑不是死于1821年5月5日。当马赫主义已经为内在论者服务而且还在服务的时候，不能希望它不为“鬼神之说”服务！

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马赫主义还不只是替内在论者服务。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请看一看这个哲学流派的那些不大像德国经验批判主义代表那样矫饰的法国代表和英国代表吧！彭加勒说，时空概念是相对的，因而（对于非唯物主义者来说的确是“因而”）“不是自然界把它们〈这些概念〉给予〈或强加

于，impose）我们，而是我们把它们给予自然界，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方便的”（上引书第6页）。这不是证明德国康德主义者兴高采烈是有道理的吗？这不是证实了恩格斯的话吗？恩格斯说，彻底的哲学学说必须或者把自然界当做第一性的，或者把人的思维当做第一性的。

英国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生的见解是十分明确的。他说道：“我们不能断定空间和时间是实际存在的；它们不是存在于物中，而是存在于我们感知物的方式（our mode）中。”（上引书第184页）这是直率的毫不掩饰的唯心主义。“时间像空间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这部大的分类机器用来整理（arranges）它的材料的方式（plans，直译：方案）之一。”（同上）卡·毕尔生照例是用确切明白的提纲形式叙述的最后结论如下：“空间和时间不是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的实在性，而是我们感知物的方式（样式，modes）。它们既不是无限大的，也不是无限可分的，按其本质来说（essentially），它们是受我们知觉的内容限制的。”（第191页，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第5章的结论）

唯物主义的这位认真而诚实的敌人毕尔生（我们再重复一遍，马赫一再表示他和毕尔生完全一致，而毕尔生也坦率地说他和马赫一致）没有给自己的哲学另造特别的招牌，而是毫不隐讳地说出他的哲学路线渊源于两位古典哲学家：休谟和康德（第192页）！

如果说在俄国有一些天真的人相信马赫主义在空间和时间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解答，那么在英国的文献里却可以看到，自然科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对马赫主义者卡·毕尔生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例如，请看生物学家劳埃德·摩根的批评：“自然科学本身认为现象世界是存在于观察者的心以外的，是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心的”，而毕尔生教授则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的⁽⁵⁾。“依我看来，作为科学的自然科学有充分根据来说明空间和时间是纯粹客观的范畴。我认为，生物学家有权研究有机体在空间的分布，地质学家有权研究有机体在时间上的分布，而不必向读者解释，这里讲的只是感性知觉、

积累起来的感性知觉、知觉的某些形式。也许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可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却是不适当的。”（第304页）劳埃德·摩根是恩格斯叫做“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的那种不可知论的代表，不管这种哲学具有怎样的“调和”倾向，可是要把毕尔生的观点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毕竟是不可能的。另一位批评家说道，在毕尔生那里，“起初心存在于空间中，后来空间存在于心中”⁽⁶⁾。卡·毕尔生的拥护者莱尔（R. J. Ryle）回答道：“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空学说，是从贝克莱主教以来关于人类认识的唯心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肯定的成就，这是不容怀疑的。毕尔生的《科学入门》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这本书里，我们也许是第一次在英国学者的著作里看到对康德学说的基本真理的完全承认，对康德学说所作的简短而明晰的说明……”⁽⁷⁾

可见，在英国，无论是马赫主义者自己，或者是自然科学家营垒中反对他们的人，或者是哲学专家营垒中拥护他们的人，都丝毫没有怀疑马赫关于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学说具有唯心主义性质。“看不出”这一点的只有几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著作家。

例如，弗·巴扎罗夫在《论丛》第67页上写道：“恩格斯的许多个别观点，比方说，他关于‘纯粹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现在已经陈旧了。”

当然啦！唯物主义者恩格斯的观点陈旧了，而唯心主义者毕尔生和糊涂的唯心主义者马赫的观点是最新的！这里最可笑的是巴扎罗夫甚至毫不怀疑：对于空间和时间的看法，即对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的承认或否认，可以归入“个别观点”，而和这位著作家在下一句话里所说的“世界观的出发点”相对立。这就是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80年代德国哲学时常说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的一个鲜明例子。因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同他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个别观点”对立起来，就像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同他关于剩余价值的“个别观点”对立起来一

样，是荒谬绝伦的。把恩格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同他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学说分开来，同他对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承认（就是承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分开来，同他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承认分开来，这就等于把完整的哲学变为杂烩。巴扎罗夫像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糊涂，他把人类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即这些概念的纯粹相对的性质，同下列事实的不变性混淆起来，这个事实就是：人和自然界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僧侣们所创造的、为人类中无知而又受压制的群众的臆想所支持的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是一种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不良社会制度的不良产物。关于物质的构造、食物的化学成分、原子和电子的科学学说会陈旧，并且正在日益陈旧；但是，人不能拿思想当饭吃、不能单靠精神恋爱生育孩子这一真理是不会陈旧的。否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正如否定上述真理一样，是荒诞的、内部腐朽的、虚伪的。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花招，正如伪君子鼓吹精神恋爱一样，整个说来是伪善的！

为了举例说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相对性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在这个问题上的绝对的（在认识论范围内）对立二者之间的差别，我还要引证一位很老的而且是十足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即休谟主义者舒尔采—埃奈西德穆在1792年写的一段有代表性的话：

“如果从我们之内的表象和思想的特性推论出‘我们之外的物’的特性”，那么，“空间和时间就是某种在我们以外的实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着的東西，因为只有在现存的（vorhandenen）空间中才能想象物体的存在，只有在现存的时间中才能想象变化的存在”。

（上引书第100页）

一点也不错！休谟的追随者舒尔采虽然坚决地批驳唯物主义并且丝毫不向它让步，但是他在1792年对空间和时间问题同我们以外的客观实在问题的关系所作的描述，正好和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在1894年对这种关系所作的描述相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最后一篇序言

上注明的日期是1894年5月23日）。这并不是说，100年来，我们的时空观念没有改变，没有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些观念的发展的新材料（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切尔诺夫和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瓦连廷诺夫在所谓驳斥恩格斯的时候所提到的材料）；这是说，不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卖弄什么“新”名称，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除了一些“新”名称，波格丹诺夫也没有给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旧哲学增添任何东西。当他重复赫林和马赫关于生理学空间和几何学空间的差别或者感性知觉的空间和抽象空间的差别的论述时（《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26页），他完全是在重复杜林的错误。人究竟怎样依靠各种感官感知空间，抽象的空间概念又怎样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从这些知觉中形成起来，这是一个问题；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实在同人类的这些知觉和这些概念是否符合，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后一个问题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但是波格丹诺夫由于对前一个问题进行了一大堆详细的研究而“看不出”这后一个问题，所以他不能明确地用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来反对马赫的糊涂观念。

时间像空间一样，“是各种人的经验的社会一致的形式”（同上，第34页），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具有普遍意义”（同上）。

这完全是骗人的话。宗教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它表现出人类大多数的经验的社会一致。但是，任何客观实在都和宗教的教义（例如，关于地球的过去和世界的创造的教义）不相符合。科学学说认为，地球存在于任何社会性出现以前、人类出现以前、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对其他行星说来）空间内。客观实在和这种科学学说（虽然，像宗教发展的每一阶段是相对的一样，它在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也是相对的）是相符合的。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空间和时间的各种形式适应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认识能

力。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认识日益正确而深刻地反映着客观的空间和时间，并日益适应它们。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编者注

[\[3\]](#)即《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编者注

[\[4\]](#)安东·冯·勒克列尔《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1879年布拉格版。

[\[5\]](#)1892年《自然科学》杂志[\[27\]](#)第1卷第300页。

[\[6\]](#)J. 麦·本特利论毕尔生，载于1897年9月《哲学评论》杂志[\[28\]](#)第6卷第5期第523页。

[\[7\]](#)雷·约·莱尔论毕尔生，载于1892年8月《自然科学》杂志第6期第454页。

6. 自由和必然

阿·卢那察尔斯基在《论丛》第140—141页上引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并且完全同意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惊人的一页”[\(1\)](#)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异常明晰确切的”评述。

这里的确有很多惊人的地方。而最“惊人的”是：无论阿·卢那察尔斯基，或者其他一群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都“没有看出”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他们读也读过，抄也抄过，可是什么都不了解。

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德文第5版第112—113页）[\(2\)](#)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整段论述是以哪些认识论的前提为根据的。

第一，恩格斯在他的论述中一开始就承认自然规律、外部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就是说，承认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叫做“形而上学”的一切东西。如果卢那察尔斯基愿意好好地想一想恩格斯的“惊人的”论述，就不可能不看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后二者否认自然界的规律性或者宣称它只是“逻辑的”等等。

第二，恩格斯没有生造自由和必然的“定义”，即反动教授（如阿芬那留斯）和他们的门徒（如波格丹诺夫）所最感兴趣的那些经院式的定义。恩格斯一方面考察人的认识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考察自然界的必然性，他没有提出任何规定、任何定义，只是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恩格斯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无须多费唇舌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会埋怨恩格斯给唯物主义所下的一般定义（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请回想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的“困惑莫解”！），同时又认为恩格斯对这个一般的基本的定义的一次个别应用是“惊人的”，是“异常确切的”！

第三，恩格斯并不怀疑有“盲目的必然性”。他承认存在尚未被人认识的必然性。这从上面所引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从马赫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人怎么能够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是存在的呢？怎么能够知道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是存在的呢？这难道不是“神秘主义”，不是“形而上学”，不是承认“物神”和“偶像”，不是“康德主义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吗？如果马赫主义者细想一下，他们就不会看不出，恩格斯关于物的客观本性的可知性和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点，同他关于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每一个个别人的意识的发展和全人类的集体知识的发展在每一步上都向我们表明：尚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之物”，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自在的必然性”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的必然性”。从认识论上说，这两种转化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基本观点是一个，都是唯物主义观点，都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认为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对人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但又是永远认识不完的。我们不知道气象中的自然界的必然性，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气候的奴隶。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必然性，我们却知道它是存在的。这种知识是从什么地

方得来的呢？它同物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这种知识同出一源，就是说，从我们知识的发展中得来的。我们知识的发展千百万次地告诉每一个人，当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时候，不知就变为知，相反地，当这种作用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知就变为不知。

第四，在上面所引的论述中，恩格斯显然运用了哲学上“获生的跳跃”方法，就是说，作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跳跃。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追随的那些博学的（又是愚蠢的）哲学教授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容许自己作出这种对“纯科学”的代表说来是可耻的跳跃。对他们说来，要想尽办法狡猾地用文字来捏造“定义”的认识论是一回事，而实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每一步，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完全是而且纯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的，建立在正面驳斥马赫主义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关于“要素”、关于“感性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一致”等等全部胡说的那些前提上的。马赫主义者对这些满不在乎，他们抛弃唯物主义，重复着（像别尔曼那样）关于辩证法的陈腐的混话，同时又热烈地欢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次应用！他们从折中主义残羹剩汁里获得自己的哲学，并且继续用这种东西款待读者。他们从马赫那里取出一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从马克思那里取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把它

们拼凑起来，于是含含糊糊地说这种杂烩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以及他们的其他一切权威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自由和必然）丝毫不了解，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那不过是他们没有读过某一本书的某一页罢了，决不是因为这些“权威”过去和现在对19世纪哲学的真正的进步完全无知，决不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哲学上的蒙昧主义者。

请看这种蒙昧主义者之一、维也纳大学最正式的哲学教授恩斯特·马赫的论述：

“决定论的立场正确还是非决定论的立场正确，这是无法证明的。只有至善至美的科学或者证明其不可能有的科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在考察事物时使用（man heranbringt）什么样的前提，要看我们究竟把多大的主观成分（subjektives Gewicht）归于以往研究的成败。但是在进行研究时，每个思想家在理论上必然是一个决定论者。”（《认识和谬误》德文第2版第282—283页）

用心地把纯粹的理论同实践割裂开来，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把决定论局限于“研究”的领域，而在道德、社会活动的领域中，在除开“研究”以外的其他一切领域中，问题则由“主观的”评定来解决，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这位博学的学究说，我在书房里是一个决定论者；可是，关于哲学家要关心建立在决定论上的、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世界观这一点，却根本不谈。马赫之所以胡说，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完全不明白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

“……任何一个新发现都暴露了我们知识的不足，都显示出至今尚未被看出的依赖性残余……”（第283页）妙极了！这个“残余”就是我们的认识日益深刻反映的“自在之物”吗？完全不是这样：

“……由此可见，在理论上维护极端的决定论的人，在实践上必定仍旧是一个非决定论者……”（第283页）瞧，分配得多好⁽³⁾：理论是教授们的事，实践是神学家们的事！或者：理论上是客观主义（即“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实践上是“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

[30]。俄国的小市民思想家，民粹派，从列谢维奇到切尔诺夫，都同情这种庸俗的哲学，这是不足为奇的。至于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迷恋这类胡说，羞羞答答地掩饰马赫的特别荒谬的结论，这就是十分可悲的了。

但是在意志问题上，马赫没有停留在糊涂思想和不彻底的不可知论上，而是走得远多了……我们在《力学》一书中读到：“我们的饥饿感觉同硫酸对锌的亲合力本质上没有差别，我们的意志同石头对它的垫基的压力也没有多大差别。”“这样〈就是说，抱这种观点〉就发现我们更接近自然界，而不需要把人分解成一堆不可理解的云雾似的原子，或者使世界成为精神结合物的体系。”（法译本第434页）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唯物主义（“云雾似的原子”或电子，即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了，也不需要那种承认世界是精神的“异在”的唯心主义了。但是承认世界就是意志的唯心主义还是可以有的！我们不仅超出唯物主义，而且超出“某一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我们可以向叔本华式的唯心主义打情骂俏！只要有人一提到马赫接近哲学唯心主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就装出一副无辜受辱的样子，可是又认为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最好来个默不作声。但实际上，在哲学文献中，很难找到一篇叙述马赫观点的文章不指出他倾向于意志的形而上学（Willensmetaphysik），即倾向于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尤·鲍曼指出了这一点⁽⁴⁾，而对鲍曼进行驳斥的马赫主义者汉·克莱因佩特也没有反驳这一点，反而说，马赫当然“接近康德和贝克莱甚于接近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经验论”（即自发的唯物主义；同上，第6卷第87页）。埃·贝歇尔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马赫在一些地方承认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在另一些地方又否认它，这只是证明他用语随便；事实上马赫无疑是接近于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的⁽⁵⁾。路加也承认有这种形而上学（即唯心主义）和“现象学”（即不可知论）的混合物⁽⁶⁾。威·冯特也指出了这一点⁽⁷⁾。宇伯威格—海因

策的近代哲学史教程也断定，马赫是一位“并非同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无关的”现象论者^[8]。

总而言之，除了俄国马赫主义者，谁都很清楚马赫的折中主义和他的唯心主义倾向。

^[1]卢那察尔斯基说：“……宗教经济学的惊人的一页。我这样说，不免会引起不信教的读者的微笑。”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不管你的用意多么好，你对宗教的谄媚所引起的不是微笑，而是憎恶^[29]。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154页。——编者注

^[3]马赫在《力学》中说道：“人们的宗教见解纯属私人的事情，只要他们不想强迫别人相信它们，不想把它们应用到属于其他领域的问题上去。”（法译本第434页）

^[4]1898年《系统哲学文库》^[31]第4卷第2期第63页，关于马赫的哲学观点的论文。

^[5]埃里希·贝歇尔《恩·马赫的哲学观点》，载于1905年《哲学评论》杂志第14卷第5期第536、546、547、548页。

^[6]埃·路加《认识问题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载于1903年《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400页。

^[7]《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31页。

^[8]《哲学史概论》1903年柏林第9版第4卷第250页。

第五章 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8. “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和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关于从最新物理学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的问题，并且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丝毫用不着怀疑，我们面前有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它不是以某一哲学体系为转移，而是由哲学之外的某些一般原因所产生的。上面对各种材料的概述，无疑地表明了马赫主义是和新物理学“有联系”的，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散播的关于这一联系的看法是根本不正确的。不论在哲学上或在物理学上，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盲目地赶时髦，不能够根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某些思潮作一个总的概述，并对它们的地位作出评价。

关于马赫哲学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最新的自然科学的实证论”等等（波格丹诺夫在《感觉的分析》序言第IV、XII页里这样讲过；参看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一伙人的同一说法）的一切空泛议论充满了双重的虚伪。因为，第一，马赫主义在思想上只和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联系。第二，这也是主要的一点，在马赫主义中，和这个学派有联系的，不是使马赫主义同其他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流派和体系相区别的东西，而是马赫主义和整个哲学唯心主义共有的东西。只要看一看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思潮，就会毫不怀疑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就拿这个学派的物理学家德国人马赫、法国人昂利·彭加勒、比利时人皮·杜恒、英国人卡·毕尔生来说吧。正如他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正确地承认的，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有同一基础和同一倾向，但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包括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学说，特别是不包括马赫关于“世界要素”的学说。后三个物理学家甚至都不知道这两种学说。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哲学唯心主义。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倾向于它。拿那些以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为依据的、极力在认识论上加以论证和发展的哲学家来说吧。你们在这里又

会看见德国的内在论者，马赫的门徒，法国的新批判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英国的唯灵论者，俄国的洛帕廷，还有唯一的经验一元论者亚·波格丹诺夫。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贯彻哲学唯心主义，不过在贯彻过程中，有的是急急忙忙地倾向信仰主义，有的则对信仰主义怀着个人的厌恶（亚·波格丹诺夫）。

我们所考察的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否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或者是怀疑这种实在的存在。在这里，这个学派离开了被公认为在物理学家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它被不确切地称为实在论、新机械论、物质运动论；物理学家本人一点没有自觉地去发展它），是作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学派而离开唯物主义的。

要说明“物理学”唯心主义这个听起来很古怪的术语，必须提一提最新哲学和最新自然科学的历史上的一段插曲。1866年，路·费尔巴哈攻击著名的最新生理学的创始者约翰奈斯·弥勒，并把他列入“生理学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第197页）。这个生理学家的唯心主义在于：他从我们感官同感觉的关系上研究感官机制的功用，例如，他指出光的感觉是由对眼睛的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的，他想由此否定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映象。路·费尔巴哈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自然科学家的一个学派的这种“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即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某些生理学成果的倾向。生理学和哲学唯心主义，主要是和康德派哲学唯心主义的“联系”，后来很长时间被反动哲学利用了。弗·阿·朗格曾以生理学为王牌来维护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驳斥唯物主义；而内在论者（亚·波格丹诺夫竟错误地把他们归入介于马赫和康德之间的路线）中的约·雷姆克却在1882年特别起来反对用生理学虚伪地证实康德主义⁽¹⁾。那个时期许多大生理学家追求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正如现在许多大物理学家追求哲学唯心主义一样，这是不容争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即19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的唯心主义，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也没有证实唯心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这正如弗·阿·朗格和“生理学”唯心主义者曾经枉费心机一样。在这两种场合下，自然科学一个门类中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所显露的转向反动哲学的倾向，是暂时的曲折，是科学史上暂时的疾病期，是多半由于已经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疾病。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和现代物理学危机的联系是公认的。阿·莱伊写道：“怀疑论批判用来反对现代物理学的论据，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切怀疑论者的一个著名论据：意见分歧（物理学家中间的）。”他与其说是指怀疑论者，毋宁说是指像布吕纳蒂埃尔那样的信仰主义的公开信奉者。但是这些分歧“没有对物理学的客观性提出任何反证”。“物理学的历史同任何历史一样，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时期，各个时期都以理论的不同形式、不同概貌为特征……只要有一个由于确证了当时还不知道或者估计不足的某一重要事实而影响到物理学各个部分的发现一出现，物理学的整个面貌就改变了，新的时期就开始了。在牛顿的发现以后，在焦耳—迈尔和卡诺—克劳胥斯的发现以后，都有过这种情形。看来，在发现放射性以后，也在发生同样的情形……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后，观察事件的历史学家，会很容易地在当代人只看到冲突、矛盾、分裂成各种学派的地方，看到一种不断的进化。看来，物理学近年来所经历的危机，也是属于这类情况的（不管哲学的批判根据这个危机作出什么结论）。这是伟大的新发现所引起的典型的发育上的危机（*crise de croissance*）。不容争辩，危机会引起物理学的改革（没有这点就不会有进化和进步），可是这种改革不会改变科学精神。”（上引书第370—372页）

调和者莱伊极力要把现代物理学的一切学派联合起来反对信仰主义！这是好心肠的虚伪，然而终究是虚伪，因为马赫—彭加勒—毕尔生学派倾向于唯心主义（即精致的信仰主义），是不容争辩的。与不

同于信仰主义精神的“科学精神”的基础相联系的、并为莱伊所热烈拥护的那个物理学的客观性，无非是唯物主义的“羞羞答答的”表述方式。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正如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一样，将克服所有一切危机，但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现代物理学的危机就在于它不再公开地、断然地、坚定不移地承认它的理论的客观价值，——调和者莱伊常常力图掩盖这一点，但是事实胜于一切调和的企图。莱伊写道：“数学家习惯于研究这样一种科学，它的对象至少从表面看来是学者的智慧所创造的，或者说，它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不涉及具体现象，因此他们对物理学就形成了一种过于抽象的看法。他们力图使物理学接近数学，把数学的一般理论搬用于物理学……一切实验家都指出，数学精神侵入（invasion）物理学的判断方法和对物理学的理解中去了。对物理学的客观性的怀疑和思想动摇，达到客观性所走的弯路以及那些必须克服的障碍，往往不就是因为这种影响（并不因为它有时隐蔽而就失去效力）而产生的吗？……”（第227页）

这说得好极了！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就是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

“……数学的抽象虚构，似乎在物理的实在和数学家们为理解关于这个实在的科学而使用的方法之间设置了一重屏障。数学家们模糊地感觉到物理学的客观性……当他们着手研究物理学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是客观的，他们力求依靠实在并固守这个据点，可是旧日的习惯在起作用。所以，一直到唯能论这种想比旧的机械论物理学更扎实地和更少用假说来构想世界，力图模写（décalquer）感性世界而不是重建感性世界的理论，我们总是在同数学家们的理论打交道……数学家们曾经用一切办法拯救物理学的客观性，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客观性就谈不上物理学……但是他们的理论的复杂性，他们所走的弯路，给人留下了一种笨拙的感觉。这未免过于做作，太牵强附

会，矫揉造作（édifié）；实验家在这里感觉不到那种不断和物理的实在接触时所产生的自发的信赖……实质上，这就是一切物理学家——这些人首先是物理学家（他们是不可胜数的），或者仅仅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话，这就是整个新机械论学派所说的话……物理学的危机在于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在19世纪，物理学的进步和数学的进步使这两门科学密切地接近了……理论物理学变成了数学物理学……于是形式物理学即数学物理学的时期开始了；这种物理学成为纯粹数学的物理学了，它已不是物理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数学的一个门类。数学家过去已习惯于使用那种成为自己工作的唯一材料的概念（纯逻辑）要素，觉得自己受到那些他认为不大顺从的粗糙的物质要素的约束，在这个新阶段上，他们不能不尽量地把这些物质要素抽象掉，把它们想象为完全非物质的、纯逻辑的，或者甚至根本无视它们。作为实在的、客观的材料要素，即作为物理要素的要素，完全消失了。剩下的仅仅是微分方程式所表示的形式关系……只要数学家不为自己头脑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所愚弄……就会看到理论物理学和经验的联系；但是初看起来，以及对于没有基本知识的人说来，大概会觉得这是随意构造理论……概念、纯概念代替实在的要素……这样，由于理论物理学采用了数学形式，便历史地说明了……物理学的微恙（le malaise）、危机及其表面上同客观事实的脱离。”（第228—232页）

这就是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第一个原因。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产生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同类的单纯的物质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忘记了物质。“物质在消失”，只剩下一些方程式。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仿佛是通过新的方式得到了旧的康德主义的概念：理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非常欣赏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精神的赫尔曼·柯亨，竟鼓吹在中学教授高等数学，以便把我们的唯物主义时代正在排除的唯心主义精神灌输给中学生（阿·朗格《唯物主义史》1896

年第5版第2卷第XLIX页)。当然，这是反动分子的痴心妄想；事实上，除了少数专家对唯心主义的极短暂的迷恋以外，这里什么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像快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一样，企图用多么巧妙的手段来人为地为那种由于无知、闭塞和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荒诞不经现象而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信仰主义保持或寻找地盘。

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关于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对于说明马赫主义的理论厄运，几乎是最重要的问题。例如，莱伊像一切欧洲实证论者一样，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仅仅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因此，虽然他感觉到新物理学在相对主义上失足，可是他仍然绝望地挣扎着，企图把相对主义区分为适度的和过分的。当然，“过分的相对主义纵然不是在实践上，也是在逻辑上近似真正的怀疑论”（第215页），但是，要知道，在彭加勒那里，没有这种“过分的”相对主义。真了不起，像秤药那样多秤一些或少秤一些相对主义，就可以改善马赫主义的境况！

实际上，关于相对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来的，所以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单是不了解这一点，就足以使别尔曼先生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这本荒谬的小册子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别尔曼先生关于他所完全不懂得的辩证法只是重复了陈词滥调。我们已经看到，一切马赫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每一步都暴露出同样的无知。

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包括那些被认为是不容争辩和不可动摇的旧真理在内，都是相对真理，——这就是说，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

观真理是不会有的。不仅整个马赫主义，而且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都是这样断定的。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这一切论点，对于所有钻研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现代”认识论来说却是无法理解的。

像马赫特别推荐的皮·杜恒的《物理学理论》^[2]或斯塔洛的《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3]这一类著作，非常明显地表明：这些“物理学”唯心主义者最重视的是证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而实质上他们动摇于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这两个处于不同的时代并且从不同的观点研究问题的作者（杜恒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工作了20年；斯塔洛以前是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却又因他在1848年出版了一本按照老年黑格尔派^[32]的精神写出的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而感到羞惭），都极力攻击原子论—机械论的自然观。他们证明这种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证明不能认为这种自然观是我们知识的界限，证明那些持这种自然观的作家们的许多概念是僵化的。旧唯物主义的这种缺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这都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摒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例如，斯塔洛说：“机械论的理论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把局部的、观念的、也许是纯粹假设的属性群或个别属性实体化，把它们说成是各种各样的客观实在。”（第150页）如果你们不拒绝承认客观实在，并且攻击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那么这是对的。斯塔洛并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他不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

杜恒也是一样。他费了莫大的力气，从物理学史上引用了许多在马赫的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有趣的、有价值的例子来证明“物理学的任何一个规律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它们是近似的”（第280页）。马克思主义者在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冗长议论时会这样想：这个人在敲着敞开的大门！但是杜恒、斯塔洛、马赫和彭加勒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他们由于不能对相对主义提出正确的表述，便从相对主义滚向唯心主义。杜恒写道：“其实，物理学的规律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近似的。”（第274页）这个“而是”，就已经开始虚伪，开始抹杀近似地反映客体的（即接近于客观真理的）科学理论和任意的、幻想的、纯粹假设的理论（例如，宗教理论或象棋理论）之间的界限。

这种虚伪竟使杜恒宣称：“物质的实在”是否和感性现象相符合这一问题是形而上学（第10页），因此取消关于实在的问题吧，我们的概念和假说不过是符号（signes，第26页）、“任意的”（第27页）构造等等。从这里只走一步就达到唯心主义，就达到皮埃尔·杜恒先生按照康德主义的精神所宣扬的“信仰者的物理学”（莱伊的书第162页；参看第160页）。而好心肠的阿德勒（弗里茨）——也是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所想出的最聪明的办法是这样地“改正”杜恒的理论：杜恒所排除的“隐藏在现象后面的实在，只是作为理论对象的实在，而不是作为现实对象的实在”⁽⁴⁾。这是我们早就熟悉的根据休谟和贝克莱的观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但是皮·杜恒说不上有什么自觉的康德主义。他不过是也像马赫那样摇摆不定，不知道使自己的相对主义依据什么。在好多地方，他非常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他说，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在同我们发生关系时的那种声音，而不是在发声物体中本来那样的声音。声学理论使我们可以认识这种实在，而我们的感觉从这种实在中发现的只是外在的和表面的东西。声学理论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知觉只是把握着我们称之为声音的那种表面现象的地方，确实有一种很小的、很迅速的周

期运动”等等（第7页）。物体不是感觉的符号，而感觉却是物体的符号（更确切些说是映象）。“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不停地提供材料的自然界和不停地进行认识的理性之间的不间断的斗争”（第32页）——自然界正如它的极微小的粒子（包括电子在内）一样是无限的，可是理性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也同样是无限的。“实在和物理学规律之间的斗争将无限地延续下去；实在迟早会对物理学表述的每个规律予以无情的驳斥——用事实加以驳斥；可是物理学将不断地修正、改变、丰富被驳斥的规律。”（第290页）只要作者坚持这个客观实在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那么这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十分正确的阐述。“……物理学的理论不是今天方便明天就不适用的纯粹人造的体系；它是实验方法所不能直接〈直译是：面对面地——face à face〉观察的那些实在的愈来愈合乎自然的分类，愈来愈清楚的反映。”（第445页）

马赫主义者杜恒在最后一句话里向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递送秋波：似乎给“实验方法”以外的方法开辟了一条小路，似乎我们不能径直地、直接地、面对面地认识“自在之物”。但是，如果说物理学的理论愈来愈合乎自然，那就是说，这个理论所“反映”的“自然”、实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的，——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⁵⁾。现代物理学正在走这一步，而且一定会走这一步，但它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走向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中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痛苦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还必然

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经验符号论、经验一元论等等，都是这一类废物。

[\(1\)](#) 约翰奈斯·雷姆克《哲学和康德主义》1882年爱森纳赫版第15页及以下各页。

[\(2\)](#) 皮·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1906年巴黎版。

[\(3\)](#) 约·伯·斯塔洛《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1882年伦敦版。有法译本和德译本。

[\(4\)](#) 杜恒著作的德译本的《译者前言》，1908年莱比锡J. 巴特出版社版。

[\(5\)](#) 著名的化学家威廉·拉姆赛说道：“常常有人问我：难道电不是一种振动吗？怎样才能用微小的粒子或微粒的移动来说明无线电报呢？对此回答如下：电是物；它就是〈黑体是拉姆赛用的〉这些极小的微粒，但是当这些微粒离开某一物体时，一种像光波一样的波就通过以太[\[33\]](#)散播开来，而无线电报使用的就是这种波。”（威廉·拉姆赛《传记性的和化学的论文集》1908年伦敦版第126页）拉姆赛叙述了镭转化为氦之后指出：“至少有一种所谓的元素现在不能再看做是最终物质了；它本身正转化为更简单的物质形式。”（第160页）

“负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而正电是一种失去负电的物质，也就是说，是减去这种带电物质的物质。”（第176页）“什么是电？从前人们以为有两种电：正电和负电。当时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明，过去一向叫做负电的东西，确实（really）是一种实体。事实上负电的粒子的相对重量已经测定；这种粒子约等于氢原子质量的七百分之一……电的原子叫做电子。”（第196页）如果我们的那些以哲学题目著书立说的马赫主义者会动脑筋，那么他们就会了解，“物质在消失”、“物质归结为电”等等说法，不过是下述真理在认识论上的一种无力的表现：能够发现物质的新形式、物质运动的新形式，并把旧形式归结为这些新形式，等等。

第六章 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就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和《俄国财富》杂志^[34]的撰稿者，他们不论在哲学或历史方面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的始终如一的反对者；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那一伙马赫主义者，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千方百计地向读者保证：马赫主义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但是，这些保证大部分仅仅是保证而已：没有任何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曾打算稍微系统地去阐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在社会科学中的真实倾向。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先谈载入文献中的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言论，然后再谈他们的俄国弟子们的言论。

2. 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列宁在意大利卡普里岛高尔基家做客时同亚·波格丹诺夫下棋(1908年)

波格丹诺夫在他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命的发展》（1902）这篇论文中（见《社会心理学》第35页及以下各页），引证了“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在《批判》一书的序言⁽¹⁾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段著名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证马克思的这段话以后说：“历史一元论的旧公式，虽然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可是已经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了。”（第37页）因此，作者想从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去修正或发展这个理论。下面就是作者的主要的结论：

“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形态属于广泛的类即生物学适应的类。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确定了社会形态的范围；为了确定这个范围，不仅要确定类，而且要确定种……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第50、51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

这个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已由正统派指出了（《哲学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183页及以前几页）。但是波格丹诺夫仅仅用谩骂来回敬她，挑剔引文中的错误，说原文本来是“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而正统派却引成了“按完全的含义”。错误是有的，作者完全有权利加以纠正，但抓住这点大叫“曲解”、“偷换”等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LIV页），这不过是用抱怨的话来模糊分歧的实质而已。不管波格丹诺夫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个词想出了怎样“确切的”含义，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们所引的他的那个论点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人们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

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波格丹诺夫企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来悄悄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这显然是按照唯心主义的精神来歪曲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想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让我们回想下巴扎罗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说明（不是对经验一元论的说明，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在这些“体系”之间有着很大很大的差别呀！）：“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识存在的同一论。我们再回想一下内在论者威·舒佩（他像巴扎罗夫之流一样拼命地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心主义者，并且也像波格丹诺夫一样坚决地声明他的用语有特别“确切的”含义）的公式：“存在就是意识。”现在请把这个公式和内在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驳斥对比一下。舒伯特—索尔登是这样说的：“任何物质的生产过程，总是它的观察者的一种意识过程……在认识论上，外部生产过程不是第一性的（*prius*），而主体或诸主体才是第一性的；换句话说，甚至纯粹物质的生产过程也不能引导〈我们〉脱离意识的普遍联系（*Bewußtseinszusammenhangs*）。”（见上引书《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第293页和第295—296页）

波格丹诺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诅咒唯物主义者，说他们“歪曲了他的思想”，可是任何诅咒都不能改变简单明了的事实。“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发展，跟唯心主义者和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驳斥，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波格丹诺夫硬说自己不是唯心主义者；舒伯特—索尔登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巴扎罗夫甚至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这时代，哲学家不能不宣称自己是“实在论者”、“唯

心主义的敌人”。马赫主义者先生们，现在是应该懂得这点的时候了！

内在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和经验一元论者，在枝节问题上、在唯心主义的一些说法上相互争论着，而我们则根本否定他们三者所共有的一切哲学基础。就算波格丹诺夫在接受马克思的一切结论时最好心好意地宣传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但我们还是要说：波格丹诺夫减去“经验一元论”（更确切些说，减去马赫主义），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如果有个别的人把这种理论跟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调和起来，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比他们的理论要好些，但决不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理论上的歪曲是正当的。

波格丹诺夫把自己的理论跟马克思的结论调和起来，为这些结论牺牲了起码的彻底性。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波格丹诺夫承认这一切。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事实上被他抛弃了，成了空洞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成了像“普遍代换说”或“要素”说、“嵌入”说以及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谬论那样空洞的、僵死的、无用的东西。但是“僵死的东西抓住了活的东西”。僵死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违反波格丹诺夫的意志并且不依赖于他的意识，把他的哲学变成了替舒伯特—索尔登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服务的工具，这些反动分子在几百个教授讲坛上用几千种调子把这种僵死的东西当做活的东西来宣传，以便反对活的东西，窒息活的东西。波格丹诺夫本人是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死敌。但波格丹诺夫的“代换”说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却为这些反动派服务。这是可悲的事实，然而的确是事实。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下面还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僵死的哲学唯心主义怎样抓住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在1901年所著的《什么是唯心主义？》（同上，第11页及以下各页）一文中写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人们对进步的见解是一致的地方或是不一致的地方，进步观念的基本含义始终只有一个，即意识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完满与和谐。进步概念的客观内容就是如此……如果现在把我们所得出的进步观念在心理学上的表现和以前阐明的生物学上的表现（“生物学上的所谓进步就是生命总数的增长”，第14页）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深信：前者是和后者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从后者中引申出来……由于社会生活归根到底就

是社会成员的心理生活，所以进步观念的内容在这里也还是生活的完满与和谐的不断增长，只要加上‘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几个字就行了。当然，社会进步的观念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内容。”（第16页）

“我们发现……唯心主义表现着人的心灵中社会性较多的情绪对社会性较少的情绪的胜利；进步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趋向在唯心主义心理中的反映。”（第32页）

不用说，在这一套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玩意中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那里，我们可以随便发现许多毫不逊色的定义，这些定义除了说明作者的“一片好心”以外，什么也没有说明，而且表明作者完全不懂“什么是唯心主义”和什么是唯物主义。

在《经验一元论》第3卷中，在1906年写的《社会选择》（方法的基础）这篇文章中，作者一开始就驳斥“朗格、费里、沃尔特曼及其他许多人的折中主义的社会生物学的企图”（第1页），而在第15页上提出了下述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把唯能论和社会选择的基本联系表述如下：

社会选择的每一活动，就是与它有关的社会复合的能量的增加或减少。在前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肯定的选择’，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否定的选择’。”（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像这种难以形容的谬论竟然冒充马克思主义！难道还能想象出比罗列这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毫无意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生物学和唯能论的名词更无益、更死板、更烦琐的事情吗？这里没有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也没有一点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迹象，只有定义的编造，以及把这些定义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地是社会整体的能量的增长……”——这句话的后半句，无疑地只是用一些毫无内容的术语重复前半句，这些术语看起来好像是使问题“深刻化”了，事实上却跟朗格之流的折中主义的生物社会学的企图没有丝毫区别！——“但是，这个过程的不和谐的性质，导致它

以‘危机’、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能量的急剧减少而告终：肯定的选择被否定的选择代替了”（第18页）。

你们看，这不是朗格吗？在危机的现成结论上只是贴上生物学的和唯能论的标签，既没有补充一点具体材料，也没有说明危机的性质。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片好意，因为作者想证实和加深马克思的结论，但实际上他却用枯燥不堪的僵死的经院哲学来冲淡马克思的结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结论的重复而已，至于对这种结论的全部“新的”论证，全部“社会唯能论”（第34页）和“社会选择”，都不过是名词的堆砌，对马克思主义的十足嘲弄而已。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像“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给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现象贴上“唯能论的”或“生物社会学的”标签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死板了。问题不在于波格丹诺夫在这里企图把他的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成果和结论塞给马克思（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作的“修正”），而是在于他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即“社会唯能论”的方法完全是虚伪的，是跟朗格的方法毫无区别的。

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²⁾第2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3]

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基础，不在于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主义^[35]硬搬进社会学，而在于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

正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认识论上并没有发展唯心主义而是在旧的唯心主义的错误上增添一些自命不凡的胡诌瞎说的术语（“要素”、“原则同格”、“嵌入”等等）一样，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上即使最诚挚地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但还是以自命不凡的空洞浮夸的唯能论的和生物学的词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俄国的马赫主义（更确切些说，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的历史特点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杜林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所有这些哲学家和费尔巴哈比较起来，都是一些侏儒和可怜的庸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是在与此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

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至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接受了——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但并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因此，应当把波格丹诺夫这一流人叫做颠倒过来的俄国的毕希纳分子和杜林分子。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在波格丹诺夫那里，“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集体的劳动过程”等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掩饰唯心主义哲学的字眼，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宣称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外部世界是人类的“经验”或“经验符号”，物理自然界是“心理的东西”的“派生物”，等等。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1\)](#)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5页）。——编者注

[\(2\)](#)即《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671—672页。——编者注

4. 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我们还须要考察一下马赫主义对宗教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扩大成了哲学上究竟有没有党派以及哲学上的无党性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在以上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忽略了这两个基本倾向（例如，波格丹诺夫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唯心主义，因为他所采用的不是“自然界”和“精神”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类“经验的”概念。字眼改变了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时期内，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

“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尝试当做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类尝试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了解和看清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活动中所抨击和痛斥的。

我们刚才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卡·格律恩曾引用过马克思在1843年10月20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36]，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37]写一篇反对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写道：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吹牛大王，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 and 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¹⁾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叫做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在20世纪，或者叫做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3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²⁾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的“实证论”，把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称为可怜的模仿者，他们自以为消灭了黑格尔，而事实上却是重犯了黑格尔以前的康德和休谟的错误。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中也轻蔑地斥责“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³⁾，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还对他采取轻视的态度⁽⁴⁾。最后，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二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38]，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恩格斯谴责唯物主义者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来混淆问题的实质，谴责他夸夸其谈，采用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方法。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只有头脑被反动教授哲学腐蚀了的人才会看不见这种提法。直到1894年恩格斯给《反杜林论》的最后增订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像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小新体系的垃圾清除掉。

关于恩格斯探究过新哲学这一点可以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看出来。他在1888年写的序言中甚至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复活的现象，而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他除了表示极端的轻蔑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论在序言里或该书正文里）。很明显，恩格斯在看到德国和英国的时髦哲学重复黑格尔以前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旧错误时，甚至认为转向黑格尔^[39]（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会是有好处的，他希望这位大唯心主义者和大辩证论者能帮助人们看出浅薄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谬误。

恩格斯没有详细考察德国新康德主义和英国休谟主义的许许多多小流派，而根本否定它们的背弃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恩格斯宣称这两个学派的整个倾向是“在科学上开倒车”。那么，对于这些新康德

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例如他们之中的赫胥黎，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的无疑地是“实证论”的倾向，如果用流行的术语来说，无疑地是“实在论的”倾向，恩格斯是怎样评价的呢？恩格斯宣称：曾经迷惑过并且还在迷惑着无数糊涂人的那种“实证论”和“实在论”，至多也不过是暗中偷运唯物主义而当众对它谩骂和拒绝的一种庸俗手段！⁽⁵⁾只要稍微想一想恩格斯对托·赫胥黎这样一位最大的自然科学家，这样一位比马赫、阿芬那留斯之流更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者和更讲实证论的实证论者所作的这种评价，就可以懂得恩格斯会怎样鄙视现在的一小撮沉溺于“最新实证论”或“最新实在论”等等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因此他们对赫胥黎的评价完全是从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们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

约·狄慈根不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什么样的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约·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我们的约瑟夫·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⁶⁾，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

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Retraitebläser⁽⁷⁾）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⁸⁾，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智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做固体和液体，那么中间就是一摊糊状的东西。”⁽⁹⁾

正是如此！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糊状的东西，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

唯心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僧侣主义”，不过是通向公开的僧侣主义的前阶，这一点在约·狄慈根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他写道：“科学的僧侣主义极力想帮助宗教的僧侣主义。”（上引书第51页）“尤其是认识论的领域，对人类精神的无知”，是这两种僧侣主义在其中“产卵”的“虱巢（Lausgrube）”。约·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财富’、用生造的（geschraubter）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第53页）。“正如魔鬼是上帝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Kathederpfaffen）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第55页），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醉的（benebelter）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宗教”（第58页）。

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第60页），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第107页）。“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反动集

团。”（第108页）“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Welsch）所迷惑，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即研究哲学。”（第103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么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一种愚蠢奢望：“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像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其实，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因此，华德之流的英国唯灵论者、赞扬马赫攻击唯物主义的法国新批判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内在论者，都拼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约·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10\)](#)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他们既然相信了，也就沿着斜坡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他们读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著作，就相信奥斯特瓦尔德，转述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马赫的著作，就相信马赫，转述马赫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彭加勒的著作，就相信彭加勒，转述彭加勒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

料的专门的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而我们的那些奴颜婢膝地追随反动教授哲学的马赫主义者就是不善于做到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论丛》的作者们写道：“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其实，不是你们在探索，而是别人在探索你们，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你们根据你们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你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去探讨资产阶级时髦哲学的每一转变，而是这种时髦哲学在探寻你们，把它的那些适合唯心主义胃口的新花样塞给你们，今天是奥斯特瓦尔德的花样，明天是马赫的花样，后天又是彭加勒的花样。你们所天真地信仰的那些愚蠢的“理论”把戏（例如“唯能论”、“要素”、“嵌入”等等），始终没有超出狭隘的小学派的圈子，但这些把戏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倾向却立刻被华德分子、新批判主义者、内在论者、洛帕廷分子、实用主义者所抓住，并且尽着自己应尽的职责。对经验批判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正像对新康德主义和“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一样，很快就会消逝，而信仰主义却从每一次这样的迷恋中得到好处，并千方百计地变换自己的花招，以利于哲学唯心主义。

对宗教的态度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最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

我们来看一看前一个问题吧！卢那察尔斯基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部集体著作中谈到了“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宗教的无

神论”[\(11\)](#)等等，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那么只是因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把欧洲的整个马赫主义思潮及其对宗教的态度正确地告诉读者。这个思潮对宗教的态度不仅跟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甚至跟费尔巴哈的态度毫不相同，而且根本相反。例如，彼得楚尔特说经验批判主义“无论与有神论或无神论都不矛盾”（《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页），马赫说“宗教的见解是私人的事情”（法译本第434页），而科内利乌斯（他极力赞扬马赫，马赫也极力赞扬他）、卡鲁斯以及一切内在论者则宣传露骨的信仰主义、鼓吹露骨的黑帮思想。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中立，就是向信仰主义卑躬屈膝，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超出而且也不能超出中立态度，这是由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所决定的。

只要你们否定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如果说感性世界就是客观实在，那么其他的任何“实在”或冒牌实在（请回想一下，巴扎罗夫曾相信那些把神说成是“实在概念”的内在论者的“实在论”），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么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对唯物主义的仇视，对唯物主义者的种种诽谤，所有这一切在文明的民主的欧洲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且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大众面前把这一切掩盖起来，他们甚至一次也没有打算把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攻击唯物主义的胡言乱语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维护唯物主义的言论简单地对比一下。

但是“掩盖”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同信仰主义的关系，是无济于事的。事实是抹杀不掉的。这些反动教授由于华德、新批判主义者、舒佩、舒伯特—索尔登、勒克列尔、实用主义者等等同他们亲吻而遭到

的奇耻大辱，是世界上任何办法都不能洗刷干净的。现在列举的这些身为哲学家和教授的人物的影响之大，他们的思想在“有教养的”即资产阶级的人士中间传播之广，他们写的专门著作之多，都比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那个小小的专门学派要胜过十倍。这个小小的学派该为谁服务，就为谁服务；该被怎样利用，就被怎样利用。

卢那察尔斯基说出的可耻言论，并不是什么例外，而是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如果他的话里有直接的、普通的、即纯粹信仰主义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同作者交谈了，因为，大概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这些言论不使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得·司徒卢威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如果不是这样（而且的确还不是这样），那么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特殊”含义，并且在还有可能实行同志式的斗争的时候同他进行斗争。卢那察尔斯基的言论之所以可耻，就是因为他居然把这些言论和他的“善良的”意图联系起来了。他的“理论”之所以有害，就是因为这种理论为了实现善良的意图竟采用这样的手段或作出这样的结论。糟糕的是：所谓“善良的”意图，至多也不过是卡尔普、彼得、西多尔的主观的事情而已，至于这类言论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肯定的、无可争辩的，并且是任何的声明和解释所不能削弱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出，在卢那察尔斯基的“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和波格丹诺夫的心理东西对整个物理自然界的“普遍代换”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这是同一种思想，不过前者主要是用美学观点来表达的，而后者主要是用认识论观点来表达的。“代换说”默默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处理问题，它把“心理的东西”跟人分割开来，用无限扩大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样就把“人类最高潜在力”神化了。而尤什凯维奇的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的“逻各斯”又怎样呢？

一爪落网，全身被缚。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即冲淡了的精巧的信仰主义的网里去了；从他们认为“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而是特殊“要素”的时候起，他们就落网了。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的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

[\[1\]](#) 卡尔·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的发展的评述》187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361页。

[\[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14—25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672页。——编者注

[\[4\]](#) 关于实证论者比斯利（Beesley），马克思在1870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比斯利教授是一个孔德主义者，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的怪论（crotchet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3卷第167页。——编者注）请把这一点同1892年恩格斯对赫胥黎之流的实证论者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4—389页。——编者注）比较一下。

[\[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编者注

[\[6\]](#) 这又是一个欠妥的、不确切的说法，不应当用“形而上学者”，而应当用“唯心主义者”。约·狄慈根本人在其他地方是把形而上学者和辩证论者对立起来的。

[\[7\]](#) 直译是：吹倒退号的人。——编者注

[\[8\]](#) 请注意，约·狄慈根已经改正了错误，并且更确切地说明了谁是唯物主义的敌对派。

[\[9\]](#) 见他在1876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党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著作集》1903年版第135页。

[\[10\]](#)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利用。在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40\]](#)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a——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靠一般实证论思潮，特别是依靠奥斯特瓦尔德、马赫、毕尔生、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参看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年纽约和伦敦版，特别是第57和第106页）。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像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请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的真理定义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定

义：“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经验中的各种特定作业价值（working-values）的类概念。”（同上，第68页）

[\[11\]](#)《论丛》第157、159页。这位作者在《国外周报》[\[41\]](#)上曾谈到“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第3号第5页），而在《教育》杂志[\[42\]](#)上（1908年 期第164页）又公然写道：“新的宗教在我心中早已成熟了……”

结论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评价经验批判主义。

第一，首先必须把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本书前三章所作的这种比较，从认识论问题的各方面揭露了用新的怪论、字眼和花招来掩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旧错误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十足反动性。只有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的人，才会侈谈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第二，必须确定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哲学专家们的小学派在现代其他哲学学派中的地位。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从他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全盘地“清洗经验”，其实他只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第三，必须注意到，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特别门类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现今流行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就像不久以前流行过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

第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像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

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它拥有庞大的组织，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效劳，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7—9、33—46、95—104、122—153、156—173、179—199、316—328、337—346、351—363、374—375页

哲学笔记（节选）[\(1\)](#)（1895—1916年）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批语摘选）（1914年9—12月）

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77页）

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78页）

这是非常深刻的：自在之物以及它向为他之物的转化（参看恩格斯⁽²⁾）。自在之物一般地是空洞的、无生命的抽象。在生活中，在运动中，一切的一切总是既“自在”，又在对他物的关系上“为他”，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90页）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90页）

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91页）



伯尔尼图书馆阅览室。1914—1915年列宁曾在这里研究哲学问题

非本质的东西，外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比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07页）

外观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外观。外观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Scheinen）。（《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10页）

任何具体的东西、任何具体的某物，都是和其他的一切处于相异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关系中，因此，它往往既是自身又是他物。（《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15页）

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冲动”（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和abstrusen（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

示、理解、拯救^[43]、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

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年）还未被应用于生命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应用于社会，是先被宣布的（1847年），应用于人，是后来得到证实的（1859年）。^[44]（《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17—118页）

注意

（1）普通的表象抓到的是差别和矛盾，但不是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而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2）机智和智慧。

机智抓到矛盾，表达矛盾，使事物彼此发生关系，使“概念透过矛盾映现出来”，但没有表达事物及其关系的概念。

（3）思维的理性（智慧）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以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那上升到矛盾顶峰的多样性在相互关系中才成为活跃的（regsam）和有生机的，——才能获得那作为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19页）

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的神秘主义和空洞的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唯物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这些概念还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22页）

一条河和河中的水滴。每一水滴的位置、它同其他水滴的关系；它同其他水滴的联系；它运动的方向；速度；运动的路线——直的、曲的、圆形的等等——向上、向下。运动的总和。概念是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水滴（=“事物”）、各个“细流”等等的总计。按照黑

格尔的逻辑学，世界的情景大致是这样的，——当然要除去上帝和绝对。（《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22—123页）

一方面，应该从对物质的认识深入到对实体的认识（概念），以便探求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真正地认识原因，就是使认识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应该用两类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自然科学史中的例子，（2）哲学史中的例子。更确切些说：这里应该谈的不是“例子”——比较并不就是论证，——而是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技术史的精华。（《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33—134页）

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环节。（《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34页）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35页）

概念是人脑（物质的最高产物）的最高产物。（《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39页）

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像所有的哲学家一样，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的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2页）

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不仅是（1）一切概念和判断的联系、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是（2）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过渡，并且不仅是过渡，而且是（3）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东西。然而这是穿过迷雾般的极端“费解的”叙述才“透露出来的”。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和运

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7—148页）

（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把因果性从这个联系中分出来，是荒谬的。否定概念的客观性、否定个别和特殊之中的一般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黑格尔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所以他比康德及其他人深刻得多。这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含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9—150页）

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它是认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永恒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人脑（就是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人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52—153页）

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纳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Schluß），说主体（人）在“推理”的逻辑的“式”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

这不只是牵强附会，不只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

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0页）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5页）

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过渡=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过渡、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6页）

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8页）

生命产生脑。自然界反映在人脑中。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在技术中检验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们，从而也就达到客观真理。（《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70页）

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75页）

当逻辑的概念还是“抽象的”，还具有抽象形式的时候，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表现着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隔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却是客观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78页）

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标准。（《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1页）

[illegible]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3页）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3页）

认识……发现在自己面前真实存在着的東西就是不以主观意见（设定）为转移的現存的现实。（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碍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由于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由于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東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5页）

（人的活动的）目的未完成的原因（Grund）是：把实在当做不存在的東西（nichtig），不承认它（实在）的客观的现实性。（《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7页）

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的人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7页）

（1）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5）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

系着的。

(9)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 向自己的对立面？ 的过渡。

(10) 揭示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

(12) 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45]。

(13) 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 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 (否定的否定)。

(15) 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0—192页)

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要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它保持着肯定的东西，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中。(《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5页)

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过渡。否则，简单的、肯定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则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和肯定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存在于否定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保存着肯定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6页)

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表象比思维更接近于实在吗？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46]，而思维则把握而且应当把握。从表象中获得的思维，也反映实在；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7页）

（16）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过渡。（（15和16是9的实例））

^[1]*《哲学笔记》是列宁在1895—1916年间研读哲学著作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时所写的摘要、短文、札记和批语。这里摘选的主要是1914—1915年期间列宁研究唯物辩证法时所写的批语。列宁的这些批语包含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基本规律、主要范畴的深刻见解，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精辟观点以及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论述。其中对“辩证法的要素”的概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我们把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和研究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对自己1914—1915年间哲学研究的简要总结，其中揭示了辩证法的实质，分析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辩证规律，阐明了辩证发展观和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根本区别，分析了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以及一般、特殊和个别等范畴，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以及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

^[2]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317页）。——编者注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批语摘选）（1915年）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约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3页）

对于“发展原则”，在20世纪（还有19世纪末）“大家都同意”。——是的，不过这种表面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么一切就都相互过渡，因为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既然如此，那首先就要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相互过渡。——其次，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么这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同存在没有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

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5—216页）

[illegible]

定，即间断性）。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非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7页）

运动就是物体在某一瞬间在某一地点，在接着而来的另一瞬间则在另一地点，——这就是切尔诺夫追随所有反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者”而重复提出的反驳（参看他的《哲学论文集》）。

这个反驳是不正确的：（1）它描述的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本身；（2）它没有指出、没有包含运动的可能性；（3）它把运动描写为静止状态的总和、联结，就是说，（辩证的）矛盾没有被它消除，而只是被掩盖、推开、隐藏、遮闭起来。（《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8—219页）

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想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陋化、僵化。不仅思想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

这就是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这个实质。（《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9页）

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帮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39页）

认识向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辩证地进行：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为了更好地跃进（认识？）而后退。相合线和相离线：彼此相交的圆圈。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

（实践=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符合的标准。）（《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39页）

辩证的过渡和非辩证的过渡的区别何在？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44页）

理性（知性）、思想、意识，如果撇开自然界，不适应于自然界，就是虚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46页）

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批语摘选） [《小逻辑》（《哲学全书》）的目录]（1915年）

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同一、差别等等规律）——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一般进程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来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89页）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90页）

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
(批语摘选) (1915年)

因此:

哲学的历史

各门科学的历史

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

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

语言的历史, 注意:

+ 心理学

+ 感觉器官的

生理学

希腊哲学已经涉及所有这些成分

这些就是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中形成的知识领域

简单地说, 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全部知识领域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2页)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批语摘选）（1915年）

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复制（=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行为；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上帝）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所意识不到的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反过来说，就是在最精确的科学中，否认幻想的作用也是荒谬的：参看皮萨列夫论推动工作的有益的幻想以及空洞的幻想。[\[47\]](#)）（《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17页）

谈谈辩证法问题^[48]（1915年）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第3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¹⁾），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为此绞尽脑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²⁾）。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和-，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正电和负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在这里并不特别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在“自己运动”中、自生发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过程，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

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按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按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13]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49]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

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韦格勒译，第2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9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房屋。”——“

οὐ γὰρ ἂν θειήμεν

εἶναι τινὰ οἰχίαν παρὰ τὰς τινὰς οἰχίας.”）。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概念的因素、胚芽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我们在说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東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很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胚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过渡、转化、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不论是黑格尔（见《逻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折中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保尔·福尔克曼（参看他的《认识论原理》第……页^[50]）都把认识看做一串圆圈。

哲学上的“圆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

不！

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伽桑狄（斯宾诺莎？）。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51\]](#)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

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5—311页）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77—317页

[\(1\)](#)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0页。——编者注

[\(2\)](#)见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同上书，第313页）。——编者注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52\]](#)（节选）[\(1\)](#)（1894年春夏）

[\(1\)](#)*这是列宁批驳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重要著作。在节选的部分，列宁着重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及其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着重说明了物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思想的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等基本观点，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指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揭露了自由派和激进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和曲解，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结合起来。

第一编

《俄国财富》^[34]对社会民主党人发动进攻了。这个杂志的头目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10期上就宣布要对“我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一场“论战”。随后出现了谢·克里文柯先生的《论文化孤士》一文（第12期）和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学和生活》一文（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和第2期）。至于杂志本身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看法，谢·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第11期和第12期）中已作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策略仔细考察一下。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此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分析。在概略地叙述了阐明这个学说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以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用这样一大段话开始了他的批判。

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证词中极其琐碎的细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

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作这样的比较——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人们多么不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他们被马克思论述中的巨大论证力量所折服，只得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视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由此不禁令人想起考茨基在他的一本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中所选用的一段很恰当的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施托克的美名？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的作品时多用心！[\(1\)](#)

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他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光辉词句和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十分公正的。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那一大段话，会以为这全部力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为了更加渲染马克思表现自己逻辑力量的范围是狭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着重指出“极其琐碎的细节”、“细心”、“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一来，似乎马克思对于建立这些理论的方法，并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实质性的新东西，似乎他使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过去经济学家原有的范围以内，并没有将它扩大，并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

《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由此不禁令人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16年前同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先生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53]。那时，也许是时代不同，也许是感觉比较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无论在笔调上或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²⁾（原文是Das ö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经济运动规律）’，卡·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地坚持了他的主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更仔细地来考察一下这个批评家也承认是严格地坚持了的主旨吧。这个主旨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所属的那个圈子里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做Naturgesetz——自然规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国如此众多的社会学家写了大堆大堆的著作，说社会现象领域根本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领域，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既然如此，那对马克思的话又怎样理解呢？

发生这些疑问是自然的，必然的；当然，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回避这些疑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的同一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的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³⁾

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像我们听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像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

现在我们来分析《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它是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如此狡猾地企图加以回避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究竟是什么？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依靠的是如下这类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

“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学家既然认为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他就应当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这也是同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甚至谈不上什么发展，而只能谈

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这样描写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

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从总体上来探讨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可以看做是社会各经济形态历史上演进的几个时代。”^[4]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在《社会契约论》^[54]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都是很明显的）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穿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很多世纪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其次，再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5]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

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析，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对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各种历史问题的办法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作者本人谈到应该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总是举出生产关系。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概只有等到某个卡列耶夫的某本玄奥的历史著作在“经济唯物主义”这个条目内，用相应的号码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

而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合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的例子）。要知道，这样的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也是无用的。要知道，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既然你连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

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什么是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抛弃那些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并且能够把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像一个在什么是灵魂这个问题上写了一辈子“学术著作”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解释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心理学家，抛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直接去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基质（神经过程），而且，譬如说，分析并说明了某个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这部著作时，称赞它，说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不错，但是并不满意。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对心理学有完全新的观点，有科学心理学的特殊方法，就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这部著作中不是“仅仅有一些事实”吗？其中不是丝毫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资本论》自然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他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的议论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问题和说明问题，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做社会概念罢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

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是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义这一问题疑惑不解，那也许还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甚至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也许正因为他没有找到），却开始把这个学说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证了布洛斯所说的马克思宣布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的话，便毫不客气地推论下去，说这个理论企求“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此！！〉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像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明。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6]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种企求当然立即遭到马克思极其辛辣的反驳，见马克思为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而写的“信”^[55]），接着讥笑他自己所捏造的这种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确切的意见（其所以确切，是因为这一次是摘录，而不是转述）引出来，即把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尚

有待于创造”、“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史^[7]等语引出来，于是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话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得很小了！”要多么幼稚或多么自以为是的人，才会指望这种戏法不会被人识破呵！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讥笑办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可从下述例子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它们。”（即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历史哲学和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甚至也写成了（1845—1846年），但这部著作^[56]从未刊印。恩格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8]”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被发现以及随后在《宣言》中被阐述的时候，据作者之一自己承认，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知识是不够的。”

你看这种批评多么可爱！恩格斯说他们当时的经济“史”的知识不够，因此，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一般”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刊印出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这点曲解成这样，好像“做这样一件事情”，如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即作出《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制度所作的科学批判，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懂得概括全部历史哲学的尝试和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制度的尝试之间的差别，或者是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知识还不足以批判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太刻薄了，竟不让我们见识一下他断定这种不足所持的理由以及他自己的更正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不发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而集中全力来科学地分析一种社会组织，这只能表明他们有高度的科学诚实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定加上几句话来对此加以挖苦，说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自己承认缺乏制定这些观点的知识，这只表明他的论战手法既不证明他聪明，也不证明他体面。

再举一个例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历史理论，做了更多的工作。他有一部专门的历史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im Anschluß）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个‘就’字真是妙极了。美国人摩尔根的书⁽⁹⁾，出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经济唯物主义原理许多年以后，同经济唯物主义完全无关。”于是他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这本书，同时，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他们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



目 錄

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怎樣進行 反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鬥爭·····	1
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和司徒魯威先生 著作中對民粹主義的批評·····	89
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與說明·····	105
俄國社會民主派底任務·····	137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	163
註釋·····	181

1940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第2卷，该卷载有《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节录

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10]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宣称：“总之，在40年代末发现并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对历史科学的贡献，同达尔文理论对现代自然科学的贡献一样。”随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重复说，但是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它不仅没有经过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检验（《资本论》是“不相称的”著作：其中只有事实和细心研究而已！），甚至没有用哪怕是批判和排斥其他历史哲学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说明过。”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智的尝试”，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量重要问题，是可以完全回避的，尽管这些“机智的尝试”很机智地表明了“从空想开始的”社会学的空洞无物，尽管这部著作详细地批判了那种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暴力论”，亦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那么热心宣扬的“暴力论”。的确，对一部著作胡诌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比认真分析哪怕是其中唯物主义地解决了的一个问题，要容易得多；何况这样做又很保险，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大概永远也不会准许翻译这部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就不必为自己的主观哲学担心，可以把这部书叫做机智之作。

更为突出和更有教益的（为说明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或赋予空洞以思想形式），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评论。

“《资本论》中有一些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页，但是（这个“但是”妙极了！这甚至不是“但是”，而是有名的“mais”，译成俄语意思是“耳朵不会高过额头”^[57]）这些篇页也是按照此书的主旨，仅限于一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换句话说，《资本论》这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和它的上层建筑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宁愿回避这个分析：看呀，这

里仅仅说到“一个”时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想概括一切时期，并且概括到根本不具体谈及任何一个时期。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实质上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些“光辉”而空洞的泛泛之谈。在用空话来支吾搪塞的技巧方面，谁也比不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原来只是因为，马克思，“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所以不值得（单独地）从实质上涉及马克思的著作。多么深奥呀！“不是确立”，只“不过是涉及”！——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任何一个问题是多么容易呀！例如，既然马克思屡次说明，商品生产者的关系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契约等等原则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以此来确立唯物主义呢，还是“不过是”涉及呢？我们的哲学家以他特有的谦逊，避免作实质性的回答，而直接从他的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机智的尝试”中作出结论。

这个结论如下：“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40年以后，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之谜，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找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一术语，即子女生产，使人觉得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术语，以便同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保持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形成的。”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战手法的确一点也“不足为奇”！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组织^[58]，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谜⁽¹¹⁾。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的丰富材料，使他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的关系或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

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如此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非难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开最困难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到惊异，有些人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是在为自己辩护，什么东西是在痛斥自己。其次，我们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玩弄子女生产这个术语，以图在它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听的吗！？您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而这使我们联想到，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弄清楚历史，也没有弄清楚心理学。毫无疑问，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固然，它们在整个日益复杂的生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只要有一定的辩证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准备研究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我们的哲学家终于有幸由说空话⁽¹²⁾进而谈到事实了，而这些事实是确定的，可以检验的，是不允许“顾左右而言他”轻易绕过问题实

质的。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批评马克思的批评家是怎样证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

“作为遗产传下来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经济生产的产品”！！这是多么通达！多么响亮！多么优雅的语言！〉，而遗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可是第一，作为遗产传下来的，还有非物质财富，这表现在关心用父辈精神教育子女上。”总之，子女教育列入了遗产制度！例如俄国民法中有这样一条：“双亲应努力进行家庭教育，培养他们〈子女〉的情操，并促进政府意图之实现。”我们的哲学家莫非把这一点叫做遗产制度吗？“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说，既然没有当做遗产传下来的生产的产品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那么同样，没有‘子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和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理，也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

（咳，请你们注意这句话：复杂的心理与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这简直妙极了！）总之，遗产制度所以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可能有遗产制！是呀，这真算是发现了新大陆！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说从前俄国在采邑制度^[59]鼎盛时代，土地不能继承的话（因为当时土地只是被当做有条件的财产），那么，对这一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寻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于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的心理还不够复杂。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同子女教育、同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同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吗！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但这无非是想逃避明确回答问题的一种诡计，而且是一种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向我们只字不提遗产对

竞争究竟依赖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既然丝毫没有说明竞争与遗产制度之间的这个联系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那我们怎能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面上的转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就不可能产生。当分工渗入公社，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在市面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单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举出一个事实，但这又是一种奇谈怪论！他继续修正唯物主义：“至于氏族联系，那么它们在各文明民族的历史中，确实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又是一个遁词，不过是更加明显的遁词。究竟是什么生产形式呢？一句空话！），但还有一部分在它们本身的延续和普遍化中——在民族联系中发展了。”这样说来，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显然是从给学生们讲的儿童故事中得来的。按这个陈腐浅陋的道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13]，然后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不过是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连俄国历史的进程也一点都不了解。如果说古罗斯^[60]有过氏族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61]，这些氏族联系便不存在了，就是说，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62]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未必能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

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仅仅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大约从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普遍化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主导者和主人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这两件事实，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见解而已，其所以是庸俗见解，是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做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关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空话转到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里去了。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着，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浊水四溅。例如，他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件这一原理，于是便以深思的神情宣称这是“走极端”，他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得彼此破产”，据他说，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清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魔”。这种断语表明，这位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情当做独立因素来谈，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们已经看出，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多么深奥的认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会以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63]来对待国际^[64]，说“马克思是那个诚然已经瓦解但一定会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当然，如果像《俄国财富》第2期国内生活栏编者按小市民的庸俗见解所写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做国际团结的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

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国际，就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把被压迫者阶级组织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巴黎公社事变就够了，它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统治阶级的真正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慨的，正是他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如果他不赞成那些使欧洲工人为之而组织起来的思想，那他至少应当直率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说明他认为什么策略更适当，什么观点更正确。可是他并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只是在汪洋大海的空话中到处插入无聊的嘲笑。怎能不把这叫做污泥浊水呢？尤其是，如果注意到在俄国不允许公开为国际的思想和策略进行辩护，就更不能不把这叫做污泥浊水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时所使用的的手法也是这样的：他不愿费神去诚实地和确切地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给以直率而明确的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片断论据加以歪曲。请你们自己判断吧：“马克思太聪明，太博学了，所以他不会以为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就是他发现的……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梯子的〉下级⁽¹⁴⁾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是早已探明的真理”〉，或者说，他们对历来为探明这个真理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确能够影响一些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批评家在这些人的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战而胜之”（据说，《俄国财富》编辑部的同事就是这样来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的）。凡是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和浮夸。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

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他究竟怎样证明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怎样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曲解极为明显：他撇开这个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全部实质，而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这整个理论归结起来就在于“必然性”一词（“在复杂的实际情况下不能只援引必然性”），似乎这个理论的证据就在于历史必然性是这样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对学说的内容默不作声，只抓住它的名称，他自己竭力使马克思学说变成一枚“磨光了的金币”，现在却又加以讥笑。我们当然不去探究这种讥笑，因为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看够了。让他去翻筋斗，以博得布勒宁先生的欢心和满意吧（无怪乎布勒宁先生在《新时报》^[65]上抚摸了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顶^[66]），让他向马克思点头哈腰之后又悄悄地向马克思吠叫吧：“马克思同空想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即使没有这一点”，就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申论战的理由，“也是单方面的”。我们只能把这种伎俩叫做吠叫，因为他确实没有拿出一个实际的、确定的、经得起检验的异议来反对这场论战，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乐于谈论这个题目，认为这场论战对解决俄国社

会主义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简直无法回答这种吠叫，而只有耸耸肩膀说：

呵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67\]](#)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之后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不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瓦·沃·先生一起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派人士中间博得的称号）的一部分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想是“没有结果的”和“模糊不清的”。也许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弄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那么一大堆纸张，说了无数的小市民感伤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当怎样吸引群众参加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

配置的看法，对构成俄国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不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严肃的批评应当是：或者反对那种认为我国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或者反对关于这种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看法，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想触及这些严肃问题。他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68]对待，先把全部内脏剝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一个太一般的括弧！这个掩盖现代真正重大而迫切问题的外壳，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喜爱的领域，因此，他特别傲然自得地强调说，“经济唯物主义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看，关于当前俄国现实是由哪些阶级的斗争和在什么基础上构成的问题，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想必是一个太一般的问题，于是他避而不谈。可是对于英雄和大众（不管这是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或是地主大众）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他却极感兴趣。也许这确实是个“有兴趣的”问题，但责备唯物主义者集中全力来解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那不过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的爱好者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结束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时，又一次企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曾被职业经济学家默然抵制⁽¹⁵⁾，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恩格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还举了一个可笑的理由，说德国有许多大学！），他说：“马克思想到的决不是这类读者（工人），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很少有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科学界人士会持公正的态度和作出科学的批评，所以他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

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der große theoretische Sinn），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16\)](#)

还有一套颠倒黑白的把戏，也是针对唯物主义的，而且完全是按照第一个公式套下来的。“这个理论〈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命题就是如此，而证据则是：“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的著作中（像在布洛斯的大作里那样）个别具有历史内容的很好篇页，本来没有经济唯物主义商标也行，因为〈请注意“因为”二字！〉实际上〈原文如此！〉这些篇页考虑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音占优势。”结论……是：“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又是那套老把戏！为了证明这个理论没有根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首先是曲解它，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其实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17\)](#)），接着又确认，“实际上”唯物主义者用经济“很好地”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这个事实显然击中了作者自己），最后作出结论说，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套颠倒黑白的把戏倒是很妙地站住脚了！

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来“驳斥”唯物主义的一切。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任何批评，有的只是一堆空洞的妄自尊大的胡说。随便问一下什么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生产关系是其余一切关系的基础的观点，究竟提出过什么异议呢？他用什么反驳过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的社会形态以及这些形态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这一概念的正确性呢？他怎样证明那些即使是他提到的作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不正确的呢？任何人都一定会回答说：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没有举出任何反驳的理由，没有指出任何不正确的地

方。他只是在那里兜圈子，竭力用空话掩盖问题的实质，并顺便捏造种种无聊的遁词。

当这样一位批评家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继续反驳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难指望他会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全部差别在于他那种颠倒黑白的发明能力已经穷尽，他在开始利用旁人的了。

首先他大谈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甚至说伽法尼电学也同经济唯物主义有联系，因为伽法尼的实验对黑格尔也“发生了影响”。真是惊人的机智！这样说来，也可以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中国皇帝联系起来！这除了说明有人以胡说为乐事，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就是说，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我们又听到这种老一套的责难，说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责难看来已被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得够滥的了。这帮先生不能从实质上对这个学说提出任何反驳，就拼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动摇这个理论的根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采用了这种手法。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一章⁽¹⁸⁾成了他的借口。恩格斯在反驳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个黑格尔公式，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在自然界中根本不是罕见的现象。于是恩格斯引证自然历史方面（麦粒的发育）和社会方面的例子，例如起初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又如起初是原始唯物主义，然后是唯心主义，最后是科学唯物主义，等等。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

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选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既然已经断然声明，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事物都是荒谬的，说谁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辩证”过程的例子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是表露了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说，不可把理论的起源当做理论的罪过。但是，要在恩格斯这段议论中发现超乎理论起源的东西，那显然就必须证明，至少有一个历史问题，唯物主义者不是根据有关事实，而是借三段式来解决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证明过这点吗？丝毫也没有。相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用实际内容把空洞的辩证公式充实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可以把这个公式从这个内容上去掉，就像从杯子上去掉盖子一样，并不会改变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把有关未来的问题作为例外，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既然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什么又这样热心地和这个并不改变什么的盖子周旋呢？为什么说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他为什么在攻击这个盖子时公然撒谎骗人，说他是在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呢？

我当然不会去探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分析三段式的例子的，我重说一遍，因为这无论对科学唯物主义还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曲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态度，究竟有些什么根据呢？根据有二：第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玩了（或正确些说，从杜林那里剽窃了）一套歪曲捏造的手法。

关于第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

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方法对形而上学方法（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无疑也属于这个概念）的态度，我们在下面将尽力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议论为例加以说明。现在我们仅仅指出，凡是读过恩格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条注解和第2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会看出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欧洲通报》^[70]1872年第5期上描述辩证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71]）全部引来，这段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证过。马克思在《跋》中说，他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被人们理解得很差。“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马克思为要更明白地叙述自己的方法，于是摘引了上述短评中描述这个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要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在他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精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证明另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

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请那些因为人抱有自觉的“目的”，遵循一定的理想，而主张把社会演进从自然历史演进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精确地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精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所否定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无论对于过去或现在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与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严格科学地表述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精确的研究所应抱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这就是马克思从报章杂志对《资本论》的无数评论中挑选出来并译成德文的一段对辩证方法的描述，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这段对辩证方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十分确切的。试问，这里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三分法、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等等胡说，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吗？马克思紧接着这段描述之后还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按照三段式的辩证规律，决定现实的发展。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说，在我看来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过

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因而全部问题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及其必然的发展的肯定的理解”：三段式只能起着使庸人们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我卖弄起黑格尔的字眼来了”，——马克思在这个跋里说）的作用。现在要问，如果一个人想批判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即辩证法，他无所不谈，甚至连蛤蟆和拿破仑都谈到了，可就是不谈这个辩证法有何内容，不谈社会的发展是否真的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经济形态看做特殊的社会机体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否正确，对这些形态的客观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社会观念是否真的不决定社会发展反而为社会发展所决定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判这个人呢？是否可以说只是由于他不理解呢？

关于第二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批判”辩证法以后，就把这种“借”黑格尔三段式进行论证的办法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并且当然是扬扬得意地攻击这种办法。他说：“关于未来，社会内在规律纯粹是被辩证地提出来的。”（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例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必然使剥夺者被剥夺的论断，带有“纯粹辩证的性质”。马克思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理想”，“就其必然和毫无疑义来说，纯粹是维系在黑格尔三项式链条的最末一环上的”。

这个论据完全是从杜林那里拿来的，是杜林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1879年第3版第486—487页）里运用过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字不提杜林。话又说回来，也许这套歪曲马克思的手法是他的独出心裁吧？

恩格斯给了杜林一个绝妙的答复，而且他也引述了杜林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引恩格斯的答复^[72]就可以了。读者一定会看出，这个答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

“杜林说：‘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¹⁹⁾，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拄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拄辩证法的拐杖，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

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aufgehoben——这是黑格尔的专用术语），根据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遁词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将存在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20\)](#)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做‘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劳动者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懂俄语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准确），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俄文版第30页）[\(21\)](#)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

那么，——恩格斯继续说，——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俄文版第648页[\(22\)](#)及以下各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俄文版前35页）中所作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

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基础。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工具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工具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变为资本），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工具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东西，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成了和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使一切差别化为乌有的那种概念的混淆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奇迹和仿效黑格尔的逻各斯学说所玩弄的戏法——据杜林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好似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第125页）

读者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段驳斥杜林的出色议论，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断言，马克思把未来纯粹维系在黑格尔链条的最末一环上，断言对于未来的必然性的信念只能建立在信仰上⁽²³⁾。

杜林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间的全部区别，只有下列两小点：第一，尽管杜林一说起马克思就怒火万丈，但他毕竟认为必须在他那部《批判史》⁽²⁴⁾的下一节里提到马克思如何在跋⁽²⁵⁾中断然反驳了那种说他是黑格尔主义的责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说明自己是怎样理解辩证方法的那段话（上面引过的那段话）却避而不谈。

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动词时态的用法上。为什么马克思说到将来的时候使用现在时呢？——我们的哲学家扬扬得意地问道。可敬的批评家，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本语法书，它会告诉你，当将来的事情是必不可免和毫无疑义的时候，就要用现在时而不用将来时。但是，究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它是毫无疑义的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惊问

道，他想装出非常激动的样子，把歪曲捏造的把戏弥缝起来。马克思对这点也给了十分确定的答复。可以认为这个答复不充分或不正确，但那就必须指明究竟什么地方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而不是胡诌一通，说这是黑格尔主义。

有一个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本人知道这个答复是什么，而且还教训过别人。他在1877年写道，茹柯夫斯基先生尽可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但是，他“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马克思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劳动社会化问题。呵，当然咯！茹柯夫斯基在1877年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问题，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4年却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了！也许是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吧？！^[73]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发表在《祖国纪事》^[74]上的一则关于对这个社会化的见解的奇闻。该杂志1883年第7期载有一位局外人⁽²⁶⁾先生《给编辑部的信》，这位先生也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这位先生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是几百或几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磨着，锤着，转着，堆着，填着，拖着，以及还从事许多其他操作。这个制度的一般性质很可拿一句俗话来表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谈得上什么劳动的社会形式呢？”

这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算是把问题弄清楚了！“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一个场所内做工”！！既然连最优秀的俄国杂志之一都有这种奇怪见解，还居然有人要我们相信《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已为科学界所公认。的确，“公认的科学”既然不能用稍为像样的东西来反驳《资本论》，于是就恭维它，同时继续表现极其无知，重复着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陈词滥调。我们必须稍微谈谈这个问题，好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他按照自己的固定习惯而完全回避了的问题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决不在于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做工（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在于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

的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的减少，单独的工业部门数目的增多；就是说，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它来织布，工业部门并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单独的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业单独纺纱，织布业单独织布；这种生产单独化和生产集中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业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分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亚麻，自己纺麻和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句俗话，也就是说，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种棉花的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任何一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都不行。显然，“人人为自己”这句俗话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已经是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已没有立足之地，不管他是作为天空的幻影，还是作为人间的“金犊”^[75]）。制度的性质完全变了。在存在分散的小企业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了，只影响社会少数成员，并未造成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非常专业化的工业部门，而且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但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么，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只有有了这个企业的商品，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又由资本家各自经营，以他的意愿为转移，把社会产品归他私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同占有形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者，不能不也变成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这

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祖国纪事》的机智的庸人却把一切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内做工。真是胡说八道！（我所说的只是物质过程，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涉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方面，没有涉及工人的联合、团结和组织，因为这是派生的现象，第二位的现象。）

我们所以不得不向俄国“民主主义者”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他们全身浸透了小市民思想，除小市民制度外，根本不能想象其他的制度。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他拿什么来反驳马克思在作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的结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呢？他是不是证明了在实际上（在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条件下）社会劳动过程不是日益专业化，资本和企业不是日益集中，整个劳动过程不是日益社会化呢？没有，他没有举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反驳这些事实。他是不是动摇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不能与劳动社会化相容的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呢？他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是不是证明过一切资本家的劳动过程联合为一个社会劳动过程的现象能同私有制和平共居呢？是不是能想出除马克思指明的出路外，还可找到其他摆脱矛盾的出路呢？没有，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究竟靠什么来进行批评呢？靠颠倒黑白、歪曲捏造，靠无非是耍花招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批评家预先说了一大堆关于历史的三段一贯的步骤的废话，然后煞有介事地质问马克思：“以后又怎样呢？”也就是说，在他所描写的那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以后，历史将怎样前进呢？试问，对这种手法又能叫做别的什么呢？请注意，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例如参看《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76]）。他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要求，即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实际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己的分析。而米海洛夫

斯基先生避而不谈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实质，却提出他的“以后又怎样呢？”这个极其愚蠢的问题，并故作高深地补充说：“我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不完全懂得恩格斯的答复。”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却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们完全懂得这种“批评”的精神和手法！

或者再拿这样一段议论来说吧：“在中世纪，马克思所说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系方面，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解释的辩证方法〈莫非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吗？〉却不主张研究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甚至也不能表现出它的局部情况，而只能满足人们喜欢把任何事物都想象为有它的过去、现在、将来的那种爱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您的歪曲捏造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他在马克思的只求表述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公式⁽²⁷⁾里，先偷偷塞进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图，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这个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恢复的只是第一阶段的一个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随随便便地作出结论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

同这样一个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评杜林时所用的字眼）破例作出准确引证的人，难道可以进行严肃的论战吗？甚至不打算证明这个公式不对在哪里，就硬要大家相信这个公式“显然”不符合现实，难道这值得加以反驳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实际内容，却就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练习自己的机智。譬如说，恩格斯在反驳杜林先生的“永恒真理”时说，“今天向我们宣扬”三种道德，即基督教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可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道德论⁽²⁸⁾。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一点说道：“我认为历史分期的一切三分法，正是以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为基础的。”多么深奥啊！可是，谁不知道，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总会在这个现象中发现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

呢？譬如说，难道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其实他谈的只是“现在”）只限于上述三个阶段吗？难道曾想断言封建主义道德以前没有奴隶制道德，奴隶制道德以前没有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道德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认真批评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现代各派道德思想的尝试，却拿最空洞的词藻来款待我们！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一开始就声明他不知道在哪一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历史观，说到这种“批评”手法，提一下这位作者曾经知道这些著作之一并对它作过比较正确的评价，也许不无益处。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评《资本论》的：“如果去掉《资本论》的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在1877年“黑格尔辩证法”是“无用的”，而在1894年唯物主义却成了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那么，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为一定的领域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唯物主义学说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我们再往下看吧：

“老实说，全部《资本论》（黑体是我用的）研究的是一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怎样加强自己的典型特征，怎样使各种发现、发明、生产方式的改进、新的市场和科学本身从属于自己，使之同化，怎样迫使这些东西为自己服务，最后，这个形式又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在1877年，“全部《资本论》”是对一定社会形式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明社会形式吗？），而在1894年，却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哪部著作里去找这种唯物主义的叙述了！

在1877年，《资本论》是“研究”“这个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可不是吗？）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请注意这

点！）；而在1894年却变成根本没有任何研究了，资本主义形式经受不住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信念“纯粹”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环上”了！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对于这个社会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的分析，将永远〈黑体是我用的〉是这位作者的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的纪念碑”；而在1894年，他却宣称唯物主义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检验和论证！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70年代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因为自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对自由“嗤之以鼻”，曾同那些竭力掩盖俄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额的自由派”作过斗争，而且幻想过农民革命，但现在它已经完全变质了，产生了庸俗的小市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给人以“振奋人心的印象”，而忘记了这种潮流带来（和引起）的是农民大批地被剥夺；第二，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维护“热血志士”（即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不受自由派批评家的攻击为己任，而且是那样专心致志，竟没有发觉马克思的方法和他自己的方法互不相容。可是有人向他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之间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的文章和书就说明了这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说明了这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往往可以看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中肯的批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问题，反而索性放肆起来。他现在不是欢迎马克思（像他在1872年和1877年所表现的那样）^[77]，而是躲在居心叵测的赞词后面向他乱吠，并且大叫大嚷地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以“保护经济上的最弱者”为满足，不愿以货栈、农村改良、手工业博览馆和手工业劳动组合等等善良的小市民的进步办法为满足，而仍然想做“热血志士”，主张社会革命，要训练、领导并组织真正革命的社会分子。

讲了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话以后，看来可以把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的工作结束了。我们试把批评家的

“理由”归纳起来作一总结。

他想要摧毁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

关于第一点，批评家首先说他不知道在哪部著作中叙述过唯物主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叙述，于是自己捏造一套什么是唯物主义。为了使人觉得这个唯物主义有过分的企求，他捏造说唯物主义者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是后来，批评家查阅了马克思主义者原来的声明，发现他们自己认为只是说明了一个社会形态，于是批评家就断定唯物主义者缩小了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说这样他们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为了向人说明制定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便捏造说唯物主义者自己都承认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制定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承认（在1845—1846年）对经济史的知识不够，虽然他们从未刊印这部证明他们知识不够的著作。演了这样一些前奏之后，批评家就以如下的批评款待我们：《资本论》被推翻了，因为它只涉及一个时期，而批评家是需要各个时期的；因为《资本论》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不过是涉及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据大概很有分量并且很重要，所以只得承认唯物主义从未被科学地论证过。接着又用这样一件事来反驳唯物主义，说有一个与这个学说完全无关的人，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研究了史前时期，也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其次，为了表明把子女生产扯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完全不正确的，表明这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所作的指点，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真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辈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了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批评家在继续他的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钻研时，察觉到马克思主义者许多论据的内容都是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是“必然”的，这个制度“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连忙宣称：必然性是个太一般的括弧（如果不说清

楚人们究竟认为什么是必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批评家还说，马克思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是“单方面的”，可是只字不提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是怎样对待主观方法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对待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石——辩证方法，那只须这位大胆的批评家一推，就把它推翻了。而且这一下是推得很准的：批评家大卖气力来驳斥似乎用三段式可以证明什么东西的见解，可是闭口不谈辩证方法决不是三段式，不谈它恰恰是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另一下是专推马克思的：批评家在奋勇的杜林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不可思议的胡说偷偷加在马克思头上，似乎马克思在用三段式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然后批评家就得意扬扬地来攻击这个胡说。

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辉煌“胜利”的史诗！观察这些胜利，岂不是“大有教益”（布勒宁）吗？

这里还不能不涉及一点，这虽然与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弄清楚批评家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理解，却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他对西欧工人运动的态度。

上面已经引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说法，他说唯物主义在“科学”上（也许是在德国“人民之友”的科学上吧？）站不住脚，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说，这个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确实传播得很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他说：“至于经济唯物主义在所谓横的方面获得成就，即它以未经批判地检验过的形式广为传播，那么，这种成就并不是侧重于科学方面，而是侧重于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日常生活实践方面。”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实践这一拙劣词句的意思，不外是说唯物主义所以得到传播，不是因为它正确地说明了现实，而是因为它离开这个现实，转到远景方面去了。接着又说：“这种远景对领会它的德国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对热情关心德国工人阶级命运的人们所要求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批判的思考。它要求的只是信仰。”换句话说，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所以能广为传播，是因为这个学说答应给工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只要稍微知道一点社会主义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就可看出这种解释是极端荒谬和虚伪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29]，并且马克思严格地执行了这个纲领。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谁都知道，在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写的东西多得多，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吸引人类，说那时人们不需要有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剥削上，而是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尽管有一大批叙述过这种思想的极有才华的人物和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大机器工业还未把工人无产阶级群众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只要工人无产阶级斗争的真正口号还未发现，他们的理论始终是脱离生活的，他们的纲领始终是脱离人民的政治运动的。发现这个口号的是马克思，是很久以前（1872年）曾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评为“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的马克思。马克思发现这个口号，根本不是靠指出什么远景，而是靠科学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下剥削的必然性，探讨这个制度的发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然可以对《俄国财富》的读者武断说，领会这种分析既不需要知识，也不需要思考，可是，我们已经看出他本人对这种分析所探明的起码真理一窍不通（我们将会看到，他那位经济学家同事更是如此^[78]），所以他的这种说法自然只能使人付之一笑。不容置辩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起来，工人运动也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展开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学说正

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回避唯物主义在工人中间取得成就的真正原因，其手法是对这个学说如何对待“远景”作了与事实真相根本不符的介绍，现在他又开始用最庸俗的小市民的方式来嘲弄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策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实在举不出一个理由来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据，可是他却非常放肆地讥讽说，“无产者大军”正在准备剥夺资本家，“随后任何阶级斗争都会停止，天下就会太平，人间就会幸福”。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一条比这简单得多和正确得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人民之友”更详细地指出“明白的和确定不移的”实现“合乎心愿的经济演进”的道路，那时这些人民之友就一定会“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见《俄国财富》第11期尤沙柯夫先生《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可是暂时……暂时工人还应当等待一下，应当指望人民之友，不要抱着“没有根据的自信心”来独立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我们这位作者想彻底摧毁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声色俱厉地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词典里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科学居然是只值几文钱的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任何掩盖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庸人们觉得有失体面的廉价出版物叙述这个科学。请看，这些人盲目自信到了何等地步！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和庸人的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同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自己起来斗争就行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的第二部分，已经不是反对马克思的理论，而是专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谈这一部分以前，我们必须稍微离开一下本题。原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如他在批评马克思时不但没有打算确切地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反而完全歪曲了这个理论一样，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也是肆无忌惮地加以歪曲。必须恢复真相。要做到这一点，最方便的办法是把俄国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对照一下。讲到前一种思想时，我且借用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2年《俄国思想》^[79]第6期上发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并且——说来会使他惭愧——是以庄重口气谈到的，没有涉及那些只有按布勒宁方式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的问题，也没有污蔑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同马克思主义对立地——如果不是对立地，至少也是同它平行地——叙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丝毫不想侮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说，不想把他算做社会主义者，也丝毫不想侮辱俄国社会主义者，把他们都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等看待：我只是认为他们和他的论证程序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信念的坚定、率直和一贯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祖国纪事》的思想时写道：“我们向来把土地属于耕作者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理想。”出发点看来是极其善意的，充满了极其善良的愿望……“我国还存在着的中世纪劳动形式⁽³⁰⁾已大大动摇了，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完全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任何一种学说，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非自由派的。”

真是奇怪的议论！要知道，无论什么“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而且他的同道中也没有一个人）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的第二部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迎合一种学说。”“我们”（即社会主义者，——请看上述附带说明）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

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至于长处是自己的或别人的，那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际上方便不方便的问题。看来，这是这样简单明了，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所有一开始，并指出实现合乎心愿的事情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纯粹形而上学地把社会关系看做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的组合，看做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他从这些现象中抽出一种现象，即中世纪形式中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以为可以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的形式中去，就像一所房子上的砖可以砌到另一所房子上一样。但这不是在研究社会关系，而是糟蹋应该研究的材料，因为在现实中这种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并非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单独和独立地存在着，这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种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手段。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考察社会问题：他（再说一遍，我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议论只是当做例子，来批评整个俄国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做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做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而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

他根本没有想到旧劳动形式被新劳动形式排挤的原因问题，于是在谈论这些新形式时便重复着完全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只要指出这些形式“动摇着”土地属于耕作者的制度（总的说来，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并斥责这多么不符合理想就够了。他的议论又是十分荒谬的：他抽出一种现象（土地被剥夺），却没有把它当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另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商品经济则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和另一部分人发财。他指出了多数人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己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他把这种手法居然还叫做“寻求有血有肉的生活问题的答案”（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恰恰相反，他不能也不愿说明现实和正视现实，于是可耻地避开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样的生活问题，而躲入天真的空想领域中去；他把这叫做“寻求理想地处理迫切复杂的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一真正的现实。

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从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毫无意思地抽出个别要素，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中抽出这个，从“新”社会形态中抽出那个，如此等等，然后用这些东西给我们臆造了一个乌托邦。显然，建立在这上面的理论，不能不与现实的社会演进相脱离，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并不是由这儿那儿采纳来的要素构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决定农民和富农（善于经营的农夫）、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工人和厂主之间关系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我们的空想主义者所完全不了解的。他们想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他们所不了解的社会关系的企图和努力不能不遭到失败。

在“诞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的情形，概括说来就是如此。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批评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方法开始的；他们不以指出和斥责剥削现象为满足，他们力求说明这种现象。他们看见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多数人破产和少数人发财的历史，

目睹小生产者的大量遭受剥夺与普遍的技术进步同时存在，发现商品经济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并巩固起来，这两个绝对相反的潮流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产生和加强起来，所以他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他们所遇见的是必然使大众遭受剥夺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信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实践纲领。这个纲领归结起来就是加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入无产者阶级反对有产者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俄国从最偏僻的乡村到最新式完善的工厂的经济现实的主要内容。怎样加入呢？答案又是由现实本身提示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使生产社会化了，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虽然这个阶级遭受的资产阶级剥削，按经济实质来说，和俄国全体劳动群众遭受的剥削是同样的，但是这个阶级在谋求自身解放这个方面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上面的旧社会已经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使它有可能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社会民主党人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自觉，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全体无产阶级投入这个斗争。

[\(1\)](#)见戈·埃·莱辛《致读者格言诗》。——编者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编者注

[\(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编者注

[\(5\)](#)当然，这里说的始终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

[\(6\)](#)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409—410页脚注（89）。——编者注

[\(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页。——编者注

[\(8\)](#)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编者注

[\[9\]](#)指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编者注

[\[10\]](#)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编者注

[\[11\]](#)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没有放过机会来讥笑一下：咳，为什么这样，既然有科学的历史观，而古代史却是一个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可以知道，氏族组织问题是曾引起许多理论来加以说明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12\]](#)责备唯物主义者没有搞清楚历史，却不试图把唯物主义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作的许多唯物主义说明的任何一种拿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本来是可以证明的，但我们不来研究这一点，——的确，像这样的手法，不是说空话又是什么呢？

[\[13\]](#)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观念，因为分散的小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才占统治地位；这种家庭，在史前时期是根本没有的。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

[\[14\]](#)谈到这个无聊的用语时，必须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挑出马克思（他太聪明，太博学，所以我们的批评家不能够直率而公开地批评他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摆出恩格斯（“没有那么多创作才智的人”），再后摆出多少有点独立见解的人，如考茨基，以及其余的马克思主义者。试问这种分法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如果批评家不满意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解说者，谁又妨碍他按照马克思学说来纠正他们呢？他丝毫没有这样做。显然，他本想说俏皮一些，结果却平淡无奇。

[\[15\]](#)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编者注

[\[1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15页。——编者注

[\[17\]](#)这是在《资本论》和社会民主党人策略中完全明白表示出来而和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以经济方面为限的要求。1843年马克思在给预备出版的杂志[\[69\]](#)拟定纲领时写信给卢格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做我们批评的对象。……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sub specie rei publicae*（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和代议制之间的区别的问题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hauteur des principes*（原则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政治的言辞来表明人的统治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已。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应该接触这些政治问题（在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注意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7页。——编者注）

[\[18\]](#)指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辩证法。否定的否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183页。——编者注

[\[19\]](#)这个尖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20)这段杜林观点的表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完全适用，关于这点，他那篇《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论文里还有下述一段可以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反驳那位断言马克思是私有制辩护者的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曾指出马克思的这个公式并解说如下：“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两个尽人皆知的戏法搬到自己的公式中来，第一，这个公式是按黑格尔三段式规律造成的；第二，合题是以对立面（即个人所有制和公有制）的同一为基础的。可见‘个人’一词，在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纯粹假设的，即辩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丝毫也不能引为根据。”这是一个怀有最善良愿望的人在俄国公众面前替“热血志士”马克思辩护以反对资产者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所说的话。他就是怀着这种善良愿望而把马克思说成这样：马克思把自己对过程的看法建立在“戏法”上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个对他不无益处的教训：做任何一件事情单靠善良愿望都是有点不够的。

(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95页。——编者注

(2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编者注

(23)说到这里，我以为不妨指出：恩格斯的全部解释是载在他谈论麦粒、卢梭学说和其他辩证过程实例的那一章里的。看来只要把这些实例拿来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因为这本著作的手稿预先读给马克思听过）这样明白肯定的声明——根本谈不到用三段式来证明什么东西，或把这三段式的“假设成分”塞到现实过程的描述中，——对照一下，就完全可以明白，责难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是荒谬绝伦的。

(24)指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编者注

(25)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218页。——编者注

(26)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笔名。——编者注

(27)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撇开不谈，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马克思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状态来说，确实是从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和他们的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例如在英国）。

(28)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2—133页。——编者注

(2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

(30)作者在另一地方解释道：“所谓中世纪劳动形式，指的不仅是村社土地占有制、手工业和劳动组合组织。所有这些无疑都是中世纪形式，但土地或生产工具属于劳动者的种种形式也应当算做中世纪形式。”

第三编

附录三

我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来说的。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指出，我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合法报刊上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简直把马克思主义缩小和曲解得不成样子。这是什么叙述！真难以设想，要怎样糟蹋这个革命学说，才能使它躺到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80]上！我国的政论家却掉以轻心，正在做这类手术：经他们叙述的马克思主义大概就成了这样一种学说，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怎样经历着辩证的发展，怎样变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又怎样社会化。他们郑重其事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纳入这一“公式”，不谈它的社会学方法的一切特点，不谈阶级斗争学说，不谈研究的直接目的——揭露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以帮助无产阶级来推翻这些形式。毫不奇怪，得出的必然是一种这样暗淡和狭隘的东西，以致我们的激进派也要为贫乏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惋惜。当然呵！如果在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横行时代，可以完整地、确切地和充分地叙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彻底说出来，那么，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就不成其为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了！如果我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真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即使是根据德文书刊），他们也许会羞于在受检查的报刊上这样糟蹋马克思主义。既然无法叙述这个理论，你们就免开尊口，或者交代一下，说你们远没有道出全部内容，说你们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略去了。但为什么只叙述一些片断，却大喊大叫狭隘性呢？

要知道，这样只会闹出只有俄国才能有的笑话来，把一些根本不懂阶级斗争，不懂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必然对抗，不懂这种对抗的发展，不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人算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一些直接提出资产阶级方案的人，也算做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们有时也说过“货币经济”及其“必然性”等等一类字眼就行，而承认这些字

眼是马克思主义者专用的字眼，是需要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样的机智的。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¹⁾和革命的”⁽²⁾。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就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³⁾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也就是说，善于客观地说明这个斗争是一定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时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和彻底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

试把“我国著名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他的“批评”中叙述过和攻击过的那套平庸的胡说，同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怎么竟会有人认为自己是“劳动阶级的思想家”，却又只限于……摆弄“磨光了的金币”，——我国政论家抹去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就把它变成了这样的金币。

试把那些最初也想做劳动者思想家的我国民粹派的著作，即论述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包括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同这个理论的要求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感到惊异，社会主义者怎么能满足于只是研究和描写灾难并就这种灾难进行说教的理论。农奴制度不是被看做产生了某种剥削、某些对抗阶级、某些政治、法律等等制度的一定经济组织形式，而只是被看做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对待农民的不公平。农民改革不是被看做某些经济形式和某些经济阶级的冲突，而是被看做尽管愿望极其善良但错误地“选择了”“不正确道路”的长官的措施。改革后的俄国被说成是偏离正道因而给劳动者带来灾难，而不是有了某种发展的一定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体系。

不过，现在这个理论已经信誉扫地，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俄国社会主义者越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越是迅速集中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俄国，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越可靠越迅速。

为了清楚地说明“人民之友”先生们号召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影响“人民”来“创立”正常的真正的工业等等，是怎样败坏着现代“俄国贫乏的思想界”，我们且引证那些与我们的思想方式根本不同的人们，即民意党^[81]嫡系后裔的“民权党人”^[82]所作的评论。请看1894年“民权党”出版的小册子《迫切的问题》。

有一类民粹主义者说：“不管怎样，即使在广泛自由的条件下，俄国也不应该放弃它的足以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的经济组织。”他们还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有步骤地、有计划地进行的经济改革。”民权党人给了这类民粹主义者有力的驳斥之后接着说：

“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辩护人，更不是资产阶级理想的崇拜者，但是假如厄运要人民有所抉择：或者是在地方官热心保护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改革’，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或者是在政治自由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保证人民能有组织地保护自己利益的条件下，

使资产阶级存在，那么，我们认为人民选择后者是绝对有利的。现在我国并没有进行要取消人民的貌似独立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改革’，可是存在着到处都照例认为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东西，这种政策表现为极粗暴地剥削人民的劳动。现在我国既没有广泛的自由，也没有狭隘的自由，可是存在着各立宪国家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已不再梦想追求的对等级利益的袒护。现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社会人士绝对不准参与国家管理，可是存在着要求政府用万里长城来防护自己利益的纳伊杰诺夫、莫罗佐夫、卡兹、别洛夫一流的先生，以及居然要求1俄亩可以得到100卢布无息贷款的‘我国忠诚贵族’。他们应邀参加各种委员会，他们讲什么，人们都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可是，有谁在什么地方替人民说话呢？不就是那些地方官吗？不是正在为人民筹划成立农业劳动队吗？现在不是有人公然无耻地说，给人民份地^[83]只是为了要他们纳税和服役吗？沃洛格达省省长在他的通令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这位省长不过是表述和大声地说出了专制制度（或者正确些说，官僚专制制度）在自己的政策中必然实行的办法罢了。”

不管民权党人对“人民”（他们想要维护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对“社会”（他们继续认为它是保护劳动利益的值得信任的机关）的看法是怎样的模糊，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民权党”的成立是前进了一步，而前进的方向，是要彻底抛弃“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的错觉和幻想，是要大胆承认现实的道路，并在这种道路的基础上寻找进行革命斗争的成分。这里明白地显露了要成立民主主义政党的意向。我只说“意向”，是因为可惜民权党人并没有始终不渝地贯彻他们的基本观点。他们仍在谈论要同社会主义者联合和结盟，而不愿了解：把工人卷入单纯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不过是使工人知识分子脱离工人群众，使工人运动软弱无力，因为工人运动只有在各方面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在同反资本仆役的政治斗争融合为一体的反资本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强有力的。他们不愿了解：要

达到一切革命分子“联合”的目的，最好是使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⁴⁾分别组织起来，并由这个和那个政党在一定的场合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现在还把自己的党叫做“社会革命党”（见“民权党”1894年2月19日宣言），虽然他们以纯粹政治改革为限，小心翼翼地回避我国“可恶的”社会主义问题。一个这样热烈号召人们丢掉错觉的党，本来不应该在自己的“宣言”上一开头就给人造成错觉，本来不应该在只有立宪主义的地方谈论社会主义。可是，再说一遍，不注意民权党人是由民意党人而来的，就不能评价民权党人。因此不能不承认，他们用纯粹政治纲领来论证同社会主义无关的纯粹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步。社会民主党人竭诚希望民权党人获得成功，希望他们的党成长和发展起来，希望他们同那些站在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上⁽⁵⁾，其日常利益真正和民主主义有着极密切联系的社会分子更加密切地接近起来。

“人民之友”的调和主义的、畏首畏尾的、感伤幻想的民粹主义，将因遭到两面夹攻而无法长久支持下去：一方面是政治激进派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居然对官僚表示信任，不了解政治斗争的绝对必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懂劳动者受压迫的原因和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却企图以几乎是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出来说话。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2—161、290—296页

⁽¹⁾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做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

⁽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编者注

⁽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8页。——编者注

⁽⁴⁾他们自己也反对相信知识分子的神通广大，他们自己也说必须使人民自己参加斗争。但为此必须把这个斗争同一定的日常利益联系起来，因而必须把各种利益区别开来并将它们分别引入斗争……如果拿一些只有知识分子才了解的赤裸裸的政治要求来遮掩这些不同的利益，那岂不是又向后倒退，又只限于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斗争吗？而这种斗争的软弱无力是刚才承认过了的。

[\(5\)](#)（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地上），而不是站在必须否定这个制度和无情反对这个制度的基地上。

社会主义和宗教⁽¹⁾（1905年12月3日〔16日〕）

现代社会完全建筑在地主资本家阶级极少数人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剥削上面。这种社会是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因为一生为资本做工的“自由”工人“有权”支配的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奴隶赖以活命、从而使资本主义奴役制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那一点生活资料。

对工人的经济压迫，必然会引起和产生对群众的各种政治压迫和社会屈辱，使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变得粗俗和愚昧。工人固然可以多少争得一点政治自由来为自身的经济解放而斗争，但是，在资本的政权未被推翻以前，任何自由都不会使他们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

但是，奴隶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并且站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就有一半已经不再是奴隶了。现代的觉悟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生活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为自己去争取人间的美好生活。现代无产阶级正在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

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表示社会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的。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必须正确地说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应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在正式文件里应当根本取消关于公民某种信仰的任何记载。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国家教会，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只有彻底实现这些要求，才能结束以往那种可耻的、可诅咒的现象：教会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教会；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法律（这种法律至今还列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法规中）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有效，这种法律追究人是否有信仰，摧残人的良心，把官位和俸禄同布施某种国家教会劣质酒联系起来。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

俄国革命应当实现这个要求，这是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俄国革命在这方面有着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警察农奴制的专制制度的令人作呕的官僚习气，甚至在僧侣中间也引起了不满、骚动和愤慨。不论俄国的正教僧侣多么闭塞无知，现在，俄国中世纪旧制度崩溃时的巨响也把他们惊醒了。连他们也要求自由，反对官僚习气和官僚专横，反对警察对“上帝的仆人”进行强制的搜查。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这种运动，使僧侣阶层中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士的要求彻底实现，抓住他们关于自由的言论，要求他们坚决割断宗教和警察之间的任何联系。如果你们是诚意的，那你们就应当主张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完全分离，彻底地无条件地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些彻底的自由要求，那就说明你们仍旧是宗教裁判传统

的俘虏，仍旧依赖于官位和俸禄，说明你们不相信你们的武器的精神力量，你们继续接受国家政权的贿赂。这样，全俄国的觉悟工人就要毫不留情地向你们宣战。

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这样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呢？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应当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宗教问题的提法上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别。

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²⁾。

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因此而“从理性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去抽象地、唯心地来提宗教问题，——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

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党纲中没有宣布而且也不应当宣布我们的无神论。因此，我们没有禁止而且也不应当禁止那些还保存着某些旧偏见残余的无产者靠近我们党。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彻底性进行斗争。但是这决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决不是说，为了反对那些很快就会失去任何政治意义、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的次要的意见或呓语，而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

各地的反动资产阶级早就打算，而我国资产阶级现在也开始打算煽起宗教仇视，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方面来，使他们不去关心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是在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俄无产阶级目前正在实际解决的问题。这种企图分散无产阶级力量的反动政策，今天主要表现为黑帮对犹太人的屠杀，明天也许有人会想出某些更巧妙的新花样。我们无论如何要沉着地、持久地、耐心地宣传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科学的世界观，以此来抗击这种反动的政策，决不要挑起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

就国家而言，革命的无产阶级力求使宗教成为真正的私人事情。在将来已经肃清中世纪霉菌的政治制度中，无产阶级必将为消灭经济奴役，即消灭宗教对人类愚弄的真正根源而进行广泛的，公开的斗争。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31—135页

[\(1\)](#)*本文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列宁指出，宗教是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这种压迫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对国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任何人都有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的自由，在公民中间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对

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宗教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我们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宣传无神论。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583—584页。——编者注

我们的取消派（关于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节选）^[1]（1911年1—2月）

常有这样一些著作，它们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们是赫罗斯特拉特性质^[84]的。例如，像爱德·伯恩施坦的名著《前提》^[85]这样一部最平凡的作品，却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波特列索夫先生在去年2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86]上的那篇论微不足道的小事的文章以及弗·巴扎罗夫在4月那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的答复，按其赫罗斯特拉特的性质来说，无疑也具有这种显著的意义。当然，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远远没有伯恩施坦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跟着资产阶级提出的）问题那样深刻，那样广泛，那样具有国际意义，但是，对1908—1909—1910—？年期间的我们俄国人来说，这些问题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波特列索夫先生和弗·巴扎罗夫的文章并没有过时，谈谈这些文章是必要的，责无旁贷的。

四

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7]即唯心主义者的哲学斗争，波特列索夫先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波特列索夫先生对“这种杂乱无章的（——“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别说得那么漂亮吧！”^[87]）哲理之谈”非常愤慨，而且从唯物主义者方面点了我和普列汉诺夫的名，把我们称之为“昨天的政治家”。我对这种说法笑了好一阵。这种自吹自擂真是太露骨，太可笑了，真该分给我们的兔子一块熊耳朵^[88]。普列汉诺夫等等是“昨天的政治家”！今天的政治家显然就是波特列索夫和他那些“好汉们”了。多可爱，多坦率。

只要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偶尔例外地说出一句不矫揉造作和不装腔作势的话来，他就狠狠打了自己的耳光。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请你加把劲，不妨考虑一下：你否认取消派是一个把非孟什维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把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为一方同普列汉诺夫和布尔什维克合在一起为另一方区别开来的政治派别。你一方面这样否认，一方面又把普列汉诺夫和某人叫做“昨天的政治家”。请你看看，你蠢到了什么地步：要知道，我和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能够一起被称为昨天的政治家，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作为昨天的（按其基础是昨天的）运动的形式昨天的组织，今天也是必要的。在这个昨天的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个昨天的组织应该在某个时机采取哪些措施的问题上，我和普列汉诺夫有过极大的分歧，现在也还有分歧，但是同那些今天正是否认昨天运动的基础（我马上就要谈到的领导权问题也包括在内）、正是否认昨天组织的基础的人的斗争，却使我们接近起来。

怎么样，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你现在还不懂取消派是怎么回事吗？你现在还认为，是什么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89]或者是想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来代替“战胜”取消派这样一种恶毒愿望使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起来的吗？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杂乱无章的哲理之谈”。

波特列索夫先生写道：“我们知道，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斗争当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一些似乎是最抽象的论点实际上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具有多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 最抽象的论点具有生动的具体的意义！这又是空话，并且仅此而已。假如“你知道”的话，请你不妨解释一下，恩格斯所说的杜林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论断是错误的这样一个论点，具有什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你的不幸也就在于，你像小学生一样把“恩格斯和杜林的争论具有伟大意义”这句话背得烂熟，而没有深刻考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你背出来的东西也就错误百出、残缺

不全。不能说“最抽象的论点〈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点〉实际上对德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具有多么生动的具体的意义”。恩格斯的最抽象的论点的意义在于它们向工人阶级的思想家说明了为什么离开唯物主义走向实证论^[3]和唯心论是错误的。因此，如果你能这样论述，即从哲学上稍微明确地论述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说些有“深刻的影响”、“最抽象的论点具有生动的具体的意义”等等响亮然而空洞的词句，那你马上就会看到，援引恩格斯和杜林的争论对你是不利的。^[90]

波特列索夫先生接着写道：“……我们知道，反对主观社会学的斗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难道就不知道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实证论和唯心论学说在主观社会学的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吗？你瞧，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你的每一枪都打偏了。如果要作历史类比，那就应当分清并且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相同点，否则就不是作历史对比，而是信口开河。如果拿你所作的历史类比来说，那就要问：要是别尔托夫没有阐明哲学唯物主义的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对反驳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意义，那么俄国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形成”呢？^[91]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而这个答案——如果把从历史类比中得出的结论用于同马赫主义者的争论的话——对波特列索夫先生是不利的。

“……但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当然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波特列索夫先生写的“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就希望，在我们进行的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及其任务和要求之间能终于建立起真正的现实的联系。而现在……”——接着引证了考茨基信中的话，说马赫主义是私事（Privatsache），关于马赫主义的争论是“海市蜃楼”，等等。

引证考茨基的话，是庸俗论断的一个典型。问题不在于考茨基“没有原则”，像波特列索夫先生挖苦（伊兹哥耶夫式的挖苦）的那样，而在于考茨基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俄国马赫主义的情况。考茨基在自己的信中承认普列汉诺夫精通马克思主义，深信唯心主义同马克思

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并认为马赫主义不是唯心主义（或者说：不是任何马赫主义都是唯心主义）。考茨基在最后一点上，特别在关于俄国的马赫主义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这是无疑的。但他的错误完全可以原谅，因为他并没有研究过整个马赫主义，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作家再来引证考茨基的话，就表现出他在思想上的十足庸俗的懒惰和在斗争中的怯懦。考茨基1908年写那封信的时候，可以指望马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同唯物主义“调和”，但在1909—1910年的俄国，再在这个问题上引证考茨基的话，就是想把俄国马赫主义者同唯物主义者调和起来。难道波特列索夫先生或别的什么人真想这样做吗？

考茨基不是没有原则的，而想把马赫主义说成“私事”的波特列索夫及其同伙才是当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没有原则的典型。考茨基在1908年没有读过俄国马赫主义者的著作，而建议他们同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讲和，他完全是真诚的，一点也不不是没有原则的，因为他一直是赞成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就在那封信中也是这样。而波特列索夫之流先生们及其同伙在1909—1910年拿考茨基作掩护，就没有一点诚意，一点也不尊重原则性。

波特列索夫先生，你没有看到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的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吗？那就让我这个昨天的政治家恭恭敬敬地至少向你指出下面几种情况和看法：（1）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流派”有“生动的现实的联系”，否则这个流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就不成其为流派了。只有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那些目光短浅的“现实的政治家”才会否认这种联系的“现实性”。（2）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那么在俄国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方面，那就不足

为奇了。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1848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3）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的。（4）在俄国先进的思想流派中，没有像法国那种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92]有联系的或者德国那种同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时期有联系的伟大的哲学传统。因此，正是对俄国的先进阶级来说，这种哲学上的“清理”是必不可少的，至于这种稍晚了些的“清理”，是在这个先进阶级完全成熟到在不久前的伟大事件中起了自己独立的历史作用之后才开始进行，那是不足为奇的。（5）世界其他国家早就为进行这种哲学上的“清理”做好了准备，因为例如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应由辩证唯物主义“处理”的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照波特列索夫的说法）哲学争论就不仅具有一定的即俄国的意义。欧洲为“更新”哲学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后的俄国在1908—1910年这个被迫沉寂的时期，特别“渴望”求助于这种材料。（6）不久前，别洛乌索夫把第三届杜马^[93]称为拜神杜马。他正确地抓住了第三届杜马在这方面的阶级特点，公正地痛斥了立宪民主党人^[94]的伪善。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95]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必然。单靠棍棒和鞭子是不够的；棍棒毕竟已被折裂。路标派帮助先进的资产阶级搞到一种最新式的思想棍棒即精神棍棒。马赫主义这个唯心主义的变种在客观上是反动派的工具，反动派的宣传手段。因此，在1908—1910

年这个历史时期，既然我们看到“在上面”不仅有十月党人^[96]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拜神杜马”，而且还有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拜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那么“在下面”进行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

波特列索夫先生“附带说明”，他“现在没有涉及到”“造神说”^[5]。这就是无原则的庸俗的政论家波特列索夫不同于考茨基的地方。考茨基既不了解马赫主义者的造神说，也不了解拜神的路标派，因此他可以说不是任何马赫主义都是唯心主义。而波特列索夫是了解这些的，他“没有涉及到”主要的东西（对用狭隘的“政论家”的眼光观察问题的人来说是主要的），那就是伪善了。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把同马赫主义的斗争说成是“私事”，那就在“社会政治”方面成了路标派的帮凶。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115、125—131页

^[1]*这是列宁为批判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机会主义观点而写的文章。在节选的部分，列宁剖析了取消派思想家波特列索夫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哲学斗争的意义的错误言论，揭露了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与马赫主义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哲学唯物主义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列宁指出，离开哲学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在实践中，我们有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这并不取决于主观需要，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在无产阶级政党总结革命经验和教训的时期，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首要地位不是偶然的，在哲学上进行“清理”是必要的。

纪念赫尔岑^[1]（1912年4月25日〔5月8日〕）

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了。全俄国的自由派都在纪念他，可是又小心翼翼地回避重大的社会主义问题，费尽心机地掩盖革命家赫尔岑与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右派报刊也在悼念赫尔岑，但是撒谎骗人，硬说赫尔岑晚年放弃了革命。至于侨居国外的自由派和民粹派纪念赫尔岑的言论，则满篇都是漂亮的空话。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赫尔岑是属于19世纪上半叶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龙和阿拉克切耶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闹事的无赖、嗜赌成性的败类、集市上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寻衅打架的暴徒、掌笞刑的打手、淫棍”以及温情的马尼洛夫^[97]之流。赫尔岑写道：“但是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12月14日的人物^[98]，出现了像罗慕洛和瑞穆斯^[99]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 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勇士，是一些顶天立地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青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并洗净在专横暴虐和奴颜婢膝的环境中出生的子弟身上的污垢。”^[100]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书简》（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即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

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精神上崩溃了。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温情的词句，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1848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崩溃，他的十足的怀疑论^[13]和悲观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现在那些用华丽词藻大谈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并大唱俄国自由派高调的骑士们不理解而且也无法理解的。在这些出卖了1905年俄国革命、根本不再想到革命家的伟大称号的骑士们那里，怀疑论就是从民主派到自由派，到趋炎附势、卑鄙龌龊、穷凶极恶的自由派的转化形式，这种自由派在1848年枪杀过工人，恢复过已被摧毁的皇朝，向拿破仑第三鼓过掌，正是这种自由派遭到过赫尔岑的咒骂，尽管他还没有识破他们的阶级本质。

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赫尔岑在1869年即逝世前一年写给巴枯宁的几封《致老友书》就是证明。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了。诚然，赫尔岑把这种决裂还只是看做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看做相信本阶级定会胜利的无产者的世界观同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之间的一道鸿沟。诚然，赫尔岑在这里又重复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词句，说什么社会主义应当“向工人和雇主、农民和小市民同样作宣传”。但是，赫尔岑与

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64]，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转向已经开始“集合”无产阶级“队伍”、团结“抛弃了不劳而获者的世界”的那个“劳工世界”的国际！^[101]

赫尔岑既然不理解1848年整个运动的以及马克思以前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质，也就更加无法理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62]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土地权”思想看做“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

其实，赫尔岑的这一学说，也像一切俄国民粹主义——一直到现时的“社会革命党人”^[102]的褪了色的民粹主义——一样，是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像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温情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1861年农民得到的土地愈多，得到的土地愈便宜，农奴主—地主的权力也就会被破坏得愈厉害，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会愈迅速，愈自由，愈广泛。“土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追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

1905年的革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创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革命农民（“劳动派”^[103]和“农民协会”^[104]）力求用各种方式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直到“废除土地私有制”，他们正是以业主的身份，以小农场主的身份进行斗争的。

现在争论什么土地权的“社会主义性”等等，这只能模糊和掩盖真正重要而严肃的历史问题，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利益的区别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这场革命中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和共和主

义倾向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看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看词句，如果我们是把阶级斗争当做“理论”和学说的基础来研究，而不是相反的话，那么，赫尔岑的《钟声》杂志^[105]所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106]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杂志（1857—1867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杂志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不能不令人厌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一索洛维耶维奇是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是，说句公道话，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当卡维林这个极其卑鄙无耻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先前正是由于《钟声》杂志带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大加赞赏——反对立宪，攻击革命鼓动，反对“暴力”，反对号召使用暴力，开始宣传忍耐时，赫尔岑就同这位自由派的哲人决裂了。赫尔岑抨击了卡维林为了“替玩弄自由主义手腕的政府暗中策划”而写的那篇“空洞的、荒谬的、有害的杂文”，抨击了卡维林硬说“俄国人民蠢笨如牛，政府则聪明绝顶”的那些“充满政治感伤的格言”。《钟声》杂志发表过一篇以《祭文》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痛斥了“那些把自己高傲而浅薄的思想编成一整套陈腐谬论的教授，那些一度表现仁慈宽厚、后来看见健全的青年不理睬他们的腐败思想就勃然大怒的退職教授”^[107]。卡维林一看到这种描绘，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愤慨…… 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来

推翻政府，而政府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赫尔岑在谈到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正好答复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94]：“这里有一些可怜的人，草芥不如的人，软骨头，却说不应当咒骂这一伙统治我们的强盗和恶棍。”^[108]

当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109]而受伤的士兵时，《钟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马格达琳娜（男性）上书皇上，陈诉她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她诚心忏悔”^[110]。屠格涅夫也是一看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整个一群俄国自由派的乌合之众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弃绝了《钟声》杂志时，赫尔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继续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我们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多数的奴才们的非难。”^[111]

当有消息说一个农奴打死了一个侮辱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时，赫尔岑就在《钟声》杂志上补充说：“干得好！”当听说沙皇政府准备派遣军官去进行“和平的”“解放”时，赫尔岑写道：“如果有一个聪明的上校带着他的队伍，不是去绞杀农民，而是去归附农民，那他就会登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宝座。”^[112]当雷特尔恩上校不愿做刽子手的帮凶而在华沙自杀时（1860年），赫尔岑写道：“如果要开枪，那就应该把枪口对准那些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的将军们。”^[113]当别兹德纳村的50个农民被杀死，而他们的首领安东·彼得罗夫也被处以极刑时^[114]（1861年4月12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写道：

“啊，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愿我的话能够传入你们的耳鼓！……我要教导你们鄙视彼得堡的正教院^[115]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们的那些神父……你们恨地主，恨官吏，怕他们，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们还相信沙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们

吧。沙皇是跟他们一道的，他们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你们现在认识他了，你们是别兹德纳村被杀少年的父兄，你们是奔萨城被杀老人的子弟……你们的神父也同你们一样无知，也同你们一样贫穷……为了你们而在喀山城遇害的安东（不是安东主教，而是别兹德纳村的安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的这些圣徒的尸体不会作出48种奇迹，向他们祷告也不会治好牙痛；但是，你们时刻纪念着他们，这就能创造出一种奇迹——获得解放。”[\[116\]](#)

由此可见，那些藏身于奴才式的“合法”刊物中的自由派，只颂扬赫尔岑的弱点而隐瞒他的优点，这种对赫尔岑的诬蔑该是多么卑鄙无耻。赫尔岑不能在40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60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派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开展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81\]](#)的英雄们。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航海长”。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1905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扩展。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

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粉碎沙皇君主制恶棍，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恶棍的第一人。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61—268页

[\(1\)](#)*本文为纪念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而作。列宁评述了赫尔岑的历史地位，指出他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的作用，在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达到了当时最伟大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越了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唯物主义；他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但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却停止了。19世纪60年代，赫尔岑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决裂，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他看到了革命人民的历史作用，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¹⁾ (1913年5月5日〔18日〕)

25年前，即1888年，制革工人、杰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著作家和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了。

约瑟夫·狄慈根的著作（大部分已译成俄文）有：《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出版）、《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果》等等。马克思早在1868年12月5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就已经对狄慈根及其在哲学史上和工人运动史上所占的地位作了极为正确的评价。

马克思写道：“很久以前，狄慈根寄给我一部分关于《思维能力》的手稿，这一部分手稿中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是令人惊叹的思想。”⁽²⁾

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是一个独立地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即达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工人。狄慈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这一点对于评价工人出身的狄慈根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1873年，当时了解马克思的人还不多，约瑟夫·狄慈根就说马克思是一派之首。约·狄慈根着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必要的哲学教养”。1886年，即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后过了很长时间，狄慈根在文章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派的“公认的创立者”。

为了评价资产阶级哲学即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包括“马赫主义^[7]”）的一切追随者，记住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人正想抓住约·狄慈根观点上的“某种混乱”。约·狄慈根本人是会嘲笑和唾弃这种崇拜者的。

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工人，应该阅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一刻也不要忘记，他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并不总是正确的，只

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

约·狄慈根是在简单化的、庸俗的唯物主义传播最广的时期从事写作的。所以，约·狄慈根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强调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即强调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必须懂得人的每一种认识的相对性，必须懂得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全面联系和相互依存，必须把自然历史的唯物主义提高到唯物主义历史观。

约·狄慈根在强调人的认识的相对性时往往陷于混乱，以至错误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作了让步。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是在或多或少巧妙地维护僧侣主义，僧侣主义则是一种认为信仰高于科学或者同科学平分秋色，或者总是给信仰让出一席之地的学说。不可知论（来自希腊文，“α”是不的意思，“γ ι γ ν ω σ κ ω”是知的意思）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实际上也就是在唯物主义科学和僧侣主义之间摇摆。康德的拥护者（康德主义者）、休谟的拥护者（实证论者^[3]、实在论者等等）和现代的“马赫主义者”都属于不可知论者。因此某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者和僧侣主义的公开拥护者，都曾试图“利用”约·狄慈根的错误。

但是整个说来，约·狄慈根是唯物主义者。狄慈根是僧侣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敌人。约·狄慈根写道：“我们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点：承认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这个“只有”也就是哲学唯物主义的实质。

约·狄慈根写道：“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于承认：人的认识器官并不放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反映自然界的其他部分。”这也就是人在认识永恒运动着的和变化着的物质方面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个理论引起了整个御用教授哲学的仇恨和恐惧，诽谤和歪曲。约·狄慈根怀着多么深厚的真正革命者的热情抨击并痛斥了唯心主义者教授们和实在论者等等这些“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们”啊！约·狄慈根关于哲学的“党派”，即关于唯物主

义和唯心主义公正地写道：“在所有的党派中，最卑鄙的就是中间党派。”

《光线报》^[117]编辑部和谢·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光线报》第92号）就属于这类“卑鄙的党派”。编辑部作了一个“附带声明”：“我们不同意总的哲学观点”，但对狄慈根的阐述是“正确的和清楚的”。

这是弥天大谎。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无耻地捏造和歪曲约·狄慈根的观点，他所抓住的恰恰是约·狄慈根的“混乱”的地方，而关于马克思对狄慈根的评价则避而不谈。然而无论是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党人普列汉诺夫还是欧洲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完全承认这种评价。

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歪曲哲学唯物主义，也歪曲狄慈根的观点，在“一个或两个世界”问题上胡说八道（说什么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亲爱的，请学习一下吧，哪怕读一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³⁾也好），而且在世界和现象问题上也胡说八道（似乎狄慈根把现实世界仅仅归结为种种现象；这是对约·狄慈根所进行的僧侣主义和教授式的诽谤）。

但要把谢姆柯夫斯基先生的所有歪曲都列举出来，那是不可能的。要让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们知道，《光线报》编辑部是马克思主义取消派的联盟。一部分人正在取消地下组织即取消无产阶级政党（马耶夫斯基、谢多夫、费·唐·等人），另一部分人正在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波特列索夫、柯尔佐夫等人），第三部分人正在取消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伙），第四部分人正在取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崩得分子^[118]科索夫斯基、麦迭姆等人，即“民族文化自治”的拥护者），第五部分人则在取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斯洛夫先生及其地租论和“新”社会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谢姆柯夫斯基先生和替他打掩护的编辑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令人愤慨的歪曲，只不过是这一文人的“取消派联盟”进行“活动”的最明显的事例之一。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51—154页

[\(1\)](#)*列宁在本文中对约·狄慈根在哲学史和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作了科学评价，指出他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就在于他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独立地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列宁肯定了狄慈根在哲学研究中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强调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必须懂得认识的相对性，必须懂得世界一切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必须把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狄慈根虽然在强调相对性时，错误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作了让步，但是整个说来，他是唯物主义者，是僧侣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敌人。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566—567页。——编者注

[\(3\)](#)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301—353页。——编者注

第二国际的破产（节选）[\(1\)](#)（1915年5—6月）

三

但是，第二国际最有名的代表和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的呢？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现在先考察一下“从理论上”为这种背叛辩护的言论。下面我们试就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作一评述。普列汉诺夫（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论据要“精致”得多，表面看起来理论上要充实得多）可以算是这些理论的代表。

在这些理论中，最浅薄的恐怕就是“祸首”论了：人家进攻了我们，我们进行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进行反击。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和黄色报刊的滥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论调，普列汉诺夫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这是这位著作家惯用的手法）来粉饰一番，说什么为了估计当前的具体形势，首先须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1914年巴黎版；并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119\]](#)第86号和第87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抽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的一句话，说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多次揭露沙皇政府对加里西亚、亚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对于经济史和外交史，哪怕是最近30年来的，他也一点都没有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目前参战的大国集团，双

方都是以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就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作为他们政策的主要轴心。^[2]

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3]。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

普列汉诺夫的拙劣的沙文主义与考茨基的比较精致的、心平气和的、动听的沙文主义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完全相同的。考茨基在颂扬各国社会党人倒向“自己的”资本家的行动时说道：

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见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122]和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

但是，假如我们细心地研究一下考茨基这种论调的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这正是克劳塞维茨在大约80年以前所嘲笑的观点：战争一开始，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政治关系就会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时，“只有”进攻者和防御者，“只有”对“祖国的敌人”的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分裂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意图——这一切都一下子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自己在战前数十年中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政治”。

这两位社会沙文主义领袖还歪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普列汉诺夫回忆起1813年普鲁士民族战争和1870年德国民族战争，考茨基则作出最博学的样子证明说，马克思解决过在1854—1855年、1859年、1870—1871年的战争中哪一方（即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解决过1876—1877年和1897年的战争中的同样问题。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他们向我们举出的以前的战争，都是历时多年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即反对异族压迫和反对专制制度（土耳其和俄国的）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那时，除了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预先号召各国人民进行这类战争，燃起民族的仇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和1848年以后曾经号召去同俄国作战那样，正如恩格斯在1859年曾经燃起德国人对他们的压迫者拿破仑第三和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仇恨那样。⁽⁴⁾

把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正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已经衰朽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了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这就像是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相提并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同时，如果不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在勾结起来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

社会沙文主义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我的国家的失败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124\]](#)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在德国有伦施等人。考茨基反对这种拙劣的理论，反对公开维护这种理论的伦施，也反对暗中坚持这种理论的库诺，可是他反对的目的，仅仅是要在更精致更狡猾的沙文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把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起来。

我们不必花许多时间来分析这种拙劣的理论。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是在1894年出版的，20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非常熟悉有教养的俄国资产者的这种“手法”，熟悉他们怎样披着清除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贯彻自己的观点和愿望。最近的事态特别明显地表明，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因此很清楚，觉悟的工人必须密切注意以司徒卢威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数量很多，形式也很多。现在我们只指出主要的三种：（1）科学的发展在提供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2）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发展，

在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改造”，使它能够为对机会主义作出各种让步进行辩护。（3）帝国主义时期是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这些阶层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只占极少数，他们倾心于“司徒卢威主义”，因为司徒卢威主义可以为他们联合“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对各民族被压迫群众的行为辩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国际破产的原因时还要谈到。

六

当上面这段文章写完时，5月28日出版的一期《新时代》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破产”的总结性的议论（他的一篇驳斥库诺的文章的第7节）。考茨基把他维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一切旧的诡辩和一个新的诡辩加在一起，并且自己作了如下的总结：

“有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似乎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似乎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似乎德国的、法国的、往往还有英国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对事情不加思考，只听到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了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

这是一个新的诡辩和对工人的新的欺骗：这场战争——请注意！——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

在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问题上，考茨基的动摇简直令人吃惊，这位党的领袖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巴塞尔和开姆尼茨代表大会[\[125\]](#)的明确的正式的声明，就像小偷躲开他刚刚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考茨基在1915年2月写的《民族国家……》这本小册子中曾经断言，这场战争“归根到底还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第64页）。现在却作了新的保留：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请问，还有别的什么性质呢？

原来还带有民族的性质！考茨基是借助下面这种“普列汉诺夫式的”所谓辩证法得出这种令人惊奇的结论的：

“当前这场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他，考茨基，早在1904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使泛斯拉夫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起来，“民主的俄国必然会强烈地激起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那时波兰问题也将尖锐起来……那时奥地利就会崩溃，因为目前把彼此趋向分离的分子束缚起来的那个铁箍将随着沙皇制度的崩溃而断裂”（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考茨基自己从他1904年的文章中引来的）……“俄国革命……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这场战争中都正在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范例！因为“民主的俄国”会激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当前这场战争，虽然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不管谁胜谁负都会使许多民族遭到奴役，那也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为“沙皇制度的崩溃”将意味着奥地利由于其民族结构的不民主而瓦解，所以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政府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更加惨重的压迫，就使得“当前这场战争”不具有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利用所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童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闭塞麻木的农民，所以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用下述“提法”使群众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

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

当前这场战争的民族因素仅仅表现在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这一点在我们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过⁽⁵⁾）。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如果德国获胜，它就会灭亡比利时，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法国的一部分等等。如果俄国获胜，它就会灭亡加里西亚，就会再灭亡波兰的一部分以及亚美尼亚等等。如果“不分胜负”，那么以往的民族压迫就会继续存在。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的继续”。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即只能腐蚀各民族而不能解放各民族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三协约国“解放”塞尔维亚，其实是在把塞尔维亚的自由出卖给意大利帝国主义，以换取它对掠夺奥地利的帮助。

这一切是众所周知的，而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者辩护，竟无耻地加以歪曲了。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他的东西。

西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有人却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这种人不是愚蠢透顶的学究，就是吹毛求疵者和骗子。问题的整个实质就在于考茨基在帮助帝国主义者欺骗人民，他说，“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是民族问题，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同时他还援引了“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第274页）这个似乎是辩证的论据来“充实”这一论点。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

考茨基一再重复一种陈腐的诡辩，说什么“左派”把事情描绘成“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这种诡辩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是无耻的故意曲解，因为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所提出的是另外的选择：要么是党参加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骗，要么是宣传和准备革命行动。而且考茨基还知道，只是书报检查机关保护了他，才使德国的“左派”无法揭穿他那些为了逢迎休特古姆之流而散布的无稽之谈。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群众”和“一小撮议员”的关系问题，考茨基在这里提出一个陈腐不堪的反驳意见：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为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言，像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了社会主义呢？我们先不谈议员和‘领导机关’……

〈这里考茨基显然是暗指罗莎·卢森堡和弗·梅林的《国际》杂志[\[126\]](#)，因为这家杂志对领导机关的政策，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领导，如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国会党团等等的政策

表现出理所当然的轻蔑》……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400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24小时之内一起向右转，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件事所证明的当然就不仅是我们的可怕的破产，而且也是群众（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可怕的破产了。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无主见的傻瓜，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第274页）

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最高权威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一整套可怜的遁词把自己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希望；正因为这样，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杂志上把考茨基之流当做最卑鄙的人物来对待，是做得唯一正确的。

不妨想一想：当初能够多少自由地（就是说不至于立即被捕入狱，不会有被枪毙的危险）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只有“一小撮议员”（他们有权自由地投票，他们完全可以投反对票——即使在俄国也不会因为投反对票而遭到殴打和迫害，甚至逮捕），一小撮官吏及记者等。现在考茨基却慷慨地把这个社会阶层的叛变和无主见推到群众身上，而正是这位考茨基多年来数十次地写文章谈到这个阶层同机会主义的策略和思想之间的联系！一般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条首要的最根本的准则，就是要求著作家去考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即大声疾呼地唤醒人们反对叛变的派别和不认为有叛变的派别）之间现在的斗争同过去整整数十年的斗争的联系。考茨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提到，甚至根本不想提出派别和思潮的问题。过去有过一些思潮，现在再也没有了！现在只有奴性十足的人一向当做王牌来使用的那些“权威”的鼎鼎大名了。因此，可以特别方便地互相援引，并以互相包庇的原则友好地掩盖自己的“罪过”。尔·马尔托夫在伯尔尼的一次讲演会上惊呼：既然盖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都……那怎么能说这是机会主义呢！（见《社会民主党人报》[\[127\]](#)第36号）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指责像盖

得这样的人是机会主义者，应当格外慎重。考茨基也在柏林随声附和道：我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但是……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杜鹃恭维公鸡是因为公鸡恭维了杜鹃。[\[128\]](#)

考茨基像奴仆一样献殷勤，甚至去吻海德门的手，把他描绘成只是在昨天才投身到帝国主义那里去。可是，在同一家《新时代》杂志和全世界数十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关于海德门的帝国主义，已经谈论多年了！如果考茨基有兴趣认真研究一下他提到的这些人物的政治履历，那他就一定会想起：在这些人的履历中不是有一些特征和事件足以表明，他们倒向帝国主义不是“一天之内”而是几十年内酿成的结果吗？瓦扬没有当过饶勒斯派[\[129\]](#)的俘虏吗？普列汉诺夫没有当过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的俘虏吗？盖得派[\[130\]](#)不是在典型的死气沉沉、庸碌无能、对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没有独立见解的盖得派的《社会主义》杂志[\[131\]](#)上当众死亡了吗？在米勒兰主义问题[\[132\]](#)上，在开始同伯恩斯坦主义[\[133\]](#)作斗争的时候，以及其他方面，考茨基本人（我们给那些十分恰当地把考茨基同海德门及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的人作个补充）没有表现出无主见吗？

但是，他丝毫也没有兴趣以科学态度去研究这些领袖的履历。他甚至也不打算考察一下，这些领袖现在是用他们自己的论据，还是捡起机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论据来为他们自己辩护？这些领袖的行为所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特殊的影响，还是因为他们附和了别人的、真正“有影响的”、得到军事机构支持的派别即资产阶级派别？考茨基根本就没有着手研究这一问题；他唯一的兴趣，就是蒙蔽群众，用权威的鼎鼎大名来震聋群众的耳朵，不让他们明确地提出有争论的问题并全面地加以研究。[\(6\)](#)

“……400万群众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一起向右转……”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400万，而是100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像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

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这个机构里面没有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

考茨基竭力想击败自己的对手——左派，硬把一些荒唐的东西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了“回答”战争，“群众”应当“在24小时之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纯粹是胡说，资产阶级和警察用他们编撰的文理不通的小册子“打击”革命者的时候，向来就是借助于这种胡说的，而现在考茨基却拿它来炫耀。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⁷⁾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考茨基知道得很清楚，德国的“左派”所指的正是这样的行动，或者确切些说，类似的行动，但他们在实行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无法直接地公开地谈论这些行动。不惜一切代价为机会主义者辩护的愿

望，使考茨基干出了前所未有的卑鄙勾当：他躲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背后，把明显的胡说硬加在左派头上，相信书报检查官会保护他不被揭穿。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33—239、250—258页

[\(1\)](#)*这是列宁批判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第二国际领袖的文章。在节选的部分，列宁揭露他们在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从而背叛了社会主义。列宁在揭穿他们的诡辩时阐述了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指出：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手段的继续。普列汉诺夫的“祸首”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都是想抹煞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不分阶级地提出所谓“保卫祖国”。列宁明确指出：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

[\(2\)](#)一位不惜假装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布雷斯福德所著《钢和金的战争》一书（1914年伦敦版；书内标明的日期是1914年3月！），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已不占突出地位，已经解决了第35页），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第36页）是巴格达铁路[\[120\]](#)、供给这条铁路的铁轨、摩洛哥的矿山等等。作者很正确地认为，“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事件”之一，就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凯约（在1911年和1913年）想同德国在共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允许德国证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协议的基础上讲和的企图。英国和法国的产阶级阻止了这种协议（第38—40页）。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向较弱的国家出资本（第74页）。英国依靠这种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在1899年是9 000—10 000英镑（吉芬），在1909年是14 000万英镑（佩什），我们得补充一下：劳合一乔治不久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利润算成2亿英镑，将近20亿卢布。卑鄙的伎俩，收买土耳其贵族的活动，替自己的子弟在印度和埃及谋取肥缺——这就是事情的实（第85—87页）。一小撮人从扩张军备和战争中大发其财，拥护他们的是社会金融家，而跟着拥护和平的人走的则是分散的民众（第93页）。一个今天还在谈什么和平和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附于军火承包商的政的党员（第161页）。如果三协约国[\[121\]](#)占上风，它们就会夺取摩洛哥并瓜分波，三国同盟将会夺取的黎波里，巩固自己在波斯尼亚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67页）。伦敦和巴黎在1906年3月借给了俄国数十亿的贷款，帮助沙皇政府镇压放运动（第225—228页）；英国现在正帮助俄国扼杀波斯（第229页）。俄国已经起了巴尔干的战火（第230页）。——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难道不对？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所共知并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报纸重复过一千次的？一个英国的资产者在大战前夕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点了。而在上述这简单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关于德国负有罪责的论，考茨基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前景”的理论，多么不成体统的废话，多么使人难以忍受的伪善，多么娓娓动听的谎言啊！

[\[3\]](#)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克劳塞维茨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大家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以为，战争一开始，这些关系就告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状态。我们的看法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在另一种手段介入的情况下的继续。”

[\[4\]](#)顺便说一下，加尔德宁先生在《生活报》[\[123\]](#)上说，马克思在1848年曾经赞成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来反对欧洲那些事实上已证明是反革命的民族，即“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这是“革命的沙文主义”，但毕竟还是沙文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02\]](#)的机会主义（或十足的轻率，——更正确些应当说是：和十足的轻率）罢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始终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民族。例如，如果社会主义1920年在美洲或欧洲取得胜利，假定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促使本国的俾斯麦分子来反对我们（哪怕起初是在外交上反对），那我们就要赞成向它们进行一场进攻性的革命战争。加尔德宁先生，您觉得这很奇怪吧？那您就是罗普申一类的革命家了！

[\[5\]](#)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4页。——编者注

[\[6\]](#)考茨基举出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像伦施和亨尼施之类的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了）。他们举出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就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们是有权举出这些人的。他们说他们与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政策，

[\[7\]](#)顺便说一下，为此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都停办，用这种方法来回答不许写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禁令。像《前进报》[\[135\]](#)那样接受不写这类内容的条件，是卑鄙和怯懦的表现。《前进报》由于这样做而在政治上死亡了。尔·马尔托夫的这句话是说对了。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公开的报纸，只要我们声明这些报纸不是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们只是为一部分工人的技术性需要服务的即非政治性的报纸。可以有评价战争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可以有不作这种评价的公开的工人报刊，它不说谎话，但也不谈真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1916年7月）

一本社会民主党的论述战争问题的小册子，没有迁就卑鄙的容克的书报检查，终于在德国秘密地出版了！作者显然属于党的“左翼激进”派，署名尤尼乌斯（拉丁文的意思是：年轻人），书名是《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在附录里还刊印了“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提纲”，这个提纲已经提交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FNG）并刊载在该委员会公报的第3号上。^[136]提纲是“国际”派^[137]起草的。该派在1915年春天出了一期名叫《国际》^[126]的杂志（其中载有蔡特金、梅林、罗·卢森堡、塔尔海默、敦克尔、施特勒贝尔等人的文章），在1915—1916年冬天召开了德国各个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通过了这个提纲。

作者在1916年1月2日写的引言中说，这本小册子写于1915年4月，在刊印时“未作任何修改”。一些“外部情况”的干扰，使这本小册子没有能早日出版。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阐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不如说是分析战争，驳斥那些说这场战争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奇谈怪论，证明这场战争无论从德国或其他大国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对正式的党的行为进行革命的批评。尤尼乌斯这本写得非常生动的小册子，在反对已经转到资产阶级和容克方面去的德国旧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毫无疑问，已经起了而且还会起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衷心地向作者表示敬意。

对于熟悉1914—1916年在国外用俄文刊印的社会民主党著作的俄国读者来说，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人们在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如果把这位德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同例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宣言（1914年9—11月）^[2]、伯尔尼决议（1915年3月）^[3]以及许多关于决议的评论中所阐明的东西加以对照，那就只会深信尤尼乌斯的论据很不充分，而且他犯了两个错误。在对尤尼乌斯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以前，我们必须着重指出，我们

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并且全面地检查那些应当成为第三国际思想基础的观点。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总的说来，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可能，它的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偶然性。

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的主要缺点，以及它比合法的（虽然出版以后立即遭到查禁的）《国际》杂志直接倒退了一步的地方，就是对社会沙文主义（作者既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使用社会爱国主义这个不太确切的说法）同机会主义的联系只字未提。作者完全正确地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和破产、它的“正式领袖们”的“背叛”，但没有继续前进。而《国际》杂志已经对“中派”即考茨基主义进行了批评，对它毫无气节、糟蹋马克思主义和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大加嘲笑。这个杂志已开始揭露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例如，公布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1914年8月4日机会主义者提出了最后通牒，声明他们已经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无论是在尤尼乌斯的小册子里，还是在提纲中，都既没有提到机会主义，也没有提到考茨基主义！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不把“背叛”同机会主义这个有悠久历史，即有第二国际全部历史的派别联系起来，就无法说明这种“背叛”。这在政治实践中是错误的，因为不弄清公开的机会主义派（列金、大卫等）和隐蔽的机会主义派（考茨基之流）这两个派别的意义和作用，那就既不能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也不能克服它。这和例如奥托·吕勒在1916年1月12日《前进报》^[135]上发表的一篇历史性的文章^[138]相比，是倒退了一步，因为吕勒在那篇文章中直接地、公开地论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报》编辑部只是重复考茨基的甜蜜的、伪善的词句来回答他，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真正的论据来否认已经存在两个党、而且无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事实）。这是极不彻底的，因为在“国际”派的提纲第12条里已经直接提到，“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的正式代表机构”已经“背叛”并且“转到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

立场上”，因而必须成立“新”国际。显然，谈论让德国旧社会民主党或对列金、大卫之流抱调和态度的党加入“新”国际，那是非常可笑的。

“国际”派为什么倒退了一步，我们不得而知。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不断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的秘密组织，这样的组织无论对机会主义或对考茨基主义都一定会采取明确的立场。这一点所以必要，尤其是因为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最后的两家日报，即《不来梅市民报》^[139]和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140]现在已经被夺走了，这两家报纸都转到考茨基分子那边去了。只有一个派别即“德国国际社会党人”（I. S. D.）^[141]还坚守自己的岗位，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

看来，“国际”派中的某些人又滚到无原则的考茨基主义的泥潭里去了。例如，施特勒贝尔竟在《新时代》杂志^[122]上拍起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马屁来了！就在前几天，即1916年7月15日，他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题为《和平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文章，为考茨基的最庸俗的和平主义进行辩护。至于尤尼乌斯，他是最坚决反对考茨基的“废除武装”、“取消秘密外交”等等异想天开的计划的。在“国际”派中可能有两派：一派是革命的，另一派则向考茨基主义方面摇摆。

尤尼乌斯的第一个错误论点写进了“国际”派的提纲第5条：“……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纪元），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民族利益只是欺骗的工具，以便让劳动人民群众为其死敌——帝国主义效劳……”以这个论点结尾的第5条，一开头就说明了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根本否认民族战争，这可能是疏忽大意，或者是在强调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这个完全正确的思想时偶然说了过头话。但是，既然也可能有相反的情况，既然因有人胡说这场战争是民族战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就错误地否认任何民族战争，所以不能不谈一谈这个错误。

尤尼乌斯强调“帝国主义环境”在这场战争中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说塞尔维亚背后有俄国，“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背后有俄国帝国主义”，并且说如果荷兰参战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性质的，因为第一，它要保卫自己的殖民地；第二，它将成为帝国主义联盟之一的成员国。这是完全正确的。就这场战争来说，这是不容争辩的。而且尤尼乌斯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同“目前支配着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民族战争的幽灵”（第81页）进行斗争，所以不能不认为他的论断既是正确的，又是完全恰当的。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那只是在于：夸大了这个真理，离开了必须具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把对这场战争的估计搬到了帝国主义下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为“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这个论点辩护的唯一理由是：世界已经被极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瓜分完了，因此任何战争，即使起初是民族战争，也会由于触犯某一帝国主义大国或帝国主义联盟的利益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第81页）。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大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法国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做通向诡辩法的桥梁，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始终

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的办法，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在某一事物的环境和发展中对它进行具体分析。

至于说1914—1916年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会转化为民族战争，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代表向前发展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在客观上力图把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其次还因为两个联盟的力量相差并不很大，而且国际金融资本到处造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但是，也不能宣布说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假如欧洲无产阶级今后20来年还是软弱无力，假如目前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而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遭到奴役，假如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也能维持20来年，比如说没有由于发生日美战争而转到社会主义，那就可能在欧洲发生伟大的民族战争。这将是欧洲倒退几十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其次，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进行的民族战争不仅很有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10亿人口，即世界人口一半以上。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已经很强大，或者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政治的继续。这种战争可能导致现在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也可能不导致，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

例如，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打过七年战争^[142]，也就是说，进行过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和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还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发生）。法国被打败，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一国的民族解放战争^[143]。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自己仍占据着今天美国的某些部分，但出于对英国的仇恨，也就

是说，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却同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缔结了友好条约。法军同美军一起打英国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附带因素，这同我们在1914—1916年战争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奥塞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赛相比，没有多大的意义）。由此可见，死板地运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并且由此得出“不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的结论，那是多么荒谬。比如波斯、印度和中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某些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因为它是从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的，至于这种战争是否转化为目前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要取决于很多具体情况，担保这些情况一定会出现，那是很可笑的。

第三，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这场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引起（在社会主义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使目前各大国的政策成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这个“时代”丝毫不排斥民族战争，例如，小国（假定是被兼并的或受民族压迫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它也不排斥东欧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例如，尤尼乌斯对奥地利的判断是很有见地的，他不仅估计到“经济”因素，而且估计到特殊的政治因素，指出“奥地利没有内在的生命力”，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组织，而只是由几个社会寄生虫集团组成的松散的辛迪加”，“奥匈帝国的灭亡在历史上不过是土耳其崩溃的继续，同时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要求”。至于某些巴尔干国家和俄国，情况也并不好些。如果各“大”国在这场战争中都弄得筋疲力竭，或者如果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则完全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甚至胜利的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大国的干涉实际上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能实现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轻率地”说：小国反对大国的战争是没有希望的，那就必须指出：没有希望的战争也是战争；其次，“大国”内部的某些现象——

如发生革命——可以使“没有希望的”战争成为很“有希望的”战争。

我们所以详细地分析所谓“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这个不正确的论点，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第三国际只有在非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左派”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漠不关心，那当然是极其可悲的。而且这个错误在政治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人们会从这一错误出发去进行“废除武装”的荒谬宣传，因为似乎除了反动的战争以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战争；人们从这一错误出发会对民族运动持更荒谬的和简直是反动的漠视态度。当欧洲的“大”民族——压迫许多小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民族——的成员，以貌似学者的姿态声称“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时候，这种漠视态度就是沙文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诚然，为了取得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众多居民（我们举例提到的印度和中国就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某些情况特别有利的配合（例如，帝国主义大国由于大伤元气、由于彼此打仗和对抗而无力进行干涉，如此等等），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情况中的最后一种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最理想和最有利的）。

不过必须指出，如果责难尤尼乌斯对民族运动漠不关心，那是不公正的。他至少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罪过之一，就是对喀麦隆一个土著领袖因“叛变”（显然是因为他在战争爆发时企图举行起义）而被处死刑一事默不作声，他在另一个地方还专门（向列金先生、伦施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仍把自己算做“社会民主党人”的坏蛋们）强调指出，殖民地民族也是民族。他极其肯定地说：“社会主义承认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都有独立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国际社会主义承认自由、独立、平等的民族的权利，但是，只有它才能建立这样的民族，只有它才能实现民族自决权。而这个社

会主义的口号〈作者说得很正确〉也和其他一切口号一样，不是为现存的事物辩护，而是指出道路，促使实行革命的、改造的、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第77页和第78页）。因此，谁要是认为一切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像某些荷兰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囿于狭小的眼界和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连社会主义下的民族自决也加以否认，那就大错特错了。荷兰人和波兰人犯这个错误的特殊的根源，我们在别处还要谈到。

尤尼乌斯的另一个错误论断，同保卫祖国问题有关。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尼乌斯使我们更加深信，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唯一正确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产阶级反对保卫祖国，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掠夺、奴役和反动的性质，是因为有可能和有必要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并竭力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尤尼乌斯一方面很好地揭露了目前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它不同于民族战争；可是另一方面，又犯了非常奇怪的错误，企图牵强附会地把民族纲领同目前这场非民族的战争扯在一起！这听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资产阶级拼命叫喊外国“入侵”，以便欺骗人民群众，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带有列金和考茨基色彩的官方社会民主党人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特别热心地重复着这个“入侵”的论据。考茨基现在向那些天真而轻信的人保证说（包括通过俄国的组委会分子^[144]斯佩克塔托尔），他从1914年年底就转到反对派方面来了，然而他却继续援引这个“论据”！尤尼乌斯竭力驳斥这个论据，举了一些历史上极有教益的例子，来证明“入侵和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历史上，并不像官方的神话所说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两者互为手段和表现的”。例子是：法国波旁王朝曾请求外国入侵以反对雅各宾党人，1871年，资产者曾请求外国入侵以反对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

“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 [\(4\)](#)

尤尼乌斯在引证1793年的例子时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一切时代的典型例子。”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历来的经验证明，不是戒严状态，而是唤起人民群众的自尊心、英雄气概和道德力量的忘我的阶级斗争，才是保卫国家、抵御外敌的最好办法。”

尤尼乌斯的实际结论是：

“是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在严重的历史危机时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重大罪过，也正在于它在1914年8月4日的宣言里庄严地宣布：‘我们决不会在危急时刻不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同时却又自食其言。它在最危急的时刻没有起来保卫祖国。因为在这个时刻它对祖国的首要义务是：向祖国指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内幕，揭穿掩盖这种危害祖国行为的爱国主义的和外交的种种谎言；大声地明确地声明，对德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无论胜负都是灾难；竭力反对用实行戒严来扼杀祖国；宣布必须立即武装人民，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坚决要求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连续）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保证人民代表机关对政府、人民对人民代表机关的严格监督；要求立刻废除对一切政治权利的限制，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民才能胜利地保卫自己的国家；最后，要用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1848年的原来的真正民族的纲领，用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纲领，即统一的大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纲领——旨在保存奥地利和土耳其，也就是保存欧洲和德国反动势力的纲领。这就是应当在全国面前展开的旗帜，它才是真正民族的、真正解放的旗帜，而且既符合德国的优良传统，也符合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政策”……“可见，所谓祖国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难以兼得，是悲剧性的冲突促使我们的国会议员怀着‘沉重心情’站到了帝

国主义战争的方面，这纯粹是一种想象，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构。相反地，无论在战争时期或平时时期，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都是完全协调的，因为无论战争或和平都要求极其有力地展开阶级斗争，极其坚决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尤尼乌斯的论断就是如此。这些论断显然是错误的，我国沙皇制度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奴仆普列汉诺夫和契恒凯里先生，也许甚至还有马尔托夫和齐赫泽先生，都会幸灾乐祸地抓住尤尼乌斯的话，不去考虑理论上的真理，而是考虑如何脱身、灭迹、蒙蔽工人，因此，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来说明尤尼乌斯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他建议用民族纲领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他建议先进阶级要面向过去，而不要面向未来！1793年和1848年，无论在法国、德国或整个欧洲，客观上提上日程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这种客观的历史情况相适应的，是“真正民族的”纲领，即当时民主派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纲领，在1793年，资产阶级和平民中最革命分子曾经实行过这种纲领；而在1848年，马克思也代表整个先进的民主派宣布过这种纲领。当时在客观上同封建王朝战争相对抗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那个时代的历史任务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现在，对欧洲各先进的大国来说，客观情况不同了。要向前发展——如果撇开可能的、暂时的后退不说——只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从向前发展的观点看来，从先进阶级的观点看来，客观上能够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战争的，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也就是说，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国内战争，因为没有这种战争，就不能真正前进，其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所以说，有些布尔什维克（好在只是个别的，并且立即被我们抛到号召派^[145]那边去了）准备采取有条件地保卫祖国的观点，即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共和制胜利的条件下保卫祖国的观点，他们虽然忠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词句，却背叛了它的精神；因为卷入欧洲

各先进大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俄国，即使有共和制的形式，它进行的也还是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他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步之后，马上又偏离了这条道路。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无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所以这太一般化，因而用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场合就不够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而不是一个国家）避免入侵的危险。要是在1914—1916年间存在“大德意志共和国”的话，那它还会进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战争。

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要进行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但他似乎害怕彻底说出全部真理，而向后转了，陷入了在1914、1915、1916年间进行“民族战争”的幻想。如果不从理论方面，而纯粹从实践方面来看问题，那么尤尼乌斯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各个阶级，都是拥护战争的（在俄国大概也是这样，至少是大多数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以及很大一部分贫苦农民，显然都被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所迷惑）。资产阶级武装到了牙齿。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常设国会、由人民选举军官（“武装人民”）等等的纲领，实际上就是“宣布”（具有不正确的革命纲领的！）革命。

尤尼乌斯在这里说得完全对：革命是不能“制造”的。革命在1914—1916年间提上了日程，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应当以革命阶级的名义“宣布”这一点，大胆地彻底地指出它的纲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在战争时代，没有反对反动透顶的、罪恶的、使人民遭受无法形容的灾难的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这是不可能的。应当周密考虑出系统的、彻底的、实际的、不论革命危机以何

种速度发展都是绝对可行的、适合于日益成熟的革命的行动。我们党的决议中已经指出这些行动：（1）投票反对军事拨款；（2）打破“国内和平”；（3）建立秘密组织；（4）举行士兵联欢；（5）支持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⁵⁾所有这些步骤的顺利实现，必然会导致国内战争。

宣布伟大的历史性的纲领，毫无疑问，有巨大的意义，但不是宣布旧的、对1914—1916年来说已过了时的德国民族纲领，而是要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纲领。你们资产者为了掠夺而打仗；我们一切交战国工人向你们宣战，为社会主义而战，——这就是没有像列金、大卫、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盖得、桑巴之流那样背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在1914年8月4日的国会演说中应当讲的内容。

看来，尤尼乌斯的错误可能是由双重错误的想法造成的。毫无疑问，尤尼乌斯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坚决拥护革命策略的，不管普列汉诺夫先生们对尤尼乌斯的“护国主义”怎样幸灾乐祸，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对于这种可能的和很有可能的诽谤，必须立即直截了当地给以回击。

但是，第一，尤尼乌斯没有完全摆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环境”，那些人害怕分裂，害怕彻底说出革命的口号。⁽⁶⁾这种害怕心理是错误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消除而且一定会消除这种心理。他们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过程中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他们正在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作斗争，他们同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的重大的、原则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因为马尔托夫和齐赫泽这班先生（和斯柯别列夫一样）一只手摇着旗帜，向“各国的李卜克内西”致敬，另一只手却和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亲热拥抱！

第二，看来，尤尼乌斯想实现一种同孟什维克的臭名昭著的“阶段论”相类似的东西，想从革命纲领“最方便的”、“通俗的”、能为小资产阶级所接受的那一头做起。这好像是打算“蒙哄历史”，蒙

哄那些庸人。据说，谁也不会反对保卫真正祖国的最好办法，而真正的祖国就是大德意志共和国，保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民兵、常设国会等等。据说，这样的纲领一旦被采纳，它便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

大概就是这种推论自觉或半自觉地确定了尤尼乌斯的策略。不用说，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令人感觉到他是一个孤独者，他没有一批秘密组织中的同志，而秘密组织是习惯于透彻地考虑革命口号并经常用这些口号教育群众的。不过这种缺点——忘记这一点是很不对的——并不是尤尼乌斯个人的缺点，这是德国所有左派的软弱性造成的，因为他们被考茨基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尤尼乌斯的拥护者虽然孤独无援，但是已经能够着手印发秘密传单并同考茨基主义作战了。他们也一定能够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15页

[\(1\)](#)*这是列宁为评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罗莎·卢森堡在1916年发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署名尤尼乌斯）而写的文章。尤尼乌斯认为当时欧洲爆发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列宁肯定了这一正确见解，同时批评了作者提出的“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错误观点。列宁辩证地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的关系，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理，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他还指出：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做通向诡辩法的桥梁，但是，我们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的方法，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在某一事物的环境和发展中对它进行具体分析。

[\(2\)](#)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19页。——编者注

[\(3\)](#)同上书，第163—169页。——编者注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编者注

[\(5\)](#)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6页。——编者注

[\(6\)](#)尤尼乌斯谈到“胜利还是失败”这个问题时的议论，也有同样的错误。他的结论是：二者都不好（破产、军备扩充，等等）。这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和平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如果说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预”——虽然，无论尤尼乌斯或“国际”派的提纲都谈到这一点，可惜太一般化了——那就必须从别的观点提出问题：（1）不冒失败的危险，能不能进行“革命干预”？（2）不冒同样的危险，能不能打击本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

（3）我们不是向来都说，而反动战争的历史经验不是也表明，失败会促进革命阶级的事业吗？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46]（节选）⁽¹⁾（1918年10—11月）

⁽¹⁾*这是列宁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要著作。在节选的部分，列宁把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作了比较，指出他们是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用庸俗的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列宁指出，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而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却竭力抹煞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观点。他们用折中主义的所谓“过渡阶段”代替革命，以“劳动的人民国家”这一非阶级概念来代替阶级概念。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我读了考茨基的这本书之后，才看到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一书（1918年巴黎版），禁不住要把两本书作个比较。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思想领袖；王德威尔得是社会党国际局主席，是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作掩饰，以老练的记者的圆滑手腕“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前者特别清楚地表明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笨拙，好发空论，粗暴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后者典型地表现了在罗曼语国家^[147]——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说是在西欧一带（就是说：德国以西一带）——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特点，即比较圆滑，不那样笨拙，比较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所用的基本手法则与前者相同。

他们两人都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问题谈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问题谈得多些。他们两人都抹杀这两个问题极其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回避革命。两人都丝毫没有那种贯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丝毫没有那种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面目全非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丝毫没有说明革命的任务不同于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奴隶的体系或秩序、制度这种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享一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这种作用。

现在我们举出王德威尔得几个最重要的论断来证实我们的看法。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非常热衷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除了资产阶级完

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把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引了不知多少，因为这一点已被他们的实践纳入纯议会斗争的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认为必须对部分过时的《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即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打碎这个机器。⁽¹⁾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约而同闭口不谈的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改良区别开来的东西。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谈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绝这个专政。考茨基通过粗暴的伪造来干这件事。王德威尔得则用比较巧妙的手法来干同样的勾当。他在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一节即第4节中，专门用（b）分节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问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再说一遍：他恰恰把最主要的地方，即讲到打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地方丢掉了），并作出结论说：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象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公社，但这次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获得胜利，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主要中心获得胜利。

这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因为目前已经看得很明显，许多国家在战后时期必将发生空前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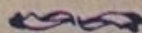
不过，如果说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革命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无产阶级没有充分作好准备来利用那由于情势的发展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政权以前，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第73页）

Ленин
Россі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і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ъ).
Пролетаріи всѣхъ странъ,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ЗКС
и
прогр.
Н. Ленинъ (Вл. Ульяновъ).

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ІЯ и РЕНЕГАТЪ КАУТСКІЙ.

Цѣна 3 руб.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УНИСТЪ“.

МОСКВА:

ПЕТРОГРАДЪ:

- | | |
|---|---|
| 1) Срѣтенка (уг. Рыбникова пер.), д. 8.
Тел. 4-70-48; 3-15-00. | 1) Поварской пер., д. № 2, кв. 9 и 10.
Тел. 2-27-42. |
| 2) 2-ой домъ Союзтсвз, Театр. пл. | 2) Литейный проспектъ, д. 48. |

1918.

1918年出版的、有列宁签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封面
(按原版缩小)

涉及问题实质的，仅此而已！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代表人物！ 1912年，他们签署了巴塞尔宣言^[148]，在宣言中直接谈到后来在1914年爆发的那种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明确宣告这种革命将要到来。但是，当战争已经发生、革命形势已经形成的时候，他们，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却开始拒绝革命了。请看，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只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议的假设！这同考茨基关于苏维埃在欧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论断毫无二致。

但是要知道，一切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说的，他们现在一定会同意说：新的公社“并非不可思议”，苏维埃将起很大的作用，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应该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作为国家的新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对这个问题作过许多详细的说明，王德威尔得对它们却一概不提。

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实践家和政治家应当说明，现在只有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拒绝下列任务：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类型的，苏维埃类型的，或者什么第三种类型的）的必要性，说明作好进行这种革命的准备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驳斥反对革命的市侩偏见等等。

无论考茨基或王德威尔得都根本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他们的社会主义者声誉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

我们从理论上来提出问题。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认并赞成这个真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问题：当无产阶级争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镇压哪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用什么手段镇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认、赞成并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他的书第72页），但是……他只字不提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资本家先生们）问题！！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完全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叛徒行径之所在。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编的词典——没说的，真是渊博的著作！——王德威尔得的书第87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摘抄这个渊博的庸俗论调，称赞这种论调，把这种论调和马克思的言论放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说，“国家”一词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ê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的代表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

“……过于绝对的论断，会有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统治为基础的资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有许多过渡阶段。”（第156页）

请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否认绝对真理，是要阐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折中主义者不愿意要“过于绝对的”论断，为的是暗中贯彻他们那种市侩庸人的愿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资本家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统治机关的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

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应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之后将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都一笔勾销了。

这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径。

这也就是在理论上哲学上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同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区分开来。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作为一个折中主义者和诡辩家，比考茨基巧妙，精细，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语，可以避开任何革命问题，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因为，有哪一个受过欧式教育的资产者会想到“一般地”否定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王德威尔得写道：“我同意盖得的意见，如果不预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1. 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变成门格尔所说的劳动的人民国家。

2. 把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像圣西门所说的，把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分开。”（第89页）

王德威尔得把这段话加上了着重标记，来特别强调这些论点的意义。其实这是最纯粹的折中主义的糊涂观念，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决裂！要知道，“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语，不过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斥责为无稽之谈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旧调重弹^[149]。“劳动的人民国家”的说法是标准的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50]）的词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论，而没有觉察到这只能造成糊涂观念。从考茨基的“纯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涂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场上，忽视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视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其次，只有在任何国家都消亡了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失而让位给对物的管理。王德威尔得用这种比较遥远的未来，去掩盖和冲淡明天的任务——推翻资产阶级。

这种伎俩还是等于替自由派资产阶级效劳。自由主义者同意谈谈对人用不着管理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不能沉醉于这种无害的空想呢？至于无产阶级镇压抗拒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那就闭口不说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是王德威尔得恭维无产阶级。恭维是不难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善于恭维自己的选民。但掩藏在“恭维”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王德威尔得详细地转述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言论^[151]，说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公然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市侩折中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21—327页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编者注

论国家 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152]

⁽¹⁾ (1919年7月11日)

同志们！根据你们拟订并通知我的计划，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国家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已经熟悉到什么程度。如果我没有弄错，你们的训练班刚开课，你们是第一次有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既然如此，这个困难的问题的第一讲，就很可能做不到使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充分明白，充分了解。要真的是这样，我请你们不要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因此，绝对不要指望在一次短短的讲课中就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听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讲课以后，你们应该把不理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三番五次地加以研究，将来在看书、听讲中进一步把不明白的地方弄清楚。我希望我们还能再谈一次，那时可以就所有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检查一下究竟哪些地方最不明白。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在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极为混乱，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别说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在不论哪天哪份报纸上，只要涉及经济或政治，你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国家是什么，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的意义是什

么，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又是什么。你们每天都会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遇到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你们要从阅读中，从听国家问题的讲课中，学会独立地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在每个细小问题上，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在谈话中，在同论敌争论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有学会独立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们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

作了这几点小小的说明之后，现在我来谈本题，谈谈什么是国家，它是怎样产生的，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奋斗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基本上应当是怎样的。？

我已经说过，未必还能找到别的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直到现在，往往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不仅宗教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这样做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自以为没有宗教偏见的人，也往往把专门的国家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并且企图建立某种具有一套哲学见解和论据的往往异常复杂的学说，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是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是赋予或可能赋予人们某种并非来自人本身而来自外界的东西的力量，说国家是上天赋予的力量。必须指出，这个学说同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有极密切的联系，处处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深深浸透了资产阶级代表先生们的一切习惯、一切观点和全部科学，因此，你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这一学说的残余，甚至那些愤慨地否认自己受宗教偏见支配并且深信自己能够清醒地看待国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02]的观点也不例外。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这样复杂，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以为那些自称具有科学

性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当你们熟悉了和充分钻研了国家问题的时候，你们在国家问题、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上，会随时看到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看到这个斗争在各种国家观点的争论中、在对国家的作用和意义的估计上都有反映或表现。

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当然，这部著作并不是全都浅显易懂，其中某些部分是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我还要重复说，如果这部著作你们不能一下子读懂，那也不必懊丧。几乎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研究时，即使不能全部读懂，也一定能读懂绝大部分。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人对人的剥削怎样产生，社会主义怎样出现，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一样，要正确地分析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历史的考察。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父权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家族，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生活在家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民族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遇到比较明确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做国家。

在人们还在不大的氏族中生活的原始社会里，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蒙昧的状态，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到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我们看到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妇女在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看不到一种特殊等级的人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这种暴力机构，大家知道，现在就是武装队伍、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编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见解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正是这种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监狱、特殊队伍即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往往不仅同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有时还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构成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划分为

阶级，即划分为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些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的地方和时候，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的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都向我们表明了它如下的一般规律、常规和次序：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的文明的欧洲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不发达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设施。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做奴隶主，而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做奴隶。

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做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做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有权强迫农民尽某种义务。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中，从商品交换中，从货币权力的出现中，产生了资本权力。在18世纪（更正确些说，从18世纪末起）和19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取代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1861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划分仍然存在，还

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划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后者自己雇用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许多世纪，出现过各种各样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你们根据这种基本划分来观察国家，就会看出，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以前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生和巩固，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国家也产生和巩固起来。在人类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内，虽然有过巨大的历史变化，虽然发生过各种与人类从奴隶制经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到现在全世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政治变迁和革命，但你们总可以看到国家的出现。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人

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现代技术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称20世纪技术奇迹的现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虽然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其装备同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暴力机构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仔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国家的实质和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费力地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没有产生而且不可能产生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只有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时，当奴隶制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奴隶维持最贫苦的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有国家了。

于是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能够管理所有奴隶的机构。当时无论是社会或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疆域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但是终究有一个机构来强迫奴隶始终处于奴隶地位，使社会上一部分人

受另一部分人的强制、压迫。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性的强制机构不可。当没有阶级的时候，也就没有这种机构。在阶级出现以后，随着阶级划分的加强和巩固，随时随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关即国家产生出来。国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掌握权力，共和制是不存在任何非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掌握权力，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民主制一词按希腊文直译过来，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所有这些区别在奴隶制时代就产生了。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不管是谁讲古代史课，你们都会听到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斗争的情况，但基本的事实是奴隶不算是人；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罗马的法律把奴隶看成一种物品。关于杀人的法律不适用于奴隶，更不用说其他保护人身的法律了。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只把他们看做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奴隶占有制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们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杀死奴隶也不算犯罪。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奴隶占有制国

家可以是君主国，贵族共和国，甚至可以是民主共和国。管理形式确实是多种多样，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

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权利，根本不算是人；在农奴制社会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禁锢在土地上，这就是农奴制这一概念的由来。农民可以在地主给他的那一块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一定的天数，其余的日子则替老爷干活。阶级社会的实质仍然存在：社会是靠阶级剥削来维持的。只有地主才能有充分的权利，农民是没有权利的。实际上，农民的地位与奴隶占有制国家内奴隶的地位没有多大区别。但是通向农民解放的道路毕竟是比较宽广了，因为农奴制农民已不算是地主的直接私有物。农奴制农民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自己了。由于交换和贸易关系有了更广泛的发展，农奴制日益解体，农民解放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农奴制社会总是比奴隶占有制社会更复杂。农奴制社会有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因素，这在当时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农奴制占优势。当时的国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虽然远不如前者明显），但始终只有地主—农奴主才被认为是统治者。农奴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无论在奴隶制下或农奴制下，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统治，非采取强制手段不可。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要推翻压迫的接连不断的尝试。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多次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137]，就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许多年中一直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

些奴隶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穿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这种国内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整个农奴制时代也同样充满着不断的农民起义。例如在中世纪的德国，地主和农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变成了农民反对地主的国内战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俄国也多次发生过这种农民反对地主—农奴主的起义。

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一种机构能使大多数人统统服从他们，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权力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政，——这就是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

由于商业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巨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交换手段，货币周转使得一些人能够掌握巨量财富。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衰落下去，新阶级即资本代表者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全体公民似乎一律平等了；以前那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划分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人，不管他占有的是何种资本，是不是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也不管他是不是只有一双做工的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了。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都加以保护，使其不受那些没有财产的、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无产者的群众的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不能详细分析这个社会。你们将来学党纲的时候还会遇到这个问题，会听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明。这个社会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农奴制，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被摧毁时（这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前的事；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到1861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导致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这个斗争正遍及全世界。

要了解已经开始的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必须记住，资本主义国家起来反对农奴制国家，是在自由的口号下投入战斗的。农奴制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农奴制已经摧毁，农民已有可能把土地作为名副其实的财产来占有了。至于这是农民赎买来的土地，还是靠支付代役租得来的小块土地，国家是不管的——国家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因为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内都变成了私有者。在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让给农民的时候，国家也保护私有财产，用赎买即出钱购买的办法，使地主得到补偿。国家似乎在宣称它保护真正的私有权，并对私有权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庇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工厂主都有这种私有权。而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以完全控制一切无产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却宣布自己是以自由为基础来实行统治的。它反对农奴制时，宣布私有财产自由，深以国家似乎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自豪。

其实，国家仍然是帮助资本家控制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但它在表面上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选权，并且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鼓吹者、学者和哲学家宣称它不是阶级的国家。甚至在目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反对它的时候，这班人还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说我们

建立的国家是以一部分人强制和镇压另一部分人为基础的，而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所以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且恰好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时候，在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这个问题即国家问题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可以说，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成为当代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

我们观察一下俄国的或无论哪个更文明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看到，目前几乎所有的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根本问题。人们是怎样议论布尔什维主义的呢？资产阶级的报刊谩骂布尔什维克。没有一家报纸不在重复着目前流行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说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制度。如果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心地纯朴（也许不是由于纯朴，也许这种纯朴，如俗语所说的，比盗窃还坏），认为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和民权制度是他们的发明和创造，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在最富有的国家内，花数千万金钱推销数千万份来散布资产阶级谎言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富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不在重复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论据和责难，说美国、英国和瑞士是以民权制度为基础的先进国家，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却是强盗国家，没有自由，布尔什维克破坏民权思想，甚至解散了立宪会议。这种对布尔什维克的吓人的责难，在全世界重复着。这种责难促使我们不得不解决什么是国家的问题。要了解这种责难，要弄清这种责难并完全自觉地来看待这种责难，要有坚定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那就必须彻底弄清楚什么是国家。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在战前创立的替这些国家辩护的各种学说。要正确处理问题，就必须批判地对待这一切学说和观点。

我已经介绍你们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就讲到，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贿赂手段如此明目张胆。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农奴制农民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者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

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的发展。因此，这一切东西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要来一个转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仅那些别有用心心的伪君子、学者和神父支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谎言，说国家是自由的，说国家负有使命保护所有的人的利益，就是许多诚心诚意重复陈腐偏见而不能了解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也是如此。不仅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人，不仅受资本压迫或被资本收买的人（替资本服务的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学者、艺术家和神父等等），就是那些只是受资产阶级自由这种偏见影响的人，也都在全世界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就抛弃了这种资产阶级谎言，公开声明说：你们把你们的国家叫做自由国家，其实只要私有制存在，你们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而且国家愈自由，这种情形就愈明显。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都是民主共和国，粉饰得很漂亮，侈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尽管如此，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像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其实，瑞士和美国都是资本在实行统治，只要工人试图真的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就立刻会引起一场国内战争。在这两个国家内，士兵较少，即常备军较少（瑞士实行民兵制，每个瑞士人的家里都有枪；美国直到最近还没有常备军），因此，罢工发生时，资产阶级就武装起来，雇用士兵去镇压罢工，而且在任何地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都不如瑞士和美国那样凶暴残忍；在任何一国的议会里，资本的势力都不如这两个国家那样强大。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但是愈往后，工人的眼睛就愈亮，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就传布得愈广泛，尤其是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场血腥的大厮杀以后。工人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资本家作无情的斗争。

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

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因此要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必将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来掌握。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可能同工人平等，挨饿者也不可能同饱食者平等。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做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而一部分人却在挨饿的现象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到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讲课中还会谈到这个问题，还会多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59—76页

[\(1\)](#)*列宁在这篇讲演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的虚伪性。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实质和职能等问题，批判了国家问题上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国家的态度。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5页。——编者注

论妥协^[153](1) (1920年3—4月)

兰斯伯里同志在同我谈话时，特别强调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们的下述论点：

布尔什维克同资本家妥协了，拿他们在同爱沙尼亚缔结的和约中同意租让森林来说，就是一个例子；既然这样，那么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温和派领袖同资本家妥协也是同样合理的。

兰斯伯里同志认为这个论点在英国广为人知，对工人很有影响，迫切需要加以分析。

现在我试一试来满足这个要求。

一

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否可以同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妥协呢？

看来，这个问题就是我引述的那个论断的基础。但是这样笼统地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提问题的人或者是政治经验极少，政治觉悟不高，或者是他故意骗人，想用诡辩来掩盖他替抢劫、掠夺以及各种资本主义暴力所作的辩护。

事实上，对于这个笼统的问题作否定的回答显然是荒谬的。当然，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可以同资本家妥协或达成协议的。一切都要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看来是正当的协议和从同样观点看来是叛卖的、变节的协议之间的区别。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提一提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意见，然后再举几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无情地反对各种空谈。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策略问题）。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派^[154]的革命宣言时，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夸口“决不妥协”是一句空话。⁽²⁾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

所处的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

凡是熟悉马克思学说的原理的人，都必然会从这整个学说中得出这样的见解。而在英国，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从宪章运动^[155]（它在很多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准备，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奏”）以来就被工联和合作社的机会主义的、半资产阶级的领袖们置于脑后。所以我试着从日常生活即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大家熟悉的现象中举一些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上述见解的正确性。

先从我在一次讲话中已经举过的例子谈起。⁽³⁾假定一群武装强盗袭击你坐的汽车。假定当强盗用手枪对准你的太阳穴的时候，你交出了汽车、钱以及你的手枪，于是强盗就用这辆汽车等等继续行劫。

这显然是你同强盗的妥协，同强盗达成的协议。这一未经签署的、默然达成的协议，毫无疑问还是十分明确的：“我把汽车、武器、钱都给你这个强盗，你让我摆脱这次幸遇。”^[156]

试问，如果这些强盗利用他们从达成这一协议的人那里得到的汽车、钱和武器来抢劫第三者的话，你是否会把那个同强盗达成这种协议的人称为强盗行径的同谋者，称为抢劫第三者的同谋者呢？

不，你不会这样称呼他的。

在这里问题十分清楚，而且简单之至。

同样也很清楚，在其他情况下，默然地把汽车、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会被一切头脑正常的人认为是参加盗匪活动。

结论很清楚：发誓不同强盗达成任何协议或妥协是荒谬的，然而根据笼统地说同强盗达成协议有时是可以允许的和必要的这一抽象的论点来为强盗行径的同谋行为作辩护同样也是荒谬的。

现在举一个政治方面的例子……⁽⁴⁾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18—320页

[\(1\)](#)*本文是列宁的一篇没有完稿的文章的开头部分。列宁在文中针对英国工党领袖兰斯伯里的提问论述了“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否可以同资本家妥协”这一问题，指出笼统地否定妥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荒谬的，并用实例阐明了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585页。——编者注

[\(3\)](#)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30—331页。——编者注

[\(4\)](#)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
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57\]](#)（节选）[\(1\)](#)
（1921年1月25日）

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

现在重新提出这样初步的、属于起码常识的问题，当然是很奇怪的。但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两人责难我，说我把问题“偷换”了，或者说我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甚至把这点放进他的提纲里，并且企图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他说：我把这两种看法结合起来。

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我在发言里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也许我的政治估计不正确？如果是这样，就请指出并且加以证明。可是，如果说（哪怕只是间接地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可以（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这种见解，就是说，来分析、研究、判断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而如果说：我“尊重”您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您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您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更具体些说吧。季诺维也夫说：“你们在工会中造成分裂，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至于提高生产的问题我早在1920年1月就已经谈过，并且写过文章，那时我曾经举修建澡堂作为例子。”托洛茨基回答说：“写了一本小册子，举了个澡堂的例子，真是了不起（第29页），可是关于工会应该做什么，您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提（第22页）。 ”

不对。澡堂的例子——请原谅我说句笑话——可以值十个“生产气氛”再外加几个“生产民主”。澡堂的例子，正好是对群众，在“深入群众”时简单明了地说明了工会应该做什么，而“生产气氛”和“生产民主”却是迷了工人群众眼睛的沙子，使他们对问题难以理解。

托洛茨基同志也责备了我，他说：关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第66页）。

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我全文宣读了鲁祖塔克的提纲并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因此我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要比你的整个提纲、整个报告或副报告和总结发言所说的更多，更充分，更正确，更简洁，更明白。因为，我再说一遍，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实物奖励和同志纪律审判会的意义要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完全抽象的（因而也是空洞的）字眼重要百倍。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以及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之下，使我们看到的是：

（1）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中主义的规定。

（2）为贯穿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的整刷政策这种政治错误辩护和掩饰。而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

（3）在纯粹生产的即经济的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就是说，从鲁祖塔克的切实的提纲，从这个提出了具体的、

实际的、迫切的和活生生的任务（开展生产宣传，学会很好地分配实物奖和更正确地采用同志纪律审判会这种形式的强制）的提纲退了一步，退到抽象的、不具体的、“空洞的”、理论上错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忘记了最实际最切实的东西。

在关于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我为一方，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就是如此。

因此，当我读到托洛茨基同志12月30日对我的反驳时，我不禁觉得好笑，他说：“列宁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国形势的报告总结发言中曾经说，我们要少搞一点政治，多搞一点经济，可是在工会问题上，他却把问题的政治方面放在第一位。”（第65页）托洛茨基同志以为这些话“正中要害”。实际上这些话正好说明他的概念极其糊涂，说明他的“思想混乱”已经到了极点。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而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来同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同对工会运动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进行争论，来就一般的“提纲”进行争论，而不是进行切实的、实际的、“经济方面的”争论，即看看谁更好地更成功地根据11月2日至6日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鲁祖塔克的提纲分配了实物奖，组织了纪律审判会，实行了结合：是萨拉托夫面粉业工人，是顿巴斯煤矿工人，还是彼得格勒五金工人，如此等等。

拿“广泛辩论”是否有好处这个问题来说吧。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错误如何使我们离开了经济任务。我曾经反对所谓的“广泛”辩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破坏工会问题委员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在这个委员会里本来是可以进行切实的辩论的。我认为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的政治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缓冲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从“缓冲”的观点

来看，他们正应当全力反对广泛的辩论，争取把辩论转到工会问题委员会里去进行。请看一看当时的情形吧。

12月30日，布哈林竟说：“我们宣布了工人民主这个新的神圣的口号，它的内容就是，一切问题都不应当在狭小的集体管理机构里讨论，不应当在小型的会议上讨论，不应当在自己的什么团体里讨论，而应当提到大型的会议上去讨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把工会的作用问题提到今天这样的大会上来讨论，我们决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第45页）这个人还责备过季诺维也夫净说废话和夸大民主呢！这才是十足的废话和“胡言乱语”，他根本就不懂得形式上的民主应当服从于对革命的适宜性！

托洛茨基丝毫也不高明一些。他指控说：“列宁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和破坏关于问题实质的辩论。”（第65页）他说：“为什么我不参加委员会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在没有允许我像所有其他同志一样把这些问题全部提到党报上之前，我是不指望在小圈子里研究这些问题会带来什么好处的，因此我也就不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带来什么好处。”（第69页）

结果如何呢？从12月25日托洛茨基开始“广泛辩论”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在100个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中，对这场辩论不感到头痛，不认为这场辩论毫无益处（甚至更坏些）的，恐怕已经一个也找不到了。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使党浪费时间去对字眼、对糟糕的提纲进行争论，还骂委员会里那种正好是切实的对经济方面的研究是“小圈子里的”研究。这个委员会本来就是为了研究和检查实际经验，以便从中学习在真正的“生产”工作中前进，而不是后退，不是从活生生的工作后退到各种各样的“生产气氛”这类僵死的经院哲学上去。

拿有名的“结合”来说吧。在12月30日我曾劝告大家对这个问题采取沉默态度，因为我们还没有研究好我们本身的实际经验，而不具备这个条件，关于结合的争论就必然会变成废话，使党的力量脱离经济工作而瞎忙一气。托洛茨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建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工会代表占1/3到1/2，或占1/2到2/3，我把这个提纲叫做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²⁾。

为了这件事，布哈林向我大发脾气。我从记录第49页上看到，布哈林很周密详尽地向我证明：“当人们聚在一起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不应当装聋作哑的。”（这一页上印的就是这样的话，一字不差！）托洛茨基也发火了，他喊道：

“我请你们每一位都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列宁同志在某月某日把这一点叫做官僚主义；我敢预言，再过几个月，这一点大家就都会知道，都会奉为准则，那时，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在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金属局等组织里，都会有1/3到1/2的兼职工作人员……”（第68页）

我读过这段话之后，就请米柳亭同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把现有的关于结合问题的印好的报告给我送来。我自己这样想：我就开始一点一滴地来研究我们的实际经验吧，因为光是说空话，既没有材料又没有事实根据，只是凭空编造分歧，炮制各种定义和“生产民主”，这样来从事“全党讨论”（布哈林在第47页上用的词，这大概也会成为“惯用语”，不亚于有名的“整刷”），实在是枯燥无味到了极点。

米柳亭同志给我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20年莫斯科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920年12月19日）。该报告第14页上，载有一个表明工人参加管理机关情况的表格。我现在把这个表格照抄在下面（只包括一部分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企业）：

由此可见，就在目前，工人参加管理的，平均已经达到61.6%，就是说，已经超过半数，而接近2/3了！这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是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关于

管 理 机 关	总人数	工		其 中		专 家		职员及其他	
		名额	百分比	名额	百分比	名额	百分比	名额	百分比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	187	107	57.2	22	11.8	58	31.0		
总管理局、总局、中央管理局和总管理局的局务委员会……………	140	72	51.4	31	22.2	37	26.4		
集体管理制和个人管理制的工厂管理委员会……………	1 143	726	63.5	398	34.8	19	1.7		
总 计	1 470	905	61.6	451	30.7	114	7.7		

1/3到1/2”或“1/2到2/3”，不管你是说也好，争论也好，写成纲领也好，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全党讨论”，都是使人力、物力、注意力、时间脱离生产工作，都不过是没有重要内容的政客的空谈。而如果是在委员会里——在这里可以找到有经验的人，在这里不会同意不研究事实就写提纲——那我们就可以有成效地从事检查经验的工作，例如，找一二十个人（从1 000个“兼职工作人员”中）问一问，把他们的印象和结论同客观的统计材料加以比较，设法对未来的工作作出切实的、实际的指示：根据这些经验，现在是应当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呢，还是应当稍微改变一下方向、方式和方法，如果改变又应当怎样改变，或者是为了对工作有利而暂时停下来，再去反复地检查经验，也许可以再把什么地方修改修改，如此等等。

同志们，一个真正的“经济工作者”（让我也来作些“生产宣传”吧！）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资本家和托拉斯组织者，也要费好多年的工夫，有时是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检查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经验，纠正和改变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倒退回去，经过多次纠正，才能找到完全适合某种业务的管理制度，选拔出高级和低级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几百年的经验和习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

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像托洛茨基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是根本错误的。托洛茨基在他12月30日的发言中喊道：“我们的工人，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受过生产教育呢？有，还是没有？我的答复是：没有。”（第29页）这样来对待这种问题，是很可笑的。这就像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在这个师里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毡靴呢？有，还是没有？

甚至再过十年，我们一定还会说：所有的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受过足够的生产教育。这正像再过十年，所有党、工会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还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一样。但是生产教育的基础，我们已经奠定了，因为现在已有近千名的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参加了管理机关，管理着企业、总局以及更高的机关。“生产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我们这些从前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论家自己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遵照“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极其仔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坚持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切实认真地检查这千把人所做的事情，更加小心谨慎地、认真地改进他们的工作，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才的选拔办法等等都已经充分证明效果良好以后再向前进——这就是“生产教育”的主要的、根本的和绝对的准则，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对待问题的整个态度，都正好违反了这个准则。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整个纲领性小册子，正好是用自己的错误使党的注意力和力量脱离切实的“生产”工作而去进行空洞的、毫无内容的争论。

[\(1\)](#)*本文是列宁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论著。在节选的部分，列宁批评了他们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并对立起来的错误主张以及在面对原则问题争论时所持的折中主义态度，阐明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他通过对工会性质和任务的阐述，强调必须划清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并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四点要求：第一，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第二，要求从事物自身的发展、变化中来考察事物；第三，必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第四，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2\)](#)《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10页。——编者注

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学校”和“机关”

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么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

由于布哈林同志好在理论上钻研问题，所以他从12月30日的辩论开始（可能还更早些），就把争论转移到这方面来了。

布哈林同志在12月30日说道：“我认为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这里所说的“缓冲派”或缓冲派思想的理论实质就在于此），而且在我看来是完全无可辩驳的，那就是既不能抛弃这个政治因素，又不能抛弃这个经济因素……”（第47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已经用政治与经济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以“缓冲”为例，这一点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党的列车有倾覆的趋势，那么缓冲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一点无可争辩。而布哈林是用折中主义的态度提出“缓冲”任务的，他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了一点，又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了一点。布哈林作为一个“缓冲者”，本来应当独立地确定，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了犯了错误，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还是犯了政治上不策略的错误，是犯了发表派别言论的错误，还是犯了言过其实的错误，等等，然后再全力来抨击每种错误。但是布哈林并没有理解他的这种“缓冲”任务。下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铁路和水运员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常务局的共产党党团（这个组织是同情托洛茨基的，他们公开宣称：在他们看来，“在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的立场，是同一个观点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1921年1月3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副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尼·布哈林《论工会的任务》1921年彼得格勒版）。在这个副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起初，托洛茨基同志曾经说，必须撤换工会的领导人员，必须选拔适当的同志等等，更早以前，他甚至曾经有过‘整刷’的观点，但是现在，他已经放弃这个观点了。因此提出‘整刷’作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据，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第5页）

这段话里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我就不去多说了。（“整刷”这个词，是托洛茨基在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使用的。“选拔领导人员”，是托洛茨基在他11月8日提交中央的提纲第5条中说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提纲已经由托洛茨基的一个拥护者印出来了。托洛茨基12月25日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种想法，那种精神。他的“放弃”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根本无人知道。）现在我要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缓冲”是折中主义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放过一方面的错误，而只提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即对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几千名来自全俄各地的俄共工作人员面前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而只提到1921年1月3日彼得格勒的错误。如果“缓冲”是辩证的，那么这种“缓冲”就要全力抨击它从两方面或从各方面看到的每一个错误。布哈林却不是这样做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分析一下托洛茨基小册子中的整刷政策的观点。他干脆就不提它。这样扮演缓冲者的角色，难怪大家要觉得好笑了。

其次，从布哈林在彼得格勒的同一篇讲话的第7页上，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

“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点辩护。”

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布哈林说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论点不正确或第二个论点不正确，因为这两个论点都是对的，把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也是对的。”（第48页）

在布哈林和他那一“派”或“派别”的提纲第6条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一——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6日《真理报》）

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中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布哈林同志说到“逻辑上的”根据。从他的全部议论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我现在就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起来阐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是布哈林同志自己用过的。在12月30日的辩论中，他说：

“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46页）

读者可以看到，布哈林想用这个比喻，向我通俗地说明片面性的害处。我接受这个说明，并且表示感谢，而为了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感谢起见，我也来通俗地解释一下折中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以此作为答复。

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做镇纸，用做装捉到的蝴蝶的容器。玻璃杯还可以具有作为雕刻或绘画艺术品的价值。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

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裂缝，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么，就是杯子底上有裂缝，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

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¹⁾。）

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暂时这些已经够了。现在可以从玻璃杯转到工会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上来了。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并在他的提纲中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学校这一点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机关“这一点”。

为什么布哈林这种议论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义呢？因为布哈林丝毫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部历史（马克思主义即辩证逻辑绝对要求这样做），去分析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或者也可以说提出问题的整个方向。布哈林丝毫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搬弄一些纯粹的抽象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吸取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吸取一点。这就是折中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是在好多年以前读过孙中山的两三篇论文，读过几本书和一些报纸上的文章）。既然那里发生了起义，那么在中国人中间想必也会有争论，某甲说起义是席卷全民族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某乙则说起义是一门艺术。我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就能写出像布哈林写的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艺术“这一点”，另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尖锐化这一点”等等。这就是僵死而空洞的折中主

义，因为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研究当前这场争论、这个问题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等等。

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第三方面是劳动者的组织；第四方面是几乎纯属产业工人的组织；第五方面是按生产部门建立的组织⁽²⁾，如此等等。布哈林丝毫没有提出任何根据，丝毫没有作任何独立的分析，来证明为什么要提出问题或事物的前两“方面”，而不提出第三、第四、第五等方面。所以说布哈林派的提纲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的空谈。布哈林关于“学校”和“机关”的相互关系的整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性的错误，是折中主义的。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空洞的抽象概念转到具体的即当前的这场争论上来。关于这个争论，无论拿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来讲，或者拿托洛茨基本人在他12月25日的纲领性小册子中提出并加以阐明的情况来讲，都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和整个方向都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无论在提出“苏维埃工联主义”这个问题时，在讲一般生产宣传时，或者在像他那样提出“结合”问题即工会参加生产管理问题时，都必须而且可以把工会看做学校。而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所学校，是一所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并且纠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反而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

我们来更具体地研究研究问题吧。我们看一看，作为生产管理“机关”的目前的工会是怎样的。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900名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在管理着生产。当然，把这数目字增加到10倍、甚至100倍也未尝不可，为了向你们让步并且说明你们

的根本性错误，甚至也可以假定在最近就能有这种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就算是这样，直接进行管理的人，同总数为600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像托洛茨基那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领导层”上，只顾谈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生产管理，而不考虑到98.5%的会员（600万减9万等于591万，等于总数的98.5%）正在学习，而且还应当长期地学习下去，那就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在12月30日同季诺维也夫争辩，并且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地指控季诺维也夫否认“委派制”，即否认中央进行委派的权利和义务，在争辩时，他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对比：

他说：“……季诺维也夫过分从宣传员的观点去对待每个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忘记了这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用行政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第27页）

现在我就来详细说明，如果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会是怎样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性错误，恰恰也就在于他对他自己在纲领性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的（确切些说，是胡乱对付），而对这些问题他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纯粹以宣传员的态度来对待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在他的提纲中，而是在他的讲话中——特别是当他忘记了他与工会工作者中的所谓“保守”派进行的不成功的论战的时候——那种生产宣传无疑是好的和有益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能以全俄生产宣传局的参加者和工作者的身份在工会问题委员会里进行切实的“经济性的”工作，发表讲话和文章，那他本来会给工作带来（并且无疑一定会带来）不少的益处。错误是在于“纲领性的提纲”。用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工会组织中的“危机”，对待工会中的“两种趋势”，对待对俄共党纲的解释，对待“苏维埃工联主义”，对待“生产教育”，对待“结合”，

——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这个“纲领性的提纲”。我现在已经把托洛茨基“纲领”谈到的主要问题都列举出来了，对待这些问题的正确态度在目前——根据托洛茨基所掌握的材料——只能是宣传员的态度。

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是实行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诱导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这个领域的特殊之点和主要之点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我们党纲经济部分中关于工会问题的第5条是这样说的）[\(3\)](#)。

对这个问题整个提法的错误，对这种相互关系的不理解，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托洛茨基的整个纲领性小册子。

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托洛茨基能从另外一方面去对待整个问题，联系他的纲领中的其他问题来研究一下这个最有名的“结合”。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的小册子是专门用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即详细地研究——譬如说——900件“结合”中的90件的情形，研究工会会员和固定的工会运动工作人员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工业的职务和工会中选举产生的职务的情形。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把这90件事，跟抽样调查的统计材料，跟工农检察院及有关人民委员部的检查员和指导员的报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说，根据行政机关的材料加以分析，从工作的总结和结果、生产的成绩等等方面加以分析。总之，假定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问题，那么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态度就是正确的，只要是本着这样的态度，那就完全可以采用“整刷”的路线，就是说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应当撤换谁、调动谁、委派谁、现时对“领导层”提出些什么要求等问题上。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一些

人印的布哈林1月3日在彼得格勒发表的讲话中，布哈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整刷”，现在则已经放弃了这种观点。布哈林在这里也陷入了一种实际上令人发笑的、理论上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折中主义。布哈林抽象地看问题，而不会（或者说不愿）具体地对待问题。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还要进行行政管理，就是说，还要管理国家，我们就决不会放弃而且也不能放弃“整刷”，即放弃撤职、调职、委派、开除等等办法。但是托洛茨基的纲领性小册子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出“实际的切实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跟托洛茨基争论过的，我们跟布哈林在争论的，全党在争论的，并不是“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而是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的问题（托洛茨基提纲第4条末尾）。

这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事情的实质——当前这一具体“事情”的实质——来讲，要像布哈林（他自然是充满最人道的感情和意图的）所希望的那样，用折中主义的修改和补充去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那是办不到的。

这里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正确地解决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党和工会（“学校”和机关等等）的特殊作用的政治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在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确切些说是不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多方面的、反复的生产宣传，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并且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进行这种宣传。

第三，不要把“实际的切实的问题”跟关于趋势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全党讨论”和广泛辩论必然有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要切实地提出这些问题，在切实地研究问题的委员会中提出这些问题，同时要询问见证人，研究报告和统计材料，然后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

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或这两种机关的决定来进行“整刷”。

而我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物：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割断了中间的联系和传动带，迫不及待要采取徒劳的、没有效果的“行政手段”。既然布哈林用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论根源问题，那么他们的错误的“理论”根源是很清楚的。布哈林的理论错误（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布哈林折中主义地提出问题，结果自己完全弄糊涂了，竟然发表了工团主义的言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托洛茨基的纲领是：玻璃杯是饮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79—298页

[\(1\)](#)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些话都已经离开了“宣传”而转向“行政手段”了。

[\(2\)](#)这里顺便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他以为产业工会就是应当支配生产的工会。这是不对的。产业工会就是按生产部门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这在目前的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上，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在俄国或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3\)](#)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56](1) (1922年3月12日)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59]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托洛茨基同志在第1—2期合刊上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我只想谈几个问题，把杂志编辑部在第1—2期合刊的发刊词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计划规定得更确切一些。

这篇发刊词说，团结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周围的不全是共产党员，然而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认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这种联盟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正确地规定了杂志的任务。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必须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设。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担负的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也是如此。可喜的是俄国先进社会思想中的主要思潮具有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且不说格·瓦·普列汉诺夫，只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够了，现代的民粹派（人民社会党人^[160]和社会革命党人^[102]等）由于一味追随时髦的反动哲学学说，往往离开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倒退，他们被欧洲科学的所谓“最新成就”的假象所迷惑，不能透过这种假象看清它是替资产阶级及其偏见和反动性效劳的不同形式。

无论如何，我们俄国还有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疑还会有——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而吸收一切拥护彻底的战斗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反对所谓“有教养社会”的种种哲学

偏见，是我们不可推诿的责任。老狄慈根（不要把他同他那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毫无成就的著作家儿子混为一谈）曾正确地、中肯地、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对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并受到它们的学者和政论家重视的那些哲学流派的基本看法，他说：当今社会中的哲学教授多半实际上无非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161\]](#)

我们俄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所说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做，是因为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只要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当今那些有教养的人在国家政治、一般经济、日常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依赖，就可以了解狄慈根这句一针见血的评语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回顾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时髦哲学流派中的多数流派，哪怕只回顾一下由于镭的发现而兴起的哲学流派，直到目前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

由此可见，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个战斗的刊物，这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追击当今一切“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而不管他们是以官方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以“民主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自命的自由射手。[\[162\]](#)的面貌出现。

其次，这个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我们有些部门，至少有些国家机关是主管这个工作的。但是，这个工作做得非常软弱无力，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看来是受到了我们真正俄罗斯式的（尽管是苏维埃式的）官僚主义这种一般环境的压抑。因此，为了弥补有关国家机关工作的不足，为了改进和活跃这一工作，这个要办成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密切注意用各种文字出版的一切有关文献，把这方面一切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翻译出来，或者至少摘要介绍。

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²⁾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许多例子之一）。有时人们用各种“动听的”理由来为我们这种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和笨拙无能进行辩护，例如说18世纪无神论的旧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等等。这种不是掩盖学究气就是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冒充博学的诡辩，是再坏不过了。当然，在18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18世纪末以来对宗教的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如此等等。

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这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那些文字枯燥无味，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而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合适千百倍，此类转述充斥我们的出版物，并且常常歪曲（这是毋庸讳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们都有了译本。担心在我国人们不会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正意见来补充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貌似马克思主义、实则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

另一方面，请看一看当今对宗教作科学批判的代表人物吧。这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驳斥宗教偏见时差不多总要“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解，从而马上暴露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奴隶，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举两个例子。罗·尤·维佩尔教授在1918年出版了一本题名《基督教的起源》的小册子（莫斯科法罗斯出版社版）。作者叙述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成就，但他不仅没有反对教会这种政治组织的武器，即偏见和骗局，不仅回避了这些问题，而且表示了一种简直可笑而反动透顶的奢望：要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上。这是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而资产阶级则从他们在世界各国劳动者身上榨取到的利润中拿出几亿卢布来扶持宗教。

德国的著名学者阿尔图尔·德雷夫斯在他的《基督神话》一书中驳斥了宗教偏见和神话，证明根本就没有基督这样一个人，但在该书末尾，他却主张要有一种宗教，不过，是一种革新的、去芜存精的、巧妙的、能够抵抗“日益汹涌的自然主义潮流”的宗教（1910年德文第4版第238页）。德雷夫斯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自觉的反动分子，他公开帮助剥削者用更为卑鄙下流的新的宗教偏见来代替陈旧腐朽的宗教偏见。

这并不是说，不应该翻译德雷夫斯的东西。这只是说，共产党员和一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结成联盟，但是当这些进步分子变成反动的时候，就要坚决地揭露他们。这只是说，不敢同18世纪即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因为我们在同流行的宗教蒙昧主义的斗争中，必须通过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同德雷夫斯们结成“联盟”。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刊物，就必须用许多篇幅来进行无神论的宣传，评介有关的著作，纠正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工作中的大量缺点。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那些有许多具体事

实和对比来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组织同宗教团体、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的书籍和小册子。[\[163\]](#)

有关北美合众国的一切材料都非常重要，那里宗教同资本之间的正式的、官方的、国家的关系要少一些。然而我们看得更为清楚，所谓“现代民主”（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等对这种民主崇拜得五体投地），无非是有宣传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东西的自由，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宣传最反动的思想、宗教、蒙昧主义以及为剥削者辩护等等。

我希望这个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能为我国读者登载一些评介无神论书籍的文章，说明哪些著作在哪一方面适合哪些读者，并指出我国已出版哪些书籍（要像样的译本才能算数，但这样的译本还不怎么多），还应出版哪些书籍。

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这些人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13\]](#)的时髦的哲学倾向。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2期合刊上登了阿·季米里亚捷夫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由此可以期待，这个杂志也能实现这后一种联盟。必须更多地注意这个联盟。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季米里亚捷夫在杂志第1期上不得不声明，各国已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抓住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而爱因斯坦本人，用季米里亚捷夫的话来说，并没有对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任何主动的攻击。

这不仅是爱因斯坦一人的遭遇，也是19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的许多大革新家，甚至是多数大革新家的遭遇。

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此类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其历史上无所作为和历史上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至今仍处于停滞和腐朽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觉醒的事实，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当然，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

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地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用谢德林的话来说，它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挨揍^[164]。不这样做，大自然科学家在作哲学结论和概括时，就会和以前一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自然科学进步神速，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革的时期，这使得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

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虽然与哲学领域无关，但毕竟属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也想注意的社会问题领域。

这个例子表明，当今的伪科学实际上是最鄙陋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

不久以前我收到了“俄国技术协会”^[165]第11部出版的第1期《经济学家》杂志^[166]（1922年）。这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寄给我的，他大概还没有时间了解一下这本杂志的内容，就轻率地对这个杂志表示赞许。其实，这个杂志是当代农奴主的刊物（自觉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他们当然是披着科学、民主主义等等外衣的。

有一位叫皮·亚·索罗金的先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战争的影响》的所谓“社会学”研究的洋洋大作。这篇深奥的文章堆满了作者从他本人和他的许多外国师友的“社会学”著作中引来的种种深奥的论据。请看他的高论吧。

我在第83页上看到：

“现在彼得格勒每1万起婚姻中，有92.2起离婚，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每100起离婚中，又有51.1起是结婚不满1年的：其中有11%不满1个月，22%不满2个月，41%不满3—6个月，只有26%是超过6个月的。这些数字表明，现在的合法婚姻，实际上不过是掩盖婚外性关系并使那些‘好色之徒’能够‘合法地’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形式罢了。”（《经济学家》杂志第1期第83页）

毫无疑问，这位先生以及出版这家杂志并刊登这种议论的俄国技术协会，都是以民主拥护者自居的；当他们听见人家叫他们的真实名

字，即叫他们农奴主、反动分子和“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任何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关于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以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即使是在所有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是以农奴主的态度对待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

当然，这并不妨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西方一切类似他们的党派继续高喊民主，叫嚷布尔什维克违背民主。事实上，在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地位这些问题上，正是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才是唯一彻底的民主革命。这是一个最直接涉及任何一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人口利益的问题。尽管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以前已经有过很多次自称为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才第一次在这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既反对反动思想和农奴制度，又反对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通常所表现的假仁假义。

如果索罗金先生以为每1万起婚姻中有92起离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我们只好认为，索罗金先生若不是在一所同实际生活隔绝得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其存在的修道院里受的教育，那就是这位作者为了讨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而歪曲事实。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资产阶级各国社会情况的人都知道，那里事实上离婚（当然是没有得到教会和法律认可的）的实际数字要大得多。俄国在这方面与别国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法律不把假仁假义、妇女及其子女的无权地位奉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是公开地并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对一切假仁假义和一切无权现象作不懈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还必须对当代这类“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其中也许有不少人甚至拿我们国家的钱，在我们国家机关里担任教育青少年的职务，虽然他们不配做这种工作，正如人所共知的奸污幼女者不配担任儿童学校的学监一样。

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

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

1922年3月12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3—32页

[\[1\]](#)*这是列宁为党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撰写的一篇指导性文章。列宁在文中指明了党在哲学战线的工作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强调共产党人应该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应该积极宣传无神论，帮助人民群众摆脱愚昧无知。列宁要求共产党员在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同党外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列宁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另一方面要求自然科学家努力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1—592页。——编者注

重要论述摘编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毫不留情地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91页

马克思、恩格斯和约·狄慈根出现于哲学舞台上，都是当唯物主义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工人中间已经占居优势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认识论领域中只限于改正费尔巴哈的错误，讥笑唯物主义者杜林的庸俗，批判毕希纳的错误（参看约·狄慈根的著作），强调这些在工人中间影响广名声大的著作家所特别缺少的东西，即辩证法，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约·狄慈根并不担心叫卖者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起码真理，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起码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导致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导致忘却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以

及勒克列尔、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一群雄鸡所不能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的这颗珍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54页

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58页

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知识是相对的。不管那些“重新”回到陈腐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怎样说，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都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看到，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2—45页

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底），《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7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更不要说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了），其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在还应加上物质的电学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3）他们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1914年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55页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

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卡尔·马克思》（1914年11月），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59—60页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2页

马克思并不是笼统地“否定”这个小资产阶级运动，并不是采取学理主义的态度忽视这个运动，并不像许多书呆子那样害怕接触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会弄脏自己的手。马克思虽然对这个运动的思想外衣的荒谬性加以无情的讥笑，但他力求以冷静的唯物主义态度来确定这个运动的真正的历史内容，确定那些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梦想和理论为转移，而是由于客观条件必然会产生这一运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者支持这个运动不是进行斥责，而是表示完全赞同。马克思站在辩证的观点上，也就是全面地考察这个运动，既看到过去，也看到将来，指出对土地私有制的攻击有革命的一面。马克思承认小资产阶级运动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的初步形态。

《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1905年4月7日〔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55页

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69页

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73页

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9页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

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游击战争》（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1—2页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这些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大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

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6日〔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197—198页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7月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7页

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条件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像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一样，既包含缓慢的演进，也包含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2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67页

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

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84页

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

《卡尔·马克思》（1914年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57页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85页

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通晓马克思主义和曾经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经历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过并向别人传授过

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许多东西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者说，他们在实践中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会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81页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例如，马克思在通信中（我记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革命局面的德国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

是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9页

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自然科学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70—71页

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不依赖于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75页

注释

[1]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是列宁1908年2—10月在日内瓦和伦敦写的，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署名弗拉·伊林。这部著作的手稿和准备材料，至今没有找到。

本书是针对当时俄国知识界出现的一股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而写的。早在1906年秋，列宁读了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第3卷以后，就曾写了一封长达三个笔记本的关于哲学问题的信，并打算用《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札记》为标题把它刊印出来（此信至今没有被发现）。1908年初，俄国马赫主义者出版了一批书，特别是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一书，对辩证唯物主义公开进行修正。列宁读后异常愤慨，决定写一批文章或专门的小册子来批评这些新休谟主义和新贝克莱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参看列宁1908年2月12日（25日）给高尔基的信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178—185页和第17卷第11—19页）。尽管列宁当时忙于《无产者报》的出版和其他党的工作，但他仍以巨大精力投入哲学的研究，并着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写作。列宁主要是在日内瓦各图书馆从事研究和写作，而为了详细了解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还于1908年5月前往伦敦，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月。1908年9月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基本完稿，只有《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和一条关于埃里希·贝歇尔的《精密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的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76—379页和第303—304页）是在以后补写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巨大研究工作的结晶，据查考，书中引用的不同作者的著作达300多种，其中一部分还是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文章。

这部书的手稿迄今下落不明，但据克鲁姆比尤格尔回忆，该书初版对手稿几乎未作改动。该书是在阿·谢·苏沃林印刷厂排印的，列宁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担任校对，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也参加了校对。列宁亲自看了这本书的校样。1909年5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印数为2000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评价。1909年10月8日《新时代》杂志刊登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1909年12月斯大林在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中把这本书称做是“一部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集成”。1909年6月瓦·瓦·沃罗夫斯基在《敖德萨评论报》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中指出，这部著作“对俄国来说具有特别的价值”。至于格·瓦·普列汉诺夫，据弗·菲·哥林说，他“对这本书反应很好，尽管他在书中被狠狠地刺了一下”。

十月革命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于1920年在俄国首次再版，印数为3万册。列宁的这部著作后来在全世界传播很广。我国于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了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以后又相继出版了多种中文译本。

[2]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是一本哲学论文集，收录了7篇论文：弗·亚·巴扎罗夫的《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雅·亚·别尔曼的《论辩证法》、阿·瓦·卢那察

尔斯基的《无神论》、帕·索·尤什凯维奇的《从经验符号论观点看现代唯能论》、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偶像之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K. F. 格尔方德的《狄慈根的哲学和现代实证论》、谢·亚·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该书于1908年由种子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

[3] 实证论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哲学流派，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反动。实证论者自命为“科学的哲学家”，只承认“实证的”、“确实的”事实，实际是只承认主观经验，认为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实证论的创始人奥·孔德把实证论等同于科学的思维，而科学思维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描述和简化经验材料的联系。孔德反对神学，但同时又认为必须有“新的宗教”。他把所有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和可知性的理论都宣布为“形而上学”，企图证明实证论既“高于”唯物主义也“高于”唯心主义。实证论在英国传播甚广，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斯·穆勒和赫·斯宾塞。穆勒的著作突出地表现了实证论哲学的经验主义，表现了这一哲学拒绝对现实作哲学的解释。斯宾塞用大量自然科学材料来论证实证论。他认为进化是万物的最高法则，但他形而上学地理解进化，否认自然和社会中质的飞跃的可能性，认为进化的目标是确立普遍的“力量均衡”。在社会学方面斯宾塞主张“社会有机论”，宣称各个社会集团类似生物机体的不同器官，各自担任严格规定的职能，而为社会的不平等作辩护。在19世纪下半叶，实证论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也相当流行。

恩·马赫和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是实证论的进一步发展。马赫主义者同早期实证论者有所不同的是更露骨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唯物主义，主张一种“摆脱了形而上学”（即摆脱了唯物主义）的“纯粹经验”的哲学。

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新实证论是实证论发展的新阶段。新实证论宣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妄命题”，而哲学科学的任务只是对科学语言作“句法的”和“语义的”分析。

[4] 信仰主义与僧侣主义含义相同。本书使用这个词的由来如下：列宁在1908年11月8日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中写道：“……如果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很严格，可以把各处的‘僧侣主义’一词都改为‘信仰主义’，并在注解中加以说明（‘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316页）列宁还曾建议用一个专门术语“萨满主义”来代替僧侣主义，但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不赞成，她在1909年1月27日的信中写道：“改‘萨满主义’已经晚了。再说这个词难道好一些吗？”（同上书，第275注）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1版中可以看到，“僧侣主义”一词大都改成了“信仰主义”，但也有些地方没有改。信中所提到的注释加在俄文第1版序言里，以后各版都保留未动。

[5] 这里说的是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造神说。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人。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

1909年6月召开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说，指出它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间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45、46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

[6] 看来是指弗·梅林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所写的注释（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革命时代（1848—1850年）》文集1926年俄文版第3—86、287—289、293—307、511—512页）。梅林在1902年（即过50多年以后）注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时，指出其中的一些论点没有得到历史的证实。例如他说：“1850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料巴黎无产阶级会举行起义，或者反动的东方大国会侵犯法国的首都，1850年4月，他们曾预料新的商业危机会到来，这两次他们都大错特错了。”

[7] 马赫主义者即经验批判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广泛流行，创始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马赫主义者，其代表者是孟什维克中的尼·弗·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布尔什维克中的弗·亚·巴扎罗夫、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俄国马赫主义者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实际上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动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免遭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8] 《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Revue Néo-Scholastique》）是一种神学哲学刊物，1894年由比利时天主教的高等哲学学院在卢万创办，首任编辑是枢机主教德·约·梅西耶。1946年起改称《卢万哲学评论》。

[9] 根据列宁书信可以证明，手稿上是“较诚实的论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版准备付印时，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把这几个字改做“较有原则的论敌”。列宁不赞成这样改，他在1909年2月27日（3月12日）写信给姐姐说：“凡是斥责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一伙的地方，请丝毫也不要缓和。缓和是不行的。很遗憾，你把切尔诺夫同他们比起来是一个‘较诚实的’论敌这句话勾掉了。这样语气就变了，同我的谴责的整个精神不符。关键在于：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不诚实的、卑怯的敌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342页）

[10] 伏罗希洛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中的人物，是自诩渊博的书呆子和空谈家的典型。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里也曾用这个形象来嘲笑维·米·切尔诺夫。他说：“大家还记得《烟》里面那位曾到国外游历过的年轻的俄国大学讲师吗？他平时总是一声不吭，但有时心血来潮，又滔滔不绝地一连说出几十个、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和名流的名字。我们这位博学多识的切尔诺夫先生同伏罗希洛夫一模一样，他把不学无术的考茨基彻底消灭掉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29—130页）

[11] 新康德主义者是在复活康德哲学的口号下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新康德主义19世纪中叶产生于德国，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1865年李普曼出版了《康德及其追随者》一书。该书每一章都以“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结束。他还提出纠正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这一“根本错误”。朗格则企图用生理学来论证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后来形成两大学派：马堡学派（赫·柯亨、保·格·纳托尔普等）和弗赖堡学派（威·文德尔班、亨·李凯尔特等）。前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利用数学方法向物理学的渗透，来论证唯心主义，后者则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宣称历史现象有严格的独特性，不受任何规律性的支配。两个学派都用科学的逻辑根据问题来取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宣布“自在之物”是认识所趋向的“极限概念”。他们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认识的对象并不是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而仅仅是意识的现象。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不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变种，断言科学没有力量认识和改变现实。新康德主义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伦理社会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依据自己的认识论，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不可能达到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斯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新康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格·瓦·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和弗·梅林都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列宁揭露了新康德主义的反动实质并指出了它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内在论者、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联系。

[12] 茜素是一种红色有机染料，原先是从茜草根中提取的。1868年，德国化学家卡·格雷贝和卡·泰·李卜曼用化学方法取得了茜素。1869年1月11日，他们在德国化学学会会议上宣读了人工合成茜素的报告。人工合成茜素的原料是蒽醌。蒽醌由蒽经硝酸、铬酸或空气氧化而成。蒽含于煤焦油中，在270°—400℃的温度下可以分解出来。

[13] 怀疑论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和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产生于公元前4—前3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发生危机的时代，其创始人是皮浪，最著名的代表是埃奈西德穆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古代怀疑论者从感觉论的前提出发，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他们把感觉的主观性绝对化，认为人不能超出他自己的感觉范围，不能确定哪一种感觉是真的。他们宣称，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互相排斥的意见，即肯定和否定，因而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是不可靠的。他们要人们拒绝认识，对事物漠不关心，说这样就可以从怀疑中解脱出来，而达到心灵恬静即“无感”的境界。

在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哲学家米·蒙台涅、皮·沙朗和皮·培尔曾利用怀疑论来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教会。照马克思的说法，培尔“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并宣告“无神论社会的来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62页）。相反，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布·帕斯卡却用怀疑论反对理性认识，维护基督教。

18世纪，怀疑论在大卫·休谟和伊·康德的不可知论中得到复活，戈·恩·舒尔采则试图使古代怀疑论现代化。新怀疑论十分明确地声称达到科学认识是不可能的。马赫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其他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都利用怀疑论的论据。

[14] 伊壁鸠鲁主义是公元前4—前3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及其门徒的学说。伊壁鸠鲁把哲学分为物理学、准则学（关于认识的学说）和伦理学。物理学的出发点是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伊壁鸠鲁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认为自然界中只存在原子和虚空。原子不仅在大小和形状上有差异，而且在重量上也不相同。原子由于自身的重量而产生运动。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形式是直线下降，但由于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发生偏斜，因而发生原子的互相碰撞和粘附，这就是物质形成的开端。伊壁鸠鲁曾提出灵魂物质性的学说，认为灵魂是“散布在整个机体上的极薄的物体”。

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是唯物主义感觉论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影像说，认为发自物体的极其细微的影像通过感觉器官而进入人的心灵，“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概念依赖于感性知觉”，是感觉多次重复的结果。他还认为感性知觉本身就是真理的标准，而谬误的根源则在于个别感觉的偶然性，或者过于匆忙地下判断。

伊壁鸠鲁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使人摆脱痛苦，得到快乐。但所谓快乐并不是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而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他用原子论唯物主义的原理证明，人不应当对神和死亡恐惧。这种思想带有无神论的性质。

[15] 这里说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2章。

[16] 指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3—6页、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

[17] 指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纳·威·西尼耳为反对缩短工作日而编造的“理论”。他在《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这本小册子中声称，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供的；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西尼耳的这种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51—256页）。

[18] 《短篇哲学著作集》于1903年由狄茨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共收入约·狄慈根1870—1878年发表在德国《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上的7篇文章，还收入了他在188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

列宁在《短篇哲学著作集》一书上作了许多批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期间作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

[19] 指弗·亚·巴扎罗夫在《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一文中提出的论点：“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其他许多人用来作为认识论基础的‘费力最小’原则……无疑是认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这点上，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获生的跳跃的认识论更靠近马克思。”（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1908年俄文版第69页）

[20] 《哲学研究》杂志（《Philosophische Studien》）是德国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主要研究心理学问题。1881—1903年由威·麦·冯特在莱比锡出版。1905年起改名为《心理学研究》杂志。

[21] 《思想》杂志（《Mind》）是英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刊物（月刊），研究哲学和心理学问题，1876年起先后在伦敦和爱丁堡出版。该杂志的第一任编辑是罗伯逊教授。

[22] 《哲学评论》杂志（《Revue de Philosophie》）是法国的唯心主义刊物，由佩奥布创办，1900—1939年在巴黎出版。

[23] 《自然哲学年鉴》（《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是德国的实证论派别的杂志，1901—1921年由威·弗·奥斯特瓦尔德在莱比锡出版，撰稿人中有恩·马赫、保·福尔克曼、哈·赫夫丁等。

[24] 《康德研究》杂志（《Kantstudien》）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的刊物，由汉·费英格创办，1897—1944年先后在汉堡、柏林、科隆出版（有间断），1954年复刊。解释和研究康德哲学著作的文章在该杂志上占有大量篇幅。新康德主义者和其他唯心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都给这个杂志撰稿。

[25] 契玛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一只狮头、羊身、蛇尾的怪兽。它口喷烈焰，形状丑陋可怕，经常从山洞里出来攫食人兽，烧毁庄稼，后为希腊英雄柏勒洛丰杀死。契玛拉常被人们用来比喻奇怪的、非现实的东西，或荒诞不经、不切实际的幻想。

[26] 这里是借用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在该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

[27] 《自然科学》杂志（《Natural Science》）是一种评述科学新进展的刊物（月刊），1892—1899年在伦敦出版。

[28] 《哲学评论》杂志（《The Philosophical Review》）是美国唯心主义派别的刊物（双月刊），由舒尔曼创办，1892年起出版。

[29]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版里，此处印的是：“引起的不只是微笑。”列宁在1909年3月21日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中指出此处应为：引起的“不是微笑，而是憎恶”，并要求务必把这一点列入勘误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344页）。此书第1版所附的《重要勘误表》包括了这一更正。

[30] “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历史归结为“杰出人物”的任意活动。19世纪30—40年代，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鲍威尔、戴·施特劳斯、麦·施蒂纳等人。他们把人民说成是“没有批判能力的群氓”，只能盲目追随“有批判头脑的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深刻而全面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代表是彼·拉·拉甫罗夫和自由主义民粹派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2—296页）中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

[31] 《系统哲学文库》（《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哲学文库》的两个独立的分刊之一，1895—1931年在柏林出版，第一任编辑是保·格·纳托尔普。1925年起改名为《系统哲学和社会学文库》。该杂志用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刊载各国哲学思想代表人物的文章。

[32] 老年黑格尔派又称黑格尔右派，是19世纪30—40年代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形成的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是安·加布勒、赫·欣里希斯、卡·罗森克兰茨等。老年黑格尔派在哲学上承袭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抛弃了他的辩证法，利用他关于宗教和哲学同一的论点，把黑格尔哲学解释为神学的唯理论形式；在政治上拥护封建等级制度，把普鲁士王国看做是“世界理性”的体现，反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的民主要求。

[33] 以太原来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一种介质，17世纪被人们重新提出，用来解释光的传播和电磁、引力的相互作用等现象。依照当时说法，光像声波一样是一种机械的弹性波，因此它的传播也必须有一种弹性介质作媒介；而依照光在传播中的性质，这种介质必须无所不在，没有质量，绝对静止。这种介质就是以太。电磁和引力作用则是以太中的特殊的机械作用。以太说在19世纪以至20世纪初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既同科学新发现的事实相矛盾，又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随着相对论的创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发现光（电磁波）的传播和一切相互作用的传递都通过各种场，而不通过机械介质，因此以太作为一种陈旧概念就不再使用。

[34] 《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和历届国家杜马中的劳动派的著名成员的政论家。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1906年成为人民社会党的机关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

[35] 马尔萨斯主义是指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创立的反科学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通过臆造的“人口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1798年）中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1、2、4、8、16……），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1、2、3、4、5……）。马克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实质，称它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572页）。列宁在批判这种人口理论时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14页）

[36] 在列宁引用的卡·格律恩的书中，马克思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这封信是1843年10月20日写的。实际上，这封信写于1843年10月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43—446页）。

[37] 《德法年鉴》杂志（《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这一期《德法年鉴》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38] 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7—351页、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

[39] 转向黑格尔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资产阶级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趋向。在英国，这种趋向是从1865年詹·哈·斯特林的《黑格尔的秘密》一书问世开始的。在垄断前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时期，经验论哲学（耶·边沁、约·斯·穆勒、赫·斯宾塞）及其伦理个人主义的原则已经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具有从理论上论证宗教的广泛可能，因而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注意。于是一个称为“英国黑格尔派”的派别便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是托·格林、爱·凯尔德和约·凯尔德兄弟、弗·布拉德莱等。他们极力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反对达尔文主义。“英国黑格尔派”利用黑格尔学说的保守方面，抛弃它的唯理论和发展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被用来为不可知论作辩护。例如布拉德莱从人的思维的矛盾性质得出结论说，思维只在现象领域运动，因为存在的真正本质是不矛盾的、和谐的、绝对的。在社会学领域，“英国黑格尔派”论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必要性，认为公民的利益要完全服从于这一国家。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19世纪下半叶也增强了。瑞典哲学家约·雅·波列留斯试图复活黑格尔主义，把它同占统治地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克·雅·博斯特隆、西·里宾格等）对立起来。挪威的黑格尔右派马·雅·蒙拉德、格·威·林格等用神秘主义精神解释黑格尔哲学，而背离它的唯理论，并企图使科学服从于宗教。

[40] 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是美国哲学）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派别，19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取代了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哲学。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查·皮尔斯在1878年提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通过威·詹姆斯和斐·席勒的著作，实用主义形成了独立的哲学流派；约·杜威的工具主义是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获得符合真理的知识，但是他们却完全歪曲了真理的概念。皮尔斯把认识看做是获得信念的纯粹心理过程。詹姆斯则拿“有用”、成功、有利等概念来取代作为现实在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的真理概念。在他看来，任何概念，包括宗教概念在内，是不是真理，就看它们是否有用。杜威走得更远，他宣布所有科学理论、道德原则、社会设施都只是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实用主义者认为知识的“真理性”（即有用性）的标准是经验。他们所谓的经验并不是人的社会实践，而是个人体验。他们把这种经验

看做是唯一的实在，而宣布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已经“陈旧”。实用主义者像马赫主义者一样，企图创立哲学中的“第三条路线”，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实际上坚持的还是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用“多元论”的观点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宇宙中没有任何内部联系和规律性，而是像一种可以由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来拼装的镶嵌画。根据当前需要，实用主义认为可以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它宣称不需要任何彻底性，只要对一个人有利，他既可以是决定论者，也可以是非决定论者，既可以承认神的存在，也可以否认神的存在。

实用主义曾经在美国广泛传播，几乎成了美国的官方哲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实用主义作为统一的独立的哲学派别在美国的地位开始下降，但它的基本精神仍起作用。实用主义在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也在不同时期有过支持者。

[41] 《国外周报》（《Gazette Etrangère》）是俄国侨民报纸，1908年3月16日—4月13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4号。报纸主要报道侨民的生活，也刊登有关俄国国内和国外事件的材料。该报第2号曾刊登1908年3月18日列宁在日内瓦国际大会上作的报告《公社的教训》。该报也刊登过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宣传“造神说”和马赫主义的文章。

列宁的引语摘自卢那察尔斯基的《简论现代俄国文学》（载于《国外周报》第2、3号）。

[42] 《教育》杂志（《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俄国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政治性刊物（月刊），1892—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1896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负责编辑。在1902—1908年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

[43] “拯救”一词列宁写的是德文hinüberretten，出自《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恩格斯在那里写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13页）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引用了这一句话（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55—56页）。

[44] 列宁指的是下面三部著作的问世：乔·威·弗·黑格尔的《逻辑学》（前两册于1812年和1813年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7年底写成，1848年2月出版）和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

[45] 在列宁的手稿中，（11）和（12）原来是一条，后来列宁把该条的后半部分单列为（12），两条之间用分号断开。此处是按手稿翻译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2页和第193页之间的插页）。

[46] 即光速——任何可能的运动的极限速度。列宁在关于路·达姆施泰特《自然科学和技术历史指南》的札记中谈到测定光速的一些方法（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48页）。

[47] 此处见德·伊·皮萨列夫《幼稚想法的失策》一文（《皮萨列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147—151页）。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引用了皮萨列夫的这一思想和他的著作中相应的地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3—164页）。

[48] 《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写在《哲学》笔记本中，在《拉萨尔〈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之间，由于其中有引自《形而上学》的引文，所以有理由认为它是在列宁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著作以后写的。

[49] 伊万是俄国最常见的人名。茹奇卡是俄语中看家狗的常用名字。

[50] 此处见保·福尔克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及其与当代精神生活的联系》一书第2版第35页。列宁关于该书的札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43—344页。列宁在作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摘要时，也指出了类似的地方（同上书，第207页和第219—220页）。

[51] überschwenglich可译为“过分的”、“过度的”、“无限的”、“过火”等等。这个词是约·狄慈根在分析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物质和精神等等之间的关系时使用的一个字眼（例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419—420、423页）。列宁也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使用它来揭示对概念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的理解。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发展了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表述，他写道：“狄慈根在《漫游》中重复说，物质这个概念也应当包括思想。这是糊涂思想。因为这样一来，狄慈根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物质和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就会失去意义。至于说到这种对立不应当是‘无限的’、夸大的、形而上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强调这一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巨大功绩）。这种相对对立的绝对必要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方向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做绝对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错误。”（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57页）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也谈到真理的辩证性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2页）。

[52]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一书于1894年写成（第1编于4月完稿，第2、3编于夏天完稿）。1892—1893年列宁在萨马拉开始为写作此书作准备，他当时曾在萨马拉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作过一些报告，批评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瓦·沃·（瓦·巴·沃龙佐夫）、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柯夫和谢·尼·克里文柯等人。这些报告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准备材料。

这部书于1894年在彼得堡、莫斯科、哥尔克等地分编胶印出版，在俄国其他一些城市也传抄和翻印过。在国外，劳动解放社和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也看到过这部著作。

这部书的第1、3两编的胶印本于1923年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和列宁格勒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差不多同时发现。《列宁全集》俄文第1、2、3版就是根据1923年发现的胶印本刊印的。1936年发现了新的胶印本，上面有许多显然是列宁所作的文字修

改。《列宁全集》俄文第4、5版是根据这个胶印本刊印的，还补上了前几版遗漏的列宁对附录一的统计表的说明。

这部书的第2编至今没有找到。

[53] 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写的《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

[54] 《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主要著作之一，176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人民有权进行革命，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卢梭的这部著作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就其社会观来说是唯心主义的。

[55] 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26—131页）。这封信是马克思在1877年底读到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时写的，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抄寄俄国。恩格斯说：“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504页）

[56]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此书在他们生前未能全部出版，只发表了第2卷的第4章。1932年由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用德文全文发表。

[57] 见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随笔《在国外》。其中写道，1876年春他在法国听到一些法国自由派人士在热烈地谈论大赦巴黎公社战士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大赦是公正而有益的措施，但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食指伸到鼻子前，说了一声“mais”（即“但是”），就再也不说了。于是谢德林恍然大悟：原来法国人所说的“但是”就相当于俄国人所说的“耳朵不会高过额头”，意思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58] 氏族组织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内部严禁通婚。若干氏族为一个部落，若干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在氏族组织中，人们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生产资料公有，集体从事生产，产品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氏族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为母权制，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逐步过渡到父权制。氏族组织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而解体。关于氏族组织，可参看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第328—571页）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5页）。

[59] 采邑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封建土地占有制。采邑是封建君主的财产，由君主暂时赐给军中供职人员或宫廷官吏使用。采邑制度的出现是与中央集权的形成和集中的军队的建立分不开的。在俄国，采邑制度出现于15世纪，至16世纪为鼎盛时期。从17世纪起，采邑和世

袭领地这两种封建土地占有制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在1714年彼得一世颁布关于采邑世袭制法令以后，采邑完全成为贵族地主的私有财产。

[60] 指俄国古代的基辅罗斯（9—12世纪初）。

[61] 即莫斯科国时期（15世纪末—17世纪）。

[62] 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苦农民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做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三分之二的农户和五分之四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

[63] 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指卑劣的论战手法。维·彼·布勒宁是俄国政论家和作家，反动报纸《新时报》的撰稿人。他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

[64] 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1871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

[65] 《新时报》（《Н о в о е В р е м 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

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

[66] 指维·彼·布勒宁1894年2月4日在《新时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批评随笔》的杂文，极力称赞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一事。

[67]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象和哈巴狗》。寓言讲一只小哈巴狗朝着一只大象狂吠乱叫，无理取闹，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毫不费力地成为“大名鼎鼎的好汉”。

[68] 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寓言故事《风干鲤鱼》。在本文中，干鱼被用来比喻没有思想内容的空洞提法。

[69] 指《德法年鉴》杂志。见注37。

[70] 《欧洲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

[71] 这篇短评是彼得堡大学教授伊·伊·考夫曼（伊·考一曼）写的。马克思认为它对辩证方法作了恰当的叙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217页。

[72] 以下引用的恩格斯的答复，见《反杜林论》第1编第13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9—174页）。引文是列宁亲自译成俄文的。

[73] 据罗马神话，雷神丘必特变成一头公牛，拐走了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欧罗巴。这自然不是所有公牛都能做到的。“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一语即由此演变而来。

[74] 《祖国纪事》杂志（《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是俄国刊物，在彼得堡出版。1820—1830年期间登载俄国工业、民族志、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章。1839年起成为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839—1846年，由于维·格·别林斯基等人参加该杂志的工作，成为当时最优秀的进步刊物。60年代初采取温和保守的立场。1868年起，由尼·阿·涅克拉索夫、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扎·叶利谢耶夫主持，成为团结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加入编辑部，民粹派对这个杂志的影响占了优势。《祖国纪事》杂志不断遭到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1884年4月被查封。

[75] 据圣经传说，“金犊”是以色列人为了走出埃及而祈求祭司亚伦用黄金铸造的领路之神（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

[76] 指《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下述原理：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页）

[77] 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当时写的两篇文章：《关于马克思的一本书的俄文版》（1872年4月《祖国纪事》杂志第4期）和《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

[78] 指谢·尼·尤沙柯夫。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的第2编里着重批评了这个民粹派分子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

[79] 《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Клыс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

[80] 出典于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鲁斯提斯把所有落到他手里的过路客强按在一张特制的床上，身材比床长的就剁去腿脚，比床短的就抻拉身躯。

[81]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13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

[82] 民权党人指俄国民权党的成员。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参加创建的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捷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的宗旨是联合一切反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

[83] 份地是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留给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由村社占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并定期重分。

[84]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

[85] 指爱·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899年）。

[86] 《我们的曙光》杂志（《Н а ш а З а р 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87] 这句话引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是书中主人公、平民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巴扎罗夫对他的同学、喜欢讲所谓典雅语言的贵族子弟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基尔萨诺夫说的。

[88] 分给我们的兔子一块熊耳朵意为给自我吹嘘者以奖赏，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兔子打猎》。寓言说，一群野兽正在分它们猎获的一只熊，没有参加猎熊的一只兔子却伸出前足来撕熊的耳朵，并且说是它把熊从树林里赶到空地上，野兽们才得以把熊逮住杀死的。野兽们感到兔子的话虽系吹牛，却十分有趣，于是分给它一块熊耳朵。

[89] 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是指按照尼·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策略精神制定的一种计划。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498—1512年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历任要职。他反对意大利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背信弃义、欺骗、暗杀等。

[90] 列宁指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7—351页）。

[91] 列宁指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该书是用恩·别尔托夫这一笔名于1895年出版的。

[92] 百科全书派是18世纪法国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因出版《百科全书》（全称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共35卷，1751—1780年出版）而得名。德·狄德罗是该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让·勒·达兰贝尔是狄德罗的最亲密的助手。保·昂·迪·霍尔巴赫、克·阿·爱尔维修、伏尔泰等积极参加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工作。让·雅·卢梭参与了头几卷的编纂。《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包括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其中有博物学家乔·路·勒·布丰和路·让·玛·多邦通，经济学家安·罗·雅·杜尔哥和弗·魁奈，工程师布朗热，医生保·约·巴尔泰斯，林学家勒鲁瓦，诗人和哲学家让·弗·圣朗贝尔等。这些人尽管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持有不同的观点，但都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教会、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而积极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者在他们中间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是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恩格斯指出：“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第352页）

[93] 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11月1日（14日）召开的，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派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3年，直到1911年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1903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1912年3月5日（18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于1910年批准了以1906年11月9日（22日）法令为基础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94]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党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

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

[95] 路标派是指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1909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96]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

[97] 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讲究虚伪客套。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的马尼洛夫精神一语即由此而来。

[98] 指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家，因领导1825年12月14日（26日）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而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集团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 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 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99] 罗慕洛和瑞穆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人物，西尔维亚和战神马尔斯结合而生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生下不久被国王阿穆利乌斯投入台伯河，但河水把这对婴儿漂到岸边。战神马尔斯派一只母狼把他们带入山洞，用狼奶喂养他们。他们长大后体格健壮，膂力过人，性格刚强，见义勇为，深得人民的爱戴。两人中的罗慕洛是罗马城的建造者。

[100] 引自亚·伊·赫尔岑《终结和开始》（见《赫尔岑文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16卷第171页）。

[101] 参看亚·伊·赫尔岑《致老友书》（第4封和第2封信）（《赫尔岑文集》1960年莫斯科版第20卷下册第593、582页）。

[102]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

[103]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成立。领导人是阿·费·阿拉季因、斯·瓦·阿尼金等。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要求建立由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超过劳动土地份额的私有土地组成的全民地产，由农民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这反映了全体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它同时又容许赎买土地，则是符合富裕农民阶层利益的。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劳动派的符合农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同时批评它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可是劳动派始终没有成为彻底革命的农民组织。六三政变后，劳动派在地方上停止了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它于1917年6月与人民社会党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

[104] 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

[105] 《钟声》杂志（《К о л о к о л》）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国外（1857—1865年在伦敦、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刊物，最初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刊，共出了245期。该刊印数达2500份，在俄国国内传播甚广。《钟声》杂志除刊登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文章外，还刊载各种材料和消息，报道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斗争，揭露沙皇当局的秘密计划和营私舞弊行为。《钟声》杂志最初阶段的纲领以赫尔岑创立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极力鼓吹解放农民，提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肉刑等民主主义要求。但它也有自由主义倾向，对沙皇抱有幻想。1861年农民改革以后，《钟声》杂志便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登载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尖锐谴责农民改革的文章以及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的传单、文件等。《钟声》杂志编辑部协助创立了土地和自由社，积极支持1863—1864年的波兰起义，从而与自由派最终决裂。

[106] 《北极星》（《П о л я р н а я З в е з д а》）是一种文学政治文集，1855—1862年由亚·伊·赫尔岑创办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出版，最后一集于1868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8集。前3集由赫尔岑主编，后几集由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编。赫尔岑把文集取名为《北极星》并在文集封面上印了五位被判处死刑的十二月党人的画像，都意在强调他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继承关系（十二月党人亚·亚·别斯图热夫和孔·费·雷列耶夫曾在1823—1825年出版了一种叫做《北极星》的文学丛刊）。《北极星》文集刊登了大量有关十二月党人的资料、被检查机关查禁的亚·谢·普希金、雷列耶夫、米·尤·莱蒙托夫的诗，维·格·别林斯基致尼·瓦·果戈理的信，赫尔岑的文章和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奥格辽夫的文章和诗等。《北极星》对俄国进步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07] 引自尼·普·奥格辽夫《祭文》（《奥格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1952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654页）。

[108] 引自亚·伊·赫尔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文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18卷第221页）。

[109] 指波兰1863—1864年起义。这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而引起的。领导起义的是代表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所组织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它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建立了联系。它的纲领包含有波兰民族独立、一切男子不分宗教和出身一律平等、农民耕种的土地不付赎金完全归农民所有、废除徭役、国家出资给地主以补偿等要求。起义从1863年1月22日向俄军数十个据点发动攻击开始，很快席卷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手工业者、工人、大学生、贵族知识分子、部分农民和宗教界人士等各阶层的居民。代表大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白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声誉扫地，也一度参加了斗争，并攫取了领导权。马克思对波兰起义极为重视，曾参与组织国际军团，支援起义。1864年5月，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于1864年3月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法令，因而在波兰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10] 引自亚·伊·赫尔岑《流言蜚语、烟黑、炭渣及其他》（《赫尔岑文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18卷第35页）。

[111] 引自亚·伊·赫尔岑1864年3月10日写的《给伊·谢·屠格涅夫的信》（《赫尔岑文集》1963年莫斯科版第27卷下册第455页）。

[112] 引自《赫尔岑文集》1958年莫斯科版第14卷第233和411页。

[113] 引自《赫尔岑文集》1958年莫斯科版第15卷第85和344页。

[114] 指喀山省斯帕斯基县别兹德纳村农民起义。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条件的1861年2月19日宣言和条例的颁布，引起了农民的失望和愤怒。他们不相信宣读的条例文本是真的，认为地主和官吏把真正的宣言和条例藏起来了。1861年春，在许多省都发生了农民骚动，而以别兹德纳村农民的暴动规模最大。领导这次运动的是别兹德纳村青年农民安东·彼得罗夫。在他的号召下，农民拒绝服徭役，拒绝向地主交纳代役租，拒绝在确定份地数量和义务范围的“规约”上签字，抢夺地主仓库里的粮食。骚动波及到喀山省斯帕斯基、奇斯托波尔、拉伊舍沃三县以及相邻的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各县共75个村庄。别兹德纳村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1861年4月12日（24日），根据阿普拉克辛将军的命令，向4000名手无寸铁的农民群众开枪，据官方报告，被打死和因伤而死的共91人，伤350人以上。4月19日（5月1日），安东·彼得罗夫被枪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16个农民中，5个被判处笞刑和不同期限的监禁。别兹德纳惨案在俄国社会各进步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亚·伊·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对别兹德纳惨案作了详细报道。

[115] 正教院是俄国管理正教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成立于1721年，当时称圣执政正教院，与参议院的地位相等。正教院管理的事项有：纯粹宗教性质的事务（解释教义、安排

宗教仪式和祈祷等），教会行政和经济事项（任免教会负责人员、管理教会财产等），宗教法庭事项（镇压异教徒和分裂派教徒、管理宗教监狱、检查宗教书刊、审理神职人员案件等）。正教院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宗教人士中任命，另外从世俗人士中任命正教院总监对正教院的活动进行监督。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撤销了正教院。正教院后来作为纯教会机构重新建立，是莫斯科和全俄总主教下的咨询机关。

[116] 引自亚·伊·赫尔岑《愚腐的主教、陈腐的政府和被欺骗的人民》（《赫尔岑文集》1958年莫斯科版第15卷第135—138页）。

[117] 《光线报》（《Л у 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正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

[118] 崩得分子即崩得的成员。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119] 《呼声报》（《Г о л о с》）是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4年9月—1915年1月在巴黎出版，头5号用《我们的呼声报》的名称。列·达·托洛茨基在该报起领导作用。参加该报工作的也有几个前布尔什维克。该报采取中派立场。1915年1月《呼声报》被法国政府查封，接替它出版的是《我们的言论报》。

[120] 巴格达铁路是20世纪初人们对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波斯湾的铁路线（全长约2400公里）的通称。德国帝国主义为了向中近东扩张，从19世纪末就开始谋求修建这条铁路。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为此亲自访问了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1903年德国同土耳其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从科尼亚经巴格达到巴士拉的铁路的协定。这条铁路建成后可以吧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联系起来，使德国的势力延伸到波斯湾。这不仅威胁着英国在印度和埃

及的殖民统治地位，而且同俄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利益发生矛盾。因此，英俄法三国结成同盟来反对德国。这条铁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尚未建成，它是由英法两国的公司于1934—1941年最后修建完成的。

[121] 三协约国（三国协约）是1907年最后形成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联盟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十月革命后，协约国联盟的主要成员——英、法、美、日等国发动和组织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122]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123] 《生活报》（《Жизнь》）是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于1915年3月在巴黎开始出版，以代替当时被查封的《思想报》。该报后来迁到日内瓦出版，1916年1月停刊。

[124] 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司徒卢威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

[125] 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即1912年9月15—21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号召工人阶级“加倍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

巴塞尔代表大会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违反这个宣言和历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对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这种变节行为，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23—277、319—363页）等著作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126] 《国际》杂志（《Die Internationale》）是罗·卢森堡和弗·梅林创办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理论问题的刊物。该杂志第1期于1915年4月出版，刊载了卢森堡的《国际的重建》、梅林的《我们的导师和党机关的政策》、克·蔡特金的《为了和平》及其他文章。这期杂志在杜塞尔多夫印刷，印了9000份。杂志纸型曾寄给伯尔尼的罗·格里姆，由他翻印向瑞士及其他国家传播。该杂志于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复刊。希特勒上台后作为非法刊物继续秘密出版，至1939年停刊。

在《国际》杂志周围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于1916年组成了国际派，即斯巴达克派。国际派和“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反对派。

[127] 《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其中5号有附刊。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该报的领导者是列宁。1911年6月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列宁的80多篇文章和短评。在反动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1907—1914年），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了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该报在俄国国内和国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

[128] 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杜鹃和公鸡》。寓言说，公鸡和杜鹃互相吹捧对方的歌喉如何美妙。杜鹃为什么厚着脸皮夸奖公鸡，就因为公鸡夸奖了它。列宁借用这一寓言讽刺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互相标榜，互相包庇。

[129] 饶勒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130]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派的法国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

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盖得和相当大一部分盖得派分子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方面，盖得、马·桑巴参加了法国政府。1920年，以马·加香为首的一部分左翼盖得派分子在建立法国共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31] 《社会主义》杂志（《Le Socialisme》）是法国社会党人茹·盖得创办和主编的刊物，1907年至1914年6月在巴黎出版。

[132] 1900年9月23—27日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米勒兰主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调和主义决议，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由于特别重要的情况“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法国社会党人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就利用这一条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辩护。

米勒兰主义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

[133]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

[134] 这里是借用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8章的话，其中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法利赛人在圣经中被认为是伪善者。

[135]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

[136] 这个提纲即《指导原则》（参看注137），载于1916年2月《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3号，标题为《德国同志们的建议》。它规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Kommission zu Bern. Bulletin》）是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15年9月—1917年1月在伯尔尼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出版，共出了6号。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 S. K.）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执行机构，在1915年9月5—8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成立。组成委员会的是中派分子罗·格里姆、奥·莫尔加利、沙·奈恩以及担任译员的安·伊·巴拉巴诺娃。委员会设在伯尔尼。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之后不久，根据格里姆的建议，成立了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同意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决议的各党的代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扩大委员会的是列宁、伊·费·阿尔曼德和格·叶·季诺维也夫。

[137] 国际派（斯巴达克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

[138] 指1916年1月12日《前进报》第11号登载的奥·吕勒的声明《论党的分裂》。他在声明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前进报》编辑部在发表吕勒声明的同时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声称尽管把吕勒的声明全文照登，但它认为声明中所提出的争论问题不仅为时过早，而且完全是无的放矢。

关于《前进报》，见注135。

[139] 《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于1890—1919年出版。1916年以前是不来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191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施加压力，迫使当地党组织改组该报编辑部。同年该报转到了考茨基分子和谢德曼分子手里。

[140] 《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71年在不伦瑞克创刊。1914—1915年该报实际上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6年该报转到了考茨基分子手里。

[141] “德国国际社会党人”（I. S. D.）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着在柏林出版的《光线》杂志而组成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集团，它公开反对战争和机会主义，在同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划清界限方面持最彻底的立场。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该集团代表尤·博尔夏特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决议草案上签了名。但该集团与群众缺乏广泛联系，不久就瓦解了。

[142] 指1756—1763年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和以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进行的战争，史称七年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之一是，英国获得了法属北美殖民地并确立了在印度的优势，成为海上霸主。

[143] 指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

[144] 组委会分子指俄国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

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是1912年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俄国孟什维克领导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委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站在沙皇政府方面为战争辩护。组委会先后出版过《我们的曙光》、《我们的事业》、《事业》、《工人晨报》、《晨报》等报刊。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选出中央委员会以后，组委会的职能即告终止。除了在俄国国内活动的组委会外，在国外还有一个组委会国外书记处。这个书记处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伊·谢·阿斯特罗夫—波韦斯、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组成，持和中派相近的立场，实际上支持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书记处的机关刊物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1915年2月—1917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号。

[145] 号召派是指《号召报》集团的拥护者。《号召报》集团是1915年9月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持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该集团于1915年10月—1917年3月在巴黎出版周报《号召报》。《号召报》的领导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伊·布纳柯夫、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等。

[146]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是为批判卡·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而写的。

1918年8月，在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是民主呢还是专政》。列宁在同年9月20日的《真理报》上看到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欧洲国家的三个使节——在柏林的阿·阿·越飞、在伯尔尼的扬·安·别尔津和在斯德哥尔摩的瓦·瓦·沃罗夫斯基——写信，提出了对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作斗争的任务。列宁请他们在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小册子出版后立即给他寄一本来，同时寄来考茨基写的所有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文章。

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即动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在这部著作脱稿之前，列宁为了尽快占领阵地，又于10月9日用同一题

目写了一篇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02—111页），发表在10月11日《真理报》上，并指示越飞、别尔津和沃罗夫斯基尽快把这篇文章译成外文发表。列宁的这篇文章译成德文后，于1918年和1919年分别在伯尔尼和维也纳发表；1919年译成意大利文在米兰发表。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于1918年11月10日写成，12月在莫斯科出版。1919年用外文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出版。

[147] 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

[148] 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斥责了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号召社会党人为反对一切压迫小民族的行为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而斗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149]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之间写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批判了“自由的人民国家”的论调（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3页）。

[150]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玛·安·纳坦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部门中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

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

[151] 指莫·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用法文写的《民主和政党》一书。此书于1903年在巴黎初次出版，1927年和1930年出了俄文本第1卷和第2卷。书中用英美两国历史上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

[152] 《论国家》是列宁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演的记录，最初由苏联列宁研究院于1929年1月18日发表于《真理报》。按照该校学员 Я. Я. 别尔兹1929年给列宁研究院的信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的说法，列宁还于1919年8月29日在该校作了第二次讲演，题目是《关于国家，国家的意义、产生及阶级的产生》，可是第二次讲演的记录至今没有找到。

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即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第一所高等学校。这所大学的前身是1918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倡议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1919年1月，训练班改组为苏维埃工作学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又改组为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1919年7月3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关于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改名为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决定。

[153] 《论妥协》是列宁的一篇没有完稿的文章的开头部分，其中阐述的思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有更详尽的发挥。这里提到的同乔·兰斯伯里的谈话，是1920年2月21日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

[154] 布朗基派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派别，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

[155]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156] 这是列宁的一段亲身经历。1919年1月19日，列宁在去索科利尼基看望正在休养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途中，遭到了一伙手执武器的强盗的袭击。强盗们抢走了列宁的钱包、手枪和汽车。这一案件很快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刑事调查局侦破。

[157]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这本小册子是列宁就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争论而写的。小册子于1921年1月25日完稿，当天付排。1月26日夜，印好的一部分小册子就分发给了到各地参加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党中央委员。1月27日，小册子全部印出。小册子封面上标明仅供俄共党员阅读。

[158]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是为1922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3期写的。

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是在科尔津基诺村休养时考虑写这篇文章的。他那时读了很多反宗教的书籍，其中有阿·德雷夫斯的《基督神话》和厄·辛克莱的《宗教的利润》（1925年出版的俄译本名为《宗教和发财》）等等。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在散步的时候我们谈论德雷夫斯，谈论辛克莱，谈论我们这里反宗教宣传搞得太肤浅，有许多庸俗化的做法，反宗教宣传没有同自然科学深刻地结合在一起，很少揭示宗教的社会根源，不能满足在革命年代迅速成长的工人们的要求。”（见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期第148—149页）

文章于1922年3月12日写成，但是列宁并没有停止对文章的继续加工。在把文章送杂志编辑部以前，列宁又在其中增加了关于用现代科学批判宗教的代表人物阿·德雷夫斯和罗·尤·维佩尔的内容，删去了提及辛克莱《宗教的利润》一书的地方，笼统地指出在反宗教宣传中利用此类著作的重要性。

[159]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是苏联为开展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而创办的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1922年1月—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该刊为月刊，1933—1935年为双月刊。

[160] 人民社会党人是1906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人民社会党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应归人民”，即归从无产者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体劳动者，主张对地主土地进行赎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但不触动份地和经营“劳动经济”的私有土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趋于低潮时，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路线。六三政变后，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解状态。二月革命后，该党开始恢复组织。1917年6月，同劳动派合并为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1918年后不复存在。

[161] 指下述约·狄慈根的话：“我们从内心深处蔑视有学位的奴仆们口中的关于‘教育和科学’的华美言辞，关于‘理想的福利’的高谈阔论，他们今天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愚弄人民，就像当年多神教的僧侣们用当时得到的关于自然界的初始知识来欺蒙人民一样。”（见约·狄慈根《社会民主党的宗教》1906年柏林版第34—35页）

[162] 自由射手是15—19世纪法国的非正规的特种步兵部队，在普法战争中曾从事游击活动。这里是在借喻意义上使用的。

[163] 此处原为：“最近我浏览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小册子《宗教的利润》。毫无疑问，作者对待问题的态度和阐述问题的方法是有缺点的。但是本书是有价值的，它写得生动，提供许多具体事实和对比……”

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阅读的《宗教的利润》一书是书的作者寄给她的，随书附有一封信，信中提到他利用自己的小说所进行的斗争。她说：“每天晚上列宁借助英文字典阅读。他对此书反宗教宣传方面不大满意，但喜欢书中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批评。”（见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期第148页）

[164] “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挨揍”一语，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在这部作品里，有一节记载了愚人城一市长米卡拉则的挨打故事。米卡拉则是一个好色之徒。一天夜里，他潜入本城一位出纳员的家中，准备和出纳员的妻子私通，不料被其丈夫发现。于是发生了一场“战斗”，结果，米卡拉则“与其说是厮打了一场，不如说是挨了一顿揍”。被打了一顿的市长大人只好仓皇溜走了事。

[165] 俄国技术协会是以在俄国发展技术和工业为宗旨的科学团体，1866年在彼得堡成立。该协会共有15个部，在全国各地设有数十个分会。协会活动包括出版刊物、举办学校、资助实验、举行普及科技知识的讲座及展览会等。1917年十月革命后，协会改组了自己的活动，于1923年通过了新的章程和《关于工业基本需要》的纲领。参加协会的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技术知识分子和前企业主。1929年协会被查封。

[166] 《经济学家》杂志（《Экономист》）是俄国技术协会第十一部即工业经济部主办的杂志，1921年12月—1922年6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第1期封面上印的是1922年）。列宁称《经济学家》杂志为“白卫分子的公开的中心”。

该杂志第1期是它的编辑Д. А. 卢托欣寄来、由尼·彼·哥尔布诺夫转交给列宁的。